伊羅生著　劉海生譯

中國革命的悲劇

EDITIONS CHAMP LIBRE

劉海生譯
伊羅生著

中國革命的悲劇



Harold Isaacs
LA TRAGEDIE DE LA REVOLUTION CHINOISE
Traduction chinoise de Liu Haisheng.

截至目前，仍未有任何中國歷史家全面地利用報刊書籍及訪問當事人的材料來描述1925—27年中國無產階級的一次失敗了的革命。當事者，無論是國民黨或斯大林主義者，以至中國共產黨都在顚倒黑白、歪曲眞象，毀滅資料、製造假歷史；一切西方的資產階級學者及記者也都指鹿爲馬，妄加毀謗。遂令此一偉大革命之光芒爲時間所遮蓋。東亞叢書爲使此一偉大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史實，爲當代中國人所了解，特重印本書，以刺激此方面的研究；或更從過去歷史的了解中，獲得經驗及教訓，以幫助預將到來的中國和世界的革命運動。



東 亞 叢 書

BIBLIOTHÈQUE ASIATIQUE

中國革命的悲劇

伊羅生著
劉海生譯

中國革命的悲劇

東 亞 叢 書
Bibliothèque asiatique
Éditions Champ Libre

Harold Isaacs
La tragédie de la révolution chinoise
Traduction chinoise de Liu Haisheng, de 1947, augmentée d'un avertissement nouveau de l'auteur, de la préface de Trotsky à l'édition originale de 1938 et de plusieurs photographies. Ce volume, le 11è de la *Bibliothèque asiatique* a été achevé d'imprimer le 20 juin 1973, par Wo Kee Printing Company en son imprimerie de Kowloon, à Hong Kong, pour le compte des Editions Champ libre, 40, rue de la Montagne-geneviève à Paris. Dépot légal en France troisième trimestre 1973. Tirage de la présente édition 3000 exemplaires tous brochés, au format 215 x 125 mm. 548 pp (texte de l'édition de 1947) + 65 pp pour les annexes de la présente édition.
和記

中 國 革 命 的 悲 劇

伊 羅 生 著　劉 海 生 譯

*

東 亞 叢 書 第 十 一 種

承 印 者 ：　和記印刷有限公司

125×215毫米　578頁　照片35頁

1973年6月20日　印數：1—2000

目　錄

7　作者給本書中譯本重版所寫序言

17　托洛次基序（法文）

圖　片

29　本書中文原版之

封　面

扉　頁

版　權

著者弁言

目　錄

托洛次基給本書英文初版所寫導言

53　第一章　叛亂的種子

77　第二章　中國革命的諸問題

107　第三章　新的覺醒

133　第四章　廣州：政權誰屬？

153　第五章　廣州：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政變

177　第六章　從廣州到長江

199 第七章 上海暴動

213 第八章 浪子回家

229 第九章 沉默的陰謀

253 第十章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政變

267 第十一章 武漢：「革命中心」

287 第十二章 「革命中心」的活動

313 第十三章 土地鬥爭

337 第十四章 莫斯科和武漢

357 第十五章 武漢：瓦解

381 第十六章 秋收暴動

401 第十七章 廣州公社

425 第十八章 失敗的後果

445 第十九章 蘇維埃中國的興亡

473 第二十章 新的「民族統一」陣綫

507 註 解

作者給本書中譯本重版所寫序言

給中國革命的悲劇（中國革命史）中譯本重版寫序言，對我來說，是一件特別繁複的工作。一九四七年上海初版的中譯本，是據一九三八年初版的英文本翻譯的。英文本初次面世後，曾經重大的修訂，多次刋行。但這次的中譯本是直接用一九四七年初版本重排。英文本後來的修訂，很明顯地，不能加入這個重印本中。目前這個英文修訂本已有數國文字的翻譯，我希望有一天亦會同樣地出現中文譯本。同時，在這序言中，我覺得應該向這中文版的新讀者說明，書中那些部份經過改變或訂正，而且，他們是怎樣反映以後歷史的判斷，和我自己怎樣逐漸地了解和解釋這些有關事件的過程。

這本書檢討了蘇聯對中國的第一次干涉，和它在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的中國革命底失敗中所扮演的角色。它描述了蔣介石和國民黨後來如何從這些事件中獲得權力。這些最初的經驗影響了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和現在大部份屬於老一輩的高層領導份子。從那時候起，這一早期的歷史極大地影響了在中國發生的種種事件。它為共產主義者終於于一九四九年在中國奪得權力提供了政治上的和心理上的條件和環境，在中共政權和蘇聯關係的發展上，影響尤大。近年來，隨着毛澤東把政權移交給年青一代的時間的逐漸推近（如某些人想的那樣），北京領導圈所出現的政治和私人的鬥爭中，仍舊深深地根植着這段早期歷史的影響。

毛和北京老一輩的領導人，幾乎都有過此歷史所寫的早期經驗。當一九二四年第一次的國共聯盟燃起了一次波瀾壯濶的全國性羣衆革命運動，他們有的已經扮演了領導的角色，有的是年輕的幹部。這個運動勢如破竹地從長江中游盆地冲到上海，一直到一九二七年春天，才給蔣介石的反革命行動所扼殺。情況是，他們以及他們的運動被自己忠心追隨的俄羅斯指導者的策畧帶到一次悲劇性的潰崩，使他們不得不爲生命而逃亡。在城市、在鄉村、成千上萬的人被蔣介石的劊子手所屠殺。現在一般人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認識，多以陝西延安這個偏僻的西北內陸基地爲起點。抗戰期間，共產黨不錯是從這裡重新推展工作，並終於成功地掌握了政權。但回顧前期所發生的事件中，今日的讀者也許能更清楚地看到後期的發展，特別是中蘇關係的破裂的某些根源。更能了解蘇俄爲何成爲支配着中共領導人的思想及行爲的強大的沙文主義和仇外主義所針對的主要目標。

這整段歷史，貫串着一個饒有諷刺性的事實。這事實雖然幾乎從任何觀點看來，都諷刺得夠厲害，但是對那些或多或少有過這一段經歷的人，却是無可言狀地是如此。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中的領導地位乃是由於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那麽大量製造的災難所促成的。斯大林造成這些災難是因爲他以一己民族爲出發的共產主義底基本觀念去看別國的革命鬥爭。在他看來，別國的革命鬥爭，不過是爲俄羅斯利益服務這個至高無上的需要所支配。他把這需要轉化——合理化——成爲保衞世界上唯一的所謂工人國家的需要。托洛茨基反對斯大林的中國政策，認爲這政策是對「民族資產階級」領導的一種迎合。他反對斯大林的革命「階段」說以爲即使在民族資產階級革命的階段，也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成功地領導革命。這不過是俄羅斯歷史上孟什維克與布爾什維克分歧的重演，而列寧早於一九一七年十月奪取政權時解決了這個問題。同樣地，托洛茨基

以他所認為絕不可妥協的列寧主義底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來與斯大林的「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信條對立。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二十二年，毛澤東終於領導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他的成功並非由於斯大林機械的革命階段論，亦非托洛茨基的純粹無產階級論。他以共產黨為無產階級的政黨而藉以保存了它必須的理論上的純粹性，實際上，他用的却是明顯地與列寧不同的策畧，以共產黨領導的農民軍隊從內陸農村進攻城市。掌握政權以後的毛澤東給中國自古至今本已存在的力量所推動，而終於變成了頭號的民族共產主義者。他與斯大林去世後的俄羅斯分離，去追尋他自己的道路，他呼籲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承認北京而非莫斯科為眞正革命主義的中心。斯大林被鞭屍後多年，他仍從到處懸掛斯大林像的北京號召全世界去跟從他。但他所高舉的却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的旗幟。那是說每個國家的工人階級向着社會主義勝利不斷永無止境、絕不妥協、進攻性地前進，從一個國家到另外一個國家，直到囊括整個世界。這是個帶着不可思議因果報應奇妙的辨證法：列寧主義產生了斯大林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的對立。斯大林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又合而成為一個新的革命的毛澤東主義。
這書本身的故事反映了這大段歷史經驗的一小部份。它是那經驗早期的編年史，而由於事件本身和作者對事情的理解的改變，這書亦曾經更動。書的本身自從初版以來，也有過一段多采多姿的經歷。初刊的一九三八年本的鉛版和殘存的成書，於一九四〇年納粹轟炸倫敦時全部被毀滅。在上海出版的盜印英文本流傳較廣，稍後期間，在世界很多角落裡都可以看到這版本。(這是日本佔領時期一間地下印刷舘用柯式版印行的。)一九四四年我在印度發現了油印的節縮本。本書的中文譯本則於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印刷刊行。多年來，此書被稱為「經典」之作而不斷地被引用於無數的書目與附註中。此書本身的數目却越來越稀少。由於事

實再三提示我們，這些早期國共的關係與當前的史實有着很大的關聯，故此很多人透過直接的詢問和書藉報刊的廣告找尋這書。到了一九五一年，這書實在是供不應求，史丹福大學出版社刊行了一個新的修訂本。十年後又刊行了第二個修訂本。這修訂本經過數次的再版，而在最近幾年另行印刷普及本並予以補訂。同時，在這期間，這書被翻譯成日、法、意大利等文字。

假如這中文翻譯本的讀者參考本書的任何其它版本時，他們會發現到在這些版本修訂的改變。但是爲了那些不方便或不可能這樣做的中國讀者，我覺得有義務在這裡嘗試概述此書的修訂版與中文譯本所據的初版之間的不同。有些不同主要是結構上的。例如在初版中某些有關一九二七年以後的中國的章節被取消了，目的是要使這本書回復成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歷史的最初面貌。如其中「中國蘇維埃的興起與崩潰」，記敘了江西時期及長征至延安一章，它詳細的資料在後期的版本中被重新採納爲附錄。

其它的改變却是不同性質的。此書之原意是要提出一個反對共產國際的論辯，它的目的是忠實地依賴着文件紀錄去駁斥共產國際的作僞。共產國際嘗試以這種竄改揑造的手法去埋沒當年在中國眞正發生的事實。內容主體的各種修訂是希望把多餘的論辯，主觀的判語，或重覆的論證取消後，此書更能一針見血。這些修訂大部份只是風格與語調的改變，目的是要使事實與文件更能自呈原意。

除了風格和語調上的改變之外，亦有些地方的變動是我希望透過各次修訂而設法表達我個人對某些史實的判斷的嬗變。所謂判斷往往只是「看法」或「觀點」的同義詞，而觀點又不過是偏見的另一種說法而已。每個作者，尤其是每個歷史家都爲這些偏見所困擾，因爲他無可避免地總受到某一時期的內在或外在因素所左右而形成他對人事的看法。所有歷史及政治的事件都是由種種衝突而引起的，各種看法都是見仁見智，而且按定義來說都蘊含着爭論性的

。這些看法關乎種種人事上的懸案，而所有有關這些懸案的想法都可能轉變，所有的論辯都可能被反駁，所有的觀察都帶偏詖。歷史家的責任，不在乎要求根本不能達到的客觀性，而是首先要盡所能以明察秋毫的勁兒去處理各種事實和它們的紀錄。其次他要清楚自己的偏見並坦白的承認出來，好使讀者閱覽時能夠醒覺。作者的困難是如何盡量使自己的偏見或觀點不會產生作僞的選擇，不會隨意取汰或忽略某些特別事件或某些人物的說話，斷章剪裁的使它們適合自己先存之見或目的。正如我所指出，任何一個讀者很快便會覺得這本書是以很大的偏見寫成的。由於這偏見，那是說由於書對事實的判斷，闡釋和理解，這書當然備受各種不同的政治語言及文字所攻擊，禁止及咒罵，但我很高興能夠這樣說，同樣的攻擊咒罵却從來沒有涉及本書對於特別事情的處理和對資料的運用。由於我太過專心於材料的研究和太熱心找尋可能掌握的材料，主觀觀念任何變動亦不至於更正客觀的事實，這是可理解的。我着手此書是盡量忠實地運用我所能找到的歷史文獻去描述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在中國發生的事件，這始終是本書的目的。而且，我希望在目前重刋的中譯本所根據的原版以及中國讀者將會在適當的時候替自己找到的其它文字的修訂本中，這個宗旨都算是得體的。同時，讓我在這兒懇摯地說一句：這本書的資料不斷地被很多近來研究這時期的中國歷史的人所採用。他們從很多不同的觀點，即是說：偏見，去審查書中所用的大部份資料而自然地產生他們自己對這些資料意義的解釋和判斷。

在此應該強調的是，自從我寫這書以來，我自己對於這些事件的觀點有頗爲巨大的改變。這中文譯本上刋載的已經是差不多三十五年前所成的見解。除非是特別僵化，否則一個研究人類行事的人生活在這動蕩的時代，是不能不產生新觀點，就是說，不能不無間斷地對社會及政治種種問題的變遷，以及我現在認爲更重要的——個人存在的奧秘，取

得新的看法。我那一代的人的經驗使我曾感受過一點，那些認為自己可以幫忙使世界變得更好或更人道的前輩所留給我們的，我也分嘗過一丁點兒，然而，正如那許多超越我的人一樣，我仍然在尋求着我年輕時，尤其是在我寫這書的時候曾一度以為已經獲得解答的問題的答案。

因此，當這本書最初寫成的時候，它反映了，並支持着托洛茨基所提出對中國事件的觀點。作為左翼反對派領袖的托洛茨基提出這些觀點，在俄國共產黨中對斯大林進行鬥爭。（這鬥爭正當中國革命失敗的時候，部份由於這失敗而達到其高潮。）愈鑽研這歷史的資料，我愈覺得托洛茨基事實上對中國每一主要的轉捩點都曾作出十分精確的推測，並極其準確地把這部歷史劇程的主角性格刻劃出來。他對黨官方路線的分析和批判曾屢次被證實。而本書對這些證據作有史以來首次的詳細檢討，這事實是不會隨時間或作者觀點的轉變而改變的。不過，當我開始知道和體驗到中國以外的這些觀念和政治傾向的衝突時，我的觀點確曾轉變過。例如，當這書最初寫成的時候，它接受了托洛茨基認為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及以後俄羅斯是一個工人國家的觀點。托氏以為這工人國家雖然被那些後來居上的（Epigone）領袖和篡權的官僚組織改變得走了樣，然而在世界舞台上，它仍然扮演著托氏所稱「進步」的角式。在我重新修訂此書之前，我便已開始覺得這不過是替史大林統治俄羅斯時代的眞象加以打圓場的八股而已。它着實曾經成為俄羅斯及世界其它地方整整一代的革命者的墓誌銘。俄國在一九三〇年代，這個大清算、大審判的時代的經驗給以「無產階級專政」這觀念一個灰暗和可怕的意義。然而我那一代的很多燥急的年青激烈份子却能一度接受這觀念，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按理論說，是一個短期內帶向更大自由的過渡時期。俄國的經驗教導我們：權威主義和民主的社會主義是絕對矛盾的。而從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基本前提下所產生的一黨專制的政治生活只能導至權力的腐敗

和暴力，而不能適當地替我們追求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目的服務。

雖然我不接受托洛茨基所宣揚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我仍然尊重他有關社會主義革命眞義的一些概念。雖然他始終是孕育極權思想的犧牲品和囚徒，但最後還是他——托洛茨基——起來反抗極權，並成爲一個超越了種種陰謀、權力機器、歪曲中傷和當年史大林主義當權下的血腥鎭壓，仍然巍然存在的革命道德象徵。我們並無需要接受托洛茨基的見解，才能尊重他。然而我却不能毫無顧慮地把他爲本書原版所寫，並載着他對本書的熱情支持的導言，包括在後來各個修訂本子中。托洛茨基在一九四〇年被克里姆林宮的刺客謀殺。我們現在只可以猜測，倘若他當年不死，他對俄國、對如何達成一個新而更民主有效的結合革命思想和行動的方法所可能發展出來的見解，或者臆度他若今日尙存，深思自己的思想從種子萌芽茁壯成爲它現在在毛澤東中國所達到的模樣兒會有什麽感想。至於我自己則堅信沒有任何人或政黨的絕對權力可以隻手空拳達成一個更人道的社會。

因此，當我二十年前開始重新修訂這書的時候，我不能像我三十五年前一樣肯定地判斷，假如二十年代中期的中國革命不受俄國的控制和影響所扭曲，而靠自身力量發展的時候，它將會走上什麽途徑。有好一段時間我曾經有這麽一個想法：既然有澎湃羣衆運動暴潮、又在城市與農村中有創造基本上民主，新制度、新機構的推動力，那麽中國的革命很可能發展出可以同時保存民主目的與民主做法的新革命形式。我覺得當時史大林在俄國的專政並未鞏固，很可能不能完全成功地控制在中國嶄現的革命政權，並且可能被一個較俄國革命更成功的中國革命改變其自身的性質。然而此後發生的事情顯示出這個觀測的奢望。自一九二七年的失敗到一九四九年的勝利，中國共產黨成長爲只可以在中國推行的一個新的而且較以前任何地方所曾經歷

過的獨裁力量更爲苛厲的極權專政統治。在此期間，當時還在發育的暴政下的俄國逐漸成長爲可怕的史大林專政。史大林的承繼者不得不改變一下這種統治以保證國家的繼續發展，雖然尚未能積極到答應發展那被長期拖延的自由政治制度。至於中國方面，從過去轉化成現在的鬥爭中所經歷的痛苦仍然在繼續着，正如中國現代史經過了一個階段又一個階段，中國革命的悲劇始終是那一齣戲中被迫俯首聽命的中國人民被越來越加重的包袱壓得頭越來越低。也許在這裡引用William Morris的話，我更能表達這觀點轉變的精神和實質。從一九五一年所有版本的題獻頁都刊載他這幾句話：「人們鬥爭並失敗了，儘管他們失敗了，却反而使他們得到他們所爭取的；可是，當這東西實現出來，却又和他們原意不相符，於是另外一些人又得在另一個名稱下爲他們心中所想的那個事物再展開鬥爭。」

最後要提到的是這本書的編成。此書於一九三四年在中國開始撰寫，當時距離所描述的事件僅七年，即我來華後三年。我於一九三〇年抵達中國，花了一年的時光艱苦地研究輯錄及翻譯一大堆當時的資料，例如報紙的剪貼、書籍、小册子、佈告及文件等。部份資料是從北京的各圖書舘找到的。但大部份却是長久被埋沒的私藏。在這工作中，我的朋友J.C.L. 君曾給予我很大的幫助。他後來被國民黨秘密警察逮捕及囚禁。我始終不知他最後的命運。我到現在對於寫出他的全名仍然覺得躊躇，因爲假若他仍生存並保持我認識他那時候的性格的話，那麽，他必也是共產黨秘密警察所追捕的人。在歐洲，我曾經爲找尋該時期共產國際所印行的資料而搜遍圖書舘及書店。這並非容易的事，因爲共產黨碰到他們較早時期的出版物中刋有叫他們受窘的言論時，他們有辦法把這幾期出版物或甚而整卷地毀掉。論中國事情，在荷蘭我曾會見了H.Sneevliet，他用馬林（Maring）這名字作爲共產國際駐中國初期代表之一。我從他那裡獲得了他對所曾參加過的事件所寫的回憶。　他於

五年後當納粹侵入荷蘭被殺 。在法國 ，我見到 Allbert Treint 。他在一九二七年仍服務於共產國際在華行政分處。他給了我一些關於當時在莫斯科舉行的討論的很有價值的資料。此書的研究和寫作，全部差不多花了四年的時間。對原著的準備及後來的修訂 ，以至寫這新序言意念 ，Viola Robinson Isaacs 都給予我不可缺少的幫助和合作。我還須感謝東亞叢書，由於他們的興趣和努力，使這本書得以再版面世。

伊羅生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於美國麻省劍橋

Je tiens tout d'abord à dire que, si l'auteur de ce livre se place sur le terrain du matérialisme historique, ce n'est en rien une raison suffisante pour me faire approuver son ouvrage. De nos jours l'étiquette marxiste me prédispose pour le moins à la méfiance. En corrélation étroite avec la dégénérescence de l'Etat soviétique, le marxisme vient de connaître cinquante ans d'altérations et de déclin. D'instrument d'analyse, de théorie révolutionnaire, il est devenu une apologétique à bon marché. Au lieu d'analyser la réalité, il ne sert plus qu'à sélectionner des sophismes pour le compte de clients haut placés.

Au cours de la révolution chinoise de 1925-1927, l'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joua un rôle très important que ce livre met très bien en lumière. Pourtant nous chercherions en vain, dans la bibliothèque du Komintern, un seul livre qui donne une vue d'ensemble de la révolution chinoise. Au lieu de cela, on trouve par dizaines des ouvrages « conjoncturels » qui reflètent docilement chaque zigzag de la politique de l'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ou, plus précisément, de la diplomatie soviétique en Chine ; et qui adaptent à ces zigzags tant les faits que le sens global du problème. A l'opposé de cette littérature, qui ne peut rien apporter, sinon le dégoût, le livre d'Isaacs représente un travail scientifique du début à la fin. Il repose sur l'étude consciencieuse d'une grande quantité de documents de première main et d'autres travaux. Il faut ajouter qu'Isaacs, avant de travailler pendant trois ans à cet ouvrage, en avait passé cinq sur place, comme journaliste.

L'auteur de ce livre est un révolutionnaire qui s'occupe d'une révolution, et il ne voit pas pourquoi il devrait s'en cacher. Pour les philistins, le point de vue d'un révolutionnaire ne saurait être que dépourvu d'objectivité scientifique. Je pense tout le contraire. Seul, un révolutionnaire, pourvu bien sûr d'une méthode, est capable de mettre à nu les lignes de force d'une révolution. Appréhender la pensée est quelque chose d'essentiellement « pratique ». La volonté est un élément indis-

pensable pour pénétrer les secrets de la nature et de la société. Tout comme un chirurgien distingue avec une attention extrême entre les différents tissus de l'organisme, le révolutionnaire, s'il possède une attitude sérieuse devant sa tâche, doit analyser consciencieusement la structure, les fonctions et les réflexes de la société.

Pour comprendre la guerre actuelle entre le Japon et la Chine, il faut prendre la seconde révolution chinoise comme point de départ. On y retrouve non seulement des forces sociales identiques, mais aussi fréquemment les mêmes protagonistes. Il suffit de noter que Chiang Kai-shek (Jiang Jieshi) est le personnage principal de ce livre. Au moment où j'écris ces lignes, il est difficile de prévoir quand et comment se terminera la guerre sino-japonaise. Mais ce qui sortira de ce conflit actuel en Extrême-Orient, de toute façon, ne sera que provisoire. La guerre mondiale qui approche avec une force irrésistible remettra en question le problème chinois, et avec lui les autres problèmes de la domination coloniale. Tel sera le véritable rôle d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 partager la planète selon la nouvelle répartition des forces impérialistes. Le terrain du conflit ne sera plus bien sûr le « pédiluve » méditerranéen, ni même l'océan Atlantique, mais le bassin du Pacifique ; et la Chine, un quart de l'humanité, sera l'enjeu le plus gros. Le sort de l'U.R.S.S., le second gros enjeu, se décidera également en Extrême-Orient. S'apprêtant pour cette rencontre de titans, le Japon tente de s'assurer un terrain de manœuvres aussi grand que possible sur le continent. Cependant que, de leur côté, la Grande-Bretagne et les Etats-Unis ne perdent pas de temps. On peut de toute façon prédire avec certitude, et cela est, pour l'essentiel, reconnu par les maîtres actuels de nos destinées, que ce ne sera pas la guerre mondiale qui dictera la décision finale : elle sera suivie par une série de révolutions qui, non seulement mettront en cause les résultats de la guerre, mais toutes les conditions qui y avaient conduit.

Cet avenir n'a rien d'idyllique, il faut bien le reconnaître, mais Clio, la muse de l'Histoire, n'a jamais été membre des sociétés de femmes pacifistes. La précédente génération, qui a passé à travers la guerre de 1914-1918, n'a rempli aucune de ses tâches, et a laissé à ses héritiers un lourd fardeau de guerres et de révolutions. Evénements tragiques et importants de l'histoire humaine qui vont souvent de pair. Cela déterminera l'arrière-plan des prochaines décennies. Il nous reste seulement l'espoir que cette nouvelle génération, qui ne peut guère récuser cet héritage, aura au moins appris à mieux comprendre les lois de son époque. En ce qui concerne la révolution chinoise de 1925-1927, elle ne trouvera pas de meilleur guide que ce livre.

En dépit de l'incontestable grandeur du génie anglo-saxon, il faut bien voir que c'est précisément dans les pays anglo-

saxons que les lois des révolutions sont les moins bien comprises. Pour expliquer cette lacune, on peut d'une part dire que la « réalité » de la révolution, dans ces pays, remonte à un passé trop lointain et amène même, chez les sociologues patentés, un sourire condescendant, comme le feraient des fredaines de gamins. D'autre part, le pragmatisme, si caractéristique de la pensée anglo-saxonne, est la chose du monde la moins utilisable pour comprendre les crises révolutionnaires.

La révolution anglaise du XVIIe siècle, tout comme celle du XVIIIe en France, avait entrepris de rationaliser la société et sa structure, en la débarrassant, par exemple, des séquelles de la féodalité, laissées par le pouvoir royal, et en la soumettant aux lois de la libre concurrence qui, à cette époque, semblaient être les lois du « bon sens ». Pour ce faire, la révolution des Puritains se drapa dans des atours bibliques, révélant par là même son incapacité de saisir sa propre signification.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si influente sur la pensée progressiste américaine, était guidée par les formules du plus pur rationalisme. Le bon sens qui s'effraie encore lui-même et a besoin d'emprunter le déguisement des prophètes bibliques, ou le bon sens sécularisé qui ne voit la société que comme le résultat d'un « contrat » rationnel, restent les moules fondamentaux de la pensée anglo-saxonne quand elle se préoccupe de philosophie ou de sociologie.

La société réelle de l'histoire ne s'est pas édifiée, suivant Rousseau, sur un « contrat » rationnel, ni, selon Bentham, sur le principe du « plus grand bien », mais s'est déroulée « irrationnellement », sur la base des antagonismes et des contradictions. Et la révolution devient inévitable lorsque ces contradictions de classes en sont arrivées au point de rupture. C'est précisément cette inéluctable nécessité du conflit, qui n'a rien à voir avec le bien ou le mal, mais seulement avec la relation objective entre les classes, qui donne aux révolutions, ainsi qu'à la guerre, l'aspect le plus dramatique de l'irrationalité fondamentale du processus historique.

« Irrationnel » ne veut pas dire arbitraire. Tout au contraire dans les prémisses, au niveau le plus infime, d'une révolution, dans son explosion, son ascension et son déclin, il y a une profonde cohérence interne que l'on peut saisir et, en grande partie, prévoir. Les révolutions, et on l'a dit plus d'une fois, ont leur propre logique, qui n'est pas celle d'Aristote, et encore moins la pragmatique demi-logique du « bon sens ». Il s'agit de la plus haute fonction de la pensée : la logique du développement et de ses contradictions, autrement dit, la dialectique.

L'obstination du pragmatisme anglo-saxon, et son hostilité pour la pensée dialectique, ont elles-mêmes leurs causes objectives. De même qu'un poète ne peut atteindre la dialectique d'une façon livresque sans expériences personnelles, de même

une société à son aise, ayant perdu l'habitude des convulsions et pris celle du « progrès » continu, est incapable de comprendre la dialectique de son propre développement. De toute façon, puisqu'il n'est que trop évident que ce privilège, pour le monde anglo-saxon, a disparu dans les ténèbres du passé, l'histoire s'apprête à donner à la Grande-Bretagne aussi bien qu'aux Etats-Unis de sérieuses leçons de dialectique.

C'est sans thèse *a priori,* et sans chercher à se raccrocher à des analogies, mais à partir de la structure vivante de la société chinoise, et de ses lignes de force internes, qu'Harold Isaacs tente de cern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 révolution chinoise. C'est en cela que réside la valeur méthodologique de son livre. Le lecteur en retirera non seulement une image à la trame extrêmement fine de la marche des événements mais, et ceci est plus important, apprendra à en discerner les ressorts sociaux. Ce n'est que sur cette base qu'il est possible d'évaluer correctement les programmes politiques et les mots d'ordre des partis en lutte. Ils sont les signes les plus révélateurs et les plus évidents du processus, même s'ils n'ont pas de caractère indépendant et décisif pour l'analyse finale.

Les buts immédiats de cette révolution chinoise inachevée lui donnent un caractère « bourgeois ». Ce terme utilisé comme un simple écho des révolutions bourgeoises du passé, n'est pas d'un grand secours. De crainte que l'analogie historique ne nous jette dans un piège, il est nécessaire de la vérifier à la lumière d'une analyse sociologique concrète. En Chine, quelles sont les classes en lutte ? Quels sont les rapports de toutes ces classes, et comment, dans quels sens, se transforment ces rapports ? Quelles sont les tâches objectives de la révolution chinoise, tâches imposées par l'évolution de la situation ? Quelles classes ont entre leurs mains, les moyens de mener à bien ces tâches ? Le livre d'Isaacs donne la réponse, précisément, à ces questions.

Les pays coloniaux, ou semi-coloniaux, donc arriérés, et qui représentent la plus grande partie de l'humanité, diffèrent par leur degré d'arriération, offrant une échelle historique qui va de la vie pastorale, sinon du cannibalisme, jusqu'à la civilisation industrielle la plus avancée. La combinaison des extrêmes à un degré plus ou moins grand caractérise toutes les nations arriérées. De toute façon, cette hiérarchie dans l'arriération, si l'on peut dire, est déterminée par le rapport entre la civilisation et la barbarie dans chacun des pays coloniaux. L'Afrique équatoriale est loin derrière l'Algérie, le Paraguay derrière le Mexique, et l'Abyssinie derrière l'Inde ou la Chine. Ayant en commun une même dépendance à l'égard des métropoles impérialistes, leur dépendance politique peut bien avoir les traits d'un esclavage colonial ouvert (Inde, Afrique équatoriale) ou l'apparence d'un Etat souverain (Chine, Amérique latine).

C'est dans le domaine agraire que le sous-développement trouve son expression la plus cruelle et la plus systématique. Aucun de ces pays n'a mené sa révolution démocratique jusqu'à une concrétisation effective. Les demi-mesures des réformes agraires se perdent dans les rapports demi-esclavagistes que reconstituent la pauvreté combinée à l'oppression. La barbarie agraire va de pair avec l'absence de routes, l'isolement des provinces, le « particularisme » médiéval et l'absence de conscience nationale. Purger les relations sociales des séquelles du passé, et des incrustations du néo-féodalisme, est la première des tâches pour ces pays.

Mener à bien la révolution agraire est impensable si l'on n'a pas préalablement débarrassé le pays de l'impérialisme, qui implante ses propres structures capitalistes, et corollairement soutient et recrée les vieilles formes de l'esclavage. Le combat pour la démocratie et la création d'un Etat national passe, sans détour possible, par un soulèvement ouvert contre la domination étrangère.

Ce retard historique n'implique pas la reprise pure et simple des modèles offerts, voici deux ou trois siècles, par des nations modernes comme la France ou l'Angleterre. Au contraire, il entraîne de nouvelles formes sociales hybrides, dans lesquelles les dernières conquêtes de la technique et de l'organisation capitaliste se combinent à la barbarie des rapports féodaux ou semi-féodaux, les modifiant et créant un nouveau rapport de classes spécifique.

Pas une seule des tâches de la révolution « bourgeoise » ne saurait dans ces pays sous-développés être réglée sous l'égide de la bourgeoisie nationale, parce que cette dernière est apparue avec la finance impérialiste, comme une classe étrangère, sinon hostile, à la population. Chaque étape de son évolution la lie de plus en plus intimement au capital étranger dont elle est le commissionnaire, et au niveau national elle n'est qu'un gigantesque compradore. La petite-bourgeoisie coloniale est la première victime dans la lutte inégale avec le capital étranger, perdant tout pouvoir économique, s'appauvrissant et se déclassant, elle ne peut songer à jouer un rôle politique indépendant. La paysannerie, la classe la plus importante numériquement, la plus arriérée et la plus opprimée, est capable de soulèvements locaux, de mener une guerre de partisans, mais elle a besoin d'être dirigée par une classe plus avancée, plus centralisée pour que ses luttes soient élevées à une cohérence nationale. Cette mission incombe naturellement au prolétariat colonial qui, depuis ses débuts, s'est opposé non seulement à la bourgeoisie impérialiste, mais encore à sa propre bourgeoisie nationale.

En la sortant d'un agglomérat de provinces et de clans, liés par la proximité géographique et l'appareil bureaucratique, le développement capitaliste avait donné à la Chine un simulacre

d'unité économique. Le mouvement révolutionnaire des masses transposa cette unité en gestation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ans le langage de la conscience nationale. Une nouvelle Chine s'est créée dans les grèves, les soulèvements paysans et les expéditions militaires de 1925-1927. Pendant que les généraux, liés à leur propre bourgeoisie et à celle de l'étranger, ne pouvaient que déchirer le pays, les ouvriers chinois devinrent les porte-drapeaux d'une irrésistible et urgente unité nationale. Ce qui n'est pas sans rappeler le combat du Tiers-Etat français contre le particularisme, ou celui des Italiens et des Allemands pour leur unité nationale. Mais à la différence des premières nations capitalistes, où l'achèvement de l'unité nationale incomba à la petite-bourgeoisie, sinon aux landlords (en Prusse), en Chine ce fut le prolétariat qui apparut comme le moteur initial et le chef potentiel de ce mouvement. Par là même, le prolétariat mettait la bourgeoisie en danger de se voir retirer la direction de la patrie unifiée. Le patriotisme, tout au long de l'histoire, a été en rapport avec le pouvoir et la propriété. Face au danger, les classes dominantes n'ont jamais arrêté de démembrer leur propre pays aussi longtemps que cela leur permettait de conserver le pouvoir sur une parcelle de celui-ci. Rien de surprenant donc, à voir la bourgeoisie, ici représentée par Chiang Kai-shek, pointer ses armes sur le prolétariat, porte-bannière de l'unité nationale. La description et l'analyse de ce tournant, qui constituent la matière du livre d'Isaacs, fournissent la clef pour comprendre les problèmes fondamentaux de la révolution chinoise, aussi bien que la présente guerre sino-japonaise.

La bourgeoisie prétendument « nationale » tolère tous les aspects de la dégénérescence nationale, tant qu'elle lui garantit son existence et ses privilèges. Ce n'est qu'au moment où le capital étranger prend en main la direction globale du pays que la bourgeoisie coloniale doit se souvenir de ses obligations « nationales ». Sous la pression des masses, elle peut même entrer en lutte. C'est alors une guerre livrée contre une des puissances impérialistes, la moins susceptible d'arrangements, avec l'espoir de passer au service d'une autre, plus généreuse. Chiang se bat contre les agresseurs japonais dans les limites fixées par ses patrons britanniques ou américains. Seule la classe qui n'a rien à perdre, sinon ses chaînes, peut conduire la guerre contre l'impérialisme à sa véritable fin, l'émancipation nationale.

Ce qui précède, sur le caractère spécifique des révolutions « bourgeoises » dans les pays retardés dans leur développement historique, n'est pas qu'une analyse théorique. Avant la seconde révolution chinoise (1925-1927), ces conceptions ont subi un grandiose test historique. L'expérience des trois révolutions russes (1905, février et octobre 1917) n'a pas moins de signification pour le XXe siècle qu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our le XIXe. Pour saisir le sens de la révolution chinoise, le lecteur doit avoir à l'esprit la lutte de tendances à l'intérieur du mouvement révolutionnaire russe, car ces tendances ont exercé et continuent à exercer directement une profonde influence sur la politique du prolétariat chinois, et indirectement sur celle de la bourgeoisie chinoise.

C'est précisément à cause de son retard historique que la Russie tsariste devint le seul pays où le marxisme, comme doctrine, et la social-démocratie, comme parti, parvinrent à un stade de développement puissant avant la révolution bourgeoise. En Russie, tout naturellement, le problème de la liaison entre la lutte pour la démocratie, c'est-à-dire la liaison entre révolution bourgeoise et révolution socialiste, fut soumis à l'analyse théorique. Le premier à envisager la question, vers 1880, fut le fondateur de la social-démocratie russe, Plékhanov. Dans la lutte contre le populisme (narodnikisme), une variété de socialisme utopique, Plékhanov établit que la voie russe vers le socialisme passait, comme pour le reste du monde, par l'étape du capitalisme, qui lui permettrait d'acquérir un régime démocratique-bourgeois, nécessaire pour susciter la lutte ultérieure du prolétariat en faveur du socialisme. Plékhanov non seulement séparait la révolution bourgeoise de la révolution socialiste, laquelle était repoussée dans un avenir indéterminé, mais encore il dressait un tableau très différent des forces en présence. La révolution bourgeoise devait être menée à bien par le prolétariat allié à la bourgeoisie libérale, et ainsi ouvrir la voie au progrès capitaliste. Après quelques décennies, lorsqu'un haut niveau de développement capitaliste serait atteint, le prolétariat reprendrait le combat direct contre la bourgeoisie, et pour la révolution socialiste.

Lénine, pas immédiatement, bien entendu, revisa cette doctrine. Au début de ce siècle, il situa, avec plus de consistance que Plékhanov, le problème agraire en tant que centre de la révolution bourgeoise en Russie. De là, il arriva à la conclusion que la bourgeoisie libérale était hostile à l'expropriation des landlords, et que pour cette raison elle chercherait un compromis avec la monarchie sur la base d'une constitution à la prussienne. Contre l'idée de Plékhanov — alliance avec la bourgeoisie libérale — Lénine proposa l'alliance entre le prolétariat et la paysannerie, la collaboration de ces deux classes devant amener l'établissement d'une « dictature démocratique bourgeoise du prolétariat et de la paysannerie ». Cette force serait seule capable de créer, en brisant le refus féodalo-policier du régime impérial, un système de paysans libres, qui ouvrirait la porte à une évolution de type américain. La formule de Lénine était un progrès immense, en ce qu'elle indiquait, contrairement à celle de Plékhanov, la tâche centrale de la révolution : à savoir un bouleversement des structures paysannes, et la seule combinaison réaliste des classes

apte à mener à bien cette mission. Mais jusqu'en 1917 Lénine restait attaché à la conception traditionnelle sur la révolution « bourgeoise ». Comme Plékhanov, il postulait que c'est seulement une fois parachevée la révolution « bourgeoise » que la question de la révolution socialiste viendrait à l'ordre du jour. Lénine en outre, considérait, et cela contrairement au mythe que les épigones ont bâti à ce sujet, qu'après ce stade démocratique, la paysannerie en tant que telle, ne pouvait rester l'alliée du prolétariat. Il fondait ses espérances socialistes sur les ouvriers agricoles et les paysans à moitié prolétarisés qui vendaient leur force de travail.

Le point faible de la conception léniniste était cette idée de « dictature démocratique bourgeoise du prolétariat et de la paysannerie ». Contradiction interne : un bloc politique de deux classes, dont les intérêts ne coïncident pas totalement, exclut la possibilité d'une dictature commune. Lénine lui-même insistait sur les limites de cette « dictature du prolétariat et de la paysannerie » en la qualifiant de bourgeoise. Il entendait par là que pour préserver l'alliance, le prolétariat aurait à renoncer, dans la révolution à venir, aux objectifs socialistes. Autant dire que le prolétariat ne serait plus dictateur ; dans les mains de qui serait donc concentré le pouvoir ? dans celles de la paysannerie ? Elle est la classe la moins capable de remplir ce rôle. Lénine laissa ces questions sans réponse jusqu'à ses fameuses thèses d'avril 1917. C'est seulement à ce moment qu'il se débarrassa de la notion traditionnelle de révolution « bourgeoise » et de la formule « dictature démocratique-bourgeoise du prolétariat et de la paysannerie ». Il déclara que seule la lutte pour la dictature du prolétariat pouvait mener à bien la révolution agraire, et offrir la liberté aux minorités nationales opprimées. Le régime de dictature du prolétariat ne pouvait se limiter, par sa structure même, à l'ossature de la propriété bourgeoise. La domination du prolétariat mettait immédiatement à l'ordre du jour la révolution socialiste, qui ainsi n'était plus séparée chronologiquement de la révolution bourgeoise, mais au contraire fondue avec elle, en en devenant un prolongement organique. Le rythme de transformation socialiste de la société, et les limites qu'elle atteindrait dans un prochain avenir, dépendraient non seulement des conditions internes, mais aussi bien des conditions extérieures. La révolution russe n'était qu'un maillon de la révolution mondiale. Voici ce qu'était, en très schématique, l'essentiel de la révolution permanente (ininterrompue). C'est précisément cette conception de la révolution qui assura au prolétariat la victoire d'octobre 1917.

L'ironie de l'histoire est amère : non seulement la révolution russe n'a pas aidé le prolétariat chinois, mais au contraire elle est devenue, sous sa forme retournée et réactionnaire, un de ses obstacles majeurs. Le Komintern des épigones commença

par canoniser cette formule de « dictature démocratique-bourgeoise du prolétariat et de la paysannerie», à laquelle Lénine, sous l'influence de l'expérience historique, avait dénié toute valeur. Comme toujours une formule qui s'était survécue, servait à camoufler un contenu politique diamétralement opposé à ce qu'elle avait exprimé en son temps. L'alliance révolutionnaire des ouvriers et des paysans scellée par des soviets librement élus, détenteurs du pouvoir, le Komintern la remplaça par un bloc bureaucratique des directions de partis. Le droit de représenter la paysannerie fut, d'une façon inattendue, accordé au Guomindang, un parti intéressé d'une façon vitale à la pérennité de la propriété capitaliste, non seulement des moyens de production, mais encore de la terre. L'alliance du prolétariat et de la paysannerie fut gonflée jusqu'à devenir un « bloc des quatre classes » : ouvriers, paysans, petite-bourgeoisie urbaine et bourgeoisie soi-disant «nationale ». En d'autres termes, le Komintern ramassa une formule écartée par Lénine, uniquement pour ouvrir la voie à un retour à la politique de Plékhanov, et de plus sous une forme masquée, donc plus pernicieuse.

Pour justifier la subordination politique du prolétariat à la bourgeoisie, des théoriciens du Komintern (Staline et Boukharine) soulignèrent que l'oppression impérialiste impliquait une alliance de « toutes les forces progressives du pays ». C'était précisément l'argument menchévique en son temps. Il suffit de remplacer impérialisme par tsarisme. En réalité, l'assujettissement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au Guomindang signifiait sa scission avec le mouvement des masses, et une trahison directe de ses intérêts historiques. A cet égard, c'est Moscou qui prépara le désastre de la seconde révolution chinoise.

Pour beaucoup de philistins qui, en politique, tendent à substituer les devinettes du « bon sens » à l'analyse scientifique, la controverse parmi les marxistes russes, sur la nature de la révolution et la dynamique des forces de classe semblait de la pure rhétorique. L'histoire prouva, en tout cas, la signification profondément vitale des « formules doctrinaires » du marxisme russe. Ceux qui ne l'auraient pas encore compris ont de quoi méditer dans le livre d'Isaacs. La politique de l'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en Chine montre ce qu'il serait advenu de la révolution russe si les menchéviques et les socialistes-révolutionnaires n'avaient pas été poussés de côté, à temps, par les bolchéviques. La thèse de la révolution permanente vient de recevoir une nouvelle confirmation, par l'absurde ; non par la victoire, mais par la catastrophe.

Il n'est pas possible d'identifier la Russie à la Chine. Malgré de fortes ressemblances, les différences sont trop évidentes. Néanmoins ces différences viennent renforcer les conclusions du bolchévisme. La Russie tsariste avait quelque chose d'un

pays colonial, par le rôle prépondérant du capital étranger, mais, comparée à son homologue chinois la bourgeoisie russe bénéficiait d'une indépendance infiniment plus grande. La Russie elle-même se trouvait être une nation impérialiste. Aussi rachitique qu'il fût, le libéralisme russe avait quelques assises et des traditions plus longues que le libéralisme chinois. A gauche de la bourgeoisie libérale, il y avait des partis petits-bourgeois puissants, révolutionnaires ou semi-révolutionnaires vis-à-vis du tsarisme. Les socialistes-révolutionnaires étaient parvenus à obtenir un soutien considérable parmi la paysannerie, principalement dans ses couches les plus élevées. Les sociaux-démocrates (menchéviques) drainaient une grande partie de la petite-bourgeoisie urbaine et de l'aristocratie ouvrière. Ce furent précisément ces trois partis : libéral, S.-R., et menchévique qui depuis longtemps préparaient, et en 1917 formèrent définitivement, une coalition qu'on n'appelait pas encore le front uni, mais qui en avait tous les traits. A l'opposé de cela les bolchéviques, dès avant 1905, avaient émis un jugement sans appel sur la bourgeoisie libérale. Politique qui trouva sa plus haute expression dans le « défaitisme » de 1914-1917, et lui permit de conquérir le pouvoir.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a Russie et la Chine — dépendance incomparablement plus grande de la bourgeoisie chinoise vis-à-vis du capital étranger ; absence de traditions révolutionnaires dans la petite-bourgeoisie ; polarisation des ouvriers et des paysans sur la bannière du Guomindang — exigeaient une ligne politique encore plus dure, si c'était possible, que celle suivie en Russie. Là-dessus, la section chinoise du Komintern, sur l'ordre de Moscou renonça au marxisme, accepta les scolaires et réactionnaires « principes de Sun Yat-sen », entra dans les rangs du Guomindang, acceptant de se plier à sa discipline. En d'autres mots, ils se sont enfoncés plus loin que les menchéviques ou les S.-R. ne l'ont jamais fait dans la voie de la soumission à la bourgeoisie. Et ils refont la même politique dans le cadre de la guerre anti-japonaise.

Comment la bureaucratie issue de la révolution bolchévique peut-elle appliquer en Chine, comme dans le reste du monde, des méthodes aussi fondamentalement opposées à celles du bolchévisme ? Il serait trop superficiel de répondre seulement en se référant à l'incapacité ou à l'ignorance de tel ou tel individu. Le fond du problème, c'est qu'avec de nouvelles conditions de vie, la bureaucratie a acquis de nouvelles structures mentales. Le parti bolchévique conduisait les masses ; la bureaucratie commença à leur donner des ordres. Les bolchéviques gagnèrent la possibilité de diriger en exprimant correctement les intérêts des masses ; la bureaucratie dut fréquemment recourir aux ordres, afin de soutenir ses propres intérêts contre ceux des masses. Ces méthodes autoritaires gagnèrent naturellement l'Internationale. Les dirigeants moscovites en

vinrent tout à fait sérieusement à croire qu'il serait possible d'imposer à la bourgeoisie chinoise d'aller à gauche de ses intérêts et aux ouvriers et paysans chinois à droite des leurs, en suivant les diagonales tirées par le Kremlin. C'est justement pendant la révolution qu'exploités aussi bien qu'exploiteurs reconnaissent avec la plus grande conviction leurs intérêts, si les classes antagonistes pouvaient glisser sur les diagonales, la guerre civile ne serait jamais nécessaire. Forte de l'autorité de la révolution d'octobre et de celle de l'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pour ne pas parler d'inépuisables ressources financières, la bureaucratie transforma le jeune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de force motrice en frein à l'instant le plus crucial de la révolution. A la différence de l'Allemagne ou de l'Autriche, où la bureaucratie pouvait imputer aux sociaux-démocrates une part dans les responsabilités de la défaite, en Chine il n'y avait pas de sociaux-démocrates. C'est le Komintern qui a monopolisé la faillite de la révolution chinoise.

Le contrôle du Guomindang sur la plus grande partie du sol chinois n'a été possible que grâce au puissant mouvement national des masses en 1925-1927. L'extermination de ce mouvement, d'une part concentrait le pouvoir dans les mains de Jiang, et d'autre part le condamnait à des demi-mesures dans le combat contre l'impérialisme. La compréhension de la révolution chinoise est ainsi directement utilisable pour comprendre la guerre sino-japonaise. Cette étude historique acquiert par là toute son actualité politique.

En Chine la guerre et la révolution seront intimement liées dans l'avenir le plus immédiat. Le projet japonais d'asservir à jamais, ou au moins pour longtemps, un pays gigantesque en contrôlant ses centres stratégiques, n'est pas seulement révélateur d'une certaine avidité mais aussi d'une imbécillité certaine. Le Japon arrive trop tard. Déchiré par ses contradictions internes, le Japon du Mikado ne reproduira pas l'histoire de l'ascension britannique, et la Chine est bien au-delà de l'Inde des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Les nations colonisées ont engagé aujourd'hui un combat pour leur indépendance, qui connaîtra toujours plus de victoires. Dans de telles circonstances, même si la guerre actuelle en Extrême-Orient devait se terminer par une victoire japonaise, même si la victoire ne s'accompagnait pas presque immédiatement d'une conflagration mondiale (ce qui n'est pas le moins du monde certain pour ceci comme pour cela), la domination japonaise sur la Chine serait brève ; peut-être seulement les quelques années nécessaires à un nouvel essor économique en Chine, le temps de mobiliser une fois de plus les masses ouvrières.

Les trusts et les konzerns japonais suivent déjà le sillage des militaires pour avoir leur part du butin encore disponible, et le gouvernement japonais tente de planifier les appétits des

groupes financiers qui voudraient se tailler leur part dans la Chine du Nord. Si jamais le Japon réussissait à conserver les positions conquises, ne serait-ce que dix ans, cela signifierait avant tout une industrialisation intensive de la Chine du Nord, dans le cadre des intérêts militaires de l'impérialisme japonais. Nouvelles voies ferrées, entreprises sidérurgiques, puits de mines, filatures, s'élèveraient rapidement.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nation chinoise recevrait une immense impulsion. Des centaines de milliers de nouveaux prolétaires chinois seraient mobilisés en un laps de temps très court, et d'un autre côté la bourgeoisie chinoise accroîtrait sa dépendance à l'égard du capital japonais, et serait encore moins capable que par le passé de se tenir en tête d'une guerre nationale, pour ne rien dire d'une révolution nationale. En face de l'agresseur étranger, il ne restera plus qu'un prolétariat numériquement augmenté, socialement renforcé, dont la maturation politique sera plus achevée, et qui sera appelé à diriger la Chine rurale. La haine des esclavagistes étrangers est un ciment puissant pour la révolution. On peut penser que la prochaine révolution nationale sera l'affaire de la présente génération. Pour résoudre les tâches qui lui incombent, l'avant-garde du prolétariat chinois doit assimiler totalement les leçons de 1925-1927. Et le livre d'Isaacs, à cet égard, est une contribution unique. Il reste à espérer que ce livre sera traduit en chinois aussi bien que dans les autres langues.

Léon Trotsky
Coyoacan, D.F., 1938.





悲劇的幕後導演：托洛次基、列寧、斯大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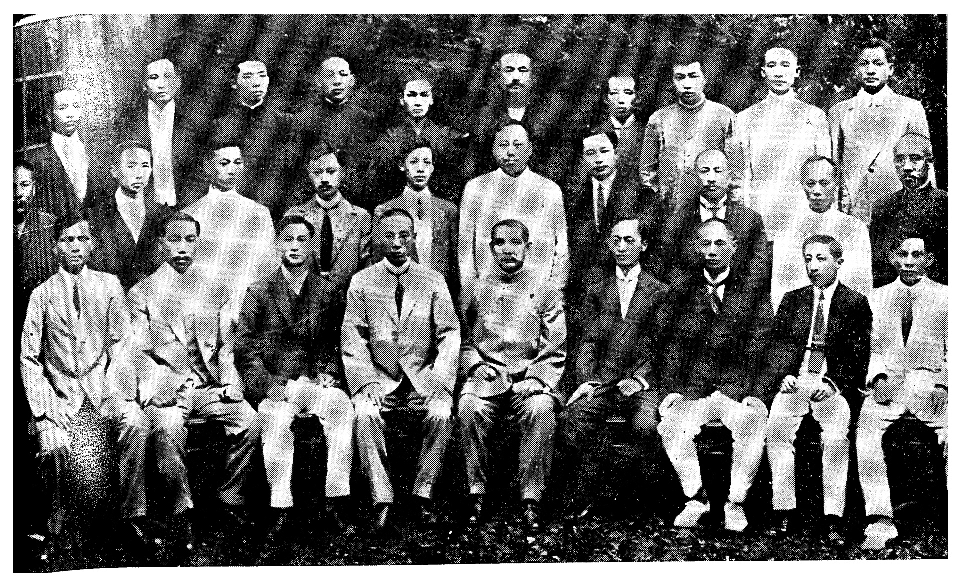
1925—27年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失敗所造成的災難，共產國際對華政策，特別是斯大林的國家主義，要負最大的責任。

本書大部份照片來自巴黎大學的收藏，我們不可能將本書有關人物的照片全印出來。東亞叢書將印「五千圖片看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一書，將會有這些照片。

特別要注意的是此書只有很少老百姓的照片，有時只見到他們的屍骸。窮人被剝削無聲無息謙卑地死去；歷史書籍只有剝削者的形象！

中山伉儷，中爲孫科





1913年 6 月23日中華革命黨成立於東京，孫中山被推爲總理

尤烈三、孫中山、陳少白、楊鶴齡（自左至右）攝於1887年 2 月



1908年興中會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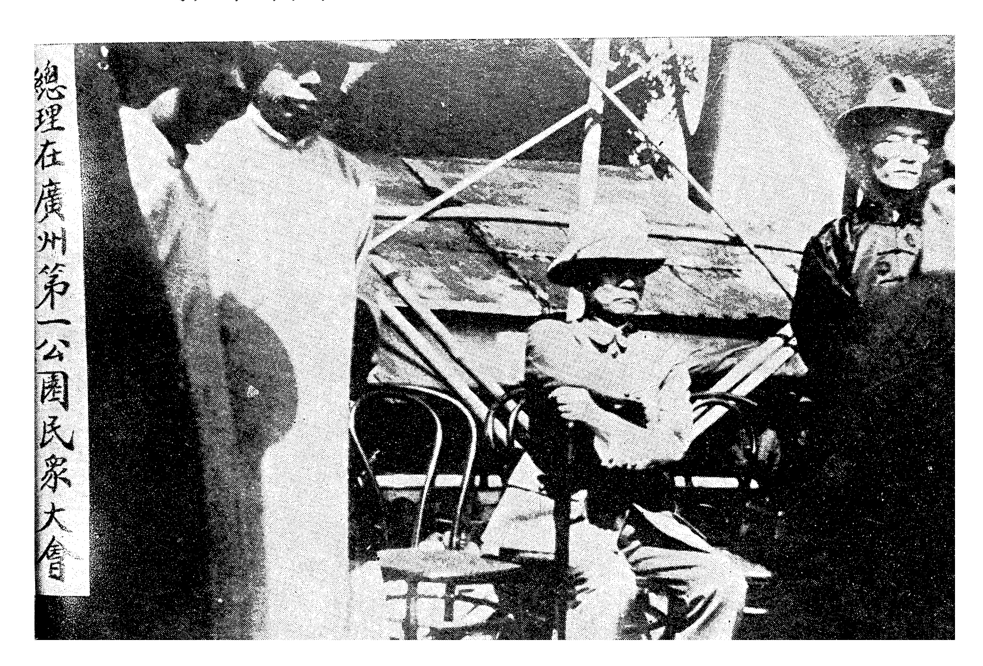
支部歡迎孫中山

1908年新嘉坡中國同盟會成立，中爲孫中山

1912年國民政府成立後孫中山率文武官員致祭明太宗墓於南京明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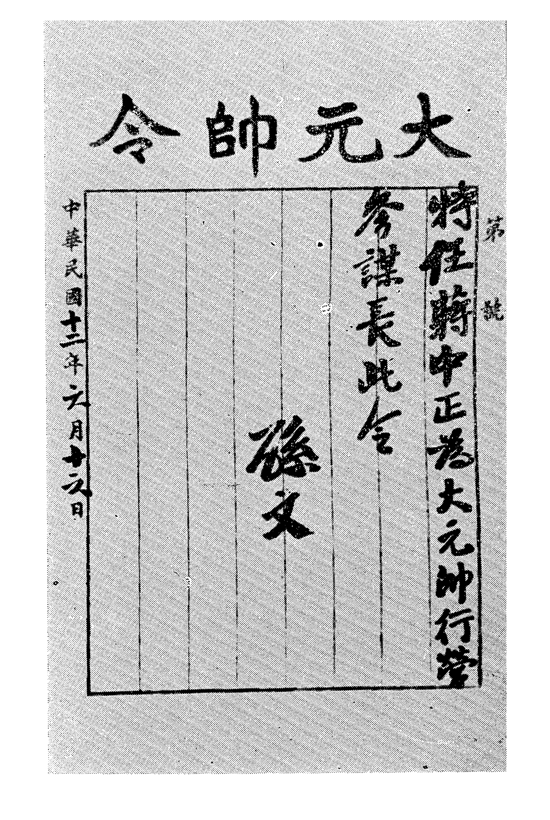
廖仲愷

孫中山在廣州公園民衆大會上演講



1921年孫中山東征並對廣州商團訓話

1921年孫中山與夫人在廣州



大元帥令

第　號

特任蔣中正為大元帥行營參謀長此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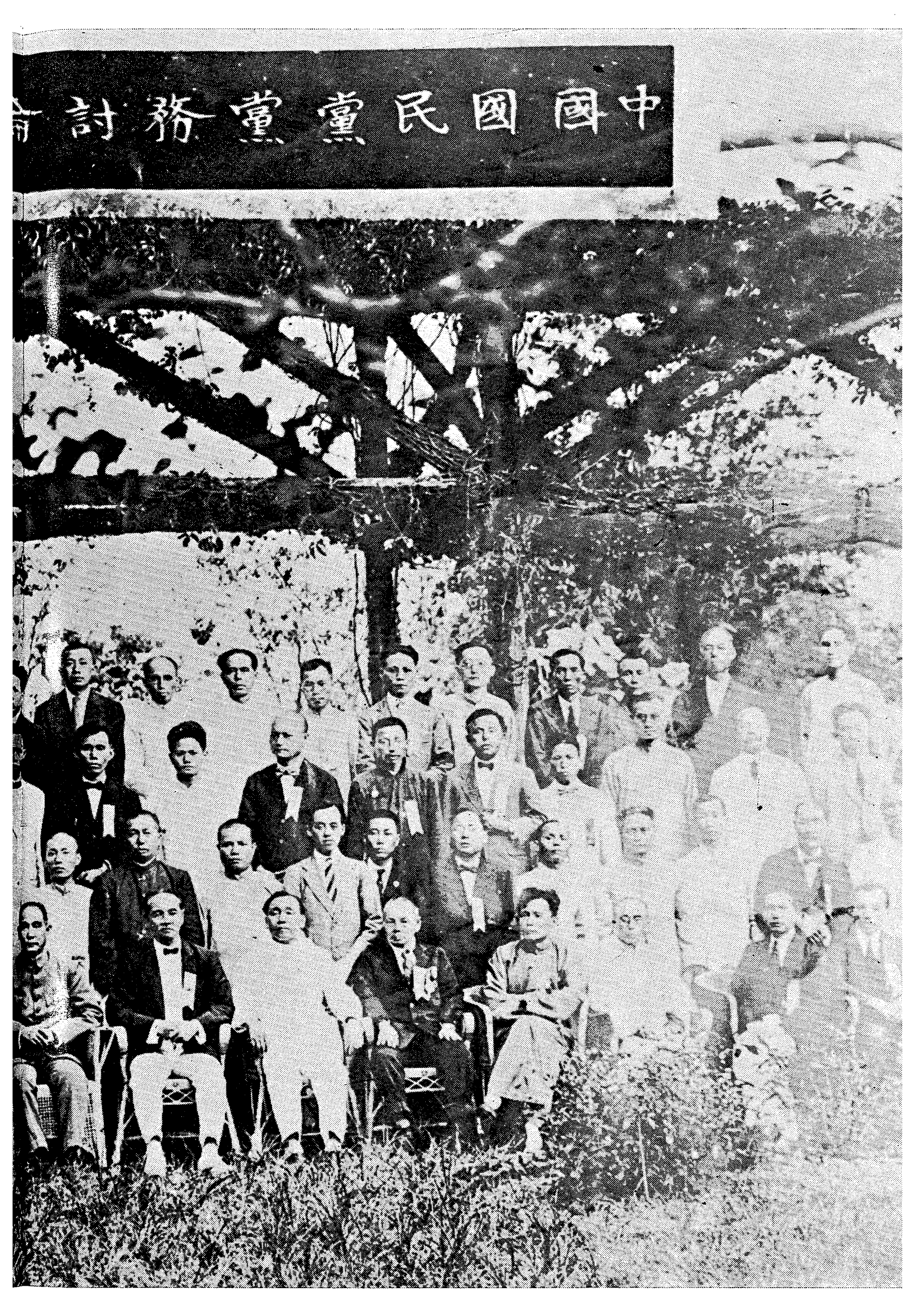
孫文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十六日

胡漢民及其女秘書



1923年10月10日在廣州大元帥



行營舉行之中國國民黨黨務討論會

1913年北京戲劇界歡迎黃興、陳其美。



1902年孫中山與家族合影。中坐爲楊太夫人，前左立者爲孫科，後中左爲胞兄孫眉，後中右爲孫中山

1913年北京戲劇界歡迎黃興、陳其美。

中華民國七年國民黨黨員同志撮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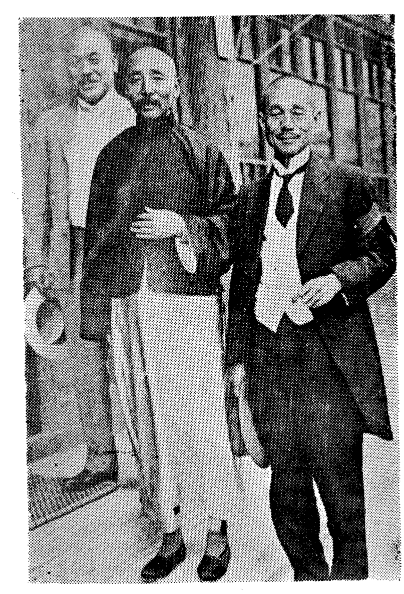
軍閥羣像



張宗昌（中） 孫傳芳（右）

馮玉祥　閻錫山　唐生智

張宗昌　段祺瑞　何鍵1941.3.30(重慶)



張作霖（中）1927年拜訪日大使館離開時照



曹 錕



一九四〇年一月卅日吳佩孚和他的肖像



吳 佩 孚

被屠殺的農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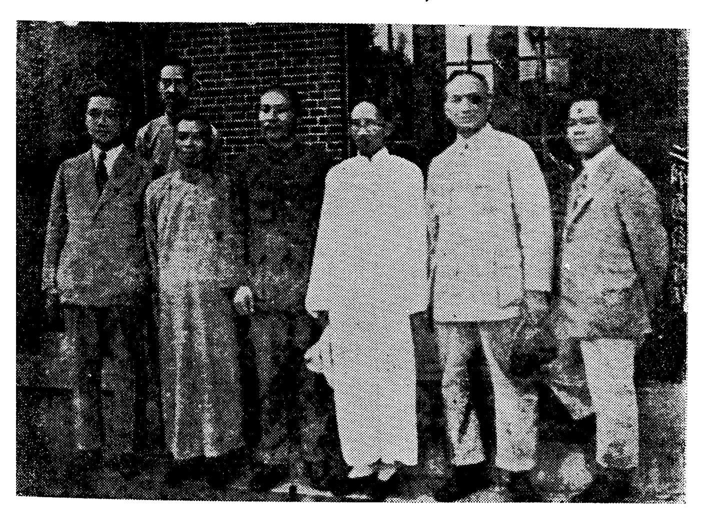


北 伐 時 的 女 兵



1 9 2 7年4月天津處决「暴徒」

汪精衛、李宗仁、朱培德、蔡元培、褚民誼
（自左至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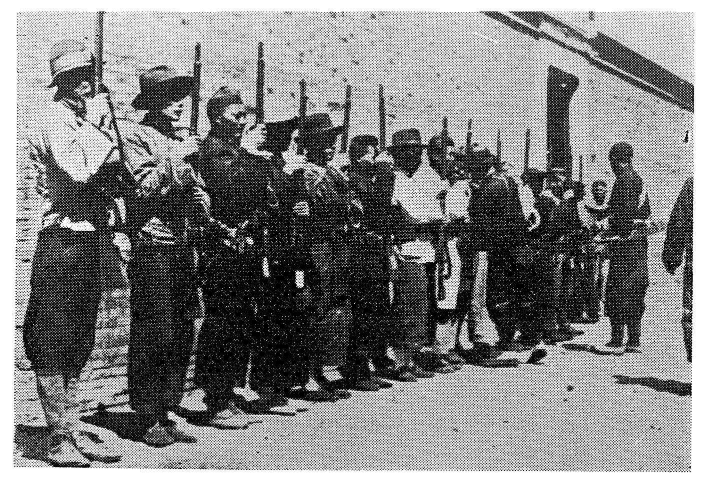
陳　獨　秀



李大釗臨刑前

1927年4月18日南京政府成立典禮
蔣介石、胡漢民、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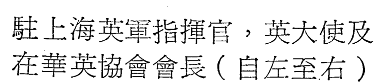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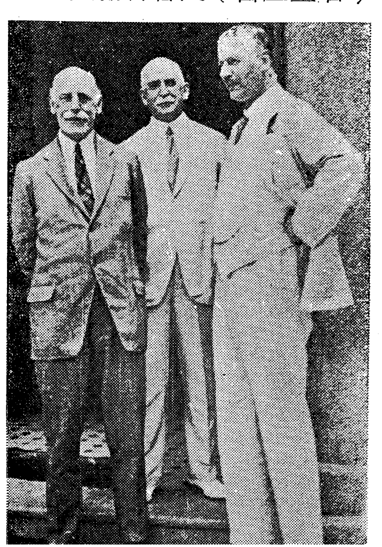
1927年上海大罷工時的工人糾察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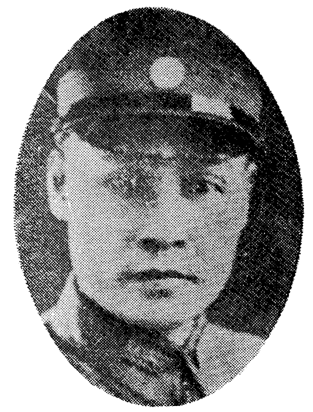


張　　羣



駐上海英軍指揮官，英大使及
在華英協會會長（自左至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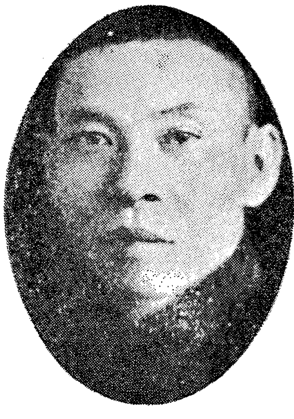
楊　　虎

上海大老闆們和他們所支持的蔣介石





張嘯林



杜月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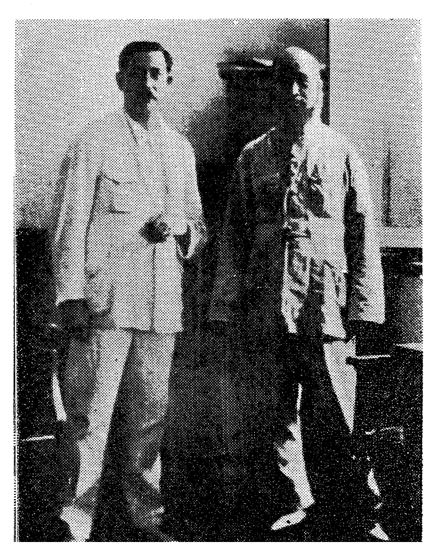
黃金榮



廣州學生反帝示威



孫中山和他的蘇聯顧問在廣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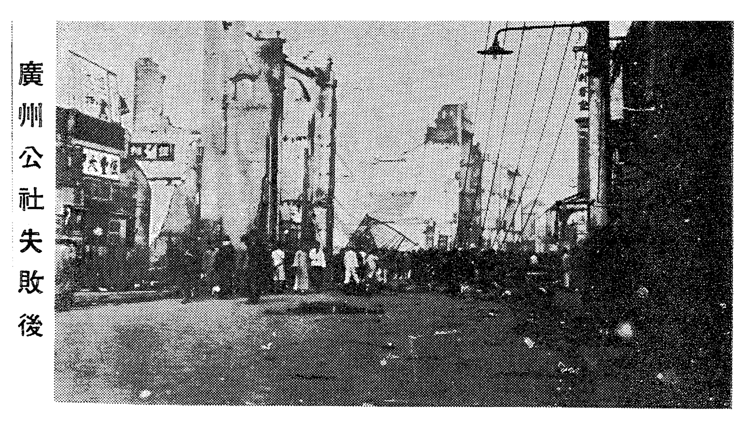


鮑羅廷和于右任



鮑羅廷夫婦，共產國際駐華特使，中共黨後台老闆

廣州公社失敗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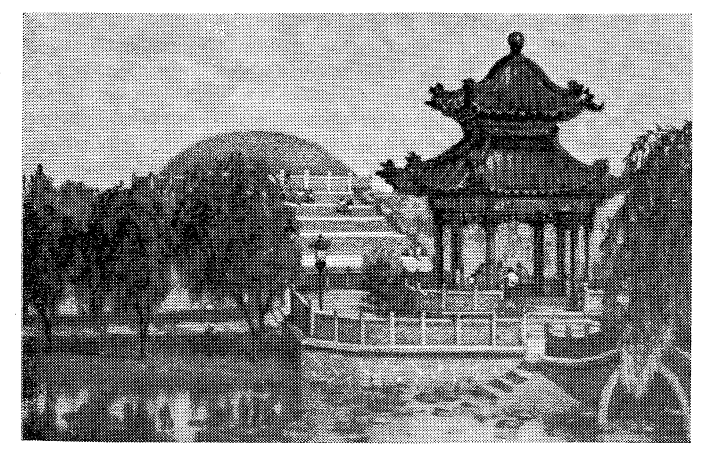

市容


成羣的共產黨人被押赴刑場


死囚


蘇聯副領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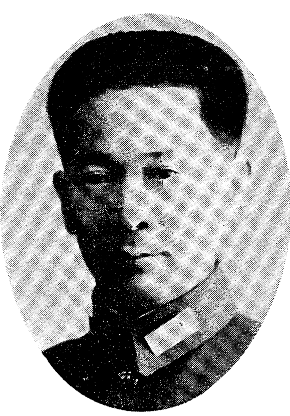
收屍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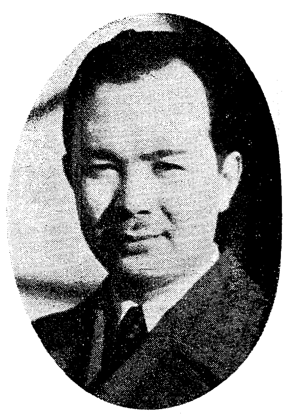


廣州公社烈士陵園

廣州公社的劊子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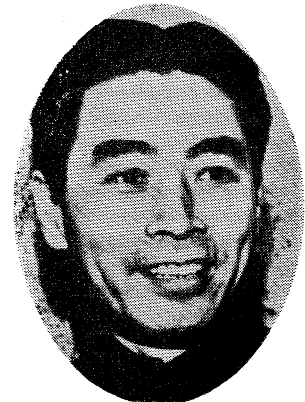

李福林


張發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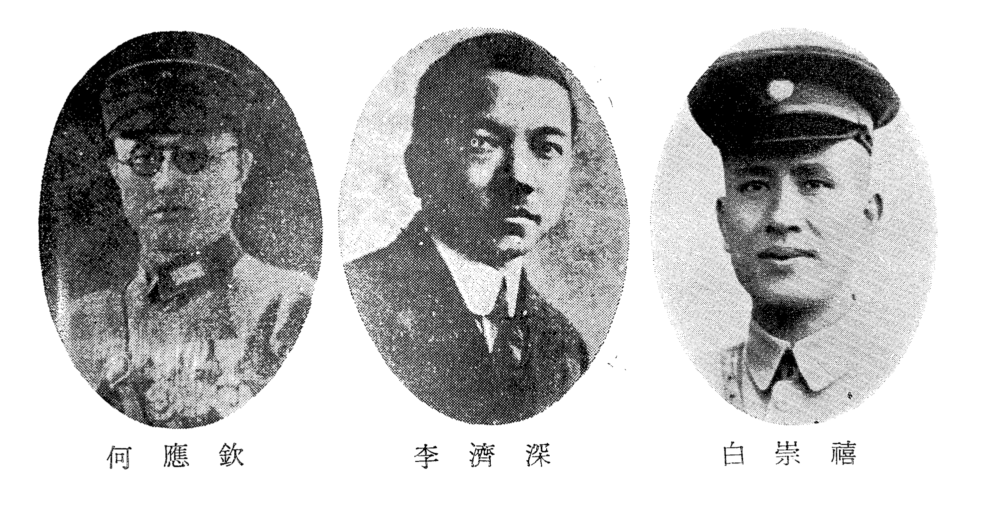

黃琪翔

共產黨領袖


賀龍


周恩來


毛澤東



何應欽　　李濟深　　白崇禧

1938年1月19日廣州公社失敗十年後，歡喜冤家又再聚到一起。(自左至右)黃琪翔、陳銘樞、郭沫若、張發奎、葉挺。郭沫若和葉挺看來已忘記了十年前被張黃追捕險遭殺害一事。親手屠殺大批共產黨員的黃琪翔渡過他快樂安祥的晚年，於1971年病死北京。



張繼　于右任　戴傳賢1941.4.30(重慶)

夏斗寅　鈕永建　李石曾

孫科　陳銘樞1939.9.28　孔祥熙



陳 立 夫　　陳果夫1941.3.30(重慶)　　宋 子 文

鄧 演 達　　宋 慶 齡　　陳 友 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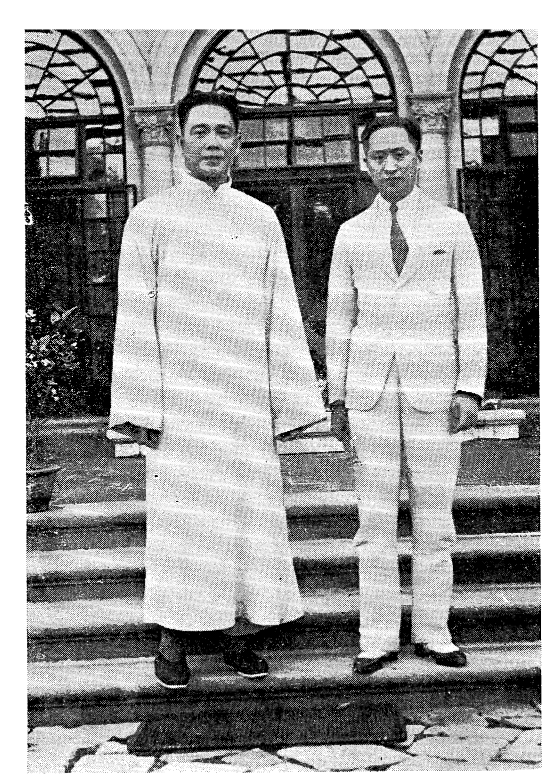
陳 公 博　　周 佛 海　　李 宗 仁



1942年 4 月17日重慶中美文化協會招待盟軍
圖爲宋靄齡、宋慶齡、宋美齡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七日蔣介石由滬抵南京光華門機場



顧維鈞（右）　汪精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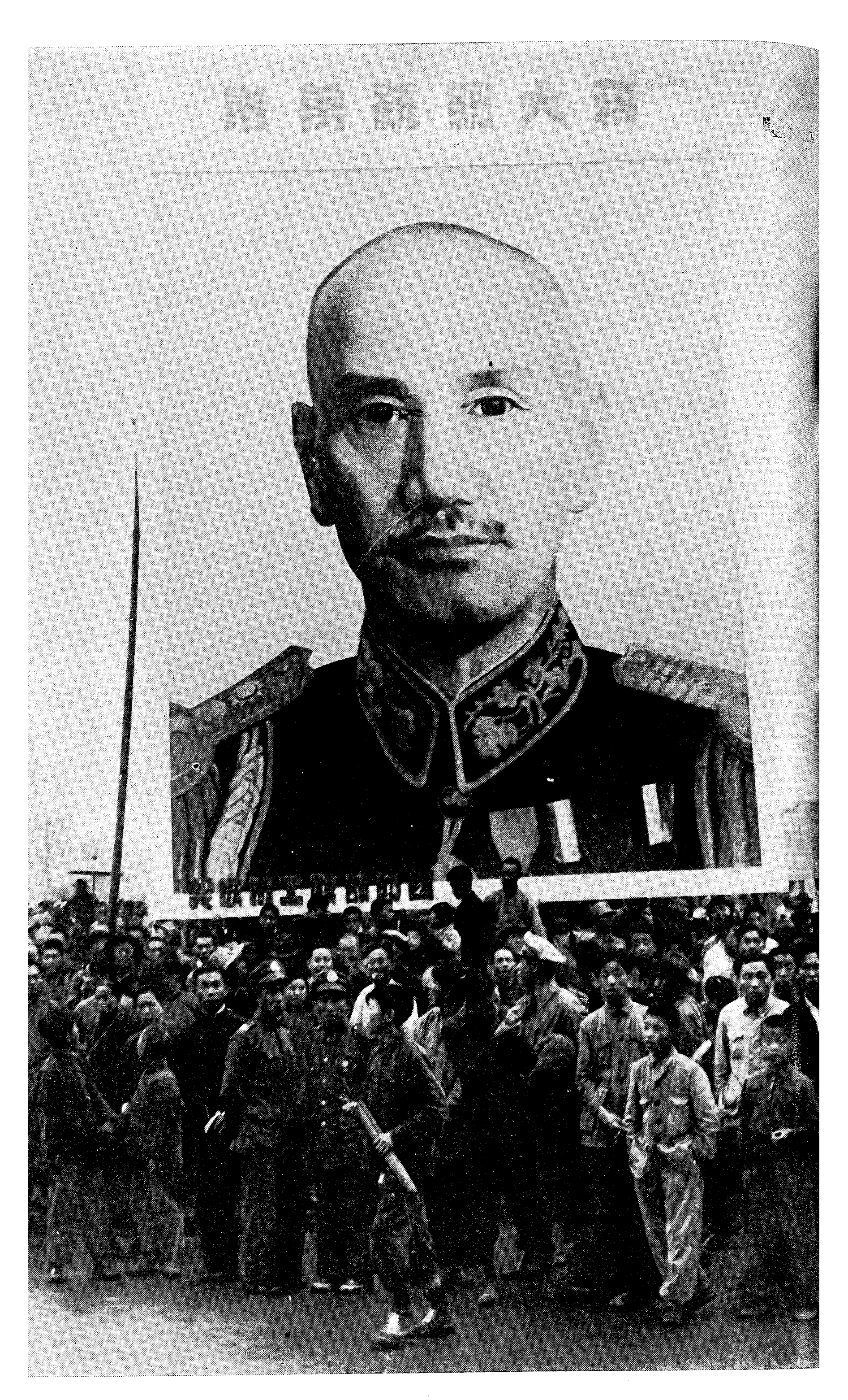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蔣介石遊江西廬山。左爲馮玉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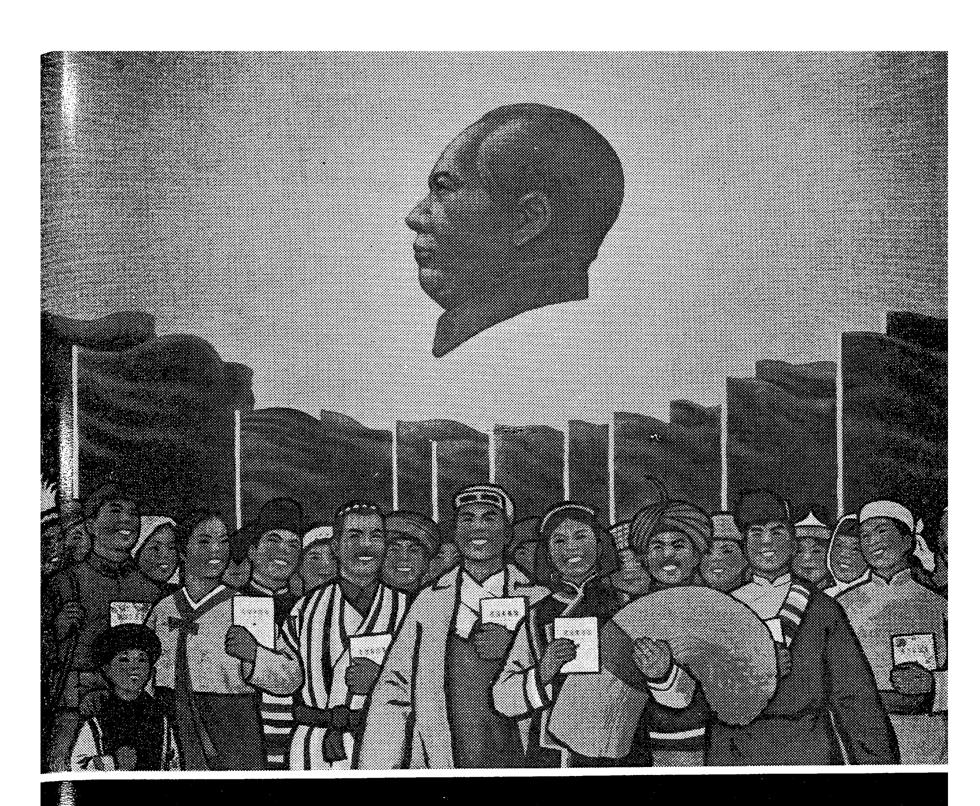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之馮玉祥。十二年後，他在一艘斯大林的船上被烤熟。



1940年3月蔣介石與蔣經國在重慶



1948年5月20日南京各界遊行慶祝蔣介石就總統職



中国唱片
M·806
33⅓

社會主義道路最寬廣

——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文工團演唱(奏)的節目

THE SOCIALIST ROAD IS THE BROADEST OF ALL

PERFORMANCES BY THE CULTURAL TROUPE OF THE LIANGSHAN
YI NATIONALITY AUTONOMOUS CHOU, SZECHUAN PROVINCE

待　　續


中國革命史

中　國　革　命　史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Harold R. Isaacs 著

劉　海　生　譯

中國革命史

著者　Harold R. Isaacs

譯者　劉海生

發行者　嚮導書局
上海四馬路一三五號

發行人　陳羅特

每本定價基數拾圓

一九四七年三月　日初版

著者弁言

這本書是將近四年工作的結果，牠的寫作的動機乃由於發現一九二五——二七年震撼中國的偉大事變，尚無詳盡的研究。當時發生的社會大破局，其教訓之作出適逢新事變開始發生，故尤其切合時機。此次新事變乃發生於本書泰半殺青之後，在本書結尾的幾章中有所闡釋。

許多友人借閱珍貴之資料、扎記、報章、文件、小冊子及書籍，以供本書準備寫作之用，著者實深銘感。此種材料均有其自身之歷史，蓋國民黨自一九二七年後，到處一經發現牠們，則加以焚燬；而共產國際的檔案庫縱或保有上述全部文獻，但對於勤求史實而排拒平空作偽的人，是閉門不納的。

因為這種資料，頭一次在這裏運用的是如是之多，又因為共產國際進行與這些事變有關的歷史偽造運動有十年之久，著者從當代文獻方面採用精確的，恐怕甚至過量的引文，其目的一方面充作印證，一方面充作未來學者的指南。中國名稱的拼音，在各國語文中，差異甚大，但已按照中國最通用之英語，加以劃一（抱括引文中者）。J・C・L對中文文獻之譯助，在此特致謝忱。

就中著者最感激的是他的合作者，維奧拉・羅賓生，訛誤之處，均蒙她斧正。

伊羅生，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五日於紐約。

目　錄

著者序言
導言……………………………………………………………一
第 一 章　叛亂的種子…………………………………………一一
第 二 章　中國革命的諸問題……………………………二五
第 三 章　新的覺醒……………………………………………五五
第 四 章　廣州：政權誰屬？……………………………八二
第 五 章　廣州：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政變……一〇二
第 六 章　從廣到長江……………………………………一二六
第 七 章　上海暴動…………………………………………一四七
第 八 章　浪子回家…………………………………………一六〇
第 九 章　沉默的陰謀……………………………………一七六
第 十 章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政變……………二〇〇
第十一章　武漢：『革命中心』……………………………二一三
第十二章　『革命中心』的活動……………………………二三三
第十三章　土地鬥爭…………………………………………二五九
第十四章　莫斯科和武漢…………………………………二八四
第十五章　武漢：瓦解……………………………………三〇四
第十六章　秋收暴動…………………………………………三二九
第十七章　廣州公社…………………………………………三四九
第十八章　失敗的後果……………………………………三九二
第十九章　蘇維埃中國的興亡…………………………三九〇
第二十章　新的『民族統一陣線』……………………四一九
註　　釋

托洛次基給本書英文初版所寫

導　　言

首先，本書作者乃屬於歷史唯物論學派這一個簡單的事實，在我們的眼中，完全不足以爲他的這一著作贏得嘉許。在目前的條件之下，馬克思主義這個標記，首先祇能在我們的心中引起不信，而不能叫我們先行接受了。與蘇維埃國家的墮落密切相關，馬克思主義在過去的十五年中經歷了一個空前的衰落與貶損的時期。從一個分析與批評的工具變成爲一種廉價辯護的工具。牠不在分析事實，而祇忙於爲高升的奴才們的利益挑選詭辯。

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國革命中，共產國際起了一個很大的作用，本書對牠有很詳細的描寫。但在共產國際的文彙中，我們如果想找到一本能多少企圖予中國革命以一幅周詳的圖畫的，却總是徒勞，不過我們還能找到幾十種『行情性』的著作，牠們卑順地反映着共產國際政策，或更正確說，蘇維埃對華外交政策的每一個曲折，且把事實與一般的論斷穿鑿附會於每一個曲折。這種文獻祇能叫人引起心裡的反感，而伊羅生的書則與此相反，牠從頭至尾代表着一本科學的著作。他秉着科學的良心，研究了大量直接材料與補充材料，乃以此種研究作爲本書的根據。伊羅生從事本書的著作，花了三年多的光陰。還有一點也得說明的，就是他以前以記者及中國生活觀察者的資格，在中國度過了差不多有五年之久。

本書著者以革命家的資格研究革命，他覺得並無理由去隱

瞞這一點。在庸人俗子看來，一個革命的觀點實際上就等於科學的客觀性之缺如。我們以爲恰恰相反，祇有一個革命家——當然他得具有科學的方法——才能暴露出革命的客觀動力。一種思想，要是能夠了解事物，那末，一般說來都不是潛想的而是行動的。爲要滲透到自然與社會的秘密中去，意志的成分，便不可少，正像一個外科醫生（人的生命依靠在他的解剖刀上），以極度的注意力分別出一個機體中各種不同的肌胳一樣，一個革命家（如果他對他的任務具有嚴肅態度的話），必須以嚴格的良心，分析社會的結構，牠的作用與反射。

要了解目前的中、日戰爭，必須以第二次的中國革命作出發點。在這兩個場合中，我們不僅遇見了相同的社會力量，而且還常常遇見同樣的人物。祇要提到蔣介石這個人物在本書中佔着中心地位，就夠說明這一點了。當這幾行文字正在寫的時候，還難於預言中日戰爭將在何時與如何結束。不過遠東目前衝突的結局，無論如何，祇具有臨時的性質。那個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正在臨近的世界大戰，將把中國問題拿來與殖民地統治的其他問題重新作一次觀察。因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眞正問題在於：依照帝國主義間力量的新關係來重分地球。將來主要的鬥爭場當然不是立立普脫國（註）裡的洗澡管——地中海，甚至也不是大西洋，而是太平洋的盆地。戰鬥的最重要的目的物將是中國這個含有全人類四分一的國家。蘇聯——未來戰爭中的另一個大注——的命運，也將在某種限度以內決定於遠東。爲這一次巨人們的衝突作準備——東京今天便企圖在亞洲大陸上給自己保證一個儘可能廣大的操演場。大不列顛與北美合衆國也同樣地不願錯失時機。不過，我們可以確定地說：世界大戰仍不能造成最後的結果，因爲在牠的後面將跟着發生許多次的革命，牠們不僅將重新檢討戰爭的決定，並且還要解決所有那些引起戰爭的條件——這一點，實際上連這些目前命運的締造者們也都承認的。

這個前途，我們必須承認牠絕不是一首田園詩，而是克雷奧，即是歷史的女神，她從來不曾做過貴婦人和平會的會員。經歷這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大戰的較老的一代人，不曾解決他們任務中的一個。他們把戰爭與革命的重負作爲遺產傳給了新的一代，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事情與最悲慘的事情時常是比肩前進的。牠們確實地將造成未來數十年代的背景。現在我們祇能希望那不能擅自脫離遺傳環境的新生代，至少要更好地，學習到他們所生息的時代的法則。爲要熟悉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中國革命，在今天是找不到一個比本書更好的指導了。

雖然盎格魯薩克森人的天才無疑是偉大的，但人們也不能不見到最不懂得革命法則的人，却正在盎格魯薩克森族的國家中這一個事實。這事情的解釋一方面在於：這些國家中的發生革命已成爲很久的過去，所以那些官式的『社會學家們』對革命彷彿對兒時的狂歡一樣，祇能引起謙遜的微笑。另方面，在盎格魯薩克森人思想中佔如此顯著地位的實驗主義，要想用以了解革命的危機那是最沒有用的。

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與十八世紀的法國革命一樣，其任務在於使社會的結構『合理化』，即是要肅清社會上封建的鐘乳石與石筍，並使社會受自由競爭這個法則的支配；自由競爭在那個時代，彷彿是『常識』的法則。爲要做到這一點，清敎徒革命便給自己穿上了聖經的衣飾，因此暴露出一種純粹幼稚的能力，竟致不能了解牠本身的意義。法國革命對美國的進步思想曾發生了很大的影響，那次革命是爲純粹唯理主義的公式所引導的。常識（牠還害怕自己，故求助於聖經上先知們的假面具）或世俗化的常識（牠把社會看成爲一種合理『契約』的產物），直至如今還是盎格魯薩克森思想在哲學與社會學領域內的基本形態。但是歷史上的眞實社會，可不曾依照了盧梭的說法，而在一個合理的『契約』上建造起來，也不曾遵照着邊沁的意

（註）格利佛遊記中的小人國——譯者。

見而根據於『最大幸福』的原則：牠是在衝突與矛盾的基礎上，『不合理地』開展着的。爲使革命成爲不可避免，階級衝突得緊張至破裂點。恰恰是這個衝突之歷史地不可逃避的必然性（牠不依賴着善意或惡意，而是依賴於階級之客觀的相互關係）造成了革命與戰爭——這個歷史過程『不合理』基礎之最精采的表現。

不過『不合理』的意思，並非等於一任己意。恰恰相反，在革命之分子運動式的準備中，在牠的爆發中，牠的上升與低落中，有一種深刻的內部法則在，牠能被人了解，且在主要之處，能爲人預見。誠如人們不止一次地說過：革命具有牠們自身的邏輯。但這不是亞里士多德的邏輯，甚至更不是『常識』之實驗主義的半邏輯。牠是思想之較高的機能：發展及其矛盾的邏輯，也就是辯證法。

這樣看來，盎格魯薩克森的實驗主義的頑固及其對辯證法思想的仇視，自有其物質的原因。恰恰像一個詩人沒有本身經驗而徒然讀書得不到辯證法一樣，一個富裕的社會，不受慣震動，習於不斷的『進步』，是不能了解牠自身發展的辯證法的。不過，此種盎格魯薩克森世界的特權，極顯然已退向過去之中了。歷史正在準備教授大不列顛與美國以幾課認眞的辯證法。

本書作者試將中國革命的性質不從先天的定義與歷史的類比中演繹，而從中國社會之活的結構及其內在力量的動力中求得。這是該書主要的方法論上的價値之所在。讀者將不僅欣賞一幅關於事件進展之結構甚好的圖畫，而更重要的還將學習着了解這些事件的社會的總發條。祇有站在這個基礎上，才能正確的評量鬥爭着的政黨的政綱與口號。這些政綱與口號在過程中雖不是獨立的，而且在最後分析中也不是決定的因素，但還是革命過程之最明顯的標記。

未完成的中國革命就其切近的目的而論，乃是『資產階級的』。不過這名稱之應用祇是過去資產階級革命的回聲，所以牠實在不能給我們什麽幫助，歷史的類比須在具體的

社會學的分析中加以校對，否則牠會成爲心智的陷阱。在中國正在鬥爭着的是些什麽階級？這些階級的相互關係是什麽？這些關係正在如何與向何處變化？中國革命的客觀任務，即那些被發展過程所決定的任務，是什麽？這些任務之解決落在什麽階級的肩上？牠們能用什麽方法來解決？伊羅生的書恰恰予這些問題以解答。

殖民地的與半殖民地的——因而是落後的——國家，包括着人類之最大部分，這些國家的落後程度極其不同，牠們形成了一種歷史進化的梯階，從遊牧生活，甚至從食人生活起，一直到最現代的工業文化。在某種程度之內一些極端的結合，乃是一切落後國家的特徵。不過落後性的等級——如果我們可以應用這個名稱的話——是由每一殖民地國家生活中的野蠻主義與文化的成分之比重來決定的。非洲赤道國遠落在亞爾及爾之後，巴拉圭比墨西哥落後，阿比西尼亞比印度或中國落後，牠們在經濟上雖然共同依存於帝國主義的宗主國，但牠們在政治上的依存關係却有些地方帶有公開殖民地的奴屬性質（如印度，非洲赤道國），而另一些則掩蓋在虛僞的國家獨立之下（如中國、拉丁美洲諸國）。

落後性在土地關係中找到了最有機的與殘酷的表現。這些國家中沒有一個曾經把民主革命實行到任何眞實的範圍。半途而止的土地改革，被半農奴式的關係所呑沒，而這些關係在貧窮與壓迫的土壤上不可避免地會再生出來。土地關係上的野蠻主義，常常與道路之缺乏，各省的孤立，『中世紀式』的特殊主義，與民族意識之缺如，同時存在。從社會關係中清除出古代的殘餘與現代封建主義的硬殼，乃是所有這些國家中之最重要的任務。

不過祇叫保存着對於外國帝國主義的依存關係，那末土地革命的完成是不可思議的，因爲帝國主義一方面固然移植資本主義的關係，但另方面却支持着並重新創造着一切奴隸的與農奴的形態。因此，爲社會關係的民主化與爲建立

民族國家而進行的鬥爭，就不間斷地轉入於反對外國統治的公開暴動中去。

歷史的落後性，這含義並非說要在較遲一二或三個世紀之後，去簡單地重覆英國或法國那樣先進國家的發展。這落後性產生一種完全新的『結合的』社會形態，在這形態中，資本主義在技術與結構上之最新的成就，植根於封建的或前封建的野蠻主義的關係中，改變着這些關係，征服着牠們，並且創造着一種特殊的階級關係。

在這些落後國家中，沒有一個『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能在『民族』資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得到解決，因爲『民族』資產階級之很快產生，是在外國勢力的支持之下，故對人民而言乃是一個異類的或敵對的階級。在這階級發展的每一階段上，總祇有更加密切地束縛於外國的財政資本。他們本質上是此種資本的代理人。殖民地的小資產階級，即從事於手藝與小買賣的人，首先成爲與外國資本作勢力懸殊的鬥爭的犧牲者，他們在經濟上衰落至無足輕重的地步，成爲非階級的與赤貧化了。這等人要起一個獨立的政治作用，那甚至連想都想不到。農民，這個數量最大，最原子化，最落後與最受壓迫的階級，能進行地方性的暴動與游擊戰，但需要一個比較前進的與集中的階級的領導，好使這一鬥爭高升到一個全民族的水準。這樣的一個領導，自然落在殖民地無產階級的身上了，因爲牠從最初起，就不僅對外國的就是對自己民族的資產階級，也立於相反的地位。

地理上的接近與官僚機關，把中國的各省與各部早就聯結成一個整體，而資本主義的發展則已使這個整體變成一個經濟整體的模樣。羣衆的革命運動第一次把這逐漸增長的統一翻譯成民族意識的言語。在罷工，農民暴動，一九二五——二七年的軍事征伐中，一個新的中國產生了。那些與本國及外國的資產階級相聯結的軍閥，祇能將國家弄得四分五裂，這時中國工人却成爲國家統一之不可抗拒的推

動力之掌旗手了。這一運動，無可爭論地能與法國第三等級反特殊主義的鬥爭，或與後來德國與意大利人爲國家統一所作的鬥爭相比擬。但中國又與資本主義初生的國家不同，在那些國家中，完成國家統一的問題落於小資產階級的肩上，部分的還在資產階級的，甚至在地主（普魯士）的領導之下，而在中國則無產階級出來作這一運動的原動力與潛能的領袖。但是恰恰因此，無產階級使資產階級感受到一種危險，即統一後的祖國的領導權將不操在後者的手中了。在全部歷史中，愛國主義總與政權與財產不可分離地相聯結的。感受到危險之時，統治階級是從來不惜使他們自己的國家分解的，他們祇求在這種方式之下，能使他們在一部分的國土上保持權力。因此，如果以蔣介石爲代表的中國資產階級在一九二七年掉轉武器來反對無產階級，反對這國家統一的掌旗手，那是完全不足奇的。關於這一轉變的描寫與解釋，占據着伊羅生這書的中心地位，牠給了我們一個了解中國革命與目前中日戰爭之基本問題的鎖鑰。

那所謂『民族』資產階級祇叫有保持自己特權存在的希望，那麽能容忍國家墮落的一切形式。但當外國資本想霸占國家的全部財富時，殖民地的資產階級迫得記起牠的『民族』責任來了。在羣衆的壓力之下，牠甚至還能跳進戰爭中去。但這戰爭祇能反對帝國主義列強中之一，即反對那最無法談判的一個，而進行戰爭時所懷着的希望，只是想轉替某一更寬大的強國服務罷了。蔣介石反對日本侵畧者的鬥爭，祇能在大不列顛或美國保護者所指示的限度以內進行。祇有那個除了鐵鏈之外無物可失的階級，才能爲民族解放進行反帝戰爭到底。

上面發揮的，關於歷史上晚起國家中『資產階級』革命之特性的那些觀點，絕對不是簡單理論分析的結果。在第二次中國革命（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之前，牠們早已受到大規模的歷史測驗了。三次俄國革命（一九〇五——

一九一七年二月與十月）的經驗，對二十世紀所具有的重要意義，並不比法國革命對十九世紀所具有的意義爲小。要了解現代中國的革命，讀者一定得注意到俄國革命運動中思想的鬥爭，因爲這些思想對中國無產階級的政治，曾經起過，而今還在起着一種直接的，並且是有力的影響，對中國資產階級的政治則起一種間接的影響。

正因爲沙皇俄羅斯的歷史的落後性，使牠成爲歐洲唯一的國家，即在資產階級革命之前，馬克思主義這種學說與社會民主黨這種政黨，便發展到了有力的地步。民主主義的鬥爭與社會主義的鬥爭間，或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間的相互關係，恰恰在俄國受到了理論的分析，這是很自然的。第一個把這問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初提出來的，乃是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創造者普列哈諾夫。在反對那所謂民粹主義（一種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的鬥爭中，普列哈諾夫認爲俄國沒有任何理由希望走一條發展的特權道路，他認爲俄國跟那些『不聖神的』國家一樣，也得經過資本主義的階段，又以爲在這條道路上，爲要繼續進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鬥爭，必須建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政制。普列哈諾夫不僅把那作爲一個任務的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截然分開，（他把社會主義革命延遲到不定的將來，）而且他還把力量的結合加以完全不同的描寫：資產階級的革命應該由無產階級聯合自由資產階級來完成，並由此替資本主義的發展清除道路，經過幾十年之後，在資本主義發展的較高水平上，無產階級將直接與資產階級鬥爭，完成社會主義的革命。

列寧——當然不是立即地——更改了這個學說。在本世紀之初，他以一種比普列哈哈諾夫更大的力量與更澈底的態度，提出了土地問題作爲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的中心問題。因此他得到一個結論：自由資產階級是反對剝奪地主財產的，而正因爲這個理由，自由資產階級會在普魯士式的憲法基礎上與皇朝謀得妥協。列寧反對普列哈諾夫無產階級

與自由資產階級聯盟的思想，提出了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的思想。這兩個階級革命合作的目的，他認爲在於建立『無產階級與農民之資產階級民主專政，』這是唯一的方法，可用以肅清沙皇國中的封建警察的殘渣，建立一個自由的農民制度，且給美國式路線的資本主義發展清除道路。列寧的公式在這一方面是前進了一大步，即與普列哈諾夫的公式相反，牠正確地指出了革命的中心任務，即土地關係之民主主義的變動，並且同樣正確地約略規定出能解決這一任務的一些階級力量之唯一現實主義的結合，但一直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列寧本人的思想始終束縛在『資產階級』革命之傳統的觀念上。跟普列哈諾夫一樣，列寧從這樣一個前提出發，即祇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之後，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才能列入當前的議程中。而且與後來不肖門徒所揑造的傳說相反，列寧認爲在民主革命完成以後，農民的全體不能成爲無產階級的同盟者。列寧把社會主義的希望寄托在農業勞働者與出賣勞働力的半無產者化的農民身上。

列寧這個觀念的弱點，在於『無產階級與農民之資產階級民主專政』這一內在矛盾的思想。兩個階級，他們的利益祇有一部分相符合，那末他們的政治同盟便不能有成立專政的可能。列寧本人着重指出『無產階級與農民專政』的基本限度，所以公開稱牠是資產階級的。他之所以這樣幹，意思就是說無產階級爲了保持與農民的同盟，在未來的革命中，得避免直接提出社會主義的任務。但是確切地說，這意思就是無產階級得放棄專政了。在這樣的情形中，革命的政權將集中在誰的手裡呢？在農民的手裡嗎？但農民是最不能起這樣的作用的。

列寧在提出他有名的一九一七年四月四日的大綱之前，把這些問題放着不加回答。祇在四月大綱上，他才第一次跟『資產階級』革命的傳統了解與『無產階級與農民之資產階級民主專政』的公式相決裂，他聲明爲無產階級專政而

進行的鬥爭，乃是澈底實行土地革命與保證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唯一方法。不過，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由於本性使然，不能自限於資產階級財產的範圍以內。無產階級的統治自然而然要把社會主義的革命置於議事日程之上。在這樣的情形中，社會主義革命與民主革命並非由任何歷史的時期分開的，而且不間斷地連接着，或者說得更加確切些，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革命之有機體的生長。至於社會之社會主義的轉變將以何種速度發生，以及將在最近將來達到何種限度，那不僅要看國內的，而且也要看國外的條件而定。俄國革命不過是國際革命之一環。這樣，已經約畧地說明了永恒（不斷）革命這個觀念的本質了。恰恰是這個觀念，保證了無產階級在十月革命中的勝利。

但是歷史之殘酷的嘲弄竟會如此：俄國革命的經驗不僅沒有幫助了中國的無產階級，而且相反的，牠以一種反動的與彎曲的形式，成爲中國無產階級前進路上的一些主要障碍之一。不肖門徒們的共產國際開始替東方各國把『無產階級與農民的民主專政』這個公式加以神聖化，而列寧在歷史經驗的影響之下，早已承認這公式爲沒有價值的了。一個公式業已陳舊，那牠所掩蓋的政治內容會與牠當年所代表的直接相反，這在歷史上是常有的事。平民大衆，工農的革命聯盟，由那自由選舉的，作爲直接行動機關的蘇維埃來加以膠結，而共產國際却代之以各黨中央機關的官僚的聯盟。在這聯盟中，農民的代表權則意外地給了國民黨。這個極關心於保持資本家財產，不僅要保持生產工具，而且要保持土地財產的十足資產階級的政黨。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則擴大成『四階級的同盟』：即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與那謂『民族』資產階級。換句話說，共產國際揀起了被列寧所拋棄的公式，衹爲要打道到普列哈諾夫的政治中去，而且還是在一種戴上假面具的，因而是更惡毒的形式中進行的。

爲替無產階級在政治上之從屬資產階級作辯護，共產國際

的理論家們（史太林、布哈林）便援引帝國主義壓迫這一個事實，彷彿這壓迫會逼『全國一切進步力量』結成同盟的。但這正是當年俄國門雪維克的論據呢，所不同的只是那時沙皇制度代替了帝國主義吧了。實際上，中國共產黨之服從國民黨，表示牠之與羣衆運動分裂，而且是對於牠歷史任務之一個直接的背叛。第二次中國革命的慘敗，就是這樣地在莫斯科的直接領導之下準備好的。

許多政治上的庸人俗子總願意把『常識』的猜測來代替科學分析，他們覺得俄國馬克思主義者關於革命性質及其階級力量的動力所進行的爭論，彷彿是簡單的學院主義。然而歷史的經驗表示出俄國馬克思主義『敎條公式』之深具活力的重要意義。那些直到今天還不懂得這一點的人，能夠從伊羅生的書裡學到許多。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政治，深刻地表示出，如果布爾雪維克不曾及時地拋開門雪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那末俄國革命會變成什麼東西。在中國，不斷革命的觀念再度被證實了，不過這次並非以勝利的形式，而是以慘敗的形式來證實的。

當然，把俄國與中國等量齊觀是不允許的。牠們雖然有好些重要的共同點，但異點却仍然太明顯。不過人們不難相信，這些異點並非減弱，反而加強了布爾雪維克主義的基本結論。在一種意義上說：沙俄也是一個殖民地國家，這可以在外國資本的優勢作用上看出來。不過俄國資產階級對於外國帝國主義，比中國資產階級享有不可比擬的更大的獨立性。俄國本身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俄國的自由主義固然卑瑣，但比之於中國的自由主義却具有遠較重大的傳統與更有力量的支持基礎。在自由派的左邊，站着一些強有力的小資產階級政黨，牠們對沙皇制度的關係有的是革命的，有的是半革命的。社會革命黨設法在農民中，主要在農民的上層中，獲得了很大的擁護。社會民主黨（門雪維克）的背後，領導着廣大的城市小資產階級與勞動貴族。恰恰是這三個政黨——自由派，社會革命黨與門雪

將受到劇烈的推動。在最短促的時期內，成千百萬的中國無產階級將被動員起來。另一方面，中國資產階級將愈加依賴於日本資本。他們將比過去更不能領導民族戰爭，尤其不能領導民族革命了。那個數量更大，社會地位更強，政治上更加成熟的中國無產階級，將起來領導農村與侵略者作對。對於外國奴役者的仇恨，乃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凝固力。人們必須想到：新的民族革命會仍舊在目前這一代人的生存期間置於議事日程之上。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爲要解決這些落在他們身上的任務，必須充分融化中國革命的教訓 。 在這一意義上 ， 伊羅生的書能予以無可替代的幫助。現在祇希望此書能翻譯成中文與其他的外國文字。

里昂・托洛次基

一九三八年，序於墨西哥，考約奥岡

（王凡西譯）

第一章　叛亂的種子

第一章　叛亂的種子

在中國大城市的邊緣上，高聳的工廠煙突的陰影橫陳於田疇間，這些田疇尚用木犂來耕耘。在海港的碼頭上，近代定期航船卸下來的貨物揹在人背上搬走，或者用原始的駁船裝運到內地去。在街道中，巨大的運貨卡車和喧鬧的電車隆隆然駛過那些靠人拉着的車子，這些拉車人宛如牲口駕着他們的重載，飄忽的汽車暴怒地向那些穿過交通小道的人力車和手車攮喇叭。街道兩旁排列店舖，店舖裡男男女女尚藉一雙赤手和簡陋的工具來製造他們的貨品，但這些街道却一直通達那些使用軋軋作聲底發電機的大工廠。飛機和鐵路橫貫廣漠的區域，這些區域僅僅靠那些上了千年的人行道和運河連結起來。新式汽船航行於沿海和江河，夾雜駛過那些古老模樣的民船。從城市到農村，在這個有許多江河流域（這些江河流域都是從大海伸到亞洲腹部去的）的疲敝的國土上，這些矛盾和對照積聚很多。牠們體現了將近五萬萬人民爲生存的鬥爭。

中國生活的樣式是參差的，割裂的，和不規則的。生產，交通，財政的近代形式移置於過去底殘破和陳腐的樣式之上，而且只是部份地和牠交織起來。在一世紀之前，當西歐恃着牠的商品，大礮，貪慾和思想侵入中國的時候，那個古老的的建築已經傾頹了。這種過甚壓迫的結果便是災刼和革命。中國的經濟强行改變了。社會各階級穩定了那樣長久，現在也進入一個猛烈變動的時代了。政府形式，

習慣，和整個社會的平衡都推翻了。這個變動的過程是錯綜的。牠把一個莫大的任務提了出來，這個任務就是創造一個新的社會組織，好讓中國的生產力發榮滋長。牠又產生了各種衝突，這些衝突很快就積纍起來，增加力量，且迅速充溢，竟要在階級鬥爭的戰場上來一個解決。

在一個歷史的長時期內，中國生產力陷於停滯，中國經濟的落後性主要就是靠這一點來決定。大約兩千年之前，鐵犂的使用引起農業生產的增進。一部份由於這一刺激，土地在那個時候已轉變成爲私有財產。采邑土地或皇上恩准開拓的土地都變成可讓渡的了，即是說，牠們都可以買賣了。從此解放了的勞力和從此獲得的資本，一部份被國家吸收去建築偉大的公共工程：隄壩，運河，宮殿，城垣和堡壘。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並未發展。封建的剝削形式尙繼續保存於農村中。中國社會仍由細小的農業單位組成。家庭或地方手工業供給社會的大部份補足的需要。國家直接參與商業和製造業。例如鹽鐵，牠都實行專利。國家機關，包攬一切的商人和手工業行會，嚴厲的操縱了生產組織和國內市場。生產和商業的城市中心形成了，但似乎其範圍只限於奢侈品和地方特產：絲綢，漆器，磁器，彫刻物，鐵器。只有更深一步研究國內市場的性質和程度，研究商業資本的活動，以及狹小農村社會的相對孤立，纔能了解馬克思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究竟，及其自行更新的非凡的能力。（註一）

整個社會組織牢牢的依存在農民羣衆上，農民們交納地租於地主，償付利息於商人及放債者，且用勞力，實物和金錢的形式，納稅於國家。後者由地方官吏來代表，這些地方官吏加入一個鬆弛的，經過各省總督直達皇帝的等級制度裡。這些官吏又在剝削農民的過程中，與地主和商人勾結在一起。地主們爲了繳納有增無已的國稅，便對那些眞正耕田的人百端勒索。小地主自身已抵押於放債者並逐漸逐漸淪入佃農或農業勞働者的地位。當每一個繼起的皇朝

渡過了牠的興盛時代而入於衰亡時，牠的財政要求便增加起來，而牠的官吏的腐敗也變本加厲。當累增的地租，債務和賦稅的負担已無可忍受，而一次再次的天災復加重了流行的困頓時，地方上反對租稅徵收吏的叛亂便擴大而爲偉大的農民戰爭。

以地主貴族爲首的軍事亂黨，領導散漫的農民隊伍和地方軍隊走上戰場，推翻皇朝並在同黨間互爭雄雌。激烈的社會和土地改革的企圖往往點綴內戰和混亂的時期，這個時期常常延長數十年，有一次還延長數百年哩。上述那些改革之中，最著名的就是基督紀元第一世紀初，漢朝傾覆之後，王莽計劃的變法，以及十世紀末，唐滅宋興之後，王安石所鼓吹的變法。他們有些倡議竟主張實行一種初步的土地國有，即：廢除土地私有權及將土地歸還原主——國家。另一些倡議則主張建立一個萌芽的國家資本主義。但這些改革沒有一個是成熟的。喚起這些改革的農民戰爭，總是自行衰竭的。那些亂黨中之一終於獲得其支配權並建立新皇朝。當新皇帝及其直系宗屬鞏固他們的統治並逐漸削平了一切皇位爭奪者時，農村中原來的社會形式又再生產出來，而同樣的逐漸收奪的過程也重新發生。

滿洲於十七世紀中葉便利用上述的農民暴動之一，獲得了政權。他們既一度充當了異族統治者，當他們完全征服了這一國家的時候，他們自然要盡力不使中國和其他外國接觸。歐洲在這個時期正捲入於劇烈的戰爭中，這些戰爭附帶產生了西方資本主義。歐人和天朝的接觸是偶然和插話式的。早期的滿清各皇帝得以自由安享他們底稱霸的時期。但再過兩個世紀之後，人口的顯著增長又使土地受到新生的和加重了的壓力。滿清皇朝已走進牠的沒落期了。牠的統治已經瓦解，牠已迫得向人民重重誅求而在牠治下各地方遭遇反叛。當西方資本主義向外發展的第一道浪潮衝破中國的隄岸時，中國社會已臨近政治崩潰和混亂的新紀元了。新的蠻夷跨海而來，加深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內部劃分

，且使之改頭換面並變得非常複雜，他們的來臨表示用舊式方法而作的舊式解決已不夠了。

西歐各國以不可抗拒之勢，推進商業的擴張與資本的積纍，牠們摧毀了這個天朝上國的關隘，這些關隘一向就把牠和世界其餘地方分開。由於這一壓迫，深刻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變革終於到來了。資本主義經濟正把整個世界捲入牠的軌道中。中國的孤立完結了。因爲資本是一個新式的征服者，牠在中國歷史中是前所未聞的。在過去，那些跨越北境而入侵的遊牧部落，沒有大困難便已同化於中國較老文明底較高組織的社會結構。但現在這些新的蠻夷却保有技術的設備，且保有中國絲毫不能匹敵的物質水準。靠手來抵敵機關鎗或靠轎子來和鐵路相抗衡是不可能的，僅靠傳統也一樣敵不住大礮。中國只能拿牠底年紀，牠底面積和人數的優勢來抵抗西方蠻夷的推進力和武器。但這三個條件只能確定這個不平衡底衝突的長久和掙扎，不能確定其結局。

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建築原已發生危機，牠的底層和上層便迅速對外國侵畧的腐蝕力起了反應。在經濟上，中國已一蹶不振。外國人藉助於鴉片，不斷造成於他們有利的貿易差額。在外國通商初期，白銀大量輸入，但於一八二六年便開始流出。十年之後，鴉片便代替了白銀，成爲償付中國茶絲的手段。（註二）這種藥品造成了裂口，在一八四二年與一八五八年兩次鴉片戰爭中，英法的大礮又擴大這一裂口，於是工業品便源源輸入。英國棉織品遏止中國棉布（南京棉布）的輸出，實際上中國棉布於一八三三年便沒有發現於出口貨單中了。在十九世紀頭二十五年，中國出口貿易的數額便猛烈下降，而鴉片的輸入則出奇的上昇。棉織品輸入源源而來，一八七〇年，棉織品佔中國進口貨的百分之三十一，過後數年，牠們便代替了鴉片，佔進口貨之第一位。西歐產業組織與技術之迅速進展，蘇彝士運河之開鑿，以及汽船航運之發展刺激中國貿易，竟於一八

八五與一八九四年之間增加了兩倍。投資和借欵很快便跟着商品的洪流到來。十九世紀末，外國船運公司，棉織廠，鐵路和電信網在中國經濟生活中佔據了一切重要的地位。

外國政治支配權的確立使這種經濟的征服輕而易舉。滿清政府無能爲力。牠最先企圖用限制鴉片貿易之法來遏止白銀的流出，但這種企圖却受挫於數度戰爭中。清政府在這幾次戰爭裡蒙受羞辱的戰敗而且牠還必須爲此而償付巨額的賠欵。滿清政府受了西人屈辱之後，牠在中國人眼中便喪失了無限的聲望和權威。外人藉大礮口恫嚇勒訂的條約（註三）規定傳教（基督敎就是西方侵畧的前鋒）自由並使鴉片合法化。（註四）但牠們的最重要條欵是開放沿海及內河口岸通商，限制中國關稅爲值百抽五，劃出根據地和租界（後來各國的『勢力範圍』就導源於此）並成立治外法權制度，免除外人受中國法律的管轄及繳納中國稅。中國只成了一個名義上的自主國了，牠只是因爲帝國主義強盜們互相間的猛烈競爭纔倖免於公然的瓜分和殖民地化罷了。

在農村中，人口急速增長及耕地短缺（註五）正造成恐慌，鴉片的流行，白銀的流出和機器製造品之流入又把這一恐慌提高到尖銳的程度。鴉片吸食的流行引起財富由農村流入城市的洪流，而且造成了國內市場的驚人矛盾。（註六）白銀外溢引起銀根短絀，結果通用的錢幣蒙受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貶值，而生活費也急劇上昇。惡幣也拿出來用了。（註七）外國棉織品及其他商品把中國手工業驅入絕境，在南方各省尤其如此。織布工於一八一九年曾織出三百三十五萬九千匹布，輸出國外，但一八三三年該項出口貨跌至三萬另六百匹，在往後三十年間又幾乎縮減至零，因此，他們喪失了他們的謀生手段。（註八）最後，彷彿人類及其作爲尚不夠惡毒似的，自然也來參加萬物舊秩序之天然破壞。在十九世紀中葉的幾個年代中，幾乎沒有

一年在大江河流域內外不發生水災和饑荒，旱災和瘟疫的。

所有這些破壞力累積起來，結果就是大多數人民的赤貧化和大量流浪人口的產生。在西南苗族及西北回族這些少數民族間發生了零碎的叛亂和暴動，這些叛亂預示了一個新的農民戰爭的開始，根據傳統的事理看來，這個戰爭一定已證實當今朝廷的天命已衰且招致一個新皇統的抬頭。但是當一個眞正的農民叛亂在各省醞釀時，中國的統治階級正直接間接的參加國外貿易的利益，找求蘇生自己的泉源。

各口岸的商人和官吏早就和外人交易，開始積蓄巨大的財產。一八三〇年之前，當外國船隻尙裝載銀元駛抵廣州，以償付載回歐美之茶絲時，（註九）這種洋財已很少歸還原來的生產者了。其中大部份留在港口商人和官僚的手中。（註十）商行中人（這些商行是正式成立的特殊商人獨佔機關，目的在和外人貿易）和地方官吏（他們可以自由徵收特別稅和『捐』）獲得了巨額財富，尤其是在違禁的鴉片貿易方面。商行中人往往有家資值二十萬兩的。廣州某商人自誇除了必須拿出巨欵償付地方官以酬謝他們底恩助之外，尙有二千六百萬元的資產。（註十一）

從這些商人和官僚中形成了一個新階級，那就是買辦階級，亦即是外國資本在中國市場上的經紀人。這就是帝國主義侵入中國社會組織的最初的直接影響之一。帝國主義替自己贏得各種支配的經濟地位，這些地位有效地攔斷了土著和獨立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去路。這些中國商人和官僚最先是由地主派生出來的。從對外貿易中積累起來的新財富並沒有投放於資本主義的企業，而是投放於土地中，這個過程分明促進了大地產的增長和小地主的被收奪。（註十二）地主們送他們的兒子到城市去加入這門一本萬利的買辦生意。一個買辦而不同時是一個在外地主，是很稀有的。他們的利潤不僅化成地土而且化成爲借給農民的高利

借欵，因爲農民們必須靠借債來彌補他們的低減的收入及高漲的生活費和賦稅。這個舊地主商人階級敵不住外人的優越力量和物質技術，於是轉變成爲一個經紀人，放債者和投機家的階級，享受那分配於城市和農村間的利益。

整個國家機構也參加上述的過程。在幾次鴉片戰爭中，滿淸被英人打敗竟『那樣輕易，以致搖動了他們本族底武勇和命運的自信心，而且使牠的軍事力量的威望在臣屬的中國人眼中完全消失』。（註十三）滿淸官僚受挫於軍事失敗之後，不久又爲賄賂和私運鴉片之迷人利益所害。（註十四）北京的上諭往往置若罔聞。北京遠處他方，而外國銀洋的叮叮聲却近在咫尺且引人入迷。中國官場在理論上是講道德的，但實際上已有了一種古老的腐敗傳統。官吏們之依賴稅收來維持自己，此舉自古已成了官吏廉潔的犒賞。國外貿易的豐美用一種非法收入的新來源來表彰這一傳統。皇朝沒落，政府歲入銳減，財政困難增加，一切道德的僞裝都抛到九霄雲外，而官場位置也成了公開買賣的對象。政府位置不是由那些有學問的人，而是由出得起價錢的人來充當。自然能夠替兒子或兄弟捐一個官銜的正是那些已經致富的商人或買辦。當這種風氣成了家常便飯的時候，商人，地主和官僚便越發淸楚的成了同一株階級樹的分枝。這個階級從土地獲利，牠根本就關心於土地上一切不平等之保持，現在却又成了外人侵畧和支配的主要工具之一。在帝國主義方面呢，牠已壓服了淸政府且使中國社會的上層適應牠的用途，牠便成了中國統治者的保護者，担任遏抑一個被摧殘底人民的激憤。這一點成了帝國主義支配半殖民中國的基本公式。帝國主義已使中國整個經濟社會，和政治的機構瓦解，但是當帝國主義自身迫得勾結這個國家的每一件保守，壓迫和落後的東西來抵抗和摧毁革命變革的動力時，新的要素差不多尙未開始形成。

太平天國運動於十九世紀中葉使滿淸皇朝有傾覆之虞，上述的關係就在這個運動中凝團起來。無法忍受的經濟狀況

產生了三番四覆的叛亂，一八五〇這年叛亂達到了極度，遂造成了一個聲勢浩大的反對皇朝的農民暴動，這個暴動由廣西向北蔓延且建立政權於長江流域達十一年之久。太平天國運動當初不過是新基督教『膜拜上帝者』的小宗派。他們在南方和地方當局衝突，後來竟迅速發展成爲最宏大的社會叛亂。國內一切不滿和叛亂者均羣集於牠的旗下。舊日反清的秘密會社本來就從未完全消滅，現在又死灰復燃了。中國的智識份子及下級紳士份子因自己的土地被奪，苦於淸廷的勒索，且受滿淸的種族歧視所激怒，便加入這個運動的領導層。在反淸情緒激發中，辮子，這個奴服的標記取消了，而故明的舊習慣也恢復了。但是最重要的還是赤貧農民，流浪手工業者和土地尋求者，他們久已反叛地方官吏，地主和收稅吏，現在他們又給與這個運動以血肉，且使牠具有農民暴動的一切傳統的特徵，這種農民暴動在過去是曾經招致朝代的更迭的。

軍事勝利是迅速和驚人的。滿淸的權力正從南方及長江流域各省掃除。太平軍幾乎抵達北京城。洪秀全是這個運動的熱狂的宗教領袖，他建號天王，定都於南京。農民在許多地方獨立奪取土地，這表明這個運動已達到了最高點。這種根本平均土地的急進傾向並沒有受到上層支持，雖然牠的壓力產生了幾道沒有實現的關於破除土地特權的法令以及集體享用土地財產的計劃。（註十五）除了農民在下面實行土地改革之外，下一事實也是很有意義的。太平政府無論在什麽地方得到相當穩定之後，牠便並非毫無成效的努力禁止鴉片買賣，阻塞白銀漏巵，刺激國內市場，劃一賦稅和增進農業生產。例如，在太平軍與時代，江蘇各縣輸出沿海的生絲達到新的高水準，這是一件最有興味的事實。如果某些傳說可信的話，太平軍還一次再次的努力在自由交易和禁止亡國底鴉片買賣的基礎上，去和外人修好。這樣一來，太平天國運動雖主要是屬於原始或傳統的一種農民戰爭，但也露出一種『正常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傾

向，這種傾向表現得不很直接也不很清楚，但却是無誤的。

太平天國運動和土地及城市中的一切特權勢力起衝突。這次暴亂破壞了舊官僚階級的權威和地位。農民解决土地問題的手段推使他們和整個佔有土地的階級發生直接衝突，而且和買辦，商人也發生直接衝突，因爲他們經過借欵和抵押已和土地財產發生了那樣密切的關係。一種典型的『標準』歷史述說，『太平軍的破壞性使有勢力的階級取反對態度』。（註十六）這些『有勢力的』中國階級切實地幫助滿淸方面。

在帝國主義者方面看來，就中國統治者而論，拿最初階段的太平軍來替代滿人，或許更滿意些。這個運動的基督性質在敎士中喚起某種同情。加之太平軍尙表現有刺激貿易和恢復社會安寧的某種希望，這種社會安寧，滿淸已無法保持了。但雖然有這些因素，外國人很快便站在滿淸方面去。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在外國人看來，鴉片貿易仍是中國市場中獲利最豐的部份。牠符合於繼續原始積累及保持貿易平衡的要求。至於靠拋售較合法的商品來維持這種貿易平衡，比較能夠獲利，這還是稍後的事。太平軍反對這種藥品的買賣，這件事推使他們侵犯了外國人的眼前利益。（註十七）

這次內戰給了帝國主義者一個難得的機會去鞏固他們的支配和伸張他們的經濟和政治地位。一八五四年，外人的大礮阻止了反淸的三合會黨人攫奪上海，並乘地方當局完全崩潰的時候，攫取海關行政的支配權（註十八）及擴大租界的治區。一八五八年，英法的大礮痛擊華北那些脆弱的滿淸軍隊並勒迫簽訂新條約，俾完全滿足外人的利益。鴉片貿易合法化了，而全國也敞開讓外人侵略。因爲簽訂了這些條約，外人對現政府之保護便有了明確的利害關係。一八六〇年之役以及是役野蠻的焚掠圓明園，把淸廷完全征服了。現在淸廷這個非常柔順的工具已成了一個確然値

得保護的寶貝了。太平軍在外人眼中已由『或許是代替滿清底友誼的繼承者』變成了『只不過一批干涉新協定實施的亂黨』。(註十九)

太平軍關於基督教的說法,其正當實在不下於其他各種各式關於耶穌的說法,但牠很快便被人認為最猥褻的瀆神。基督將軍戈登帶着一個十字軍人的熱狂走上戰場,而且不惜用一切手段(包括出賣的手段)和太平軍週旋,宛如耶和華的選民對付阿瑪勒開人及一切偶像崇拜者一樣。英法軍隊拋棄了一切『中立』的形式偽裝,積極參與生死的決戰。

這次保護滿清皇朝的戰爭由兩個中國政治家出來主持和取得勝利,一個是土地利益的代表曾國藩,另一個是新買辦階級的代言人和領袖李鴻章。他們組織和率領軍隊保護龍位,而他們之所以致勝,只是因為外國陸海軍壓倒了武備窳劣而清軍仍無法抗拒的太平軍吧了。

一八六五年,太平天國運動本身內部已衰竭,牠便終於失敗和潰散了。這次內戰的破壞(生命損失重大,全國大部份土地荒廢)耗竭了農民戰爭的泉源。太平天國運動的領袖不能給這一土地運動以一個堅持的領導,這一運動便不可避免的墮落而為游擊戰爭和土匪。上層的領導也分裂而為無望的冒險之徒的敵對私黨。偉大的太平天國的叛亂失敗了,現狀也保持了,因為中國社會沒有一個階級能夠把國家導出困境。帝國主義的重壓阻滯了中國自身生產力的自由生長,同時又使農民戰爭分崩離析,和朝代更迭這種舊式的循環永遠無法重演。

在這裡便浮現了一個中心的矛盾出來,中國的階級鬥爭從此以後就要圍繞這個矛盾而發展。外國帝國主義之來臨,中國孤立之完結,以及機器製造商品之出現於中國市場已無可更改的判定了中國社會革命底的轉變。帝國主義一度鞏固了自己地位之後,便極力幫助保存這個社會內的一切古老的和退步的東西。中國底革命的變革現在需要破壞土地

佔有的舊制度及解除土地上的壓力。帝國主義却加入來支撑地主，商人及官僚的支配權，這些地主，商人和官僚們使農民羣衆淪爲奴隸，且替外國商業資本的洪流開闢道路，引入最僻遠的內地去。中國底經濟社會和政治諸問題的解決迫切的需要全國的統一，以保證牠底資源的儘可能的利用。帝國主義列强的競爭使國內的衝突永無止境，而由於這些衝突之不斷的橫徵暴斂，破壞了中心權力。經濟的進展有賴於國家獨立。帝國主義特權的維持却要求繼續的隸屬。

太平天國運動是想按照『傳統的』中國辦法來應變革底需要的最後企圖。牠失敗了，因爲走向這樣解决的道路已爲帝國主義侵畧所產生的嶄新的條件打斷了。中國民衆經過二十年來的叛亂和失敗，已弄得筋疲力倦了，在他們能夠再起干涉之前，他們還得在完全新鮮的環境之下，等候新一代來重振力量。在往後的時期內，在中國社會的底層，一切造成慢性民衆貧窮的矛盾，異常厲害的加劇了。土地的集中仍在繼續。商品和商業資本冲入農村的洪流擴大了，又扼緊了一切勞苦羣衆的生活。同時，在這個社會建築的上層以及在那些正在發展的城市中心內，根本的改變也發生了，爲中國底未來的鬥爭便得到新的形式和新的內容。

滿清皇朝經過了征伐太平軍和其他零碎叛亂（這些叛亂維持至一八八〇年）之後，牠已弄得精疲力盡了。內亂，飢荒和頻發的天災，這種種震動正使牠幾乎支持不住，牠又碰到外來的打擊了。帝國邊境碰到一次新的帝國主義進攻，牠便陷於無告。法國於一八六〇年佔領柬埔寨和安南，又於一八八四——八五年的短期戰爭中使牠的掠奪物『合法化』。次年英國將緬甸併入牠的印度帝國。沙俄也跨越亞洲，在北境立下一條新鐵路的路向，且在北滿建立牠的『勢力範圍』。在上述同樣的幾年內，日本更一致，更迅速的應付帝國主義的壓迫，牠已毀棄了牠底封建建築的大

部份，而且經過明治維新，牠又已着手實行其採用西方生產和組織方式的卓越政策。牠剛已發展到要跨越狹小的海峽，找尋一個大陸根據地。一八九四年，這個新興的海島強國竟使牠底年老的且一貫受尊敬的鄰國蒙受屈辱的戰敗。朝鮮之割取與日本勢力之建立於南滿，就是列強重新來一次奪取領土和讓許權的警號。清廷既受了毆辱和陷於無告，便簽了一道條約又來一道。中國的瓜分以及牠的幾部土地之併入西方各國的殖民帝國似乎迫在眼前了。

但帝國主義的重新壓迫却產生了新的改革和革命運動，這些運動的性質和階級根源都與十九世紀中葉的偉大羣衆叛亂完全不同。這些變革的新勢力發展於中國社會的上層中。外人的壓迫已把中國的統治階級打造成爲適合於帝國主義需要的形態，而外國的特權又把土著資本主義發展的大多數門戶關閉了。但是，這個階級底財富的積累，按照事物的常理，却不能不刺激他們去努力站在自己立場上和外人競爭。帝國主義已破壞了舊經濟基礎。牠能夠障碍但不能夠完全阻止一個新基礎的建立。李鴻章，這位頭號買辦親自創辦第一批獨立的中國資本主義企業。一八六三年，第一家碾米廠建立於上海。江南造船廠建立於一八六五年。七年之後組織招商局，和外人在沿海及內河的航運獨佔競爭。次年第一家近代繅絲廠成立，一八七六年第一條鐵路（從上海到吳淞長不過十二里）出世，驚動那些吃驚農民底祖先的靈魂。一八七八年一個近代的煤礦開始於開平動工，一八九〇年第一家綿織廠建立於上海而第一家鐵廠也建立於武昌。火柴廠及製粉廠也跟着成立於一八九六年。中國的工業化已經開始了。（註二十）

在這同一期間內，中國的貿易地位，尤其是在原棉和棉織品方面，已大見改善。原棉的入超已於一八八八年變爲出超。土製棉布之輸出，自一八三三年之後幾乎跌縮至零，但一八六八年之後已恢復原狀，從是年之二百三十八擔增至一九〇〇年之三萬零一百擔，一八八三年之後又發生猛

烈的上升，雖然在同期內，機製棉織品之輸入不斷增長。（註二十一）工業初步發展，貿易相當改善，同時運輸，交通和銀行業也發展了，只是採取的速度較慢罷了。近代的郵傳制度於一八七八年產生。中國商業銀行組織於一八九六年，全部爲華資。其他交通線，其他銀行不久便跟着數目增加起來。

自始，中國資本抵抗外國競爭就陷於失敗了。一八九五年中日簽訂之馬關條約規定外人有權在華興築工廠，於是許多企業便迅速產生，享受中國底廉價和取之不盡的勞動的利益。外人有優越的技術設備和智識，他們又享有經濟和政治的特權，憑這幾點他們便使中國的競爭者陷於不利。中國人除了忍受技術的限制和捐稅重負（外人却免掉了）之外，還要依賴國外市場，以取得信用借款，機器和許多中國尙不能生產的工業品。幼稚的中國工業家曾企圖藉更緊張的勞動剝削來克服這些不利。但是不久，他們要求更有利的條件以供中國資本的活動，却迫得要走入政治決鬥場中，鼓動改革舊制，因爲這個政制已不復適應於新興經濟利益的需要了。

在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後的時期內，李鴻章作了幾次小小的嘗試，想使政府現代化。李氏一方面創立新工業，一方面又興辦近代海陸軍，促進學校的改革，派遣留學生出洋去替中國探求西方經濟和政治權力的秘訣。但他的努力却受中日戰爭打斷了。戰敗，失地，以及列強跟着舉行之新的進攻，又誕生了新的政治傾向。更快，更劇烈的變革就在眼前。

一八九五年之後，兩種不同的思潮支配了中國的政治生活。第一種思潮希望改良皇朝，使牠適應新的要求。牠夢想有一個皇帝來演彼得大帝的角色，牠又夢想有一個政府類似於英國的君主立憲制。第二種思潮則鼓吹推倒滿淸皇朝，仿照美國或法國的方式建立一個中華民國。滿淸統治者進入其沒落的最後時期之後，他們逐漸向維新黨人讓步。

清廷因爲屈服於完全與其自由底基本建築不相容的變革，牠便促使自己最後讓位於革命黨人。

維新派以修正孔子開始。他們大胆的把他說成不是一個古典的保守現狀者，而是一個進步的自由派。他們曾設法把亞丹·史密斯，約翰·史杜亞特·穆勒，哈爾拔特·斯賓塞及湯馬士·赫胥梨的思想注入中國底社會，政治，經濟思想舊的河床中。史密斯等的著作開始有中譯本出現。他們深信本國可以由皇上的勅書來改革，且於一八九八年當他們得到年青光緒皇的寵信，發動著名的『百日』維新時，他們以爲他們的主張已勝利了。一批勢不可當的命令已發出，目的在用近代國家工具來代替陳舊的滿清政府。他們要興辦學堂，選舉機關，取消苛捐雜稅和官場腐敗。他們下令由國家幫助工農業及實行政府民主化。但維新派的熱心却不幸得很，新思想的河流流出了莊嚴的紫禁城門，便只是捲入御溝中停滯下來了。在那些舊王公大臣看來，皇帝似乎發了瘋了，因爲他的勅令似乎立心來剝奪他們一切職掌的世襲利益及破壞數百年習慣所尊崇的一切文物制度。上諭一道一道的下來請求服從皇命，但究竟皇命是否尚受上天容許，這似乎已成疑問了。這種疑慮很快便在宮廷內證實了，因爲在宮庭內，抗拒維新的力量已結集於慈禧太后週圍。一八九八年九月，她把她的姪兒監禁起來，而且把他已經實行的改革一筆勾銷。他的幾個顧問官也給她殺掉了。其他的人（連同康有爲和梁啓超）好容易纔保得生命，逃亡海外。這些智識份子在『百日』維新時已企圖用從上到下的做法，使滿清政府適應於西方思想。但中國資產階級太不成熟，牠的經濟基礎尚太狹窄，而且牠的利益尚太分立，因此牠不能以更帶進攻的態度影響事變的進程。那末，那些追求維新的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只好就依賴一個開明的君主。不幸，拿『皇命』當作一個社會變革的工具來看，却證明是無能的了。皇帝只是他自己的國家機關的化身罷了。當他指揮牠去破壞牠自己時，牠冥頑

地起來抵抗，這是並不足奇的。維新派碰到官僚的惰性，便束手無策。（註二十二）

保守的滿淸官僚能夠遏止維新的小小滴流（這不過由幾個智識份子來支持），但牠却不能抗拒那些致牠於死命底強有力的各種因素。牠受了帝國主義者的連續打擊，已搖搖欲倒。十九世紀臨末的幾年，最顯著的事實就是列強相繼勒索土地，貿易及鐵路的讓與權。（註二十三）在國內，舊式手工業經濟之破壞，生活費之高漲，再加上新的水災和旱災又造成一個新的原始的民衆叛亂，這一次發生於華北各省，在這些省份裡，舊時的秘密結社又復興和繁盛起來，且使被迫害人民的激憤向一切外夷（滿人和西人一樣）發洩。滿淸官僚受維新運動驚退之後，竟依賴於危險的便宜方策，把這一次反對牠自己的民衆叛亂，轉變成爲鞭撻那些可恨底外人的皮鞭。他們竟公開正式支持義和團（這個造反的團體以『拳黨』見知於外人）。這些亂黨把他們的口號：『排滿興漢』改變爲『扶淸滅洋』！（註二十四）

這只能招惹禍患。這些猛烈的，原始的地方暴動被外國軍隊摧毀了，勝利者並向中國施以嚴酷的懲罰（包括四萬萬五千萬兩賠欵），又藉一九〇一年之拳匪條約把軍事的要津一掃而空。在往後數年間，中國成了列強相互競爭和衝突底無告的旁觀者和犧牲者。鐵路，租界，及全中國各行省的命運均在歐洲的外交官邸中決定。滿洲和朝鮮的支配權取決於日俄橫越中國領土而進行的戰爭，並由一道條約來解決，這個條約竟不顧及中國政府之意旨，自由交換中國的領土。淸廷不復替中國人口中任何有力部分說話，牠也不能抗拒其主權之逐漸破壞。

中國智識份子由維新的希望一變而爲革命的宣傳。淸朝已衰敗了，這一感覺深植人心。學生和智識份子均捨棄康有爲而開始更親切的傾聽另一個亡命客，孫逸仙的意見。

一八九五年向皇帝遞改革條陳的人們，孫氏亦是其中之一

★。但他的政治發展却是另一種思潮的產物。這種思潮與影響當代更著名之維新派者不同。孫氏於太平天國運動最後壓服之後一年生於廣州附近一小村中，他早年和秘密活動之過激份子接觸，這些份子深染武裝叛亂之太平軍傳統。他青年時遠赴檀香山，成了一個基督徒，且於研讀聖經之餘，吸收美國之民主思想。在他的政治生涯之始，孫氏採取秘密組織推翻滿清的道路。一八九五年他的第一次嘗試失敗了，孫氏亦亡命國外，找尋和爭取華僑來擁護他的革命政綱。

孫文和華僑的連繫對第一次中國革命的行程是有決定重要性的。中國國內資本主義因外人競爭及城市中國資本與土地半封建剝削之有機連繫，弄得無能為力。這些因素障碍獨立資本主義之發展，也阻止任何強有力的，清楚的資產階級民族革命運動的產生。但印度，南洋，歐洲和美國的華僑（工人和商人）和近代民主政治直接發生接觸。旅華外僑享受之強有力的保護，清晰地與華僑遭遇種族歧視及虐待時之毫無保障相對照。一種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尚未在中國發展之前，久已形成於華僑間。強有力的種族，家族，和傳統的紐帶使這些僑民與其故土連結起來，而革命運動也從他們那裡首先得到財政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在較為富足的華僑中，肯為一個強大和獨立的中華民國而奮鬥者，寥寥無幾，這件事頗耐尋味。孫氏籌集的大部分款項均來自那些窮苦工人和小商人捐助的小款，這些人是證明了比誰都堅决擁護孫氏的政綱的。

這個政綱的中心思想是藉軍事陰謀來推翻君主政體，牠吸引了大部分失望的維新派和新一代學生的大多數，尤其是一八九五年後成羣結隊赴日留學的學生（一九〇〇年後，

★按此處與史實畧有出入，孫文並未參與公車上書，他只於戊戌政變之前一年（一八九四年）曾上書李鴻章。但他條陳的內容及其精神與康梁一致，故著者在此只犯年代上的錯誤，他指出這件事的意義却是對的——譯者。

他們的數目更多）。在中國，這一運動與秘密會社結合。從城鄉智識階級來的新份子給了這些組織以一種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色彩，這是牠們從來沒有過的。留學生滿懷新思想和急進的熱誠回國。到處奔走召募黨人。對現存事物秩序之不滿增長了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思想向前邁進。俄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給了中國智識份子一個印象且對清廷發生特別有效的影響，推使牠讓步。（註二十五）中國商人和資本家開始更勇敢的保持自己的利益。一九〇五年之抵制美貨與一九〇八年之抵制日貨，再沒有這樣清楚的表現這一點。

這兩次運動採取一種廣大的民衆性質。牠們受商會和新出版的民衆報紙擁護。中國利用經濟的武器來反對美國人之虐待華僑，這件事表示商人和小資本家已生長了一種自信心和團結的新精神。這次抵貨運動把僑美華人與祖國同胞的連結拉緊了。牠幫助打破了地方界限。這次抵貨在廣州最猛烈（僑美中國人大多數是廣東人），但廣州的抵貨却與星架坡，上海和天津的示威和抵貨活動相呼應。恐怕最有意義的就是這次抵貨的舉行公然蔑視皇帝的權威，因為清廷受了美國的外交壓迫已下令禁止抵貨了。一九〇八年的抵制日貨更特別帶有反政府的性質。這次抵貨之發生是因為在某輪船事件上，中國當局向日本卑躬屈膝。商人焚燬日本貨，碼頭工人拒絕替日本輪船卸貨，恐怕這一次是中國工人第一次參加本世紀的反帝鬥爭。（註二十六）

抵制美貨連帶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取消讓與美國某公司之粵漢路建築權。現在正是圍繞這個鐵路讓與權的爭執，反對清廷的空氣在各省富有紳商之間發展起來。建築鐵路連結廣州，漢口，長沙和成都的計劃已擬妥，實現這種計劃的，純用中國資本的公司也已成立。北京政府現在已是一個買辦工具，牠發覺批准讓與權於外人獲利最豐，於是用外人金錢收買中國人已投放於各種鐵路計劃中之股份，為的是把這些計劃轉讓於外人。這些雛形的鐵路大王們，尤其

是湖南，湖北和四川的，便羣起反對這件事。秘密的革命會社（註二十七）利用這次爭執作廣大的鼓動，因爲牠大有助於把滿清政府和可恨的外國剝削者和競爭者視爲一丘之貉。這件事把上層階級的新層份牽入反君主政體的鬥爭中。正因爲四川在這一問題上爆發了騷動，纔終引起於公開的叛亂。

清朝苟延殘息的最後十年間，完全崩潰的危險已顯現了。只因爲屈服於改革的迫切要求纔把牠延緩下來罷了。慈禧太后及其心腹迫得要認識拳亂之後，繼長增高的嚴重不安，必須藉讓步來對付。現在彷彿只是一個讓步或下台的問題似的。一九〇六年，清廷，這個差不多三百年的天朝上國的專制統治者，竟不得已承認立憲政府的『原則』了。經過這一次初步示讓之後，皇帝們的天生特權便逐漸失墮了。當這個皇朝最後一個有力的代表從舞台上消失時，牠已判定了死刑了。慈禧太后於一九〇八年末逝世。與她一道進墳墓的還有受監禁的光緒皇。她的最老的心腹寵臣也不久追隨於地下。一個三歲的宣統皇高坐於龍座上★。一個愚蠢和不夠格的人充作攝政，治理國事。朝廷墮入於瑣屑的袒護親私和黨同伐異的泥沼中。紙上改革（數目愈多則愈見鄙嗇和不實際）是賜准了。一九一〇年各省諮議局（與俄國沙皇治下之Zemstvos 非常相似）成立了，這是經過嚴格限制的『人民』選舉出來的。（註二十八）這些諮議局只有權討論，而且也只是討論皇上指定的某些問題。但是甚至這些小心揀選出來的『長衫』諮議局也和清廷衝突起來。他們力陳只有一個更寬大，更負責的政府纔會保持君主政體。各省諮議局代表參加北京的全國機關（即指資政院——譯者）而且絕望地設法克服宮廷的抗拒，促進議會改革。形式的變動已着手，但舊制度的手尙壓緊這些機關，把牠們削減成爲無望的虛搆。資政院由欽選議員與

★別名亨利溥儀，他之成爲日本傀儡國——滿洲國的康德皇，事非偶然。

異常安全的諮議局議員組織而成，牠設法把君主政體拉在後面，幻想拯救牠，這種幻想包含在『議會』這個魔術的名詞中。但當牠們爭吵的時候，革命突然襲擊牠們及牠們希望拯救的宮廷。

一九一一年九月，在四川發生了反對滿清官吏的地方騷動，十月武昌衞戍軍的叛亂也隨之而來。當駐紮於蘭州的清軍拒絕開往征討亂黨時，滿清統治的命數將要完結了。叛亂擴大，清廷卑賤地甘願犧牲一切權威的計較，以保全統治的外貌。但事情來得太晚了。這個帝國崩潰和塌台了。這個帝國曾微弱地設法揮動『資政院』的旗幟來抵抗一個無法更變的命運，現在這個『資政院』也跟牠塌台了。

內部的腐蝕已把這個皇朝削減爲一個零。只需輕輕一推便可除掉牠。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只是產生足以造成這輕輕一推的力量。從這次革命中，沒有浮現一個階級能夠領導這個國家的轉變。能夠解決土地恐慌及恢復國家獨立的，而只有國家獨立纔能保障中國不受帝國主義列強底不斷的侵入和壓迫。中國資產階級與土地半封建利益之一致性預先決定了牠無能引導農民走出困境。一九一一年的革命黨人甚至連被逼而畧作嘗試也沒有過。農民羣衆在推翻滿清皇朝中沒有盡一點作用。他們的消極態度使各省的舊軍政機關能夠保持原狀，只不過廢除了朝代稱號和長辮子罷了，這條辮子是滿洲征服者當作奴屬的標記而强迫人民留蓄的。

名義上的中央權力一失，政權便轉入各省或各地方小暴君的手中，這些小暴君極力保持整個現存的剝削制度。經過他們，外人在中國經濟和政治生活中的堡壘弄得更嚴整了。各地方政權之成立主要是配合列强各自的『勢力範圍』。雲南和廣西南部的軍閥受法國的扶植和支持。珠江流域在經濟上受香港支配，而上海則更確定的處在英國勢力之下。華北大部分成了日本的特殊勢力範圍。不久這些互相敵對的政府爆發內戰，這些內戰主要是反映那些騙取重要

經濟地位的主要帝國主義列強間的衝突。正因爲有了這一事實，辛亥革命後的時期與往日朝代傾覆之後的分立，內戰及混亂的類似時期，完全不同。

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曾參加這次革命，但等到這種新的割據局面展開和形成，他們便束手無策了。他們反對皇朝的戰畧從來就無法取得一種眞確民衆運動的形式，原因就在他們所代表的階級，經濟上不成熟，政治上又無能。保持這個階級的土地利益也就等於保持中國農村的一切落後的東西（封建的宗法制度，文盲，迷信等）及舊制度所憑藉的每一事物。牠的城市利益却隸屬於，又因而屈服於外國資本。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鬥爭因此便採取軍事陰謀的方式，但這種方式却往往失敗。君主政體的傾覆幾乎與他們的努力無關。往後他們只成了那些篡奪政權底軍閥的附屬物。他們精心製作的國會和憲法並不是有眞實政治支配權的機關，而是他們賴以保護的軍閥們隨意寬容和利用的簾幕。因此，孫文本已勝利回國且被選爲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但很快便迫得讓位於袁世凱，袁氏是舊政府一位將軍，供職於北京。

智識份子如不成爲目不識丁的將軍底下一名秘書或屬吏，便只好離開這個運動，陷於消極和灰心。孫文及其政黨——國民黨的其餘黨人染了議會白癡的毛病，在黨的旗幟上標寫『護憲』的口號。但他們只是寄托於兩派敵對軍閥之一方來護憲。在這種把戲中，他們喪失了首尾一貫的原則性。只有軍閥們勝利了。

推翻君主政體本身就是一種具有巨大歷史重要性的進步行動，但牠似乎已把這個國家愈弄愈糟。內戰與軍閥的統治加深了農村的貧困。苛捐雜稅增加了。土地荒蕪了。農業生產也衰落了。中國迫得開始輸入米麥。飢荒與無法遏止的天災使人類生命喪亡甚巨。幾千百萬農民被迫離開土地，或加入軍閥軍隊，擴大牠們的隊伍，或流爲匪寇。苛刻的賦稅與軍閥的誅求促進了中國農民經濟的破壞，且使人

口的絕對大多數陷於慢性的飢餓。國內工業不能夠，而且似乎永遠不會吸收大量的過剩勞力。但第一次大戰的直接結果，恰好就在這一方面開始發生迅速和突然的變化。

這次大戰要人全力注意而所有國家的全部工業生產也捲入其中。中國土著的生產者突然發現他們本國內有一個偉大的市場擺在他們面前，而且這個市場還暫時免除了外國資本的不斷壓迫。虧得這次戰爭的需要，中國的入超急促低降至最低點（一九一九年總計不過一千六百萬兩），而輸出則激增。以一九一三年爲一〇〇，則一九一四年之輸入爲九一·六，一九一九年爲一〇五·九。輸出由一九一四年之八三·八增至一九一九年之一四〇·一。其實在戰爭的幾年中輸入差不多停滯不前，這給了出口貿易以一個飛躍的機會。（註二十九）

中國工業生長的突發更足驚人，這是大戰的喘息時間之賜。工業機器之輸入由一九一五年之四，三八〇，七四九兩增至一九二一年之五六，五七八，五三五兩。棉織廠由一九一六年之四十二家增至一九二三年之一二〇家，紡錘由一，一四五，〇〇〇增至三，五五〇，〇〇〇錘，絲廠由一九一五年之五十六，增至一九二七年之九十三。一九一五年之四家烟廠增至一九二七年之一八二家。（註三十）

假如我們以一九一三年爲一〇〇，則一九二三年我們便得到如下的指數：煤產量，一八三·五；生鐵產量，一八〇·六；絲品出口額，一五二·三；豆油出口額，四三二·五；棉紡錘四〇三·九，同時，在運輸和船運方面也有較小的，但值得重視的增長。（註三十一）

工業生長，中國商業機構也根着發生廣泛的改變。合股方式採用了。銀行業也擴張了。既然機器已採取迅速增長的手段，代替了手工業生產，師傅，工匠，徒弟關係也放棄決定的經濟地位，讓之於股東——經理——工人關係。

生產力的增長促使野心勃勃的中國資本不由自主地與基礎鞏固的外人利益衝突，並與外人底經濟和政治特權的現存

機構衝突。牠同時也促使工人這個新興階級和他們的中外僱主衝突。從這些泉源中流出了新鮮的民族主義潮流，而這些潮流則把中國捲入下一年代的蜂起中。

第二章　中國革命的諸問題

第二章　中國革命的諸問題

中國發生社會變革過遲了。牠今天之所以是一個具有如是深刻對照的國度，就在這一點。牠受一個全世界的制度拉着，迫得從木犂跳到拽引機，從抬轎跳到飛機。帝國主義迫使天朝上國要擇居於下界，這個下界在經濟上，文化上和政治上均已遠超過牠了。中國已沒有循次漸進之餘地，也沒有機會來經歷世界其他國家已通過了的各個歷史的發展階段。牠想與其他各國並駕齊驅，牠一定得向前拼命一跳。西方曾花數世紀來進行變革，中國就必須花幾個年代來進行。這一扭轉如沒有最深刻的震動是不能夠發生的。從此便決定了過去三十年間中國事變之動亂，速度，廣度，深度，和爆炸性。

新時代既如是急迫的要求把中國抬高到物質和文化的平面上，中國便不僅必須猛烈的和牠的過去决裂，牠還必須改變牠的現在。舊的桎梏和新的桎梏兩者都必須加以破除。帝國主義的侵畧，輸入生產，運輸，交通和金融的最新式技術，亦即輸入近代資本主義之工具。但是帝國主義却使商人，地主，官僚和軍閥適合牠自己的用場，藉此來幫助保存中國社會組織的前資本主義形式。外人建築的工廠，外人建築的鐵路是用來從落後性中抽取超額利潤的，這種落後性尚在整個中國佔優勢。帝國主義因爲操縱了中國經濟的一切重要地位並爲了酬答海外投資家而從中國抽去貢品，牠便窒塞了中國資源底『正常的』或獨立的發展，這

發展是有利於中國人民提高生活水準的。假如中國人民從窮乏的地位開始提高到豐衣足食的地位，生產力就一定要解除一切束縛自己的東西。土地就一定要回歸那些耕種牠的人們，而帝國主義操縱中國經濟生活的權力就一定要打破。這兩點就是中國革命問題的不可分離的要素。牠們的解決當然不能單獨在中國的國家範圍內來尋求。在世界經濟的現狀中，某一國家的問題再也不能夠與整個世界的問題分離。在中國，按照最直接的意義來了解，牠的歷史任務的性質就表示這些歷史任務的解決不能不與帝國主義列強直接衝突。這一點馬上指出中國社會和政治衝突之國際性。中國社會的改造只能是整個世界底經濟及社會改造之一個因素。同時，中國現在已成了這個世界之一部，成了世界規模上敵對力量底活動，估計和衝突的巨大要素。中國國內危機的發展和最後解決不能不發生遠超出其國境以外的重大（而且恐怕還是決定的）影響。

如果革命不首先把土地及農民辛勞而獲的生產品歸還農民，要想在中國經濟生活中來一個急激的改變，連想也不能想。只有依照這個辦法，舊式土地佔有制纔能破除。不經過這個必需的第一步，則農村經濟的最後改變以及按照新形式和新方法來增進農業生產是不可思議的。中國人口中有四分之三或三萬萬以上的人民是依賴土地謀生的。這幾萬萬人的問題就是中國的問題。他們的貧窮就是中國的貧窮。中國底未來的希望恰恰就在這大多數人民底巨大生產能力的解放。今天，他們被一個社會制度弄得赤貧了，這個社會制度把他們從土地搾出來的生產品奪去，同時把土地本身也奪去，但一點報酬也不給回他們。

中國的農村經濟具有如下的主要特色：（一）土地所有權愈來愈急速的集中於人口中數目愈來愈少的一部份人的手中；（二）多數土地權限讓渡於住外地主，政府官僚，銀行和城市資本家，這些人操縱商業資本，而商業資本則經過地方商人和高利貸者而深入最僻遠的村落，但地主，官

僚，銀行和城市資本家回頭又受外國金融資本及世界市場制度操縱和支配；（三）農業生產之失序和衰落，這皆由於愈來愈細份底土地之不經濟的利用，最落後的耘耕方式之保存，地主，高利貸者和國家之苛捐重稅，飢荒，水災和旱災之肆虐，以及軍隊舉行的內戰，這些軍隊是由那些被收奪的農民擴充起來的。

世人曾一度那樣普遍的懷着幻想，以爲中國是較爲安樂的小地主國家，這一幻想等到最近的調查纔最後加以打破，這次調查是第一次充分地和科學地進行了的。陳翰笙教授曾根據分區的研究（這是在他的指導之下舉行的）估計農民人口中，不下百分之六十五是完全無土地或土地飢荒的，所謂土地飢荒就是指保有零碎的土地，而這些零碎土地却太小，而且太受落後的生產方法和現制度的殘暴手段所牽累，以致即使在僅能糊口的水準上，也無以爲生。（註一）土地佔有和應用的差異以及在土地上應用和剝削勞動力之差異，暴露農民人口內深刻的分裂爲富農，中農和貧農這三個範疇。★

土地租佃的狀況反映出農業內的階級關係。一九二七年製作的一個官式估計稱，農民中百分之五五完全無土地，百分之二〇爲土地不足者。有人估算可耕地的百分之八一集中於百分之一三的農村人口中。(註二)這些數目字大體上爲後來的調查者證實。在中國北部，個別的土地所有者佔了優勢，但把一個標準的縣份加以研究，證明農業人口中雖然只有百分之五的無地佃農，但總數百分之七〇纔佔有百分之三〇的耕地，平均每塊土地爲一〇・九畝或二英畝弱。在另一個縣份裡又發現人口百分之六五・二佔有百分之二五・九，土地分攤每塊七畝弱，或一英畝強。地主和富農合成農業人口的百分之一一・七，佔有百分之四三的土地，而中農家族則佔有其餘的土地。

在人烟遠較稠密的長江流域和南方（在這裡已最先感受帝國主義的影響，而農業的商業化因此也比較進步）發現這

種不平均現象厲害得多。調查者在浙江省的某縣發現人口的百分之三領有百分之八〇的土地。在無錫（華中的另一縣），農戶的百分之六八・九僅領有土地的百分之一四・二，平均每戶領有一・四畝，或四分之一英畝弱。地主和富農不過佔農戶的百分之一一・三，却領有百分之六五的土地。（註三）

單獨調查廣東南部（註四）的結果，發現該省各區的土地所有者構成人口的百分之一二至三二，而佃農及農業勞動者則構成百分之六八至八八。調查者發現某地代表人口百分之六四・三的貧農中有百分之六〇・四是無土地者。已經過研究之縣份，每縣都證明農業人口中有半數以上沒有土地。在貧農耕種之土地中，只有百分之一七・二是領有的，而百分之八二・八是租佃的。據調查，一家貧農家族

★陳教授把這三種範疇規定如下：『當一個農戶靠土地僅能自給而在牠的農業勞動中沒有直接受他人剝削或剝削他人者，我們可以說，這種農戶屬於中農階級。中農的地位幫助我們去決定另外兩個農民階級的地位。當一家農戶在忙時僱用一個或一個以上之農業勞動者(日工或季工)，以致超過普通自給的中等農戶所需要之勞動力總消費量，或當該農戶所耕種之土地面積超過中農所使之平均土地，我們就把這種農戶歸入富農一類，我們凡在某處發見農戶耕種之土地兩倍於其本村中農之土地，我們就無須進一步考察勞動關係，隨便把他們歸入富農一類。貧農比較容易認識。凡農戶耕種之畝數(一畝等於一英畝之六分一)低於中農，而其成員除靠其自耕之產物維持生活之外，尚必須依靠工資收入或具有補助性的某種收入者，一概屬於貧農。凡貧農中不耕種任何土地（他們自己的，或租來的）而就僱於人，或者只耕種一小塊土地，而主要還是靠出賣他們的勞力於農業中以維持生活者，稱爲僱用的農業勞動者，但仍屬於農民。』華南土地問題（一九三六年上海出版）第八頁。——譯者註

領有的平均地面積爲八七畝，而平均耕種面積（包括租佃地）爲五·七畝。又據調查，一家農戶的起碼生活所必需的畝數，按照縣份的不同，在六畝與十畝之間，而農佃所必需的畝數，則加倍。

土地領有權這樣極度的集中，一半還是由於往日佔重要地位之國家，廟堂或公社土地逐漸割讓，以及農村宗族的大集體領有地轉落於小羣有勢力宗族領袖手中，變爲他們的事實上的私產。農業生產不斷衰落，農民雙肩負担不斷加重，很快便使他喪失了自己僅存的土地。他用在他這一小塊土地上的本領一點也敵不住其他地方農業上的科學進步，也不能幫助他去解决他這塊土地的不斷低減的生產。中國的重要商業農獲物：絲和茶已在世界市場中失去牠們的地位。因爲更新式的競爭者已更有效的生產出更好的生產品了。（註五）

商業資本之深入最遼遠的內地及與之俱來的廉價工業品的流入，完結了農民底舊式的自足自給生活，而整個國家的落後性，足以應近代市場要求底交通之缺如，再加上農民底方法的原始性，又一齊把農業生產者摧毀。他爲了生存便必須爲販賣而生產，但他這塊土地的狹小及他底耕種的原始性却成了一個不可踰越的障碍，使他無法順利地這樣做。他不僅不能生產足以供給他所需要的剩餘額，他倒還要借債來購買肥料，購買食糧以渡過收穫之前的難關，購買籽種，償付農具之租金及用費。他爲這些債務抵押了他的土地，至於利率則永遠不低過百分之三〇，而且常常在百分之六〇，七〇，八〇以上，甚至還有更高的哩。賦稅的沈重負担，軍閥們的橫徵暴斂（這些軍閥是統治他的），迫使他更深的沈淪於債務中，且使他和他的土地一任高利貸者和收稅吏爲所欲爲。（註六）他還受商人隨意敲詐，因爲他不能把這一點子收獲運到更遠的市場去，他希望賺錢。收獲物被恣意壟斷了，價錢也受操縱了。一季勤勞的結果總是增加新債而不是增加剩餘額。債務跟着他到下

一年和下一代。他喪失了土地便成了一個佃農。他必須把他的收獲物百分之四〇至七〇讓之於地主而且還讓給他一個巨大的附加百分率，那就是特別稅，禮物及義務，這些義務從過去湮遠的封建時代起不知經過幾世紀遺留下來的。（在古代傳統規定的特別期間內，替地主作無報償勞動的義務也包括在此項義務之內）。他無法抗拒之饑饉，水災，和旱災犧牲他的收獲，他的土地（如果他有的話），犧牲他的家庭，而且往往還要犧牲他的生命。但即在最好的年成中，他也差不多頻於餓斃。他比之地主，收稅吏，商人和高利貸的債奴好不了多少。

這個過程，從許多方面看來，都在使大多數農民陷入於慢性的，無可救拔的赤貧中。幾千百萬被驅離土地的農民，行乞，挨餓，做土匪或擴充軍閥的隊伍。在南方他們流到海外去，流到美洲，南洋和印度去。在北方，他們移殖於滿洲的未開墾的土地上。幾千百萬人擁塞着沿江河及沿海的城鎮，這就是新興工業無法吸收的廉價人力的無窮泉源。他們的勞力尚賤過於牲口的勞力，而橫亘整個中國，人類就幹着牛馬的工作。土地愈來愈多的被拋荒。中國是最大的農業國，也迫得開始有增無已的輸入糧食。(註七)內外市場也開始不祥的衰落。整個經濟建築已腐朽入心。

上述的情形表示解放土地以供更大的生產用場（而這一點又表示解除農民的負担）已成了任何復興和甦生中國經濟底努力的必不可少的眞正一步。但這一點要能夠實現，只有整個國家經濟同時解放，按照其需要來發展和調整本國的資源。但只要帝國主義經濟和特權保持一日，這一點也永遠辦不到。外國資本在一切基本的經濟部門中佔據了支配的地位，像水蛭一樣的吮吸這個國家的資源。牠佔有將近一半的棉織工業(中國之最大工業)。牠直接領有三分之一的鐵路，在其餘鐵路上則握有抵押權。牠在中國領海中，領有和經營半數以上的航運，且獨自經營百分之八〇的中國對外和沿海貿易。帝國主義者利用其技術的優越及其

政治與經濟的特權，使中國利權不斷外溢。在一九一二年與一九二四年之間，該國的入超竟累增至十五萬萬元★的總額，在往後十年中，這個數目還達到兩倍以上哩。一九〇二年與一九一四年間，外國投資已倍增了，在隨後十五年間又增加了一倍，竟達總數三十三萬萬美元的估值。這筆投資五分之四以上直接投放於運輸業和工業，其餘就是借欵，這種借欵使中國政府變成帝國主義者的柔順工具，且給了後者一個致命的支配權，操縱了該國的內外歲收。（註八）

中國想取回自己的生產力支配權，牠就必須奪回這種喪失了的陣地。牠必須終結那些地盤衝突（軍閥們在外人『勢力範圍』內，受帝國主義支持，他們永遠要維持這種衝突下去），把自己統一起來。只有採取這個辦法，國內和平纔能恢復，軍閥制度的沈重壓迫纔能撤除，國內市場纔能擴張和發展。也只有採取這個辦法，中國工業纔能成爲提高全國民衆生活程度的基礎。中國要想解决土地的難題，牠必須把自己從帝國主義中解放出來。牠要想從帝國主義中解放出來，牠又必須令農民有解除其不可忍受的負担的希望，藉此，把大多數農民羣衆鼓舞起來。一個反帝運動要把土地暴動的口號和民族解放的口號並排地寫在旗幟上，纔能取得力量，把帝國主義加以制服。

這個任務怎樣纔能完成，又由誰纔能完成呢？答案自然要歸結到階級力量和關係的估計，因爲人口的每一部份對土地和對帝國主義都保有各別不同的關係。每一部份也必然懷着不同的目標來參加政治鬥爭。農民構成小資產階級的最大多數，歷史已非常豐富的證明，牠在政治决鬥塲中不能獨立起作用。牠深刻的分裂爲幾個階層，這些階層的經濟利益，厲害的衝突起來。牠是人口中最分散和最落後的部份。牠無論在經濟上和心理上都是地方化和帶狹隘性。就爲着這些原因，農村往往追隨城市。農民往往順從城市

★照美元計算

階級，因爲城市階級能夠集中，團結，支配和號令。農村經濟一定不可避免的繞着都市的向心力旋轉，如果沒有這種向心力農民就束手無策，尤其是那些最貧苦的農民，即最受剝削和最接近耕地的農民。他因爲得不到那個起支配作用的城市階級的援助或者因爲蔑視這一階級，結果他自己企圖改善他的命運總是採取孤立而沒有持久性的暴行方式。

這種說法，適用於俄國，尤其適用於中國，因爲中國是幾千百萬窮民的大國，這些人民受了文盲和迷信的籠罩，在地域上竟如是分裂，以致風俗習慣和說話在省與省，城與城，甚至村與村之間都有厲害的差別。中國的偉大農民戰爭總是以農民內部之重新分層結合告終，因爲叛亂的農民一貫就是受統治階級之一部份督率，而這一部份統治階級並不是追求一個新社會，而是追求一個新朝代。等到戰爭已完結，一個新皇帝便登極而地主們也重新抬頭。只有一個城市的同盟者能夠改變一切社會關係，破壞整個舊國家機關並在牠的廢址上樹立一個新的，纔能夠把農民從這種有害的歷史循環中解救出來，使他們脫離農村中的少數剝削者，以及幫助他們媾通那使城市與鄉村分離的文化裂罅。

在歐洲，兩三個世紀以前的資產階級革命已盡過這種歷史的作用。新興的資本家一定得把資產階級財產的權利伸張到土地去，並且替新興產業制度的工資奴隸制把勞動從農奴制中解放出來。小資產階級中最急進的部份走上前來幫助農民打破封建的桎梏（封建制度利用這些桎梏把農民束縛於土地上）並奠定了強固的民族的資產階級國家的基礎。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一個不同的社會模型勢必有不同的解決辦法。資產階級不能解放農民，因爲資產階級生長的特殊條件及遲緩性，直接剝削農民的正是牠。我們已經指出過，資產階級並不是以一個淸楚的城市集團抬起頭來，而是從舊統治階級中生長出來，我們又指出過，牠仍有成

千根紐帶和土地上的前資本主義或半封建的剝削制度連結在一起，而且牠還是直接參加其中的。農民忍受地主，高利貸，商人，銀行家，軍閥，收稅吏和地方官僚的掠刼。這些剝削者的利益混合在一起並成了整個統治階級的連帶利益。地租，利息，封建稅和國稅的徵收人是同一個人，這種情形並不是不普遍。

陳翰笙教授寫道：『中國地主與法國舊制度下之地主完全兩様，他們往往是四位一體的傢伙。他們是收地租者，商人，高利貸和行政官。許多地主一高利貸者變成地主一商人；許多地主—商人又變成地主—商人一政客。同時，許多商人和政客也變成地主。地主保有釀酒坊，油坊和穀倉。另一方面，批發所和雜貨店的所有者又是土地的承押人，最後又是牠的主人。地主的當舖和商店設法隸屬於軍政當局的銀行，這是一件盡人皆知的事實……當若干大地主把重利盤剝當做主要職業來幹時，這些銀行差不多通通和這件事有點關係。又，許多地主同時是軍政長官。』（註九）

這就是中國統治階級的眞面目，同時也就是搾取農民底剝削制度的眞面目。支配這一現象的基本關係是資產階級性的。許多世紀以前，當生產的基本手段——土地變成可讓渡的時候，封建制度(就其古典形態來說)已在中國消滅了。商業資本侵入農村，便在那一個仍然保留許多前資本主義特徵的經濟結構之內，建立本質上是資產階級的剝削方式。現時的資產階級（身兼地主—商人一銀行家—政客—收稅者），其收入乃出自高利貸，市塲投機，土地抵押，國稅及地租。他自身就是中國經濟落後的產物，他從那深植於社會結構內的前資本主義剝削形式方面，也蒙受不少福利。他採取無論在性質上和來源上都帶有強烈封建臭味的方法來租收租稅，如軍閥的徵發，採取義務勞動和禮物形式納給地主的稅，現物地租，強迫勞動，兵役，龐雜的地方稅和厘金等便是。

在帝國主義的重壓之下，中國資產階級最重要的部份已成了外人或外人操縱底資本的數代相承的掮客，宛如軍閥及其政府已在其各自的勢力範圍內，成了帝國主義互相競敵底棋盤的小卒一樣。當滿懷大志的中國工業家和銀行家逆睹其自身的獨立的資本主義發展，自然而然的要去解鬆帝國主義的支配力之時，他們却碰到了這一事實：他們與國內被剝削羣衆隔離的鴻溝較之他們與國外競敵（對這些外敵他們尙如是密切的依賴）矛盾更是深刻和不可踰越。資產階級能夠而且一定會設法向帝國主義者取得讓步，向他們要求和獲得較大一份贓品，但資產階級如果不把自己摧毀却不能希望令羣衆滿足。如果不推翻一切現存的財產關係和破壞城鄉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土地是不能歸還農民的。這一基本事實預先決定了中外剝削者要聯合起來反對被剝削者。這件事又同時表示中國革命任務的解决已落在一個最新，最年青的階級——城市無產階級的手中，這個階級把城市和鄉間幾千百萬勞苦大衆和手工業者組織起來做自己的後盾。只有牠的利益纔和整個中國經濟生活的急激改變相一致。

無產階級在一個生齒繁殖的國家裡不過佔一個極小的少數，但牠却能夠負上政治領導的責任，這個思想已不再是一個學理，已於一九一七年在俄國成了事實。在那裡，一個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已經承担了一個破產的資產階級無法負起的任務。十月革命已經證明，一個無產階級暴動——新階級矛盾的極致——與一個農民戰爭——舊階級矛盾的推移——的結合，在近代帝國主義世界中是一個落後國家的唯一出路。中國也像俄國一樣，牠必須把那些在歷史上屬於過去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任務加以解決。俄國已經證明，在二十世紀，只有激烈的改變一切階級關係及整個社會結構纔能夠完成這件事，而這種激烈的改變靠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種革命的結合來完成。

十月革命的經驗對整個落後的東方，尤其是對中國是很重

大的。過去的資產階級革命曾發生於資本主義初期，即發生於無產階級尚未以一個獨立的階級出現之前。但就是這些革命也只是由於平民大衆的堅决干預纔產生了牠們的歷史的成果。荷蘭的手工業者和都市貧民奮鬥了一個世紀來推開西班牙封建制度的魔手，替荷蘭資產階級的經濟擴展清除道路。替英國資產階級共和政治奠定基礎的正是克倫威爾軍隊中的手工業者和農民。在法國這個古典的資產階級革命的國度內，農民暴動把第三等級的那些受驚嚇的市民們趕回貴族的懷抱中。都市的平民，雛形的無產階級，窮人，短袴黨，一次又一次的從巴黎的溝壑中抬起頭來，把革命推向前去。最後打破了封建制度的鐵鍊和解放農民的正是一七九三年的雅可賓共和政府，不是一七八九年的國民會議，雖然雅可賓政府必須把農民交給資產階級秩序的新奴隸制（農民成了這個奴隸制的一個必要部份）。

在上述的事變與俄國革命之間，插入整個歷史時代，這個時代深刻的改變了整個社會並因而改變了社會變革的方法和工具。資本主義在世界規模上建立分工。國家界限的樹立原來是便利於把國內市場及供應這個市場的生產制度加以改造的，但勢不可當的技術進步和大財富的自動擴張很快便和國家界限衝突起來。一羣互相競敵的國家爭奪市場，新的原料來源，廉價勞動和較高利潤。從這些衝突中生長了殖民帝國。世界上一切落後的區域都隸屬於較進步的國家而且不可抗拒的捲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軌道中。亞洲和非洲成了兩個極大經濟，政治和軍事衝突的劇場。從這個迅速展開的過程所包含的無情的競爭中，發生了大財富集中的趨勢，而在大規模工業中以大量生產爲基礎的獨佔業也生長起來，全世界也分成數目愈來愈少，力量愈來愈大的經濟和政治集團，這些集團藉經濟或軍事的手段不斷互相戰爭工業的支配轉變而爲金融的支配，這種金融的支配力跨越大海高山，甚至攻陷了舊中國的長城。當落後底俄國和新近覺醒底東方的革命已成熟的時候，世界已經

遠進入帝國主義的時代了。

這個變革了的世界對那些落後國家是現成的榜樣。發展遲緩的國家必須向前飛躍，把世界其他國家已經歷過了的改進步驟綜合爲幾個單純的歷史階段。先進國與落後國相互間的高度依賴關係把牠們的政治命運聯結在一起，破壞了落後國任何漸進和孤立底民族發展的可能。在經濟上，牠們必須從最原始的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跳到工業，運輸和市場組織的最新技術；在政治方面所必須作的跳躍也不下於經濟方面，近代民主政治底長期和較爲漸進的發展縮成一個簡短的階段了。事情還不止此，因爲社會已在世界規模上發展到這個地步，牠不僅迫使落後國要與先進資本主義國並駕齊驅，而且還要超過牠們。資本主義已是生產力的桎梏。牠的國家界限阻斷了更進一步的發展，而這一發展現在只有在國際規模上纔有可能。正因爲如此，資本主義世界只能提出一個災刧的戰爭來解決問題。假如在先進國中，資本主義與其民主的政治機構已無法適應擴張經濟的基本要求，那末落後國家想在民主政治的範圍內來博取和平的資本主義發展，已完全無望了。他們萬一要走上前去，便必須跨過整個歷史時代，建立過渡的無產階級專政直接走向社會主義的發展。這就是一九一七年在俄國所發生的情形。事實證明只有年青的無產階級纔能夠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及現在提出的問題。

十月革命是勝利了，因爲歷史發展的行程使生產力的生長要有賴於無產階級走上政權。在俄國，工人之能夠利用這一歷史的時機，就是因爲他們受一個黨領導，這個黨已把歷史底階級結合的自覺性發揮到了異乎尋常的程度。牠是從十九世紀中葉歐洲的革命經驗及俄國較近的歷史中獲得這一自覺性。這幾個最偉大的共產主義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及繼起他們之後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列寧和托洛斯基，把這一自覺性加以綜合，並把牠發揮得清清楚楚，這四個人已在整個歷史時代上留下他們的偉蹟，這種偉蹟是很少

人幹得出來的。

無論在先進國或落後國裡，歷史的辯證律已從資產階級手中取出社會進步的槓杆，把牠交到無產階級手中，但光是這一點還是不夠的。工人在經濟領域裡起來反對他們的階級敵人，他們就必須憑他們自己的經驗獲得他們底政治和歷史任務的自覺並必須鍛鍊一支必需的武器——政黨出來，這個政黨是能夠在政治決鬥場上領導他們作獨立行動的。

階級鬥爭的歷史，就其最直接的意義說來，就是被壓迫階級從奴服及依賴於其壓迫者中解放出來的歷史。當市民們不復卑躬屈膝於貴族面前的時候，建立資產階級國家的鬥爭便提上議事日程。一八四八年歐洲的民主運動是流產了因爲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受了工人和庶民大衆的驚嚇，竟把農民賣給封建的反動勢力並容許加文尼克★及其德奧的副手去摧殘剛剛生長的工人階級運動。資產階級背後既站着一個蓬勃生長的無產階級，牠便再也不能解決土地的恐慌或建立一個穩定的民主政權。相反的，牠倒還屈服於俾士麥和拿破侖第三之流，想藉助於革命以外的手段，把難局加以部份和鄙嗇的解決。

無產階級的革命思想從上述的事變中結晶起來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把過去的歷史加以剖析，已替歷史的方向畫出一個輪廓，而且他們也已經以無產階級革命家資格從事鬥爭，現在他們感覺得工人們必須取得組織和政治的完全獨立，成爲一個獨立的社會集團，而人類的未來也就屬於這個集團。他們於一八五〇年寫信給德國共產主義者說，『無產階級政黨要是不受資產階級利用和監督，像一八四八年年情形一樣，那牠』今後就必須『以儘可能統一和獨立底政黨的資格現身於戰場中』。牠必須避免成爲一個『官式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附屬品』且必須致力於『一個獨立底

★加文尼克是法國一八四八年六月屠殺巴黎工人的反動將軍一譯者。

………工人組織的建立………並使每個公社成爲工人聯合會的中心和核心，在裡面討論無產階級的立場和利益不可受資產階級的影響』。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來一個『暫時的結合』以反對任何共同敵人是可能的，不過千萬要站在這樣的基礎上，即，對這些同盟者採取警惕的不信任態度，且毫不妥協的提出工人自己的要求，『以取別於資產階級民主派所提出的要求』。馬克思和恩格斯尚把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視爲農民的城市同盟者，因此逆料一個資產階級民主政制將要建立於德國。但是工人政黨的任務就在於了解革命不能就此停留。

他們寫道，『我們的利益和任務就在不斷的革命，使一切大小資產階級都被逐於統治地位之外，使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使無產者的聯合不僅限於一個國家內，並且還推廣至全世界所有主要的國家……我們的任務不是改變私有財產的關係，而是剷除私有財產，不是調和階級的對抗，而是消滅階級，不是改良現社會，而是創造一個新社會。』（註十）

幾年之後，馬克思又指出不斷革命的重要因素，他於一八五六年寫信給恩格斯道：『德國全部問題將繫於第二次農民戰爭來掩護無產階產革命的後方。如果辦到，事情就好極了。』（註十一）德國並沒有照此實現，但就五十年後俄國所發生的情形而言，上述的話是一種差不多有如數學那樣精確的預言。

一八四八年的教訓及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教訓（巴黎公社把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個粗糙的輪廓貢獻於世界）是俄國馬克思主義思潮（即盡人皆知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之源頭。當比較先進底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減削馬克思主義底國際和革命的內容來適應他們底民族社會主義的，漸進的概念之時，落後的俄國却承受一切革命學說中之最堅強者，恰好像牠曾採納資本主義技術之最大胆的一樣。列寧底天才創造出來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固守着工人階級

在組織上和政策上無條件獨立的思想。牠對俄國未來所抱的全部思想建立在革命的國際性上，建立在更先進底國家的工人們的合作上。俄國工人運動中的另一潮流以孟什維克主義見知於歷史，牠以實行階級合作爲職志，且懷有這樣的思想，認爲俄國革命是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因此，工人必須服從資產階級。列寧的思想與此種思想大相逕庭，他認爲只有農民受工人而非受資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革命纔會實現和進行到底。至於從這個工農聯盟中產生的國家，則列寧尚未決定其性質，他只是用『工農民主專政』抽象公式來表現牠。托洛斯基繼列寧之後，作了一次勇敢的理論推進，並宣布在資產階級革命中，工農合作只有經過以幾千百萬農民爲後盾的無產階級專政纔會而且纔能夠實現。這就是托洛斯基的有名的不斷革命論。牠的基本前提就是：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一定要轉變爲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又只有在世界規模上纔能實現。事變遠出乎大多數人的夢想之外，竟使這兩個怪傑的思想和行動迅速結合起來。（註十二）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暴露自由資產階級以專制政體桌子上的麵包屑沾沾自滿，在往後的反動時期內，無產階級獨立的思想便成了列寧的不斷的論題。他寫道，布爾什維克派『在這個確切不移的規則之下，不用害怕和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共同攜手打擊敵人，〔這個規則就是〕：不要混合組織，分別進兵，共同攻打，不要隱蔽利益的衝突，監視同盟者有如敵人』。（註十三）當一九一七年孟什維克設法將革命引入資產階級的河床中的時候，列寧寫道：『在一切資產階級革命中，一切資產階級政客都給人民以空口允諾並痲醉工人。我們的革命是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因此工人必須擁護資產階級；這就是取消派★陣營中那些不值錢的政客所說的話。我們馬克思主義者說，我們的革命

★取消派是指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那些想使工人運動遷就沙皇法紀的孟什維克——譯者。

是一個資產階級的革命；因此工人們必須叫人民睜開雙眼，看清資產階級政客的欺騙，必須教他們不要相信空話，要依賴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組織，自己的團結，自己的武裝。』（註十四）

這就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基礎。俄國的專制政體是俄國生產力的制動機，而俄國與中國一樣，資本主義的與封建的剝削方式纏結在一起並使大多數農民受其支配。這種情形所包含的意義，在布爾什維克看來並不是各階級聯合反對沙皇，恰恰相反，而是這些階級的互相鬥爭展開，而無產階級也以一個農民的眞正領袖的資格出現。十月革命用算術的內容來充實列寧底工農民主專制的『代數公式』，或者用列寧自己的話來說，『生活把牠從公式的領域取出，放入實際的領域中，給牠以血和肉，使牠具體化，並因而改變了牠。』（註十五）十月革命證明只有無產階級專政纔能使農民戰爭致勝。布爾什維克和俄國工人期望世界各國工人參加他們，他們便把大胆的學說翻譯成驚人的實際。當戰爭打斷沙皇制度底下的最後支柱時，他們便把一個龐大的落後國家轉變爲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國家。

從工人的俄國散放出來的革命刺激披靡一個厭戰的世界，在列強底殖民帝國中找得反響。戰爭已耗竭了帝國主義世界，牠終於在牠的最薄弱一環裡爆發起來，十月革命引起全部建築搖搖欲墜。戰爭已在歐洲引起震動。牠同時又刺激了近東和遠東殖民地和被壓迫民族的叛亂。橫越土耳其，敘利亞，埃及，阿拉伯，阿富汗，印度，印度尼西亞，安南以至中國和朝鮮，這些屬國人民都設法打破戰爭已削弱了的鎖鍊。落後底俄國的經驗對他們全體都具有決定的重要性，因爲牠把基本的理論和戰畧教訓加以具體化，又因爲牠把新的客觀因素加進世界政治中，這一客觀因素就是工人國家的挑戰，牠以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來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力量。在俄國領導無產階級走上政權的人們把希望寄托於世界革命的往前發展，並把他們的國際主義規

定爲『一國無產階級鬥爭的利益隸屬於國際規模底鬥爭的利益，又一國已經戰勝資產階級，則能夠而且準備不惜以最大的民族犧牲來推翻國際資本主義。』（註十六）

他們之得出這個見解並不是由於情感，而是由於這一事實，即，世界社會主義改造之能夠實現，其唯一辦法就是『產生一個統一的世界經濟』以推進和完成資本主義已經建立的世界經濟制度，這個統一的經濟『乃以一個總的計劃爲根據，且受世界各國無產階級監督』。這一點便產生了『迫切的需要，要把無產階級專政加以轉變，把牠從一個民族的基礎（即，存在於一國又不能影響世界政治的）改變成爲一個國際的專政（即，至少是幾個先進國的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專政是能夠給世界政治以決定影響的。）』（註十七）這一轉變有賴於兩大主流的滙合：先進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鬥爭與無數屬國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這些屬國包含全世界面積和人口之一半至四分三）。

當共產國際在列寧和托洛斯基的領導之下成立起來的時候，牠把牠的全部世界革命的戰畧寄托在西方工人和東方被壓迫人民的合作上。後者得到前者的指導和幫助，就一定能夠從他們底各個不同的落後階段中脫穎而出，跳過資本主義的階段，直接參與社會化的改造及世界生產力的管理。這個大胆的思想就是國際主義底根深蒂固的基礎，列寧的名字與這一國際主義不可分離的連結在一起。

在殖民地與其他比較間接隸屬於列強的屬國（半殖地）內，民族解放鬥爭所採取的形式取决於牠們彼此的經濟發展及隨之形成的階級結構。工人的革命政黨不僅必須擁護民族運動（整個看來，這是進步的），而且還必須懂得在屬國裡什麽階級能夠解决國內問題，能夠於解决國內問題時把這個國家推向非資本主義發展方面去，因而能夠最堅决的進行反帝國主義鬥爭。列寧於一九二〇年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上討論到這些問題時，他着重指出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內，資產階級民主運動與民族革命運動的差

別。前者傾向於和帝國主義妥協，俾滿足土著統治階級的上層。後者則設法解決他們的最迫切的國內社會和經濟問題，藉此在反帝鬥爭中統一人民大衆。無產階級革命家必須在這一洪流中設法領導羣衆反對他們土著剝削者，這是使民族解放運動得到成效的唯一手段。（註十八）

列寧在他替第二次大會起草的殖民地提綱裡說（註十九），『在落後國中支持反對地主及一切封建殘餘的農民運動具有特別的重要性。首先我們必須儘可能的努力使農民運動得到一種革命性，把農民及一切被剝削者組織在蘇維埃中……

『支持殖民地與落後國的革命乃共產國際的義務，其唯一目的就在把落後國中未來無產階級黨的各種單位——這些未來無產階級黨不僅掛上共產主義的名義而已——統一起來且教育牠們，使牠們自覺到牠們的特殊任務，亦即使牠們了解在其本國內反對資產階級民主傾向的任務。共產國際必須和殖民地及落後國的革命運動建立暫時的關係，甚至建立聯合，但不是和牠們混合，而是保持無產階級運動的獨立性，即使這一運動尚處於萌芽狀態中。』

列寧預見民族資產階級運動要力圖利用十月革命的權威和聲望，爲了預防受牠們『監督』起見，便插入一個特別的警告：『要堅決反對冒充共產主義的革命家的企圖，他們想用共產主義的外衣來遮掩落後國的解放運動。』

在上述同一大會通過的補充文件裡，這些觀念又具體的表明如下：

『在附屬國中發見有兩種截然不同的運動，這兩種不同的運動天天愈來愈互相背離。一種就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民族運動，這個運動具有一個處於資產階級秩序之下的政治獨立的政綱，另一種就是貧苦和愚昧的工農的羣衆行動，這一行動爲的是從各種剝削中把他們解放出來。前一運動企圖操縱後一運動而且往往獲得某種程度的成效，但共產國際及受影響的黨必須反對這種操縱且幫助殖民地的工

人羣衆去發展其階級自覺。推翻外國資本家是殖民地走向革命的第一步，爲了做到這一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革命份子的通力合作是有用的。但首要和必需的任務就是成立共產黨，這些共產黨將組織工農，領導他們走上革命和建立蘇維埃共和國。因此落後國羣衆之達到共產主義並不是經過資本主義發展，而是依賴先進資本主義國底階級自覺的無產階級的領導。

『殖民地解放運動的實力已不再局限於資產階級民主民族派的狹隘圈子內。在大多數殖民地內已有了組織好的革命政黨，這些黨努力與工人羣衆發生密切關係。（共產國際與殖民地革命運動的關係應經過這些黨或團體的中介來實現，因爲牠們是其本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牠們今天尚不十分大，但牠們反映羣衆的願望，且後者將跟着牠們走向革命。各帝國主義國的共產黨必須與這些殖民地的無產階級黨聯合一氣來工作，且經過牠們，貢獻一切精神和物質援助於一般革命運動……

『殖民地革命在最先幾個階段內不會就是一個共產主義的革命。但假如一開始領導權便落在共產主義先鋒隊的手中，革命的羣衆就不會被引入歧途，將一直通過革命經驗底連續的發展時期……在最先幾個階段，殖民地革命一定要靠這一政綱來進行：這一政綱將包括許多小資產階級的改革條文，如分配土地等。但並不因此就得出結論，認爲革命的領導權將一定要讓之於資產階級民權派。相反的，無產階級政黨必須進行有力的，有系統的宣傳蘇維埃的思想並儘可能早一點組織農民和工人蘇維埃。這些蘇維埃將和先進資本主義國的蘇維埃共和國合作，俾最後推翻全世界的資本主義秩序。』（註二十）

在這幾段話裡，共產國際把半世紀革命思想和經驗的成果總括起來並應用於東方問題，而且最主要最具體的還是總括和應用俄國革命的經驗以及這些經驗，所暴露出來的處於二十世紀情形之下落後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內在的原動

力。

俄國革命的教訓對中國而言，具有特別的力量。這兩個國家的命運首先就由一條隣接的邊境連結起來，這條邊境竟橫貫亞洲幾達六千里之遠。兩國都由諸色種族和民族構成，這些種族和民族均具有特殊的文化和特性，這兩個國家和這兩羣人民並沒有對壘衝突起來，倒還有逐漸橫越土耳其斯坦及蒙古邊境而溶和起來之勢。在兩個國家中，農業人口佔大多數，而無產階級則佔一個渺小的但又是決定的少數。中國像沙俄一樣，牠在大戰結束伊始尙是一個落後國，這個國家結合資本主義之初步基礎與封建底過去的殘餘，這種結合是一種變則，牠只能使大多數農民衰亡和窮困。在俄國，君主政體束縛該國的生產力且把過去的野蠻主義保存下來，在中國則帝國主義採取遠較兇猛的方式來癱瘓該國的經濟生長。經濟的和社會組織的落後使兩國的羣衆不得不淪到奴隸的景况中，而這種奴隸的景况則受最黑暗的迷信，愚昧和數世紀舊傳統底重負來支持。在戰爭所產生的環境中，年青的俄國無產階級已證明只有牠纔能夠解放本國底潛伏的創造力，打開其富源底工業化之路，並從此藉助於別國工人建立世界規模的社會主義經濟。

俄國固然落後，中國却更落後，因爲牠之加入歷史的主流裡遲緩得多，又因爲帝國主義已成了牠的道路上的障碍，而這個障碍遠較羅曼諾夫族的腐敗的專制政體有力得多。俄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淸楚的劃淸階級的分界線，且牠之發生，正當落後的俄國已本其一己的權利成爲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之時，這個革命還是世界歷史因素之一，牠招致一九一一年中國的爆發，推倒最後一個滿淸皇帝的皇位。在俄國，一九〇五年的事變已使俄國工人階級最進步的一部份對其歷史的作用有了自覺，但在中國，在一九一一年，經濟結構的改變與新的階級劃分的發生尙沒有發展到要用政治權力的術語來表現的地步。資產階級受了帝國主義窒塞，未免太脆弱了，牠不能用牠自己底統一和近代的國家

機關來代替滿清。無產階級差不多還沒有出世。因此，政權便落到軍閥手中，這些軍閥們的敵對地盤畧畧隱蔽着帝國主義對抗的交互作用。但一九一一年革命已導入一個過渡時代，這個時代再也不能像過去一樣，招致新朝代的興起，而一定要招致這個國家底經濟和階級結構以及盤踞於其上底國家機關的完全變革。在大戰那幾年，生產力之驚人的生長產生了一個近代的中國無產階級。帝國主義壓力的暫時減弱已給了中國資產階級某些層份以自由生長及夢想不到底利潤的燦爛閃光。但是牠的資本主義擴展的希望却與帝國主義者底競爭及互相競敵的不可踰越的欄柵衝突起來，又與外資投放於生產品，補助原料及工業製品而抽取的巨額貢品衝突起來。而且中國資產階級不解決土地問題便不能使牠的國內市場復蘇，而不顚覆財產關係的全部現存的建築，土地問題也不能解決。

俄國革命貢獻一個新的和激烈的分歧點。世界革命（俄國布爾什維克堅決的認爲牠是保持他們自己底勝利的唯一可能的條件）要合理的改造世界經濟，並按照生息於世界上底人類的要求，合理的分配世界生產品。這就表示要廢除資本主義制度下世界市場的無政府狀態。中國置身於新秩序中，牠就一定取得先進國的有計劃和有系統的幫助，而其一興一革也符合於各國人民經濟及文化水準一般提高的利益。這是唯一的意義，中國只有按照這個意義才會眞正完成牠的民族解放。而做到這一步的辦法就是動員本國的廣大羣衆反對中外的剝削。資產階級，這個帝國主義的奴僕不能夠領導這一鬥爭。年青的無產階級，這個掌握機器的新手立即便碰到一個任務，要領導大多數人民走入未來世界。此外沒有別的階級能做這件事了。

在中國社會中，無產階級的政治作用與其說是取决於牠與人口其他部分比較之數量，還不如說是取决於牠的比重。中國碰到的與從前俄國碰到的一樣，已不再是本國社會主義『成熟』與否的問題，而是整個世界的社會主義改造『

成熟』與否的問題。又成問題的與其說是無產階級與全部人口對比之眞實數目，毋寧說是工人在各個階級互相關係中所佔的經濟和政治地位。但指出這一點仍然是很有興味的：一九〇五年俄國的工廠人口是一百五十萬，而城市和農村工人合計有一千萬。（註二十一）中國在大戰當中及大戰結束伊始，工業的勃興產生一個工廠工人的階級，人數共計有一百五十萬左右。一九二七年，產業工人（包括工廠人口）計有二百七十五萬左右，而手工業工人則在一千一百萬以上。（註二十二）雖然人口的分配和密度以及兩國人口的不相稱的總數不容易忽視，但這些數字仍表現出明顯的類似。俄國和中國工人的鬥爭心和好戰性也相類似。後者在大戰期間才形成一個階級而第一批具有現代意義的工會在一九一八年才出現。但一年之後，中國工人階級已干涉本國的政治生活，舉行罷工聲援愛國學生以反對日本強奪山東及巴黎和會的出賣。六年之後，有一百萬工人參加罷工，這些罷工中有許多是起於直接的政治要求的。再往後兩年，中國工會差不多有三百萬會員，而上海工人也實現了一個勝利的暴動，把政權拿到手中。這種空前生長的緊張性一半是脆弱的根源，但牠仍然是中國工人階級力量積蓄深厚的表現，雖則這個階級尙屬年青。在這個地方，單純的比較必須停止，讓位於歷史延續的標準。俄國工人階級已取得勝利並已統治了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國家，這個事實就是中國工人力量底深厚泉源之一。

假如中國工人因爲是那樣年青的一個階級，所以比較薄弱，那末正因爲現在俄國這個工人國家已在世界規模的階級鬥爭中成了一個巨大的客觀因素，所以中國工人比之先於他們出現的俄國工人遠較強大。十月革命對中國的影響不僅表現在這個革命發放出來的難以捉摸的推進力中，或表現在牠所教的重大歷史教訓中。牠之存在是可以捉摸的。中國工人雖剛剛起來鬥爭，但他們後面有俄國無產階級，俄國無產階級國家，及團結於共產國際隊伍內的所有先進

國工人的最先進的部份，這全部力量就是中國工人的後盾。這一力量成了世界的動力，牠比之其他任何條件都優越，主要就是牠使年青的中國無產階級能夠有資格大胆的要求一個四萬萬人民底國家的領導權。但恰好就在這一點上，一個歷史的矛盾侵入來，而且開始把非常有利的環境轉變爲不利，把中國革命的最大財產轉變爲牠的最沈重的負債。

當中國革命的新興和新鮮力量開始增加運動量時，歐洲的革命浪潮已在低落中。俄國蘇維埃政府受國內外環境所迫，不得不設法休息。牠從沙皇制度承受下來的經濟建設受了戰爭摧殘，且已由於『軍事共產主義』之需要，被耗竭到了極度。無產階級專政迫得要向新經濟政策倒退，以便替筋疲力竭的人民博得一個喘息的機會。環境之迫使這一次戰畧上的退却，主要就是因爲希望先進歐洲工人的援助，沒有實現。第二國際的各國社會民主黨是領導歐洲工人運動的，但正當大戰爆發把牠們的誓約加以試驗時，牠們已立即從口頭的國際主義者墮落而爲實際的民族主義者。牠們已犧牲工人而保衞歐洲的資產階級祖國。在戰爭結束之後的震動中，牠們證明是資產階級秩序的最堅固的支柱。牠們攔住無產階級的高潮，且把政權原封不動的交還資產階級。一個堅决革命領導的缺如阻碍了新興革命的勝利，這一勝利是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所預想的。蘇俄沒有得到歐洲工人國家的立即援助。倒還碰到帝國主義干涉的咄咄迫人的刺刀。牠雖然逐走了牠的敵人，但臨末牠迫得要設法和敵對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牠的邊界成立暫時的休戰。

列寧說過而且反覆說過幾千遍：在落後俄國中的工人國家至少要得到幾個先進國底工人的援助，否則就不能站得穩。當他迫得要率先向新經濟政策退却時，他承認因爲歐洲革命浪潮及俄國羣衆的緊張精神開始減退，敵對階級從國內外加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影響，已有了危險的增長。布爾什維克希望經過共產國際及蘇維埃國家的積極干涉，在世

界舞台上一種新的事變的結合一定很快的使他們能夠改變力量關係，轉而有利於無產階級。共產國際首四次大會供給外國各黨以思想上的武裝，因爲上述這個新的事變的結合有不少依賴於牠們的地方。但要想強使歷史就範已非一個列寧或一個托洛斯基的天才能濟事了。在羣衆脫離政治舞台而陷於孤立和退却的情形當中，尤其是在內戰最後的幾塲大戰打過之後，官僚的反動（牠反映着國內外敵對階級的壓力）把持了新國家的機關。牠遠在歐洲的年青革命組織能夠領導工人重新走向政權的門限之前，已開始鞏固了自己的地位。

官僚層開始結合於新形成的蘇維埃國家的外殼之上，牠拿俄國的民族孤立做牠的出發點。牠開始改變蘇維埃的政策，把世界革命的約言改變爲官僚底狹窄打算的保守的民族利益，而這個官僚又把自己和工人政權等量齊觀。列寧在他臨死的幾年攻擊這種傾向，但牠比他強。他的鬥爭很快結束，政權便落入新官僚層底代表的手中，這個官僚層的化身就是約瑟夫・史大林。反對篡奪者的布爾什維克反對派團結在托洛斯基及布爾什維克黨內無產階級核心的最優秀的份子周圍。他們逆流前進，但他們不能擋住或挽轉牠。新領導尙在口頭上贊助無產階級革命的推展，但實際上却着手以官僚特權的鞏固來代替了牠。歐洲革命的失敗尤其是一九二三年德國革命的失敗，產生了失望的情緒且減損了信心，以致懷疑西方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底能力。從這些根源和這些情緒中，生出了『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這一理論是史大林於一九二四年第一次提出的。他把牠強加在列寧底不可調和國際主義之上，且把牠造成爲後來修正了的『布爾什維克』的主要軸心。

這種民族主義的墮落發生於蘇維埃孤立的腐蝕力之下，牠必然促使蘇維埃的國內外政策脫離無產階級的基礎。在國內，這個政府從事於買好小資產階級，富農和耐普曼。在國外，牠採取的政策，愈來愈使國外無產階級運動的利益

隸屬於新興蘇維埃官僚的外交要求 。 現在問題已不再是『作最大的民族犧牲以推翻國際資本主義，』而是作最大的國際犧牲以保持俄國的國家『社會主義』了。這一發展經過了一個年代以上，且經過了一連串眩人的曲折搖擺才在西方各國的共產黨內開花燦爛。牠的影響不久也在東方各國內感到，蘇維埃官僚渴想在東方各國找尋強大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同盟者，并對工人階級的力量喪失了信心，遂致應用一種政策，這種政策並非出自布爾什維克主義和十月革命，而是直接出自孟什維克主義，而孟什維克主義則主張在資產階級革命中資產階級應起領導作用并準備使工人的利益隸屬於資產階級的利益。把資產階級革命劃分爲幾個嚴格的年代學的『階段』，這種迂腐和機械的思想代替了十月革命的活的經驗，這一經驗已證明這些階段如何混合或結合起來。

史大林及和他一道的許多上層『老布爾什維克』那樣輕易的滑入這一條道路中，絲毫不是偶然的。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寧回抵俄國之前，他們已毫無例外的，通通認爲革命頭一階段出現的資產階級政權，具有不可侵犯性。一九一七年三月史大林已成了擁護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底著名公式的作者，但列寧反對這一公式竟到了這個地步，甚至威脅着要和黨底領導破裂。是年三月，史大林在黨大會內宣稱，『只要臨時政府加强革命的步驟，我們就必須擁護牠，但如果牠是反革命的，擁護臨時政府就不許可了。』（註二十三）數日之後，列寧在他的有歷史意義的四月提綱要，嚴厲的對抗上述這一見解，他的提綱寫着：『不要擁護臨時政府。把牠所有諾言的極端虛僞性加以暴露。……要求這個政府，這個資本家的政府不成爲帝國主義政府，對這種產生幻想的要求我們不是嘉許而是揭破……。』（註二十四）他又向一個布爾什維克黨大會宣稱，『連我們自己布爾什維克派也表示信任政府了。這就是社會主義的死亡。同志們，你們竟相信政府。在這種情形中，我們便分道揚鑣。我

寧願居於少數。』（註二十五）當他要求黨取道走向工人政權並宣佈『民主專政』的舊觀念只適於放入『「布爾什維克」底革命前期的古物保存所』（註二十六）中之時，那些恐怖戰慄的『老布爾什維克』（史大林也驚倒於他們之間）罵他『跳過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階段』。列寧的路線佔了上風，而十月革命也淹過那些『資產階級民主階段』保衛者的頭。當革命浪潮退去，政權落入他們手中之時，原來他們尚死守住他們的『革命前期的古物』哩。十月革命的經驗已經過去了，但幾乎一點痕跡也沒有給他們留下。那些『古物』（可不是代替這些『古物』的活的實際）又重行刷新，且標上布爾什維克主義與十月革命的招牌來撐起新統治層的權威。剛巧在這個時候，革命開始發生於中國，蘇維埃官僚便轉而注意東方，列寧和托洛斯基底富於動力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便讓位於史大林的經驗主義，這種經驗主義又隱伏於布哈林底學院式的公式中。他們底政策的基本動機并不是保衛中國無產階級的利益而是渴望找尋一個強大的民族資產階級同盟者。孟什維克馬丁諾夫及拉夫斯基便出頭來替東方做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詮釋者』。他們的軸心不是無產階級而是資產階級。

中國工人已經自發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他們從城市發放出來的推動力已經開始鼓舞大部份農民行動起來。中國資產階級方面(希望發展，焦急不安)已伸手操縱這一初生的運動，且已像列寧所見的一樣，企圖用共產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權威來掩護牠自己。在另一方面，卑賤的中國苦力却正發揮他們的英雄主義，勇敢，犧牲和忍耐力（這是他們的特出的標記），反抗社會，，這個社會竭力使他們永世成爲一個愚鈍和馴良的動物。爲了塡補他們底政治不成熟的缺陷，他們需要工人國家的幫助。首先他們需要一個革命政黨，這個黨由十月革命的思想武庫來武裝，由共產國際的力量來做後盾，並對其歷史作用充滿自覺。憑這些力量，中國革命便有了一個無比的機會來影響整個被壓迫的東

方和破壞帝國主義權力的基礎，藉此對帝國主義施行致命的一擊并打破蘇維埃國家的孤立狀態。
在短促的幾年中，一個偉大的羣衆運動湧現於中國城市的街道及中國田野的疲弊土地中，且威脅着要把中國社會之一切古老的，腐敗的和枯朽的東西加以破壞。但是挺身站在這些衣衫襤褸的隊伍前頭的人們，却不教他們永遠和那種奪人志氣的屈辱的傳統决裂，倒還把他們束縛在他們底剝削者的政治戰車上，甚至還是在他們起來鬥爭的時候。十月革命與共產國際的力量和權威並不是用來支援當作一個獨立力量的無產階級，而是支援民族資產階級。結果，羣衆正當急劇湧起盛極一時之際被制止了，他們的組織被摧毁了，他們的領袖被砍了頭了。他們公然干犯的那個剝削制度的搖動了的基礎又重新穩定，屹立如故，這就是中國革命的悲劇。

第三章　新 的 覺 醒

第三章　新的覺醒

在世界大戰期間，當中國的經濟變革開始之時，牠迅速地洞開了一切改革的泉源。新觀念，新思想，新希望通過千百孔道輸入這個國家并衝毀過去的死硬的重物，好像巨浪衝毀擱淺的破船一樣。在智識份子中，一九一一年革命失敗所喚起的絕望和氣餒的情緒已消失了，一個豐富的文化復興運動便代之而興，這一種運動迅速地把整個新生代吸引到牠的軌道中。新的領袖，新的力量出來。從一九一一年底革命的智識份子的疏疏落落的隊伍中，湧出了陳獨秀這一角色來，他是安徽官家之子，他開始比之任何前人都來得大胆，清楚和勇敢的提出叛亂的任務來。圍繞於他週圍的人和他一道去改造一整代的生活，往後數年，這些人便在社會衝突的戰場上，加入和率領相敵對的軍隊。

陳獨秀宣告新一代的任務是『反對孔教，舊道德及舊禮教傳統，舊倫理與舊政治……國粹與舊文學。』他决以民主政治及近代科學代替這些東西。

一九一九年，陳氏在他的著名的雜誌，新青年上寫道：『我們……不得不打破「天經地義」「自古如斯」的成見；决計一面拋棄此等舊觀念，一面綜合前代賢哲當代賢哲和我們自己所想的，創造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的新觀念，樹立新時代的精神，適應新社會的環境。我們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

，全社會幸福的。希望那虛僞的，保守的，消極的，束縛的，階級的，因襲的，醜的，惡的，戰爭的，軋轢不安的，懶惰而煩悶的，少數幸福的現象，漸漸減少，至於消滅。』★

陳氏又寫道：

『予……惟屬望於新鮮活潑之青年，有以自覺而奮鬥耳！

『自覺者何？自覺其新鮮活潑之價值與責任，而自視不可卑也。奮鬥者何？奮其智能，力排陳腐朽敗者以去，視之者仇敵，若洪水猛獸，而不可與爲隣，而不爲其菌毒所傳染也。

『嗚呼！吾國之青年，其果能語於此乎？吾見夫青年其年齡，而老年其身體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齡或身體，而老年其腦神經者十之九焉……循斯現象，於人身則必死，於社會則必亡。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濟，是在一二敏於自覺勇於奮鬥之青年，發揮人間固有之智能，决擇人間種種之思想……社會庶幾其有清寧之日也。……』吾輩如欲生存，不得不有青年，吾輩如欲排除腐敗，不得不有青年。社會之希望即在於此。★★

這種鮮明的號召預示了新的覺醒。當牠發表出來的時候，一個學生寫道：『牠宛如晴天霹靂，喚醒我等於迷夢中……快函北京定閱者，數目更多。第一號翻印若干，雖不確知。但余深信推銷數目必在二十萬份以上。』(註一)從這一號召裡生出勇往直前的破除偶像的精神和不顧一切的大勇氣，青年就憑着這點勇氣，着手去替自己創立新生活和新世界。這些偉大運動的智識泉源不久便振奮全國，使幾

★按此段文章乃新青年七卷一號第一篇宣言之摘錄，該號出版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 ， 本書著者誤認爲一九一五年——譯者。

★★按此數段文字乃摘錄自新青年一卷一號(一九一五)之敬告青年一文，但本書著者插入『吾輩如欲生存……』數句並非屬於該文，未知摘譯自何處，譯者遍尋不獲，故只好照原譯文轉譯，並放於括弧之外——譯者。

千百萬人從屈服中站起來。從此又生出新的民族主義，而大戰結果，到處刺激被壓迫人民的不安和騷亂又加速了這一民族主義的生長。

這種情緒立即和日本帝國主義衝突起來，蓋日本帝國主義曾利用大戰幾年的機會迫使中國接受一九一五年的不名譽二十一條，且佔領山東省。威爾遜的卓越辭令，他對全世界人民提供之自決和社會正義的諾言曾喚起中國人的希望，以爲在一般的調整中，中國也會蒙到實惠的。等到巴黎和會開幕，這些幻想給帝國主義的騙子們無恥地打斷了的時候，（註二）新青年怒氣塡胸起來反對腐敗的親日派北洋政府的賣國。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發生了大規模的學生示威。賣國總長的住宅被襲擊和搗毀。這個運動蔓延全國。在這個運動裡新的音調響起來了，工廠工人罷工支持學生的要求。

工業的發達已把一個近代的無產階級帶上舞台。一九一六年末，產業工人已有了一百萬左右，一九二二年他們的數目幾達兩倍。有一支包含將近二十萬中國工人的軍隊送上歐洲西線，他們在那裡畧畧學會讀和寫，尤其重要的就是他們和歐洲工人及較高的歐洲生活水準接觸。他們囘國帶着新思想，曉得人類如何爲改善自己的生活而鬥爭。他們已見過那些捲入衝突中的大國，他們囘國決心要解放他們自己的祖國。在山東事件惹起羣情激憤的期間，他們恰好在離歐囘華的途中，許多都拒絕在日本口岸上陸了。當罷工開始加強五四運動的怒吼時，這些囘國工人已被視爲『中國勞工界的海燕』了。（註三）在中國產業工人這個偉大的個體裡面，這支新從戰爭出來的勞苦大衆軍形成一個強固的，自覺的核心。牠幫助這個幼稚的階級去解決那些成年人的任務，這些任務，這個幼稚階級差不多剛出世時就碰到了的。年青的產業無產階級領導着幾千百萬交通工人，苦力，店員，手工業者和學徒，（註四）牠開始自行團結在自己的組織中。舊式家族店號和行莊讓位於股份公司

，行會破壞了，工會和商會起而代之。中國工人雖然對自己的機器還陌生，但立即便衝入政治鬥爭中。一九一九年，他們在上海及其他城市舉行罷工，迫使政府釋放北京的示威學生及革除政府的犯罪官員。

五四的浪潮捲全國。牠成了第二次中國革命的前驅。舊傳統思想堡壘倒塌的隆隆聲響徹全國，在青年心中喚起不安。他們從城市和農村捲入這一代的動亂中，這一代正站起來支配中國的未來。他們大胆的掙破權威的拷鐐，勇往直前的把舊中國長城的遺蹟打倒。做事和思想底舊方法的惰性雖然尚殘存下來，而且在臨近的革命和改革的苦鬥中，這種惰性尚顯現得巨大和可怕，但城門已倒，已永遠無從再建了。新青年的視線從巴黎和會移向俄國，俄國十月革命給了他們一個榜樣和一個鼓勵，這個革命的現實性具有無比的必然性。歐洲社會思想一切主潮的過遲的支流都和十月革命一道來到中國，這些潮流就是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牠們打開了新的眼界，并在思想，道德和文學方面惹起一個眞實的革命，這個革命迅速地加深了政治改革和社會衝突的河床。社會的一切階級均加入政治决鬥場中。陳舊的政治組織得到新鮮的生命。新的組織也產生出來了。

當這些新鮮的政治潮流於一九一九年開始奔流時，國民黨，這個一九一一年革命派的黨已變得極度闇弱無能。牠的『右派』份子——保守的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已成了軍閥底無告的門下客。孫中山是資產階級智識份子中較急進一派的領袖，他企圖利用小軍閥來反對大軍閥，藉軍事手段來完成他的革命計劃。他已創出一種政治哲學，這一哲學包括在他的三民主義內，三民主義最明顯的特色并不是牠們的水晶樣的透明，在解决中國革命底社會問題時，他們的特色也并不是採取具體和大胆的態度。他的民族主義一點是沒有指出反對中國底帝國主義主人的鬥爭。中國第一任民國大總統孫中山在列強之前確乎表示一種卑躬屈膝的奴

性態度，他答應他們，凡是他們用武力向亡清勒索的酬勞物和特權均予保留，并答應由民國担負償還他們的借欵。（註五）大戰之後，他對中國的希望只是寄托於列強底慈善合作的某種形式中。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他把一個幼稚的計劃呈遞給外國政府，這個計劃的內容就是各帝國主義者『精誠』合作開發中國的經濟富源。他確實在逆睹一首牧歌，在這首牧歌裡，外國的強盜們將捨棄他們的貪慾，參加實行一個天下皆蒙其利的『社會主義計劃』。孫氏寫道：『我希望實行這個計劃的結果，現有的勢力範圍就可廢除，國際與商業戰爭消滅，互相殘殺的資本主義競爭可以排除，最後而重要性不稍減的便是勞資的階級鬥爭可以避免。』（註六）

孫氏的『民族主義』尚包含有轉變被壓迫的中國政府爲中華帝國內部少數民族的一個壓迫者的希望。他逆料滿蒙囘藏將『同化』於漢族統治的大中華。民族自决像反帝鬥爭一樣，牠之進入他的思想還是後來的事。

他的第二個主義——民權主義主要是規定一個『訓政』時期，在這個時期內，開明的領袖將一步一步指導黑暗和貧窮的羣衆朝向自治的光明。孫中山的民權思想與由人民直接取得政治權利和自由的觀念沒有絲毫共通之點。

第三個主義——民生主義所包含的政治思想有兩點，第一是關於中國經濟未來形式的重大問題，第二是關於土地與農民的普遍問題。孫氏提倡『節制資本』及『平均地權』，但後來這兩個公式，孫氏本人及他的信徒均加以諸多改變和解釋。孫氏希望實行『節制資本』（運用的手段則從沒有指出過）便可使中國免除資本主義之害。孫氏主張的『平均地權』乃是一個計劃，其目的在把窒礙中國農村的不均現象加以調整，使『過去有財產者不蒙其害』。（註七）他的計劃是經過地主同意，規定地價，而未來該項地價無論增漲多少均歸於國家。國家將利用購買權，繼續替農民人口中之無土地或土地飢慌的部份造成更有利的情況

。但是孫中山多年來連這種學說也從來不敢太公開的宣傳，因為他害怕失去他底軍事同盟者及他本人底信徒的歡心。孫氏極力排斥階級鬥爭的觀念且反對羣衆參加政治生活。他希望得出一個方法，等到他本人和他的信徒藉純軍事手段取得政權之後就能夠和平的且毫無震動的改變中國社會。這就是他那無窮盡而又總是無結果底軍事冒險和聯盟的目的。（註八）

但一九一九年之後，新的政治潮流與羣衆運動的生長使孫中山的沒落的黨得到生力，而國民黨的活動也復興了。孫氏開始出席學生集會，當陳炯明將軍應允他在廣州開府時，他和省港新近組織的工會也建立關係。

恰恰這個時候，萌芽的無產階級政治組織也已成立了。馬克思主義刊物開始出現於大中學校，替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打開思想和行動的新遠景，此事尚遠在工人階級本身得到這種遠景之前哩。一九一八年與一九一九年形成的各種團體發育成為社會主義團體，又這些團體只不過往前發展一步便於一九二〇年成立中國共產黨。牠的創辦人都是五四運動的重要角色，他們中的主要人物就是陳獨秀，他當時是北京大學教授。（實際這時陳氏已離開北大——譯者）共產黨於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開第一次代表大會，與會代表均來自非常不同的背景。無產階級份子甚少。許多都是受了新覺醒運動激勵的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他們沒有受過什麼訓練和試驗便混合成一片臨時的溶液，但牠很快便受事變的影響，沉澱下來了。階級鬥爭竟出乎他們多數人預想之外，很快便把致死的白光瞄準每一個人。牠的壓力迫使他們走入許多不同的方向中。有不少人或受感情牽引，或受無政府主義的學理蒙蔽，立即離開，走入資產階級陣營中。★創辦人有些是消極了，退出政治舞台了。其他如李大釗等則命定要在臨近的鬥爭中喪失他們的生命。殘存的領袖，如陳獨秀，毛澤東，張國燾等人雖然於一九二一年炎夏，當這混雜的一羣尚通通未受階級

鬥爭衝擊之時，開始獻身於共產主義運動，但他們在晚近中國歷史中却各走不同的道路。共產黨出生於俄國十月的灼熱中，牠在第一次大會裡負起替中國工人階級創立組織武器的任務，這一工作已在北京附近的長辛店開始，該地的鐵路工人已組織了一個工會，且共產黨學生已在那裡開辦夜校。一個勞動書記局已成立於上海。進行是緩慢的，開創的規模是細小的，而問題又多而且難，因爲歷史已把一些成年人的問題交托給一個尙處於嬰孩期的階級。

共產黨的頭一個問題就是牠以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的資格，如何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派國民黨建立關係的問題。共產黨參加民族運動的形式和方法，對事變的全部未來的行程是具有決定作用的。這一參加乃出自民族革命運動之無可辯駁的進步性質。我們已知道，列寧已於第二次共產國際大會指出，在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如何能夠走到與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主潮相溶合。和民族運動合作是合乎心願的和必要的，但要附有一個最重要的條件，那就是無產階級組織的獨立應保持，『即使〔這個組織尙〕處於萌芽的形式中』。

一九二二年在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了國共兩黨聯合的計劃。少共國際的俄國代表達林向孫中山提出這一計劃，孫氏拒絕他。他告訴達林，他可以應允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但不贊成兩黨聯合。不久之後，馬林（共產國際在華第一屆代表，他已在南方和孫氏會晤）在杭州西湖與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會商，提議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利用牠的廣大的弛鬆的組織結構爲手段，在羣衆中發展自己的宣傳和關係。

★戴季陶也是提創人之一，但共產黨一經正式成立，因爲他受了孫中山一頓痛罵，就走開了。他後來成了國民黨的主要資產階級思想家。其餘很快便脫黨的尙有陳公博，邵力子和周佛海，他們後來在屠殺成千成萬的共產黨人和工農的國民黨政府中，通通成了先知先覺者。

馬林這個提議有三個因素做根據。第一個就是他本人在爪哇得來的經驗。大戰之前，爪哇的社會民主黨左派參加薩拉喀特回教會（Saraket islam），這是一個混合的經濟，社會和宗教的運動，目的在反對歐洲殖民者剝削爪哇人，牠的左派已接受印度社會民主聯合會的援助，這個聯合會是馬林幫助組織的。左派在薩拉喀特回教會內部發展工會組織的思想，在大戰期間，一個重大的左翼運動生長起來，也歸功於牠。馬林根據的第二個因素就是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的戰術和策畧的結論，他感覺得這些結論特別可以運用，因爲——這也是第三個因素——在南方，國民黨與方興未艾的工人運動已建立關係，南方的工會在孫中山影響之下已參加民族運動且給了共產黨一個最膏腴的園地來擴大活動。★

據馬林說，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多數贊成這些見解。反對他這一提議的人所持的理由就是：他們認爲拿國民黨當做一種政治力量來看，其重要性殊成問題，且不相信牠能夠發展成爲一個羣衆運動。馬林認爲贊成加入國民黨這一計劃者，陳獨秀亦是其中之一，但陳獨秀曾寫過一九二二年杭州大會的情形，他在這一點上與馬林互有出入。（註九）他說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委員都反對馬林的見解。他給了這一反對派一個根本的政治性質，認爲他們相信加入國民黨『會混合階級的組織與束縛我們的獨立政策』。但認爲共產黨領袖在早年就反對和資產階級合作，是無根據的。恰恰相反，這種合作觀念却完全支配了他們。一九二二年陳獨秀寫道：『和革命的資產階級合作，也是中國無產階級目前必由之路。』(註十)反對加入國民黨不管是出自共產黨領袖之全體或幾個人，牠好像多份還是基於國民黨乃一死物這一信念。馬林說，實際上也這就是張國燾表示的見解，張氏在杭州會談中是反對加入者中之最強硬的

★這項報告乃以一九三五年在阿姆斯塔敦和馬林談話的記錄做根據。

。但結果這一提議却通過了，雖然國民黨領袖是否歡迎尙屬疑問。★

共產黨人個別加入國民黨，他們希望爭取南方工人，使之受共產黨的影響，這些工人是追隨國民黨的。（註十一）他們提議拿一個能夠吸引人民擁護的政綱做基礎，改組國民黨，但孫中山尙冷然置之。直等到一九二二年六月陳炯明在廣州叛變之後，孫氏再度亡命，他才逐漸採納馬林的見解，馬林的見解當時受孫氏急進的心腹至友，廖仲凱擁護。孫氏雖尙不把羣衆運動當作一個政治武器，重視其潛能，但他已開始爲俄國底直接和具體援助的希望所惑。

有幾個因素結合起來，促使孫中山轉而注意聯俄的可能性。他的國際開發中國的幼稚計劃已經在一切帝國主義的政府中碰了釘子或客氣的冷遇。豺狼是不會和羔羊並存的。（註十二）他們只是想經過肉搏來決定誰應吞掉牠。一九二一年至二二年華盛頓會議的目的就是想解決這一問題。這次會商曾經又喚起中國人希望帝國主義的慈悲，但這種希望迅即打消。借用汪精衛的總結來說，華盛頓會議『從日人單獨武力蠶食的政策中解放中國』，只是爲的使牠成爲一切列強『共同緩慢蠶食』的犧牲品。（註十三）牠之

★據陳獨秀說，因爲馬林乞靈於共產國際紀律，才通過加入的。馬林否認這一點，他指出當時有很大機會向共產國際的較高機關控告他，但却沒有這樣的控告。他附帶指出：『而且，我沒有共產國際的特別訓令。我手頭沒有文件。』關於這一點要想更進一步的闡明，無疑要依賴於共產國際的未發表和失效的舊文件。據共產國際東方局的米夫說，『使國民黨和年青的中國共產黨合作』的第一次正式訓令包含於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一特別通訊中。當時共產黨已加入國民黨，不過此事的正式決議直到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大會才通過。（參攷米夫著之『英勇的中國』，第二十一——二頁，一九三七年紐約出版）

召集並非爲着中國民族解放的利益而是爲着美帝國主義的利益。領悟這一事實大有助於消除中國人企望列强慈悲垂愛的固執的幻想。牠又迫使中國民族運動的領袖自覺到這一事實，即，新興的蘇維埃政權如是有效和驚人的擊敗了世界大戰戰勝國底聯合干涉的武力，那末，在中國企圖向帝國主義取得讓步時，這個新興的蘇維埃政權可以成爲一個强有力的槓桿。

遠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蘇維埃府已宣佈牠準備放棄沙俄在中國所保有的一切帝國主義特權。牠在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的更進一步的宣言中又重新提起這一建議，而非正式的蘇維埃代表也在北京努力根據這一點來談判一個新條約。但列强方面用盡一切可能的手段（政治和軍事的）來孤立和破壞布爾什維克政府，他們的切齒的仇恨便阻止了俄國政府的努力，不過俄國建議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與中國訂約，此事在中國造成一個深刻的印象，且在蓬勃生長的中國智識份子集團的眼中，提高了新成立的蘇維埃權力的威望。

蘇維埃代表和中國成立關係的初步努力，是某種傾向的一個顯著的（雖然尚是孤立的）例子，這種傾向就是想使蘇聯底明顯的眼前的國家利益超出於革命目的之上。當赤塔政府及共產國際伊爾庫次克遣派的第一屆非正式蘇維埃代表抵華時，北京政府適在著名親日派安福系手中。孫中山領導的弱小的民族運動並沒有被他們看爲蘇維埃利益的據點。他們迷醉於軍閥吳佩孚的軍事力量，當時吳氏正設法推翻安福系政府。當吳氏於一九二〇年在北京攫取了政權，且成立他自己的傀儡內閣時，蘇維埃政府的機關報——消息報（Izvestia）的一位遠東政論『大家』寫道：『吳佩孚已在中國發生的事變中豎起他的大旗，顯然在這一旗幟之下，中國新內閣一定採取有利於蘇俄的方針。』（註十四）但事實證明吳佩孚是英帝國主義的一個工具，他對布爾什維克的俄國絲毫不講交情。在北京政府背後只是英

國旗代替了太陽旗吧了。這就是一九二一年談判無效的原委。

當馬林於一九二一年春來華，到廣西訪晤孫文，與之建立關係之時，馬林斷定中國民族運動的主流是在孫氏的國民黨方面。一九二二年一月，正當香港海員罷工的時候，馬林訪問廣州，他發見當地國民黨已和年青的中國工人運動的最積極一部份發生了實際關係，他的信念愈堅。馬林違反伊爾庫次克局（這個機關當時是共產國際與遠東發生連繫的唯一機關）的傾向，在杭州提議中國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當孫中山見逐於廣州，於一九二二年八月抵達上海時，馬林再度和他會晤，勸他拋棄藉純軍事手段奪回廣州的任何企圖，而採取一個羣衆宣傳的運動。華盛頓會議已大有助於改變國民黨領袖的心理，現在馬林發覺他的見解大受熱烈的歡迎，蓋孫中山已確切開始考慮蘇維埃的幫助。這就是馬林於次月帶回莫斯科的報告。共產國際根據他的發見，放棄『伊爾庫次克路線』。轉而注意孫中山。馬林贊成和華南民族運動合作的意見發表於共產黨報紙上。（註十五）蘇維埃政府方面也派遣牠的第一流外交家阿陶爾夫・越飛和孫文建立正式的關係。

越飛會晤孫文於上海，他們於一九二三年一月廿六日在當地發表一共同聲明，在這一道聲明中，越飛同意：『在中國沒有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建立成功之條件，』又同意『中國的主要及當前目的是在國家統一與獨立之完成。』越飛向孫文担保，爲了達到這些目的，國民革命運動『可依賴於俄國的援助。』（註十六）這一外交公式正式宣告了蘇俄和孫氏的聯合，孫氏最後恍然大悟，原來俄國人把十月革命的威望送給他和他的黨，這一威望還有武裝，金錢和顧問做後盾。

但差不多同時，這同一公式又被解釋成這樣的意思，即，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完全屈就這一工作：幫助國民黨變成一個有價值的同盟者。當密些爾・鮑羅庭於是年秋就任孫文

的顧問職時，他並不是以一個共產國際代表的資格來和中國共產黨合作，而是代表蘇聯共產黨政治局來充當國民黨顧問官。這種辨別並不是純粹形式的。鮑羅庭的職責就是改組國民黨並以新的生命充實牠。一切努力——主要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努力——現在必須集中到這一目的上。

共產黨的獨立的政治遠景已消失於當時的估計中了。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决議：『因爲中國獨立的工人階級運動尙屬薄弱，因爲中國當前的中心任務是完成反對帝國主義者及其在華底封建代理人的國民革命，又因爲這一國民革命問題的解决直接有利於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本身尙未充分分化成爲一個絕對獨立的力量，所以共產國際執委會認爲年青的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是必要的』。（註十七）無產階級的獨立被拋到遙遙無期的未來，但中國共產黨却仍然『不』和國民黨『混合』，也不『捲起牠的旗幟。』實際上，假如共產黨人必須放棄以一個『絕對獨立的力量』的代表資格來活動的思想而贊成和國民黨合作的『中心任務』，結果就必然喪失他們的獨立了。一九二三年六月共產黨第三次大會拑制黨內反對加入國民黨者之口，提出這一口號：『一切工作歸國民黨！』大會宣言宣佈：『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領袖地位。』（註十八）

共產黨人的路線直接而又不可避免產生這一思想：認爲反帝的民族鬥爭較階級鬥爭重要，或暫時延緩階級鬥爭。認定利益相反的階級能夠統一在一個黨內的思想是建基在這一假設上的，即，帝國主義暫時溶合各個階級的利益，而不是加深牠們之間的矛盾。這一思想假定資產階級在民族革命運動中不僅能夠而且一定要盡革命的作用，而且還要盡領導的作用。這是一種急劇的轉變，背離了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立下的明晰的戰畧路線，因爲這一思想立即替民族運動開闢通路，引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路線中，且完結了共產黨底政治和組織的獨立。後者於一九二三

年從始便承認國民黨的『領袖地位』。共產國際也一樣做法，且發揮一種理論，認爲國民黨並非資產階級政黨，而是各階級在反對國外侵畧者的共同目標之下聯合起來的黨，因此，牠把這種模糊階級路線的思想加以合理化了。這種實際上是第一次確立的概念（即指各階級聯合黨的概念——譯者）不久便混入共產國際的正式文件中，且指導了牠底戰畧的全部未來的方向。

鮑羅庭開始使孫中山相信，國民黨所急需的是一個有紀律的政黨組織，以一個強有力的羣衆運動做後盾。當十一月，陳炯明又威脅廣州，危及孫氏的再起根據地時，鮑羅庭幹出一個具體的例子出來，證明幾椿諾言就能夠喚起工農來保護政府。陳炯明威脅的安然避過證明了鮑羅庭的見解。（註十九）鮑羅庭得到孫氏支持起草（註二十）一個政綱，內容包括三點：聯俄容共，武裝反帝以及充分改良工農生活。鮑羅庭採納孫氏的『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但把牠們加以具體化，只不過規定二五減租和製定勞動法。（註二十一）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了這個政綱，並實行澈底改組。大會開幕之日亦即列寧逝世之日，這是一個歷史的巧遇，這一巧遇並不缺少牠自己的諷刺意味，因爲列寧幫助產生之蘇聯和共產國際正在中國放棄不可和解的無產階級獨立的思想，而這一思想却是列寧的最豐富的遺產。★

國民黨在組織上改變成爲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粗畧複本，而布爾什維克宣傳鼓動方法也輸入來了。爲了糾正依賴於封建思想底軍閥的錯誤（這是已往國民黨的主要弱點之一），俄國人於一九二四年五月創辦黃埔軍校，替新國民革命軍的軍官奠定基礎。這一軍校靠俄國經費來供給和經營。（註二十二）不久蘇聯的軍火便源源運入廣州，供給各軍，這些軍隊於國民黨開始現出力量時就團集於新旗之下，而國民黨的力量又是共產國際及共產黨的活動賜予的。

因爲他們要在國民黨（牠現在開始飛快發展）內工作，共產黨人便拿資產階級國民革命的口號和要求來限制自己，而這些口號和要求自然又受中國資產階級的利益的限制。共產黨的幹部先是主要從學生中募集，後來從熟練工人隊伍中來的逐漸多起來，但他們受的教育乃是純資產階級國民革命的，而並非無產階級革命的教育。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宣傳只限於完成資產階級所能接受的反軍閥和反帝目的。這一事實把共產黨改變爲國民黨的左翼附庸。

共產黨人與純粹國民黨員並非由馬克思主義與孫文的糢糊的民粹主義之間的深刻思想鴻溝來區別，也不是由任何政綱上的不同來區別，因爲整個運動只是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進行的。★★他們與國民黨上層的不同就在這個地方：只是共產黨人才使黨和革命運動充滿英雄主義，自我犧牲和共產主義的進取心，因爲他們相信他們在服務於工農運動而他們對這一運動之忠誠便生出了上述的進取心。共產黨人沒有一分鐘朝着他們自己的任何政治遠景前進，又任何時候也不是在他們自己的名義和旗幟之下現身於羣衆面前，他們孜孜不倦的把組織和羣衆力量的鋼鐵

★已故之阿梭爾・蘭森（Arthur Ransome）對共產國際之援助中國做了一個銳敏的總結，他於一九二七年二月寫道：俄國敎國民黨『如何把孫中山的提高工人生活水準的虔誠的政綱改變爲進攻與防守的強固的武器。鮑羅庭敎孫中山依賴黨而不依賴自己之後，他可以說已敎孫博士依賴階級而不依賴個別份子。鮑羅庭可以指出工人如何……替俄國資產階級造成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他可以指出法國的土地革命如何……替法國資產階級摧毀封建地主……這些都是危險的武器，但是沒有其他武器能夠造成（這些危險武器所）獲到的結果。爲了使這些武器積極活動起來，分明合用的代理人就是中國共產黨人，這些人，假如當到中國革命覺得必要挫折他們的時候，就要受沉重的打擊的。』——『中國之謎』一九二七年倫敦出版。

注入國民黨的鑄模中。但在起始的幾個階段中，這一事實的基本意義却部份地爲羣衆運動的驚人生長所掩蓋了。因爲羣衆運動之產生既不是由於共產黨人的策畧，也不是由於國民黨的要求。牠的勃發的條件埋伏在中國社會組織之現存結構中，有如礦苗之嵌在石頭中一樣。

在廣州，上海，漢口，天津及其他城市的中外工廠中，工廠工人生活和勤勞的狀況，只有產業革命最早幾個階段底英國工人的奴隸境況才堪與比擬。男工，女工和童工（像他們現在一樣）每日工作十二，十四以至十六小時，而工資則低至每日八分錢，連他們底安全的最起碼的保障，或最微末的衞生設備也沒有。一種最有害的學徒制以無窮的童工勞動供給於小生產者和店老板，這些童工每日工作竟達十八和二十小時，而報酬則只不過一碗飯和一塊睡眠的床板。

從這樣的勞動境況中，僱主，尤其是有優越技術的外人便能夠抽取最高限度的剩餘價值，而且還可以抽取得更多，因爲一個工人的生命是不値錢，沒有人曉得中國的死亡率。（註二十三）中國工人（他們的隊伍已隨工業的生長而膨脹了）很快就揭竿而起反對這種境況。

有組織的工人運動於大戰結束伊始便開始形成。甚至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之前，罷工就已開始發生。一九二〇年廣州機器工會舉行頭一次大規模的罷工，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員罷工勝利，使英帝國主義者受了重大打擊，他們的工

★★一九二四年孫氏企圖使他的學說和共產主義調和，把後者和他的『民生』主義等量齊觀。這種湊合的混亂思想把他自己的許多信徒弄糊塗起來且弄得不易解釋。但他仍舊遵守私有財產不可侵犯這一根本的資產階級原則。關於孫中山思想的發展，如想得到一個很好的引經據典的研究，請參閱關守貞（譯音）氏『廣州與莫斯科聯合對孫中山政治哲學之影響』一文，原文載於一九三四年四月，七月，十月號之中國社會政治學報。（北京出版）

會取得承認了，工資也大大增加，這次罷工震動了全國。（註二十四）這些罷工奠定了工人迅速擁入工會的基礎。一九二二年五月，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在海員的勝利的領導之下，開於廣州。

這次大會集合二十三萬有組織工人的代表。在這種新興和強大的力量壓迫之下，孫中山的廣東政府修改了懲治合法工會組織的法令，而更大發展之路遂掃清。（註二十五）在華中，華北，爭取增加工資，爭取組織和集體談判的權利也開始了。這些鬥爭中之最重要的就是京漢路工人的罷工，這次罷工結果遂造成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河南鄭州的大屠殺。華北軍閥吳佩孚命令他的士兵搗毀一個工人組織的大會。六十個工人被殺。這一次鎮壓只不過暫時使鐵路工人無法造成全國的組織吧了。差不多『二七』一週年之後，鐵路工人全國代表大會舉行了，並產生了一個全國執行委員會進行爲『改善我們的生活狀況，尊重我們的命運，教育我們及我們的子女』而鬥爭，并爭取『組織個別工會的權利，俾煅煉全體鐵路工人的團結。』（註二十六）上海於一九二三年初已經有四萬工人組織在二十四個工會中。戰線迅速擴大。一九一八年統計有二十五次罷工，包含工人不足一萬。一九二二年全國各地有九十一次罷工，包含十五萬工人左右。（註二十七）工人運動以驚人的迅速和戰鬥力生長起來。一九二四年五一節有十萬工人遊行上海的街道，在廣州則數目倍之。當時的報導敘述武昌，漢陽和漢口雖受嚴峻的戒嚴令拑制，紅旗尙飄揚於工人區。五一節的傳統口號：八小時工作制，使工人震動起來，因爲他們才剛剛開始夢想每日工作十四小時來代替十六小時，十二小時代替十四小時，十小時代替十二小時哩。

那一天傳單上寫着：『八小時工作，八小時教育，八小時休息這一個政綱何等合理呀！工人階級爲實現牠而流血已四十年。無產者充當資本家砲灰的時期已過去了。他們只有革命之一途了。到時他們就要實現牠！』（註二十八）

『工友們，記着今天，你們和資本家一樣是人。你們要求受人的待遇。組織起來！人數產生力量！同志們將向你們伸手！』他們遊行各街道，唱着新歌：『工作將是快樂，將是我們獻身於同胞之愛。我們將被自由之鐘喚去工作。携手合唱——「工人萬歲」！』（註二十九）

顯然恰好於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之時，中國的無產者已站起來，組織在一個大運動中，這一運動的明顯的特性就是鬥爭性和勇敢。牠同時也充滿了懷疑資產階級『同盟者』的健全精神，這種精神很快便被國共聯合的要求窒息了。一九二四年五一節孫中山向廣州工人說：『中國工人與外國工人的不同就在這個地方：外國工人只受其本國資本家壓迫，而不受其他國家的資本家壓迫……中國工人還沒有受中國資本家壓迫……他們是受外國資本家壓迫。』（註三十）下一個月，太平洋交通工人第一次大會開催於廣州，一個國民黨演講者在會上講出同樣的話。共產國際駐華代表衛金斯基（他在迫使工人運動屈受資產階級領導的工作，曾盡過很大作用）叙述這次大會道：『中國鐵路工人代表不遠千里而來，非法參加大會，他們腦中對京漢路罷工流血事件及是年五月之鎗殺工人，尙保留活生生的記憶，他們與爪哇同志結成大會的左翼。他們以冷淡的，懷疑的態度接受國民黨負責代表的宣言，因爲國民黨代表號召工人和農民及智識份子成立聯合戰線，但並不是處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爪哇同志於去年五月也經過了一次巨大的和嚴重的鐵路罷工，而且他們還從薩拉喀特囘教會那個泛囘教組織中，分裂了一個頗大的左翼出來，他們現在雖參加號召一個反軍閥的聯合戰線，但（主張這個聯合戰線）要在革命的組織（在這個組織內要有充分的共產主義影響）領導之下。』（註三十一）衛金斯基和他們的朋友不久就教中國工人應當聽從國民黨的負責代表。

農民也開始鍛鍊他們自己的組織武器。近代中國農民運動是彭湃在廣東東江的海豐縣一手培養出來的。彭湃是中國

革命中最動人，最英勇的脚色之一。他是海豐一個有錢的地主的兒子，曾在其本村當小學教員。他是第一批共產黨員中之一個，他不久就設法於農民中傳播他的思想。彭氏於一九二一年因帶他的學生舉行一次五一示威，受學校辭退，他便走入農村喚起農民的組織要求。關於他早期的挫折，他的第一次成功以及海豐農會的初期鬥爭，關於這些事的源本，他已親自保存在一批寶貴的個人扎記和回憶錄中。（註三十二）農民一開始以不信任和仇視的態度接待彭湃——他不是一個地主的兒子麽？——但彭氏終於影響幾個農民的子弟。他一面演魔術和唱留聲機，一面演講如何從地主的壓迫中爭得自由，因此，彭氏和一小羣年青同志終於取得農民的信任。之後，第一個農民協會成立起來，迅速發展，且差不多立即就在陳烱明軍隊的進攻之下，受第一次炮火的洗禮。

海豐農會開始成立之後，這個組織迅速擴大到隣縣，而全省農民協會的規模也於一九二三年上半年成立了。這個新組織的一個宣言說，『認爲地主的土地是買來的，這不是眞情。現在地主的父親和祖父是用武力從農民奪來的。即使假定土地是買來的，付錢也不過一次，但地主每年從土地收租已有幾千百年了……地主不勞而獲得大部份收獲物。我們和我們農民的先祖在這塊土地上耗去多少金錢和血汗呵！』（註三十三）這些都是簡單的辭句，牠們描寫一種境遇，人們告訴農民這種境遇是千古不變的，是天命注定的。當農會工作者指出牠可以由農民自己的力量來改變——而且進行用事實證明牠能夠被改變——之時，世界彷彿已改變了面目了。上天彷彿對農民和地主一同露出喜色了。這些觀念迅速滲透農村，猶如雨水之滲透大地一樣。牠們很快就開花結實。農民反對地主，反對一切縣官和軍警勢力的鬥爭如雨後春筍的蔓延於東江各縣，而且掀起了該省西北的同樣衝突。減租的要求差不多馬上就轉變爲全部廢除地租的要求。甚至一九二三年，在揭陽縣，『有些農民協會

會員已有勇氣拒納地租於地主，地主不得不乞靈於軍警來徵收。』(註三十四)嚴重的小衝突到處發生。農民運動揭幕了。在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之時，牠已欣欣向榮了。共產黨人把國民黨政綱傳播於工廠和農村，在工人和農民看來，這個政綱似乎供給一個明白的機會去藉助於戰鬥組織，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當然，他們把國民黨的人視爲自己的敵人，而且在國民黨夠得上成爲統治權力之前，不僅在廣東省，就是在廣州市本身尙有許多敵人要加以攻擊和壓服的。一九二四年夏，廣州的國民黨政府受商團攻擊，這些商團均由英國及省港的富有買辦接濟武裝和金錢。經手組織商團的就是陳廉伯，他是遠東英國重要金融機關——滙豐銀行的大買辦。八月十日，孫中山將運交陳氏的一載軍火籍沒，經過一番躊躇和延擱之後，便决意把這些危及他的統治的武裝隊伍加以鎭壓。

八月二十六日，英國總領事下一通最後的哀的美頓書，威嚇：如攻擊商團，則英國海軍立加干涉。孫文向英國工黨首相藍賽·麥克唐納提出抗議，但麥克唐納的沈默却證明工黨允諾的改良，並沒有包含英帝國主義政策的更改在內。孫氏又通電國聯，但這個世界和平的機關却沒有看出這件事和牠有什麽關涉，牠也保持沈默了。最後，到了十月，黃埔學生，工人武裝隊伍和農民自衞軍合成一支武裝力量襲擊商團，經過了一塲短促而劇烈的戰鬥之後把他們打敗和繳械。英國的軍艦並沒有履行他們的恫嚇。(註三十五)四個月之後，即一九二五年二月，廣州又受陳烱明威脅，陳烱明是孫中山從前的軍閥同盟者，他在軍事上尙控制了該省的大部份土地。國民黨軍隊打入他的東江老巢裡去。海陸豐，惠陽和五華農民活動使陳烱明束手無策，他們襲擊他的後方，截斷他的交通線，截獲他的軍需品，使他無法防禦。東莞，常平及隣縣的農民與國民黨軍隊站在一起作戰，且做嚮導，間諜及交通隊的活動。陳烱明一點也沒有辦法抵抗這種進攻，這似乎是在他的地盤內四面八方

起來反對他的。他迫得潰退並放棄進攻廣州的計劃。（註三十六）

一九二五年五一節，廣州舉行了一次表示工農運動非常發達令人難忘的示威，同時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及農民協會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也召集起來了。勞動大會聚集二百三十個工人代表，他們代表中國一切重要城市五十七萬有組織的工人。（註三十七）農民協會雖尚限於廣東二十二縣，但已有了一一七個代表，代表十八萬農會會員了。（註三十八）工農代表與成千成萬的廣州工人和農民（他們從近郊擁入城來）成羣結隊遊行於城裡佈滿旗幟的街道，成了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工農團結的大示威。這些手粗面黑的羣衆魚貫而入廣州各大中學校的會場中，這些學校是供他們十天集會之用的。學生和政治工作人員登塲演講。他們第一次聽到新式機器農具，運用牠們便可以減輕他們的工作。他們遊覽教室和圖書館。他們享受世界的第一次眩人的一瞥，數世紀的勞動和滴汗已無情的把他們和這個世界割離了。

數星期之後，廣州街道又響着步鎗和機關鎗聲了。廣州當時尚處在滇軍將領，楊希閔和劉震寰的軍事支配之下，他們像別人一樣，希望和國民黨合作，取得一點利益。但他們與羣衆運動之間的鴻溝太大了，他們無法跨過。黃埔學生和武裝工人又站在一起作戰。結果是可以先行決定的。滇軍挫敗和潰敗，這兩位將領也被驅逐出境。西江各縣農民截斷殘敵的退路，經過軍田一次短促劇烈的戰爭之後消滅了他們，完成這件未竟的工作。（註三十九）這時一聲新的雷鳴又隆隆然從上海發出來了。羣衆運動高潮才剛剛來到哩。

上海工人已經奮起反對奴隸勞動的境況，這種境況流行於各廠，尤其流行於紗廠。在一九二五年頭幾個月，尤其是在日本廠裡，已連續發生兇猛的罷工，要求增加工資和反對工頭的暴虐。青島罷工工人的鎗殺，再加上上海一個日

本工頭殺死一個中國工人，使羣衆的憤激騰沸起來。當學生和工人聯合示威抗議時，這種憤激之情沿着上海馬路上的羣衆行列，震盪起來。有幾個人被捕，示威者便列隊到巡捕房要求釋放他們的同志。一位驚惶的英國長官喝令開鎗。學生們躺下來。他們中有十二個死掉。這是五月三十日下午的事。

這次影響是飛快的，騷亂的，閃電式的。上海，這個建築有外國銀行和工廠的偉大的帝國主義根據地，現在被一個總同盟罷工弄得癱軟了，這次總罷工甚至連外國人家裡的中國僕人也捲去了。宛如一個巨人驚醒一樣，這個外表上是遲鈍的中國勞苦大衆怒吼一聲站起來，這一聲使中外僱主胆戰心驚，並傳過大洋震撼帝國主義官邸的大門。傲慢的外國人幾十年來便已習於視中國的勞苦大衆爲無數骯髒而又馴良和必需的牛馬，但等到這些無法認識的大衆起來，向他們的面前揮拳示憤的時候，他們的臉色立即蒼白起來了。這次罷工這樣普遍，以致『外人除了服務於當地保衛隊之外，很難做任何事情。』（註四十）

這種爆發是全國性的。據一位勞工調查者收集的不完全的統計，五卅鎗殺案直接掀起的罷工，南自省港，北至北京，總計有一百三十五起，包含四十萬工人左右。（註四十一）上海的五卅屠殺之後，不久又跟着發生漢口和廣州的鎗殺。六月十一日漢口的英國海軍陸戰隊向工人示威隊伍開鎗，殺死八人，鎗傷十二人。（註四十二）在廣州，英國輪船的中國水手於六月十八日罷工。三日之後，實際上香港和沙面（廣州之外人租界）外國工廠中的全體中國工人均參加罷工了。六月二十三日，學生，工人和軍校學生遊行示威於廣州各馬路上。當他們經過沙基路橋的時候，對岸租界的英法機關鎗手向遊行羣衆開火，工人和學生遇難者五十二人，受傷者一百一十七人。★

抵制英國貨和總罷工立即宣佈了。香港，這個不列顛帝國主義在華的堡壘完全無能爲力了。沒有一個機輪轉動。沒

有一件貨物搬動。沒有一隻輪船起錨。十萬餘香港工人採取空前的撤離香港的行動，成羣結隊的回到廣州。這次罷工使所有外人的工商業活動瀕於絕境，牠從香港和沙面的一切工商業中捲去二十五萬人。（註四十三）在廣州，工人們肅淸賭館和烟窟，把牠們改變爲罷工工人的寄宿舍和食堂。從罷工工人中召募二千糾察隊，合成一支大軍，在香港和沙面週圍豎立一道不可踰越的欄栅。這次運動組織得非常之好。每五十個罷工推舉一個代表參加罷工工人代表大會，再由大會推舉十三人成立執行委員會。和這個工人階級組織（中國第一個萌芽的蘇維埃）的主持之下，一間醫院和十七間學校已成立起來，供男女工及其子女之用。由一些特別委員會管理基金和捐欵，管理沒收仇貨和拍賣及審計事宜。一個罷工工人的法庭也成立起來。這個法庭是審判破壞抵貨及其他擾亂治安者的。（註四十四）

警察和司法職權均授與罷工工人糾察隊，他們以特有無產階級的快當和機警來完成這些義務。糾察的圍牆像鼓一樣圍得水洩不通，一位外國旁觀者寫道：『廣州的抵制英貨運動由一個罷工委員會主持，這個委員會則憑藉糾察隊來活動，糾察隊之工作就在嚴防破壞……在廣東凡是有運貨公路的地方，糾察隊便出現，準備檢查貨物，打開包裹，搜查行人……外人和華人同樣要受檢查……罷工工人的規則是不讓貨物，甚至不讓食品出入沙面……假如有破壞抵貨情形，犯者便被送至罷工工人法庭受罰……這次抵貨是充份的……〔我們〕不能不把〔牠〕視爲攻擊香港和大不列顛的戰爭，而糾察隊則爲此次戰爭中之軍隊。除此之外便沒有其他可能的說法來說明這次抵貨實行時的充分和無情。』（註四十五）工人守護廣東沿岸交通線的任務與農民協會協力實

★外人聲辯他們首受鎗擊。他們却難於證實此說，當射擊開始時過橋的一部分示威者，完全是徒手遊行的學生和工人。而且事實俱在，在這一事件中只有兩個外人被殺。而中國人由掃射過橋的機關鎗彈殺害的却有五十二人。

現。農民糾察隊巡邏汕頭，海豐，平山及其他海口一帶的岸線，使這次封鎖得以完成。（註四十六）
沙面(裡面住着一小羣懷恨，激怒，渴想復仇的孤立外僑)和廣州外僑其他地方完全脫離關係。糾察隊嚴峻的監視通到租界去的一切入口。只有不定期的船隻偶然從香港駛來，給牠一些生活必需品，這些船隻大都是英國軍艦，上面全是外國志願水手。其他城市的英國僑民也遭遇同樣的命運。『一定要從香港運更多食糧來——此地沒有鮮奶了。俱樂部闃無一人，用人都走了。』汕頭一位英僑向字林西報淒然報告如此。（註四十七）
罷工工人欣然鑒賞高傲的外人親自弄飯洗衫的奇觀。在罷工的狀態之下。垃圾顯然不能照常清除，故罷工工人把香港改稱爲臭港，又因爲罷工和抵貨窒死了這塊富庶的英國殖民地，他們便開始稱牠爲死港。（註四十八）
香港總督大聲疾呼說：『無秩序和無政府之徒已進攻代表現存文明標準的我們了。』（註四十九）『無秩序與無政府』每天耗去這些文明前驅者二十五萬磅或兩百萬元華幣左右。(註五十)一位英國商會的辦事人報告說：『從一九二四年八月至十二月止，英國輪船駛入廣州的數目……每月總在二百四十隻與一百六十隻之間。但在一九二五年同期，數目則在二十七與二之間。』（註五十一）人們從香港的搖搖欲倒的屋頂上大聲要求武裝干涉，保護『文明』。『香港的有信譽的中英居民深信英政府之干涉與就地行動是急不容緩的事……』否則『如沒有英國助力，期待廣州反赤勢力就無望了。』他們又力主採取迅速的軍事行動，這種行動能夠『很容易在廣州把可取的和友誼的中國當局捧上台。』（註五十二）
但白屋比之香港及其他海港的過於熱心和歇斯得里的紳士們觀察得更聰明，牠認爲毋須直接運用英國的武力就能夠把『可取和友誼的華人』攏絡得很好了。在廣東省恐怕沒有一個軍閥或一個土匪在這個時期不受過英國洋錢的賄賂，

而以襲擊糾察隊或組織軍隊反對廣州政府來酬答的。

但是，罷工和抵貨仍舊沒有打破。國民黨靠着羣衆的力量，便能夠鞏固牠的政權，且於六月末成立國民政府。九月，國民黨軍隊得到戰線雙方農民的支持，終於肅清東江各縣的陳烱明勢力，雖然陳氏當時有香港大量財政和軍需的接濟。（註五十三）在一九二五年最後的幾個月間，粵南的最後的敵對軍閥份子也肅清了，國民黨在廣州便成了無上權力。

如此看來，不到兩年功夫，一個勢力雄大的羣衆運動已把國民黨從政治底闇弱無能的深淵，提高到有權力和威信的地位上，這個地位使牠能夠排除一切足以障碍牠稱霸的勢力。牠統一了廣東之後，便馬上北窺華北華中敵人的龐大陣營，這些敵人以無法掩飾的驚惶來注意牠的力量生長。國民黨已獲得的一切力量，只是工農羣衆運動之賜吧了，而羣衆運動之能夠發展牠力量和團結力又只是憑藉於中國共產黨人的進取心和創意吧了。一枝有力的武器已鍛鍊出來了。現在提到議事日程上的問題就是如何使用牠又由誰來使用牠。羣衆運動已鼓舞中國社會的一切階層起來行動。這些階級迅速結成新的陣列。階級鬥爭的鐵的現實迫使牠們走入公開的戰場中。

第四章　廣州：政權誰屬？



第四章　廣州：政權誰屬？

孫中山總喜歡說中國沒有貧富之分——只有大貧和小貧。假如他再活得長久一點(他歿於一九二五年三月)，他一定親眼看見：等到『大貧』想變『小貧』的慾望與『小貧』想變富翁的野心相衝突時，究竟發生什麼事情。他一定親眼看見：邏輯像時間一樣的無情，推使國民黨內結合的所謂『反帝聯合戰線』自行分解爲不可調和的對立營壘，那些離靠的大貧羣衆反對那一握之衆的安樂享福的『小貧』。他一定親眼看見一件社會事實的重大明證，這件社會事實，他沒有認識到就死了——那就是階級鬥爭。因爲當羣衆運動一直上升到較高的水準，當到牠的程度和緊張性增長了，那末，牠所喚起的一切階級的衝突都推到前面來了。人們不能期望工人長遠在中外僱主之間做一種形式的區別。人們也不能期望農民老是以一些可憐的允諾爲滿足，或期望他們不爲自己的利益而有所行動。工人們很快就踏過這些界限，而所有財產的勢力，勞動僱主與土地所有主也迅速向工人反攻。

自然，中國資產階級寧願在贓物分沾的基礎上與外人妥協，也不願意選擇那蓬勃生長的羣衆運動似乎已經指示出來的道路。這一點是符合於整個統治階級的利益的。但這一點並不是說，統治階級的反應是一致的。由於羣衆的干涉，整個社會進程加速得太大了。正常的社會均衡搖動得太厲害了。各階級的政治結晶與鬥爭的發展同時發生。中國

資產階級本身就在變化中，而在這個階級內部，這件事也不是平衡的和一致的。歸根結蒂說來，中國統治階級各部份利益的根本共同就要把他們趕入一條共同的戰線，抵禦被剝削者的威脅，因爲從他們的觀點看來，國民革命的基本目的是建立一個新的資產階級政權，這個政權較之軍閥制度更强固，更穩定，更易於操縱，而且更能夠從把持實權的帝國主義者方面取得較好的條件。但是，由於眼前利益的不同，又由於資產階級內部別立保守和急進的階梯，一九二五年對羣衆運動的反攻便沿着不同的，有時還是衝突的道路展開。

買辦，亦即外資的經紀人，代表資產階級的一個强有力的部份，他們的利益與帝國主義者的利益纏結在一起，這種利益和他們底競敵的民族主義目的直接發生衝突，因爲他們底競敵夢想在工商業方面和帝國主義者競爭。人口中這一部份(即指買辦資產階級——譯者)從始就反對新興的民族運動，他們爲了這個目的不惜利用舊軍閥，並充當帝國主義者的工具，扶助軍閥保持現狀。在某些場合中，比如一九二四年在廣州，他們竟組織他們自己的作戰隊伍，直接攻擊孫中山的政府。但一般的說來，依賴農村地主與城市買辦的舊軍閥等級是這一反抗的主要工具。

這一部份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是舊國民黨中最年老，最腐敗保守，因此又是最短視眼的右派份子，他們久已成了軍閥的屬吏和附庸了。他們從始就排斥孫文的新三角政策，即，聯俄，容共和動員羣衆。當一九二四年第一次黨大會通過這一方針時，他們拒絕牠，並立即組織一個反對派，這個反對派公開宣布的目的就是救護國民黨，因爲他們相信國民黨有滅亡之虞。他們覺得：與外國列强謀妥協之路正無可挽回的被塞斷了。

他們有一道宣言說，『自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以來，……其所宣傳打倒英美日法等帝國主義者，其作用係在破壞國民黨之國際好感……其計劃係在消滅國民黨。』(註一)各種

『護黨』的組織成立起來。牠們的黨員均成爲華北及滿洲底反動軍閥的心腹。他們奔走於京津滬港之間，組織，宣傳，玩弄陰謀及謀叛。孫中山逝世之後，他們不久就提出口號，主張從不肖門徒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中救護孫文主義的純潔，而他們組織的重要團體之一便掛上『孫文主義學會』的招牌。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他們召集會議於北京城外之西山，他們後來爲世所知的西山會議派一名就是從這次會議得來的。他們自詡爲與帝國主義列強妥協底政策的守護者。實際上，他們却在完成這一目的：替這一妥協掃除道路以待良機。

在外人方面呢，他們受了羣衆運動的壓迫已立脚不穩了。不久就有種種徵兆表示他們自願在妥協的基礎上和中國資產階級合作。一開始，他們似乎相信，鴉片戰爭與拳亂時代的海盜方法已足夠應付了。但他們中較爲有識見的不久就察覺（可是仍帶着不少驚訝），時代已變了。英國威嚇要用武力支持廣州商團，但並沒有防止這一反動勢力於數月之後冰消瓦解。第二年，在上海，青島，漢口和廣州，帝國主義的炮火聲並沒有嚇怕中國人，只不過暴露文明的眞相而已，而叛亂的種子似乎就賴此種文明而繁盛起來。外國子彈播種於中土，產生幾千百萬革命的新兵。列強一面不放棄他們的大砲政策，一面找尋補充的出路，積極支持每一種可以利用的反國民革命勢力。我們已經知道，一九二五年東江戰役期間，香港公開用軍火和現欵供給陳炯明。可惜的，就是陳將軍並沒有酬報給他們。當北方馮玉祥的擁護國民革命的國民軍於一九二五年末進攻滿洲軍閥——張作霖時，日本的鎗砲和金錢支持張作霖的防禦戰爭。當張作霖一個部下，郭松齡倒戈幾乎要使張氏的地位失墮之時，日本軍隊便出來堵住缺口，反張的進攻便被摧毀，而華北國民革命潮流的更進一步生長便受阻若干時。

中外僱主團結起來的呼籲開始聽到了。頭號帝國主義者，字林西報在上海大罷工最高漲時，向上海的有產者說，『我

等與諸君多年友誼的交際，深知諸君並不寄同情於暴徒及罷工工人。』牠叫他們證明他們與『無政府及破壞底不事生產的工人並沒有交誼……此種威脅諸君和平，威脅諸君福利及安全之事將延續多少時日，主要視諸君〔之態度〕而定……』（註三）外國人趕忙表示，他們願意討論妥協的步驟，這些妥協步驟具有這一具體的性質：支持北洋傀儡政府，反對國民革命威脅。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原要解決中國關稅權及治外法權等問題，但此項決議遲遲未執行，現在又趕快舊事重提起了。一九二五年十月，一個特別關稅會議開幕於北京，結果應允於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交還關稅自主權於中國。是年末，又成立一個治外法權的國際委員會，以促進立法和司法的改良，據華盛頓會議決議案的原文說，是項改良『將保證若干列強，使他們可以逐漸或藉其他方法，取消他們各自的領事裁判權。』遠在一九二六年，英國已派一個特別委員會來決定英國庚子賠款的分配。列強拿這幾件事，喚起中國資產階級的希望。但這些事情却引起一個愈來愈大的反響。方興未艾的罷工浪潮並不自限於外國企業中。甚至有一類中國『自由主義者』雖一心想承認工人運動已『產生了遍全國的社會自覺，而這一自覺則是建立一個新興和強大的共和國所必需的』，但他們也忐忑不安地注意這個運動的『愚蠢的過火，因爲中國工業中的罷工也急促增長了。』（註四）人們小心翼翼的承認工人運動的效用了。因爲牠不是已經從帝國主義取得讓步妥協的諾言麼？但人們却愈來愈感覺到了『利用工人是一回事……但讓他們咬去更多，以致不能受用又是一回事。』安享『強大有組織底勞工之利』固然是一件美事，『但美事往往害處亦甚大。』（註五）

當工人向外國資本家的堡壘施行沈重的打擊之時，人們就鼓舞歡欣。當工人（孫中山却不同）無法合人心願的分清中外僱主時，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工人們這樣可悲的缺乏識別力，使中國廠主發覺他和他的外國競爭者同在一隻船

內。工人階級運動愈是進展，這一點弄得愈是淸楚。而且荏弱的中國工業家之依賴於外人太過明顯了。在中國的首要工業中心——上海，中國工廠甚至還要依賴一間外國電力廠來取得電力。當一九二五年五卅事變掀起大罷工之時，外人割斷電力供給，使一切中國廠停車，以資報復。這件事使中國商會的先生們很快屈服。他們把罷工工人最初提出的勢不可當的經濟和政治要求大大修改，獻呈於外僑商會。他們很快就替自己與外人的聯盟奠定基礎了。他們自己的利潤依存於這一妥協。他們截止支持罷工的捐欵了。罷工運動逐漸被破壞了。到了夏末，統治上海的奉軍與外國租界當局合作且得到中國總商會的完全認可和支持，封閉了上海總工會，搗毁和封閉大約一百二十間工人俱樂部及其他組織。上海的罷工運動暫時受了挫折，且在一九二五——二六年冬季期間，尙未恢復。

在這個時期內，中外有產者的眉來眼去來得越發大胆。而且預演這一着並無困難。雙方都組織他們自己的反共同盟，發表兇猛的反共宣傳，在演講台上拍胸示憤。一位英人約安斯先生大聲疾呼道：『我向你們呼籲，起來替中國挽救其古代文明的無價遺產呀！』（註六）這些紳士們對中國過去遺產的忠誠眞是令人感動的。

董事會長們總計他們的萎縮的賺頭，對他們的股東說：『我們希望當局將來採取激烈的步驟來壓制職業煽動家的活動。』（註七）所謂『激烈的步驟』，他們究指什麽，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下午在北京便見分曉，當時因爲段執政準備屈服於一通外國哀的美頓書，把天津港變爲非武裝區，所以那一天學生舉行示威反對此舉，段祺瑞的軍隊便向學生示威羣衆開火，殺死幾十個青年男女。（註八）這次北京屠殺是上海不平凡一幕的前奏。

那天晚上在大華飯店，上海工部局董事會人員與上海中國資產階級社會的大人物聚餐。這件事稱爲『上海歷史中之一里程碑』。『此種會議之召集，在本市歷史中尙屬創舉

。』（註九）在這些傲慢的外國人看來，這一套確乎是弄不慣的，因爲他們通常在他們的俱樂部後門打發各階級的中國人。在中國來賓——銀行家，經紀人，商人和官吏——看來，這些蠻夷的巧言令色就是他們的榮幸。美國總董代表他的英日同僚致詞稱：『我等乃諸君之東道主，今蒙一班享有如斯盛名之中國縉紳光臨此會，實覺慶幸之至……與我們同聚一堂者乃一羣代表人物，彼等均足以規範及指導一龐大及驚人之力量，此種力量即世人所知之輿論是也。』（註十）

演講者，費信惇單刀直入的說到本題。當局眼見困難當前，『想出對付手段』是必要的。也許要用武力，但這一方法自有牠的障碍。牠的運用也許『很快便招致一個極端嚴重的國際形勢。這一點從前已碰到過了。』強迫仲裁的計劃『恐怕終歸失敗』。上海工人似乎成了『第三者』底易欺的犧牲品了，這些『第三者』誘使他們破壞他們底工廠的安全。那末，爲什麽不利用『中國工人階級這種極端的輕信……爲什麽不利用牠——以謀他們的好處和我們的好處呢？爲什麽不建立另一種領導，以取別於他們已經熟習的領導呢？——他們對這一新領導至少要像他們對其他任何領導一樣樂於服從的。……我的意思，需要有一些像今晚和我們聚首一樣的人士……』

虞洽卿，一位銀行家和買辦起立致答詞：『我們通通十分知道這個非常緊張的局勢，……我們毫不誇大的說，只須畧一撩撥，立即便發生的火燄，這一火燄恐怕立即就又掀起較之去年更糟的大火災。爲了我們彼此共同的利益，我們必須用一切方法防止牠。』時候不多了，聽天由命是危險的。『我們目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將地方的初步工作與全國及國際規模的共同行動打成一片，使我們的重大問題得到最快和最滿意的解决。』虞氏率直地說，和平是急需的，『但坦白的說來，我們不想以「任何代價」得到牠。』外人必須多少承認『種族平等』和『宗主權』的原則。尤

其是此刻，他們應該讓中國資產階級參加上海的行政。
三星期之後，外國納稅人年會通過華人參加市政一案，上海公董局便破天荒有三個華董參加。這是一宗買賣。
這次『大華』聚餐是中國資產階級對帝國主義者底基本態度的一個非常淸楚的象徵。他們坦白的規定一個價格——而且還是一個最克己的價格哩——價錢講好的時候，他們便公開共同進行抵抗工人運動。他們自覺的集合他們的共同力量，而且在一切行動中，他們愈來愈自覺，愈迅速和愈週密。他們的勢力並不限於上海和北方，而且遠及廣州國民革命運動的心臟。
這些頭腦簡單的有錢人（中外也一樣）無論什麽時候觀察廣州方面的情形，總是除了赤化之外，便一無所見。另一些眼光較銳利的人開始發覺現實完全兩樣。外國人在這些焦頭爛額的月份中，一定學到許多東西，而他們中眼光最銳利的學得很快。他們一定得了解，問題的解決並不在於運用他們自己方面的武力，而在於這一個似乎威脅他們底利益的革命運動內部發生階級分化。他們中有一個人寫道：『外人犯下的嚴重錯誤就是過於重視共產主義爲一九二五年一切騷亂的原因……只要反共和媚外混做一起，希望華人中的善良份子起來反對共產派是很難的。』（註十一）中國政客以及另外和他們迅速結合新關係的人一定要教他們的較爲愚鈍的同僚曉得：廣州並不是單色的，他實際上反映階級分光鏡中的一切色彩。假如赤色被遮沒於帷幕中，你們應該以極小心的態度來打破分光鏡。
因爲廣州是最接近羣衆運動的地方，階級對抗在醞釀和發榮滋長。國民黨的老衞士——『右派』已分裂開去，因爲他們相信和共產黨人合作，一定妨碍他們和列強妥協的。但在廣州的所謂『左派』（即敢於運用危險武器的人們）却抱着相反的見解，他們認爲羣衆運動一定會給他們一枝強有力的槓桿來和帝國主義者談判。他們把共黨人視爲這一政策的現成工具。結果已在廣大規模上組織羣衆的力量，

並鞏固了廣東的國民黨政府。但這一運動的上升却尖銳的把領導權的問題提上議事日程。這個羣衆運動一定仍舊要受資產階級支配，這一點是必須確定的。多謝共產黨人的順從政策，這一點不流一滴血便完成了。我們要想把這個過程當做眞實發生的過程來研究，我們只須置身於陰謀詭計的迷途與構成廣州政治生活底個人野心的衝突中，追尋一根線索——蔣介石的生涯便夠了。

蔣介石是這些歷史人物之中一個：這些人物從某一階級站出來領導本階級，因爲他們個人的野心，背景和歷史使他們最適於在某一定的歷史時機，滿足他們本階級的某一定的要求。等到這些要求一提出來，恩格斯所謂『偶然事故之無窮排列』（我們則稱之爲機會，因爲牠們的互相關聯往往不可考）便把他們擁到前面來。他們一方面要求他們認爲相宜的價錢（不管是他們參與建立較好世界的報償也好，是權力，財產或『面子』的貪慾也好），一方面把他們的時代向他們提出的要求加以完成。他們通通都是社會各階級衝突所構成的總圖樣中之一部；不過他們也來幫助那些不斷形成的新模型，決定牠們的質地和色彩。在這種人的生涯中，凡是看起來似乎是偶然的機會底積纍者，歸根結蒂要與不可避免底歷史的必然性相配合。像這樣一個順時應運而生的人就是蔣介石，他的野心（再加上無情的詭譎和果斷）現在使他走上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心。

蔣介石是浙江一個富裕商人家族的後裔，一九一一年第一次革命爆發之時，他正就讀於東京軍事學校。他匆促回滬，加入陳其美的參謀部。在陳其美的贊助之下，蔣氏會見孫中山。他又與虞洽卿及張靜江等交往，虞洽卿是買辦，張氏則經營銀行業及買賣古董和豆腐來擴張他父親遺留給他的一份財產。蔣氏又和上海最著名的流氓頭黃金榮結納，而且一般人都相信他當時已成了上海一個最有勢力底秘密會社和幫口（青幫）的一員。他就從這些幫口，從這種通商口岸的流氓渣滓中，徵募他的士兵。強盜，銀行家，

軍人，兇手，騙子，走私客和娼家鴇母給後來世界聞名的蔣介石，畫成一幅繪像的最初幾筆輪廓。時過景遷，這幾筆輪廓不但沒有消失，倒還愈加深刻了。在往後幾年中，蔣氏注定要依靠於這些早年的師傅，而他們也不能不依賴他。上海的花天酒地顯然投合他的嗜好，有一個時候，我們還發現他在上海股票交易所充當一個小小經紀人。他不是由於利慾薰心就是由於無見識——關於這一點沒有清楚的記載，——不久弄得一文莫名，流浪街頭。張靜江和他的其他師友幫助他脫離那種似乎已非常危殆的情形。他們賠補若干曖昧的虧損，塞滿他的袋子，把他裝送到廣州，與孫中山榮枯與共。些少投資往往付出更大紅利的。

孫中山與蘇維埃政府成立關係之後，他派遣蔣氏（他當時已成了他的心腹之一）赴莫斯科，研究紅軍方法和蘇維埃制度。蔣於一九二三年七月離華，留駐俄國六個月。當時在莫斯科很少人留心這個嘴唇薄薄的年青軍官，但他的冷靜的，小而發光的黑眼睛也許留意了許多東西了。蔣氏來自一個充滿了僱傭軍隊的國家，他一定已滿懷敬畏的注意紅軍的士氣和方法。他親眼看到一枝從革命和內戰中生長出來的人民軍隊，且熟視軍隊與羣衆的圓滿關係。他看到幾千百萬人剛剛丟棄壓迫和愚昧的緊外衣。如果說這一雄偉的奇景在他心中引起什麼反響引起什麼慾望去幫助他本國人民從數世紀的糞污中站起來，他後來的生涯却沒有一點足資證明。在他看來，他所考察的事情就是能夠供他一己利用的資本。他也許看到一種思想的力量如何能夠喚起無限制的犧牲和效忠。他尤其看到羣衆的力量爲一種政治和軍事的武器。因此，蔣氏囘華就帶着一種智識，這一智識使他大大超越他的軍閥同僚。因爲他現在可以高呼：『世界革命萬歲!』只要這一口號尙適合他的用場。這就是他曾聽到的，令千千萬萬人鼓舞起來的呼聲。這也就是他希望藉以建立他自己底政權的呼聲。所有他的根深蒂固的階級本能警告他：這是不好玩的危險的賭博；但蔣介石就是

一個賭徒。他把他的賭注放在賭桌上，大胆的狂賭。

蔣氏於是年末回廣州，立即成了鮑羅庭和俄國軍事顧問的黑髮意中人。一九二四年五月，黃埔軍校藉俄國欵項且在俄國贊助之下成立起來，蔣當時是唯一留俄及親眼視察過蘇維埃軍事方法的軍人，他當然被選爲校長。黃埔替中國培養一種新式的軍人，但牠同時又成了蔣氏政權的發源地。本國一些最優秀的青年成羣擁入黃埔。而一些最頑強的革命戰士也從牠出身。但羣衆運動的生長，工會和農民協會的愈來愈大的勢力很快便使黃埔軍校學生發生階級分化。在最初時期，在鎮壓廣州商團，遠征東江，消滅滇軍將領之戰，粤南之役等戰役中，黃埔軍校學生均以身先士卒著名。蔣是他們的軍事領袖，而每一次戰役便有效地抬高了他的威望，權力和影響，尤其是黃埔學生開始卒業，到各軍隊就任軍官之後。但是等到羣衆運動增長，尤其是等到農民開始利用組織的武器來侵犯地主的權利和特權的時候，這些年青人因爲許多是地主家族的兒子，他們便開始嚴整陣列，以反對羣衆和共產黨人。在黃埔學生內部，這種階級分化迅速採取組織形式，而當時階級分化已在更廣大的政治舞台上採取這種組織形式了。孫文主義學會已積極活動於華中及華北，現在黃埔學生中取得一個堅固的立足地。軍校學生的共產黨員和他們的較爲急進的國民黨盟友共同組織他們自己的青年軍人聯合會。在一九二五年戰役期間，這兩個集團有幾次公開起衝突。蔣介石想維持他們間的均勢，這恰如在較爲廣大的政治舞台上，他在國共之間已開始盡同等的作用一樣。一九二五年十月，當軍隊第二次遠征東江勝利，回師廣州之時，蔣邀集他的青年軍官聚餐。『他拍案大駡他們』（註十二）且要求兩個敵對組織言和。當時無論如何他要求保持統一的外貌。

在『統一』的問題上，蔣介石與鮑羅庭的見解不謀而合。他們的態度一致，清楚的反映出共產黨政策與資產階級要求吻合的一斑。蔣政權和他本階級的權力一樣尚未鞏固。

他尚需要共產黨人，羣衆運動，俄國人，他們的獻議，他們的指導，和他們的物質援助來鞏固他的地位。蔣本人的根基尚未穩固。在政治上他仍舊服從國民黨的文治派領袖（他們中最重要的就是胡漢民，及孫中山的得意門生，汪精衞），在軍事方面他在一羣將領中尚有許多競敵，這些將領也已經把他們的運氣與國民黨的運氣連做一起。蔣介石希望羣衆運動的力量把他捲到一個優越的地位上。使他能夠發號施令，這也正是中國資產階級的目的和要求。

鮑羅庭和他的莫斯科師傅及中國共產黨領袖通通一樣從這一前提出發：資產階級的合作對於革命成功是非常緊要的。工農底獨立的，而且當時還是強有力的組織力量從沒有令他們想起確保工農底直接利益之必要，甚至當牠們和資產階級利益發生衝突也是如此。反之，有種思想倒還牢牢不可破且成了共產國際的正式理論，即，認爲國民黨不是和共產黨成立臨時聯盟底自由資產階級的黨，而認爲『國民黨……乃代表工，農，智識份子及都市民主主義（即：資產階級）的一個革命的聯盟，〔這一聯盟〕乃是這些階層在反對帝國主義者，反對全部軍閥底封建秩序，爭取國家獨立，爭取一個單一的革命民主政府的鬥爭中，根據牠們底階級利益的共同〔而建立的〕。』（註十三）

基本的方向乃『階級利益的共同』，並非牠們的衝突。牠培養這一幻想：以爲一方面資產階產與另一方面受牠剝削的大多數工農羣衆在共同的立場上反對帝國主義。鮑羅庭就是懷着這樣的思想，才把蔣介石視爲國民黨領導中之最可靠的『同盟者』。廣州的其他軍閥尚形成過去羣雄割據及軍事無政府狀態底歷史之一部份。甚至在鮑羅庭看來他們的最高利益分明就是私利。共產國際相信有一部份資產階級能夠眞正進行反帝鬥爭，蔣介石似乎就是這一部份資產階級的比較正統的代表。而且，蔣氏掩藏在激烈的詞句中，在鮑羅庭及羣衆眼前把自己表現爲革命軍的赤色希望。鮑羅庭因此便運用每一可能的政治權謀，把蔣推到羣衆

的高峰上。假如鮑羅庭一面做這件事，一面相信蔣在服務於羣衆利益，蔣並不反對。相反的，據說，他『往往引用孫中山向他說的一句話：他採納鮑羅庭的話就是採納他（孫文）的話。鮑羅庭知恩酬答，力勸「不論共產黨或國民黨，通通都要服從蔣將軍。」』（註十四）當鮑羅庭『力勸』增加蔣氏的權力之時，後者不難聽到已故大領袖底幽靈的聲音，出自他底俄國顧問官之口。

一九二五年八月廣州國民黨右派的陰謀不軌，終於造成廖仲凱的刺殺案，廖氏是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又是國民黨的極左翼。胡漢民（國民黨的元老）和許崇智（粵軍司令）受此案牽連甚深。（註十五）廣州國民黨右派這次威脅的公開表示，完全由鮑羅庭在幕後處理，其處理的方法就是運用『陰謀』，排除不合心意的人。鮑羅庭經過一番巧妙的小買賣（他做這一類事顯然是極自負的），終於把胡迫走海外。許將軍及其他與這次陰謀有關的一批人也離開廣州。廣州工人突然發現他們的新領袖是汪精衛（他已成了黨，政府和軍事委員會的主席）和蔣介石（他已能夠號令廣州軍隊。）蔣介石為了取得這個地位，他只須立正，敬禮，高呼：『世界革命萬歲！』便行。

但是當鮑羅庭及追隨他的共產黨領袖一手包辦，和可疑的同盟者做新的上層勾結的買賣時，羣衆運動已經獲得了大部份東西了。省港罷工，包括將近一百萬工人的全國經濟和政治罷工，農民協會的非凡的生長，農村反地主鬥爭之發動，這些通通都畫出了羣衆力量進展的猛烈上昇的曲線。工農鬥爭已招致獨立組織形式的產生，羣衆經過這些組織形式本能地去達到他們本階級的目的。

省港罷工工人組織自己的罷工委員會且經過工人代表大會和其他廣州工人聯合起來，他們正設法保衛他們本階級的利益。廣州的警察權事實上在他們手裡。借用一個官方報告的話來說，農民已經『在六七縣裡公開反對地主。』（註十七）軍隊供給共產黨人一片潔白的園地，尤其是自一

九二五年在東江各縣及廣東其他地方進行各次戰役之後（這些戰役之獲勝主要是因爲工農的直接參加）。只是因爲沾了這些勝利的光，廣州政府才能存在。牠的權力完全依賴於省港罷工工人及廣東農民的成就。甚至蔣介石也公開承認這一事實。有組織的羣衆與兵士的決定的部份已成了整個運動的推進力。但雖然如此，上層的聯盟却妨碍他們去從那個君臨於他們頭上的政府，取得一點有效的手段，以滿足他們自己的利益。幾宗小小的苛稅已取消。幾點較爲觸目的官場弊竇已剷除。私有財產的神聖疆界仍然不受侵犯。

共產黨人從沒有教人家必須使這一强有力的羣衆運動具有牠本身的政治方向，給牠以一個遠景和一枝旗幟，這枝旗幟使牠能夠按照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利益而參加階級鬥爭的戰場。牠反而被一個領導弄得愚鈍了，這個領導並不教導羣衆對他們的國民黨同盟者懷着不可或缺的疑心和不信任，牠倒還教他們完全依賴於站在運動前頭的資產階級民族派。

一切權力和一切榮譽統歸國民黨及其領導。這就是共產國際，尤其是聯共領袖們的格言。一九二六年一月，史大林及聯共第十四次黨大會主席團的其他人員，給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主席團拍發了如下的電報：『領導全世界第一次勝利底無產階級革命的光榮的歷史任務已落在我黨肩上……我們相信國民黨將來也能夠**在東方扮演同樣的角色，並因此而在亞洲破壞帝國主義者的統治基礎**。假如國民黨在目前鬥爭中鞏固工人階級與農民的聯盟，並自願受這些革命底基本力量的利益來指導的話，……』（註十八）（圈照原文）。

史大林已經產生他最初的思想：認爲國民黨不是與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而是工農聯盟的政治表現。他於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告訴一班學生說，在中國，民族主義聯盟能夠『採取一個單一的工農黨的形式，如國民黨便是。

』（註十九）

關於革命中『無產階級領導權』底前途的討論開始出現於若干共產國際關於中國事件的報告中；但共產國際的中央機關報却報告牠的支部說：『一個非常類似於蘇維埃組織的國民政府於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成立於廣州，』並且牠還光榮地引證蔣介石和汪精衛在國民黨大會中的演辭。蔣說：『我們之聯合蘇聯及世界革命實際上就是聯合一切共同反對世界帝國主義，完成世界革命的革命黨。』汪精衛說：『假如我們願意反對帝國主義者，我們一定不要翻過來反對共產黨人。（喝采）假如我們反對共產黨人，我們就不能同時自稱爲帝國主義的敵人。（喝采）』這個報告下個結論說：『國民黨的工作和鬥爭證明孫中山的信徒仍然盡忠於他的根本思想。』（註二十）

一九二六年二月召集的共產國際執委第六屆中全會讚揚國民黨屏斥牠的右派，並宣布這次屏斥右派爲『加强廣州政府的革命傾向，並使國民黨得到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支持。』（註二十一）但在這次中全會裡，各代表在蘇維埃領袖的監護之下，對國民黨右派的著名領袖之一，胡漢民的列席却保持熱烈的喝采！胡氏因與行刺廖仲凱案有案，從廣州出亡，逕赴莫斯科，他在莫京立即被選入農民國際的指導機關中，充當『中國農民的代表！』（註二十二）他被邀去出席剛開幕的第六屆中全會會議，代表國民黨向這個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總參謀部致祝詞。

官方的報告說，『當這位粤軍大元帥★全副戎裝踱上講壇時，』安德里埃夫廳（從前沙皇的正殿）『呈現一幅難忘的畫圖。演講者因爲不斷一陣又一陣的喝采，有幾分鐘無法開始講話。西方革命的無產階級與東方被壓迫人民之間的團結在這裡表現得非常清楚。』（註二十三）

對中國共產黨代表也有喝采，但畢竟他僅只代表東方被壓

★在莫斯科，胡氏極力用『大元帥』的榮銜，這是他繼承孫中山的官銜。

迫的無產階級吧了。『當胡漢民同志（！）……登上講台時，熱狂到達之點還要高。這些熱狂的表現延長幾分鐘，而且演講者幾乎每一句話都被打斷了。』（註二十四）胡的講辭是值得引證的，因爲我們不要忘記：胡不僅只是後來突然成了羣衆屠夫的大批國民黨領袖之一。而且他站在共產國際講台上時，他已經是因爲參預行刺一個左派領袖而從廣州出走的亡命客了！

胡說，『因我能夠親自參加此次國際會議，玆代表中國民衆，代表中國工農，代表中國被壓迫羣衆致謝。世界革命只有一個，中國革命就是這個世界革命之一部分。我們的偉大領袖孫中山的口號與馬克思主義及列寧主義的口號一致。沒有一個人再信仰第二國際。第三國際的影響晚近在中國已大大增加。這個運動包括智識份子及大部分工農，即整個無產階級。

『國民黨的口號是：擁護羣衆，即，與工農聯合奪取政權！所有這些口號都與第三國際的政策相一致……我覺得我是世界革命戰士之一分子，我慶祝這次共產國際會議。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萬歲！世界革命勝利萬歲！第三國際萬歲！世界所有共產黨萬歲！出席此會的同志萬歲！』（註二十五）

共產國際的影響包括『整個中國無產階級』。中國資產階級能有機會，藉共產國際支持的威望來掩飾自己，那牠之感恩知遇是有充分理由的。（甚至廣州的商會也把『世界革命萬歲！』這個口號寫在牠的宣言上。）胡漢民可以揮霍無度布施他的萬歲的願望。此事使他能夠於短短一年之後，幫助蔣介石兇殘地減短最優秀的中國青年共產黨員的壽命。共產國際第六屆中全會爲了答謝胡的善良心願，（而這也就是共產國際從牠的中國資產階級同盟者方面得到的全部東西，）牠宣布『廣州政府是中國民衆解放鬥爭中的先鋒，（而且）是全國未來底革命的民主秩序的模範，』而且敦促中國的革命家統一於『由革命的民主組織領導

的，〔包含〕人口底最廣大層分（工人，農民，資產階級）的一個單一的全國革命戰線』之內。（註二十六）

由於這一理由，在廣州，鮑羅庭是並不喜歡共產黨員在羣衆運動中的驚人進步的。『共產黨員在新的革命組織中佔的顯著地位……引起國共兩黨領袖的焦慮，並不足奇。鮑羅庭也非常關心這一點，且於一九二五年期間，他常常與汪（精衞），廖(仲凱)，胡(漢民)，蔣（介石）討論這個問題。「自一九二四年改組以還，國民黨分裂爲兩黨，即，擁護和反對改組的兩黨。但這一分裂是不嚴重的，——因爲左派必然勝利。恐怕嚴重的就是左派自身的分裂，」他說這些話已預見國共的分裂。「因此左派領袖克服未來困難的唯一方法就是表示一個統一的意見。」』（註二十七）

鮑羅庭說，唯一方法在於所謂左派領袖們的統一。這也就表示國共兩黨的『統一』。而這一『統一』又表示使羣衆屈從資產階級的政治領導。有一本著作企圖辯護中國的官式共產國際政策，人們爭辯說，激烈的改革不能施行於廣州，土地革命也不能實現，因爲『由於其混合的階級成分，』國民黨不能『實行沒收私有財產。』（註二十八）國民黨的『混合的階級成分』需要保障資產階級利益。共產黨人處在國民黨之內，他們便一定要尊重私有財產之不可侵犯性。換言之，國民黨並不是各階級合作的黨（更不用說什麽『工農黨！』）而是資產階級迫使其他階級服從牠的黨。

組織一個獨立的工人階級攻勢，爲什麽不可能呢？因爲廣州無產階級『薄弱』。鮑羅庭認爲『我們能夠在廣州奪取了政權，但我們一定不能保持牠。我們許已沈沒於血海中了。』（註二十九）

『廣州無產階級的薄弱』在什麽地方？廣州政府已乘着羣衆運動的浪潮走上政權，而有組織的羣衆是否繼續支持的問題足以决定牠的存亡。在這一方面，廣州工人和廣東農

民佔了一個决定的戰畧地位。他們的『弱點』就在於這些強有力的羣衆組織缺乏一個獨立的政治遠景。假如一開始直接問題或許不是工人政權，那末當時問題是摧毀資產階級的反攻，就確切不移了，因爲這一反攻正公開從四面八方發動起來。這一點能夠辦到，只有藉工農本階級的政策來武裝工農，領導他們去創造蘇維埃，這些蘇維埃是能夠握住羣衆權力的棍棒，高臨於持有名義政權的中國克倫斯基們的頭上的。廣州無產階級太『薄弱』，以致不能幹這一着嗎？但合組廣州工人代表會的省港罷工委員會和代表大會已具備了兩重政權的規模。這些組織已獲得警權以及興建學校，法庭和醫院等國家機能，而且牠們甚至還曾經負責建築一條從廣州到黃埔的公路，牠們正本能地要行使充分的政治權力。牠們的活動已發揮了蘇維埃的職能。牠們聯合軍隊代表和全省農協，代表當時廣東政權的眞正泉源。但是按照上述的辦法而舉行工人階級攻勢的問題，共產黨領導機關從未提出過，甚至還沒有考慮過。爲什麽呢？因爲這一攻勢恐怕要連帶侵犯資產階級的財產，而侵犯資產階級財產也就表示和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要破裂。

托洛斯基寫道：『但我們姑且承認，廣州工人尙太薄弱，不足以建立他們自己的政權。但一般的說來，羣衆的弱點是什麽呢？就是他們傾向於追隨剝削者。在這種場合中，革命家的第一樁義務就是幫助工人從奴服的信仰中解放出來。但共產國際官僚所做的工作却與此正相反。牠灌輸給羣衆的思想是必需服從資產階級，牠又宣稱資產階級的敵人也就是他們的敵人。』（註三十）

鮑羅庭說，假如採取較爲進攻的政策，工人一定已『淹沒血海中』了。不錯，成功是沒有事先保證好的。現在來認定採取任何其他政策都一定已博取勝利，這是不可能和無益的。但這一點却是清楚的：一九二五年廣州的屈服政策使工人喪失方向，而且只不過將流血延緩到資產階級準備

打擊，更臻完備，而羣衆也已由於他們自己的領袖的政策，完全解除了武裝的時候吧了。我們可以料想得到，一種進攻的，獨立的無產階級政策也許已招致失敗。這件事一定要看許多因素來定。但這樣的失敗一定像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失敗一樣，是在公開反對已知和公認的敵人中遭逢的。結果一定是幹部受了鍛鍊並使中國工人的教育進入新的階段，更清楚，更確切的引向中國的一九一七年。但因爲害怕破壞『聯合戰線』而拒絕一個獨立的路線，却一定要在工人蒙受無比損失和沮喪的情況之下發生失敗，因爲這些工人聽人家的教誨去相信別人，結果他們所相信的人却把刀插進他們的背脊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七十五年前寫道，工人們『切不可被民主黨人的辭句混亂視聽：例如，說什麽民主黨將因爲工人們的獨立行動而分裂呀，牠（指工人的獨立行動——譯者）將使反動的勝利成了可能呀等。當這些辭句應用起來時，最後的結果，無產階級往往要受欺騙。』（註三十一）

這些辭句運用過了，廣州無產階級也受了欺騙了。

第五章　廣州：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政變

第五章　廣州：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政變

蔣介石守護他本階級的利益宛如屹立於冥府大門的三頭沙比拉斯（按Cerberus 乃守護冥府大門之犬形三頭蛇尾怪物——譯者）。一個頭面向右，樣子像戴季陶，他已成了廣州國民黨保守派的領袖思想家。戴氏在上海，華北底公開活動的右派與廣州底隱伏的右派之間，充當中介。他在廣東省活動和影響的範圍充分駁倒那種單純根據民十三改組之贊否而定為左右派的粗率劃分，這種劃分已證明是鮑羅庭及其他同僚所懷抱的一種愉快的過度簡單的思想，這猶如一個酷熱的廣州下午的一頓冷飲。但冰在太陽底下融化，恰好似政治虛構消解於階級鬥爭的閃光中一樣。在這兩個非常不同的政治傾向間，表面上似乎有一條深刻的裂縫在，事實上却證明這一裂縫只是一個根本性質相同的集團底兩部分間的分工。北方的右派是一道橋樑。『左派』將跨越牠而進行和列強妥協。在廣州，早在一九二五年七月，正當國民政府成立之時，戴季陶已開始準備這種妥協。他得到蔣介石的默認的保障，開始印發反共產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小册子。他宣布人口之中『先知先覺』的部分有指導和治理『不知不覺者』的當仁不讓的權利，他聲明共產主義與孫中山的遺訓沒有共同點，他極力勸人保持總理的學說，以免受共產主義摻假之虞。戴氏大胆創建孫文主義學會，這個學會小心謹愼的設法使自己和北方的西山會議派分清面目。孫文主義學會派『宣稱，他們與西山會

議派有三點不同。（一）西山會議派是反對民十三改組的，他們則擁護牠。（二）前者只包含腐敗和反動的官僚和無政府分子，他們則是積極的革命家。（三）……（西山會議派）之目的……乃推翻汪蔣，而他們則承認汪蔣爲他們的領袖。但是他們雖屬於左派，他們和西山會議派一樣積極的，頑強的反對共產黨人。他們也要求與共產黨破裂。』（註一）

沙比拉斯的第二個頭向着左方。牠很像蔣介石，不過牠對革命却叫出忠誠的話。『我也願意長眠於爲國民革命，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而犧牲之烈士墓旁。革命不能沒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國際革命也不能漠視共產主義。我們不能否認，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三民主義的實現，也就是共產主義的實現。既然曉得我們不能使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分離，在我們中間爲什麼還要有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呢？』（註二）

沙比拉斯的第三顆頭在正中，往前看，牠是萌芽的野心底審愼的守護者。蔣介石向左邊傾聽他本人的主張：把共產主義和孫文主義等量齊觀。他向右邊傾聽戴氏的主張：宣布這兩種主義的難於消除的矛盾。他從左而取得支持，羣衆面前的威望，俄國的軍火，金錢和顧問；但他却從右方取得材料，製成他自己那架機器的輪齒。他委任要職時，他的選擇嚴格限於非共產黨人。蔣氏建築這一非常『純正』的國民黨的政治組織，他得到那位慘白的，貌美的弱質書生——汪精衞的充分分作，汪氏是小資產階級急進派的首領，他永遠命定要成爲他底強力的大資產階級的同盟者手中的綁腿布。

在國民黨組織內，有幾個著名共產黨員充任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但這幾個共產黨員一個也不獲准任職於黨的秘書處。軍事委員會任用一批俄國的技術顧問，軍隊政治部的多數位置都操縱在個別共產黨人手中，但共產黨人却被嚴峻的屏出總參謀部及軍隊的財政處。國民政府本身就沒

有共產黨人參加，只有鮑羅庭得到顧問資格，但在羣衆組織中，又在政府及黨部的下級中，共產黨人及其同情者却委身於日常工作。國民黨左派就從他們那裡取得力量，而這一力量使牠能夠操縱一九二六年一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在這次大會裡，階級利益和人物的衝突，在羣衆運動的陰影之下隱藏起來了（雖然只是微薄地隱藏）。全國有組織工人的數目已達八十萬。廣東的農民協會，其會員已發展到六十萬以上。香港被罷工癱瘓了，在廣東，糾察隊巡察城中街道和碼頭。資產階級的代表們心裡尙鮮明的記着廣東統一的教訓，他們了解，他們在未來的戰鬥中將需用這種羣衆的武器。他們興高彩烈的通過決議：重復申說那些毫無誠意的空口允諾和國民黨『工農政策』的熱烈辭句。他們柔聲譴責戴季陶的反共宣傳，向沙比拉斯第一頭蹙額示憤。他們頭一次把蔣介石選爲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向沙比拉斯第二頭笑臉相迎。他當塲接受，並忠心高呼：『聯合蘇聯，聯合世界革命』。（註三）但沙比拉斯第三頭却絕不過問大會，因爲這裡的最高角色是汪精衞，他是黨和政府的首腦，軍事委員會的主席，操縱一切國民黨的職位，這是蔣介石所羨望的。

蓋蔣介石早已自視爲孫中山門徒中的領袖。廖仲凱被刺及胡漢民褫職，只留下汪和他的要求對敵。蔣仍然不過是黃埔軍校校長和第一軍軍長，汪不僅以黨政首腦的資格，行使重要的民政，且以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資格，代表文官支配軍事機關。在這種情形之下，其他軍長（他們已和廣州榮枯與共）在政治和物質利益，尤其是軍火的分配上，享受莫大的平等待遇。二月，當蘇維埃軍事代表饗宴國民黨的領袖時，一位俄國軍官舉觴祝賀，他把汪的名字放在蔣的名字之前。一位來賓說，他瞧見蔣的臉色轉白，嘴唇緊閉。蔣『當晚不發一言』。（註四）蔣非常嫉忌汪獨攬許多特權，資產階級方面也曉得如何利用蔣的虛榮心。右翼

國民黨的老衞士早已知道，他們經過蔣介石來重奪黨的大權，一定會成功的。他們在西山會議（這是戴季陶幫助組織的）上已採用『聯蔣倒汪』的口號，蔣當時雖公開排斥這種思想，但他却暗地裡培殖牠。當一九二六年一月右派殘餘會議舉行於上海，堅執地重行提出他們的主張時，蔣證明更能容納這種主張。雖然『左派』表面上己勝利，而共產國際也已從莫斯科方面慶祝『國民黨轉變成爲一種堅决的鬥爭力量，成爲中國革命的一個眞正的黨，』（註五）但右派的影響在廣州是分明可見的。

有一位眼光銳利的中國記者從廣州寫一篇通訊道：『國民黨右派或反共派的大本營在北京和上海，牠們……在南方首都較不急進的國民黨人方面，得到不少支援。這一點，蔣將軍及其他同志已感覺到了。』(註六)這種影響已不再是間接傳達的了。張靜江，這位青年將軍的恩人，已親自光臨監視他的投資。他已加入蔣介石的心腹集團，且已成了他的主要政治助手和顧問。

使資產階級獲得保證，俾能夠對方興未艾的羣衆運動握有領導權，這是資產階級目下所切望，同時也是張靜江敦勸他的被監護人去做的。保證羣衆運動不越過資產階級利益之界限是必要的。爲了做到這一點，具體的說來，便必須鞭策共產黨人俯首就範，把他們的地位調整並規定爲資產階級國民黨的輔助者。乾脆說一句，現在時候已到，應剋減共產黨人的政治工資以增加資產階級的政治利潤，並把羣衆運動底龐大的資本積蓄交給後者支配了。現在是如何使上層領導穩定的問題。爲了解决這個問題，一定要對共產黨人及其小資產階級的急進同盟者施行猛烈的打擊，這一打擊是足以引起損害的。但不是致命的。廣州政客和軍人朋黨之所以爲縱横交錯的陰謀詭計生嫌露隙，只不過因爲他們中許多人都在爭着首先施行這一打擊吧了。多謝鮑羅庭，蔣處於得寵的地位，而决定行動的也就是他。

帝國主義者影響右派，並經過張靜江及孫文主義學者來影

響蔣介石。他們的慾望與他的野心，他的詭譎，他對於政治及軍事競敵的嫉忌，他對權力之無誤的貪心混攪在一起。壓平共產黨人就是爭取資產階級對羣衆的領導權。屈服他的競敵就是爲自己取得領導地位，以實施這一領導權。在這一模型中，一切五顏六色的線條都迅速纏結成一個結節。牠有賴於蔣介石來斬斷牠並藉此以產生一個新的模型。他徹底而確切地演變爲馬克思所說的『那種人，他並非夜間決定日間行動的，而是日間決定夜間行動。』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黎明之前數句鐘，蔣的軍隊調動了。藉口是所謂『中山』艦之恫嚇態度，蓋中山艦已於晚間駛離黃埔。是晚的事變結合許多複雜的陰謀，在這裡如加以追溯，未免離題萬丈了，因爲許多可疑的冒充的國民黨英雄們的野心衝突都與此事有關。★但是蔣有系統的進行他的計劃時，這些事情都被掃開了。在他所統率的軍隊中，一切黨代表(大約有五十人，多屬共產黨人)均遭逮捕。省港罷工委員會的總機關被解除武裝。城內一切蘇維埃顧問均受軟禁。鄧演達乃共產黨同情者，他曾繼廖仲凱爲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現在也被扣留了。蔣確確實實是出其不意來打擊他的所有犧牲者的。李芝龍是海軍部的共產黨領袖，他也是從夢寐中被拖走，押赴軍事監獄之一個。東方發白，蔣介石一躍而成了廣州的主人。其他國民黨領袖們則陷於極度混亂中。一位共產黨的史家記載說，一切人『在事前均毫無準備，甚至亦未估量到此。』（註七）每一個人都驚做一團。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匆促聚會。他們在一道決議案裡大胆宣稱：『既然蔣介石一貫爲革命而奮鬥，希望他領悟他在這次事件中之錯誤，』但是，他們決定，『鑒於當前

★李芝龍，這位海軍部的共產黨領袖一點也想不到成了這一晚活動的徒有其名的重要對象，他已在汪精衛主席之辭職一書中，紀載這段史實的大部份，這本書一年後才出版於武漢。

的局勢，左派同志應暫時引退。』（註八）在汪精衛看來，這也就表示切實離開舞台。他恰好生病起來，他的傳記作者敘述說，他『考慮解决這個局面的最好辦法，就是他引退，讓蔣暫時當政。』（註九）他在造幣廠佈置的官冕堂皇的一幕中，把權柄移交給蔣之後，他便離職遠引，先潛赴廣州郊外某村，數日之後便亡命歐洲。他於離國之前，寫信給蔣，哀求他堅守『革命的』道路。只『要他這樣幹，汪犧牲一己，毫不在乎。』（註十）

國民黨『左派』軟弱地投降了，因爲蔣突然打擊他們，並沒有喚起眞正的左派，喚起有組織的羣衆底相應的壓力，羣衆們都陷於混亂，且完全得不到消息，不知道上面發生什麼變故。（註十一）一位外國視察者數日後來到廣州，發現共產黨人隱匿起來，俄國顧問正束裝就道，心裡非常高興。（註十二）但蔣尙無意直接打擊羣衆運動。他只不過設法把這一運動放在資產階級的確實支配之下，回頭又把這一支配權集中在他自己的手中吧了。他順利地把『左派』領袖迫走之後，便走上前向工人解釋。他告訴他們說，三月二十日事變，尤其是罷工機關的搗毀乃出於『誤會』，他又應允懲治負責官員。共產黨人自身就糊塗得那樣到家，他們竟不知道相信他還是不相信他好。（註十三）昨天還從旁監視的右派政客，這時從他們的香港和上海的亡命地擁入廣州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全體會議五月十五日召集，會期臨近，一種故意製造的屠殺空氣籠罩全城。牆上貼滿標語，警告神秘的『挑撥』，而共產黨將要實行政變反對政府的謠言也流佈起來了。中央銀行發生擠兌。會議開幕之前夜，戒嚴令突然拑制了全城。除了蔣氏心腹之外， 誰也猜想不到將要發生什麼事情 。（註十四）

蔣在會議中提出『黨務整理案』。此案製定之目的在將國民黨中共產黨員之組織活動，限制於最狹窄的範圍之內。共產黨員『不得懷疑或批評孫總理及其學說』。共產黨須

將加入國民黨之黨員名單交給國民黨中常會。限制各省市及中央黨部之共產黨委員不得佔委員三分之一以上。共產黨不得當國民黨或政府各部部長。另一方面，國民黨員『不得加入其他任何政治組織或活動』。這就是說，共產黨員可以加入國民黨，但國民黨員則不能加入共產黨，否則註銷黨證。今後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其本黨黨員發出之一切訓令須首先交由兩黨的特別聯席會議通過。(註十五)
蔣一方面使共產黨人受這種狹窄的政治束縛，一方面進行集中一切權力在他自己手中。三月二十日的政變已破壞了文治派軍事委員會的權威，汪精衛的撤職已令蔣握有一切黨政務的支配權。五月十五日中全會批准了這些變動。蔣正式被舉爲黨的主席，他立即又委張靜江代理他爲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舉行北伐的計劃通過了，而蔣介石也被委爲一切北伐軍的總司令。後來又發下一批特別命令；在北伐期間內授蔣以緊急權。一切黨政機關均直屬於總司令部。軍事委員會本來被認作文官抑制軍閥野心的機關，現在也全部轉入蔣的手中了。他又成了政府財政的仲裁者。他操縱政治部，兵工廠，總參謀部，陸海軍校。廣州政府變成了一個軍事獨裁。蔣的勝利是完成了。
這次蔣介石在廣州奪取政權，不流一滴血便建立起資產階級對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權。列寧曾警告落後國家的共產黨，要牠們用全力反對資產階級支配羣衆運動，現在在中國，資產階級正好支配着羣衆運動。在克林姆宮中負責指導中國革命運動的那些人已用死的列寧來紀念活的列寧。他們從他在國家大典，在大會和羣衆集會上發表的著作中，抽取些斷簡零句來喃誦，這正好似國民黨的政客在紀念其已故領袖的紀念週中，口裡呢喃着孫中山的濫調一樣。列寧曾寫着：共產黨人必須擁護民族革命運動，其『唯一的目的』就在團結共產黨的分子，教育他們，使他們了解『反對其本國內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傾向的任務』，但是當列寧寫這幾句話之時，他不僅僅是在定立訓條，就是當他極

力主張無產階級運動即『處於其萌芽形式中』亦應保持其獨立性時，也不僅僅是如此。（註十六）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全部經驗總結在這句永雋的話中：共產國際及其落後國的黨應反對資產階級想支配那設法『解除一切剝削』底羣衆運動的企圖；又『並不因爲』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落後性質『便認爲革命的領導權應送給資產階級民主派』。（註十七）

中國的事變又重新試驗而且又重新證實這一分析。但克林姆宫的軸心已不再是一種無產階級的政策。在中國，牠相信國民革命運動如果由資產階級來領導就可以更迅速地產生一些急需的同盟者。蘇維埃國家與共產國際底精神和物質的援助並非經過共產黨而送達羣衆運動，而是經過資產階級國民黨，這個黨被說成爲一切階級的黨，而共產黨人及羣衆則一定要服從牠。這種政策已直接招致了三月二十日政變。假如共產國際的領袖們不能像列寧一樣預見事變，他們現在至少也碰到了既成的事實了。事情是遲了，但還不太遲。克林姆宫的經驗主義者還能夠進行反對資產階級支配的鬥爭——否則就完全『把革命的領導權讓之於資產階級民主派。』——何況此刻還不是讓之於民主派而是讓之於軍事獨裁創造者的資產階級。

共產國際領袖，史大林和布哈林却採用後一路線，且設法隱匿廣州已發生的政變，不讓國際的下層知道。他們把牠發生經過的一切消息都壓下來。這些事情不僅不讓俄國工人及共產國際的其他支部知道，而且連牠的執委會，甚至連執委會主席團的其他委員都不讓知道。關於這一點，有兩個機關的委員們作證。（註十八）當政變消息已出現於中國和國外的帝國主義報紙時——詳細事實雖往往被曲解，但這些記載却包含有非常眞實的斷言：廣州政權已轉入蔣介石手中了——共產國際報紙的中心機關開始發出猛烈的否認。

共產國際的中央機關報於一九二六年四月八日寫道：『路

透社……最近發出一則新聞，稱在廣州，蔣介石，這位革命軍的最高司令官（路透社從前稱他爲赤黨）已實現「一次政變。但這則謊報（旁圈照原文）不久就被否認……國民黨並不是只有幾個黨員的小團體，而是名符其實的羣衆黨，而廣州革命軍及廣州革命政府就是建立於這一基礎之上的。一夜工夫在那裡實行一次政變當然是不可能的。」』（註十九）

廣州政府並沒有變成資產階級政策的工具，牠此刻愈益『矢忠於世界革命』且以『蘇維埃政府』的資格，伸張其權力於鄰近各省。

共產國際的同一報道繼續往下寫道：『廣州國民政府的前途從來沒有像現在那樣順利的……廣西省將於短期內成立一個蘇維埃政府……由於國民革命運動，結果將軍們的權力消失了。（旁圈照原文）國民政府現在彷照蘇維埃的制度，在廣東省內進行組織一切縣鎮行政。』（註二十）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紐約工人日報★採登一則莫斯科專訪說：『香港及倫敦的反動的英國報紙努力推進他們的帝國主義宣傳，現在又散佈關於國民政府破裂的聳人聽聞的故事。這些報道並沒有眞正的根據。牠們無非是英帝國主義底挑撥離間的陰謀手段而已。現在廣州沒有發生過什麽暴動。這些報道的根據似乎是一位廣州軍將領——蔣介石與廣州政府間的某些異見（！）。這些異見與原則問題無涉，且與武力爭奪政權毫無關係。這些意見已袪除了，廣州仍是中國民衆解放運動的堡壘。英帝國主義企圖爲牠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廣州的不重要的異見已失敗了……莫斯科報紙認定英國反動報紙這種挑撥離間的陰謀正好暴露英帝國主義對於廣州的眞正計劃。消息報寫道：『願望是思想之父，英帝國主義者把他們的眞正企圖表現爲旣成事實。』（註二十一）

假如發出這樣的否認只是偶然出於無知，那末，共產國際

★工人日報乃美國共產黨機關報——譯者。

駐華代表的報告就不能這樣說了，衞金斯基寫道：『英帝國主義者……妄想在廣州挑起一個暴動，並向全世界大吹大擂說，廣州政府已塌台了，國民黨右派已奪取政權且成立一個政府了，這個政府已贊成和英國妥協且正在逮捕國民黨左派及共產黨人。所有這些話都證明是帝國主義者的向壁虛構。……被帝國主義報紙「推翻」的廣州政府現在事實上愈益強大了……』（註二十二）

一九二六年末，這一駝鳥政策交給共產國際的最高機關來考慮，共產國際的最高機關關於中國問題通過了一個決議，這個決議案下文將見分曉，牠一點也不提及廣州的三月事變或這一事變的結果。共產國際上層希望藉這種沉默來隱藏三月政變的意義並使中國共產黨人易於順從（中國共產黨是由共產國際在華代表就近指導的）。

鮑羅庭曾一度北上，在政變之後，在五月十五日國民黨中全會之前遄返廣州。有個眼光銳利的外國觀察者當時已和蔣介石若干最親近的顧問有關係（而且他後來也服務於蔣介石政府），他於事變後數日抵廣州。據他的叙述說：『俄人似乎相信萬事皆休了。許多中國共產黨人都躲起來……反共派歡天喜地……鮑羅庭與蔣解決爭端。蔣想知道俄國在北伐中，對他幫助到什麽程度。鮑羅庭從前曾一貫反對北伐。蔣對聯俄延續之態度視鮑羅庭對北伐之態度而定。他們得到一致意見了。俄人一定支持北伐。聯俄的政策仍繼續維持。共產黨人恢復原狀』。（註二十三）

據另一個記實說，『後來蔣與鮑羅庭的關係愈益和好了，』（註二十四）而且五月十五日國民黨會議的一切決議均『受鮑羅庭完全贊成』。（註二十五）據更進一步的記載說：自委任蔣爲總司令後，所有授給他的緊急權力均同樣授給『鮑顧問』。（註二十六）無論如何，這却是一個事實：鮑羅庭及追隨他的中國共產黨領袖，毫不猶豫的屈服於三月二十日政變所造成的軍事獨裁。鮑羅庭甚至還順從蔣的意思，把一批俄國軍事顧問撤換，代以更易駕御的同

僚，因為這批軍事顧問在軍隊間平等貢獻他們的意見和分配物質的援助，而並非特別經過蔣，故他們已惹起蔣的不歡。這次事情出乎蔣介石的意想之外，不用很大的困難便完成了。他於是毫無悔意的翻過身來對付若干曾幫助他舉行政變的右派陰謀家，把他們逐出廣州。他現在越發要用左的外套來掩蔽他的領導了。他的右派同僚溢返上海了。等到他再次用得着他們的時候，他能夠而且一定要召喚他們回來的。

凡是從莫斯科官僚方面得到政治上的鼓勵和報告的歷史家，他們通常都只用幾段話來交代三月二十日政變，把這次政變的意義完全隱瞞起來或加以曲解。正當這次政變發生之時，莫斯科甚至無恥的抹殺牠的意義，牠自然希望寫歷史時不注意這一事實。例如，魯易・菲些耳便把三月二十日的結果寫成如下的話：『但蔣的著名特性不是勇敢，他分明為他自己的行動所驚嚇，他於是寄……一封謙卑的信，哀求鮑羅庭立即南返。……』鮑羅庭回來時，蔣『百般辯解。……他問鮑羅庭，他應當怎麽辦？『準備北伐』，鮑答說。那末，正『因為鮑羅庭想修補三月二十日政變所造成的傷害（！）』，『蔣才計劃第二次政變……這一次是反對右派……』

他往下寫道：『但是鮑羅庭，左派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為什麽不排除蔣介石呢？』『因為他們太薄弱了……』他學着鮑羅庭的口氣答道。『他們雖有廣大的羣衆同情，但他們在廣州却沒有充分的力量來克服蔣介石及擁護蔣的資產階級……雙方面都知道，他們之間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但與其現在從事於流血（而只有廣州軍閥才能從這一流血中獲勝），他們還不如默默贊成把問題拖延到他們抵達長江之時。開始北伐的提案在五月十五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上通過。在這次會議上，每一派把意見坦白直陳達到這個地步：『諸君呀，我們知道我們一定要互相搏鬥的。但我們需要一個更廣大的用武力之地。讓我們把算帳的日子延

緩一下吧，此刻讓我們走向一個共同的目標吧。』（註二十七）

非些耳隨便將五月十五日通過的其他决議置之不提，而這些决議却是束縛共產黨的。流血果眞是延緩至他們抵達長江之時了，但三月政變，五月决議以及共產黨之投降牠們，已事先保證了將來流的一定是工人的血了。所謂『共同目標』就是資產階級對羣衆運動的勝利。鮑羅庭在這裡被描寫得彷彿很想將來和蔣介石鬥爭——而準備這一鬥爭的方法則是事先把一切武器交給他似的。如果偏要說蔣介石有什麽特性的話，那就是爲了他本階級（資產階級）的利益而施行打擊，施行痛烈打擊的本領。史大林——布哈林——鮑羅庭之流對於工人的利益就不可同日而語了。中國共產黨人執行他們的命令，迫得要投降，甚至要匍匐於國民革命運動底新主人之前。★

蔣介石藉口共產黨人密謀舉行他們自己的政變，遂實行了三月的政變並執行了五月决議案。不錯，在廣州有直接反蔣的陰謀，但不幸共產黨却連想也沒有想過這一類事。在牠心裡沒有什麽事情比一九二六年三月組織工人階級暴動那樣生疎。蔣和他的右派助手製造共產黨『陰謀不軌』的謠言，他們所根據的就是局勢本身的邏輯呈現給他們的材料。他們——並非共產黨人——瞧見工人階級的組織蓬勃生長，瞧見牠的武裝糾察隊，牠的戰鬥精神以及牠的力量，

★關於三月二十日政變，還有一個特別露骨的歪曲歷史的例子，這可從前任沙皇軍官V·A·治剛妥夫的著作中尋出，他數年前毫不困難的混入史大林的陣營中。據治剛妥夫說：『(政變後)不到兩個月，「右派」和「中派」爲了博得羣衆的擁護，迫得妥協起來，一致向「左派」作許多讓步……因此，五月各派和協起來，而蔣介石便成了國民黨的領袖及革命軍的總司令。』——參閱V·A·治剛妥夫著：俄國及蘇聯在遠東第一五一頁，一九三五年出版於紐約。蔣因爲要做廣州主人，竟『讓步』和『妥協』！

他們懂得牠當時是能夠奪取和掌握革命運動的領導權的。因此，懂得幹的時候已到來的正是他們，不是共產黨人。當他們立即幹起來時，再沒有人比得上共產黨領袖那樣震駭，那樣痛苦，那樣委屈，他們竟被控犯有計劃舉行工人階級進攻之罪。

中國共產黨總書記陳獨秀寫道：『第一、……共產黨若不是一個瘋子的黨，當然不會就要在廣州建設工農政府；第二、蔣介石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的一個柱石，共產黨若不是帝國主義者的工具，決不會採用這種破壞中國革命勢力統一的政策；……共產黨的政策，恰恰和右派所宣傳的相反，不但主張廣東革命的勢力不可分裂，並且希望全中國的革命勢力都要統一，不然無對敵作戰之可能。』（註二十八）

陳獨秀在六月四日給蔣介石一封公開信裡，更進一步的爭辯着說：『……正當英日吳張反動勢力大聯合，攻破北方國民軍之時，復在廣州陰謀倒蔣，這是何等助長反動勢力，這是何等反革命！介石先生！如果中國共產黨是這樣的一個反革命的黨，你就應該起來打倒牠……如果是共產黨同志中那一個人有這樣反革命的陰謀，你就應該鎗斃他，絲毫用不着客氣。不過我知道我們的黨並且相信我們的黨中個人，都沒有這樣反革命的陰謀。』（註二十九）

蔣介石於三月二十日不久之後，在一篇演講辭裡提起某一共產黨員的一句話，來證明這種思想存在於共產黨人心中，這個共產黨員說的那句話就是：『我們團體裡有一個段祺瑞，要打倒北方段祺瑞，就要先打倒這裡的段祺瑞。』於是這位作過這次演講的共產黨員趕快給蔣介石一封公開信，解釋他所指的是『思想上的段祺瑞』，亦即舊封建思望，又解釋因他講的是普通話，不是廣東話，他的原話給翻譯者弄錯了。『……我不但沒有詆毀先生的言論，自信因爲國民革命而愛護先生的言論，實在是到處公開的。……曾記三月二十日事變以後，我……會見先生……當時很誠

懇的對先生表示我們始終信服先生的態度，先生若果眞以同志相待，應該開導我，或是見我有什麽不對，更應當聲色俱厲的責罰我，使我好曉得改過，先生却很平和的輕輕答道：「沒有什麽！沒有什麽！」爲什麽現在竟加我以『詆毁中傷』「有旁的用意」的罪名？』(註三十)寫這封信的人就是高語罕，他不是一個無名小卒，他是共產黨的領導同志，他同時還供職於國民黨的監察委員會。

當三月二十日政變碰到委屈的否認和叱責之時，五月十五日中全會的决議却毫無問題的被接受了，共產黨人尋求各種不正當的手段來把牠們說得有條有理，並加以辯護。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致國民黨的一封正式信說：『帝國主義者見之（即指『黨務整理案』）或且疑爲貴黨已中其奸計而自破革命戰線，表現右傾……然貴黨之出此，或者認爲與本黨合作之方式，歷年以來，迭次引起黨內一部份人之疑慮與猜忌，……故必須先在合作方式上有幾種之改變，袪除一般無謂之疑忌，然後决然肅清內部，打擊反動派，方能整齊革命之戰線，以全力對待帝國主義軍閥之統治與壓迫乎？果若此，則與本黨合作改策並無所謂根本衝突，此原則爲何，即團結革命勢力以抗帝國主義，不問其團結及合作之方式爲何也。果若此，則吾兩黨聯合之根本精神，不……稍減……貴黨「黨務整理案」原本關及貴黨內部問題，無論如何决定，他黨均無權贊否。』(註三十一)五月二十六日，共產黨嚮導週報（註三十二）的一位廣州記者寫道，五月十五日中全會『既有團結革命分子與反動派戰鬥的宣言，又非根本推翻與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合作的政策，』且『單是這一中央會議的黨務一案，還不足決定民黨中央的右傾，』故此，『共產派認淸革命的現時形勢，要求極鞏固的極澈底的革命聯合戰線，他們在此地對於民黨中央的新決議案的態度，便以此爲標準。民黨中央會議中的共產系 (Fraction)，……對於民黨內部組織問題……毫沒有什麽爭執。』★

這種諂媚政策在共產黨下層並非暢行無阻的。在上海，有一批同志要求黨立即退出國民黨，他們宣稱在五月十五日國民黨中全會造成的情形之下，共產黨人不能有效地工作了。上海中央委員會與廣東黨組織均極力反對這一本能地正確的無產階級要求。廣東委員會（後來比較上海中央更『急進』）認爲『退出國民黨就等於放棄廣大的工農勞苦羣衆，放棄革命的國民黨旗幟給資產階級。這就是莫可補償的損失。這個時候應該採取暫時讓步的政策以保留在國民黨之內。』（註三十三）

但黨的領導機關雖於三月二十日之後奉共產國際的命令，執行了投降的政策，牠也開始覺得必須修正黨的路線。要求恢復獨立的呼聲已傳播到這個程度，甚至連陳獨秀也寫信給共產國際，提議以國民黨外之兩黨聯合來代替國民黨內之工作。（註三十四）一九二六年六月共產黨中全會當眞把這個意見做成决議通過了。牠馬上受到共產國際嚴厲的叱責，但在共產國際內，托洛斯基領導的俄國反對派也已經開始同樣的提出中國革命的問題，設法使中國共產黨人脫離國民黨底窒死人的壓制。有一篇正式文章，幾及一年之後才第一次暴露三月二十日的政變已將中國的民族運動放在國民黨右派的支配之下，這同一篇文章也同樣第一次揭露中國共產黨人曾要求他們的自由，並揭露這一要求曾奉令『改正』。甚至中國共產黨提議在國民黨內部組織左派——這是一個驚人的暴露：原來所謂左派甚至還沒有自己的派別組織——也同樣遭到叱責，爲的是要執行這一政策：『領導整個國民黨向左走並使牠獲得一個穩定的左派政策。』（註三十五）

在中國，鮑羅庭堅决壓制中國共產黨內部主張採取獨立政策的傾向。他宣稱：『目前是共產黨人替國民黨做苦力的★這篇報告的作者趙世炎命定要忍受『絲毫』沒有討論資產階級進攻的後果。一年之後，他壯烈地死於蔣介石劊子手之手。

時期！』（註三十六）退出國民黨的提議橫遭壓制，因爲這次提議等於『放棄革命的國民黨的旗幟給資產階級。』但資產階級却並沒有等待共產黨人。三月二十日之後，國民黨的旗幟牢牢的握在他們手中，而羣衆却從來沒有料到這一點，只好讓之異日突如其來的，悽慘的碰到牠。中國共產黨人竟不去站在偉大工農組織（共產黨人在這些組織的領導機關中佔優勢，而廣東政府也仍然依賴牠們的力量）的前頭，在階級鬥爭戰場上進行反資產階級的戰鬥，他們倒還迫得僅僅去做奴隸式的辯護。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政變暴露出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個強有力的羣衆運動的驚人現象，這一運動竟毫無痛苦的被迫離開自己獨立發展的路線，被放到其階級敵人的領導和支配之下，且因爲受了牠自己的領袖欺瞞，對這件事還茫然無知，這些領袖猶曉曉置辯說，他們從來沒有夢想領着羣衆離開資產階級的指導。

還是虧得這一點，資產階級代表才能夠仍以『革命領袖』的資格出現於羣衆面前，在他們和共產黨人之間，很少有什麼明顯可見的不同了。一九二六年五月，蔣介石出席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這次大會有五百個代表，代表四百個工會和一百二十四萬有組織工人，在這一百幾十萬工人中，有八十萬自去年五月以來曾參加過兩百次以上的政治和經濟罷工。（註三十七）蔣以騙人的客氣，自稱爲兄弟。他以純粹犬儒主義的態度來感謝工農，因爲他們於一九二五年曾在東江和粵南戰役中盡過決定的作用。他說：『在這個時期內，工農大衆……促成國民黨的統一，肅清一切反革命派並鞏固國民政府之基礎。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工人和農民已能夠用他們自己的力量來反對帝國主義，而毋須依賴軍隊的力量！』（註三十八）

蔣介石竟敢向中國工人說出共產黨所不敢說的話：工人能夠依賴自己的力量來鬥爭並百戰百勝。他可以用『世界革命萬歲！』來收束他的演辭，並在共產黨人的聲音與所有

其他人的聲音混合在一起的歡呼中步下講台。他現在可以進行準備北伐，因爲他心裡已有了把握：羣衆運動尙可爲他利用。爭取支配權的預備戰，沒有引起資產階級一點災害便結束了。老實說，這不是一幕戰鬥，只不過是一幕順利排演的陰謀吧了。虧得共產黨的退却和屈從政策，牠正在羣衆鬥爭的戰場之外發生過了。有組織的工農只須共產黨人一號召便一定已把他們的法碼投入他們所屬的天平盤中——對抗資產階級，——但他們現在却被人召去參加北伐戰爭，他們參加北伐乃處在保證資產階級獲得勝利果實的環境之下。北伐軍於七月向北進發，牠們乘着新的革命浪潮的高峰很快就勢如破竹，連戰皆捷，這一革命浪潮有如激流一樣淹沒江西，湖南和湖北，把幾千百萬新人捲入鬥爭，不久便吞沒武漢和上海。

同時在廣州，三月二十日政變的後果已令人感覺到了。資產階級從秘密的陰謀變成公開的鎮壓。廣州共產黨人的『暫時退却』成了一條永遠不盡的長途。七月二十九日，蔣介石的總司令部宣佈戒嚴令。公衆組織，集會，報紙，工農義勇隊，一切均受軍事當局節制。三天之後，又一條命令下來：『在北伐期間禁止一切勞工騷亂。』當局雖表面上超然事外，但牠已動員廣州的流氓加入『中央工會』了。對革命工人的進攻發展到街頭上。

工人們突然從外表的平靜（這是他們的領袖撫慰他們的）中驚覺，拿着武器，棒子，竹桿，小刀，間或拿着一枝手鎗和步鎗，起來自衛。經過六天的巷戰，有五十餘工人遇難。八月九日，當局頒佈一切勞動爭議均由政府執行強迫仲裁的條例。禁止工人携帶任何種類之武器，又禁止工人集會，結隊遊行。一道警察命令道：『北伐期間任何擾亂後方之企圖均視爲反革命及叛黨之行爲。』軍隊的巡邏隊控制各街道。『中央工會』的會員奉召去破壞一個印刷罷工，這個罷工已使全市出版界停頓了。工人代表會，這個代表十七萬廣州工人和店員的革命組織恫嚇着要舉行總

罷工。但他們的恫嚇拖延太久了。牠終沒有實現。廣州工人經過連年鬥爭從僱主方面奪來的幾點小小的勝利品，又失掉了。毒辣的包工制曾使工人降爲工頭的無告的奴隸，且曾在廣州被部分的廢除了，但現在又恢復起來。公共的弊害（如官准的烟賭窟）又重新繁昌起來，官家『敲搾』的苛捐雜稅也駕乎國民革命以前時代的捐稅而上之。（註三十九）

在廣東農村中，三月二十日政變是地主向叛變農民發動惡毒攻勢的信號。一九二七年二月廣東省農會作一報告，列舉許多攻擊農民，殺害農民領袖，搗毀農民協會的案件，這種進攻，一九二六年六月開始發生於廣東，以後一直到該省的革命的農民運動被消滅之前，從未終止過。但就是在這個報告的字裡行間，農民運動的共產黨領袖尙繼續掩護這次反攻的眞兇。牠說：三月二十日事件『確實沒有影響我們國民黨的政策。但貪官汚吏，土豪劣紳却利用牠來散佈謠言，如稱：「農民協會被解散了」，「國民黨中止農工政策」……五月十五日中全會通過之提案只是充分處置國民黨內務問題，但不法地主，貪官汚吏却據此來推斷政府將要解散農民協會，又推斷國民黨已放棄農工政策。』（註四十）地主及其奴僕正確地學取蔣介石政變的榜樣。農民從來沒有懂得，地主對他們施行攻擊是完全『合法的』，三月二十日政變已確乎把農民的叛亂排出國民黨『合法』的範圍之外了，雖然農民的領袖尙那樣手足無措的依存牠。這同一轉變又使省港工人罷工毫無結果的終結。

三月政變不久之後，解決這次大罷工的談判又重新舉行。這種談判曾於一月間停頓下來，因爲當時英國絕對拒絕香港工人的要求，而廣州政府也堅主牠只能充當香港當局與罷工工人的中介人來談判。一九二五年六月在罷工伊始，新成立的國民政府曾要求交還沙面租界及撤退廣東海面一切外國軍艦。香港工人曾要求言論出版自由，要求有選舉

中國代表參加香港殖民地政府之權，要求改善工人生活，禁止童工，施行八小時工作制，並要求收回定於是年七月一日普遍增加房租的成議。

英國已拒絕一切談判，當罷工和抵貨繼續下去時，牠高踞在香港山上大發雷霆。一九二六年二月四日香港總督宣稱：「只有受布爾什維克陰謀教唆的廣州罷工委員會的非法活動，才阻止省港在舊時親密的基礎上恢復正常的關係。我們希望而且要求廣州政府完結這些非法行爲。我也希望牠清楚的了解，香港將在原則上永不贊成償付罷工費用或賠補不復職工人的損失。」（註四十一）督憲大人發言之後，不過短短的幾個星期功夫，他所希望和要求的終於來到了。蔣介石的三月政變在廣州造成的轉變，已令人們有可能在「舊時親密的基礎上」恢復關係了。

四月九日，香港的非正式接洽又重新舉行，香港政府的檢察長坎培君與廣州外交部長伍朝樞搓商，據官方描述，此次搓商爲一種「由衷之談」。（註四十二）中央執行委員會五月全體會議休會後數日，廣州政府又正式邀請港方重開談判。英國欣然贊成。雙方代表於七月會晤。省港工人原來的要求，雙方都不贊成了，陳友仁現在已接任外長，他說：「這些要求乃是在六二三屠殺案之後的非常環境中擬定的，我政府爲博得滿意解決之忠誠的願望所推使，準備把牠們所包括的條件，加以重新審定，使得其中再沒有甚麽與華貿易強國之一——英國之榮譽和利益相違反的，免得解決路上繼續受了障礙。」（註四十三）現在問題已不是償付工人罷工期間的工資。而是由英國貸給廣州一千萬元，條件是：「在廣州政府直轄的領土內，完全停止抵貨及其他一切反英的表示。」（註四十四）中國代表甚至不再假裝代表罷工工人利益。罷工委員會要求在這次談判中參加意見，蔣介石下令「廣州公安局長制止工會干涉目下進行中之省港會議。」（註四十五）

在談判期間內，軍警巡邏市中各要道，且嚴密監視工會領

袖，「制止工人中的任何運動，蓋此種運動將產生一種見解，以爲國民黨不能控制廣州局勢，並以爲和國民黨談判解決罷工……將屬徒勞無益。廣州罷工委員會尙要求：如果不准牠參加現在進行中的談判（這一談判與工人有重大關係的），也應聽一聽牠的意見；據一般人了解，如果雙方沒有異議，整個會議的次委員會可在某些問題上聆取工人代表的意見。廣州華人已抱有這樣的見解，認爲在七月十五日雙方代表……會見之前，整個問題已在國民黨領袖及蔣介石將軍之間決定好了，他們看不出在工人中有任何煽動足以改變旣成的政策。他們之靜聽罷工委員會的意見無非是一件客套事而已。」（註四十六）

「客套」歸工人，一千萬元歸蔣介石！這不算是一宗倒霉買賣。但談判却無結果而終，因爲廣東政府不復替工人說話，而事實上牠也和英國人一樣急於結束罷工，這件事一表明出來，牠的搓商地位便立即破產。因此，英國退出談判，於九月三日，一隊英國海軍陸戰隊肅淸廣州西隄各碼頭的工人糾察隊。陳友仁對這種行爲提出抗議，要求「現在寄泊於長隄的英艦退回沙面附近之通常拋錨所。」（註四十七）這與撤退廣東江海一切英艦的要求相去太遠了！但罷工和抵貨的後盾已遭打破。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廣州政府無條件的宣布停止罷工和抵貨。國民黨及罷工委員會解釋此舉乃時勢所需，蓋「國民革命的權力和影響伸展至長江已引起全國形勢的變化」了。這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十五個月鬥爭，沒有使領導這次鬥爭的工人們的要求得到半點滿足便草草了結了，這樣草草了結還稱「不是失敗而是偉大的勝利」哩。（註四十八）

鮑羅庭解釋說，「或者是帝國主義應該投降中國，……或者是中國承認失敗。但旣然失敗是不能加以鼓勵的，那末，爲了在全中國——在更大的基礎上，用更大的力量反對帝國主義，了結這個角落的戰鬥便成了必要。」（註四十九）失敗是不能「加以鼓勵」的。牠必須合理的化成勝利。

重要的時機和決定的地位久已不經一戰的讓之敵人了，但把這件事加以隱瞞是必要的。香港的罷工和抵貨已給一個獨立的工人階級的遠景廣開門戶，且已無可比擬的證明工人們爲自己利益而活動的才能。但在共產國際和鮑羅庭的教導之下，中國共產黨人已毫無感覺的讓機會錯過了。省港工人一定得用高價來償付這一「勝利」。

罷工和抵貨自動取消之後，香港總督喜氣洋洋的宣稱，「我們可以很有理由的希望，廣州當局目下將作堅決的努力，以重建法律與秩序。」香港渴想在兩廣見到「一個强大，穩固和開明的政府；我們應樂得做這一政府的密友和堅定不移的擁護者。」（註五十）十二月國民政府遷都長江，在廣東重建「法律與秩序」的任務便交給桂系軍閥李濟深，他已攫得充分統治權了。對付工人的嚴厲的警察手段已實施。强迫仲裁一切勞資爭議，禁止工人領有或携帶武器，禁止工人擅自捕人及糾察廠店等一批緊急法令也頒布了。（註五十一）

爲了答覆這些手段，糾察隊及其他工人志願軍「奉工人代表會（這個大會是受共產黨指示的）之令，目下在他們的立場未重新確定之前，深居簡出。」（註五十二）共產黨人本來在鼓動改選參加各省國民黨組織的代表。但他們現在急於取悅李濟深，便突然把這種鼓動停止了。（註五十三）當李濟深實行改組，委派他自己的私人充任一切要職之時，他們不發出半句抗議。他們絲毫沒有致力於有組織的抵抗這種反動的進攻。廣州被軍閥緊緊的拑制住了。共產黨人的投降也完成了。（註五十四）

埃爾・勃勞達，譚曼尼和約圭・杜里奧合組的共產國際代表團於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七日抵廣州，當時廣州的情形恰好正如上述。他們視察一下那尙殘存的，受獨裁者李濟深束縛住的羣衆運動的外殼，李濟深告訴他們說：「國民政府永遠不會違反工人階級的利益的。」（註五十五）他們致電慰問蔣介石，蔣又回電以示歡迎。（註五十六）他們

給國際報紙的第一個報告深以身居「革命的廣州」為榮，沒有半點提到衝突之事。（註五十七）他們在香港糾察隊參加大罷工遇害者的墓前獻花圈，上面附有這樣的題句：「香港糾察隊烈士象徵中國工人階級貢獻於中國革命及世界革命之偉大捐助。」（註五十八）

六個月之後，在事變久已自行發展之後，這個代表團才用如下的話來寫及牠訪問廣州的情形：「北伐正盛極一時，廣州商人聰明的利用聯合戰線的口號，來免除他們替工人階級負的義務……廣州無產階級的若干領袖碰到資產階級這種聰明和蠱惑的策畧，竟弄不清他們的政策……（他們）漠視了……無產階級的基本的階級利益，為的是害怕破壞和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彷彿嚴格遵守一切反帝和反軍閥底「聯合戰線」口號的唯一階級，就是無產階級及其革命領袖似的……這無疑是一個錯誤，這個錯誤後來使中國工人階級耗去重大的犧牲和不少的血。」（註五十九）

第六章 從廣州到長江

第六章　從廣州到長江

國民黨移師北向，實行以自己的政權來代替其他軍閥的政權。牠出師並非反帝　，而是和牠妥協　。羣衆們受了欺騙，相信國民黨的勝利一定會澈底改變他們的生活狀況和一般民生——共產黨人根本沒有嘗試去打破他們這一點盲信——於是他們澎湃起來，把北伐軍捲到長江流域去。

勝利是飛快和驚人的。武裝力量只不過補助一架龐大的宣傳機器，這架機器勢不可當衝向前去，牠解放出來的力量，宛如一列爲步兵開路的坦克車一樣，推倒一切敵人。吳佩孚及其盟友的僱傭軍隊遇到這一進攻，弄得手足無措和癱瘓起來。一位目擊當時情形的外人敍述說：「一個本地的間諜機關……正在等着幫助開進來的軍隊，可靠的嚮導可以隨時應需服務；在某些情形中，軍隊尙未抵達之前數日，各城鎭已由小羣（！）熱心家……用國民政府的名義……佔領了。」（註一）在實際戰鬪中，只要有農民部隊參加的地方，衝突總是最兇猛的。鐵路和電報工人使敵人交通停頓。農民間諜把所有敵人參謀部的秘密供給挺進中的國民革命軍。

唐生智是湖南一個軍閥，他是首先投入國民革命軍的人們之一，他於七月十二日佔領長沙。數星期之後，北伐軍在長江的岳州城遭遇北軍的抵抗。平江農民及粤漢，萍株兩路工人的獨立行動已替北伐軍肅淸了道路。農民嚮導把北伐軍帶到北軍不知道的淺水灘，使他們能夠渡過長江一個支流，從後方抄攻岳州的防軍。廣州某報欣然報道說，「

敵軍驚爲天降。」(註二)十二小時之後，八月二十二日淸晨，國民革命軍進佔岳州。國民革命軍會師於漢水、長江交流處之三大城，——漢陽，漢口和武昌，漢陽兵工廠的工人罷起工來。北方衛戍軍狼狽退出該城，國民革命軍於九月六日佔領漢陽，兩日之後佔領漢口。武昌衛軍據守該城的堅墻厚壁將達一月之久，後來由著名的「鐵」軍担任攻破。十月中旬，國民黨的旗幟已牢牢豎立於長江流域的中心地了。

此時，蔣介石在東方經江西推進，旣少驚人成績，勝利亦少。蔣已限制宣傳機關的活動，且已隨着軍事的進展，採取鎭壓羣衆運動的手段。這一點使五省督辦孫傳芳能夠舉行頑強的抵抗。蔣介石的進展旣如是遲緩，他於十月遂畧畧放鬆宣傳的限制，事情便進展得比較迅速。南昌終於佔領了，十一月五日蔣的軍隊到達長江岸邊的九江。

北伐軍的勝利與羣衆運動的廣大擴展相配合。在湖南，十一月末，工會從五縣發展到四十縣，會員從六萬增至十五萬。在武漢，在國民革命軍佔領兩個月之內，已有三十萬以上工人和店員參加兩百多個工會，這些工會均統一在湖北總工會的旗幟之下。在工人看來，國民革命軍的勝利就是用戰鬥力量來改善窮苦的生活水準的信號，這種生活水準是中外僱主迫使他們屈就的。武漢受一連串可怕的罷工震撼。(註三)

更足驚人的就是農民運動的增長。十一月來，湖南有五十四縣組織農民協會，登記會員總數有一，〇七一，一三七人。一九二七年一月，這個數目已超過了兩百萬。(註四)農民最先要求減租，廢除苛捐雜稅，及要求武裝反對鄉紳。鄉政多數落在農民協會手中，而且在湖南很快便採取從拒納一切租稅以至公然沒收土地的步驟。

十二月國民政府從廣州遷至長江，正好處於這種情境中。勝利的氣燄與羣衆運動的飛黃騰達使「左派」的動搖的小資產階級政客暫時吐氣揚眉，脫去蔣介石耀武揚威於廣州

時迫使他們表現的寒酸態。他們在羣衆樹立的政府講臺之上，高視濶步，傾出激烈辭句的激流。但他們碰到階級鬥爭的現實，却退縮下來了。不久，小資產階級急進派的傳統的呼聲像哀號一樣在政府各委員會的辦公廳內響起來——『羣衆走得太遠了！』

漢口資本家碰到罷工浪潮，加以頑強的抵抗。十二月三日，總商會大肆恫嚇：如不立即採取限制工人鬥爭的手段，則宣佈總罷市。鮑羅庭，共產黨領袖及他們的國民黨同僚趕快應允。三天之後，成立一個仲裁機關，俾『承認合理的（？）增加工資，勸告各業循例（！）規定工作時間，實行改善工人的社會待遇，且將僱用及解僱工人之權完全留在僱主手中。』（註五）這個機關的人員由國民黨，總工會和商會的代表合成。牠的决議將『約束僱主和僱員雙方。』此外尙計劃實施勞工立法：規定每月最低限度工資爲十三元——這個規定雖然可憐，但始終未實現——同時，又禁止工人干預『管理及僱傭』事宜；『但如果情形於工人顯然不利時，他們可提出抗議。』（註六）這就等於成立一個強迫仲裁的制度，共產黨人會一貫在原則上反對這種制度，蓋這種制度的目的在耗竭工人階級的創意力，敗壞其組織的戰鬥力，且一般的使他們背離武勇的階級鬥爭的方法。

鮑羅庭及武漢的國民黨急進派同樣想逃避農民運動的責任。他們避免規定一個農民要求的具體政綱的工作。甚至國民黨民十三政綱規定的二五減租也從未實行過。人們倒還悲嘆農民的『過火』，而且普遍的害怕農民走得『太遠』，足以傷害各階級的聯合戰線。北伐時期提供了一個無比的機會，使我們可以從資產階級的影響，從蔣介石在廣州所建立的資產階級領導中解放羣衆。但共產黨領導機關却不抓住這個機會。牠倒還去買好國民黨『左派』的那些軟弱無能的資產階級急進份子。在上海有三位較有批判頭腦的共產國際官員，他們於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七日寫一封

信給莫斯科，這封信把共產黨領導及共產國際代表的政策，繪成一幅動人的畫圖：

『直至一九二六年十月，無論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或中國共產黨中央都始終沒有採取多少認眞的方式，把……農民問題……提出來，有之亦不過是中央六月中全會的決議而已，這道決議完全緩和農民的鬥爭並號召和「正紳」聯合……到了十月，一個農民要求的政綱已擬出，但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和黨的領袖一樣只把牠視爲一個提交黨大會的政綱。經過三四個月的時間，這個政綱沒有出中央大門一步，等到一月才把牠發給地方組織。但直到如今，黨關於農民問題的策畧，實質上一點沒有改變。壓制農村鬥爭以及應用制動機於整個農民運動：這一舊路線尙佔優勢……畏懼農民運動的心理曾經存在而且現在仍留在黨中。農民實行領有土地（即由農民佔領土地），中央稱之爲「一種危險的左傾幼稚病」。牠不斷的空談「和正紳及中小地主聯合戰線反對土豪劣紳」。（十二月三十日湖南報告）。「正紳」的字眼當時發現於一切黨的文件及重要同志的文章中。這樣用道德範疇來代替社會範疇實際上就等於停止農村中的革命運動。

『十二月中全會有國際代表參加，通過了一道關於農民問題的決議案。在這個決議案裡找不出半句話涉及土地政綱及農民鬥爭。這個決議案對於當時最迫切的問題沒有半點答覆；農民政權的問題是以否定來答覆的。牠說，農民政權的口號千萬不要提出，以免嚇跑小資產階級。因爲漠視農民革命，結果黨的領導機關便停止農民武裝……

『黨在工人運動中的策畧與牠的農運策畧無異。首先，黨對牠就估計得非常低且缺乏注意。中央沒有工會部。一百萬以上有組織的工人沒有指導的中心。工會脫離羣衆，多分尙爲上層的組織。政治和組織工作到處爲强迫所代替，但最重要的事情還是：改良主義的傾向在革命的工會運動內外生長起來了……拒絕支持和防衛工人底經濟要求的事

情也發生了。因爲害怕工人運動的初步增長，黨在廣州贊成强迫仲裁，後來在漢口也幹出同樣事情（强迫仲裁的觀念本身就出自鮑羅庭）。黨的領袖害怕得特別大的就是非產業工人的運動………

『中央在十二月中全會中報告說：「決定我黨關於中小資產階級的策畧，在我們看來是異常困難的，因爲非產業工人及店員的罷工只是小資產階級自身內部的衝突。兩方面（即僱主和工人）都是民族統一戰線所必需的，我們不能支持雙方，我們也不能守中立。……在生產生活必需品（米，鹽、煤、柴等）的商號中，僱員如有一分可能用和平方法取得讓步，便千萬不要訴諸罷工。」

『因此，黨便放棄了對非產業工人，即，中國工人階級之大多數的保護和支持，且拿與小資產階級聯合戰線的必要來掩蓋這一點。想不到事情却非常明白：成問題的與其說是小資產階級，尤其是手工業者，還不如說是商業中等資產階級……黨的領導也害怕武裝工人……

『周恩來同志在他的報告裡，表明黨對軍隊態度的特色。他對黨員說：「走入國民革命軍去，鞏固牠，提高牠的作戰能力，但在那裡不要進行任何獨立的工作。」直到最近，在軍隊中還沒有核心。我們充當政治顧問的同志，只是忙於替國民黨做軍事和政治工作……

『我們的同志希望藉助於種種拉攏和反對等，來維持軍隊中的均勢，但他們却從沒有想起去奪取牠……國際代表特別激昂的否認在軍隊中做政治工作的可能性。十二月中全會通過一道决議，要在軍隊中建立核心（當然只限軍隊的上級長官，在兵士中是禁止實行這一决議的），又在是年一月，當其他俄國同志（已不是第一次）提出在軍隊中工作的問題時，V・同志（附註一）已嚴厲表示反對核心的組織。他先是告訴M同志（附註二）說，莫斯科已决定不

（附註一）衛金斯基。

（附註二）曼達利安(Madalyan)

成立核心，隨後他便指出組織牠們之不可能；第一，因為軍隊的上級長官，尤其是蔣介石一定把牠看成共產黨人的陰謀詭計，這樣就會把關係弄殭；第二，廣州軍隊是不易從下面受影響。當有人提議吸引工人及共產黨員……同時吸引農民及農會會員……大批加入軍隊時，他用種種藉口把牠（提議）棄置一旁，他宣稱誰也無法把他們弄到軍隊裡，這件事是永無什麼結果的，現在也沒有徵募新兵的事情，等等。而且，因為他不敢在原則上成為武裝工人問題的反對者，他便找出累千困難，指出武裝工人是不可思議的，我們不能在任何地方找到武器等。

『而且，有幾打連長和幾個團長是共產黨人，他們有很大影響，以外還有一團人是共產黨的，經過所有這些線索可以進行龐大的工作。但是由於害怕使軍隊革命化（若干黨的領袖是充滿這種害怕心理的），在軍隊中工作的一些孤立的同志竟離開了黨，變成了「個人的」共產黨將官……雖然國際代表經過一番長期抵抗之後終於答應我們，必須把黨的軍隊工作加以改組，但他後來一點也沒有實現這一改組。我們甚至還不曉得他是否向中央提過這件事。』（註七）

在上引的話裡，這幾位官吏批評家小心翼翼的避免說出鮑羅庭和衞金斯基只是在中國執行史大林和布哈林在莫斯科所指示的政策。受鮑羅庭和衞金斯基監督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牠的致命政策是共產國際所採取的路線的無可挽回的結果。一九二六年三月，恰當蔣介石政變的前夜，共產國際第六次中全會已批准工農與資產階級的聯盟，且保證後者得到無產階級的擁護。三月二十日政變之後，牠故意隱匿廣州政權轉入蔣介石庇護的國民黨極右派手中的事實。後來不久，蘇聯共產黨的政治局贊成（只有托洛次基一票反對）蔣介石的國民黨以一個『同情黨』的資格加入共產國際。（附註一）

托洛斯基寫道：蔣介石『準備充當一個劊子手的角色，他

渴想得到世界共產主義的掩護——他果然得到牠。』（註八）

一九二六年十月，莫斯科史大林——布哈林的領導機關通電中國共產黨人遏抑農民運動，以免趕跑那些領導勝利的北伐的將軍。等到碰到事實時，(註九)史大林後來承認曾拍發過這一電報，更可注意的就是他自認這是『一個錯誤』，不過他趕忙補加一句話說，牠於數星期之後已『取消』掉了（註十）。這個『取消』包含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中全會的指示中，這個指示用空泛的字句，更小心的着重指出土地革命對中國反帝鬥爭之重要性。但同時，他們藉複式簿記之法（這種記帳法現在在共產國際中已成慣例）替中國共產黨人擬就一個詳明和具體的政綱，這一政綱要求中國共產黨人愈益要遏抑幾千百萬農民底動亂的蠢起。

公開言論與實踐的裂隙是共產國際底機會主義的結果，牠抽象地公開承認無產階級政治獨立的原則，但牠却具體地實現投降資產階級的政策。史大林，布哈林之流在他們的充滿空話和狡猾的决議案裡，把這些正相反對的要素統一在一起，而且把他們表現成儼然一個統合的整體。等到他們的實踐招致不幸的時候，他們就往往可以引證他們的公開言論，而諉過於他人的實踐。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共產國際第七次中全會通過之中國問題大綱(註十一)認爲『大資產階級之逐漸放棄革命在歷史上是必不可免的』。當需用一些引證來證明共產國際『預見』和『預言』每一件事時，這句話後來便愈用愈俗。但牠原來時的下文却包含如下幾句：『這並非表示資產階級整個階級已被逐出民族獨立的鬥爭之外，因爲甚至大資產階級的某一部分在某一時期內尚能夠與中小資產階級一起接近革命……無產階級當然應該寬大的利用資產階級這些層份，

（附註一）蔣的私人心腹邵力子以國民黨友誼代表的資格參加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的第七次國際中全會，證明國民黨在國際內取得黨員資格。

因爲祂們目前尚積極幫助反帝和反軍閥的革命鬥爭。』這個大綱警告：『資產階級』正設法『摧毀革命』，但密切注視中國眞實事變的工人却無法在這個文件的字裡行間找出半句話把這一可怕的『警告』翻譯成與中國事變直接有關的人名，日期，政黨和地點。『摧毀革命』暗指具有一種極端具體性質的活動。誰在摧毀牠？在什麽地方，什麽時候，又怎樣摧毀？關於這一點，這個大綱沒有提過半句話。蔣介石到底如何？三月二十日政變，廣州工人的受鎮壓，在廣東省和蔣介石北伐軍後方對農民的屠殺到底如何？所有這些事情，都沒有一句話，沒有一個字談及。這個大綱毫無解釋，毫無思索的包含一句話，提到這一事實：『工農運動，即在廣東省也曾經必須要克服許多困難。』中國共產黨代表譚平山在他的報告裡，神秘地指出『今年廣州的三月事件』是『資產階級方面想向無產階級奪取革命領導權的企圖』，但假如官方紀錄可靠的話，他從沒有第二次提起這句話，其他任何人也沒有提過。（註十二）史大林於十一月三十日親自向中國代表保證說，『大資產階級極度薄弱……中國農民領袖的責任一定不可免要落在中國無產階級的手裡，中國無產階級較之中國資產階級組織得更好，而且更積極。』(註十三)共產國際各支部及牠們的代表竟相信人們給他們的保證：『資產階級』雖然也許要設法『摧毀』革命，但蔣介石正使牠（革命）不斷勝利。當蔣的私人代表邵力子以國民黨友誼代表之資格現身於講台上時，他們給他一頓狂風暴雨的大喝采，且起立唱『國際歌』來慶祝他。邵——紀錄中稱爲邵『同志』——『以國民黨名義』宣稱『我們期待共產國際及牠的一切附屬黨的支持……共產國際萬歲！世界革命萬歲！』這種熱心是難以形容的。（註十四）

史大林完全曉得蔣介石軍隊的進展已等於在廣州和許多城鄉，對罷工施行流血的鎮壓，破壞工會和鎮壓農民運動，（註十五）但他談到蔣介石的北伐時，仍然說：『廣州軍

隊的進展等於對準帝國主義打擊，對準其中國代理人打擊。牠又等於一般的替中國一切革命份子，特殊的替工人們取得集會自由，罷工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在中國並不是非武裝的人民反對他們本國政府的軍隊，而是武裝的人民採取革命軍的形式（來反對政府的軍隊）。在中國，武裝的革命正在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也是其優點之一。

『最重要的，』史大林往下說，『並不是廣州政府的資產階級民主性質（這個政府形成未來全中國革命政權的核心）。最重要的事情還是：這個政權是一個反軍閥的政權，而且這個政權的每一步發展總是對世界帝國主義施行一個打擊，因此，又是有利於世界革命運動的一擊。』（註十六）

『資產階級』確乎『不可避免要放棄』革命，但牠的主要代理人蔣介石却是『武裝革命』的英勇的領袖，而牠的主要代理機關，廣州政府却是反軍閥和反帝的閃耀的鎗尖，牠『雖然具有資產階級民主的性質，但實質上和客觀上却包含無產階級，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底革命聯盟的革命的民主小資產階級獨裁的萌芽』。（註十七）還有比這更使各國共產黨人，尤其是中國共產黨迷失方向和糊塗混亂的麽？

第七次中全會的大綱關於土地革命說出大胆的話來：『土地問題……是目前局勢的中心點……不勇敢的解決土地問題，不支持農民羣衆底全部政治經濟的目的，這是革命的一個眞正的危險。如果因爲害怕失去一部分資本家階級底不確定的和不守信義的合作而不把農民運動的政綱放在民族解放政綱的首位，這是錯誤的。』（註十八）

這大概就是十月通電的『取消』，這個通電曾命令壓制農民，其目的正是想使資產階級底『不確定和不守信』的合作能繼續不斷。但是檢查一下這次新的勇氣，不過數行之後，該大綱便宣稱：

『雖然認爲中國共產黨必須宣佈土地國有爲無產階級農民政綱的基本要求，但在目前，牠應視中國領土各不同部分底經濟和政治的特性來區分牠的土地策畧。』

替中國共產黨人擬就的具體的農民政綱，原來發現有這種隱伏的限制。共產國際一點也不跨越國民黨的自由改良政綱，牠要求減租，調整稅收，信用借欵，政府支持農民組織和武裝，『沒收廟堂寺院土地和屬於反動軍閥的土地。』當史大林談及無產階級的政綱式的要求及提出產業國有的口號時，他暗示同樣的『策畧的區分』。他立刻補充說：『這件事首先提出某些企業的國有化的問題，這些企業的業主是以對中國人民特別仇視和特別冒犯著名的。（註十九）

這句話又把中國已通用的『正』，『劣』紳的範疇再生產出來。牠把牠們擴大而爲『反動的』（是『進步的』的對稱吧？）軍閥，和『特別仇視的』（是『友誼的』的對稱吧？）產業工人剝削者。這種機械論調在這裡只是簡單的用來完全『取消』上述那個大綱的冠冕堂皇的激烈主義，同時又隱蔽（但只是畧微地隱蔽）共產國際對資產階級的投降，共產黨人奉令去支持農民的『全部』要求——而農民也已經在要求土地。但同時共產黨人又要局限於鼓動僅僅沒收『反動軍閥』的土地。國民黨勢力一旦伸展到每一個地方暴君的地盤，這個暴君便立即加入國民黨，這不是事實麽？他於是成了『武裝革命』的一部分，而他的土地照理也成了不可侵犯，跟着所有他的黨羽，他的親戚，他的擁護者——亦即他治下所有地主的土地均成了不可侵犯了。當廣東，湖南和江西的農民伸手去奪取土地時，他們已發現這一點。共產國際在上述大綱中又批准保障『軍官的土地』，這成了土地革命的一個圈套。牠受了共產黨人支持之後，又成了保護整個地主階級的主要支柱。

這種『土地革命』就是蔣介石也樂於擁護的。邵力子『同志』對中全會說：『蔣介石同志（同志！）對國民黨的黨

員演講，宣稱假如中國革命不能正確的解決土地，亦即農民問題，牠就是不可思議的了……我們相信國民黨在共產黨及共產國際的領導之下，將完成牠的歷史任務！』（註十二）

蔣介石相信在『共產國際領導』之下，國民黨將『完成牠的歷史任務』，這是一個可怕的眞理。只要這領導把中國共產黨人及羣衆們一道縛在資產階級及其政府戰車上，這一點是不能有半點懷疑的。上述的大綱也着重說明這一點。全部政綱是經過而且由國民黨政府來完成的。這個大綱說：『共產黨任務就在於監視廣州政府實施這些手段，作爲土地革命更進一步發展的一個過渡。』出乎意外的，這個大綱承認『自該政府產生以來，牠已實際握在國民黨右派的手中』，但隨後牠又補充說：『最近的事變指出共產黨人必須參加國民政府，支持左派去和右派底薄弱的（？）和動搖的（？）政策鬥爭（？）。『最近的事變』——又是不加說明——已確實證明『左派』是公然侵犯底和強有力底右派的薄弱和動搖的俘虜。命令共產黨加入這一政府且使他們拋棄他們自己的強有力的獨立攻勢，只不過使他們始終做『左派』的唯命是聽的俘虜吧了。

一切政權歸國民黨政府，而且毫無疑問的服從牠！布哈林在列寧格勒黨大會裡說：『實際上所謂新奇的事就是：現在中國革命已具有一個中心，這個中心已組織成一個國家政權。這件事有莫大的意義。中國革命已經經過了人民大衆反對現政府的發展階段。中國革命當前階段的特色便在於這一事實：革命力量已組織成一個國家政權，這個政權具有一枝正規的，有紀律的軍隊。……這些軍隊的進展，他們的輝皇的勝利……是革命進程的特殊方式。』（註二十一）

人民大衆已無須作反『現政府』的鬥爭。現政府尙代表城鄉剝削者的利益，牠的將軍們已在鎭壓羣衆運動，但這是『革命進程的特殊方式』。譚平山不自覺的總括這個雙關

論調：
『我們必項保障農民的利益，但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維持和鞏固國民革命運動的聯合戰線。在這樣矛盾的局勢裡，維持一個正確的策畧路線是不容易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完全採納布哈林同志的觀點：發展中國的農民運動，同時又在反帝的國民運動中，維持人民中一切階層的聯合戰線。』（註二十二）
這就是和解不能和解之事的企圖。『發展』農民運動而仍舊保持與資產階級的聯盟是不可能的，假如這一『發展』做出牠的邏輯的結論——沒收地主土地的話。人們強要中國共產黨人騎兩匹背道而馳的馬，而在俄國反對派和中國內有人發言，稱這件事是做不了的，便立即遭受叱責了。史大林及中全會的其他發言人嚴厲的打擊中國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的要求。『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史大林說。（註二十三）米夫是後來史大林派的主張『民族統一戰線』的老手，當他偶然重溫一下列寧的提綱，提議在中國農村中創立蘇維埃之時，史大林粗暴地叫他嚴守秩序，他趕快退縮。
第七次中全會决議案談及『非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及『土地革命』，但牠却定立一個政策，這一政策所根據的並非工農的利益，而是這些利益的犧牲，而犧牲這些利益的苦衷就是顧全與中國資產階級的投機聯盟。不惜犧牲一切保存這一聯盟，這就是共產國際駐華代表，是漢口的鮑羅庭和上海的衛金斯基所負的任務，他們的見解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硬化於階級合作的模型中。他們並沒有教中國共產黨人信賴幾千百萬羣衆的力量，毅然走入工廠和田野中，這幾千百萬人在一九二六年末數月間已從事反對他們底剝削者的鬥爭了。
農民運動的驚人生長，配合着一九二六年全年在一切重要產業中心發生之無比深入和緊張的罷工浪潮。不完全的紀錄指出一九二六年罷工總次數爲五三五，一九二五年則爲

三一八。有一百萬以上工人直接捲入這些罷工中。多數罷工是經濟要求的鬥爭，如增加工資，改良工人生活等。牠們中半數以上是完全或部分勝利的。一位調查者光是根據那些有充份材料可援的罷工，估計百分之四九・七〇是全部勝利的，百分之二八・〇一是部分勝利的，只有百分之二二・二九是失敗的。(註二十四)這些統計不言而喻，中國工人正空前未有的抬起他們的頭。是年末，罷工浪潮已超出經濟要求的平面，走到公開政治鬥爭的平面。漢口工人只藉驚人的一擊便把反帝鬥爭的方向操縱在自己手裡。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下午，在漢口英租界的邊界上發生一次大示威。英人腦際尚新鮮留着一九二五年五卅的記憶，他們於翌日自動撤退他們的海軍陸戰隊。國民政府的領袖們受街頭示威所驚嚇，較之英人更甚，他們贊成於海軍及義勇隊撤退之後，担任巡守英租界之責。一月四日下午，工人復集合於租界邊區。他們『發現租界只由他們本國人巡守，又發現牠並沒有眞正從英人手收回，於是嘩然大呼「現在奪回牠吧！」……幾隊苦工動手把租界週圍的障碍物撤除。堆在租界一切馬路入口處的沙包都破開，沙粒撒在街道中，袋子拿走了。鐵絲網通通移走，所有其他障碍物都撤除了……在英租界的街道上，外國人的日子完結了」。(註二十五)隨着發到上海及外國去的電報，轟傳着『暴徒』焚掠搶刼的消息。事實上，一般目擊其事者也迫得承認，勝利者『在租界通衢大道上歡欣鼓舞了一兩日，對外人也有幾宗侮慢和恫嚇的事；但沒有幹出人身侵犯的事，房屋也沒有被闖進的。』(註二十六)

兩日之後，九江英人在羣衆行動的威脅之下，趕快撤離該城，九江英租界結果也同樣被收回了。而同樣關於暴行的消息也遍傳起來。六個星期之後，一位著名的英國記者，阿爾梭・蘭辛訪問九江，視察幾間『受侵害的』房屋，這些房屋是特別封存以待調查者的。他寫道：『這次搶刼在我看來，似乎是極無效果的，樓板舖滿扯破的紙頭，這一

定是外人準備離家時留下來的；沙發椅及床褥的角頭破裂了……家具很少破壞，窗戶沒有動，甚至一盞極簡陋的徒有其表的掛燈也沒有破壞，這盞燈假如是我就把牠摔碎了……看到這件事是很奇怪的：那天（一月七日）下午六點，有十五個人（兩個男人，其餘是婦人）……從牯嶺下來，道經中國街道入租界，而後落船，沒有受什麽困擾。』（註二十七）

漢口收回英租界是漢口工人的自發行動。三位共產國際官員在他們從上海寄發的信中寫道：『沒有一個人預見一月三日的事變。漢口工人之佔領租界是自發的，並未受政府，國民黨，或我黨的任何領導。他們通通都猝然碰到羣衆的自發行動所造成的既成事實，而且他們通通都不得不去對付牠。』（註二十八）

就帝國主義者而言，尤其是就英人而言，漢口事變所盡的作用是促成他們向羣衆運動退却的政策，這一政策在一九二六年的期間已開始出現。這一政策有雙重的性質。牠的第一個性質就是作種種讓步，這些讓步足以引誘中國資產階級建立一個新基礎來共同反對羣衆的行動。但這一點是伴同武力的誇示和應用的，而武力應用之目的就在提醒中國資產階級，使牠知道帝國主義的特權不能也不會不經一戰而放棄。這一政策將威迫和利誘結合起來。一九二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列強簽訂一個合同，規定交還上海會審公廨於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實現。簽約之後，不過數天功夫，英國的炮艦便無情的炮擊長江萬縣，爲了報復一件小小的船務爭執，竟使手無寸鐵的平民罹受無妄巨災。這件事令人猛醒：原來『炮艦政策』尚繼續有效。

遠在十二月，當國民政府遷都漢口之時，英國閣員，米爾斯·藍辛勛爵已派來漢口，他負的正式使命是尋求可能的妥協途徑。日美政府也同樣派遣特別外交代表和武漢政府交涉。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英政府鑒於在華英人的又驚又怒的狼狽狀態，把一通備忘錄諮送一九二二年華盛頓

條約的其他簽字國，提議逐漸取消外人的條約特權。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英政府又以同樣的建議公平的諮送於北京，武漢兩政府。同一星期，美國國務卿宣布他的政府決意參加妥協談判。依照這一政策，英國政府承認漢口的既成事實，且進行談判，結果簽訂了二月十九日及三月二日的陳歐（歐梅萊 O'malley）協定，這兩個協定規定把漢口，九江兩租界交還中國政府管轄，這一屈服在其他通商口岸的英國僑民看來，彷彿是世界末日來臨似的。（註二十九）但他們尙感滿意的就是新來的軍隊和軍艦。帝國主義者用一隻手撫愛，另一隻手則準備打擊。武裝干涉的威脅已臨在中國資產階級的頭上，但帝國主義者尙希望他們的中國寵臣齊心協力去摧毀羣衆運動，而他們的主要戰畧就以此爲目的。

漢口的小資產階級政客曾爲工人的勇氣所驚嚇，當他們驚魂已定之時，英國底退却和讓步的奇怪現象又使他們振作起來。他們欣然參加談判，且陡然爲陳歐協定所眩惑。他們慶祝此舉爲陳友仁的『外交勝利』。但其實使強有力的英國低頭的却是漢口的卑微的苦力和他的同志。

共產黨領袖也呆然若失了。『共產黨中央怎樣響應漢口的事變呢？首先，牠一點也不想響應……中央的意見認爲激怒外人和小資產階級是不必要的』。(註三十)又：『漢口工人之奪回英租界……不僅於實現時沒有經過黨的領袖承認，就是事後，中央也認爲此舉是不正確的』。(註三十一)但一月三日事變的心理上的影響到底使武漢左派領袖對蔣介石的態度強硬起來了，雖然這也只是暫時的。蔣已駐足於江西的省會南昌，右派領袖均來此歸附他，而黃郛和王正廷之流的拉線人也奔走於此，想拉蔣與日人聯合，且甚至想經過張作霖的秘使楊宇霆的斡旋以促成蔣張聯合。蔣的眼睛盯着上海，因爲上海是買辦制度的首要經濟和根據地，又是中外金融資本的堡壘，在未奪取這個具有現成基金，且直接接近大資產階級的重要中心地之前，蔣介石陰謀

把黨的支配權操縱在他自己手裡。他要求政府的所在地應在南昌。他要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他的監督之下開會於南昌。他甚至於一月十日匆促赴漢提出他的要求。但該地的小資產階級急進派（包括鮑羅庭）此刻因爲受了對英勝利及他們後面羣衆運動底力量所鼓舞，他們便有足夠的勇氣給蔣以冷遇。甚至鮑羅庭在蔣出席的宴會上也說了幾句有所指而發的，提及爭權軍閥的諷語，他覺得有點兒大胆了，他『立即驚惶退縮』，說：『我害怕我犯了一個錯誤……我們之攻擊蔣介石這由一般輿論的壓迫喚起的，我不知道我做的是否正確。』（註三十二）

蔣匆遽離漢。回到南昌之後，他公開宣布他立意消滅共產黨人。他於二月十九日演講道：『同盟會（國民黨前身）之所以無法建立一個有秩序的共和國，就是因爲牠的隊伍太多性質不同的份子，無法合作。有……反動和反革命份子妨碍工作。這些人現在仍然太多。旣然他們不是眞同志，現在是開除他們的時候了……在我們當中不應再有異見和派別！我旣然與孫文學說的忠實信徒見知於世，我就有權利說，每一個眞黨員應該就是孫文學說的忠實信徒。誰違背孫文指示的目的和方法就不是同志而是敵人，敵人不應留在我們中間』。（註三十三）三月七日蔣又發出一張傳單，這次是攻擊鮑羅庭及其他俄國顧問的，但尙言明仍繼續維持與蘇聯的友誼。他說：『並非（俄國的）政策要苛待我們，雖然牠的代表已行爲不軌，侮辱我們的每一運動，我仍相信這與俄國無關，（這些）只是代表們的個人行動罷了』。（註三十四）蔣將風傳他與奉系及日本談判的謠言歸罪於『一二個人』，他認爲這『一二個人』心懷惡意，想損害他的革命貞潔之名。

三月十日，武漢急進派召集國民黨三中全會於漢口，他們的勇氣表現在這次會議的決議案中。鮑羅庭及其同僚在會中通過一批提案，這些提案紙面上決定蔣介石一年前獲得的權力歸還於正式黨機關。從前授予蔣的緊急權撤消了，軍事

委員會也重新成立。蔣介石『辭去』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職，中全會幷把主席一職也廢除，以表示反對集中太多權力於個人手中。同時又通過決議，整頓國共兩黨的『合作』，邀請共產黨選派『負責同志參加國民政府及各省府』，分担政治責任。又決議『第三國際，中國共產黨及國民黨的出版物在報告及互相批評之時，不要破壞合作的精神』。（註三十五）

關於共產黨的決議，再加上任命兩個共產黨人爲新政府的農工部長，其目的在特別地和自覺地將原來束縛工人政黨於資產階級國民黨的繩索拉緊。國民黨領袖是完全明白這一點的。官方的國民日報解釋道：『目前的合作計劃是重要的，因爲牠表示國民黨對一切參加國民革命的力量，握有更大的支配權……共產黨將必須完成牠的義務，使黨（國民黨）及政府能對羣衆運動行使充分的支配權』。（註三十六）

這些決議案都實施了。關於蔣介石的決議仍然是寫在紙上的無益空言。共產黨人承認武漢小資產階級急進的權威。蔣不承認而武漢也不敢攻擊他。當報紙到處謠傳國民黨的分裂日益增長之時，武漢的急進派及其共產黨同盟者拚命否認國民革命的隊伍有任何嫌罅。武漢的領袖宣稱，『軍事機關自願而且樂於將一切政治職權交還於黨……黨和軍隊是意見一致的』。提及分裂的謠言，他們說這是『一種純粹的虛構。』（註三十七）據說，黨上峯的變動是在大家一致贊成中進行的。國民新聞社報告說：『目下已完全一致贊同所有更變。似乎成爲此次更變對象的個人及團體……目下已表示贊同』。（註三十八）

這種黑暗中的嘯聲完全與蔣介石的戰畧相調協。他尚要進抵上海。他尚要成立和鞏固他的新同盟。只要他滯留南昌，他尚不願公開破裂。他一旦安處於黃浦都會中，他一定照他自己的條件，與武漢分裂。他在江西已對工農領袖及共產黨人施展恐怖手段。報紙幾乎每天報道他和奉系談判

『南北妥協反赤』，這就是他傾向分裂的先兆。但在武漢方面却認爲『危機已過』並宣稱國民革命運動『不受內部分裂的絲毫挑撥所阻，仍能前進。』（註三十九）

『我黨中央怎樣幹……呢？人們一定以爲牠在羣衆當中發動一次廣大的運動……來揭發這次衝突背後的秘密動機和暴露那些包圍蔣介石的陰謀者，並以強大的壓力加於政府和鮑羅庭，使他們不要把這次衝突假裝爲個人的衝突，又使他們根據一個社會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的政綱，推動羣衆，因爲這樣蔣介石就一定會迫得根據一個固定的政綱來迎戰(假如他願意迎戰的話)——這件事一定給他生出很大困難。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國際代表長時期「不注意」這次衝突，且關於這件事沒有採取一個立場……我們再說一遍：黨的領導機關在南昌——武漢衝突中，兩個月不贊一辭，不做一事。……中央只是潔身自保，避免答覆局勢提到牠面前的問題。黨在湖北的地方組織沒有等待中央的決議便自行冒險，圍繞着這個問題，發展一個運動。』（註四十）

三月十八日陳獨秀終於公開承認這個局面，但他也只限於責備蔣介石的攻擊武漢鮑羅庭。他把三月十七日上海某日文報的標題引下來：『南昌公開宣佈親日政策；拒絕承認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的結果；決意排除鮑羅庭』。陳獨秀敦勸：蔣應否認這些日人的謠言，而且不應『怪責他自己的同僚』。他寫道：『因此，我們的義務………是誠懇勸告國民革命的領袖蔣介石將軍，立即在口頭上和行動上證明所謂南北妥協反赤只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策劃。』（註四十一）

北伐軍進抵長江與羣衆運動的驚人湧起已使國民革命運動的階級矛盾發展到爆發點。蔣介石正公然直趨上海，到該地和帝國主義者談判。這個時候只有藉更嚴酷的砍頭之法才能將羣衆運動驅開。這就是所謂南昌——武漢衝突的眞正根源。但武漢的急進派仍舊以他們一紙議案的勇敢自慰

，認爲危機已過。共產黨人則只是設法『誠懇勸告』那位犯錯的將軍。這些爭執都小心的隱瞞着羣衆，尤其是隱瞞那些握有危機之鑰的上海工人。他們不知警戒，不知準備，先是成了蔣的走卒，後來又成了他的犧牲品。

第七章　上 海 暴 動

第七章　上海暴動

在上海，工人們已掀起一個無比深入和富於戰鬥性的罷工浪潮，來響應北伐軍的勝利。在一九二六年期間，據一個官方的調查，在上海有一百六十九次罷工，波及一百六十五家廠店，包括二〇二，二九七個工人。在這次罷工中，有八十二次或百分之四十九·六四次是全部或部分勝利的。另一個官方統計則列舉二百五十七次罷工，其中有百分之五三·八九是全部或部份勝利的。（註一）

是年銅幣價值的不斷低減引起生活費的劇烈上昇。工人的生活狀况也因之惡化。罷工的要求大都不出增加工資，召回解僱僱員，開除不法工頭，反對無理開除，罷工期間工資照發，償付或增加米貼，減少或規定工作時間，改良工廠設備，工房、飯堂及一般工人待遇，廢除體罰，發花紅，釋放被捕或被監禁工人，工作時受傷賠償費等。其他不斷反覆提出的要求也就是上海產業中一般狀况的明證，這些要求例如免費受醫，生病期間工資照發，學徒發工資，星期日停工，工資到期即發，女工於分娩期間應發一個月工資，禁止用童工代替成年工，養老金等便是。

這些罷工鬥爭是在軍閥及外國當局極野蠻的鎮壓的狀態之下進行的，牠們中半數以上也是在這種狀態之下取得勝利的。上海總工會處於非法的地位活動。很少罷工是沒有連帶發生被捕和武力壓迫工人的事情的。但這種手段對罷工浪潮的影響極微。國民革命軍佔領武漢和九江，上海的羣

衆運動染上更直接的政治色彩。工人們準備依照自己的辦法來干涉事變，以便從政治上謀解决他們的問題。

十月，孫傳芳一個部下在浙江舉行了一次流產的叛變，這件事遂成了十月二十四日上海第一次暴動的信號。浙江叛亂失敗了。上海暴動（共產黨讓紐永建領導的國民黨機關來發動這次暴動）便被孫傳芳的走狗相當輕易的壓服了。這次並未號召總罷工，也沒有動員全體羣衆起來行動。紐是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委任官，又是蔣介石的親信，他負了雙重任務：一方面擾亂孫氏後方，俾有利於蔣；另一方面限制共產黨人之影響和活動。十月二十三晚，浙江叛亂失敗的消息傳到上海。紐不守信約，竟乾脆逃避那原定於翌日舉行的暴動。幾隊共產黨工人的小隊伍於當晚襲擊警署，但很快便寡不敵衆了。工人們當然從這次經驗中得出教訓，準備未來的更有效的行動。在十一月二十八日與十二月十二日的羣衆大會中，反軍閥和反帝的情緒很高漲，這幾次大會就是臨近的暴動底先聲。

在這幾個月中，上海的政局異常複雜。牠圍繞在一個運動的週圍，這個運動一開始本來是想鼓動上海區的自治的，不久便發展成爲蘇、浙、皖三省自治的鼓動。這一運動成了一切集團和階級政治活動的焦點。虞洽卿及江浙銀行團領導之銀行買辦資產階級，吳稚暉、張繼等領導之右派國民黨政客，黃郛、王正廷之流的職業陰謀家和說客，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麾下之流氓，紐永建領導之國民黨黨部，以及普通社會上無數的小人物，食客，蜂媒，職業操縱及營謀者，通通以這個運動爲焦點。甚至孫傳芳（這次自治運動大抵就是直接反對這位當地軍閥的）也染指於這一個自治的大餅。徘徊於近旁的就是奉系的特使，楊宇霆，他正想從中拉合張作霖和國民黨。拖在所有這些資產階級政客和操縱者的尾巴後面的就是中國共產黨和上海總工會，而工人及城市貧民羣衆却期望牠們來領導。（註二）

十二月孫氏軍事地位之惡化，使這一奇怪和混雜不堪的運

動歸於瓦解。孫氏於絕望中求助於昔日的盟友，張宗昌，張氏是一個山東軍閥而且在他的同類中還是最有名貪婪的。張的軍隊開始沿津浦路南下。上海的資本家聽說張將以十萬元不值錢的軍用票強迫他們兌現，他們均大驚失色。銀行界鑒於張宗昌的直魯軍佔領上海有引起紛亂之虞，故他們轉而注意蔣介石，他似乎是最中肯的候補者，能夠拯救他們於自下而來的工人及城市貧民的侵犯，及自上而來的山東軍閥的掠刼中。

帝國主義當局（英美人較日人更甚）似乎已覺得局勢的複雜一時不很易於了解。在一九二七年最初的那幾個星期中，他們的最流行的態度似乎是想保持和防護他們已有的邪惡，而不想忙着去管他們絲毫不知道的其他邪惡。因爲在外國商家，銀行家，軍人，領事和傳教師看來，這種摸不着頭腦的的不安靖，這些無窮的投鎗和飛矢（他們就是這些投鎗和飛矢的搖搖欲墮的靶子）彷彿是一個普遍兇暴的命運之神的打擊。他們分不清誰是兎，誰是狗。因此，他們用關閘和鐵絲網圍着他們的租界。海外一團一團兵和全部艦隊都調來保護他們，免遭意外。只有他們當中眼光最銳敏的（附註一）才從始便了解他們利益之所在亦即上海銀行家利益之所在，並照此而確定自己的方向。他們知道蔣介石是一個有政治頭腦的軍閥，他披着一件色彩甚多的外套。假如上海銀行家準備支持他，他們曉得他們也可以跟着照辦。只有上海的工人才障碍他們的交易成功。蔣一到來就會除去這個障碍。因此，二月間蔣的軍隊一進入浙江，一切有關係的人均把局勢弄得淸淸楚楚，只有工人和共產黨的領袖除外，他們猶以爲蔣是革命的英雄將領哩。國民革命軍於二月十七日佔領杭州，翌日進抵嘉興，離上海不足五十里。前鋒沿鐵路直薄松江，離上海僅二十五里。上海頓然緊張起來。總工會預料國民革命軍進展更近，

（附註一）如馬爾勞人之命運小說中的銀行家，費洛爾(Ferral)之流便是。

故下令於十九日晨舉行總罷工。工人們像機器一樣的準確響應這個號召。在四十八小時之內，三十五萬工人走出街頭。（註三）『繁華富麗的上海，頓變爲死氣沉沉的區域；全市電車停駛，輪船不開，郵局閉門，繁華的百貨公司停止貿易，一切大的製造廠停止工作。工場與作坊的汽笛回聲，喚不動一個工人入廠。』（註四）

工人們把鬥爭發展到街頭上。和警察開始發生衝突了。共產黨的領導不自行站在工人前面，倒還期望國民黨的代表來做政治指導。總罷工的口號只限於：『響應北伐軍！』『打倒孫傳芳！』『歡迎蔣介石！』甚至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也沒有了。底下就是共產黨中央委員之一，瞿秋白告訴我們當時中共中央的活動情形：

『……宣佈罷工並不是黨的正式決議。罷工爆發之後，牠並沒有被認爲暴動之第一步。不僅在小資產階級羣衆中沒有什麽政治宣傳，就是在工人間也很少人明白總罷工的方針和目的……

『雖然决定提出「召集市民代表會」的口號，但並不把牠看作一個號召一切工廠和工會工人選舉代表，邀請小商人派出自己代表的行動口號。也沒有想到使這個代表會成爲國民革命的一種蘇維埃，把牠變爲一個行動機關，在這個機關裡，凡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從武裝防守過渡到武裝暴動等問題均能討論。換言之，並沒有致力去把牠轉變成爲事實上的臨時革命政府。

『黨只是組織一個臨時革命委員會，由工人的上層代表及資產階級代表構成。因此，走出街頭的羣衆沒有機會參加工人代表與資產階級代表的「階級鬥爭」……自然的結果就是工人代表在每一個問題上向大資產階級讓步……我黨把羣衆叫出街頭，讓他們在那裡逗留三天，一點也不注意他們。我們不領着他們往前走，下令進攻，走向暴動。我們甚至還沒有進行防禦鬥爭。工人們奪取步鎗和鎗决叛徒大都是自發的行動……。

『我們幹的工作就是花全副力量和鈕永建，楊杏佛，虞洽卿，王曉籟談判——而這種談判只是想利用這各種各色（資產階級）集團間的衝突。這種策畧等於這樣：工人罷工起來，但在跨步前進之前，等着資產階級的俯允。小資產階級受了冷遇，沒有領導，沒有方向。我們希望保障勝利的情勢造成（即指鈕永建一方面與上海防守司令李寶章，另一方面與大商人談判的勝利結束）之後，我們希望這件事幹好之後，才來開始準備暴動，這在客觀上就等於出賣工人階級！』（註五）

李寶章和公共租界及法租界的巡捕沒有等待共產黨和資產階級談判的結果，便向工人報復。學生和罷工工人在街頭散發傳單，一被捕便當場砍頭和鎗決。罷工的頭一天，李便派他的大刀隊梭巡街道。罷工領袖被外國巡捕逮捕便移交中國地界處决。在租界和中國地界一樣，警察隊伍搜查行人和店舖，竟在街道上產生這樣一種恐怖的空氣，以致多數店舖，尤其是閘北和南市的店舖都停市了。華崗講及浦東(黃浦江對岸一工業區)有一個小販口呼『賣大餅』軍隊誣之爲呼『打敗兵』，即執而痛毆；以刺刀亂刺。兩個金屬業工人和一個電車賣票員因發傳單而立遭斬决。老西門有市民閱讀若干顏色小傳單，被大刀隊斬决。三個學生在曹家渡向羣衆演講被執，同樣的殘忍處死。被殺的確數從不知道，估計有兩百人。一位外國記者親眼看見這些殺人勾當：

『大刀隊將犧牲者的頭斬斷之後，他們把這些死人頭掛在電桿上示衆，或者放在大盤上遊街。這種慘象穿過熱鬧的通衢大道，結果產生一種眞實的恐怖景象，因爲犧牲者連審判的外表程序也不准經受的。處决發生於人烟最稠密之區。劊子手拿着大刀，伴同一隊士兵，把他們的犧牲者押赴一個顯著的角落，罷工領袖就在那裡被迫而引頸受戮，當死人頭插在尖頭竹桿上，高高舉起，帶到第二個處决的地點之時，成千成萬人都覺毛骨悚然』。（註六）

工人與軍警的巷戰發生於二十一日。工人無論在什麼地方一發現武裝便開始奪取牠們，在街頭上進行抵禦恐怖。當共產黨領袖終於規定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六時爲暴動時刻之時，小規模的戰鬥已發生了。這次暴動是預計響應國民革命軍之到來的，蓋每個人均相信牠們正沿滬杭路挺進。總罷工已維持了三日。工人的頭顱已落，鮮血流滿街衢。共產黨領導尙和鈕永建及其他資產階級代表在繼續談判。在這個期間內，國民革命軍從未離開松江。本來牠們進軍上海，路上並沒有什麼軍事障碍。牠們與上海的距離不過二十五里，而路上也只有少數士氣頹喪的北軍，於狼狽潰退回城時，掠奪各村。

國民革命軍停頓不前不是偶然的。蔣介石接到鈕永建一封電報，勸他『暫時停進』，(註七)蔣突然下令：在軍隊向南京及京滬路驀進中，停止嘉興——松江沿線的一切活動。軍事情勢完全有利於佔領上海，但蔣却慨然讓李寶章從容屠殺上海工人的領袖。這一點雙方都特別了解的。據消息靈通的密勒士評論報報道：『李將軍已設法加入國民革命軍，據報，蔣介石將軍亦已同意把他拉入……甚至風傳保守派的國民黨人並非全然不喜歡李將軍的流血暴行的，因爲這種暴行打擊黨底急進或共產派的權力，同時也打擊牠的頭』。(註八)數天之後，李得到酬勞，被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於是證實這一消息。(註九)

預定的暴動被流血的屠殺鎮壓掉了。街頭戰鬥一直繼續至二十四日，逐漸變得零星，後來終於完全熄滅了。這時，罷工的陣線也已衰竭了。多數工人被事變的轉變弄糊塗，已回廠上工。逮捕和處決仍然不絕如縷。一位外國目擊者補寫最後一筆：『……許多人因爲拿着「歡迎勇敢的北伐軍軍長——蔣介石」的傳單，被捕了。這些人也算是犯罪且立遭處決。』(註十)

儘管有總罷工的深度和廣度，儘管隨後又有野蠻的手段用來鎮壓暴動，儘管共產黨領袖仍然繼續混亂和動搖，但二

月十九至二十四日的事變却證明仍然只是一個更驚人底奇觀的序幕。災害是沈重的，但工人組織仍屹然未動，而工人們也學會如何去鬥爭。昨天的失敗並未摧毁他們，只不過鍛鍊他們去準備明天的戰鬥。但是他們的領袖曾經從這些新鮮經驗中學到點東西麽？二月十九日的總罷工已直截了當的提出了政權的問題。經過衞金斯基而接受共產國際指導的共產黨領導，『當暴動已經發生了，還在討論是否要舉行一個暴動』，又在工人鬥爭的時候來進行與資產階級作上層勾結。『結果，我們錯過了一個非常有利的歷史時機，一個非常的機遇。當政權在街頭上，黨不曉得如何去取得牠。更糟的就是牠不願去取得牠，牠害怕取得牠』，衞金斯基的僚屬給共產國際的信所寫如此。（註十一）他們把這次失敗與德國一九二三年暴動的失敗相比，但補加幾句話說：『只有這一點不同——在上海，無產階級有更大的力量來使用，而機會也在牠的一面。假如牠採取一種堅决的態度來干涉，牠一定能夠替革命征服上海，並把國民黨內部的力量關係加以改變。

假如這三位俄國代表相信二月的情形是如是，人們當然亟想知道他們對隨後而來的事變作何想法。二月暴動已失敗了，但他們發出那封信去莫斯科四天之後，工人們正要攫住一個更是非常順利的時機，而這一次，他們一定證明他們已經學會如何去鬥爭及取得勝利了。但共產黨領導機關受了牠和蔣介石的聯盟死死縛住，牠只會曉得如何轉勝爲敗。

在摧殘暴動之後兩個星期當中，張宗昌的直魯軍沿京滬線開下，取得上海區，孫傳芳狼狽向北退去。在外國租界內，帝國主義者添增衞軍，加強他們的鐵閘和沙包防禦物。二月末，滬上有七千英軍，一千五百美國海軍，六百日本海軍，此外尙有海軍陸戰隊來自黃浦江中愈來愈多的外國艦隊。更多的軍隊源源而來。二月二十五日，外交團發出一強硬聲明，牠宣佈採取『必要的步驟以保證租界的安全

及僑民的保護。』（註十二）

此刻軍事活動沿着三條戰線擴展。國民革命軍沿長江而下，佔領安慶和蕪湖並準備直薄南京 。第二支軍隊沿鎮江——蘇州線直迫京滬鐵路。國民革命軍集中的第三據點是上海西南，滬杭路上的松江。這一線自初步進攻，引起二月十九至二十四日的暴動之後，便沉寂下來，三月復趨活躍。蔣介石的一位桂系部屬——白崇禧緩緩沿線進迫上海。三月二十日晚，他進抵上海郊外的龍華。他就在那裡按兵不動，開始與魯軍防守司令畢庶澄談判讓國民革命軍『和平佔領』滬市。直魯軍完全軍心渙散，許多都已逃去了。但他們的主力（由白俄僱傭軍增援）尚扼守市內的戰畧地點。

龍華成了無數陰謀的焦點。鈕永建趨見白將軍。他獻計道：『停一日入城，畢庶澄就要投降。』（註十三）蔣介石下令該線：『勿攻滬。勿與帝國主義者衝突。停候。』（註十四）

市內工人却並不想停候。總工會號召於三月二十一日正午舉行總罷工，同時舉行暴動，並派代表趕赴龍華，請求白崇禧開動他的軍隊援助工人的進攻。他拒絕調軍。當工人們自動行動起來的時候，這些代表尚想法敦勸他。正午汽笛的回聲未休，就開了火了（註十五）

罷工是完滿的。實際上上海每一個工人都走出街頭了。他們的隊伍因爲店員和城市貧民羣衆的參加，驟然增漲起來。直接捲入此次罷工者在五十萬與八十萬之間。（註十六）暴動的計劃已小心擬定。牠以五千糾察隊構成的一支精練工人民軍爲基礎，這支隊伍再分爲二三十人的小隊。他們開始有一百五十枝毛瑟鎗。（註十七）這就是說一隊還派不到一枝。其他人則只携帶木棍，斧頭和小刀與警察及魯軍肉搏。

戰鬥在滬市七個地點同時發動：南市（包括法界的整個南部）；虹口（公共租界三面環繞的狹長地帶）；吳淞（黃

浦江和長江滙流附近之砲台區）；滬東（包括楊樹浦的廣大工業區）；滬西（毗連租界的另一工業區）和閘北（滬上無產階級人口最稠密之區）。

除閘北之外，在每一個地方，工人們在黃昏之前都已勝利地控制了警署和地方軍事機關。許多士兵和警察都脫去他們的制服，委棄他們的武器和軍用品。武器到處都可以得到，傍晚，糾察隊的襲擊隊伍已比較充分地武裝起來了。傢俱，箱子和凳子都拖到街頭上。大門也取下來建立警署週圍的障碍物。幾百間烟霧迷漫的小飯店忙着準備飯食，婦女們用碗盛着熱氣騰騰的飯送上前線。工人男男女女都在右臂上纏着紅布條，這就是新興無產階級軍隊的徽章。天晚，所有警察署都佔據了。電話局和無線電局也佔據了。電線也割斷了。

華崗紀載道：『南市……武裝動作開始時，先向警察廳進攻，二時許即完全佔領了。同時佔領了電話局。警察的一署三所，及一署三所第一分所，次第佔領。從警廳與各分署中，徒手的羣衆奪得了槍械。沿途的遊巡隊，在最短時間中，經羣衆繳械降伏。大隊由警廳進攻兵工廠。無激戰而降伏，四時完全佔領兵工廠。南火車站是時已無敵縱，被羣衆佔領；鐵路工人奪得火車頭往來運輸。五時到華商電車公司集合。廣大的南市區域，在四小時內便全部解決。

『虹口……無駐兵，只有警署。在時間上說虹口是首先被佔領的。虹口電汽廠與絲廠及金屬業的工人羣衆，當暴動開始時，最先發難，佔領警署，奪得槍械。逃散的警察，嗾使流氓與工人爲敵，時來襲擊工會，襲擊已被工人佔領之警署。因此工人糾察隊旣戰勝警察，復抵抗流氓之擾亂，以武裝鎭壓……』（註十八）

賀生（譯音）的紀載描寫此次虹口的特別事件道：『……逃散的警察發覺進攻者是共產黨人而不是國民黨員。他們便重新重合，在紐永建的領導之下反攻……因此巷戰再度

爆發。但結果工人獲得勝利……』（註十九）

浦東工人彷效軍隊編制編成隊伍，撲攻第三區警察署。這個警署差不多毫無困難的落入他們手中。潰逃的軍隊均被繳械。他們中許多人都參加糾察隊，成立臨時的工人保安局，他們又共同佔取全區的公共機關。國民黨代表率領一批流氓打手過江要求接管全區。他們通通被迫退回他們的小輪船，且唯唯奉令退回上海。

在吳淞，工人們已把軍隊擊潰，一部分兵士，因爲不知道滬市情形，趁淞滬車赴滬。他們至江灣附近，發覺鐵軌已被工人拆斷，蓋工人已預知他們的潰退也。兵士遂據守江灣，虹口，閘北三區鄰接的地點——天通庵車站。此時，吳淞的工人糾察隊已取得充分的支配權。

大約有五萬工人的先鋒部隊勝利地佔領楊樹浦之後，便開向閘北，與閘北的作戰工人會合，而兩區工人遂會同進攻天通庵站。

滬西事情的經過也一樣，工人佔據警署，奪得武裝之後，遂渡河會同糾察隊圍攻四區警署，經過一場劇戰之後，佔領之，是役糾察之總指揮及若干警察被殺。工人們遂集合力量，從各方面圍攻北火車站，北火車站居閘北之中，此處戰事最烈。

各處的抵抗已迅速失敗，武裝工人經過比較小的困難便奏勝了。但到晚上，戰事仍在工人階級底閘北的各要道中劇烈進行。張宗昌的白俄僱傭軍駕鐵甲車巡邏各要道，用機槍掃射工人隊伍。鎮守北站的一輛鐵甲列車也由白俄指揮，炮擊工人陣地。從北浙江路的租界隘口可以控制寶山路的全景，而工人之蜂擁進攻北站就從寶山路經過，駐守該隘口的英軍一窺見進攻工人行近時便立即開火，他們的藉口是『保護』租界。幾百魯軍獲准避居租界，後來又確實由租界當局遣送回山東原籍。

當下午滬東滬西工人擁入閘北之時，糾察隊的隊伍便大增，牠們便安然圍攻閘北敵人的六個要塞——北站，湖州會

館。商務印書館俱樂部，警察五區總署，廣東街分署，中華新路警署分所。第七個，同時也是最後的敵人陣地在寶山路的另一首，在天通庵車站。下午四時，各警署及湖州會館均已陷落。其餘三個中心：北站，商務印書館及天通庵處在等分閘北的一條直線上。武裝糾察隊則夾處牠們之間。商務印書館駐有幾百兵，擁有充分的機關槍和炸彈，完全受了包圍。在這三個地點，戰鬥繼續進行一個通宵。

『北站方面，敵人於晚間縱火圍攻………燒民房數百間。………糾察隊乃棄防線而救火，以水龍皮管，開自來水管猛勇撲救，卒至撲滅火勢。附近居民，義憤塡膺，對工人糾察隊感激至流涕，居民壯丁，以義憤所激，自願加入暴動。老者少者，自屋中取出木板磚石布袋，爲工人糾察隊佈置防線，建築障碍物。………敵人不敢進攻，惟時以排槍射擊；白俄人的鐵甲車，則時以大炮轟擊；英國帝國主義的鐵甲汽車，亦時時偸襲向工人射擊。……

『（三月二十二日）天明以後，敵人已覺困乏，糾察隊乃從各方面猛勇進攻。……至正午，天通庵車站敵軍解決稱降……下午四時半商務印書館俱樂部中敵軍，易便衣欲逃，被生擒，餘人願降……糾察隊總指揮處遂由五區總署移至俱樂部中。自此以後，全部武裝集中攻北站。

『但自上午起，北站敵人復用第二次火攻，延燒房屋無數；是時自來水管已斷，無從施救。糾察隊防線退至五次，但敵人亦不敢前進。最後各方隊伍集中後，猛攻一小時餘，白俄兵逃入租界，北站魯軍亦潰退……』

六時，北站上空飄揚着白旗。

國民革命軍第一師從龍華開抵麥根路之時，情形如上述。師長薛岳受了自己部隊的壓迫，終於不顧命令率軍來幫助工人。他趕到的時候，工人已幹完他們的事了。除了縮在鋼鐵絲網後面又恨又驚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外，整個上海都在他們手中了。寶山路，寶通路，中興路一帶，鞭炮

的喜慶聲及工人慶祝勝利的歡呼聲代替了來復槍聲。鐵路工會下令修復各鐵路。爲執行這項命令而組織起來的三百個工人的交通隊就是上海暴動勝利之後首先復工的一批工人。

第八章　浪 子 回 家

第八章　浪子囘家

當蔣介石早在三月廿六日（星期六）下午抵達上海之時，他終於囘到了家了。他的舊遊之所，他往日的恩人，他已往的掮客同僚，以及他的流氓知交均在此地。他是寧波人，他可以在這裡和他的同鄉，有勢力的浙江財閥，寧波的工商業家繫手，這些人與外人共同在經濟上操縱這個中國的大都會。

銀行家和商人已眼見罷工發展而爲總罷工，總罷工發展而成暴動。工人征服上海已給了他們一根槓桿，他們需要這根槓桿向帝國主義者索取價錢。但這一點也值得注意的：他們自行擺脫羣衆力量底危險武器的時候已到了。他們自己的利益之陷於危險不下於帝國主義者的利益。中外資本之間急須交涉的一個實際條件就是摧毀羣衆運動。他們久已曉得，他們可以希望蔣介石來實現這個任務，這個浪子現在畢竟囘到他們中間來了。

爲了這個目的，蔣已在長江流域和秘密會社恢復關係。這些秘密會社從滿淸初期起已在長江一帶滋生繁殖，現在以青紅幫見知於世。他們販賣鴉片和奴婢。他們綁票勒贖。他們搾財害命。從長江口到四川山巔，無論大小老闆商家都沒有不向他們納賄的。

青幫以上海爲活動中心。牠的老頭子就是黃金榮，渾名叫做黃麻皮，他是法界捕房包打聽的頭腦。一般人都相信，他曾親自介紹蔣，以一個上海防軍的青年軍官的資格加入

青幫的秘密隊伍。（註一）當蔣，這位國民革命軍的將軍於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抵九江的時候，黃痲皮便從上海溯江而上，代表上海銀行家和商人，重新建立關係。他們兩人會商的結果，把青幫動員起來，其公然的目的就是破壞工會。青幫曾經一度爲普通作奸犯科者的組織，現在却獲得俄國黑色百人團及魯易·拿破侖底十二月十日社的綜合特徵。楊虎是蔣的參謀之一，他負責做這項活動。（註二）建立對敵『工會』的計劃也擬妥了。現有通商口岸的廢物殘渣都迅速被徵募爲『會員』。武裝也準備充足。黃便回上海。蔣也回南昌，他的司令部就設在此處。

公開鎭壓羣衆組織的運動開始發生於一九二七年二月。遠在二月，贛州（江西南部一個城市）的總工會主席陳贊賢就被蔣介石軍隊槍殺了。這個工會被迫要秘密起來。三月十七日在南昌，蔣下令解散南昌市黨部，逮捕牠的共產黨及左派領袖，封閉工會和學生會，且禁止當地的黨報發刊。同日，在九江也對羣衆組織施行打擊。幾百個流氓（被稱爲『穩健工會份子』）搗毀總工會，市黨部，農民協會，學生和婦女團體及第六軍政治部。抵抗發生了：四人被殺，十人受傷。一個中國人的記載，敍述當時工人抵抗這些流氓，不稍示讓，一直等到蔣的一連兵開到，猛攻該建築物和釋放幾個已被俘虜的流氓才停止。（註三）一位外國的記載證實這件事，牠說，當『搗亂者看看就要戰敗之時，軍隊加入來，擊毀總工會的機關，完成他們已着手的工作。從此以後，』這個報告往下說，『該工會的領袖已失踪了，又據說，該工會也按照更保守的辦法來改組了。戒嚴令立即宣布，禁止集會的命令也發布了。平民不得……携帶武器……街道由軍隊巡邏，……暴亂之時，蔣介石本人就在九江，不過現在已赴長江下遊，據說他教唆……此次攻擊。在紛擾的時候，他置大批軍隊於租界以資保護……新市長因工人過激份子搗毀他的衙門，曾一度退居南昌，現在他已從南昌回來了，他身邊還帶着蔣介石精選部

隊的一百五十個衞隊。……蔣介石所代表的溫和黨的影響開始普及全省……潮流已確乎轉變了。』(註四)

蔣介石沿江而下，到處發生相同的事變。有組織的流氓於三月二十三日襲擊和佔據安慶的工會會址，(註五)一日之後在蕪湖也如法泡製。工人們被殺或被迫逃匿。他們的工會迅速被『改組』了。蔣介石本應駐足於南京，蓋南京已於三月二十四日被革命軍佔領。

但他大概已逆料某種計劃，因爲南京於被佔之日，竟發生搶刼和襲擊外人之事，鬧得天翻地覆。幾位領事館的官員和傳教師被殺了。英美炮艦立即炮轟該城，殺死十二個和傷了十九個中國平民。(註六)留在南京市的外人通通撤退了。若干外國新聞記者迅速製造一種說法，認爲此次『南京暴行』乃武漢共產黨及左派所製造的狡猾的陰謀之一部分，其目的在陷蔣於困難，使他和外人發生糾葛。但武漢共產黨人和國民黨『自由派』的全部戰畧却在於和解蔣介石，這一事實就足以暴露這個故事的荒謬。而且，已經席捲華南的廣大運動實際上却沒有過侵犯外人的暴行，這也是一件明白事實。工人和農民並不缺乏仇恨外國商家和傳教師的理由，他們在幾百個城市裡已籍沒教會財產並迫使許多外人逃跑，但是『只有在極少數的孤立例子中』，他們中之一個寫道，『一個外人才得到一點子微傷和血痕。』(註七)後來又有人暗指南京事件(據說在這個事件裡有強姦外國婦女之事，當然，這也是一種傳說，可是從未證實過(註八)是蔣本人造成的，這是故意挑撥反共的行爲。這種說法也同樣很少證據。關於這整件事的唯一可信的文獻就是一位外國調查者的陳述，他於事變發生之後數日抵達出事地點。他不受外僑的羣情激憤所蔽，集合透澈的和確鑿的證據，證明士氣沮喪的，狼狽潰退的軍隊是這次襲擊的眞兇。(註九)

因此，蔣不在南京駐足，繼續沿江而下上海。他一到上海便趕快趁汽車離開碼頭，駛過外人的障碍物直達法租界附近

祁齊路的交涉公署。在這個地方，他的第一個召見者就是黃麻皮。第二個召見者就是上海工務局政治部的T．派特勒克．基凡斯，他送交蔣一張通入外人區域的通行證，且允許他有携帶武裝衞隊遊行這些神聖區域的特權。（註十）蔣想不到是受優渥禮遇的唯一國民革命軍長官。蔣也同等慷慨，保證他一定『與上海的外國巡捕合作』，（註十一）且立即與他的助手和擁護者會商，討論『法律與秩序』如何能建立與維持。

他與吳稚暉，蔡元培，張靜江領導的國民黨右派『元老』會見。他又會晤銀行家和商會的代表，這些代表的首領就是他的第一個恩主——虞洽卿，王曉籟等。他和他的部下，白崇禧和周鳳岐討論軍事形勢，前者已佔領上海，後者則是一位新來者，他昨天尚和北軍一道哩。他會見黃麻皮及其重要助手——杜月笙和張嘯林，同時又會見一批名望較差的人和黨羽。他們的問題簡單地這樣提出：他們將怎樣從工人手中奪取上海的支配權和建立他們的南京政府呢？爲了摧毀工人組織及共產黨人的工作，手頭已有大筆財政的接濟。但當他們於三月末的灰黯日子環顧他們週圍，蔣和他的朋友知道成功並不是確定。障碍似乎重重疊疊和可怕。一位消息靈通的外人寫道：『他明天也許不能夠抗逆共產黨活動的潮流，這並不是難信的。』（註十二）不錯的，凡是瞧不見工人羣衆與共產黨領導之間的鴻溝者，都難於了解何以勝利不能歸於工人運動。

上海在他們手中。五十萬以上工人枕戈以待，守護他們會用自己的武器取得的東西。不錯，工人糾察隊（他們現在已代替警察巡邏全市）只有二千七百人和一千七百枝來復槍，幾挺機關槍和從北方軍隊奪來的大量軍用品，（註十三）但外表上却顯然沒有什麽嚴重障碍，足以使隊員數目與這枝武力的武備不能迅速擴充。只消從商務印書館和湖州會館的工會總機關方面來一句話，全市沒有一個男工和女工不立即起來行動的。他們爲昨天的勝利而氣壯，表現

爲一個可怕的力量。有一個臨時政府成立起來，牠似乎是充分受共產黨支配的。這個政府分明準備以上海工人的名義，取得全上海區的政權。而且人們還沒有半點理由認定工人不能設法與防守本市的軍隊共同奮鬥。

蔣介石只有三千軍隊駐紮市內，他們中也只有少數是『可靠的』。最隣近的援兵在杭州（距離五小時之遠）該處有何應欽駐守，但他這一枝軍隊不足一萬人，而且這些士兵許多都是在羣衆運動的灼熱中訓練過的，假如他們視爲他們底主要同盟者的工人組織，派出宣傳員使他們充分明白問題的眞相，恐怕他們未必還會掉過他們的武器來反對工人的。其實，蔣並不知道他能否命令他自己的人馬去進攻工人。駐紮於工人堡壘——閘北中的是第五師，牠是熱烈同情工會的。牠的師長薛岳於三月二十二日，違抗白崇禧的命令，把自己隊伍開入閘北時，他已反映了他的軍隊的情緒和壓力了。（註十四）

在鐵絲網障碍物之彼方，外人正怒氣冲天，據他們中有一個人說，他們通通相信他們就要在自己的牀上被自己的僕人刺殺。英美的僑民完全確信他們底外國正義和誠實的淸白小島就要遭受那些瘋狂的，渴飲白人血的暴徒蹂躪。他們深犯了某作者中肯地稱爲『高度驚慌』的毛病。（註十五）他已們通通聽到一月漢口和九江租界被奪，及南京事件等瘋狂的殘忍故事。逃亡的敎士到上海沿途所見的故事（這種故事，多走一里路就增多一段）使吃敎會飯的社會棟樑歇斯得里地尖聲喊殺。

英國僑民的一位名流大聲狂呼道：『此時最宜於採取一種強硬的行動方法，並遏止這種假借自由虛名而犯下的不法暴行，即因此而流一點子血亦所不惜……』（註十六）外國婦人心頭忐忑地分配她們的贈品於開赴保護租界的軍隊。外國男人更憂心他們的投資被刼，他們知道這些渾身濺朱的暴徒一撲向他們，這件事就會發生的。租界的統治機關——工部局已於三月二十一日宣布緊急狀態，頒行嚴峻

的戒嚴令。三月廿四日跟着發表一道宣言，宣稱牠『察覺地方局勢之嚴重及其可能及於整個文明世界之影響，將應用現有之一切手段，保持對於現局之支配權。』（註十七）

這些手段已頗爲可觀。防守外人地區之外國軍隊有三萬人，差不多每一個外國住民（白俄除外）可攤到一人。僅就英人而論，上海市每一個英國平民就有兩個英國兵。三十隻外艦（英、日、美、法、意，甚至還有葡萄牙的）泊在黃埔江，準備緊急行動。幾隊英國飛機經常飛巡上海市及週圍領土的上空，這一件分明破壞條約的罪行並不引起英國當局担心。其他戰艦已在途中，幾天之後，各國艦隊就要增至四十五艘，內中包括炮艦和一萬噸巡洋艦。但人們尙要求更多的軍隊，更多的戰艦。外國人要把整個上海都拿過來。他們要佔領南京。他們要求一枝國際軍隊重演八國聯軍壓平拳亂時的殘殺。他們的報紙（尤其是字林西報）進行警告，恫嚇和造遙中傷的瘋狂運動。他們大罵本國政府的執政者，因爲這些執政者尙以爲慢一點動作是最聰明的。（註十八）

任何外國人，如果在口頭上或行動上對國民革命政綱的最溫和之點表示同情，或者就是批評一下時行的歇斯得里病，他也成了最惡毒的攻擊之靶子。（附註一）J·B·鮑威爾是上海一位美籍編輯，他竟敢懷疑武裝干涉必能產生如願的結果，並明察地鼓吹對國民革命軍讓步，因此，他被

（附註一）北京有兩個美藉記者(Wilbur Burton和Mildred Mitchell）替國民新聞社做工作，被北軍逮捕和監禁起來。美國公使館事實上將他們置之不理，後來因爲美聯社Randall Yauld 把他們的案子公佈，並得到一位天津律師Charles J. Fox的努力，他們才得到自由。Gould 後來被美國公使Macmurry逐出公使出版會議。威廉（William）和樸萊姆（Rayna Prohme）因爲編輯民衆論壇，一般人都視他們爲種族叛徒。鮑羅庭當然有兩隻角的。

攆出美國商會。一個外國傳教師聯合一小羣中國基督教徒鼓吹和平交還租界，他立即在字林西報上被宣佈爲背信者和『革命煽動者』。一位中國基督教徒寫一篇文章，牠的題目叫做『耶穌與三民主義』，企圖把孫文和耶穌基督並列，因此被教會的上下人士宣佈爲『瀆神的怒號』。全國基督教會是一個中外合辦的團體，牠採取一個同情於國民革命的立場，結果被謚爲『布爾什維克救濟會』。三十二個英美傳教師正式斥爲『危及與破壞中國教會的至善利益』。宣佈牠的代表基督精神的呼籲『直接破壞上海工部局禁止散發足以引起敵愾，造成紛擾，惹起公共驚惶或破壞和平底文書的禁令。』洛德尼·基爾拔(Rodney Gilbert)是一位親英的美籍記者，每天在英國報上刋登一些駡語，這種駡語可以說像白熱一樣閃耀於報端。在他看來，一個工會就是『從不工作也不會工作底下賤苦力的組織』。在這些傢伙看來，不僅『下賤苦力』，就是虞洽卿之流的銀行家，王正廷之流的政客，他們當時雖日以繼夜致力於和外人聯合反對『下賤苦力』，但也終歸是『激烈的排外者』。當時的情緒是不難歸納幾點的：

激烈：『上海這個大埠乃純粹外人手創者……現在華人竟要牠「交還」，而同情華人者也奔走討論條件，在這些條件之下，外人努力幾世代的一切成果均可以讓之於無政府的苦力團體了。這件事殊令我驚怪，蓋無異捧揚愚騃，膜拜庸懦也。……』（註十九）

憤激：『來到人們腦中的第一種思想便是氣惱。使人傾家蕩產，使人急急忙忙擠幾件家產在一兩個籐箱和一個手提包中，其餘財產則讓人刼奪或用他法泡製，這就是一種純凈不假的氣惱，……』（註二十）

滑頭：『……外人從各方面急忙趕向碼頭去，他們的唯一罪惡就是他們想把中國弄好。我說到這一點心目中不僅包括傳教師，而且還包括許多光榮的商家，他們都希望中國應受的待遇，似乎要比之牠目前的行爲所應受的還要好。

但我們必須慈悲為懷。中國有若干眞正的苦衷；牠現在的許多苦衷當然都是牠自己造成的，但老實人一定受這種思想貽害，而且往往受欺而相信這種思想：外人是負全責的。』（註二十一）

自私：『和平的外國居留民已被逐離他們的家室，他們的財產被破壞……許多外國商店……現在正遭逢破產……但這些實際上都是小事情……最重要的還是與一種政治思想鬥爭，這種思想的公開目的就是破壞目前的世界文明……（牠）不受良心的內疚阻制……不尊重既存的權利，風俗，習慣……這就是共產主義與世界文明衝突的第一道戰線……』（註二十二）

宗教上：『我以我的傳教師的資格看來，又當我首先想及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瘋狗如不受挫於中國，得以躍越大海，抵達我們自己所愛的美國，而使全世界基督教會遭逢諸般後果之時，我沒有半點猶豫確認我的自信：一個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一定是世界上的最大禍患。』（註二十三）

貞潔：（徵引一個廣泛刋載的消息稱漢口婦女協會已選拔『有雪白肉體和完滿胸部』的婦女，號召和表演一次『裸體巡行』。）『凡是熟識過去數千年來中國婦女之貞節的，便毋須乎要更近一步或更確鑿的證據來證明俄國共產主義之惡毒的影響。』（註二十四）

豪俠：『每一個美國人對投放於某外國之利益只淡然置之，但他一見到美國無辜婦孺有横遭暴徒或軍隊毒手之虞時，他可以氣憤塡胸。』（註二十五）

率眞：『在中國，共產黨的手段是喚起階級仇恨，社會的憎惡心，貪婪和嫉妒。』（註二十六）

嘲笑：『假如目下的「鐵絲網」歇斯得里病繼續得更長久一點，那末，毫不足奇：我們在某一個早晨醒來發覺我們的殷勤和買氣力的市政府已建造一張鐵絲天蓋蓋在我們頭上，以便遮斷太陽的光線，他們所根據的理由就是：我們的天體已有散佈赤化宣傳之嫌。』（註二十七）

直幹：『在這些時候，精密之區別和法理的遁辭毫無結果。在上海C·P·（共產黨）沒有立足之餘地，牠必須受打擊，猶如工部局一定要打擊黑死病一樣……中國和俄國的C·P·應受同等嚴峻的待遇——兩者都是文明之敵。』（註二十八）
明察：『國民革命的好機會——一切同情歸國民黨——但反對共產黨人。』（註二十九）
簡單明瞭：『蔣介石……站在十字路口……毫不誇張的說：他與何應欽，白崇禧二將軍現在是防止中國長江南岸被共產黨淹沒的唯一保障……但是如果蔣將軍想從赤黨手中救出他的同胞，他必須迅速地，無情地行動起來。他將證明他自己是行動和果决的人，是眞正孫文主義的戰士，是他本國的保護者呢？抑或他將和中國一道沉沒於赤化的洪流中呢？』（註三十）
在上海市之南的龍華，蔣也正在考慮這個問題哩。在他和外國記者的連續談話中，他極力撫慰外僑，且使他們安心。他對南京事件深致悲悼，應允徹底查究和懲罰負責者。三月三十一日他在一個談話中宣稱：『國民黨領袖一貫就希望和列強維持友誼的關係。國民黨人是列強的朋友……不應用武力或任何形式之羣衆暴力來變更外國租界的現狀，此乃國民黨政府之固定政策。』他以一個願望結束這個談話，他希望外人千萬了解：『雖然目下困難重重不能獲致一個更淸楚和更好的諒解，但我們仍希望剷除這些障碍，俾在中國與列強之間保有一個更淸楚和更好的關係，這種關係將建基於相互友善和諒解之上。』（註三十一）
有幾個外人滿懷希望的對這個無誤的建議表示首肯，這個建議就是『中國』（財產所有者）與列強合作剷除『障碍』（工人）。但他們之大多數與其說因蔣氏答應保護他們的利益而平服，不如說因蔣氏必須以一個『國民黨人』的資格來發誓，仍然怒火中燒。字林西報的編者就表現這兩種見解。他稱此次談話爲『固執己見的……及與一切經驗

相悖底厚顏的假托的一種非凡的混合物，』但經過一番思索之後，他補充說：『蔣將軍分明講忠誠話，且平心而論，……在他管轄的區域之內，（他）似乎已設法保持秩序。』（註三十二）留心等待一下是沒有害處的。在蔣氏沒有證明他能夠『迅速地和無情地行動起來』之前，他們的一切狐疑是不會平息的。數日之後，英軍司令鄧肯將軍覺得大可放心，遂告訴一位中國記者說：蔣氏已博得他的尊榮，『因為他不僅講出這條道路，而且實際上也把牠加以實行了。』（註三十三）

中國銀行家和實業家更具有信念和把握。他們更懂得他們的人。三月二十九日，有五十餘家銀行，廠家，和商業團體聯合成為一個聯合會，受虞洽卿及王一亭領導，王氏在一家日本大輪船公司裡當買辦，他和蔣氏至少已有十五年的交誼了。統一在這個聯合會裡的團體有各區商會，銀行公會，棉織業協會，製粉業公會，茶業公會，絲業公會——實際上，上海一切有組織的有產界都包括在內。

這個新團體的代表團當天迎候蔣將軍，『蔣氏非常懇篤的接待他們。』他們的代言人『轉達上海中國商人的祝辭，且鄭重說明立即恢復該市治安之重要性。他們告訴蔣，商人們衷心擁護他，蔣將軍用幾句中肯的話作答，且負全責保障上海中外人士的生命財產。他又向這個代表團保證：勞資關係將很快加以調整。……此次謁見告終之時，該代表團興辭而出，心裡非常滿意，因為他們已發現蔣將軍為一個節操高尚的人，而且還是一個單一政權的領袖。』（註三十四）

數日之後，各業公會均分別印發宣言，表示衷心擁護蔣氏，且派出代表團表達他們希望早日改善局勢。四月九日，二十餘個商業組織的代表開會，決議『擁護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擁護蔣總司令！打倒一切反革命份子！』

自然囉，有錢人除了空口叫喊之外還要有所作為。他們必須慷慨解囊。局勢要求信念和信任以上的東西。牠需要現

錢。第一次攤付蔣氏的欵子是四月四日的三百萬元『借欵』。（註三十五）據遍傳的消息說，數日之後，又補付了一筆七百萬元的欵子。一位外國訪員報道說：『中國銀行家和商人……派代表見蔣，齊送他一千五百萬大洋的一筆鉅欵，附有的條件是：他鎮壓共產黨和工人的活動。』（註三十六）除了這幾筆預支欵子之外，兩星期之後，又募集了三千萬元的『借欵』來幫助南京新政府的成立。

蔣立即開始設法取得他自己對於上海市的支配權。他委任他的直系軍官之一爲警察長。他的政治私狗之一成了上海市長。他成立一個特別的財政委員會，並爲此選拔了一批著名的銀行家出來，以便籌集他所需要的欵項。他委任一個官員就滬寧和滬杭兩鐵路的總辦之職。他任命郭泰祺爲外交部長，與外人發生正式關係。戒嚴令於三月二十八日宣佈，使該市的一切民政機關，對龍華的軍事大本營負責。嚴禁『未奉命者』不得保有或携帶任何種類武器的命令也頒發了。同時，『工商聯合會』也出現了，牠是受黃痲皮，杜月笙和張嘯林扶助的，牠假裝爲一個新起的『温和的』工會。各種準備步驟迅速進行，以便在上海來重演已施用於南昌，九江，安慶和蕪湖等地的策畧，而且彷彿蔣氏和他的流氓助手想證明這些方法是否尙有効力似的，三月三十日和卅一日在杭州表演了一次全副戎裝的演習。

蔣氏在杭州也已利用『工界聯合會』的組織來反對共產黨操縱的總工會。三月三十日晚，流氓們衝入工會的總機關。在當地發生的爭鬥中，有幾個工人遇害，受傷者也很多。據上海某報（註三十七）刋載的總工會來電說，翌日曾號召了一個總罷工，但只有電話及郵政工人響應。一個羣衆的抗議大會給召集起來了，且組織成一個遊行示威，一直朝薦橋街走去。軍隊正在一個重要的十字路口上等着。他們聽人家說，工會正設法對國民革命軍的順利推進舉行怠工。沒有一個人告訴他們不同的話。當工人們行近時，軍隊便開火。半打的遊行者倒下來。百餘人被捕。糾察隊

數目上千，他們只用棍棒來武裝，結果均被繳械和驅散了。總工會的房屋被搗毀。糾察隊被捕。他們的土布制服撕破了。從無人知道或紀錄有多少人遇害。總工會被封閉，靜候按照現在熟知的更温和的辦法來改組。杭州事變以非常的精確性預示了上海行將在更大規模上發生的事情。不僅蔣氏的行動是如此，即共產黨的反應也是如此。

當蔣氏委任私人就杭州民政機關的職位並着手向工人施行鎮壓手段之時，總工會通電蔣氏，恭敬地請求罷免犯事的官員。他淡然答覆道：『在軍事期間，我有權任命公安局長。』（註三十八）他們對這個答覆默然忍從。在三月三十一日的逮捕和屠殺之後，該工會又發出通電，這道通電臨末懇求蔣介石將軍『來杭懲治犯罪者及肅清反動勢力』。（註三十九）可惜蔣氏剛巧太忙於在上海豎立反動勢力了，他無暇走訪杭州來鎮壓牠，而上海的總工會也太忙於設法撫慰蔣氏了，牠也無暇從杭州經驗中學得什麽東西。

但雖然如此，蔣介石之承担破壞上海工人組織的工作，並沒有表示他是不曉得這件工作的重大的。羣衆運動已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他迫得開始實施一連串循次漸進的陰謀詭計，使自己獲得一個理當有利的顯著地位。他每一步前進，總表現一種反面的姿勢出來。他有意使他的敵人迷醉，使問題混亂，使一切可能的反對者癱軟無力，一直到政變已經到了眼前才止。這種辦法把他的若干朋友弄糊塗了。在廣州三月二十日政變之前夜，他的許多軍事同盟者都『和他衝突，因爲他們不能領悟他的行動所隱藏的眞正目的，』（註四十）現在在上海也一樣，有許多人（尤其是在外人中間）對他底行爲的外表上的矛盾是按耐不住的。四月八日字林西報抱怨道：『據中國政界中人表示，假如蔣將軍發動一個明白反共的運動，他一定會博得擁護，但他對共產黨徒的不大熱心的，帶着辯解口吻的攻擊，却使人無法確定這次分裂是否無可挽回。』

但蔣氏比他們更懂得他正在幹什麽，他正往何處去。他未曾打算，也未曾力圖和武漢的『左派』國民黨作任何妥協。他專心準備打敗上海工人；但他需要時間來整頓他自己的力量。同情工人的軍隊必須調離閘北，而換之以因與羣衆運動很少接觸而未染有政治色彩的新軍。爲反共的攻勢而動員流氓已盛極一時。當所有這些事正在進行之時，蔣氏尚繼續想盡一切可能的辦法來散佈並無衝突臨近的幻想。從他到滬那一天起，他就堅執否認他立心與武漢國民政府破裂的消息。

三月二十七日，他告訴謁見他的人『並沒有分裂，國民黨的黨員是統一的……並沒有嚴重不和的徵兆或前途。』（註四十一）兩天之後，他向日本東方社的一位代表宣稱，他毫無保留地承認武漢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權威。他以同樣的方法使莫斯科放心。

白崇禧對眞理報的駐滬記者說：『我們知道帝國主義者希望國民革命軍與民衆破裂，但這是不可能的。我們的基本原則就是武裝力量與民衆聯合……中國革命形成世界革命陣線之一部份。帝國主義者正設法藉說謊和造謠來破壞這一陣線。孫中山教我們和共產黨人合作，而他們也形成國民黨之一部份，我們是不會破壞和他們的聯合的。關於這一點，中國的英文報正散佈各種謊話。牠應該受禁止……』（註四十二）我們將來可以看到：莫斯科和中國的共產黨人多麽熱心利用這些保證——而且看到：牠們的眞正價値究竟有多少。

四月一日汪精衞從歐囘華給了蔣一個機會，使他的話似乎更來得具體和令人信服。汪氏，這一位軟弱，柔順，甘願屈服於較強個性的壓力之下的典型的小資產階級的急進派，現在剛好足踏中國國土的時候，又再度成了一個人的工具，這個人在一年之前曾那樣汚辱地迫他逃離廣州。舉行了兩日的會商。四月三日，蔣發出通電宣佈他『完全服從』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他說：『中正深信汪主席既出，必能……鞏固黨基，集中黨權以竟國民革命之全功……此後所有黨政……諸端；皆須在汪主席指揮之下，完全統一於中央。中正唯有統率各軍，一致服從。』（註四十三）
據汪的傳記作者說，汪對於蔣的通電，『感覺得極不愉快。』蔣介石提出用來消滅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勢力的方法，他不表贊同。不錯，汪也『想到與共產黨分手的必要』，不過他『反對任何倉卒的破裂……（而且）……想採取循序的和平的辦法來解决一切爭執。……』（註四十四）
爲了避免他那樣憎惡的直接行動（隨便採取任何方式來避免，不過這一回可不是逃亡，和辭掉他自己的職位了），汪極力勸蔣，說他們毋須採取暴力或『非法』手段亦能夠達到所求的目的，據某項傳說汪答應將鮑羅庭撤職，將三月國民黨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的决議案加以修改（這項决議是撤除蔣的黨主席職及最高軍事司令權的，）又答應贊成將上海糾察隊繳械，及批准蔣在上海市委任的官員。（註四十五）汪後來極力否認他曾和蔣作出任何這一類的協定，不過他自己的傳記作者却紀載他離滬赴漢去敦勸他的同僚『到南京和蔣及其他人召集全體會議，以維持黨的統一』，又說，汪『相信他能夠得到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大多數純粹國民黨員的擁護，來實行修改第三次全體會議所通過的决議案』。（註四十六）
但蔣介石和他的朋友却懂得目下合他們用的是機關槍而不是黨的妥協。蔣汪之假裝一致只是幫助加濃他們需用來掩蔽他們的進攻的政治烟幕吧了。他們經過汪來影響共產黨人，結果一定已遠出乎他們的望外，蓋汪只須一舉手之勞便使得上海工人的共產黨領袖每日把許多祭品供奉在『民族統一戰線』的祭壇之上，而潛伏的反對派遂更加削弱了。

第九章　沉默的陰謀

第九章　沉默的陰謀

共產黨領袖向上海工人說，國民革命軍到來的時辰，就是一切被壓迫者得到解放的時辰。三月二十一日暴動勝利的中心口號曾經是：『響應國民革命軍！歡迎蔣介石！』工人們完全忘記軍隊已在龍華觀望不前，希望工人的武裝隊伍與直魯軍作戰而自行潰滅。他們於三月廿二日傍晚，竟歡天喜地的慶祝國民革命軍先頭部隊的到來。兩日之後，外國記者趨集龍華，謁見白崇禧，他們親眼見到在革命以前的中國尋不出類比的希奇現象。

『廣東軍到滬在上海勞工階級心中所造成的印象的一個動人的例子，在謁見（白崇禧）時碰到了。……一千八百個廠工（內有三百女工）的遊行隊伍帶着許多犒賞走入衙門，他們把這些犒賞堆在內衙的門外，以表示他們的歡欣，這些犒賞就是鍋子，茶壺，箱子，籃子，衣服……』（註一）

蔣介石抵滬之翌日，在西門舉行了一次歡迎他的示威，有五萬餘工人集合該地聆聽共產黨人演說，這些共產黨演說者『……對蔣介石作無上的讚揚。』（註二）

但把蔣介石及其軍隊尊爲人民救主的不僅是上海工人和中國共產黨人。共產國際的各國黨也採取同樣的態度來響應，因爲到處都是這樣了解，以爲蔣帶到上海城的就是世界革命的大纛。誰曉得此外還有什麽意義呢？

暴動之前數日，德國共產黨的中央機關報，紅旗報特別印

出蔣介石一個照片，把他描寫爲國民黨『革命軍事委員會』的英勇領袖。（註三）三月二十三日，法國共產黨日報，人道報也印出同樣的照片，並刊載一道消息，稱一個偉大的羣衆集會把蔣之入駐上海慶祝爲『中國公社』之成立，展開了『世界革命的一個新階段』。此外，尙有一篇社論稱粵軍的勝利爲『上海的解放』，而『上海的解放』則又等於『全世界工人解放的開始』。（註四）

把局勢這樣看法，自然在邏輯上要歸咎於共產國際在蔣氏抵滬前後所採取的整個路線。假如遲至四月十日，共產國際的指導機關報——眞理報尙宣佈最最需要維持『四個階級聯盟』，又假如蘇聯的代言人三番四覆的堅主各階級在國民黨領導之下，形成無懈可擊的統一，（註五）那末，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人把蔣介石來到上海，看作中國革命底新日子——亦即中國公社底日子的曙光，就並不足奇。

不幸，事實却完全相反。我們已指出過：人們把『民族統一戰線』或『四個階級聯盟』尊崇爲一個神秘的偶像，並不惜付一切代價加以保持，結果，人們差不多一開始就已把中國共產黨牢牢的縛在國民黨的靴帶上，使工農受資產階級束縛。在廣州，這種政策已促使李濟深建立軍事獨裁，對工人施行野蠻的鎭壓。牠又已令資產階級能夠俯拾廣大羣衆運動的果實，北伐軍之能夠進抵長江，就是那廣大羣衆運動之賜。今天在上海，資產階級又準備經過蔣介石來採摘那個果實了。共產黨的領導機關因爲自動遏抑工農的鬥爭，使工農的政治目的適應於資產階級的政治目的，迫使共產黨員負起替國民黨作『苦力工作』（鮑羅庭的名言）的任務，禁止他們批評孫文學說，放棄一個獨立的日報，因此已替公開的反動清除道路，這種公開反動已形成於廣州，江西，和長江各口岸。

一九二六年末，及一九二七年最初幾個月，共產國際的重要機關報已開始發出泛泛的，一般的警告，指出民族資產階級行將背叛，（註六）在二三月間，這種警告又在各種

文章中反覆提出。（註七）這些文章總是看不起國民黨右派的力量，總是誇大左派的力量，而且提到蔣介石時，從沒有把他當作正在結集的反動勢力的眞正頭腦來看待。恰恰相反，當牠們提起蔣介石時，牠們總是安慰牠們的共產黨讀者說：蔣表示『服從』，萬事如意了。

因此，共產國際的一切報紙都齊聲否認謠言和消息，這些謠言和消息，數目愈來愈大，也愈來愈迫眞：稱蔣介石在上海正趨向决裂，這就是人們對一個臨近的災刼所玩弄的一種眞正的沉默的陰謀。

我們不能說：共產國際不知道到底正在發生什麼事情。往後不過幾個星期，牠的全部報紙就怒氣冲冲的痛斥蔣介石，而壓下了一年的所有情報遂如洪流一樣傾瀉出來了。我們上面引證過的，三位共產國際官員的信，證明蔣介石的傾向對於當局者並不是秘密的。但是還有更明顯的證據哩。

埃耳·勃勞達（這個人注定要成了美國無產階級普遍不認識的，但却是慇懃可愛的領袖，）俠克·杜里歐（他將要從史大林的高級參謀部投降法西斯主義，）英國的湯姆·曼尼和一位俄人，雪多爾·史托拉都是共產國際代表團的人員，這個代表團於二月抵廣州，在三月一個月中，追踪蔣介石，道經江西北上。當時恐怖現象已如一條黑鞭一樣橫掃該省，他們恰好直接碰到牠。但他們却若無其事的放過了，因爲蔣介石大獻慇懃，留下訓令囑他的下屬用美酒佳肴來欵待他們，打發他們走。因此，勃勞達本人後來也天眞的承認，無論他們到什麼地方，他們『總碰到這樣的經驗：當雙方領袖向我們交談時，實際的巷戰便在我們到訪的期間內停止下來。』據這些代表後來的報告（註八）指出，他們做過人名，日期和地點的豐富的註解。他們遊過一城又一城，而在這些城市裡工會均已被逼秘密起來，他們在贛州接到關於陳贊賢被殺的詳細報告，陳氏是當地工會領袖，僅於數日前才被蔣下令殺死的。他們既然知道

海外各國均相信蔣爲一個『革命將軍』，宛如羣衆底報仇雪恨的天神一樣披靡北向，他們是否於三月二十九日從九江內地急遽趨赴無線電局，把消息公諸於世呢？難道他們能夠把他們所見所聞底事情的意義忽畧掉嗎？不會的，且聽一聽杜里歐的說話吧：

『贛州事件給了我們一個寶貴的教訓。我們從那時起——在分裂之前——就很懂得資產階級與中國工人階級間的衝突一定要採取流血的形式……』（註九）

且聽一聽勃勞達的話吧，他說他在贛州事件中看出『深深分裂的全貌，這一分裂正把國民黨分成全中國兩個分立的敵對團體』（註十）

沒有什麼事情足以費他們思索的。因爲人們正直白地使他們知道事情臨近而且就要發生於上海了：『總司令（蔣介石）現在不能說話……』三月二十六日程潛將軍在南昌告訴他們說。『他尙沒有充分的自由。他尙沒有充分的地盤。他已去南京和上海。他到那裡就要說話。他到那裡就要有他的話！』（十一）

換言之，國際代表團到九江時已確實知道：國民黨內部分裂已發生了，蔣介石已特意跑到上海摧殘該地的工人組織，彷照他北伐路過江西所幹的一樣了。那末，勃勞達，杜里歐和曼尼豈不是需要發出警告，儘可能大聲和緊急地發出警告麼？他們到達九江不過比蔣介石到上海畧遲數日。我們已知道蔣在九江的力量如何不確定，工人的力量如何大。但莫斯科正勸人退却，其理由就是：蔣介石如不受招惹，他是不會進攻的。人們到處安慰工人說，國民黨內沒有分裂，蔣介石正表示『服從』，上海是沒有衝突可能的等等。假如共產國際的三位負責代表在這個特別的時機，向工人，尤其是向上海工人傳佈一個警告：指出蔣介石並不是他們的朋友或救主，而是他們的死敵，誰又能估算出一定已發生什麼效果呢？至於他們應不惜一切代價保存他們的武器並準備抵禦勃勞達——杜里歐——曼尼所深知的

進攻是否絕對難免呢？又這樣大胆的行動是否已改變了事變的行程呢 ？這當然是很難說的。 但勃勞達——杜里歐——曼尼之沒有幹過這一類事情却是事實。

他們於三月三十一日行抵漢口。勃勞達的第一個談話不僅沒有公開痛斥蔣介石，倒還是『勃勞達先生說，各地……軍隊，工會與農民團體間的關係是他遊歷所見的最愉快的情景之一……他們凡到一地方……他們總是發現人民毫無例外的堅决擁護黨（即國民黨）……農民們與國民革命中的一切其他團體充分合作。……』（註十二）這位二十世紀阿美利堅主義的未來代表小心謹愼地說：在江西『這個運動已在困難中進行』，——但急忙補充說：『工人們並非完全沮喪的。』除了在一個簡單聲明裡（他堅認他曾對某中國記者作過此項聲明）提及一下之外，（註十三）勃勞達在什麽地方也沒指明蔣介石就是江西那些『困難』的作者。

八天之後，他們發表此行的正式報告。勃勞達——杜里歐——曼尼在這個報告裡堅認：『幾乎到處代表團均聽到說：革命軍及其政治部與革命的國民黨一道幫助組織和發展新工會及農會……』他們竟敢說，他們看出『一種明確的分化在發展中』，且提起他們在贛州見到工人們追悼『反動勢力代理人』刺殺的一個領袖。這些『代理人』究爲何人尙不暴露。這個報告於結末處表示：『深深相信國民政府與國民黨是决心消滅封建制度和反動勢力的。』（註十四）

數月之後，國際的共產黨報紙尙發表消息，稱『代表團見到農民羣衆得國民黨之助，到處組織成强有力的農民協會，異常愉快。』（註十五）

這些隱匿事實的謊言就足以蒙蔽一切，一直到蔣介石時運已來，在上海施行他的打擊時才罷休。那時，也只有那時，這些『反動勢力代理人』才被人認出是『用蔣介石上將名義行事的』軍隊。那時又才是時候：暴露全江西省的『

工會』必須秘密集會，一切機關均被軍隊佔據。』（註十六）原來這種情形就是勃勞達見到的那樣『愉快的』軍隊和工會的關係！現在才是時候：暴露在江西省『國民黨只不過代表官僚和資本家，因爲工農絲毫沒有說話之餘地。』（註十七）原來這就是『全體人民堅决擁護的』黨！

在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的最嚴重的局勢中，這樣有意來隱匿重要的情報也就是整個共產國際在蔣介石政變前夜所造成的空氣的指標。只消幾段徵引就揭露牠：

『現在正當我們行將奪取寧滬之前夜，帝國主義者却放出關於所謂國民黨內部傾向分裂的消息。國民黨執委會議的結果……恰恰證明相反。黨內的聯合戰線今天像已往一樣牢固……國民黨並沒有像帝國主義所說的一樣，陷於分裂，牠已團結牠的隊伍了……』（註十八）

又引用標上『上海工人之勝利』底標題的一篇文章：

『國民黨內分裂及上海工人和革命士兵衝突（等消息）現在是絕對不確的……蔣介石已親自宣稱他將服從黨的决議。像蔣介石這樣一個革命家是不會像帝國主義者喜歡相信的一樣，親自和反革命的張作霖聯合來對付解放運動的。誠然，在去年十一月張作霖與廣東軍之間曾有過談判——但只是由於策畧上的理由……國民黨已應允滿足工人所有要求。上海無產階級的唯一危險就在於一個帝國主義的挑撥。』（註十九）

同一星期，巴黎工人聽到國民黨底『無疵的統一』的安慰，他們熱狂歡呼起來。（註二十）

在莫斯科，同樣的撫慰採取答覆托洛次基及反對派的形式，蓋反對派正警告打擊將到，且要求中國共產黨人無條件的獨立。三月十六日，眞理報刋載一篇文章，題爲『中國革命與國民黨』，牠宣稱『尤其是現在，軍事問題是中國革命之主要政治問題。』該文往下敘述『動搖程度不一』（！）的右翼份子正企圖和帝國主義做買賣。但牠趕忙撫慰我們說，另一方面，『我們在國民黨內還有一個強大的

左翼，這個左翼反映羣衆的利益……帝國主義報紙之運用一切手段來誇大右派國民黨的力量，其理由是很容易懂的，據說，右派國民黨已使革命轉向「溫和的」路線，且已集中權力於他們手中。帝國主義報紙已預言國民黨之完全墮落，預言分裂及中國革命癱瘓……』該文於是繼續對左派反對派之要求立即退出國民黨，猛烈攻擊：『他們看見國民黨的右派，但他們看不見牠的核心，他們也看不見羣衆……甚至國民黨的右派，接近國民黨政府底右派的人，以及軍隊也迫得向革命羣衆的壓力示讓……關於這一點，蔣介石的宣言……是一個極重要的文件。（這就是指他的紀律宣誓）蔣介石迫得……要玩弄陰謀……要宣誓盡忠……要服從領導。國民黨極右派希望實行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視爲左券的計劃……已失敗了。現在連美國資本主義報紙也已迫得承認右派陰謀的失敗了……』（註二十一）

馬丁諾夫，這位孟什維克在眞理報上替共產國際說話，他給我們更進一步的安慰。他寫道：『左派代表國民黨的大多數……國民黨十分之九的地方黨部是在左派及共產黨的領導之下。』（註二十二）

最圓滑的就是戰畧大家本人——約瑟夫・史大林所提供的保證，他於四月五日出席莫斯科圓柱大廳中召集的三千官員的大會，答覆托洛次基及反對派的警告：

『蔣介石正服從紀律，』他在這篇令人難忘的演辭中宣說，『國民黨是一個聯盟，是革命議會之一種，內有右派、左派和共產黨人。爲什麼舉行政變？既然我們有多數，既然右派聽從我們，爲什麼把右派趕走？只要有用場，農民連一匹疲蹶的老駑馬也需要。他不把牠趕走。我們也一樣。等到右派對我們沒有什麼用場，我們就把牠趕跑。目前我們需要右派。牠有的是能幹的人，這些人尙率領軍隊且指導牠去反對帝國主義者。蔣介石也許對革命沒有同情，但他正帶着軍隊，且除了引導牠去反對帝國主義者之外，便不能幹別的事情。此外，右派中人尙和張作霖的將領有

關係，且非常懂得如何去使他們軍心瘓散，不經一擊便引誘他們全部轉到革命方面來。他們和富商也有關係，可以從他們那裏募錢。所以他們必須要被利用到底，像檸檬一樣搾乾，然後丟掉。』（註二十三）

才不過幾天之前，史大林曾向一個青年共產黨人的會議說：『我們必須說，迄今他們（帝國主義者）已得到一個結果：中國人對帝國主義的仇恨加深，國民黨的力量團結一致，而且（羣衆）重新趨向中國革命運動的左方。沒有一個人能夠懷疑這一點：現在帝國主義已得到與他們所要求的恰正相反的東西……據說，神仙想滅絕一個人，便首先把他弄盲，這不是虛語。』（註二十四）

這誠然不是虛語！不過誰眞正被弄得盲目起來，尚待決定哩！

在這個生死關頭的星期內，共產國際給上海中國共產黨的絕妙訓令如下：

『三月三十一日，當資產階級準備鎮壓已路人皆知（！）之時，國際執委會給了如下的指示：喚起羣衆反對現在正在準備中之鎮壓且舉行一個反右派的運動。此時不要發動公開鬥爭（因爲力量關係起了極不利的變化。）不要放棄武器，但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就必須把他們藏起來。』（註二十五）

這種訓令不多不少恰恰等於請中國共產黨人伏伏貼貼地將他們的腦袋放在斷頭台上。假如他們不去發動反對蔣介石的『公開的』，也就是武裝的鬥爭，他們顯然就要儘可能和解他。『反右派的運動』並非就是反對蔣介石本人的運動。因爲所有共產國際的報紙不是宣佈他的忠誠麽？這個運動實際就是帶怒啜泣反對目下成了蔣氏心腹人物的政客和軍人。

共產國際的領導機關報正在這些日子裡宣稱：『國民黨病在缺少革命工農的血。共產黨必須灌注這種血，藉此可以劇烈的改變局勢。』（註二十六）

『何等奇巧的一句兆頭話，』托洛次基寫道，因爲目下在準備中的正是這種灌注血液的工作——只不過那些高坐於莫斯科，勸上海工人裝死的勇敢和自信的戰畧家很少預想到牠發生的方式罷了。

我們之所以必需詳述一九二七年三月至四月，共產國際對上海局勢之估計，就是因爲經過數度不爽快的企圖想把這個嚴重關頭採用的政策加以辯護之後，（註二十七）有一種神話久已產生且保持在共產國際一切文件中，這種神話就是：認定上海潰敗的責任單獨而且無疑歸於中國共產黨領袖（尤其是陳獨秀）來負，他們的罪名爲頑強拒絕莫斯科的訓令。我們已經知道這些訓令到底是什麼，以及牠們所根據的估計是什麼。牠們說明何以上海的中國共產黨人眼生生看着大禍臨頭而束手無策地被解除了武裝。

政變臨近的謠言在上海也像國外一樣碰到憤怒的否認。總工會在一個公開的聲明中問道：『上海工人怎樣能夠和軍隊衝突呢？這枝軍隊就是他們唯一歡迎和尊重的呵！』『目下散佈的謠言稱國民革命軍與勞工階級間有破裂之可能……不消說，這些謠言是無根據的，請大家不要相信……』（註二十八）這些謠言被稱爲『敵人離間的詭計』。日報上公開預言攻擊臨近，也遭歧視。共產黨組織請求蔣介石將凡是刊載『害及聯合戰線』底消息的報紙加以禁止，這就是牠們對上述那些預言的答覆！因爲要遵照莫斯科的訓令：『舉行一個反對右派的運動』，於是差不多每天都對一般『反動派』發出如火如荼的痛斥。四月四日，總工會甚至還公開恫嚇：如『反動派』採取任何反對武裝糾察隊和工人的行動，就立即舉行大罷工。但是在任何這一類的恫嚇中，從來沒有提過蔣介石的名字，而且『反動派』一詞往往只是專指西山會議派，吳稚暉及張靜江之流的國民黨右派分子。蔣介石已公開和這些人結生死交，這件事實被抹殺或隱匿起來——或者只是暗中懊惱。

人們拚命和解這位『革命將軍』。蔣介石抵滬之後，共產

黨人甚至還準備一個盛大的歡迎會，並開筵以禮待他。但是他和另外被邀請的一位將軍通通不想到會。共產黨人忍受此次冷遇之餘，尙興高彩烈的慶祝蔣介石所作的每一種小小的讓步姿勢——或他們能夠解釋成讓步的每種姿勢。他於四月三日拍發贊成汪精衞領導的通電引起了一切共產黨組織函電交加，歡慶牠的宣告實際上解決了一切爭執的問題，且表示忠誠的希望，願他今後忠實的完成他本人負担起來的義務。蔣氏四月三日通電之後，汪精衞和陳獨秀簽名的聯合宣言也按照同樣的精神寫就發佈了，這個文件代表了自暴自棄與階級調和之最完全的表現，而自暴自棄與階級調和也就是共產黨政策的特色。爲了這個原因，該項宣言全文轉錄於此：

『國民黨共產黨同志們：

『此時我們的國民革命，雖然得到了勝利，我們的敵人，不但仍然大部分存在，並且還正在那裡伺察我們的弱點，想乘機進攻推翻我們的勝利，所以我們的團結，此時更非常必要。中國共產黨堅决的承認中國國民黨及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在中國革命中毫無疑義的重要，只有不願意中國革命向前進展的人，才想打倒國民黨，才想打倒三民主義，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錯誤，也不至於主張打倒自己的友黨，主張打倒我們敵人（帝國主義與軍閥）素所反對之三民主義的國民黨，使敵人稱快。

『無產階級獨裁制，本是各國共產黨最大限度的政綱之一，在俄國雖然實現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經濟的環境，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程，是否一定死板的經過同樣形式的同樣階段，還是一個問題。何況依中國國民革命發展之趨勢，現在固然不發生這樣問題，即將來也會不至發生。中國所需要的，是建立一個各被壓迫階級的民主獨裁來對付反革命，不是什麽無產階級獨裁。

『兩黨合作，本有各種不同的方式，重要之點，是在兩黨大多數黨員，雙方以善意的態度，解决此問題，方不違背

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國國民黨多數同志，凡是瞭知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理論，及其對於中國國民黨眞實態度的人，都不會懷疑孫總理的聯共政策。

『現在國民革命發展到帝國主義的最後根據地上海，驚醒了國內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謠中傷離間，無所不用其極；甲則曰共產黨將組織工人政府，將衝入租界，貽害北伐軍，將打倒國民黨；乙則曰國民黨領袖將驅逐共產黨，將壓迫工會與工人糾察隊。這類謠言，不審自何而起。國民黨最高黨部全體會議之議決，已昭示全世界，決無有驅逐友黨摧殘工會之事。上海軍事當局，表示服從中央，即或有些意見與誤會，並未必終不可釋。在共產黨方面，愛護地方安寧秩序，未必敢後於他人，對於國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示贊同，總工會亦已發表不單獨入租界之宣言；對於市政府，亦贊同各階級合作政策。事實俱在，更無造謠之餘地。

『國共兩黨同志們，我們強大的敵人，不但想以武力對待我們，並且想以流言離間我們，以達其以赤制赤之計。我們應該站在革命的觀點上，立即拋棄相互間的懷疑。不聽信任何謠言，相互尊敬，事事開誠協商進行，政見即不盡同，根本必須一致。兩黨同志，果能開誠合作，如兄弟般親密，反間之言，自不獲乘機而入也。披瀝陳詞，萬希各自省察！勿致為親者所悲，仇者所快，則中國革命幸甚！兩黨幸甚！汪精衞陳獨秀，十六年四月五日。』（註二十九）上海及國外的共產黨領導就是拿這種態度來處置當時的嚴重任務。一般工人都十分信任這些領袖。

暴動勝利已大大提高了共產黨人的權威。工人大批加入工會。（註三十）因此，上海中外資本家預想武裝的工人政權實行收奪之期已迫，這種思想並非出於純粹的歇斯得里病的。當一切工廠突然停車，工人們把階級鬥爭從工廠發展到街頭上的時候，資本家們滿以為聽到了財產的喪鐘響聲（並不是響着適度莊嚴的音調，而是卜卜地響着機關槍

的斷續聲），這是不足爲奇的。拋開他們的空言之外，他們所恐懼的意思就是如此，因爲他們明明看到武裝的工人階級就是能夠推倒他們的力量。戰艦可以保護租界，但牠們不能令工廠的機輪轉動，或者令工人重新忍受他們的重負。他們的帶着歇斯得里病的恐懼乃完全合乎邏輯地出自他們對於局勢的清晰的估計。他們判斷錯誤了的就是共產黨領導的才幹。他們誤認牠爲俄國共產黨領導的同類，俄國的領導是在俄國實現了十月革命及摧毀了私有財產制（資產階級社會之基礎）的。

上海工人靠共產黨領袖來指導。假如這些領袖曾立意把上述資產階級所恐懼的（即使是其中之一部分）加以證實，利用當時似乎如是清楚具備了的機會，則我們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蔣介石會在軍隊中陷於孤立，而資產階級的反革命也遏住了。但當時的情形却並非如此。那個領導暴動勝利的共產黨被夾在『四個階級聯盟』的鉗子裡，而且被『民族統一戰線』之神弄盲了，牠碰到反動勢力便迅速暴露牠的無能。眞理報於三月二十二日大聲疾呼道：『勝利的工人將上海的鑰匙交給廣東軍，在這件事裡表現上海無產階級的偉大的英勇行動！』（註三十一）這種『英勇行動』就是於暴動之翌日，將工人取得的政權交給資產階級。

三月二十九日，上海臨時市政府在共產黨贊助之下成立了，政府的多數位置是自動拱讓於上海資產階級代表的。政府十九個委員，其中五個由工會委派。蔣介石當時正獨斷獨行地把他的人安插在重要的行政位置上，且正在趕速建立他自己的民政機關，因此他拒絕承認臨時市政府，經過他的舌人吳稚暉宣稱，這個政府是『違反本黨的政府組織法的』。（註三十二）

等到蔣的態度一鮮明，當選的資產階級代表便立即一個一個的拒絕那些獻上門來的職位。虞洽卿（銀行家兼買辦）駁囘這次選任。陳光甫（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總經理）拒

絕就職。總商會的王曉籟事前已經公開表示他不願參加，但後來終於被選為主席，他便聲明，他是一個絲商，而春季又是一個忙季，故他寧願將他的職位另讓賢能。王漢良（另一位大商家）宣稱，上海克復，他過去的一切努力已獲充分酬報，他目前必須退避賢路。鄭毓秀是一位有名的女律師和法官，她與流氓及大商家關係甚密，她說她『太忙於她的公務』了。中國郵報的總編輯，謝福生稱病不能担任政務。其餘資產階級代表也立即如法泡製。

工人代表受了資產階級的抵制，束手無策。在四月三日第五次市民代表會議上，『市政府秘書長林鈞（共黨）報告，畧謂市政府委員就職以來，民衆自動接收機關之呈報及呈請派員接收機關之公文，請求懲戒（本市附近各鄉）土豪劣紳，解決學校糾紛等等，紛至沓來。而市政府各委員因就職時接了蔣總司令的緩辦公信後，未能積極進行。』（註三十三）

該政府不接管地方的政權機關，倒還用呈文的形式致函於蔣介石(此種形式乃由官僚下級向上級申請時用的)，誠惶誠恐的懇求他把市政機關交給牠（但蔣介石已在這些機關內安插了私人），且懇求他擁護那個民選的市政府。（註三十四）這個政府並沒有定出蘇減民困的手段。牠並沒有號召工會和工人糾察隊幫助牠實施一個大胆的社會政綱。牠雖然發出宣言列舉一個綱領，但並沒有採取什麽步驟來實施這個政綱。市政府所做的唯一大事就是熱心通過決議，歡迎蔣介石和國民革命軍，歡迎汪精衛回國，慶祝蔣介石的宣誓服從紀律，帶着特別的歡欣向汪陳宣言致敬。

臨時政府如果採取任何實際上配合工人與小手工業者及小店主之實際日常要求及利益的手段，牠就一定能夠得到上海工會及其他羣衆組織底戰鬥的武裝支持。又如果這個政府用宣傳的武器來攻襲軍隊並取得工人與兵士的有效的聯歡，牠就能夠博得軍隊下層的擁護。像這一類的手段一定喚起各省及其他城市的反響，在這些城市裡，工農已經動

員起來，他們僅僅需要有這樣的一個榜樣，好使他們自行擺脫武漢國民黨政府的動搖和踟躕吧了。但假如共產黨不完全獨立，自覺地充作工人的工具來活動，上述這件事却是不可思議的。中國共產黨人悶處在國民黨的緊身襖裡，正追求着相反的目的。

他們跟着蔣介石銀行家及商家的尾巴走，他們認為他們的合作對於『聯合戰線』的維持是有重大關係的。如果沒有這種合作，他們就自以為束手無策了。在幾個地方（如浦東），工人的政權比較採取進攻的姿態發展起來。當地工人自發地接收本地的市政機關，成立他們自己的法庭，授權糾察隊逮捕，審問和判决工人的敵人。這些行動從沒有得到臨時政府的支援，反之，只博得牠的嘆息和批評。

共產黨領導經過臨時政府來活動，無法採取任何有利於工人的積極步驟。共產黨人經過總工會的領導機關來活動，走得更遠。他們自動限制蓬勃生長的羣衆運動及拘束糾察隊的活動，使他們局限於為了維持『民族統一戰線』的要求而豎立的界限之內。四月四日，總工會執委會通過了一批罷工條例。工人發起的自發罷工被禁止了。據他們立下的辦法，工人要求『不得過奢』，而且應首先提出與僱主直接磋商。如果磋商失敗，不要號召罷工，可將此事訴之於工會的上級機關（區分會或總會），由上級機關與僱主談判。（註三十五）這些條例的效果就是使工人的創意力消竭，使他們的鬥爭分散和陷於孤立。等到僱主們開始藉關廠來反攻羣衆運動的時候，總工會謙遜地通過一個决議，請臨時政府轉請僱主『不得無故或藉故閉廠。』（！）（註三十六）

禁止糾察隊擅自逮捕的嚴峻命令也頒發了。他們的義務僅限於『與軍警合作維持秩序』了。（註三十七）糾察隊如踰越這些範圍則規定嚴加處罰。總工會的領袖尙對軍事長官保持奴顏婢膝的態度。例如有一天晚上，工人的著名仇敵，劉峙的若干家屬因嫌疑遭糾察隊的巡邏兵逮捕。第二

天早上總工會向軍事機關呈送一封極盡阿諛能事的道歉書，請劉將軍『寬恕』這四個糾察隊員，他們的『行動不愼，侵及同志（！），冒犯師長眷屬。已立令解除武裝，先革除隊員資格，再嚴加懲戒。』（註三十八）

在反帝鬥爭方面也表現同樣的謙遜。全部局勢要求採取罷工，抵制，示威的方式，展開最富於戰鬥性的和最大可能的行動來反對列強——他們的軍隊在租界邊境上荷槍實彈，正直接參與羣衆運動的鎭壓。（附註一）

但總工會只限於發出撫慰的聲明和約束，表明牠並沒有衝入租界鐵門的意向。冒然撲向外國的大炮當然是一宗魯莽行爲。但和解和安慰外人是一回事，進行廣大的運動把租界與中國其他地方連繫的每一道神經割斷且使帝國主義的抵抗力消竭又完全是另一回事。資產階級想和帝國主義者妥協的意向是非常明白的。既然這一妥協分明就要犧牲工人而達到，那末，共產黨人的任務現在就越發要脫離資產階級，獨立舉行進攻，只有這樣才能解放工人雙手來應付他們本國和外國剝削者的急迫的聯合。但共產黨人却倒行逆施，事先宣告他們對『正當成立的當局』（即指資產階級）所作的任何解決，均毫無問題的服從。

牠在華文報上遍登啓事，說：『（一）收回租界問題，願協同軍界商界一致爲國民政府外交政策之後援；决不自由單獨有衝入租界之行動。（二）關於治安問題，願協同軍界商界合力維持。』（註三十九）

（附註一）三月二十四日炮轟南京，美國人盡了主要作用，這件事使許多中國人驚愕起來，因爲他們尙相信美國以一種好心善意的，例外的興味來觀察中國的民族主義。四月七日，東方紡織公司門外舉行的工人示威被美軍巡邏隊的刺刀驅散了。四月八日晚，有一隊英軍，人數有二百人，衝入大夏大學，打傷八個學生，搜查宿舍，籍沒學生的東西，且捕了一批人。日本陸戰隊在日本廠中不斷用刺刀打工人。

總工會的執行委員會在三月三十日的宣言中已答應『耐心靜候國民政府與列強未來談判之結果，並靜候其和平的解決。』總工會對『公共租界居民』大受一種意含攻擊的謠言『所煽惑』，不勝浩嘆之至。『我們應有廣大的宣傳，免除無謂的恐慌。我們絕對主張收回租界，但這個責任當由國民政府外交部軍事當局去負……我們對於外交問題行動與國民政府是一致的。』（註四十）

共產黨就這樣一步一步，在『民族統一戰線』的招牌之下，放棄了工人階級的一切權利。政府的大權只有得到資產階級的合作才能施行——等到資產階級代表拒絕合作的時候，共產黨人便宣告束手無策，且一點事情也不幹了。『治安』要『和軍界商界合力』來維持。反帝鬥爭要受『上峯』，即資產階級來指導，而他們做出任何解決也毫無問題的贊成。又如果有誰人竟那樣大胆的指出：資產階級正在準備摧毀工會和共產黨，他就要被罵爲散佈別有用心的謠言，這些謠言是『反革命份子』製造出來的，其目的在分裂『民族統一戰線』。

一年多之後，共產國際的一位中國『專家』——米夫用如下的話描述中國共產黨領導在那些嚴重日子裡的情形：『上海同志尙沉迷於舊路線，他們想不出一個革命政府可以沒有資產階級參加的……他們把領導的責任讓之於資產階級，這又是按照老傳統的做法……』（註四十一）

舊路線嗎？老傳統嗎？共產國際曾在什麽時候宣佈過任何新路線呢？牠又曾經在什麽時候創立過一種新傳統呢？牠曾經在什麽時候逆料過一個沒有資產階級參加的革命政府呢？牠又在什麽時候，在什麽地方叫中國共產黨人去追隨他們本階級的路線——一種必然與資產階級決裂的路線呢？史大林和布哈林說過，資產階級必然與無產階級決裂。他們雖然已賢明地作出這種『預言』，但他們却命令無產階級苦苦跟着資產階級的尾巴，一直到牠被一脚踢開爲止。當蔣介石公開進行他們已『預言過』的決裂時，史大林

却閉上眼睛，不睹惡事，布哈林塞住耳朶，不聞惡事，而鮑羅庭——魯易——勃勞達——杜里歐之流則三緘其口，不發一言。當時衆議紛紛，人心惶惶，並不是對蔣介石，而是對托洛次基而發，蓋托氏正在這個時候，要求宣佈中國共產黨獨立（這個要求是不蒙垂聽的）。

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托洛次基把一篇題爲『中國革命之階級關係』的論文交給蘇維埃報界發表，結果受了拒絕。在這篇文章裡，托洛次基戒人注意『中國的皮爾蘇斯基』，並宣稱：『假如波蘭的皮爾蘇斯基需要三個年代來完成他的發展，中國的皮爾蘇斯基從國民革命過渡到民族法西斯主義所需要的時期就更短促得多。……一個受了束縛的共產黨既然充當一個招兵代理人，把工人帶入國民黨內，這個黨的政策就是準備讓一個法西斯的專政順利的建立於中國，這個專政的建立爲期不遠，等到無產階級不顧一切迫得從國民黨往後跳時，就要實現……把工農趕入資產階級的政治營壘並使共產黨做國民黨內的一個抵押品，也就是實施客觀上等於叛賣的政策……照其目前的形式看來，國民黨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一種「不平等條約」的體現物。假如整個中國革命要求廢除帝國主義列強的不平等條約，那末中國無產階級就必須取消本國資產階級的不平等條約。』（註四十二）

但史大林曾說他從事搾檸檬，這些檸檬們替他找到張作霖及富商的關係，尙未加以充分利用。蔣介石誠然和張作霖有關係，但蔣並沒有引誘他『轉到革命方面』，他倒還設法和他商量聯合反對左派。（註四十三）蔣又誠然知道如何從富商關係中募欵，只不過這筆欵並不是付出來資助革命而是資助反革命吧了。但既然按照史大林的說法，蔣及其他掌握軍權的『能幹的人』『只能引導牠（指軍隊）去反對帝國主義者』，那末，工人準備武裝抵抗同一軍隊底進攻的問題就當然談不到。史大林正因爲想担保不發生任何這一類的萬一之變，他才下令把工人的武裝隱藏起來。

因此，當取得第一師聯絡的千載難逢的機會到來時，共產黨領袖陷於無法決斷，這是易於了解的事。第一師當時正駐守該市，積極站在工人方面反對蔣介石。

第一師是由飽經鍛練的革命隊伍構成的，他們在革命中受過教育，且深深自覺到他們與工人聯合的堅固的紐帶。這些部隊曾憤然於白崇禧三月二十一日的禁令，並在第二日終於悍然不顧這些命令而開入上海市。蔣介石抵滬後的第一個目的就是調離這枝軍隊。他就在那個星期內下令讓他們離防。師長薛岳受了他的隊伍的壓廹，立即去找共產黨的中央。

他告訴他們說，『我已接到蔣介石令我離滬的命令，我怎麼辦呢？』他提議反抗蔣，並讓他的隊伍準備和他作戰。他提議藉陰謀反革命之罪，逮捕及監禁蔣氏。（註四十四）薛岳的提議把整個危機的關鍵交到共產黨領導機關的手中。陳獨秀等躊躕不决。但還有衞金斯基和另外半打共產國際的『顧問』呀。他們也躊躕起來了。他們竟騎牆觀望起來了。

『他們對這個斷然進攻蔣介石的提議，沒有明白的答覆。他們勸薛岳怠工，裝病。』但蔣不肯延緩。『時機不容延緩，且終於到來了。薛岳接到一封哀的美頓書，當他再度向黨報告時，沒有別的出路：或者得到共產黨的支持並在牠的領導之下執槍抵抗蔣介石（這是薛岳的建議），或者服從命令，從上海調去一枝龐大的，從革命觀點看來，又是寶貴的武力。』（註四十五）

共產黨領袖們因爲害怕負上勸告薛岳不顧蔣的命令而留駐上海之責，故向蔣介石和白崇禧呈遞鄭重的請願書，謙恭的請求他們讓第一師留駐該市。他們向工人重複保證，稱一切都很好。凡是拒絕受催眠的個別共產黨員和工人階級的領袖均弄得癱軟無力了。（註四十六）决定的關頭過去了。薛氏的隊伍被調開，先是調離閘北，隨後又全部乘車離滬他去了。兵士們摸不着頭腦，但仍然信仰共產黨的領

導，他們遂毫無反抗的被調開了。（附註一）上海的工人階級區域遂被白崇禧，劉峙和周鳳岐（孫傳芳的叛徒）等徹底反動的軍隊佔領。

在上述同一個星期，即四月的頭一個星期內，開始零零碎碎的襲擊當地共產黨的中心機關。大批人被捕，幾隊糾察隊的巡邏隊被繳械。受共產黨影響的市黨部被封閉。軍隊的政治部人員於四月五日開會，通過決議，要求蔣重新宣佈他對國民黨紀律信守不渝，且釋放被捕人來證明這一點。翌日，蔣的隊伍突然襲擊政治部的機關並捕去十九個辦事人員，這就是答覆。兵士們據人們告訴他們說，他們正在逮捕『反革命派』。

政府公報煞費苦心的宣稱這些逮捕沒有虐待共產黨人之意。牠斷定『操縱政治部的人正在秘密扶植反動勢力，妨礙北伐的進展。』（註四十七）在同一天，張作霖的兵士得到外交團的許可，衝入北京蘇聯大使館，把該處發現的二十個中國人通通捕去，李大釗（共產黨創辦人之一）也在其中。（附註二）蔣急忙通電俄國大使館，表示他的『憤慨』和『抱憾』。他稱這次搗亂爲『空前駭聞之大暴舉』並且『敬以最誠懇之友誼，專電奉慰貴代大使。』（註四十八）蔣的通電在莫斯科被人得意洋洋的引證，藉此進一步證明他萬萬不至籌劃舉行一個政變進攻工人。（註四十九）但是當上海的外國當局響應北京的侵襲，在俄國總領事署週圍佈警備線，搜查一切進出行人時，蔣却小心保持沉默了。一位訪員的專電說，『外人方面均疑心蔣介石一派也許並不反對剝奪俄國領事館的自由。』（註五十）

蔣氏到滬之後，在共產黨人替蔣氏佈置的某次典禮上，蔣曾確確實實親贈『共同奮鬥』的旌旗給糾察隊。（註五十一）但四月六日，當他在龍華發出如下的命令時，他便洩

（附註一）一九三〇年至三四年薛岳成了蔣的最親信部屬之一，又是圍剿農民紅軍最殘忍的將軍之一。

（附註二）李大釗及其餘十九個被捕者後來均被絞殺。

露他所謂『共同奮鬥』的意義了：『凡工會糾察隊等武裝團體應歸總司令部指揮，否則認其爲對政府之陰謀團體，不准存在。』（註五十二）裝模作樣的時期很快就要完結了。

當共產黨和左派組織慶賀汪陳宣言的祝電如雪片飛來時，蔣的代言人吳稚暉在一次右派政客的會議上說道，汪陳宣言只是兩黨領袖間的外交式的友誼談話而已。牠於我黨的政策無關。吳氏宣稱，在國民黨方面說來，牠只是容納共產黨人，並非和他們聯盟。他又說，『至於容納共產黨乃是叫共產黨內的個人來服從國民黨主義，他便是國民黨。至於友視不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充其量也與所聯之俄國一樣，請他們「予我黨助力」，不是請他共治中國，更不是一定容許他們來鼓吹共產主義……然若有觝觸國民黨或竟危害國民黨者，……我們可以相當的制止他們……若出了友誼的範圍或要共治中國，甚至於他們獨治中國，那我們的擁護（國民黨）也不得不增高力量了。』（註五十三）

臨時政府到了現在已奄奄一息了，蔣委定一個『臨時政治委員會』來代替牠，進行接管和整頓一切民政機關。這個委員會的首腦就是吳稚暉。其他事情差不多通通準備好了。他事先已從他自己的最可靠的部隊中派出一枝軍隊到南京去肅清城內敵視他的軍隊。後來他又親自匆匆出發巡視結果。大約四月九日，這次軍事活動毫不費力地完成了，許多靠不住的部隊都繳了械了。（註五十四）在上海，講價還價，玩弄陰謀，裝模作樣，往來談判，外表妥協和發聲明的時期正在結束了。政客們退到舞台後面，流氓們出台了。

行動時刻的臨近恐怕最清楚的反映在白崇禧總指揮部政治部每天在中國報上登載的半幅標語上。革命軍佔領上海後的頭幾日，用大黑字連日刋登這幾個爛熟的口號：『打倒帝國主義！剷除封建勢力！』但從四月七日起，態度改變

了，先是狡猾閃躲，不久就悍然直白了。
四月七日：『打倒破壞國民革命的反革命派！』
四月八日：『反三民主義即反革命！』
四月九日：『打倒後方的搗亂份子！』
四月十日：『擁護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
四月十一日：『我們士兵，在前線拚命犧牲，良好的工友們決不會在後方要挾罷工擾亂秩序。』
最滑稽的是四月十二日晨的標語：『鞏固農工商學兵大聯合戰線，努力實現三民主義！』我們稱之為滑稽，那就是因為打擊恰好就在是日黎明之前來臨了。機關槍與步槍聲響澈剛剛醒覺的全市。工人們一覺醒來，發現這件不可思議的，不可能的事發生了。他們被他們底領袖的不可恃的無知弄糊塗了，他趕快拿起他們身邊還有的武器來保護自己。誰如果在是日黎明之前數小時，和馬爾勞小說中的喬一同倉卒就道，也可以一樣的問：『他們一以當十，又與中國共產黨的訓令不一致，他們那裡能夠抵抗一枝軍隊呢？這枝軍隊將運用牠的具有新式武器且佔有進攻優勢的資產階級志願軍團來反對他們。』（註五十五）

第十章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政變

第十章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政變

四月十二日早晨四時，在祁齊路交涉公署的蔣介石司令部裡有一支軍號嗚嗚吹起來。駐泊南市的一艘中國軍艦也用汽笛聲應答。『同時，機關槍聲突發，不斷轟擊。』(註一)閘北，南市，滬西，吳淞，浦東和曹家渡一齊受襲擊。這件事之發生，除工人外，沒有一個人覺得奇怪，因爲『中外一切當局者於午夜之後均秘密偵知早上將要發生的事件』。(註二)

流氓們在各地動員起來行動，他們穿着土布制服，臂上綳着白色臂章，上面寫着『工』字，他們『已在漏夜組織的秘密隊伍中熱狂工作，黎明出現宛如天降……』(註三)字林西報稱他們爲『武裝的國民黨工人』。上海工部局巡捕房報告指他們爲『商團』。大陸報稱之爲『國民革命軍』。佛朗卡，喬治・索珂爾斯基報告道：『與青紅幫談商已妥，故某晨他們充當「白色」工人進擊和槍殺共產黨人。』(註四)他們不是『從天』而降的，而是按照某一定的暗號，『從租界衝出』，(註五)然後與白崇禧軍隊的精選部隊合力進攻散置於全市的工人階級組織的。在許多場合，比如在南市的福州會館及浦東的警署等場合便是，經過一場短促的劇戰之後，各地工人的陣地便直接被那些流氓佔取。他們的地方一被佔領，工人糾察隊和幫助他們的人通通受即時的，殘惡的處决。他們的武器被剝奪，『而且甚至他們的衣服和鞋子也被剝掉了。』(註六)每一個

反抗的工人都當塲射殺了，其餘就被綑在一起，押到街上或龍華司令部槍决。

凡是工人的武力較爲強大，抵抗也大概較爲猛烈的地方，襲擊者便採用其他策畧。有一隊流氓大約六十人，於上午四時半左右向閘北的湖州會舘開火。這建築物是總工會的機關所在地，由幾隊糾察隊駐守。這些驚愕的工人衛兵喝問襲擊者是何工會。『北伐軍』，其答覆如此，炮火繼續打去。糾察隊亦還擊。會舘面臨的街上充滿礮火聲，二十分鐘之後，有一個名字叫做邢霆如的軍官率領一連兵到來。邢某喝令停戰。他向糾察隊大呼：『不要打我們！我們是來幫助你們解除這些人的武裝的。』炮火停止了。他從街上提議雙方交出武器。他假裝進行繳掉若干流氓的械，而且在糾察隊的懷疑的目光之下，甚至把他們若干人牢牢的綑起來。因此，大門打開了。邢某和他的部隊被請入去。據說，甚至還向他們供奉茶烟。這位軍官向糾察隊的總指揮顧順章說，他已奉命根據戒嚴條例進行『武裝調停』。他叫顧伴他到司令部去，這位糾察隊領袖欣然首肯，並帶同他的六個部下和邢一道離去。到街上跑了幾步路，邢突然向顧說：

『我們已繳了這些游擊隊的械。我們也要把你們的隊伍繳械了。』

顧嚇得一跳。他答道，『你不能這樣幹，那些人是流氓。我們糾察隊是革命工人。爲什麽要繳我們的械呢？』邢不做聲。他的部隊圍攏起來。顧和六個人都被繳了械，且被押回總工會會所。幾分鐘之後，一支流氓軍大約有二百人衝入這座建築物，兵士袖手旁觀，他們野蠻地襲擊這些大驚失色的糾察隊。

顧和副指揮周恩來於混亂中逃走。他們帶怒帶驚闖入第二師部——去抗議這次襲擊！他們被冷置一旁。他們遂設法逃出，躱藏起來。（附註一）這時湖州會舘已陷入攻擊者之手。在該市其他多數工人中心機關中，同樣的方法也得

到同樣的結果。上午六時左右，工人的最後根據地就是商務印書舘。該地尚有一支糾察隊，大約有四百人，繼續據守，抵禦那些佔壓倒優勢的襲擊隊伍。

當流氓襲擊，軍隊出頭要求停戰之時，據守商務印書舘內的工人重新發一排槍來答覆。軍隊於是奉令參加襲擊。一切欺騙的企圖都拋棄了。該建築物遂四面八方受包圍。寶山路上的炮火聲幾點鐘不絕。工人們不過有幾挺機關槍和五十枝左右的步槍，他們就這樣死守下去。他們不愧爲好領袖，這些上海無產階級的無名保衛者。他們的英雄主義一定不是從絕望中，而是從悲苦，亦即從一種被出賣的感想中產生出來的。國民黨的子彈或國民黨劊子手的大刀絕滅了他們底肉體的生命之後，這種感想將要長存不滅。他們一直抵抗至傷亡過半，子彈已絕才罷休。過了中午，這些襲擊者才小心翼翼的步進這座彈穿的建築物。（註七）

字林西報佯笑道，『除了解除共產黨人的武裝之外，軍隊尚採取什麽行動，這一點自然無從曉得。中國當局也不想公告於世。』外人的最初報告把死傷數目減少了，但英人操縱的上海工部局捕房後來得出較爲眞實的人數，據牠報告說，在那一天的軍事活動裡大約有四百個工人遭殺死。（註八）總工會主席汪壽華就是失蹤者之一。（據後來發覺，他於是日下午之前被流氓綁走，送到龍華司令部，三天之後，他遂遭處死。）四時，軍事當局宣告他們已『掌握』大局。

陳羣（附註二）是流氓頭張嘯林的秘書又是白崇禧軍隊的政治主任，他宣布立即『改組』總工會的計劃，改組的辦

（附註一）顧順章留在共產黨內，至一九三一年他就做了叛徒，投降國民黨，並成了最兇殘的殺手，後來又成了蔣介石反共組織的首腦。周恩來逃出上海，後來成了江西農民紅軍政治領袖之一，一九三四——五年他隨軍逃至遼遠的西北。現在他們又重新在蔣介石陣營內聯合起來了。

法就是三月在江西和浙江所幹的那個老套。

他宣稱，『政府的政策志在使工人與革命軍及政府合作。但是工人一成了擾亂的根源，擅自幹他自己的足以危害革命和擾亂治安的工作，那就必須使他就範。』

新近組織的工人聯合會立即接管被佔的工人機關和自行介紹如下：『上海總工會係少數共產黨徒所操縱，以壓迫恐嚇欺騙之手段刼制工友，而使工友供其犧牲。現在工友之因罷工失業者日益增多………該總工會………反更加壓迫以陷工友於死亡，造成彼輩國家社會之搗亂機會………本總會………（之）………用意全在實行中國國民黨三民主義，以謀工人本身最正當最確實之利益，以謀中國建設，使得國際之平等自由。………現在該總工會之糾察隊業經一律繳械，已不能再施其壓迫於我工友，凡我工友可以完全自由。希即派代表前來本總會接洽，靜候解決………』（註九）

但總工會及其他共產黨組織尚未遭全部破壞，他們尚有充分的氣力向蔣介石致送新的呼籲和請願書。上海市黨部久已被逐出辦事處，他現在又發出一篇宣言說，『我工人羣衆立即不稍退却，整頓隊伍，………軍事當局亦當將槍械交還工會，切實保護工人組織。』（註十）實際上已死亡了的臨時市政府致白崇禧一函道：『查工人糾察隊在過去不惜重大犧牲，響應北伐軍，消滅直魯匪軍………上海克服以後，協同軍警維持秩序，對於地方，亦不無微勞足錄，是以蔣總司令對之極爲贊許，贈以旌旗，題曰「共同奮鬥」………。』該信於結束處必恭必敬的懇求發還糾察隊的槍枝。（註十一）是晚，共產黨人在閘北向羣衆演講。他們口發怨言道，工人們『數年來已不斷幫助國民政府，最

（附註二）陳羣和楊虎充當蔣介石的劊子手的指揮，潛赴寧波及其他鄰近城市，殺害成千成百人來完成工人運動的『改組』工作。『上海狼虎成羣而出』，這句話曾流行一時。

近還替他們克服上海……他們已一貫維持紀律……（他們）又不僅已遵守法律，且協力維持它。』結果通過決議，極力主張『重新請求當局發還已繳槍枝』。（註十二）

所有這些事情都是眞實的，太眞實了。僅僅到了現在，戰鬥已敗而行動的時機已無可挽回的消失於過去鑄成大錯之中，總工會才於四月十三日發現一點子可憐的勇氣，宣佈一個抗議的總罷工，並宣稱：『誓死奮鬥，寧死於以國民革命爲旗幟的軍隊之手，雖死亦榮。』（註十三）

共產黨領導已把工人們送到蔣介石們的礮口之前，但牠於四月十三日尙號召工人『準備犧牲一切，恢復反對右派勢力的鬥爭。』（註十四）

工人很可以問一問：『什麽樣的反右派鬥爭呢？』

而且他們現在如何去鬥爭呢？共產國際的訓令已叫人裝死——埋藏或穩匿他們的武器——希望藉此來避免『公開鬥爭』。現在敵人已迫使他們作『公開鬥爭』。他們便無可奈何地任人擺弄。

但雖然在四月十二的嚴重日子，領導已完全破產，尙有十萬工人左右響應大罷工的號召。（註十五）這就是上海工人階級紀律和勇氣不墮的明證！海上交通停頓，電車工人離廠，滬西多數紗廠工人和楊樹浦各工廠半數工人均起來響應此次罷工號召。

四月十三日正午，工人在閘北青雲路召集一個羣衆大會，通過決議要求發還被奪槍枝，懲辦工會破壞者及保護總工會。（註十六）後來又起草一封請願書，把這幾點要求包括入去，於是組成一個請願隊伍，想遊行至第二師部，把請願書遞交周鳳歧將軍。女人和孩子都參加了。沒有一個人携帶武器遊行。他們在滂沱大雨之下轉入寶山路。當他們看看行到義品里對面，離軍部甚近的時候，在那裡迎候他們的機關槍手立即開火。槍彈從馬路兩面向厚結的人羣密集射去。男男女女和小孩哭喊連天倒臥泥濘中。人羣四散狂逃。機關槍尙繼續射擊逃亡的工人。泥濘的雨水注入

馬路凹轍，均成血河。待機而動的小步隊從鄰近的衖堂中衝出，用刺刀向人羣亂刺，揮動步槍槍托和大刀亂打。他們爭先恐後追趕那些逃命的示威者，許多人都被追到自己家裡，追到義品里，寶通路和天通庵路，工人階級聚居的馬路上。男女工人都被拖出。『凡是反抗的都當塲遇害或者受傷……許多受傷者都躺在原地待死，沒有人過問。不到一點鐘，馬路就已肅淸。』（註十七）有一位目擊者見到屍體用搬運貨車搬走。『有八輛以上裝滿死屍的貨車。』三百餘人遭殺，受傷者數目更多。不少重傷者『和死者一道搬去埋葬。』（註十八）

上海工人被人當做『擾亂革命軍後方』的『反動派』來槍殺。蔣介石發出宣言（註十九）罵共產黨徒『與北方軍閥勾結，陰謀破壞革命運動。』（附註一）

現在在全上海建立起來的恐怖局面，外人勢力也有一臂之助的。法國當局之間接幫助是最顯著的，因爲法租界包打聽的首腦就是黃金榮，他把他的所有部下都派去作反對工人的活動了。公共租界工部局捕房和英日的衞軍合作，從十一日晚上開始舉行不斷的侵襲，有幾次還是在所謂北四川路越界築路鄰近的中國領土上發生的。他們採取這些手段是得到『龍華國民黨軍事當局的許可的』。（註二十）四

（附註一）反革命的方法是沒有什麽新奇的。雅各賓黨人被人當作『保皇黨』和『彼特走狗』送上斷頭台。列寧和托洛次基被稱爲『德皇走狗』。數年之後，托洛次基又要成了『希特勒走狗』，而史大林也把成千成萬異己的工人當做『法西斯間諜』和『天皇走狗』來槍斃。在西班牙，工人們又因爲『對反法西斯鬥爭怠工』而被槍殺，而革命家也被誣爲『佛朗哥走狗』。只有在西班牙，史大林黨才盡了蔣介石的劊子手和青幫長槍隊所盡的作用，這些劊子手和流氓也在上海成羣的殺死過『張作霖走狗』哩。

月十四日晚上，英國的鐵甲車與日本陸戰隊合作，小規模的侵襲越界築路區，在侵襲時，有幾次使用機關槍。（註二十一）到處都舉行嚴峻的逐戶搜查，並發生大批大批的逮捕。（註二十二）犯人成批移交龍華司令部。他們在該處要受軍事法庭審判，這些法庭是根據蔣介石頒發的戒嚴條例成立起來的。這些軍事法庭完全受軍事長官操縱，而這些長官又是賦有權力在任何『緊急』情形中可『自行斟酌』的，因此牠們就成了官式恐怖主義制度的工具，這個制度在往後的幾個月中，送掉了確確實實成千成萬工人學生及其他人的生命。

這種恐怖局面首先是對付工人和共產黨人，但有一個時候也跨過了資產階級財產的界限，即，跨過了原來要牠來維持的不可侵犯的財產界限。中國資產階級已知道不得不求助於蔣介石和流氓來反對工人。現在牠迫得要忍受牠自己底救命恩人的予取予求。法國資產階級於一八五二年『把流氓無產階級，把十二月十日社的首腦所率領的這些無賴漢和叫化子推上政權』（註二十三），中國資產階級也像法國資產階級一樣，於一九二七年把青幫和蔣介石率領的都市殘渣抬到自己頭上。中國資產階級現在也像牠的法國標本一樣，必須對專門的服務付重賞。牠『讚美劍；現在牠要受劍來統治了……牠使公衆集會受警察的監視；現在牠自己的客廳也受警察的監視……牠曾經不經審判便流徙工人；現在資產階級也不經審判就被流徙了……（他們的）錢袋被刼……資產階級對革命不斷叫出的字眼就是聖·阿爾遜尼斯對基督徒所說的話：逃跑，沈默，服從！巴拿帕特對資產階級叫出的字眼也一樣……』（註二十四）蔣介石對上海的有錢人也說出同樣的話。只不過除了逃跑，沈默，服從之外，他還更直白的加上一句話：『付錢！』吧了。

資產階級已團結在蔣的麾下，牠之這樣幹只是因爲懂得他會從共產黨，從工人，從罷工和暴動中救出他們吧了。他

以一種足以使最苛刻和苦惱的資本家也心滿意足的殘忍手段，完成他的任務：實行『北洋軍閥甚至在其自己地盤內也不敢實行的清共工作』。但是到這裡就發生了岔子。『反共運動在該地本應完結，人民(原文如此。)也應安居樂業。但人們藉口清共，竟採取各種迫害方式。人被綁架且被迫而捐助巨欵，充作軍事費。……分明沒有理由或公道……也不用什麽法庭……有幾百萬塊家產的人都被誣指爲共產黨……即在此刻，什麽人都無法安然避免那已經成立的裁判所。』（註二十五）蔣介石曾『侈談赤色無政府狀態的威脅』，用驚慌的態度使資產階級吞聲屏息。現在，蔣介石却要催促兌現，『給牠嘗一嘗未來的滋味，這個未來是牠已預言過的。』

『在上海和上海附近，中國商人的處境是可憐的。在蔣介石將軍獨裁的掌握中，他們不知道明天將發生什麽事情，沒收財產，強迫借欵，流放，或許還要處决吧。……軍事當局已下令改組商會及其他機關，這些機關要推舉一批大抵使蔣介石和白崇禧滿意的新董事，這正如他們下令改組工會一模一樣……把中國較善良的階級擯之法律之外，這個手段是恣意實行。』（註二十六）

當替新南京政府籌集的三千萬借欵遲遲未遂時，商人便接得『軍隊勸捐的通知，並暗示如此事不成，恐跟着就捕人……』（註二十七）甚至國中最著名的實業家榮宗敬也不豁免。蔣要他出五十萬元。當榮氏想斷斷論價時，蔣立即把他逮捕起來。榮氏被押入獄，據說後來花了二十五萬把他買出來。其他人則還要付更多錢。（註二十八）

法西斯或軍事獨裁者宛如殘暴的衞兵，他們盤踞在那些嚇得要命的顧主們的筵席上，幾乎隨意所欲的把羅列桌上的珍饈大啖特啖。蔣介石雖要在其本階級中握有支配權，然後出來替牠服務，但在進行中，他仍不外是牠的傭役而已。（註二十九）假如蔣介石似乎成了一個假裝爲國家權力之首的強盜，那只不過因爲他已替他的主人，盡了很好的

職責吧了。他們必須付給他的代價一點也配不上他曾經摧毀羣衆運動而解救了他們的工作。蔣介石在南京建立政府，銀行家和商家趕快擁護牠，他們這樣做正是證明上面這句話呵。他們自以爲報答甚優，因爲在滬變數日之內，對寧波，福州，厦門，汕頭和廣州工人施行同樣打擊的消息傳來了。這些城市差不多處於同等的情境之下。蔣的部屬應用同樣的野蠻手段來鎮壓工人，這些工人的混亂，狼狽，被解除武裝和徬徨無告不下於他們的上海同志。（註三十）

在『民族統一戰線』與『四個階級聯盟』的名義之下，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已把中國工人階級的自由和獨立奉送給人。他們留給工人的無非是供犧牲的生命而已。共產國際的中央機關報恰好在政變之前夜已說過：『國民黨病在血管裡缺少了革命工農的血。共產黨必須灌注這樣的血，藉此劇烈的改變這個局面。』（註三十一）事變已給了這些話以多麼可怕的內容呵！國民黨現在已要求——而且已得到——牠的一磅肉了。

歷史還沒有幹完牠的可怕的惡作劇。在漢口，汪精衞已抵埠，告訴他們蔣已贊成召集國民黨中執會的聯席全體會議來『和平』解決一切爭端。現在消息傳到武漢，稱蔣將由他自己一派人在南京召集他自己的全體會議。四月十三日——注意：四月十三日——即當上海流血已達極點之時，漢口的第三國際代表團拍給蔣介石如下的通電：

『……第三國際代表團現在在中國，且曾一貫渴望謁見閣下；但因爲我們曾分頭遊歷全國各地，路途遠隔，故不果……現在消息傳來稱閣下已決意在南京召集中央委員會及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若干委員開會。這種舉動顯然違背閣下與汪精衞訂立之協定，該項協定曾規定黨內一切引起衝突之問題將交由中央委員會之全體會議解決之，而該會議將在武漢召集，閣下亦將前來參加。閣下在這個危急的關頭來召集中央委員會幾個委員的會議，革命的敵人將自然把

此事解釋爲國民黨內部的破裂。此刻正當國際帝國主義聯合一致向中國國民革命驕橫進攻之時，革命力量的統一實乃無上必需，……鑒於局勢危殆，我們敦勸閣下放棄原定的南京會議，蓋此種會議實際上將使黨分裂。在這個危急關頭，破壞國民革命戰線的嚴重責任將由閣下負之。我們勸請閣下贊成將黨內問題之一切爭執交由中央委員會之全體會議處理。閣下若採納此議，我們將欣然造訪南京，與閣下親自討論一切重大問題。第三國際將盡全力幫助一切革命力量形成一個統一的國民革命戰線。——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三日，M·N·魯易代第三國際代表團叩。』（註三十二）

蔣介石正用機關槍的言語來向上海工人講話，但共產國際的代表，魯易，勃勞達，杜里歐，曼尼，鮑羅庭等却還能夠彬彬有禮的跑到他的面前，哀求『革命力量之統一』。也許滬漢間的電報阻塞了吧。他們還要『和解』這位驕傲不可一世的將軍哩。他們說，他的舉動『實際上將使黨分裂』。難道蔣介石還要在南京召集一個會議才使這些共產國際的先生們相信黨內分裂正是他所渴求，又正是他所促進的麽？他當然欣然應命！上海工人既然遭受摧殘和流血，這個『嚴重的責任』誠然要輕輕地放在他的肩上。上海馬路染遍了工人的血，工人的屍體尙溫，尙暴露未葬，但是假如，假如蔣採納史大林，魯易之流的『獻議』，共產國際還要繼續『盡全力』於國民革命的統一戰線的。但假如不採納呢？假如蔣不理會他們呢？何消說得，革命的敵人就要知道國民黨內部已發生了破裂了！這些革命敵人眞聰明得可惡。這樣卑躬屈膝的向劊子手哀求（這位劊子手恐怕還沒有停止屠殺的工作來訕笑這件事）概括了共產國際指示給中國共產黨的全部有害的，違反工人階級的政策。

在莫斯科，共產國際各國黨的代表對中國事變的發展完全蒙在鼓裡，各國支部更不消說了。上海事變的消息傳來彷

彿像某種難以相信的，令人紛亂的災刼，因爲這一災刼事先並沒有警告。消息只靠謠言流佈於蘇維埃首都。整個一天已過，尙沒有任何官式的聲述。在這幾小時當中，克林姆宮裡面究竟做什麼事情，沒有記錄可資參考。一位資產階級訪員終於能夠發電：『蘇維埃當局經過執拗的否認蔣介石與國民黨極端派發生嚴重異議的消息之後，今晚却宣告此事不幸是眞的了，且對於國民革命軍與「武裝的勞工團體」發生械鬥，國民革命軍在其他南方各城市內也忙於解除工人團體的武裝等事實，表示悲惋。』（註三十三）在共產國際內部，驚訝是無例外的，狼狽周章是無止境的。他們花了幾多天來估計他們所陷的現實情形。直到政變發生的那一天，共產國際的專家們尙在寫文章堅決否認這個政變之任何可能性，而這些文章在這次政變發生了許多天數之後尙刋載在共產國際的中央機關報上。例如，四月十六日，國際通訊報上便刋載了德國共產黨領袖阿爾斯特·台爾曼（他在幾年之中就束手無策的把他的黨送給納粹劊子手）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宣稱：『國民黨的資產階級右派及其領導已被打敗了』——還遠在一九二六年呢！他吹牛說，蔣介石『必須服從……最高軍事會議，而這個會議的多數却由共產黨和國民黨員構成。』左派和共產黨人合成的領導『正共同一致爭取……民衆各階級的民主獨裁！』他末了嘲笑帝國主義者關於蔣介石變節的『幻想』。（註三十四）

四月二十日——政變後整整八天——國際通訊報又刋載帕拉格的維多·史坦的大文，這篇文章驕傲地宣稱：『分裂……及右派與軍閥妥協的希望……均是謊言，而且沒有成功的機會。』（註三十五）同一日，他在一個『專號』中報告——『蔣介石的叛變！』（註三十六）原來叛徒完全失敗和完全成功——通通同在一天：四月二十三日！這同一機關報絲毫不隱的宣稱：『蔣介石的叛變，不是出乎意外的。』（註三十七）

於是發佈了一批文章和大綱，『辯護』過去採用的政策及其結果。這種論調是史大林親自造成的，他於四月二十一日莊嚴的宣告：『事變已充分和完全證實』共產國際『路線』之『正確』。（註三十八）

消息靈通的華爾泰·杜蘭第（Walter Duranty）從北京發電表示他的信念說：『莫斯科領袖將盡他們之所能去恢復國民黨的統一，即使犧牲更極端的中國共產黨亦所不惜。』（註三十九）他說對了。史大林在和中國資產階級統一的祭壇上，尙沒有停止供奉犧牲。事變雖然證明托洛次基正確，但反『托洛次基主義』的鬥爭必須繼續下去。在上海，借用馬爾勞的話說，共產黨中央『知道托洛次基派的提綱正在攻擊和國民黨的聯合，牠生怕採取任何態度，足以授人以柄，或者正確地或者錯誤地，拿來與俄國反對派態度連繫起來。』因此，牠唯唯聽命推使工人去受屠殺。階級鬥爭的鐵鉗較之莫斯科頒來的教皇勅令更帶強制性。工人們爲『統一』而死，但他們所獲致的唯一統一就是壓迫者反對一切被壓迫者的統一。『四個階級聯盟』底華麗而不雅觀的破外衣被剝除了，剩下來的原來只有上海工人階級底釘在十字架上的屍體。軍閥和銀行家就在這個死屍底下拿掠奪物賭博和做買賣。

第十一章
武漢：『革命中心』

第十一章　武漢：『革命中心』

蔣介石的上海政變對革命施行了一次搖撼的打擊，但是牠本來就不必是致命的打擊。莫大的後備軍尚存在於兩湖，革命潮流正捲入這兩個省份，當地的農民正起來沒收土地，而有組織和有力量的工人已能夠成爲土地叛亂的領袖及其勝利品的保護者了。此刻還有時候來動員和團結這些力量，舉行一個新的進攻，把盤踞東部（以上海爲中心）的反動勢力摧毀。雖然在蔣統治的區域內，工農的組織已受了摧殘，先鋒隊伍也喪失過半，但在四月十二之翌日，反動勢力尚未坐穩。

蔣介石已替帝國主義者及中國資產階級施行了他的打擊，但他們對他尚沒有充分的信任。他已砍斷了國民革命運動的脈管，但是爲了維持他自己的地位，他又不能完全在自己身上剝去牠的保護外皮。他還必須替自己，又替國民黨要求『反帝』鬥爭的領導權。他還必須指斥『不平等條約』，要求至少在形式上廢除牠們。帝國主義的利益集中在上海，蔣介石既已消除了羣衆運動的即時的威脅，他們就暫時沾沾自滿，退處一旁，靜候更進一步的證據，證明他是否應享有他們底慈悲保護之權。

字林西報寫道：『我們一刻也不會輕視蔣將軍的作爲。就本地兩星期以前的情形看來，應該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無情的幹，毫不留情的鎗殺共產黨徒。又照蔣將軍當時的處境看來，採取這一步驟需要無限的不顧一切的勇氣，而

且要具有決心來幹，這點決心他證明是有的。而且，我們充分承認「房子不是一天築成」這句古諺的眞理。同時，蔣介石將軍和國民黨還要完成更多的事情，他們的保證才能兌現哩。』（註一）

蔣介石替江浙資產階級花了氣力，他便要用勒索，恐怖和征稅的手段向他們索取重價。舊軍閥的重担還比不上他的横征暴斂，而且這種舊的重担還一定似乎是一個模糊和相當愉快的回憶哩。總之，蔣與其資產階級師傅們的宴會並不是仁愛的。他必須兇殘的把他們鞭策到自己方面來，而他們也必須忍受鞭打，因爲除此之外，他們就只有破滅之一途了。他的處境是絕望的。他的軍事地位是不足恃的。在奉軍反攻之下，徐州失守，北軍還有意捉弄，從他們的浦口的塹壕方面炮擊他的南京首都。他的軍隊處在號令不一和軍心渙散的狀態中。（註二）蔣背叛羣衆運動，現在也須付出代價了。革命軍百戰百勝的神話是靠羣衆來實現的，沒有羣衆，這一神話也就不靈了。他在戰場上的勝利愈來愈不容易，而失敗的機會則愈來愈顯得多了。

羣衆運動若來一個反攻，分明可以增大這些機會。蔣孤處長江口，假如一道報仇雪恨的浪潮從革命澎湃的幾省沿江席捲而下，蔣一定已被吞沒了。但中國共產黨領導如不澈底改變方針，共產國際的政策如不加以大刀闊斧的修正，這件事是辦不到的。我們必須了解，上海的慘變乃『四個階級聯盟』的政策，工農屈處於國民黨底窒息的範圍之內的直接結果。執行這些政策，結果已一步一步，從廣州到北方，引到大災刼中去。如果不了解這一事實，如果不把上海底悲慘結局的原因加以分析和估計，在言行上來一次唯一足以替革命勝利肅清道路的堅決轉變是不可思議的。但是對中國革命最不幸的就是：由約瑟夫・史大林領導的共產國際來舉行這一次轉變，更是不可思議。

四月二十一日，莫斯科眞理報公佈史大林論『中國革命問題』的大綱，他在這一大綱裡宣稱，造成上海悲劇的事變

進程『證明過去立下的路線是正確的路線』。

他寫道：『這個路線就是國民黨內左派與共產黨人密切合作，就是鞏固國民黨統一……利用右派，又只要他們服從國民黨的紀律，就利用他們底關係和經驗……等的路線。……後來的事變已充分而且完全證明這種路線的正確。』（註三）

托洛次基做了一篇反大綱，但無法公佈，他在這篇文章裡答覆史大林的大綱：『我們很知道：資產階級是怎樣的服從「紀律」，無產階級又怎樣的利用右派（即大資產階級同中等資產階級），利用他們（與帝國主義者）的「關係」，以及他們（絞殺和鎗殺工人）的「經驗」。這種「利用」的史實現在用血寫在中國革命的書上了。但這一點並不妨碍該大綱說道：「後來的事變充份證實這種路線之正確」。誰也不能比此走得更遠！』（註四）

據托洛次基說，事變充分暴露了官式政策的破產。他寫道：階級鬥爭之不能『靠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來進行，流血的四月事變已非常雄辯地證明了，這個事變就是四個階級聯盟底政策的直接後果。』拒絕了解這一點就是『準備在中國革命的新階段中，重演四月的悲劇。』

他極力主張：只有採取一個新的路線才能保證未來不會發生新的和更大的慘敗，這個新路線要使中國共產黨取得組織上和政治上的獨立，而且要組織蘇維埃，當做一個兩重政權的機關，來領導和保障各省的土地革命。組織蘇維埃就是在城鄉中產生羣衆運動本身的眞正可靠的機關。工人，農民，和士兵將用民主辦法選舉他們自己的代表，自行統一在共同的代表會議裡，這些代表會將與正式政府的機關並立，保證土地鬥爭及反軍閥反帝的鬥爭不受迫害。這種根基鞏固的統一將給予那些盤據於武漢政府高位上的小資產階級急進派，以永久的障碍和永久的威脅。牠將使羣衆們擺脫上層的動搖和妥協。一言以蔽之，牠將產生兩重政權，當作走向革命下一階段的過渡。

但是，根據史大林的見解，尙把完全的信賴寄托於國民黨，寄托於牠的『左』派，寄托於武漢政府，他宣布武漢政府現在已成了革命中心，工農將要倚賴牠來進行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來袒護土地的叛亂。

他寫道：『蔣介石的政變表示從今以後，在中國南部將有兩個營壘，兩個政府，兩枝軍隊，兩個中心，武漢是革命的中心，南京是反革命的中心………

『這件事又表示武漢的革命的國民黨由於進行堅決的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將在事實上轉變成爲無產階級與農民底革命的民主專政的機關……（我們必須採取）……集中全國權力於革命的國民黨手中的政策。……從此可以得出更進一步的結論：國民黨內部左派與共產黨人密切合作的政策獲得特殊的力量和特殊的意義……沒有這樣的合作，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因此，蘇維埃的口號是不能採納的，因爲這等於『提出反對當地現政權的口號……亦即反對革命的國民黨政權的口號，蓋當地目下除了革命的國民黨政權之外沒有其他政權。這件事又等於把兩個任務混淆起來：一個任務是採取罷工委員會，農民協會，農民委員會，工會，工廠委員會等形式（革命的國民黨已以此爲基礎）來產生和鞏固工農的羣衆組織，第二個任務是建立一個蘇維埃政府，當作代替革命的國民黨的一個新式政權。』

托洛次基答覆道：『這些話完全表現出人們對革命權力懷着行政機關式的，官僚式的思想。人們不把政府視爲正在發展底階級鬥爭的表現和結合，而視爲國民黨底意志的自滿的表現。某些階級雖然加入和退出，國民黨却依然繼續存在。但就使眞是如此，武漢也夠不上稱做革命中心。蔣介石的偏處一隅的國民黨有了一批舊式的，反動的，唯利是圖的官僚可用。左派國民黨有什麼呢？目前可以說什麼也沒有，或差不多什麼也沒有。蘇維埃口號是號召羣衆起來，經過兩重政權的過渡制度，產生一個新國家政權的眞

正機關。』

在史大林看來，在未來一個時期中，『革命的國民黨底權力的主要根源是使工農的革命運動更向前發展，及鞏固他們的羣衆組織，鞏固革命的農民委員會，工人的工會及其他革命的羣衆組織，作爲未來組織蘇維埃的要素』。

托洛次基問道：『這些組織應採取什麽方針呢？我們在這個大綱裡，找不出一個字談到這一點。所謂未來蘇維埃的『準備』要素，這只是一句空話而已。這些組織現在應該幹些什麽呢？牠們應當舉行罷工，抵貨，打斷官僚機關的脊骨，消滅反革命的軍隊，驅逐大地主，解除高利貸者及富農底隊伍的武裝，武裝工農，一言以蔽之，解決民主與土地革命的一切問題……而且按照這個辦法，把自己提高到地方政權機關的地位上。但是這樣一來，他們就應該是蘇維埃了，只不過是不很配得上牠們底任務的一種吧了。……在已往的羣衆運動中，職工會迫得要盡的機能，已近於蘇維埃的機能（香港，上海等地）。但這些職能，靠職工會來完成是非常不夠的。牠們不能包容城市中接近無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羣衆。但是如進行罷工而使城市貧民儘可能少受損害，分配糧食，干預征稅政策，參加武裝力量的組織（在各省進行土地革命更不用說）等任務，若想以必需的迅速手段來完成，只有當領導的組織不僅包容無產階級的各部分，而且在牠的活動過程中，將他們與城鄉的貧民聯繫起來才有可能。

『人們至少應該想到，蔣介石的軍事政變已終於敲醒每一個革命家的腦袋，使他們認識工會與軍隊分離是一回事，聯合的工農兵蘇維埃又完全是另一回事。革命的工會與農民委員會之能夠喚起敵人的仇視不下於蘇維埃，但牠們抵抗敵人打擊的能力却遠遜於蘇維埃。

『假如我們要認眞的談及無產階級與城鄉被壓迫羣衆的同盟——不是領袖間的「同盟」，即由可疑的代表成立的摻假的同盟——那末，這個同盟除蘇維埃之外，找不到其他

組織形式。只有那些寧願依賴妥協的領袖而不依賴下層革命羣衆的人才能否認這一點。』

史大林一方面拒絕蘇維埃的口號，一方面宣稱『對抗反革命的最重要的手段（消毒劑）就是武裝工農。』

托洛次基答道：『武裝工農自然是一件很好的事，但一個人必須合乎邏輯。在中國南方已經有了武裝的農民，他們就是所謂國民革命軍。但是他們却不是什麽「對抗反革命的消毒劑」，他們倒已成了牠的工具了。爲什麽呢？因爲政治領導並沒有經過蘇維埃來包容軍隊的羣衆，而只是以純粹外表上仿傚蘇聯的政治部和黨代表爲滿足，但政治部和黨代表因爲沒有一個獨立的革命政黨，也沒有兵士蘇維埃，所以已經轉變而爲資產階級軍閥制度的空洞掩護物。

『史大林的大綱拒絕蘇維埃的口號，認爲牠是「反對革命的國民黨政府的口號」。但是當時所謂「對抗反革命的重要消毒劑是武裝工農」這句話是什麽意思呢？工農自己武裝起來反對誰呢？難道不是反對革命的國民黨政府的權力麽？武裝工農的口號若不是一句空話，一句遁辭，一種僞裝，而是一個行動的口號，那牠的尖銳性就不下於工農蘇維埃的口號。難道武裝的羣衆能夠容忍一個仇視他們的官僚的政權來監視或壓迫他們麽？在目前的情境之下，眞正的武裝工農必然要連帶組織蘇維埃……既然宣佈組織蘇維埃尙非其時，同時又提出武裝工農的口號，這只能引起混亂。在革命往前發展中，只有蘇維埃才能成爲能夠眞正進行武裝工農及指導這些武裝羣衆的機關……

『……有人說：武漢政府却是一個事實。馮玉祥也是一個事實，唐生智也是一個事實，他們手頭上都有武裝力量；而武漢政府，馮玉祥，唐生智都不願組織蘇維埃。若組織蘇維埃就要與這些同盟者破裂。這種見解雖沒有在大綱中公開說出，但牠在許多同志心目中却成了很重要的論據。我們已從史大林的口中聽到他把武漢政府稱爲「革命的中心」，「唯一的政權」。同時在我黨的會議中，替馮玉祥

大吹大擂：「工人出身」，「忠實的革命家」，「可靠的人」等。所有這些，都是重覆過去的錯誤，而在當時的情境來重犯這些錯誤，實足以造成更悲慘的失敗。武漢政府與軍事首領之反對蘇維埃，只因爲他們用不着一個急進的土地政綱，用不着和大地主及資產階級眞正破裂，因爲他們暗地裡懷着和右派妥協的思想。但這樣一來，組織蘇維埃就越發重要，這就是把武漢革命份子推向左方以及迫使反革命派退避的唯一道路。』

因此，史大林拒絕了中國羣衆經過蘇維埃而發揮其獨立的創意力的遠景，他竟贊成一個聯盟，這個聯盟經過左派國民黨的小資產階級急進派的中介，繼續使羣衆隸屬於資產階級。這就是支配中國共產黨往後底方向的路線。托洛次基的見解（要求中國共產黨無條件的獨立，要求建立蘇維埃，要求『與小資產階級羣衆的關係，應高出與小資產階級政黨領袖的關係，依賴自己，依賴我們自己的組織，武裝和力量』遭受機械的排拒，干脆不准發表。中國共產黨人從沒有得到一個機會來較量一下反對派的觀點與他們自己的經驗。他們糢糊地聽到什麽『托洛次基主義』，即一種不屑討論而只須說些反對牠的話便可以的有害學說。俄國工人及共產國際所有支部只接到關於反對派觀點的最簡畧的轉述。但同時，用以闡明史大林所立下的官式『路線』的無數文章却儘可能的發表出來。（註五）

這些文章通通發揮這一卓越的論調：認爲上海中國工人之遭受屠殺完全與共產國際的預言——即關於資產階級『必然』叛變民族統一戰線及此種叛變之無法防止的預言相吻合。他們齊聲一致辯護中國共產黨的行動，而這種行動後來又正是他們兇猛攻擊的靶子。

史大林的四月大綱說：一九二七年春中國發生的事變，『充分而且完全證明』共產國際所採取的政策之『正確』。在同一文件中，史大林又對中國共產黨無法在上海抵抗蔣介石一事加以辯護，當時托洛次基和反對派曾控告上海此

次慘敗乃共產國際強使中國共產黨人執行底政策的直接結果，故他即立加以答覆：

『反對派表示不滿，因爲上海工人並未舉行反對帝國主義者及其僕役的決戰。但他們就不懂得，中國的革命不能採取這樣迅速的速度發展……他們又不懂得人們不能在不利的情形之下舉行決戰……在不利的情形之下而不避免決戰（當牠可能避免的時候）等於使革命敵人的工作更形順利。』（註六）

共產國際戰術的另一位辯護者寫道：『一點事也沒有做，這不是一句眞話……共產黨舉行了一個廣大的反對蔣介石的運動……而且設法發展武裝羣衆的運動……討論這些手段是否足夠是可以的，但上海南京工人起來暴動反對蔣介石的口號却確實只是一個沒有頭腦的步驟，一個漂亮的姿勢。只有極左的空談家才能夠主張在幾十艘外國軍艦和盤據上海的幾萬軍隊監視之時，在上海舉行暴動。應當要做的恰恰相反。千萬不要妄受挑撥，要等候順利的時刻才來行動。蔣介石的政變是在壓迫之下而且還是在武裝的外國帝國主義的保護之下進行的，因此牠是無法防止的。』（註七）

布哈林於四月曾在莫斯科的黨組織做一個報告，他趕忙給這個報告補充一章，辯護那種『隱藏鎗械，不應（？）戰』的政策，並進一步宣稱『共產黨的權威將必然增加，因爲此次武裝政變之前，共產黨久已舉行一個猛烈的反對那位資產階級「獨裁者」的運動。』（註八）稍後，甚至布哈林已因爲中國共產黨實施了他本人過去指示的政策，肆加攻擊之後，他仍然補加幾句話說：『我們必須承認：即使他們把本來能夠實現的都幹了，在目前的時期內，我們也不能在直接鬥爭中戰勝蔣介石……帝國主義者也能夠經過一天功夫的武裝衝突，把上海工人摧毀於血泊之中。』（註九）

有一篇長文章熱心證明中國共產黨毫不猶豫的服從共產國

際的指示，且引證了一番羣衆運動的發展之後，說：『所有這些通通證明年青的中國共產黨在最近的時期內已擺脫了動搖和逡巡，且已懂得刺激羣衆運動的策畧就是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唯一正確策畧。』（註十）

他們所說的話把事情弄得淸淸楚楚：共產黨人將不惜一切犧牲繼續依附國民黨（布哈林厲聲說：『把國民黨旗幟交給蔣介石朋黨是一個大錯誤』）。（註十一）且將首先集中全力，把工農羣衆帶入國民黨中，藉以支持武漢政府，蓋武漢政府『不僅在反對帝國主義和中國軍閥，而且在反對封建制度的殘餘……使國家民主化，樹立勞苦大衆的統治權……牠已把土地革命提到議事日程上。』（註十二）一切信任，一切擁護歸『武漢的革命政府』，歸『國民黨左派』，因爲牠不多不少已成了『共產主義式的國民黨』了。（註十三）

托洛次基寫道：這種政策，這種局勢的估計等於『自動把人的頭顱送去屠殺。上海的血的教訓完全空過，沒有留下半點痕跡。共產黨人像從前一樣，正被人改變爲資產階級劊子手政黨的趕牲口者。……』（註十四）

事變非常迅速的證明誰是正確的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會於數星期後開催，在史大林的大綱上蓋上贊成的膠印。但『革命的國民黨』的將軍們甚至在這次國際會議之前已開始屠殺工農了，這些工農與蔣介石在上海殺戮的戰士一樣陷於束手無策。而史大林捧出來扶助土地革命的武漢政府也正批准了牠的流血鎭壓。假如我們要知這件事如何發生，那末我們還是回到上海，加入共產黨人及其他人的逃亡羣，逃往長江上游以躲避蔣的殺手，並和他們一起抵達漢水與長江的會流點，而總稱爲武漢的華中三大城：武昌，漢口和漢陽就在此地，傍着泥濘的江岸。這裡就是史大林的『革命中心』，『國民黨左派』的首都，據史大林說，如得不到他們的合作，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這些叛亂的模範人物，這些萬事繫於一身的人物到底是誰呢？這些不願意有個工農兵蘇維埃，光是拿着羣衆的鞭子來監視自己的革命大勇者又是誰呢？第一個就是汪精衞，這個最『可靠的』同盟者。我們已知道，汪精衞在廣州和上海受了蔣介石的壓迫而低首屈服，具備了小資產階級政客的特點——軟弱，胆小，而且除了在他的大資產階級長者之前準備退縮讓步之外，什麽事都無决斷。還有徐謙，曾經一度是孔門學者和基督教徒，他可以整天演講罵人，甚至連他的共產黨同僚也遭殃。他今天可以比任何人都高聲對帝國主義者喊殺。但明天就要渾身發抖，嚇得死去活來，首先逃之夭夭了。還有顧孟餘，他早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就已經把農民運動稱爲『暴徒，無賴和游手好閒的農民運動。』但顧孟餘還是『革命的國民黨』中央機關報的編輯哩！還有已故領袖的兒子孫科，他那樣經常改變他的見解和信仰，甚至本來就沒有什麽堅定品質，他自己的同僚，也輕蔑地稱他爲『孫悟空』，即一個觔斗可以打到十萬八千里外的齊天大聖。

外人最熟知的就是漂亮的陳友仁，善於辭令的聖手，又是外交攻擊的能手，但他除此以外便一無所長，他因爲不懂中國話（他生於特立尼達），故只能充當政府代言人，向列強辦交涉。孫文的年青未亡人宋慶齡充當領袖之一只是徒有其名。阿爾多·藍辛獨具慧眼，稱她爲『一個熱心家，致力於其亡夫的理想較之（例如）解决複雜的政局更稱心。』（註十五）鄧演達是繼承廖仲凱爲總政治部主任的人，他在武漢這些領袖中，是更帶機動性的小資產階級急進派，他具有他的自信的勇氣，這一點使他遠遠高出他的同僚。

上述這幾個人就是各以其爪牙建立武漢政府的重要人物。這幾個人也就是『革命中心』的主要台柱。一個月之後，姬塔洛夫在蘇聯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上演說，談及武漢的事件，說：『……人們忽畧了與此有關的一件事——即資產

階級雖然退出革命(！)，武漢政府連想也沒有想到離開資產階級。不幸在我們的大多數同志當中，此事不被了解；他們對武漢政府懷着幻想。他們視武漢政府差不多是無產階級和農民底民主專政的一個偶像，一個模範。』（註十六）

但是托洛次基在五月十八日的第八次全會上就已警告：『汪精衞之流的國民黨左派領袖將必然出賣你們，如果你們一味跟着武漢的首領走而不組織你們自己的獨立蘇維埃。土地革命是一件認眞的事情。汪精衞之類的政客處在困難的情形之下，將完全和蔣介石聯合起來反對工農。』（註十七）

這次預言花不了三個月功夫就證實了。

史大林——布哈林等迫使共產黨和這些領袖建立聯盟之後，便以爲自己在武漢實現了『工農和小資產階級的聯盟』。實際上，這些小資產階級領袖與所謂民族或大資產階級的關係，比之他們與工農羣衆的關係更是無限的密切。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像其他國家的模型一樣，在性質和利益上都不是一致的，而是龐雜和分化爲幾個階層的。最上一層，即小地主，店老闆，手工業師傅和小廠主等的經濟利益，與大地主，大城市資本家，銀行，又最後分析起來，與外國金融資本都有密切的連繫。任何次要的矛盾永遠退到保持現存財產關係的實際一致的後面。假如拿一個放大鏡來照視你們的上層小資產階級，你們將看出他具有他的大資產階級從兄弟的一切汚點。

你們的小地主不僅出租土地，而且恐怕還是市鎮中米舖，當舖或某種小製造業的業主。你們的店老闆也是一位勞動僱主，一位徒弟剝削者，他也許還把他的小小賺頭直接投入土地，用地租的形式從中抽取利得，或採取高利率向農民放欵。加之以，城鄉小剝削者中間的聯繫雖然出於共同而且往往是同一的經濟利益，但大致上還是由於帶有非常強制性的家族和宗族關係造成的。上層小資產階級的利益

與農村封建剝削方法的延續發生關係，此點與大資本家大地主的情形毫無二致。在這二個階層之間只有程度之差，而沒有種屬之別。

另一方面是下層，即小資產階級的基本羣衆，他們就是城鄉的貧民，被剝削的工匠，手工業者，店員，徒弟，中農，貧農和農業勞動者，他們構成農村人口之絕對大多數。這些下層小資產階級的利益不僅與大資產階級的利益直接發生矛盾，而且與小廠主，小地主和小商人的利益越發直接的發生矛盾。這種矛盾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使他們和城市的產業無產階級聯繫起來。

如果把這些區別加以發展，使他們得到政治的表現，則我們一定不在被剝削的貧民中，而在小剝削者的帳房中來找尋這些國民黨左派領袖的階級根源。正因爲如此，所以徒弟之要求從奴隸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店員之要求改良生活，工人在工廠中提出之諸般要求，尤其是貧農的土地要求，在這些領袖看來都不是值得爭取和贊助的正當希望，而是令人驚怖的『過火行爲』，這些『過火行爲』大有推翻他們所處慣了的全部經濟機構之虞。但是也正因爲這些小資產階級剝削者在經濟組織中僅佔着一個次要的，補助的，而且往往是一個中間人的地位，所以他們便要依賴他們的大資產階級兄弟，且一定要靠他們來保護他們的政治利益。他們也許憎恨他們的主人，但他們見着主人却要畏縮和卑躬屈膝，因爲他們有一種不光榮的恐懼心理，生怕被迫而陷入黑暗的被剝削的下層羣衆中。牠們曉得自己不能自立，而他們也不僅樂得在經濟剝削的領域中，而且也樂得在對羣衆的政治鎮壓中成爲中間人。

一九二七年春漢口的情形就是如此。在南京，資產階級已找到蔣介石做牠的保護者和工具。在漢口，牠也迫得求助於軍閥，且找到唐生智來做他的工具。唐生智本人就是湖南一個大地主，漢口商會和有關係的縉紳都靠他來保護。因此，我們將從國民黨左派領袖與唐生智及其他軍閥的關

係中，發現我們剛才描述過的階級關係，幾如數學一樣完整表現出來。關於這一點的特別巧妙的譬喻，歷史還要深深感謝武漢國民政府的最高顧問，鮑羅庭。

安娜・魯意絲・史特朗（Anna Loauise Strong）問及他關於武漢軍政和民政權力的情形。她認爲『民政權力立得穩，軍權就一定讓步的。』

『他笑起來。他說：「你見過一個兎子見到一條蟒蛇的情形麽？牠渾身發抖，明知牠就要被吞噬，但還要誘惑對方。這就是武漢民政權力遇着軍權的情形，呆呆看着軍權，渾身發抖。」』

史特朗女士解釋道：『因此，他雖和中國智識份子合作，且雖然中國智識份子建立起武漢政府，他對他們的勇氣却很少幻想。但是他却是他們底堅定和革命到底的意志的主要來源。』（註十八）

好一句適切的墓誌銘！史大林，共產國際和鮑羅庭在中國就只限於企圖把能力灌注在一個貧血和受驚嚇的兎子身上，好讓他打敗蟒蛇呵。但這個兎子却沒有應驗於這種治療，倒還捲起牠的一雙紅眼睛，死了，於是蟒蛇把牠吞掉。但鮑羅庭和共產國際却站在這個兎子旁邊，把『堅定和澈底革命的意志』注入牠身內——一直到完結爲止！隨後整本書都不能夠比此更巧妙的描寫國民黨左派及其莫斯科師傅的作用和命運。因爲史大林宣布革命勝利所不可或缺的條件正是和這個兎子的合作。鮑羅庭對這個兎子稍爲知得熟透一點，他已經曉得蟒蛇終歸要享受牠的美餐的。他簡直認定革命是不可能的。『你們不能共產貧窮』，他總喜歡這樣告訴那些感服的外國記者。

有一天，上述的同一位女士用她的天眞態度向鮑羅庭和陳獨秀說，因爲她到俄國參加俄國革命已來得太遲，故她這一次早一點趕到中國來，『以便趕上時間』。『鮑羅庭帶笑向陳獨秀說：「史特朗女士趕的日子總是不幸。她趕到俄國固然太遲，她現在到中國來却又未免太早了。」他們

間互通了一次可怕的會心一視，這是我當時不很了解的。（附註一）因爲我和外間人士，又除了國民黨的秘密委員會之外，和所有人士都抱有共通的見解，仍然以爲武漢是革命的，並不知道右傾已把牠影響到什麼程度。』（註十九）

『外間人士』——史大林也和史特朗女士一樣——以爲武漢是革命的。只有那些因爲害怕羣衆運動而退避的國民黨『秘密委員會』和莫斯科的托洛次基才知道另外的事情，一個是由於自知之明而知道，另一個則由於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而知道。

全世界報紙的標題（包括共產國際報紙的）均擠滿『赤色漢口』的消息——史大林則稱武漢爲『革命中心』——因爲牠們犯下了並非不重大的錯誤，把羣衆運動和武漢政府等量齊觀；又因爲武漢的領袖發覺拿革命和急進詞句的保護脂來塗抹自己是有用的，必要的。帝國主義報紙（尤其是英國的）往往因一點點細故便視爲赤化，他們之歇斯得里地怒罵武漢的『布爾什維克黨人』是自然之理。但自詡爲替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十月革命說話的共產黨人却來東施效顰，就不倫不類了。根據史大林的見解，蔣介石的政變已經替武漢的『革命中心』掃清陣地了，『革命的

（附註一）陳獨秀和一位最反動的元老吳稚暉作過一次談話，這個故事暴露了陳獨秀對於共產黨底前途的觀念，據吳稚暉述說：『我問陳首領………「你在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是若干年？」彼不遲疑而答曰：「二十年。」………本委員曰：「如此國民黨生命止賸十九年了。前時總理答越飛國民黨國民革命完成應需三十年……」因共笑而罷。』這次談話舉行於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吳稚暉不能接受僅僅十九年活命的見解，他敦促蔣介石趕快準備根絕赤禍，事先防免這個不吉日子的來臨。

國民黨』現在可以着手實現土地革命，驅逐帝國主義者，廢除封建制度，摧毀軍閥，且因而保證中國革命向『非資本主義的道路發展』。因此，共產黨人及他們後面的羣衆均奉令服從國民黨及武漢政府的節制和紀律。

杜里歐寫道：『革命政府和國民黨的力量實際上就在於工人羣衆的擁護。……總工會和他的三百萬會員……無條件擁護國民政府。農會和牠們的一千五百萬會員……也擁護牠……所有這些力量都自行團結在國民黨的旗幟週圍，實行……從帝國主義的監護之下解放中國，消滅反動勢力，封建制度及軍閥制度，並實現社會主義……使牠的經濟循着資本主義以外的道路發展。』（註二十）

但史大林，勃勞達，杜里歐及其他從莫斯科來的先生們所忽畧的就是：羣衆趨附武漢政府是一回事。武漢政府趨附羣衆又完全是另一回事。『全世界都以爲漢口是「共產黨的」漢口。但國民黨左派在統治着，國民黨左派旣不是布爾什維克也不是社會黨人，而且在漢口享有共同管轄權的將軍們必定反對每一件共產主義的事情。』這就是事變很久以後鮑羅庭給魯易・菲些耳的一幅畫圖。（註二十一）這才是眞正的武漢，不是寫在莫斯科底空想的，過於狡猾的決議上的，而是事實上的武漢。

據『革命中心』的理論說來，蔣介石的政變，藉某種奧妙的點金術，卒至造出一個淸楚的局面來。在這個局面中，革命勢力（武漢）直頭對抗反革命勢力（南京）。共產國際的中國『通』米夫說：『在最初的瞬刻，（這個瞬刻是不是等到史大林大綱的墨漬乾掉之後呢？）其特點就是在這兩個中心間充滿矛盾。』（註二十二）或者，照中國共產黨領袖的說法：『大資產階級的退出，免除了國民革命內部衝突和不睦的原因。且使整個革命運動直接走向一個簡單的目標。』（註二十三）還有任何事情能夠比此更簡單呵？

但是我們且看吧。不出幾個星期，『消息報』的驚愕的讀

者就一定知道：國民黨左派領袖證明爲『將軍們手中的玩物』。（註二十四）在同樣短促的日子之內，外國共產黨報紙的讀者一定突然看到這個消息：『關於無數將軍和總司令想使工會受他們節制的無數企圖……反革命陣營的將軍和總司令與國民政府的將軍和總司令很少不同，如果有什麼不同的話。』（註二十五）米夫本人也迫得紀實道：『結果……武漢的領袖們跪在南京之前。』（註二十六）這件事是怎樣發生的呢？既『充滿矛盾』，何以又那樣快，那樣干淨的解消了呢？呵！原來這就是牠的點金術哩。那末公式呢？可愛的華特生說：基本的公式就是『階級鬥爭的辯證法』。畢究沒有什麽東西像『辯證法』那樣易於解人之難。但我們且去尋一尋稍爲忠實一點，精確一點且無限辯證的解釋。爲了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走一走在時間上和空間上距離事變稍遠的路程。底下就是我們在一九三一年出版的某一著作中發現的話，這本著作是在中國共產黨的贊助之下發表的：

『寧漢分裂並沒有在武漢使工農和小資產階級的聯盟立即得到清楚的表現。相反的，不僅資產階級的權力，就是地主和豪紳的權力也仍然存在。後者特別握有大權。武漢內部的衝突和南京內部的衝突有其同樣的社會性質，即，工農的民主革命反對豪紳和地主階級。武漢的內部分解甚至已開始於武漢政府完全組織好之前。』（註二十七）

因此，雖與史大林的想法相反，在武漢却從沒有一個革命中心！在武漢與在南京無異，有資產階級與地主的權力（後者的權力『特別大』）而且武漢政府還受階級鬥爭分裂，牠甚至在完全成立之前就已開始叛離，即，已開始向南京屈服！在一九二八年或一九三一年提出這種見解顯然是上好的『辯證法』。但在一九二七年輕輕說出一點就是反革命的托洛次基主義了。

一九二七年春，在武漢國民黨『左派』與南京國民黨『右派』之間並沒有什麽階級矛盾，有之只是實際上代表同一

階級力量的兩個集團之間的同行競敵而已。不管其急進領袖運用的辭藻如何，武漢的『左派』之資產階級性及反對土地革命絲毫不下於南京的『右派』。這就是托洛次基底見解的根據，他的見解認爲使共產黨人與羣衆隸屬於汪精衞和唐生智領導的國民黨『左派』，其罪惡不下於在前一時期使他們隸屬於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右派』。正因爲如此，反對派才要求中國共產黨無條件獨立。也正因爲如此，牠才要求迅速和澈底運用土地革命的口號，要求組織工農兵蘇維埃，這些蘇維埃要能夠領導鬥爭，能夠佔蔣介石之先，從汪精衞之流的一雙軟的纖手中攫取政權，且能夠爭取兵士中具有决定作用的部份來摧毁反革命，能夠瓦解和破壞將軍們的權力。

必須舉行反對資產階級國民黨的鬥爭，因爲他一貫總是反對土地革命——而土地革命却是中國未來的心臟和靈魂。拒絕舉行這一鬥爭——但也只有藉蘇維埃的武器才能舉行這一鬥爭——就等於放棄和出賣農民，一言以蔽之，就等於絞殺革命本身。但史大林却反對這種與國民黨作不可調和鬥爭的路線。因爲他並不視國民黨爲一個資產階級的黨，而視牠爲一個特種的『革命議會』。在這個議會裡面，敵對的階級將在史大林的保護之下，學習如何去想像出一種事實上並不存在的共同利益，在史大林看來，武漢是『革命的』，而牠的『革命政府』將領導和擴大土地革命。武漢將推倒蔣介石。武漢將在最短期間內變成『無產階級與農民的民主專政』——在全部歷史中從未見過或知道過的一種現象。（註二十八）史大林保證道：假如共產黨和羣衆組織用全力擁護武漢，假如他們自己不過早採取蘇維埃的道路，採取攫奪政權的道路，武漢就一定會幹出這一切事情。人們就是如此談及牠，而且人們也一定要牠如此。中國革命的命運落在國民黨左派的懷抱中。牠到底如何，很快便見分曉。

第十二章
『革命中心』的活動

第十二章　『革命中心』的活動

共產國際宣稱蔣介石的政變完全與牠自己的預言吻合。牠走得更遠。牠宣稱上海工人的遭受屠殺『本來就是不能防止的』。

武漢的國民黨左派却不能十分習於這樣的圓滑腔調。國民黨執行委員會在一篇咒罵蔣介石的宣言中說：『很久以前，我們就知道這種陰謀。現在事已太遲，追悔莫及。對此，我們謹致忠誠的歉意。』（註一）

牠又說：『因爲誤選了一個軍事長官造成這樣的困難，深爲遺憾。黨內同志素來寬大爲懷，已屢次爲了救黨而忽視許多非法行爲，雖然此事亦非出於本願。』（註二）

事實上，共產國際也已經眼看蔣的發展，而陷於無能爲力，一籌莫展和默不作聲，在絕望中猶冀他不扼住牠的咽喉。但是，現在他已違反他們的最好的勸告，果然把事情做出來了。現在，也只有現在，共產國際的代表們才來公開敍述蔣從北伐伊始便已實施的恐怖。他們現在把罪狀如實列舉出來，但全世界共產黨報紙却曾經熱烈地替蔣辯駁這些罪狀，把他視爲帝國主義造謠中傷的犧牲者。埃耳·勃勞達僅僅三星期之前還熱心地描寫江西軍隊與羣衆之間底牧歌的關係，現在却列舉人名，日期，地點，敍述蔣早在二月便已開始在全省進行殘酷的恐怖。（註三）

共產國際的漢口代表團宣稱：『蔣介石的反革命活動已達極點，卒致建立南京底對敵的「國民政府」。他這種行爲

較之他從前的無數暴行更難饒恕，這些暴行即指三月二十日的政變，對國民黨革命派的屢次進攻，對江西和浙江工農運動的鎮壓，以及最後對上海工人的屠殺。我們非常焦慮，監視蔣介石及其代理人的一切這些暴行，但我們尚希望他不敢遽爾成爲民族運動之公開叛賣者。在這個國民革命的嚴重時期內，聯合戰線之維持旣如是切要，凡是參加反帝鬥爭者，其一切罪惡暫時寬貸。但……蔣介石的罪惡並沒有止於屠殺江西和上海工人。這些罪惡竟造成反國民黨及國民政府的叛亂。』（註四）

共產國際的代表與國民黨左派的領袖無異，準備把那些鎮壓羣衆運動和殘殺工農之類的不足重視的背叛，加以『寬貸』。假如蔣願意保持『統一』的外表，他就得到他所要求的每一擁護，每一讓步。這一點，共產國際代表團於四月十三日的通電中已淸楚指出，這個電報我們也已引用過，現在他們又把這一點引證出來，以證明他們謀和解的決心。蔣在南京另行召集會議的消息傳到漢口，分明正是代表團將要定期離漢造訪這位總司令的時候。

『我們當即打電讓他停召此會，并履行他與汪精衞同志在滬成立的協定，將一切爭執問題交付中央全體會議解決，這個會議他將來也參加。在同一電報裡，我們通知他，假如他採納我們的獻議，我們就謁見他，和他討論保持革命勢力統一的方法和手段，以便抵抗帝國主義的進攻。他並沒有答覆我們的電報，直頭進行他的分裂黨的計劃。』（註五）

蔣介石似乎竟敢遽爾『成爲一個公然的叛賣者』。這就是他的『最難饒恕』的罪惡，因爲共產國際的全部戰畧就全視這件事爲轉移。他們曾簡單的希望他不會幹這樣的事。他們想錯了。事實證明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者的『希望』更有根據。上海工人替這次判斷的『錯誤』，償付了他們的頭顱。

汪精衞在革命政治方面也是屬於哥埃(Conē)派的。他現在

必須說明在四月，當他和蔣介石在滬會晤時所發生的事情。他於四、一二之後說：『我尙希望他覺悟，我尙希望他與反動勢力割斷關係……我答應他向中央提議召集會議，解决一切重要爭執……當我來到此間，我於絕望中尙冀他萬一幡然悔改。我在我的報告內沒有攻擊到蔣……』（註六）

那末，汪現在在武漢也懷着僥倖之想。他離滬時分明以爲他已說服蔣放棄激烈行動，靜候『和平的，合法的』消除他的不平。四、一二事變證明蔣只不過利用汪來遮掩他的政變的準備工作吧了，蓋他已知道形式取巧的時候已告終結了。汪抵漢不過兩日，先是驚惶失措，終於老羞成怒。他也想壓抑羣衆運動。只不過，他想『合法地』來做吧了。現已有人替他把事情做過了。

在汪精衞（『革命中心』）與蔣介石（『反革命中心』）之間，沒有什麼不可和解的衝突，沒有像約瑟夫・史大林現在那樣樂於相信的衝突。汪在上海時，蔣要求更進一步壓制共產黨人（亦即羣衆運動）及承認蔣的事實上的獨裁，他早已非常樂於俯從了。但汪精衞自以爲是孫中山的繼承人和繼任者，是國民革命的主要領袖。他的鼻孔嗅到的，再沒有比官府大權那樣香甜了。蔣在南京成立一個敵對政府，這種舉動致命地冒犯了這些抱負。汪發覺資產階級喜歡蔣的服務和蔣的方法而不喜歡他的，頓然狼狽起來。他主要關心的幷不是推進羣衆底反帝，反封建甚至反資產階級鬥爭的志願，即史大林和共產國際好心善意賦給他的志願。汪現在所關懷的，瞿秋白後來也承認，就是如何覓得門徑『與蔣互相爭東南（江浙）資產階級的同情』。（註七）汪，這位小資產階級急進派領袖，這位共產國際十分信仰的領袖希望向資產階級證明：蔣在『壓迫』他們，而他，老汪，則要從羣衆運動和軍閥的誅求中拯救他們。爲了辦到這一點，破壞蔣的信用是急不容緩的，如果他能夠辦到的話。武漢政府頒布四月十七日的命令，痛責蔣及

其同僚，列舉他們的罪狀，開除他們出黨，又把他們一切政府職位革除，這也正是爲着這個目的。（註八）

但是武漢雖然願意這樣做法，牠却反對對蔣宣戰來聲援牠的命令（這也是實施該項命令的唯一可能的手段），因此默認牠與南京之間，實際上有密切關係。蔣介石在他的政變之翌日，確乎是特別易於攻倒的。他的隊伍軍心渙散，他的軍事地位朝不保夕。但是人們一問到武漢領袖們是否要平服叛變，他們就温和的表示他們將把這件工作讓給蔣氏地盤內的工農去幹。國民黨領袖譚延闓保證道：工農不久就會起來反對蔣及其同僚，『因此，國民政府并不認爲他們的叛變十分嚴重，因爲他們必然失敗。』（註九）鮑羅庭也義不容辭的響應着這種虔誠的希望。一位日本記者問他，南京軍閥是否要藉武力加以壓服。他答覆道：『這件事殆無必要，南京正陷於崩解的過程。讓他們一點子時間去爲所欲爲，他們將從內部完結。』（註十）蔣那樣相信他的武漢政府內的外表上的敵人，他簡直不想即刻用軍事手段來進攻他們。誰將『從內部』完結，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菲些耳發揚鮑羅庭對於蔣氏政變翌日所形成的關係的事後分析，寫道：『雖然存有敵愾和個人的利害衝突，又雖然實際上已破裂，（武漢）與蔣介石的某些關係尚保持着……使武漢和南京分裂的事情很多，但某件事（！）使他們接近起來。』（註十一）武漢曉得：爲了重新博得資產階級的信任，如果和蔣作戰是得不到好處的。牠首先就必須自行擺脫羣衆運動與共產黨人。汪精衛，唐生智輩計算，如果他們能夠首先從奉軍手中奪得河南省，那末，又借用菲些耳——鮑羅庭的話來說，『他們就能夠和蔣介石談判了。』（註十二）他們心目中所希望的就是軍事一帆風順，克服北京。這件事將一定在本國資產階級的估價上，提高他們的信用而壓低蔣的信用。假如他們能夠辦得到這一點（我們不久知道，他們的計劃成敗完全繫於馮玉祥的軍

事活動），他們就成了本國的毫無問題的統治者，蔣就一定要附他們的驥尾。這就是『革命的』國民黨底『革命的』領袖的眞正打算。而且，他們完全迎合唐生智底私人的拿破侖雄心，并不是偶然的。這位湖南將軍現在天天表明他的革命忠心，夢想有一天他也會完全操縱一個強有力的運動，足以爲他自己的利益而實行叛賣。因此，武漢政府開除蔣介石，立即下令進兵河南，軍隊也立即開動。但北京不能一天攻下，在這個中間，武漢的領袖還必須把蔣介石政變替他們產生出來的無數困難加以克服，尤其困難的，就是他們必須與羣衆運動相週旋。

上海事變已使全國反動勢力，勇氣大增。這個事變正發生於羣衆運動已在中部各省達到最高點的時候。在兩湖，農民開始按照他們自己的粗鄙辦法，把說話翻成行動。他們開始爲自己的利益鬥爭。武漢的領袖們設法站在互相嚴陣以待，將要決戰的勢力之間。當問題正在城鄉中解決的時候，武漢的小資產階級急進派尙安然妄想：他們藉他們的委員會，他們的漂亮堂皇的命令和佈告來決定本國的命運。事實上，這些軟弱的政客無法控制的事變正迅速地使他們的言行的裂罅合口了。汪精衞一派人不同蔣介石一派人。他們處在這些靠攏的鐵夾板之間，他們不會大胆行動，只會不安蠕動，抑鬱頹喪，動搖姑息——一直等到較他們更積極的階級代理人從他們手中奪去統治權才罷休。

雖然他們宣言反抗右派，但階級鬥爭的火熱已燒灼了他們底『左傾主義』的薄翼了。很久以前，他們就再也不能飛翔了。但他們到最後一振翼，尙設法證明他們在某一件事上，即在保護資產階級財產上，也能夠表示執着。武漢將設法向帝國主義者，工廠主和店東，地主和豪紳證明不僅僅是蔣一個站在他們方面講話。

就帝國主義列強而論，上海事變已使一切事物面目全非。他們淸楚的懂得力量對比的變動已於他們有利。他們從前對羣衆運動的進展，着着讓步。他們小心翼翼地探尋他們

能夠和中國資產階級談判之點。砲轟南京促進了這種買賣。四月十二日，這種交易就定奪了。現在他們的口氣強硬了。外國武裝力量輸送到要港的愈來愈多。四月二十一日，駐中國內河的最大英艦，九千七百五十噸巡艦『復仇號』加入那佔漢口江岸達一里半的三十五隻外艦的陣列之內。再過一個星朝，從上海駛來的補充軍艦使總額增至四十二隻，這些軍艦都是從英、日、美、法、意的海軍方面派來的。

在東京，新近就任的田中首相『明白表示在中國事件中的退讓時期完結了』。（註十三）東京的記者報告道：『蔣介石反赤的勝利一擊，使中國局面頓然改變，這正是日本觀察者所希望的。』（註十四）在倫敦人們欣然宣告『關於中國的外交局面……已遭逢變化……局面已完全改變。（武漢政府）不復得勢，也許只需幾個星期就已完全從畫圖中消失。』（註十五）在美國，中國消息在紐約大報的首頁中消失，這一點反映官場脈搏的突然舒暢。（註十六）

本來一月間漢口工人奪取英租界所造成的外交勝利已養成了對列強的冷漠敵視態度，現在武漢的領袖們突然恢復卑躬懇求的姿態。漢口牆上的反帝標語撕掉了。工人，農民，軍隊佔據的，用作羣衆組織底辦事處的外國教堂都歸還原主。一位歡天喜地的漢口僑民寫道：『外交部機關本來一味講禮義和寄同情的，現在在與外人的轇轕中成了有力的，甚至决定的因素了。』（註十七）四月廿五日，紐約泰晤士報的記者發電道：『到處的談資的是最近二三日間已發生了的變化。』（註十八）

政府頒發新佈告，湖北總工會也『等因奉此』，限制工人糾察隊的權力，並禁止任何足以激怒外人或侵害外人產業的行動。對付不服從此項命令的工人的懲罰細則也規定了。（註十九）外長陳友仁以個人名義，繕就一封公函遞交美國總領事及商業代表團，（他於四月廿三日接見他們。

）他在這公開函裡把上述的命令都引證出來了。『該部長畧叙各項手段正在施行，俾恢復原狀以利外人商業之進行，他又鄭重聲明，勞工界已决意遵守革命紀律，俾政府該項手段得以實施。』（註二十）

長沙工人因為美國海軍在砲擊南京中的作用，曾舉行一個總罷工，抵制美國企業，政府遂嚴厲叱責工人。工人奉令撤出他們所佔據的外人青年會，并奉令停止湖南省會美國煤炭及煤油公司的罷工，其理由就是：『任何自由不羈的行動，不管其本身好或壞（！），一定嚴重防害本黨的統一政策，并同時使反帝運動受沉重的打擊，……任何不當行動……現在必須矯正，且必須防止今後重新發生。』（註二十一）

當武漢報紙開始詳細解釋『遷就』政府外交政策之必須時，（註二十二）武漢的領袖妄想應用中國以夷制夷的傳統政策。美國的政策在外表上似乎矛盾的搖擺，曾在國民黨人心中喚起希望，但南京的事變已使這些希望消失了，美國的大砲在南京轟擊得比誰都響亮。但日本的大砲却寂然無聞，一位日本尉官甚至還因為恥於本國政府的寬縱而自甘切腹。武漢的反帝派便卑鄙地特別轉向日本呼籲。

國民黨中央的正式機關報寫道：『中國革命方搖動英帝國主義的根基，牠大有助於友好的日本穩定其世界強國的地位，且使他獲得其商業與繁榮空前發展的一切可能……』他們又繼續往下寫道：英美帝國主義者方到處設法封鎖日本的擴展。『日本政治家最賢良的對策就是與中國民族共同反對牠的敵人，證明日本並非贊助軍閥或帝國主義的干涉政策……日本與中國應聯合反對英帝國主義。』（註二十三）

過了幾個星期，日本按照牠自己的辦法來答覆武漢的獻媚企圖。日本軍隊突然衝入山東，佔領濟南及膠濟鐵路。

英國方面表示非常滿意。五月九日外交大臣張伯倫在下議院發表正式言論，表示列強對蔣介石政變及往後事變的歡

樂。陳友仁答覆列強關於南京『暴行』底抗議書的公文遭了拒絕，因爲『趣旨和細節均不滿意』。張伯倫說：當列強的備忘錄遞交中國之時。『中國揚子江南岸分明統一在國民政府之下，這個政府的所在地就是……漢口……從陳先生覆文的日期起，往後不過四天功夫，中國南方的統一政府已不復存在……不到兩個月之前，外表上看來好像南方黨及國民革命軍將從華南長驅華北。但南京已阻止了這一勝利的事業，如牠沒有把牠完全破壞掉的話。』他又喜氣洋洋說，共產黨人『已遭受國民黨人親自懲罰，其嚴峻和效力非任何列強所能辦到的。在上海，廣州及其他城市，極端派的組織已遭破壞，其領袖亦遭處决。武漢國民政府已喪失牠的統治地位，而且現在已名存實亡。』（註二十四）

上海的英僑本來要求迅速和直接的恐怖軍事報復的，張伯倫現在向這些懷着受辱底驚怪的僑民說明英帝國主義暫時還是安心讓蔣介石充作牠的代表去幹。一星期之後，英國駐漢口的外交代表撤退。（附註一）

同一星期，在倫敦發生阿爾哥斯侵襲事件，兩星期之後，（五月廿六日）英國和蘇聯斷絕外交關係。莫斯科曾希望蔣介石在解放鬥爭中領導中國羣衆，而且曾希望這一鬥爭把資本主義世界的反蘇領袖——英國置之死地的。蔣介石的政變證明所有這些希望都破產了。并不是英國，而是中國的羣衆運動遭受一個致命的打擊，同時又是蘇聯的國際地位被弄得嚴重地惡化起來。倫敦懂得武漢做不出嚴重的威脅，懂得牠『名存實亡』，因此便照牠自己的利益幹去。但共產國際可不能同日而語，牠尙一味把空架子看成實在。

（附註一）彷彿想鄭重指出此次撤退的性質似的，英國政府選擇這同一天（五月十七日），宣佈給八個月之前對萬縣施行不名譽的砲擊的『英雄們』，頒發獎章。

長江的外艦過去拿來反對羣衆運動，看起來只不過一點小小的威脅而已，而且其目的也無非在監護外人的匆促的驚惶的退走，但現在牠們却成了充滿威脅的可怖的魚龍了，武漢的國民黨左派深深感覺這一長長的灰色陣列的新壓迫。共產國際的代表，魯易也有同樣感覺。他寫道：『不僅僅上海，就是長江全線也聚滿戰艦了。長江流域，這條中國貿易的大脈管處在帝國主義大砲的直接控制之下。這簡直是一種大規模的『攔刼』。帝國主義強盜現在向革命的中國大呼「舉起手來！」國民政府所在地（漢口）實際上是一個被圍困的城。巡洋艦，驅逐艦和砲艦的可怕的陣列藐然侵害中國人民獨立治理本國的權利。英美法的水兵擠滿國民革命首都的街道。國民政府在這種凌辱之下，痛心疾首，因爲些須細故，這個強盜就要使牠滅亡………』（註二十五）

武漢確乎已喪失牠的『統治地位』。英帝國主義本來於一月間對武漢態度是必恭必敬的，但後來多謝蔣的政變和國民黨左派的懦弱，牠五月間又輕蔑地聳着肩離開了。過去在國民革命首都內所有的『青春的樂觀，非凡的自信和勇敢的進取心』（註二十六）通通喪失了。只有胆怯的不確信殘存着。

陳友仁吹牛說：『不到三個月，我們就通過河南直取北京，到了北京，我就代表國民革命的中國和國民黨講一種張伯倫不能漠視的話……馮玉祥和唐生智統率的革命軍連同閻錫山統率的軍隊現在正包圍張作霖的匪軍……』（註二十七）但馮棄絕他。唐棄絕他。閻也棄絕他。而陳友仁也永遠不復有機會受張伯倫漠視。（附註一）

在廠店的勞動僱主看來，南京政府的成立已預示了一個政治工具的出現，這個政治工具，將格外有力地服務於他們的利益而反對工人的利益。這種服務付出任何代價都是值得的。在武漢的領土內，工會尚合法存在，工人尚至少有提出他們底要求的機會，光是這件事就足以使大小資本家

的同情轉向南京方面。上海事變給了武漢的僱主以新的勇氣來抵抗該市的罷工浪潮。他們重振精神，舉行反攻。他們關閉工廠和商店。他們故意造成當地銀行的擠兌風潮，加迅白銀流向上海，(註二十八)且拚命對經濟生活怠工和使之癱瘓。(註二十九)在農村方面，高利貸者隱藏他們的金錢或沿江私運到滬。農民們無論用任何條件借欵均遭拒絕。到處都缺乏現金，而且在許多地方，農民們都因此無法購買種籽及其他必需品來渡過青黃不接的時間。投機家故意把米價抬高到難於到達的水準。在這種經濟的怠工中，外人也推波助瀾，關閉他們的企業，減少他們的內河航船的班數，且造成武漢一種事實上的封鎖。五月間，有十萬工人左右因爲廠店關門失業，往後一個短短的期間內，這個數目字幾乎倍增了。(註三十)資產階級寧願冒破產的危險也不願答應工人的要求。

只有使羣衆運動發展到牠的邏輯的結論才能敵得住這種反攻。在工人監督的制度之下沒收和經營關閉的工廠和商店，即使在內戰的情形之下也能夠把怠工和封鎖所造成的嚴重情形，大大減輕。沒收囤積的米穀，利用由沒收手段得來的資本興辦農民合作社，農民自己旣趨向於沒收土地，則加以支持，這就是達到農村生活劇烈改造的道路。但是實施這些手段，却需要有一個革命的政權。需要有城鄉的工農兵代表會。在武漢政府看來，這些手段是不可思議的，因爲他們牽涉到侵犯資產階級的財產。共產國際『勸』國民黨左派接收銀行，工廠和商店。但是國民黨左派的領袖却

(附註一)六年之後，福建政府建立於福州反抗蔣介石的統治，陳友仁又當了這個短命和薄弱的政府的外長，他那時默想過去，向本書作者說：『那時呀，那時呀，我能夠有權威說話，因爲我有羣衆和我一道！』他就是不曉得，他之喪失這一權威就是因爲他自己無法和羣衆一起前進。陳友仁被蔣介石逐出福州(與逐出武漢無異)之後，便活該湮沒無聞了。

恭恭敬敬走到漢口總商會，懇求牠使商業恢復原狀，而他們則答應管束羣衆運動。共產黨不能自由行動。牠被束縛在國民黨內，而且花任何代價，牠也不能和牠解除合作。武漢的領袖並非把他們的經濟困難歸咎於資本家的怠工，而歸咎於工人的『過火』。他們大呼：工廠和商店僱員的要求使工商業破產。這些過火的要求到底是什麽要求呢？在一月至四月的期間，碼頭工人的罷工鬥爭曾使他們的工資從每日三塊洋增至七塊洋。紗廠的女工和童工從前每天賺一角二分，現在鬥爭的結果，增加至每天二角，即每月工資由三塊六角增至六塊。火柴廠罷工工人勝利，一天工作十二小時，從十七個銅板增至四十個銅板。(附註一)絲廠工人罷工勝利，得到十二小時的工作日。過去他們曾每天工作十七小時哩。若干印染廠，(並非全數)罷工勝利的結果，工資是每天十八增至五十個銅板。產業工人得到的最高工資每月仍不過二十塊洋。一般的平均工資已從每月十元左右增至十四元左右。但是在政府主持之下進行的工資和生活費的調查，斷定維持四口之家的最低費用爲二十七元四角六。時間問題，情形也不很好。七八歲的小孩每日一角，和成年人的工作一樣長久。童工的八小時工作的要求仍然寫在紙上。六月末國民黨勞工部的調查暴露該市多數店員每天尙工作十二和十四小時。工人們尙在要求將每日工作時間從十七小時縮至十五小時，從十六小時縮至十四小時，從十四小時縮至十二小時。學徒想從那種遠較債奴爲惡劣的狀況中解放出來，也提出要求，但這些要求更得不到滿足。

三月，正當國民黨的口中已大呼『無理的』要求之時，一位訪問者會見若干工會領袖。

（附註一）據一九二九至三〇年中國年鑑，一九二五年二百四十個銅板兌洋一元；一九二八年，二百八十五個銅板等於一元。一九二六年與一九二七年未列數字。

『提到「無理」這個字，這些工會領袖笑了。他們自己也是工廠的工人。他們終生就想知道什麽叫做「合理」。他們叫我們告訴他們。他們說，他們終生就想替他們的生存找得某種的「理由」。別人豐衣足食，他們則除飢餓之外，一無所有。這件事的理由何在？』他們問道。（註三十二）

武漢工人獲得的勝利，尙沒有一樁是使他們能夠達到最低限度生活底最低限度費用的『合理』範圍之內的。難道工人們把那些幹食糧投機的僱主押到他們自己的法庭上，這也算是『過火』嗎？難道漢陽工人决意強迫開廠和經營這些工廠，以抵禦他們底僱主的怠工，這也算是『過火』嗎？難道蒲圻及其他湖北城市店員接管那些故意關門的店舖，也算是『過火』嗎？難道兩湖的農民攔截各處的穀米出口，以對抗那些想使他們餓極而屈服的投機家的活動，也算是『過火』嗎？又難道他們沒收地主囤積的米糧來養活他們的家庭，也算是『過火』嗎？

國民黨左派的領袖們尖聲叫喊道，對的，這些都是『過火』。牠們破壞商業和擾亂經濟生活。牠們都是對財產施行的進攻，牠們必須停止。汪精衞回武漢的第一步正式行動就是把經營漢陽十五家工廠的工人合作社加以破壞，強廹這些工廠屈服，並下令解散漢陽黨部，因爲牠擁護工人。（註三十三）

四月末又頒發條例，取消工會原有的司法和警察職權，規定牠們只有懲罰他們自己會員的權力。這些條例由政府頒布，又由湖北總工會奉令執行。仲裁法庭成立起來，金錢的『不正當要求』也禁止了。（註三十四）

總工會的共產黨秘書向忠發在該市的通衢大道上廣貼佈告，叫工人們作『無上努力』，並下令『反對資本家的新鬥爭應暫時停止』。（註三十五）

五月二十日，國民黨中央發出一道宣言，說明『革命之各階級性』，這道宣言充分暴露了武漢國民黨左派的特殊的

階級性質：

『革命成功視工商界擁護牠的程度而定。工商界能否有效地擁護革命又視農工願否以同盟者待他們而定。

『自北伐軍興以來……長江流域之農工團體，由於迅速發展而不自覺其錯誤，殊為可惜。……他們不為整個革命的未來着想，而輕視其同盟者，工商業界。例如農工團體因昧於經濟情勢，已向僱主提出過奢要求。武裝糾察隊竟封閉廠店，向僱主或廠主提出過份要求，強廹他們做其所不能做的事。因此，工商界感覺他們已不受政府保護，他們在人身及財產方面已不能享受自由。他們又覺得不僅革命無法替他們謀利益，且反而危及他們的福利和安全了。他們遂離開革命戰線，仇視其工農同盟者。結果，農工陷於孤立狀態而自殺，革命的基礎遂致動搖。

『我黨……對於缺乏指導的工農的孤立狀況，不能漠視，尤其不能漠視革命同盟者，工商界之利益，而不給予他們以充份保護。我黨的政策就在把他們統一在一條戰線上，使他們永不破裂，並使他們從革命中得到同等的利益。為了實現這一政策，國民政府謹實施如下數點：

『一、勞工部及各省當局應採用仲裁條例，組織仲裁法庭，解決勞資爭議；

『二、制定勞働法，規定工人的工時……按照生活程度規定工資，……並規定工人保障辦法；

『三、禁止工人店員提出過奢要求及干涉廠店行政；無論提出什麽要求，均應交由工會及商會合組之特別聯席會議審定，該聯席會議可以對要求加以適當的限制；

『四、工會或糾察隊不得向店東或廠主威脅，罰欵或採取任何壓迫方式……』（註三十六）

共產黨主持的總工會回頭又孝順地和這個『革命的政府』『合作』。數天之後，牠就宣布工人應遵守『革命的紀律』，敦勸他們『不要忘記他們底工商業同盟者的利益』，且頒佈如下的條例：（一）凡破壞革命紀律之工人應受懲

罰；（二）情節嚴重者移交政府審判和懲罰；（三）工會不得擅自逮捕，處罰，『或以任何方式壓迫工界以外之人。』（註三十七）

被削剝者應放棄他們的自由，好讓削剝者有自由之感，這是天經地義。但被削剝者不可免要和剝削者衝突，這也是天經地義。這是一件偏偏要表現出來的鐵的事實。武漢政府和國民黨左派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牠以爲自己正在替衝突中的階級找求一個共通立場。實際上，這就等於叫工人們和平地和沉默地忍受他們的奴隸境況。他們腦子裡就從來沒有想到要求和（假如必要的話）強迫僱主去屈服於工人的要求。歸根結蒂，他們代表了資產階級，雖然史大林的想法相反，又不管資產階級對他們的信賴如何小。只有藉大胆的革命手段才能依照工人的利益來對付資產家的反攻在武漢所造成的經濟困難。武漢政府既證明無法採取必須的步驟，工人們便必須找尋他們自己的某種手段來實現牠們。這種手段就是指工農兵代表會（蘇維埃），這些代表會，應該準備率先運用那些保護羣衆利益而非保護資產階級財產的政治和經濟政策。但組織這種代表會就一定表示『反對革命的國民黨』，反對這個『唯一的政權』，而這樣做也就是『反革命』。因此就革命的眞義上說來，毫無經濟政策，有之只是熱狂的保護資產階級財產而不惜絞殺武漢，不惜讓羣衆的新鮮力量逐漸消散而已，這些羣衆從沒有得到人們指點他們自己的出路。

同樣的財產尺度測定國民黨左派在基本的土地問題上所採取的立場。史大林曾担保國民黨左派在解決土地問題時一定表示決切的態度，這種決切的態度原來表現出來却是迴避土地問題，進一步發展成爲抱怨農民『過火』的怨言，又等到農民自動用自己的辦法來處置他們的問題，牠便立即無情地轉向武力的鎮壓。

武漢的領袖既然是小資產階級急進派，他們對於羣衆的動力便不能毫無感覺。只要熱烈講出的說話使他們操縱這一

動力，他們就要任情揮霍這種說話。武漢方面關於土地革命問題的早期的文告，已把話都說盡了，沒有什麽可說的了——所謂沒有什麽可說的，即是說，此外只有把牠們翻成行動。例如：『實現國民革命的目的端賴乎全國農民的覺悟。我黨一貫保護和爭取農民的利益，俾一切壓迫他們的特權階級失却支持……俾被壓迫農民眞正解放』。又遲至三月十九日，一道政府宣言尙堅認『革命必須在農村中引起極大的變動……以便在農民政權之下，最後鎭壓地方寄生蟲，不法豪紳，地主及反革命派的活動……這是唯一的道路。……如果農民沒有領有其自己土地的可能，他們就不能擁護革命勝利到底。……』（註三十八）

國民黨在詞句上，其急進並不下於共產國際決議案中所用的詞句，牠甚至曾經宣佈這一口號：『武裝農民！』國民黨中央於三月發表『告農民書』，曾說：『爲了獲得勝利……農民需要有武裝來自衛。封建地主運用的武裝力量，應加繳械，他們的軍火應轉交農民。而且本黨亦應設法使農民能夠廉價購買槍枝。簡言之，本黨應使農民能夠得到大量自衛的槍械。此事將保證農村革命勝利，能長久維持，且保證民主勢力能推翻封建勢力。』（註三十九）

這些都是些令人興奮的說話，但光是說話仍舊不會給農民以土地；而且正因爲牠們都只是說話，等到兩湖農民認眞的相信牠們，開始行動的的時候，說過這種話的人們就碰到困難了。歷史不能讓這些可憐的區區之數的空談家扮演雅各賓黨的角色，甚至約瑟夫·史大林心願如此也辦不到。他們不能領導，不能支持，甚至還不能寬恕土地革命的眞正實現，因爲這件事等於把他們深深依賴的經濟和階級基礎加以破壞。他們雖然辱罵『封建地主』，而在口頭上贊助農民運動，但他們替『封建地主』負的義務較之農民的要求更帶無限的強制性。他們知道土地革命勝利等於他們底政權的完結。假如他們一定要幹的話，他們就要保護財產，並不是去侵犯財產。

孫中山的政綱仍以『平均地權』這句含糊和無意義的話爲中心。國民黨於一九二六年十月通過的農工政策，實際答應農民的只不過二五減租和『禁止』高利貸，規定債息每年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十！(註四十)不僅減租政策之仍然完全無效，就是農民自己鬥爭的進程也已經使他們很快就感覺到問題並不是在於部分改良，而在於土地本身。一九二七年三月國民黨的全體會議承認『貧苦農民問題中之基本問題是土地問題』，但是牠所能貢獻的唯一實際的解決辦法，就是成立一個農民銀行，每年五厘放欵，俾解決貧苦農民中的資金缺乏問題。（註四十一）這次全體會議又產生一個土地委員會，其目的在搜集統計及其他材料，俾制定國民黨的土地政策。這個委員會於一九二七年四月間開始召集會議。牠由重要的國民黨領袖構成，譚平山則代表共產黨參加。

這個土地委員會雖以『農民必須成爲土地之主人』，這一個一般的命題出發——大家都在原則上贊成這一點，但牠立即發生疑問：那一類農民應該成爲何種土地的主人呢？（註四十二）『耕者有其田！』這句話夠漂亮，也夠急進。但是誰的土地呢？汪精衛說，當然不是小地主的土地。本黨的義務就是保護小地主，因爲他們不就是同屬於小資產階級的本黨麽？唐生智又說，當然不是屬於軍隊長官的土地。他抱怨道，湖南的農民已侵奪軍官或其親屬的地產。哼，在建始縣，他們甚至還捉到一個團長（他恰好是當地一個大地主），把他綑起來，給他戴一頂高帽子，遊行示衆哩！程潛（一位國民黨將軍）的阿姨確確實實還被迫剪短她的頭髮來表示她與新時代一致哩！這是不行的。士兵，無土地的農民也許通通贊成這樣做，但軍官們是不會贊成的。你們須知，軍隊在土地問題上是會分裂的，但是我們畢竟不能讓軍隊分裂的呀，我們能夠這樣幹嗎？

不，絕不，那些委員們趕快答道。

好吧，那末，大地主的土地呢？對，還有大地主的土地！

但是，問題又來了，我們怎樣知道地主何者爲大，何者爲小呢？還有一層，假如按照唐生智要求，『我們必須想出具體的辦法來保持國民革命軍軍官們的土地，』那末，我們還要把那些與軍官有關『大』地主及那些沒有兒子或兄弟掛着皮帶的不幸的地主加以區別哩。

『我們必須確立沒收的標準，』汪精衞和孫科附和道。

徐謙有他自己的解決辦法。他不知從那處發現全中國土地只有百分之十五是耕種的。他就說：『那就用不着從地主取得土地，因爲我們可以把沒人開墾的土地送給農民。』但徐謙却沒有辦法證實他的數字，而且，無論如何這些未墾地大部分是散處在西藏，新疆和西北一帶。把兩湖農民成批送走又似乎不是特別可以實現的建議。因此，後來徐謙也贊成譚延闓的見解，認爲只可以沒收『特別作惡或不良地主及不良商人』的土地。那末，現在又問，那些地主是不良或（我們想起這種人就不禁慄然）特別作惡的呢？大家說：哦！

當大家正在討論向小地主購買土地的意見時，譚延闓摸着他的下巴，說：『這件事將無法滿足小地主，因爲他們對國民政府的信仰尚非常之小。假如我們把債券發給他們，他們是不能靠吃一張紙頭過活的。土地必須留在他們手裡。』

譚平山代表共產黨，戰戰兢兢的提議只有沒收反革命的地主們的土地了。汪精衞立即乘隙而入，他嗤之以鼻道：『政治的沒收！這是一句極普通的廢話。假如某一縣的農民力量充足，他們就把每一個地主都視爲反革命，好沒收他的土地。在政治沒收之下，是沒有什麼標準的。凡是農民力量強大的地方，他們就直頭進行經濟沒收。凡是他們力量薄弱的地方……他們就首先侵犯小地主，因此這些小地主就比誰都來得痛苦，但我們却要把小地主拉到我們這一面。』

共產黨人狼狽不堪，撤回他們的提議。

三個星期之後，大家鬆了一口氣，終於決定：革命尚在軍事時期，照孫中山的見解，像土地這一類問題的解決應待至最後的軍事勝利及全國統一，一俟全國統一，則進入『訓政』時期。因此，他們通過了一個決議，在原則上承認沒收大地主底地產的必要，但又勸人在目前不得讓地租超過收獲的百分之四十。

這個決議甚至連二五減租的政策也放棄了，因爲地租平均就從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雖然在某些地方，牠竟達收獲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但共產黨人居然接受這個決議，當土地委員會進一步決定，因爲『恐怕引起混亂』，不公佈牠的討論詳情時，共產黨人也同意了。軍隊得救。地主得救。國民黨也得救。問題的解決使大家都滿意，但除了農民。他們必須忍耐一下。如果他們繼續擁護國民政府，那就萬事皆吉了。

農民的問題得到這種『解決辦法』，農民本身如何容受呢，這個問題不久便見分曉。這時，新的威脅又從別個地方出來，侵擾這個『革命中心』。軍閥們受蔣介石勝利的鼓勵，而且還是直接受他的慫恿，四面八方起兵叛亂，反對武漢政府。在湖北北部，于學忠公然反抗政府。在西面，楊森開始調動他的軍隊來進攻國民革命的首都。夏斗寅本來在西線担任抵禦楊森的，現在也突然譁變，帶着一批小部隊，馳騁於武漢西南，放火，搶刼，且幫助地主豪紳鎭壓農民。武漢政府因爲無法支持農民的要求，已使農民的信仰喪失得那樣厲害，以致招募他們和組織他們起來抵禦夏斗寅等一切努力，竟很少或簡直沒有得到回音。（註四十三）雖然葉挺（一位共產黨的軍官）藉英勇的手段，終於能夠袪除了夏斗寅對武昌的威脅，但武漢仍然四面受困，軍閥叛亂威脅於外，經濟拮据威脅於內。

民衆論壇的編輯目擊驚慌的人民『隨着載滿傢具的貨車，走過我們的窗下，』且聽到『四處有憂傷的耳語』。『城中驚怖的人民都說大難臨頭了。……外人半狂半露驕氣。

他們已眼看國民革命的漢口，那種憎恨入骨的統治完結了。他們預期於明天早上就可以看見武漢一個新政府的曙光。……』（註四十四）這位編輯先生對那些驚慌的和那些懷着希望的，兩者都加以嘲笑，且預言國民革命運動很快就全線勝利。

但是，兩面夾板就要合攏來了。革命的出路就在發動澈底的土地暴動，把羣衆蓬勃的解放起來。只有施行這樣的方針才有改善經濟困境及瓦解叛亂軍閥底軍隊希望。如果國民黨左派不能採取這個方針，共產黨就必須準備這樣做。

不錯，共產國際也談過土地革命，但一轉瞬間，牠又命令中國共產黨把一切政權讓給國民黨左派，因爲照史大林的話說，『如果沒有國民黨內部左派與共產黨密切合作的政策，……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因此，汪精衛能夠以上賓的資格參加四月廿七日共產黨在漢口召集的第五次大會的開幕典禮，宣布他和他的同僚『欣然接受共產國際的遠景』，（註四十五）並聲明他『完全同意共產國際代表魯易的報告』，這就毫不足奇。（註四十六）

共產國際以印度共產黨人魯易這個人來充當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的思想領導。米夫告訴我們說，魯易『第一次』——（米夫說這句話，大概在詆毀共產國際從前的指示和決議吧？）——對剛發生的事變，給了年青的中國黨以『一種眞正的列寧主義的診斷』。黨『第一次』從魯易口裡聽到『這個運動的一種澈底思考過的遠景』，且『得到關於許多基本問題的指示』。魯易『把全世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經驗……給予年青的中國黨』。（註四十七）不久，莫斯科就把中國共產黨在第五次大會時的立場說成直接違反共產國際的指示。稍後，魯易本人也照例成了惡意攻擊的對象。但是現在我們姑且聽一聽魯易自己在大會的報告吧，這個報告，是曾經負全責而且毫無相反的詮釋，公佈在共產國際的機關報上的：

『第五次大會有許多複雜和困難的問題待解決……對革命

的未來發展的遠景必須加以探討，且應給牠以堅定的領導。指出這一遠景，替無產階級探出行動的路線，幫助他們創造一批革命勝利進展所不可或缺的，思想清楚，忠誠和勇猛的領袖，這就是第五次大會的歷史任務。大會完成了這一任務』。（註四十八）

魯易怎樣估計當時的局勢呢？『國民黨內部的階級分化已加強了牠底左派與共產黨間的聯繫。大資產階級的脫離已使國民黨能夠轉變而爲產業無產階級，農民與小資產階級（加上資產階級的某些層份）合成的一個革命聯盟……中國革命繼續在階級聯合的基礎上發展，牠尙不能夠交給無產階級單獨領導………國民黨的領袖黨員參加大會的開幕且宣稱他們決意鞏固（他們）和共產黨的聯盟。』（註四十九）

魯易對中國共產黨的實際領導是什麽呢？我們且聽一聽中國共產黨一位中央委員瞿秋白的話吧。瞿秋白是在事變的震動已摧毀了革命，同時摧毀了魯易在共產國際下層中的神聖不可侵犯性之後一年，才寫這幾句話出來的：

『魯易的政治見解就是認定左派和小資產階級除了跟隨我們之外，沒有別的出路。他沒有指出新的叛賣的可能，並指出共產黨應進而防止這種新叛賣底可能的具體和複雜的任務。因此第五次大會的空氣受這一口號支配着：「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合作到底萬歲！」』（註五十）

陳獨秀在他向大會的報告中也承認：雖然農民正自動傾向於沒收土地，『我們已實施了一種太和平的政策了』。他贊成大地產應加沒收，但附加幾句話說：『目前與小地主的聯盟仍屬必要。我們千萬不要採取極左政策，應採取中間路線。在沒收大中地產之前，我們還要等候軍事運動的發展。此刻唯一正確的解決辦法，就是革命尙未深入之前，必須使牠擴大。』（註五十一）

當這段摘引在莫斯科眞理報上公佈時，托洛斯基在他的批評史大林大綱的文章後面，寫一段追憶：『這條道路是走

到破產的最眞實，最確鑿，最短捷的道路。農民已起來沒收大地主的財產，我黨竟極端背反牠自己的政綱和名義，採取一種和平的自由的土地政策……陳獨秀同志已被共產國際代表的虛僞領導綑起手足，他的土地公式客觀上無非是中國共產黨脫離眞正土地運動的公式而已。』（註五十二）

但是眞理報採取什麽態度呢？眞理報毫無意見的刋佈陳獨秀的報告。其實牠又怎能採取別的態度？五月十三日，史大林尙與陳獨秀底見解的精神完全一致，在莫斯科宣稱在中國只有『在武漢革命政府鞏固之後』，才能組織蘇維埃。（註五十三）整個共產國際也同樣毫無批評的公佈了陳氏的報告。只有後來當事變已擺在他們眼前之後，共產國際的代言人才開始響應托洛斯基對中國共產黨的警告。

大會關於土地問題的討論與國民黨土地委員會會議上的討論如出一轍。共產黨大會也像那個委員會一樣，在原則上贊成沒收大地產。但，牠補充說：『關於小地主的土地與屬於革命軍底軍官的土地不得沒收。』（註五十四）

拒絕觸動軍官的土地也就等於拒絕觸及整個土地問題，因爲在武漢軍隊中，幾乎沒有一個下級軍官（將軍們更不消說）不是兩湖地主的親屬。陳獨秀本人在他的報告裡也指出過：『（國民革命軍的）軍官都是出身於地主階級的青年人。』（註五十五）但是難道共產黨大會的決議在任何方面和共產國際的訓令不同嗎？史大林不是遠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就已電令制止農民，以免與將軍們生隔膜嗎？（註五十六）共產國際不正在這些日子反對產生工農兵蘇維埃，而其根據的理由又正是認爲產生這些蘇維蘇維埃『就是在共產黨及其同盟者最不利的情形中(？)自覺地促進與將軍們的衝突』嗎？(註五十七)又史大林不是在數星期之後拍發特別的指示，逐字重覆保護將軍們土地的同樣訓令嗎？在武漢，在莫斯科發電的另一端，有鮑羅庭，魯易，米夫，羅佐夫斯基，勃勞達，杜里歐及另外一羣『布爾什維

克』顧問。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及時說出他的意見。莫斯科後來藉可鄙的推諉和謊言，設法把這次慘敗的全部責任推到陳獨秀和中國黨中央的肩上，但這種可鄙的推諉和謊言絲毫不能掩飾共產國際設定，讓中國共產黨來追隨的政治道路。

第五次大會的土地决議案是共產黨關於土地問題的第一次直接的宣言。牠簡直等於規避兩湖農民剛要親手來解决的問題。實際上，共產黨人迫得要積極反對農民的『過火』了。假如像史大林和共產國際所一口咬定的一樣，革命的勝利沒有國民黨左派的合作是『不可能的』，那末，在土地叛亂的意義上和國民黨合作便是不可思議的了。因此，土地叛亂必須加以擯棄，而農民們也一定得聽天由命。中國共產黨的第五次大會雖召集於革命的最危急的關頭，但只要牠追隨史大林的訓令，牠是無法不受『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合作到底萬歲！』這一叛賣的口號支配的。這完全是合乎邏輯的，因為大會的宣言宣稱：『一切民主主義份子統一在國民黨的旗幟之下。鞏固這一革命的聯合。這就是無產階級在革命現階段的重大任務。革命的民主聯合就是國民革命的領袖。』（註五十八）

在第五次大會的幕後，有種種不同的傾向。瞿秋白敘述這些傾向如下：

『鮑羅庭的路線是退出和緩和土地革命……向小資產階級讓步；向所謂工商業家讓步；向地主豪紳讓步；聯馮倒蔣；且藉這種政策，領導左派領袖去反對武漢和南京的右派反動勢力。

『魯易主張對商人作相當讓步……反對向地主豪紳階級作任何讓步……贊成向小地主和革命的將領作小讓步。』

共產黨中央則主張『對商人完全讓步，對地主豪紳完全讓步，（牠）讓為土地革命不能馬上實現，尙需要一個充分的宣傳時期……認為最好還是讓（國民黨）左派去領導，而我們則站開一點，好使革命不致過早發展。……』（註

五十九）

這三種傾向實際上就是一種——退却的傾向。實際上牠們也只成了一種，因爲，據瞿秋白正確把牠們總括起來：『當時實施的政策就是爲了克服蔣叛變以後的困難而作讓步。』（註六十）

正當中國革命最需要把丹敦的不朽口號：『勇敢，勇敢，仍要勇敢』揭示在牠的旗幟上面的時候，鮑羅庭，魯易及所有共產國際的變臣竟大呼：『退讓，退讓！』但莫斯科命令中國共產黨人向國民黨左派叩頭。國民黨左派却向軍閥，地主和資產階級叩頭。這種叛賣結果要窒死中國革命，但這些領袖的動搖和懦弱却一點也不能掩蔽行動中底羣衆的偉大和勢力。

第十三章　土地鬥爭

第十三章　土地鬥爭

除了俄國的十月革命，我們這個世紀尚沒有替歷史產生一種現象，比得上一九二七年春夏間中國羣衆的蠢起那樣聲勢浩大，那樣驚心動魄。自從長毛太平軍興的時代以來，中國農民除了勞苦和死亡的權利之外，便沒有機會希冀從生活中獲得更多的東西。但現在他們在兩湖居然開始掌握歷史進步的槓桿——進行猛烈的和集體的行動了。他們開始撐直他們的腰，開始從他們的肩膀上解除數世紀的負担。人們把這件事稱爲中國勞苦羣衆的初步覺醒：開始知道他們也是一個人，他們也生活着。從這種覺醒中，生出了不願過牛馬，但願過人底生活的願望，這一願望又推使幾千百萬勞苦羣衆起來反對每一樁令他們成爲幾千年文明底馱馬的事物。

無知和胆怯的領袖已替農民把壓迫者加以道德的區分。有在打倒之列的『劣』紳，但也有稱爲農民朋友的『正』紳。有些大地主，將來總有一天，農民可以沒收他們的財產的；但也有一些小地主，他們將被視爲堅固和友善的同盟者。農民在農村中的敵人就是土豪——地方暴君，官吏和地主的僱傭；但國民革命軍的軍官，却是朋友和解放者且不得觸犯他們的財產，即使他們和他們的父親，兄弟也是地主和高利貸者。畢竟沒有什麽東西比得上道德正義的外衣那樣容易披在有產者身上的了。當革命運動進展，而『革命的』政府表示連牠用來酬答農民擁護的最輕微的諾言也

無心履行的時候，羣衆們開始明白：『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并沒有配合他們的利益，倒還配合那些要他們作無報償服務底階級的利益。農村開始覺醒。這個口號經過一番民衆的闡發，很快就變成：『有土皆豪，無紳不劣！』（註一）

國民黨說，『打倒不平等條約！』但湖南農民所知道的唯一『不平等條約』就是佃租合同，根據這種合同，他們迫得要把他們的百分之七十的收穫讓給地主，預先儲存一筆毫無利息的現欵來償付地租，逢節送禮給地主，如逢地主家族有嫁娶喪葬等事，需要人力準備儀禮，通報和服侍賓客時，還要無工資盡義務。『廢除不平等條約』這個口號在湖南農民看來就等於廢除土地上的奴隸制。假如國民黨談到中國與列強的關係，農民們就不能不作如是想。（註二）

在國民黨的旗幟上僅僅標上二五減租及『限制』利率爲每年百分之二十。國民黨也含糊地談及『佃農權利均等』，但從沒有清楚的說明牠的含意。當羣衆開始行動，而事實證明國民黨左派不願意或不能夠把牠自己政綱中這些溫和的的條欵加以實現時，羣衆底覺醒的力量以迅速的，直接的邏輯，驅使農民得出這一口號：『耕者有其田！』農民們以嚴酷的率直態度，進行把他們自己的口號加以實現，這種態度，在因此而蒙受損失的人們看來，是很可怕的。四月末，在湖南許多縣份，又在湖北某些縣份裡，土地和財產的沒收提到議事日程上。

在華中，土地鬥爭使一千萬左右農民捲入羣衆組織的軌道之內。數世紀積累的壓迫已在地下深深埋着火種。一九二七年的蠢起只不過拿火把來點着那像人體脈絡一樣纏繞着整個社會組織的導火線吧了。革命造成一連串的轟然大爆炸，這些爆炸把舊社會炸得一片不留。凡是舊的，腐敗的，墮落的和凋殘的，都震碎了，被殘踏了，而且通通解消於『歷史底受激動的狂亂中』了。婦人的小脚已扯開了纏

帶。少女們剪短了頭髮，以一種旁若無人的態度湧入農村去喚醒她們的同性，替她們解除那經過幾世代腐蝕的鎖鍊。（附註一）人們公然把孔子，這位特權和屈服的教主從一種惡毒和反動的道德幃幕中拉出來，抬着他的偶像在鄉下遊行示衆并加以焚燬。佛家寺院被佔據，并改爲學校和會場。外國傳教師成羣被逐，狼奔豕突，逃避他們稱爲無政府的某種事物，亦即他們的教旨使他們永遠無法了解的事物。迷信被掃除了。『泥神木偶已喪失了他們的威嚴。人民再也用不着四書五經。他們所急需的是政治報告。他們要知道國家和世界的情形。貼在門上的門神現在已給標語黏掉了。在屋子裡，連神主牌也已被標語擠掉了。』（註三）

充滿舊社會的壞習慣給洪流掃除了。一位湖南的農民領袖報告道：『自清末以來，政府已屢次禁止鴉片。但事實上禁煙局往往就是賣煙局。受罰的只是小煙鬼。貪官汚吏就是公開抽煙也從來無人過問……但是這道禁令二十年來雖成一紙空文，自農民起來之後，牠就成了一道事實上的禁令了。農村的農民協會下令如發覺任何人抽鴉片則以懲罰和遊街示衆。自從許多有名士紳帶高帽子遊街之後，在湖南鄉下誰都不敢再抽煙了。農民們打碎鄉紳的煙鎗，先鋒隊（都是十二歲至十五歲的童子）挨戶搜查，撲滅賭博。

（附註一）一位老太婆在田裡向一位女宣傳員說：『我活到八十歲了，我沒有見過像你這樣短頭髮，大脚板，着制服的女人。』這個女孩子坐在湖北南部嘉魚縣的草地上，寫信給漢口一位友人，告訴她如何向一羣農民演講纏足之害。一個小康中年婦人拖着三寸金蓮，拐到她的面前說：『你的脚這樣大，你的男人有時不會穿錯你的鞋子了麽？』旁面圍立着的士兵和農民哄然大笑起來。這位女軍官羞得面紅耳赤，但後來她自己也笑起來了。——摘自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民衆論壇之『戰地來信』。

痲雀牌及其他賭具都當場焚燬了。纏足廢除了。河堤道路建築起來；荒地均加耘耕……興辦學校與破除迷信成了農村中的最熱烈的工作……農民創造了一個和平的農村。不管你們把湖南農村形容得如何動亂，牠們已比之地主統治時候更和平了……』（註四）

農民進行肅淸過去底封建勢力的工作，進行得驚人的澈底，而且往往幷不是沒有某種驚人的幽默的。在湖北黃崗，給犯罪紳士帶的『高帽子』是三斗三升的容器，地主從前在收穫後，收租時期用來分穀的就是這種容器。（註五）

在農村中，農民的裁判是迅速和簡單的。如果這種裁判犯過什麼錯誤的話，牠就錯在寬容方面。被他們下令鎗决的人數非常之少，這是萬萬料想不到的。在大多數場合，他們對地主及其僕從處以重大的罰欵或判處徒刑。當地的農民委員會，以主席團的資格出席農民的羣衆大會，執行裁判。紳士們常常說，『我們怕什麼，只怕民衆大會。』往日地方大地主在法律之前享有土皇帝的特權，一切爭執和要求大都經過他或當地長官來解决 。 通常高坐在他的法庭上，照他一已之所好，執行他一已的司法。這一點現在通通改變了。當地農民協會掃除一切積弊，解决一切重大的案子。他們成了一切問題申訴的法庭，連家庭細故也包括在內。

當農民組織解决農村的無數經濟問題時，牠們表現一種勇氣和一種胆量，遠超過牠們解决這些問題的能力。但是，在許多地方，他們畢竟利用從紳士方面沒收來的欵項及其他手段，進行建立合作社，且實行規定穀物價格的漲落，防止投機。(註六)這些合作社甚至還印發證券，當地農民都非常信任的接受牠。債息和地租的問題都以拒絕償付的簡單辦法解決了。在農村中，賣淫和婦孺的拍賣都直接由於農民的無法忍受的貧困所致。人類生命的買賣已成了繁殖於人類貧困上的貿易，每年成千成萬女人和兒童被賣入娼家或賣入富家爲奴。在陽新，縣農會代表大會通過把從鄉紳

沒收來的一部分欵項，撥出來救濟貧民，『如此，他們就毋須為了大家求生活而鬻賣他們的妻子。』但是克服經濟困難的每一步部分的，初步的努力都迅速促使農民要解決土地本身的基本問題。沒有什麽飢餓大過於土地的飢餓。農民愈來愈自覺到自己的力量，便愈來愈要滿足他的慾望。

在城市裡，工會中的工人執行裁判，維持地方秩序。工人糾察隊穿着藍色土布制服，他們携帶的武裝往往是木棒而不是步鎗，他們帶着『威嚴的認眞做事的神氣』，很快就成了『街道上最惹目的革命特色』了。（註七）在早期，工會的威權是很大的。查伯曼寫道：『在湖北許多縣城裡，我親眼在德安見到，而且從其他縣城的中外同僚方面也聽到，縣長雖然直接由漢口國民政府委任，且有國民革命軍駐紮在縣裡，但他仍然無法採取任何行動，違背兩三個重要工會的願望。』（註八）

工會興辦學校，保護女工權利，庇護那些逃出來的婢女，組織失業救濟，儘可能揭發，追捕和懲罰反革命份子，但是武漢政府頒發，而由共產黨支配的總工會加以贊成的限制條例已使他們的活動限制在狹窄的範圍內了。（註九）

在城市和鄉村雙方面，羣衆運動碰到可怕的障碍。資產階級的怠工，帝國主義的封鎖，武漢政府之堅决拒絕藉革命的手段來對付這個局面，已把武漢的工人迫到經濟的死巷中去。他們自己的努力（佔領漢陽工廠明示出來）一開始就受政府制止，這個政府，共產黨人告訴他們應該毫無問題服從的。在漢陽，兵工廠工人熱心地包圍着俄國工會的訪問代表團。

他們問道：『在你們革命期間內，你們對政府產業中的怠工採取什麽態度？你們鼓勵牠呢，抑或容忍牠呢？』

『在你們的革命期間內，全體工人什麽時候才開始獲取利益？他們於剝削者被推翻時，立即取得利益呢？抑或革命尙未最後勝利之前，他們一定要忍受長期痛苦，作許多犧牲呢？』

史特朗女士報告這些問題時，忘記提起俄國工人的答覆如何，她繼續寫道：『他們已替他們底革命的(！)政府作過許多犧牲。他們放棄他們的八小時工作的要求，在兵工廠裡做十三至十七小時的工，「因爲我們的革命政府受了威脅。」他們擱置了童工立法的要求；我親眼見到武昌的紗廠裡，七八歲的童工工作十小時，據工會的組織部人員告訴我說，「武漢受了封鎖；我們千萬不要妨害生產，尤其是外人的生產。」他們有理由爲武漢而犧牲，因爲在別的地方，他們的情況更其嚴重。在上海，廣州和湖南，工人正被處决。在武漢，他們尙有機會抬起他們的頭和說一點子話。他們對這種微薄的特權是感激涕零的。』（註十）

『抬起他們的頭和說一點子話！』這就是工人在武漢『革命中心』的特權！那些訪問的俄國工人有沒有告訴他們的中國同志說，他們確乎曾替他們的革命政府作過犧牲，作過驚人的犧牲——可是這個政府却眞正是他們的，是眞正革命的，幷不是如『革命的武漢』這種虛構？如果這批訪問者中有任何人看出分別來，他是否說出來過，殊屬疑問。一九一七年在俄國是革命的，一九二七年在武漢就是反革命的了。這是應該的。史大林所說如此。

在農村中，土地叛亂的第一道浪潮已使地主豪紳脚跟搖動。在許多地方，地主們由於害怕喪命或由於希望在土地國有和土地分配（這是他們料想要到來的）中他們可以挽回一部分，因此，他們甚至自動把他們的土地讓給農民協會。農民進行沒收各村土地及全縣土地的初步行動現在最需要一種集中權力來幫助，有了這個集中的權力才能夠武裝農民，保護和擴大他們的勝利品。當地主及鄉村豪紳察覺武漢幷沒有這種權力存在，幷察覺武漢只有優柔寡斷動搖和一種畏懼農民的心理（這種畏懼心比他們自己的畏懼心還要大）時，他們的自信心立即恢復，而反動勢力的反攻遂帶上一種武裝的，有組織的性質。

省農會報告道：『現時湖南農民尙不能說是已經打倒了豪

紳。我們只能說他們現在正在叛反他們。昧於實情的人說，湖南情形是可怕的，豪紳被殺太多了。但事實正相反………豪紳被殺總共不過十人，但農民被豪紳殺害的數目着實驚人……許多人都知道農民正在湖南舉行革命，但很少人知道豪紳的殘忍和奸詐的。……各縣民團私自拷打農民已成了極普通的事情……私刑拷打自由行使……農民被捕之後，不是干脆被殺，便是被殘害肢體——脚上肌肉被臠割，生殖器被割除等。……茶陵的民團用火油活活燒死一個學生，這個學生是到該縣做農運工作的。……

『豪紳及民團的殘餘份子被農民驅逐之後，他們往往和土匪聯合來反對農民協會。省農會接到的報告十之八九是提到土豪和土匪揷血爲盟，發誓打倒農民協會，殺絕黨委員的……

『他們又組織反動團體。在湘鄉，他們稱之爲鄉鎮維持會。在漢陽有白黨。在醴陵和瀏陽有三愛會。在醴陵尙有打狗團，狗就是指農民。在湖南許多地方尙有財產維持會。這些團體均有計劃和實行屠殺農民，搗毀農會。……有時這些陰謀也給農民發現，但這些團體却從未解散，………

『土豪應用的另一種辦法就是混入農會……破壞牠們。不然他們就組織他們自己的農會。他們在口頭上也熱心贊成農運……他們在宗族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爲的是挑起一縣反對他縣，一姓反對他姓。（附註一）他們答應賣平穀誘惑族人入會。他們又欺騙上峯，俾承認他們爲特別鄉或縣農會。』（註十一）

從湖南的縣城和鄉村逃出來的豪紳家族散佈謠言像老鼠傳播疫病一樣。有錢的都逃到上海去。次富的到漢口，小康的就到長沙。他們到處舉發關於公妻的老罪狀，自從一七八九年以來，每一次革命運動都發生過這種公妻的責難。（附註二）這些中國亡命客在兵士裡散佈謠言稱六個月之

（附註一）在許多縣裡，大多數居民同屬一姓，而且關係無論親疏，却同屬一宗。

內，所有他們的老婆和姊妹都要被『共產』了。這種控告最妙的是發自中國的豪紳，這些傢伙總是盡他們的財富之能力，討許多小老婆，而他們的橫徵暴斂又迫使農民把他們的老婆子女賣去做奴隸和賣淫。他們又設法利用孝心，大談五十歲以上通通殺戮的故事。

湖北農民組織的報告與湖南的報告非常類似。湖北農運進行得比較慢，故豪紳有更多的時間來準備反抗。五月間，已有不少農會完全落入他們手中。『在許多鄉村裡，農會完全沒有農民——只有長衫濶袖的紳士在進進出出。』假如農民對他們自己的組織能夠保持他們的支配權，豪紳們便集中他們的注意力於當地國民黨黨部。他們一打入黨裡面來，就立即成立對抗的農會由他們自己主持，他們在農民與黨之間保持一條極淸楚的界限。『在蘄水縣，甚至還有拒絕農民加入黨的事。』(註十二)在湖北也在種種不同的名稱之下湧現如大刀會，拳頭會之類的反動組織出來，牠們都由地主接濟和領導。豪紳與反叛軍閥的勾結迅速形成。當夏斗寅於五月間叛變時，他的軍隊『由江陵到監利，新堤，崇陽，到處打開牢監，釋放豪紳，這些豪紳便充當嚮導搜捕農會辦事人和執行委員，把他們殺害。他們左右亂殺幾乎殺到武昌。在毗連河南的某縣裡，豪紳與紅鎗會（一種舊的反動秘密會社）聯合屠殺農民。在湖北西部和北部，他們和張聯陞及于學忠勾結。』（註十三）

豪紳的反攻連帶施用極殘酷之能事的慘刑——包括那種精心設想的酷刑，這種酷刑只有數世紀來掌有特權的統治階級才能想得出來。『在陽新，他們把火油倒在農民身上，活

（附註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裡寫道：『……我們的資產階級以爲共產黨人鼓吹正式公妻，他們關於此事的道德義憤，其荒謬是無可比擬的。共產黨人用不着提倡公妻制；牠已一貫存在着……目前生產制度廢除，由此種生產制度而生的公妻形式也就消滅——正式和非正式的賣淫也就消滅』。

活燒死他們。在黃崗，他們用燒紅的鐵來烙肉和殺人。在羅田，他們把他們的犧牲者綑在樹上，一刀一刀的割他們，然後用沙鹽揉他們的刀痕，使他們痛絕。他們破開女同志的乳部，用鐵絲貫穿她們的身體，讓她們裸體遊街。在鍾祥，每一個同志都被穿過二十次。』（註十四）叛亂的羣衆表現的殘忍程度還不及他們的報復的主人向他們表演的千分之一。這種野蠻主義（這似乎只有那些財產保護者才能做得出）迅速撕破他們底『高尚』和『有教養』的外表，這種外表那樣老資格，那樣優超，又那樣爲多感的國粹家所愛好。（註十五）

兩湖的工農實際上除了他們的赤手空拳和他們的鬥爭意志之外，便沒有別的東西來對付這些敵人。只有在一個集中的力量的領導之下，而這一集中力量又大胆的把土地革命的要求寫在牠的旗幟之上，這個運動才能前進。他們需要地方的政權機關。他們尤其需要武裝。所有這些他們都缺乏，而沒有這些東西，他們是無力抵禦反動勢力的反攻的。共產國際雖然設法把革命的土地領導的外衣贈給武漢政府，但武漢政府却幷沒有接受牠。牠甚至還無法作一次有效的行動來實施牠的二五減租的政綱。（註十六）牠所能做的就是把農民每一次自尋出路的努力加以攔阻。

農會的報告反覆敦促政府明白的規定牠的政策，豎立解決土地問題的標準。政府代言人只是用農民『過火』的譴責來答覆這些要求。（註十七）

在湖南，共產國際的代表團知道國民黨減租減息的政綱不能實現，『因爲地主反抗』。一位國民黨代表告訴他們道：『本省農民有普遍的和激昂的土地要求。他們要分土地。他們說他們服從國民政府，但他們同時又要求政府幹點事情。他們要土地！』（註十八）

在莫斯科，史大林正排斥蘇維埃的口號，因爲這個口號等於反對武漢的『革命中心』，反對這個『唯一的政權』。托洛斯基反駁道，這個『革命中心』是一個虛構，革命的權力

機關現在應該產生，而且只有經過工農兵蘇維埃的中介才能產生和集中化。在兩湖城鄉中的眞正情勢如何呢？湖北省農會代表在武漢宣稱最迫切的需要就是『立即成立機關，維持政體，現存的政治機關實際上幷不是一個政權。』（註十九）

在湖南，史托拉——勃勞達——杜里歐發現農民正盡全力產生托洛次基所談及的那一類地方權力機關，他們又發現史大林的『唯一政權」實際上幷不存在。

『……軍閥們雖已被打敗和驅逐了……縣長，豪紳地主依舊殘留。我們到處見到他們……他們對人民尙行使他們的封建獨裁權……一個革命而不破除地方政府的舊制度是不可思議的……羣衆到處都深深感覺和了解這一點，……在湖南，剷除舊制度的進程已較之我們所經過的任何其他省份都走得遠。……該省的各縣，正在成立特別委員會來管理地方政務。這些委員會均由國民黨，工會和農會代表組成，……舊村長雖仍在各村行使權力，但他們正逐漸被排擠，而代之以民衆直接選出的所謂鄉民會議。在許多地方，農會就是解決各種問題的最高權威。……但在這裡提明這一點是適切的：（！）所有這些掃除陳腐制度的工作……尙缺乏系統和計劃性。改組地方政府底明確的行動綱領之缺如，大家都深深感覺到。當然這一點是可以解釋的，（！）因爲革命的中國正忙於反軍閥戰爭及反帝鬥爭的緣故。』（註二十）

『民衆直接選出的鄉民會議』——但這不就是萌芽中的蘇維埃麽？難道『托洛斯基主義』的病菌竟神通廣大，跨越一萬里路幷終於到達目的地，偸偸攢入湖南農民的細胞組織中麽？

共產國際的訪問者到什麽地方，他們總聽到這樣的呼聲：『發給農民以武裝！他們沒有鎗砲或軍火。農民必須武裝起來！』

史托拉往下寫道：『我們聽說無論什麽地方如果農民不能

獲得步鎗，他們就用鐵鋤和犁頭組織自衞隊，……我們聽到許多替農民獲得武裝和軍火的計劃。人們又引證農民會從北軍奪獲成千步鎗的例子，但這些武器總是交給國民政府或軍隊的。』（註二十一）

農民要求土地和武裝。共產國際却強迫中國共產黨人接受一種政策，這種政策把這些要求的滿足完全寄托於國民黨左派領袖及其武漢政府的心情意願的合作。沒有這一合作，『勝利是不可能的，』史大林下令道。

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書記寫道：『如不解決土地問題，中國革命將不能獲致最後勝利，……國民政府如漠視以最堅決的革命態度來解決土地問題或無法充分支援農民的政治和經濟要求，這將是一個致命的錯誤。』

但史托拉也沒有走得太遠，他幷沒有指出國民政府應把土地給農民。他疲弱地做出結論道：『某種手段是絕對而且馬上需要的……地租的激減……賦稅的改良……高利貸利率的禁止……武裝農民』。

這原本就是國民黨政綱。但『革命中心』連這一溫和的改良政綱也不進行實施。這對於革命是『致命的』，但這一『致命的』錯誤幷不在國民黨的領袖方面，（他們只不過在保護他們本階級的利益），而是在共產國際方面，因爲牠無法給農民一個機會去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

據勃勞達——杜里歐——史托拉的見解，武漢政府是太『忙』於反軍閥和反帝的鬥爭了，因此不能替農民做任何事情。實際上，武漢的領袖却忙於，非常忙於農民運動。只不過他們所關心的不是給牠以『充分的支援』而是設法抑制牠，把牠管束在資產階級財產的範圍內吧了。

國民黨土地委員會的討論和結論表現出來的逃避，混亂和缺乏任何有效的政策，實際上就等於對土地叛亂消極怠工。等到這一叛亂終究爆發了，國民黨左派的領袖便放棄他們的消極態度而採取直接鎮壓的政策。

當農會（當時除了牠便沒有任何其他有效力量）開始取得

政權的機能時，武漢的領袖便大呼：『過火！』走入來限制他們。地主及其傭僕率領民團的反革命隊伍公開洗刼鄉村，武漢政府不能夠或根本不願意對付他們，（註二十三）牠倒還禁止羣衆組織去審判這些人民公敵，稍後，牠甚至制止他們擅自追捕或施行罰欵。（註二十四）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宣稱：『本黨排斥不法地主豪紳，就是因爲他們不斷藉壓迫手段剝奪農民……但本黨必須指出：關於此種剝奪和壓迫行爲應有明白和確鑿的證據，方可由法律機關制裁此等地主豪紳。凡鄉村及縣城中并不反對國民革命的淸白富家均由國民政府保護。本黨同志應明確指示羣衆，不要輕率侵他人的人身，財產，職業或宗教信仰的自由。凡甘冒不韙，擾亂地方治安者，……就是違反革命的利益，他的行爲實等於反革命。各地黨部應留心制止此種行動。……』（註二十五）

湖北省農會的秘書道：『農民樂於把這種裁判的工作交給政府，但在所有這些縣份裡政府却沒有法定的官吏。我們的最大要求就是：武漢政府應趕快成立地方政府，……如果政府肯發給我們鎗枝，我們農民將來仍要用我們的生命來保護這一政府的。』（註二十六）

但政府却不想在農村裡成立一個革命的政權。牠反而下令將企圖成立這一政權的農會加以解散。政府法定每個農會只准有五十個武裝農軍，而且還有一道命令，限定這五十個人只可以用他們的武器來抵抗土匪，不能反對地主。湖北於六月間有組織的農民不下三百萬，但全湖北省的農民協會只有七百枝手槍，而這些手槍還分散在全省哩。（註二十七）

湖北省農會代表向國民黨報告道：『許多縣都曾派人到首都來請求購買槍枝。他們已帶來充足的欵項，他們只是請求幫助去購買牠們吧了。這不僅是農村農會的要求，還是農民的普遍要求。』（註二十八）

但這些代表都空手而返，其他一切請求也得不到回覆。國

民黨的一個正式報告說：『農民……沒有槍枝，不斷遭受反革命份子的攻擊。可惜要想滿足鄉村送來的關於軍事援助的請求，一般的說來是不可能的。』（註二十九）

湖北省農會秘書說：『例如在黃安縣，反動派殺死了二十一個最重要的農民領袖。農會曾懇求政府派軍隊來保護他們。但政府說軍隊正忙於上前線。農會於是要求牠有運用自己底武器的權利；但這一點政府也禁止，只准牠抵抗襲擊鄉村的公認的土匪，但不准在農村裡惹起內部衝突。我們怎麽辦呢？反動派不認識法律；他們隨意殺戮。但我們一定得承認法律，因爲我們是一個負責任的農會。但法律却不能幫助我們，只是禁止我們自助，……我們因爲答應農民把他們從惡劣境況中救出，故博得他們的信任，……這件事却沒有實現……普通農民只是叫：「牛皮大家！你們沒有替我們幹出一點事。現在我們不要聽你們的空話。」我們想打破封建制度。但封建制度却依存在目前農村的經濟結構上。豪紳有的是錢。窮人每年春天都不得不借錢來買種子，肥料，甚至購辦他們自己的糧食。現在豪紳拒絕貸欵，因爲他們仇視農會。三分之二的農民得不到錢買種子。他們開始駡農會。我們答應組織合作社，但就是舉辦這樁事我們也沒有錢，……法律禁止我們於新土地政策樹立和法庭決定之前奪取豪紳的土地……』

史特朗女士補充道：『……他告訴我說，爲了對付這許多可怕的困難，農會只提出兩個簡單的要求：立即成立地方政府並有充足的民軍來支持牠們，以免受土匪和不法的反動派攻擊；又立即成立合作社，政府給農民信用放欵……』我們的女報告者做出結論道：『這是基本和必需的要求，但在武漢的軍事，財政和政治情勢之下——這又是烏托邦的夢想！』（註三十）

這就是『革命中心』！這並不是存在於史大林和布哈林想像中的『革命中心』，而是事實上存在於華中的『革命中心』。這就是勃勞達——杜里歐——曼尼經過江西旅行之

後『重新呼吸新鮮空氣』的地方，同時這也就是『我們在湖北羣衆中發現的熱情以及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對工農的態度使我們再度放心……』的地方。（註三十一）這也就是魯易稱爲『中國人民反帝鬥爭底標識』的政府。（註三十二）在牠的支配之下，農民的最基本的要求成了——烏托邦的夢想！

農民很快就對他們的領袖失掉信仰（『牛皮大家！你們沒有替我們幹出一點事——現在我們不要聽你們的空話！』）——而且對他們的組織也失去信仰。六月廿五日一位演講者在一次湖北代表會議中報告道：『農會已逐漸喪失了農民的信任和擁護』，因爲『農民們從他們的鬥爭中所得到的往往不外是磨難或屠殺』。（註三十三）

夏斗寅於五月間叛變時，他從未想到把青天白日旗扯下來。『因爲他仍然豎起國民黨旗，沒有淸楚的表明他的態度，（？）農民便不提防遭受襲擊。這次進攻是突然而來的，被捕的事發生，許多人逃走，農民失掉他們的領袖，而組織也就崩潰。因此，他們不幫助作戰也不幫助運輸。』（註三十四）

羣衆們曾領人家的教，把國民黨的旗幟視爲他們自己的。當反動勢力在牠的招展之下抬起頭來的時候，牠發現羣衆們原來全無準備且很輕易就把他們擊倒。這就是整個革命運動所遭遇的情形。國民黨的旗幟從來就不是羣衆的旗幟。牠是資產階級的旗幟，是地主，豪紳和軍閥的旗幟。上海政變，甚至不久隨之而來的事變都沒有使共產黨領袖及其共產國際的祖師了解這件事。

在武漢，共產黨人已替國民政府的行動負上全部責任。共產黨人供職於國民政府及省政府。共產黨領袖和國民黨領袖共同參加所謂『聯席會議』，凡關於政策的一切重大決定都是在這個會議裡作出的。共產黨中央於五月初通過一個決議，規定黨在這種會議中的義務，這個決議道：『共產黨員在聯席會議中討論各種主要的問題，提出具體建議

，但是這些具體的建議不應根據我們黨的最大要求，而應注意到民族革命發展的利益與團結國民黨的左派。』（註三十五）但我們要記着：共產黨人在這個『聯盟』中並不是起着一個同盟黨底獨立代表的作用，而只是充當國民黨的黨員，服從牠的政綱和紀律。因此，在首次會議裡，有一次汪精衛聲明『只有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才有權批准和公佈聯席會議的決議案』，共產黨代表只好贊成。汪精衛當然成立一個小心組織的黨團來反對共產黨人。他『暗地裡集合各種黨機關的所有純正國民黨員，規定於每次會議之前在他的私寓裡開一次預備會議，其目的在成立一個聯合戰線……反對共產黨員。』（註三十六）

但是他簡直用不着害怕共產黨的反抗。共產黨中央甚至命令供職於國民黨報舘的共產黨人『不當使此等報紙變為共產黨的報紙，而照國民黨決議的精神去工作。』（註三十七）處在這種『聯盟』的環境之下，從始共產黨人就沒有出版他們自己的日報，他們後來在武漢也沒有出版過，在共產國際訓令的決議中，人們也找不出一個地方指正這種連一個革命政黨的最基本武器也缺少的錯誤。沒有一張共產黨報紙，最後的保證這一點：『與國民黨左派』保持『一致』也就等於共產黨人完全隸屬於國民黨和放棄了共產黨的『最大要求』。

中國共產黨既已如是妥貼的被綑縛起來，史大林於四月二十一日的大綱裡提到牠，猶說『共產黨雖然在革命的國民黨隊伍內作戰，但它現在越發要保持牠的獨立。』（註三十八）

托洛次基反問道：『保持嗎？但迄今共產黨尚沒有過這種獨立。牠之沒有獨立正是一切惡果和一切錯誤的根源……（史大林）不把昨天的實踐一次而又永久地加以結束，（他）反而提議「現在越發」要保持牠。但這也就等於說，他們要保持無產階級政黨對一個小資產階級政黨的思想上和組織上的依賴，而小資產階級政黨又不可避免要成為大

資產階級的一個工具。』（註三十九）

『團結國民黨的左派』保證中國共產黨人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繼續依賴於他們的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同盟者。共產黨人不是採取獨立的路線，公然違反國民黨左派的阻遏羣衆運動的要求，就只好投降這種要求，只要共產黨國際堅執認爲工農的要求只有經過國民黨左派之手才能滿足，這一獨立的道路就塞斷了。因此共產黨人只好走另一條唯一道路。

『中央沒有發展和推動罷工運動，牠反而和國民黨領袖合作成立強迫仲裁制，並把最後決定權讓之於政府，命令工會不要爲工人的要求而鬥爭，而要服從勞工紀律……當工會逮捕一批工廠主和店東時，資產階級大叫：「過火！」中央設法勸工人，即使工廠主故意怠工關閉工廠，也不要佔領工廠，又即使店東故意抬高物價也不要關店。』（註四十）

抬高物價就是取消經過許多次勝利的罷工而得來的小小成果。工人們本能地採取更革命的手段。他們佔領工廠和商店，且設法自行經營牠們。他們的工會採取直接的懲罰行動，反對怠工者和投機家。但政府却突然制止他們。他們聽人家說，政府的行動（並不是工人的行動）會解決他們的問題的。埃耳．勃勞達於四月廿九日在武漢一個工會會議上演講說，政府一定要規定物價的。他說：『（政府）無法幹這一點，對於革命力量就是禍患。』（註四十一）史托拉說：政府無法幫助農民就是一個『致命的錯誤』。勃勞達說：政府無法幫助工人就是『禍患』。但政府畢竟兩件事情都辦不到。

在這個政府裡有兩位共產黨部長，掌握農政和勞工兩部之職，用托洛次基的話說，這就是『人質的古典職位』。共產黨人原本是遵奉一九二六年末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全體會議的命令，加入國民政府的的。國民黨的三月全體會議指定譚平山爲農政部長，蘇兆徵(廣州工會領袖)爲勞工

部長。四月十日勃勞達寫道，『委任共產黨人來掌握這兩部，表示』革命的『社會變局加深了』。在勃勞達看來，共產黨人加入政府表示『向左轉』，他覺得這件事的『到來將確實無疑使英美帝國主義驚愕和震駭』。（註四十二）阿爾棱・蘭森（一位資產階級記者）比勃勞達畧爲懂得一個共產黨員在資產階級政府內充當勞工部長的意義。『他將來不是工會的工具，而是政府與工人間的一個中間人。』（註四十三）事實上，共產黨人加入武漢政府只不過畧畧掩蓋一下向右的急轉吧了，這一轉變也只不過使工農羣衆驚愕和震駭吧了。

共產黨人旣當了部長，他們便不得不執行國民黨的政策。譚平山於五月二十日正式就職時，汪精衞說：『農民運動已迅速增長……我們現在正需要一個能夠領導和指導農民的人。……譚同志就是這種領袖。他已有非常的準備來解決農民的問題。』（註四十四）他已有『非常的準備』，因爲幾千百萬農民都把共產黨人和俄國的十月革命等量齊觀，他們知道在俄國，農民已得到解放了。但譚並未想及十月革命。他於受職時說：『我覺得努力實施政府的農業政策……實施國民黨及已故總理的農業政綱是我的唯一義務。』（註四十五）

在事變老遠老遠之後，人們譴責道：『農政部長譚平山（共產黨員）就職典禮時的演辭，除批評他是可恥之外沒有別的話說。他對於土地革命沒收土地，消滅土豪劣紳地主階級在農村中的政權，都默默無言，他却說了一些自由主義的「改良農民狀况」反對「過火」的話。譚平山就職後，馬上發表對農民的訓令，禁止農民反對豪紳的「妄動」，違反則「嚴罰」。』（註四十六）

這位共產黨農政部長的頭幾篇宣言，其中有一篇說：『目前在農民解放運動中有一種危機。（這是）一個過渡時期……一個混戰紛亂，行動過早，使主要問題蒙混不清的時期。此種情形多少歸咎於農民方面的過份要求。雖然過

份要求應歸因於農民的長期受壓迫，且亦是此種壓迫之天然結果……但把他們加以抑制和管束仍屬必要……政府因此宣佈牠的政策：凡農民之一切不負責任的行爲及非法舉動，爲顧全大多數（？）農民之利益及農民運動的大局起見，應於萌芽時加以剷除……農村中一切同情革命運動的份子應集合和組織在牠的旗幟之下，且爲了這個目的，和平應該瀰漫於農村。牠不應被農民的過份要求消滅。至於地方的横暴地主豪紳，應交由政府處置。農民如擅自逮捕或處决，當依法懲辦……』（註四十七）

共產黨員蘇兆徵在勞工部裡也唱着同樣的調子。他就職數天之後頒發一道通告，寫道：『在新解放的工農方面，有許多幼稚行動的證據。這件事引起革命聯合的嚴重嫌隙。』（註四十八）

地主和資產階級的輿論就這樣經過『革命的』國民黨底『革命的』政府的傳聲筒傳達出來——又由共產黨加以發揮和散佈到羣衆中去！

『農政部及勞工部與其他官僚機關並沒有什麽區別……牠們沒有公佈一個減輕工農痛苦狀況的法律，沒有一個改變城市鄉村中剝削的法律……有些並沒有準備向政府提出，這些部長的共產黨員的工作……實際上則成了最腐爛的資產階級官僚統治，只是在羣衆面前消去共產黨的面貌；我們沒有一個革命的建議。對於武漢政府包庇反革命之種種錯誤，也沒有一點批評……』（註四十九）

人們經過羣衆組織努力勸勉工農，稱他們的得救就在於和壓迫他們的人聯合。向忠發（湖北省總工會主席，後來又成了共產黨書記長）（附註一）忙於組織工會與商人資本家的聯席會議，拚命執行汪精衛的訓令：『小資本家應與工人聯合。』（註五十）湖北總工會奉勞工部之命，把牠已獲得的警察權力放棄了。（註五十一）

（附註一）他於一九三一年六月在滬被捕，並由蔣介石下令槍斃。

全國農民協會總書記，（不是全國農協總書記，而是牠的秘書——譯者）任曙埋怨『湖北的農民運動發展得太快了』，且聲明農會已決意『緩和』農民的蠭起，爲的是保護『革命軍官』的土地。(註五十二)湖北省農會唯唯照辦。『因爲遵奉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的訓令，』牠命令各級分會『制止農民運動中的幼稚行動……』牠敦勸道：『……應努力鞏固戰線，設法使無產農民，小地主，商人和工廠家密切合作……嚴禁沒收革命軍人財產或並非土豪劣紳的財產』。（註五十三）據他人紀載說，汪精衛曾向鮑羅庭埋怨農民不注意這些訓令，而且他們只要力量辦得到便奪取土地。』鮑羅庭聲明他不替這個運動負責。……汪於是問鮑羅庭，他提出什麼辦法來對付這件事。鮑羅庭只能答覆道：『唯一的辦法就是限制這個運動。』(註五十四)

『團結國民黨的左派』是由上面規定的。爲了維持這種團結，共產黨必須放棄牠的階級任務和歷史使命。階級鬥爭的壓廹驅使武漢的政客倒入資產階級和豪紳的懷抱中，（武漢政府已成了他們的工具）——而共產國際的直接訓令又使共產黨人受國民黨及武漢政府的束縛。共產黨領袖在國民黨領袖的畏懼和躊躇的影響之下，無法提出一個革命行動的綱領來解決土地問題。』（註五十五）

共產黨中央於五月十五日抱怨道：『貧農的幼稚行爲使小資產階級離開我們。』（註五十六）鮑羅庭，魯易和共產黨領袖在這些危急的日子裡忙於——『使小資產階級和我們站在一起』。所謂『小資產階級』他們並非指手工業者，小商人，小店主和下層農民的廣大羣衆，這些羣衆是能夠而且一定要麕集於一枝眞正無產階級的旗幟之下的。他們指的是小地主，『革命的』軍官和國民黨左派的政客。他們讓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廣大羣衆陷於無領導的狀態。城鄉的反動勢力因之實際上增强了，他們很快就重新獲回他們的霸權了。

當武漢的領袖和共產黨人爲農民的『過火』痛哭流淚和哀

求『恢復秩序』之時，軍閥的隊伍不久就按照他們自己的辦法出來恢復『秩序』了。『革命軍』實行用武力來完成武漢的政客所求的，而又不能靠說服來達成的事情。
五月廿一日天黑後數句鐘，在湖南省會長沙，步鎗和機關鎗的炮火衝破了黑暗。一點鐘，許克祥（當地防守司令，又是唐生智的部屬）向他的部隊（第三十五軍第三十三師）下令臂纏白布。他把他們開到湖南省總工會會所。四個糾察隊，兩個女人和另外一個男人被鎗殺在門外，兵士們遂擁入屋內。搗亂隊伍迅速順序襲擊省黨部，黨校和所有工農學生團體佔據的房屋。機關均遭破壞，所有在裡面做事的人都立即被槍殺或被捕。槍擊幾乎繼續至黎明才停止。第二朝，全市貼滿『打倒過激份子！』『擁護蔣介石！』的標語。許克祥宣稱他是『被迫』而行動的，因爲工人糾察隊農民自衞軍計劃解除他的隊伍的武裝，其實自從不過六星期之前發生的上海事變以後，此種解釋已不是新發明的了。許又宣稱湖南省黨部和省政府將加『改組』並成立一個委員會，（這是由軍隊指定的）來辦理此事。
長沙馬夜事變的消息遲遲出現於武漢報上。直到四個星期之後，（註五十七）當一個代表團從湖南抵漢，向政府請求保護並懲辦那些使全省陷於恐怖狀態的匪軍時，此次事變的詳情才在報上刋佈出來。整整一個月過去了，這個月在武漢充滿胆怯不決和叛變出賣。
馬夜的襲擊，證明只不過是中國一九二七年失敗史上的最血腥的一章正在開始吧了。朝朝暮暮，被捕的工人，農民和學生被押到長沙西門外的空場成批槍斃。兵士們拿婦女犧牲者來尋開心，讓子彈穿過她們的陰戶向上射入體內。（註五十八）男人們則遭受無名的酷刑。許多未遭斬決的，都受了臠割之刑。經過了頭一道屠殺浪潮之後，長沙便定例每天至少牽十個人，往往多至三十人出去處決。恐怖一度發軔於省會，便立即擴佈開去，索取驚人的血債。幾天功夫，衡陽便有百餘人被殺。五月二十四日在常德，當地

農會的六百個積極會員被機關槍射死。當軍隊在瀏陽起事時，農民們都往長沙逃走。但在長沙，許克祥却用機關槍來迎接他們，結果一百三十個男女死掉和奄奄待斃於城門外。在往後幾個月間，不下兩萬農夫農婦及農村工人受犧牲。反動勢力被革命殺死幾十人，他便要成千成萬生命來賠償。

五月二十一之翌日，當地羣衆領袖計劃動員潰散的自衞軍來舉行反攻。他們命令武裝隊伍在長沙郊外的山上集合。農民軍和工人糾察隊携帶槍枝潛赴指定的地點。數天功夫，一枝幾千人的軍隊，痛於妻子，姊妹和父母兄弟的喪亡，準備進攻長沙，在長沙城內許克祥駐有一千七百人。農民們打算擊敗長沙駐軍，克服該市，在全省規模上組織他們的武力。他們特別期望的就是武漢方面迅速援救。

當武漢的共產黨中央下令取消進攻長沙的計劃，『靜候國民政府來進行解決該項問題』時，他們已出動了。（註五十九）全國總工會和全國農民協會，於五月廿七日聯合通電：『省農會及工會轉湘潭，湘鄉分會均鑒：中央政府已委定五人委員會於今晨離此前往解决長沙事件。請通知全省所有農工同志，耐心靜候政府大員，以免增加糾紛。』（註六十）駐湖南的共產黨中央代表命令一切農軍撤退。這些命令通通傳達到，只有瀏陽縣兩枝戰鬥隊伍事前不知，他們照約定的時間開抵城門，結果當場被許克祥的機關槍掃除。這種延緩使何鍵能夠從岳州派出兩團人來增援長沙的防軍，何鍵已受了蔣介石的分封，他是應當取得該省的。數天功夫，反攻和動員全省的機會錯失了。反動勢力握住了湖南的牛耳，牠再也不會失墮的了。（註六十一）

武漢派出的『五人委員會』由譚平山率領。瞿秋白追記鮑羅庭也曾偕同這批人（註六十二）於五月廿六日離漢『去執行恢復秩序的工作』。但他們只到了湖南邊境。他們在岳州被何鍵的軍隊逐回。恢復『秩序』的工作已由反革命的更能幹的工具來進行了。（註六十三）

『改組過』的省政府下令立即恢復聯保制，（全家和全村替個人的犯罪負責，）並下令凡是反共反對羣衆組織底積極領袖者，均加保護。在『改組』黨部及其他機關的過程中，所有從前的領袖一捕到就當場不客氣的槍決了。所有從地主或廟堂奪來的土地均下令歸還原主。召集全省代表會的計劃打消了，已在長沙等候六月一日第一次會的百餘代表成批的被槍決。學校被封閉。女學生遭受可怕的凌辱。已封閉的反動報紙又重新出版。那些逃避農民怒潮的豪紳亡命客又成羣結隊的回來，擠滿新改組的黨政機關。他們帶着錢回來，他們就拿這些錢來塡滿許克祥和何鍵的私囊。（註六十四）

第十四章　莫斯科和武漢

第十四章　莫斯科和武漢

當長沙和湖南另外許多城市的工農被國民黨的軍隊牽出去槍決的時候，世界各國代表聚會於莫斯科克靈姆宮，參加共產國際執委會的第八次全體會議。雖然許克祥的長沙軍事政變發生於全會開幕之後三日，但在莫斯科只有兩三個人知道往後的幾天，（迄五月三十日全會閉幕爲止）在湖南是最血腥的恐怖日子。但這次全會本身也完全處在牠自己的恐怖空氣中召開的。

在理論上，共產國際執委會在世界大會閉幕之後就是國際決定政策的最高機關。實際上，政策是由俄國代表團决定的，而俄國代表團又是受史大林支配的。史大林之竭力消滅托洛次基領導的反對派正進入最後的階段。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會議暴露了敵對力量間的深刻裂痕，一方面是史大林派機關所代表的新生的小資產階級反動勢力，另一方面就是最優秀底無產階級的老布爾什維克所擁護的反對派。這道裂痕在當時一切重大問題的不同意見中暴露出來，這些問題就是：蘇聯的國內政策，英俄委員會，戰爭的威脅，以及其中最尖銳的，關於中國革命底命運的問題。（附註一）

（附註一）反將派並不是一個完全一致的團體。牠是由托洛次基領導的原來的反對派及季諾維也夫和加明尼夫的所謂列寧格勒反對派共同聯合而成，季諾維也夫和加明尼夫初時曾聯合史大林，成

（接上附註一）

立『三頭機關』反對托洛次基，到了一九二六年才變成反對派。在中國問題上，在這兩個反對派之間，又托洛次基與拉狄克之間均存有重大的不同意見。季諾維也夫以共產國際主席的資格遲至一九二六年三月尚在維護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六次全會的決議，這個決議就是批准中國的各階級聯盟。在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史大林已替東方產生了『工農黨』的思想，而且把國民黨視爲這種黨的模範例子。拉狄克也拾他的唾餘，視廣州政府爲工農政府。在往後的反對派聯合中，這些不同意見便表現出來。季諾維也夫派要求把『工農民主專政』的公式加入反對派政綱。托洛次基派不顧托洛次基的反對，竟爲着在其他問題上一般意見的一致起見，投票以贊成。托洛次基自一九二三年以來，便已在俄國黨政治局中始終單獨投票反對共產黨隸屬於國民黨，他現在仍然繼續表現他的見解的要點。史大林布哈林多數派遂得以拿這些見解和季諾維也夫的見解相對抗，得到若干效果（尤其是在估量對武漢政府的態度及退出國民黨的問題上）。史大林和布哈林在他們關於中國問題的演辭和論文中，費去許多時間和篇幅去根據反對派的內部異議來窘迫他們。

眞正的不同意見雖然並非不重要，但反對派整個立場的根本邏輯却直接引出中國共產黨的要求，而這一要求往往被牠的政敵公認爲反對派的基本要求。在產生蘇維埃這個中心問題上，反對派內部沒有不同意見。

本書所引的俄國反對派主要是指托洛次基領導的始終如一的左派反對派。季諾維也夫，加明尼夫和拉狄克於一九二八年投降了史大林，但

此次全會開催，正當各地事變直接證實反對派對史大林路線的批評的非凡正確的時候。蘇聯政府在布哈林底『你們自己發財吧！』的著名口號之下，轉而擁護富農，這種國內政策已把無產階級政權摧毀到驚人的程度。（註一）尤其明顯的，（在外國代表看來特別如此）就是史大林派政策在英國和中國兩處的破產。克靈姆宮反對英帝國主義底戰畧的兩根台柱已崩潰了：一根是英俄委員會，即和蒲些耳，赫克斯及雪特林的聯盟，（註二）另一根是國民黨，即和蔣介石的聯盟。

和英國的外交破裂發生於全會開會的時候。同一星期，英俄委員會，史大林本來視之為抵禦唐寧街反蘇計劃底主要武器的，也化作一縷輕烟。全會開會之際，在武漢和長沙發表的那些信任汪精衞，唐生智之流的新文章也被湖南工農的血塗污了。

在這種情境中，史大林不想給反對派以公開發言的場所，但所有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傳統及蘇聯與世界革命運動的利益却賦予反對派這種公開發言的權利。共產國際執委會全體會議從前舉行於安德萊也夫殿，即克靈姆宮內從前沙皇的御極寶殿。幾百個俄國和外國共產黨人通常擠滿這座大殿聆聽報告和演講。這些報告和演講逐字被寫成按日的記事刊載在俄國報紙及共產國際的英文，德文，和法文的

（接上附註一） 這種行徑及後來的其他行徑並沒有挽救他們於八年後落入特爾米多反動勢力毒手的悲運。

反對派內部的不同意見是本應深一步研究的，但此事不在本書範圍之內。上述關於中國問題的內幕，托洛次基一九三〇年給夏克曼的一封信曾約畧提及，此信已公佈於夏克曼替托洛次基的中國革命問題集英譯本作的序文。（參閱該書十八至二十頁。）季諾維也夫的意見發表在他的『中國革命提綱』中，該文附印在上述一書的後面。

機關報上。這種程序，就是先一年召集的兩次全體會議尙遵從，（詳三）但現在却突然廢棄了。第八次全會反乎共產國際歷史的一切先例，它是在宛似圖謀不軌的情形下開催的。在報上只有一個簡短的，遲到的八行消息宣告牠已開會。（註四）

阿爾拔·特列恩特當時是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之一員，第八次全會關於中國問題的特別次委員會的委員，又是『托洛次基主義』的一個頑固的反對者，他用如下的話描寫這次會議：

『執委會最後一次全體會是在那間通常供主席團集會用的小室內召集的——其藉口就是在莫斯科，這個世界革命與無產階級國家的首都內，沒有別的房子可供共產國際的執委會利用。實際上，問題却是阻止俄國同志（他們是通常被邀請參加我們的國際會議的）來參加討論，因爲他們可以從會議中聽到若干瞞着他們的事情。絲毫沒有秘密性質的政治文件在執委會開會之前夜才發給代表們。於是全會及牠的各項委員會不間斷的連續開會，代表們所得到的時間只能最浮面地看一看這些文件。

『代表們不得把他們自己的演講速記稿抄錄，或把這些稿子傳授給任何人。全會閉幕，一切文件應立即歸還，否則不准離會場。他們想禁止執委會委員於表决時發言，但結果因有若干反對，這個决議只適用於反對派委員。在共產國際歷史中第一次沒有討論的紀錄發表在蘇聯報紙或共產國際報紙上。只有通過的决議和討論時作的寥寥幾篇意見書公佈出來，但這些文件都是從討論中做出來的，現在用這種辦法把牠們和討論割離，牠們的眞義就喪失了。』（註五）

除了决議案之外，還有五月卅一日眞理報上一篇簡短的社論和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局的一篇通告，（註六）報上一個月之後才發表史大林的演辭（註七）和布哈林在莫斯科黨會議上關於此次全會的報告。（註八）經過一年之久

，待國外反對派已着手公佈托洛次基之演辭之後，共產國際才出版一本薄薄的德文小冊子，裡面包含此次全會關於中國問題的幾篇演辭。（註九）會議進行的充分報告則從未公佈過。

但關於中國的不同意見還是在此次會議裡才勇敢直白的提出來，尤其是當這些意見涉及當時剛巧在武漢政府治下發生的事變之時。

史大林在五月廿四日，即長沙事變之後三日發表的演辭裡，重新表明他反對成立蘇維埃，其理由就是：漢口政府和國民黨是中國土地革命的機關。

他說：『土地革命構成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礎和內容。漢口國民黨和漢口政府則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中心。』

又說：『反對派懂得產生工農兵蘇維埃在現在就等於產生蘇維埃與漢口政府平分的兩重政府，並必然和不可避免地要提出號召推翻漢口政府的口號來嗎？……如果在中國沒有像國民黨左派這樣得民心的，革命的民主組織，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既然有這樣一個特殊的革命組織，而這一組織適合於中國的特別情形，且事實證明牠對於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更進一步的發展具有價值——那末，如果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剛剛開始，尚未勝利，而且在某個時期內也不能勝利的時機，把這一個花了許多年建立起來的組織加以破壞，就是愚蠢和不智。』

又說：『既然中國正在經歷一個土地革命……既然漢口是中國革命的運動中心，那就必須擁護武漢的國民黨。共產黨人必須形成國民黨及其革命政府的一部份，但要在這個條件上：無產階級和牠的黨要在國民黨內部和外面取得領導權。目前的漢口政府是無產階級和農民革命獨裁的一個機關嗎？不是。牠現在不是，在最近的將來也不會是，但是革命更進一步發展，牠却有發展成爲這樣一個機關的一切機會。……』（註十）

史大林想在國民黨和漢口政府內取得『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他又期望牠們來實現土地革命。托洛次基駁覆道，武漢領袖將在土地革命的問題上破裂，只有動員羣衆加入眞正能夠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鬥爭的蘇維埃，『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才能實現。

他警告道：『武漢領袖的聯盟尙不是一個革命的政府。在這一點上產生和散佈任何幻想就等於判决革命的死刑。只有……蘇維埃才能夠充當革命政府的基礎。』（註十一）又說：『史大林在這裡又親自聲明反對工農蘇維埃，他的論據是：國民黨與武漢政府就是土地革命的完善的手段的工具。因此，史大林替國民黨和武漢政府的政策負責，他又要國際替這種政策負責，這與他屢次替從前蔣介石「國民政府」的政策負責如出一轍……我們和這種政策沒有絲毫共通之點。我們不願替武漢政府的政策及國民黨的領導負絲毫的責任，我們也迫切敦勸共產國際拒絕這一責任。我們直接對中國農民說：汪精衛及其同僚之類的國民黨左派領袖將不可免要出賣你們，如果你們不形成你們自己的獨立蘇維埃而老是跟着武漢的領袖走的話……汪精衛之類的政客在困難的情形之下，將和蔣介石十倍聯合起來反對工農。在這種情形之下，在一個資產階級政府內的兩名共產黨員如果不成爲準備向工人羣衆舉行新打擊的直接掩蔽物的話，就成爲無能爲力的人質了。我們向中國工人說：如果農民靠小資產階級急進派而不是靠你們革命的無產階級來領導，他們就不能實現土地革命了。因此，建立你們的工人蘇維埃，使他們和農民蘇維埃聯合，經過蘇維埃來武裝你們自己，吸引兵士代表加入蘇維埃，鎗斃那些不承認蘇維埃的將軍，鎗斃官僚和資產階級自由派，他們將來要組織暴動反對蘇維埃的。你們只有經過農民和兵士蘇維埃來爭取大多數蔣介石的兵士到你們這方面來。你們先進的中國無產者，假如相信一個充滿小資產階級和妥協精神的上層領袖的組織……能夠代替那些包含幾千百萬人的工農兵

蘇維埃，你們就是你們底階級和你們底歷史使命的叛賊。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將來不採取蘇維埃的形式就無法往前發展和取得勝利。』（註十二）

在這次全會中通過的决議，其重要的幾段如下：

『共產國際執委會認爲有人過低估計漢口政府及否認其現實性，否認其偉大的革命作用，此種觀點是錯誤的。漢口政府及國民黨左派領袖，由他們的階級成分看來，不僅代表農民，工人和手工業者，而且還代表一部分中等資產階級。因此，漢口政府（牠是一個國民黨左派的政府）尚不是無產階級與農民的專政，但是牠正處在走向這一專政的道路上，牠隨着無產階級鬥爭的發展，喪失了牠的暫時走着同一道路的小資階級急進派，克服了叛賣，將不可免的朝向這個專政發展……

『共產國際執委會特別叫中國黨注意這件事：革命政府與羣衆中間的聯繫現在越發必要了。只有憑藉這種密切的聯繫(主要是靠國民黨的幫助來實現)，只有堅决的轉向羣衆，才能增强革命政府的權威及其充當革命底組織中心的作用。共產黨的任務就是使漢口政府方面能夠實行這樣的轉變。如果這一任務不實現，羣衆運動不展開，沒有土地革命，工人階級的狀況不加以斷然的改善，國民黨不改變爲一個龐大和眞正的勞苦羣衆的組織，又如果工會將來不加强，共產黨不增長，漢口政府與羣衆之間沒有十分密切的聯繫，那就不能夠使革命達到完全勝利。

『在中國目前的情形中，共產黨擁護漢口發動的戰爭。牠直接參加武漢政府，替牠的政策負責。牠藉各種手段，促成這一政府的各項任務。因此，共產黨「在原則上」不能反對審愼將事的策畧。共產黨旣替政府的政策負責，假如牠不顧環境，拒絕妥協的策畧，即，同時全線作戰，牠就做下極端的蠢事。

『因此，共產國際執委會認爲這一問題必須參照具體的情形來解决，這種具體情形是不能事先預見的……改變方向

的策略是否妥當，一定反映於政府的經濟政策中，而政府的經濟政策，尙沒有實行即時沒收一切外人企業之必要……』（註十三）

該決議案既向『審愼將事』廣開門戶，牠又叫中國共產黨人去『加深』土地革命，去武裝和動員羣衆。這些話後來被引證來證明中國共產黨領袖曾對共產國際的訓令『怠工』。人們把土地革命完全寄托於所謂『革命的組織中心』的武漢政府（共產黨人奉令替牠負全責）將照例被人遺忘，正如動員羣衆加入國民黨——（托洛次基說，『落入劊子手的手中』）——的命令和『增強』漢口政府『權威』的命令之被人遺忘一樣。共產國際宣佈道：如果武漢與羣衆之間沒有這種聯繫，（這種聯繫『主要是靠國民黨的幫助』來形成），勝利是不可能的。

但是假如事實證明漢口政府不願意，又怎麽辦呢？假如牠不僅證明不願意贊助土地叛亂，而且還公開反對牠，又怎樣辦呢？這個嚴重的問題，在全會通過的正式決議裡既沒有提出，也沒有解答。史大林和布哈林大談漢口政府的『偉大的革命作用』，但他們十分曉得，漢口政府將永遠不會批准，也不會領導土地革命。另一方面，他們認爲漢口的政客和將軍們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他們於是從這一點得出一個邏輯的結論，認爲必須使土地革命不致逾限，以免把這些同盟者嚇跑。這就是所謂『審愼將事』的眞義所在。

這也就是布哈林在中國問題次委員會的會議中提出來的觀點，這個委員會是由他本人，意大利的埃果里和法國的特列恩特三人成立的。特列恩特當時尙是史大林一個忠實部屬而且是反『托洛次基主義』運動的一名領袖，他反對這一前途，他聲明這一前途將招致農民的武裝鎭壓。布哈林請史大林加入討論，史大林宣稱如果無法壓制農民將『使資產階級左派反對我們』，他於是出示鮑羅庭打來的電報，『證明國民黨的領導決意反對土地革命，即使和共產國際

破裂亦所不惜。』史大林說：防止這一可能就必須『使用陰謀』。（註十四）

史大林認爲：『鬥爭現在一定失敗。使用陰謀就是想博得時間，以便有可能增長得更強，並有可能到後來在可能勝利的情形中作戰。』他繼續往下說道：『使用陰謀而不吃虧是可能的。土地革命要等到直接打擊到國民黨自己的黨員及軍隊的軍官時，才使牠害怕。我提議向鮑羅庭發出訓令，反對沒收和分配國民黨黨員或革命軍軍官們的土地。』當特列恩特要求知道共產黨人將來是否支持漢口對農民的武裝鎮壓時，他說布哈林用肯定的口氣答覆。關於這一點，史大林插言道：『布哈林得出極端的邏輯結論，但事情是不會這樣發生的。我們對中國羣衆有充分的權威使他們接受我們的決定。』（附註一）

不幸，第八次全會的訓令和史大林的電報於六月一日抵達漢口的時候，國民黨的將軍們已對羣衆施行他們自己的『充分權威』。維護土地暴動勢必要和國民黨左派決裂。但這一決裂却分明被禁止，本來蘇維埃就是動員羣衆去實現土地革命的組織，但人們却禁止組織牠們，因爲這種辦法等於『反對革命的國民黨』，反對漢口政府，亦即反對『革命的組織中心』。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公開決議要求作『加

（附註一）特列恩特補充說，他主張訓令上面應附加一個條件，命令反對漢口政府應用武力的任何企圖。他被史大林當即答覆道：『我們在原則上贊同，但發下訓令涉及一些並非擺在我們目前的問題，是沒有用場的。我重說一句，我們對中國羣衆保有充分的權威，毋須應用武力。』特列恩特在這次全會中只提出温和的保留，但他不久以後便被開除出法國共產黨。爲了權衡這個證據的價值，我們順便說一句，特列恩特直到今天仍舊和他當時一樣，是一個『托洛次基主義』的頑固反對者。

深』土地革命的獨立行動。史大林的電報則命令土地革命應加限制，以便保持與將軍和政客們的聯合。這些指示互相抵消，使中國共產黨人陷於無望的混亂中。

陳獨秀收到史大林的電報，（附註二）據他列舉該電報的內容有如下數點：（註十五）

一、『沒收土地……不要用國民政府的名義，軍事長官的土地不要侵犯。』

實際上，這只是把國民黨土地委員會及共產黨五次大會在原則上已通過的公式反覆背誦一番吧了。汪精衞已極力反對任何土地沒收的方式，因爲他覺得『第二，第六和第八軍的下級軍官均出身於兩湖豪紳之家。』（註十六）在汪的方面，他寧願和將軍站在一起，也不願意和羣衆一致前進。據陳獨秀後來說：『當時兩湖沒有一個資產階級，地主，督軍和豪紳不是軍官的親戚或舊朋友。所有地主都直接間接受軍官們的保護。』（註十七）用托洛次基的話來說，這次訓令把軍隊改變爲『大小地主的互相保險公司』。（註十八）

二、『藉黨部的權力制止農民的過度熱心的行動。』

『我們執行了這種可恥的政策，』陳獨秀寫道。農民的『過度熱心』已被『制止』，但並不是被共產黨的權威，而是

（附註二）史大林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的演辭裡曾引證『關於一九二九年五月』的一個指示，這顯然就是六月一日電報的原文或草稿。舉列各點，大體上都是陳獨秀舉出過的。史大林只是沒有引證關於沒收軍官土地的制度。據他的說法，該項指示開頭是：『沒有土地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往下一行是：『過火必須加以遏止，但不是靠軍隊而是靠農民協會。』史大林的原文是把頭一句話加重號。我們則加重第二句話。參閱史大林著，馬克斯主義與民族及殖民地問題第二百四十九頁。

被國民黨的將軍們『制止』。

三、『剷除目前的不可靠將軍，武裝兩萬共產黨員，選拔兩湖五萬工農份子，創立一枝新軍隊。』

誰去剷除這些將軍呢？既然共產黨人必須留在國民黨及其政府之內，這件事又怎樣做法呢？陳獨秀說，『我猜想我們仍然要可憐地懇求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來撤他們的職。』我們不久可以分曉，人們恰好就是懷着這種思想哩。如果不立即和國民黨的將軍衝突，這枝新軍隊又如何創立呢？如果沒有立心把軍隊的士兵組織在他們自己的蘇維埃裡，因此使他們和工農羣衆發生直接連繫，這一點又怎樣能夠辦到呢？

四、『提拔新的工農份子來代替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舊委員。』

瞿秋白於一年之後才寫及這一點，他不敢直接援引史大林的電文，他只敢從共產國際報第七十一期中引證類似的一段話：『一方面，我們要鞏固國民革命和國民黨……另一方面……我們又要設法改變國民黨內，國民政府內和軍隊內的階級結合，而不致動搖聯合戰線。』瞿秋白小心翼翼的寫道，這『確實是極困難的，因爲改變軍隊內的階級結合就等於由共產黨奪取軍隊……（這也就等於）某種社會政策（？）必須大胆實施，以解决兵士，農民和廣大羣衆的生活問題。這件事不僅要侵犯資產階級，而且還要侵犯小資產階級商人。』（註十九）

五、『組織一個革命法庭來審判反動軍官，這個法庭要以國民黨的有名望的黨員來做主席。』

這就是提出來『剷除』反動將軍的手段。根據這一點，共產黨人贊成委派唐生智來審判許克祥。也許莫斯科現在要汪精衛來審判唐生智吧？這就是魯易得出來的結論。

共產黨中央委員們本來已被他們自己的錯誤積累起來的結果弄糊塗了，他們現在又被這些訓令弄得張口結舌和爲難起來。陳獨秀稍爲粗俗的形容他們的感想，他說，這宛似

要到尿缸裡洗個澡的情景一樣。他又說，甚至史大林自己的代表都『認爲執行牠們是不可能的』。中央委員會去電感謝莫斯科，不過辯明這些指定的目的『不能立即實現』。（註二十）

但魯易却是一個名符其實的世界布爾什維克，他了解和國民黨合作是一件認眞事。他趕快把史大林的電報拿給汪精衞看，並請他批准牠。據人家引證他當時對汪說的話是這樣：『我很相信你一定贊成牠的。』（註二十一）但很難索解，汪却不贊成牠。他不願『剷除不可靠的軍官』。他寧願和他們聯合去摧殘共產黨人和羣衆運動。魯易狼狽驚慌地發覺，原來國民黨左派除了『跟着我們跑』之外還有一條出路。這也是史大林忽畧了的一點小事情。他的計劃要得到汪精衞的贊成。但汪精衞却不贊成。

五月廿八日，在莫斯科，托洛次基曾寫了一封信給全會：『整個革命不能視慈善的資產階級及國民黨領導是否接受我們的好意勸告爲轉移。牠是不能接受牠的。土地革命的完成，不是靠汪精衞的首肯，而是不顧汪精衞和反對他……但要辦到這一點，我們要有一個眞正獨立的共產黨，這個黨不乞憐於那些領袖們，而堅決的領導羣衆。此外沒有別的道路、也不能有別的道路。』（註二十二）

但托洛次基的警告却遭人擯棄，第八次全會的一個特別決議案還罵他鼓吹創立蘇維埃。（註二十三）有一個簡短的消息宣布『全會贊成武漢政府和國民黨改變爲工農民主專政』，（註二十四）眞理報也鄭重的宣布『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對中國革命的曾重大的問題，給了唯一正確的答覆。』（註二十五）

在漢口，中國共產黨人正用他們自己的辦法來承認國民黨政府的『偉大的革命作用』，因此，他們反對農民進攻長沙，反而轉請政府來『解決』。湖北總工會，省農會和商會聯名通電：

『不幸湘省工農兵間發生誤會。但此事無碍於我等革命的

神聖工作。政府已遣派特別委員會進行調解，數日間當有滿意的解決……我等已一致决定執行所有政府通過及宣布之政策及命令。我等將極力鞏固工農商的聯合戰線，以支持本黨的農民政策。我等澈底了解挽救目前困難局面的唯一辦法，就是政府與民衆實行合作，……關於湖南事件，我等希望政府解决之，……並保證今後不致發生同樣事件。』（註二十六）

但汪精衞却宣布長沙事變的負責者實際上是農民，因爲他們胆敢擅自奪取土地。『鮑羅庭和共產黨人提議，（國民黨）中央應下令進攻叛軍和懲辦犯事軍官，但汪精衞反對，因爲他認爲這些軍人是在嚴重挑撥之下起來幹的。結果，反而派唐生智赴長沙調查此事並恢復和平。』（註二十七）共產黨人對這一决定低頭。他們向羣衆散發宣傳大綱，勸他們『耐心靜候解决』。（註二十八）共產黨『安撫』湖南農民已撲了空，他們現在唯有望希『安撫』唐生智，他們向羣衆担保他是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而且一定會主持公道的。他們現在也只能依戀於這些空虛的希望和虛僞的諾言，因爲他們已往的全部政策已使他們脫離了軍隊中的無土地的農民——下層的士兵。他們要跨過軍官和將軍們的頭，才可以向士兵們申訴，而這一定就是一個強有力的控訴院，可惜，牠並未存在過。

一九二七年二月，即在蔣介石舉行政變之前，共產國際的中央機關報曾寫道：『中國共產黨及自覺的中國工人在任何情境中都不要採取瓦解革命軍的策畧，因爲資產階級的的影響在那個地方有某種程度的強大。』（註二十九）宣傳與組織工作不觸及這『某種程度』的『資產階級影響』。結果如何呢？再回頭聽一聽瞿秋白吧：（註三十）

『我們一點也不注意軍隊。即使兵士和工人有時也有聯歡，但這也只是表面的。兵士的具體要求幷未提出過。他們幷沒有受過宣傳。工人，農民和士兵羣衆的要求幷沒有連繫起來。我們只注意和軍長師長聯絡，或政治部的粉飾工

作。這些政治部把軍師長的反革命醜臉加以美化。羣衆厭惡軍隊往往就是厭惡兵士。兵士羣衆因此極易受軍閥欺騙和被人說動，以爲工農和共產黨人和軍隊作對，專在後方破壞輸給和滋事。』（附註一）

等到『革命的』將軍們斷定他們『革命』的時期已完結時，『國民革命』軍（史大林曾稱之爲『武裝的人民』）便變爲反革命的工具。共產黨人現在只能抱唐生智的佛脚，絕望之餘，希望他不致一脚把他們踢開。當唐生智於六月十四日從前線回來，取道赴長沙時，共產黨發出一張傳單，稱『湖南政變是背叛唐生智的，因爲唐……表示好意於被壓迫農民。』（註三十一）

共產黨企圖發動一個運動，促成討伐許克祥。他們召集幾次羣衆大會，共產黨各羣衆團體也發出宣言，請求政府採

（附註一）把這段話和托洛次基五月七日提綱的幾段話比較一下，并不是沒有教訓意義的：

『政治領導不經過兵士蘇維埃來包容軍隊的羣衆，而以純粹外表上模彷我們的政治部和黨代表爲滿足，但因爲沒有一個獨立的黨和兵士蘇維埃，這些政治部和黨代表已變成了資產階級軍閥制度的空洞的掩護物。』

又：『人們至少會想一想，蔣介石的軍事政變已使每一個革命家終於覺悟：脫離軍隊的工會是一件事，聯合的工兵蘇維埃……又完全是另一件事。

又：『假如我們不願任從資產階級離間革命羣衆與軍隊，那末兵士蘇維埃必須配入（工農蘇維埃的）革命的鎖練中。』——托洛次基著：中國革命問題集英譯本四十九頁，五十八頁，七十八頁。

托洛次基與瞿秋白的不同就是：前者於一九二七年五月寫出這種話，當時改正行動尚有可能。瞿秋白在事變過後一年多才『招供』。這就是馬克斯主義與經驗主義之間的不同。

取斷然的行動，解放湖南的農民。從湖南逃出來的八十人駐留中央黨部。『雖然湖南代表已在武漢駐留了二十餘日，……湖南許多縣份尙陷於恐怖狀態。國民黨中央應該討伐許克祥。』（註三十二）湖南各團體的代表人數更多，他們親自謁見唐將軍，懇求發動討許行動。

他答應他們道：『工農永遠不受壓制，不過工農運動的若干幼稚行動應由中央糾正，……』他高呼『湖南革命民衆萬歲！』（註三十三）但屠殺湖南農民的兵士就是他管轄的部下呀。

共產國際第八次全會曾指定共產黨一個任務：使漢口政府堅决轉向羣衆，牠遂於六月十六日給國民黨一信如下：

『執行土地政策的時機就在目前。這是國民黨的歷史任務。革命的未來全視國民黨是否在這個問題上採取堅决的步驟而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提出鎭壓反革命的手段如下：國民政府應下令宣佈長沙的叛逆委員會爲反革命並號召全體兵士起來推翻牠。這個委員會應加解散，重新成立正當的省政府。立即派討伐軍鎭壓此次叛變。授權唐生智派軍打倒反革命。越軌的地方黨部應加解散，……工農組織及共產黨應繼續存在湖南省，不受侵擾。國民政府應下令將所有武裝發還工農自衞軍。農民應武裝起來，保證反動的叛亂不致再度發生。國民黨現在應密切體察民意，領導他們一致反對反革命。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如果不這樣做，革命就要陷於危殆了。』（註三十四）

唐匆匆赴湘，並不是去討伐而是去『調查』。自然嘍，他的報告完全替當地的軍事政變辯護。

他於六月二十六日從長沙打出電報：『我已發現工農運動在他們的領袖的錯誤指導之下，已不受管束，且造成危及人民（！）的恐怖局面。他們已公然反抗中央政府保護革命軍人家屬的命令，到處誅求勒索，虐待人民，甚至謀害人民……鑒於此種事態……湖南駐軍遂起而自衞……雖然許克祥的行動乃激於正義感，但他已逾越法紀的範圍。他

應受記過薄懲，但他應該仍留軍職。』他末了要求『改組』省政府，並要求有權處分『少數……計劃違抗政府的………黨員』。（註三十五）三天之後，政府遵命答覆，委唐生智爲湖南省政府主席，且把省政府一切重要位置分配給他的部屬。（註三十六）

莫斯科曾『贊成武漢政府及國民黨改變爲工農民主專政』，但武漢的汪精衞們却不採取這條『不可避免的』道路，甘願倒伏在唐生智的懷抱中。湖南已無可挽回的落入反動勢力之手了。

在唐生智電文公佈於漢口的同一日，共產國際的中央機關報大吹法螺安慰人家說：

『反對派的製造恐怖大家關於長沙政變曾諸多鼓噪。他們大談中國革命的新失敗。他們的叫聲將無人相信。我黨正密切監視中國的事變，……相信中國革命的力量。長沙軍官的叛亂，（這次叛亂遭逢工農的堅決抵抗，（？））已被壓平了。』（註三十七）

湖南事變不久之後：朱培德（他名義上代武漢政府治理江西省）驅逐一切共產黨人，工農的領袖，政治代表及黨的工作人員出境。共產黨人對這次新的進攻又是退却，他們決定不要求撤朱將軍的職，因爲他們『害怕迫使朱將軍離開革命』，而且他們希望保持鎮定，使他『守中立』。（註三十八）

共產國際的中央機關報於六月二十三日尙告訴牠的讀者說：『貧農羣衆是革命的武漢政府的可靠基礎，武漢政府可以企待農民大衆的堅決擁護。』（註三十九）實際上，羣衆早已企待『革命的武漢政府』來支持他們了。湖南的礦業總工會主席杜正秋道：『工人們相信國民黨的領導，（他們）以爲中央是永遠不准壓迫工人的，他們之擁護黨就拿這一點做根據。』（註四十）人家教羣衆企待武漢。但武漢却不企待羣衆。牠反而伸手破壞羣衆運動。

江西已不經一戰的被搶去了。湖南則沉淪於恐怖中。羣衆

運動在一個愈來愈狹小的圈子裡，甚至在武漢，都陷於聽天由命的境地。六月十三日，一位農會辦事人的一個憂鬱的報告說：『在荊門，宜昌等縣裡，屠殺尚在繼續。甚至離漢陽不過十里，土豪們竟包圍和殺戮農民。往常有五十四縣是有農民協會的，但上星期只有二十三縣了。據我們的估計，前天這二十三縣中農民尚操有自己組織者僅有四縣，今天一縣也沒有了。』（註四十一）

托洛次基已警告過：羣衆如不獨立組織蘇維埃，共產黨如不脫離國民黨的桎梏，農民叛亂將『歸於泡影』。（註四十二）很少預言是比此更迅速或更悲慘地證實過的。

米夫也是在武漢代表共產國際的，他用如下的話總括中國共產黨人在這些危急日子裡所取的態度：『我們不能憑我們自己的力量來反對反動勢力。如果這樣幹，我們就會毀壞國民政府的權威并使我們自己與他對抗。我們必須擁護國民政府；我們必須要等牠來行動。我們必須把牠推上這條路。但我們自己千萬不要採取任何手段來對付反動勢力』。（註四十三）米夫是在一年之後寫的。他拿『可恥，胆小，出賣』來辱罵這種態度。但是他不也一樣可以引證史大林和第八次全會的文件麽？蘇維埃（獨立行動的唯一道路）被禁止了，不也就是因爲他們會『毀壞國民政府』——史大林底『唯一政權』——『的權威』麽？而且蘇維埃之被禁止不也就是因爲成立蘇維埃等於『使我們』與武漢政府『對抗』——又借史大林的話來說，因爲牠們是『一個反對革命的國民黨的口號』麽？

這種政策已直截了當的造成破產了。羣衆運動正『歸於泡影』。工農雖死於國民黨劊子手的大刀和來福鎗之下，共產黨尚正在設法維持『走向羣衆的堅決方針』，這一方針『主要是藉國民黨的幫助來造成』，其目的在『把羣衆帶入國民黨中』。但武漢的領袖們却表示輕蔑。汪精衞在軍事委員會某次會議裡宣稱：『共產黨人向我們提議和羣衆走在一起。但羣衆在什麽地方？上海工人或廣東和湖南農民

的受人誇獎的力量在什麼地方？并沒有這種力量。你們瞧吧，蔣介石沒有羣衆也站得很穩。和羣衆走在一起就等於和軍隊作對。不，我們最好還是不和羣衆走在一起，而和軍隊携手。』（註四十四）

但汪精衛雖然不和羣衆走在一起，此事并不妨碍共產國際和共產黨設法和汪精衛走在一道。蘇維埃的口號已於一九二七年春被宣布爲過早，因爲『和國民黨左派合作可能性尙未完全消竭。』（註四十五）人們把這些『可能性』一個又一個探尋，先是蔣介石，現在又尋到汪精衛。但現在仍不是停止『乞憐於領袖』的時候，因爲『可能性』尙未完全消竭。還有——馮玉祥。

第十五章　武漢：瓦解

第十五章　武漢：瓦解

馮玉祥，這位肥碩和草莽的漢子，是一軍閥，他全憑多次狡猾和切合時機的叛賣了他的上峯和盟友，才獲取了西北的地盤。他初時是在外國傳教師的懷抱裡教養大的，所以他第一次是以『基督將軍』的名義出現於世界報端的，他以鄉愿底坦直的平凡德性教訓他的高唱讚美歌的士兵。一九二四年他發現莫斯科很慷慨地拿東西補助他人。這些東西是敬虔精神裡面所沒有的。他便脫掉他的基督外皮，加入史大林和布哈林專門在中土培植的特種階級，即『布爾什維克化的』軍閥。事實證明，聖盃到底比不上俄國軍火，俄國金錢，俄國顧問。馮玉祥很快改變思想，認爲手頭有俄國鎗枝值得上一打來世的光輪。當一九二五年末的倒戈使他的『國民軍』斷絕了一切軍需給養的來源時，他尤其如此打算。

他在一九二六年動程赴俄。紐約工人日報的訪電鄭重地說：『馮玉祥正來莫斯科，打算在工廠裡以一個普通工人的資格做工，以便在工人環境中，獲得蘇維埃共和國經濟和政治生活各方面的上乘教育和經驗。他正走入這種自己甘願的流寓生活，爲的是最澈底的準備自己，俾實現國民黨的主義。』（註一）不錯，馮玉祥想利用蘇聯兵工廠的出品，『最澈底的準備自己』，而且他一抵達蘇維埃首都他便發現，取得這些財寶的開門呪是比之上帝祈禱文還要簡單的公式。他本人和他的心腹于右任的照像攝在俄國受崇

拜的同志中央。他預言『中國民族未來將有新的戰爭和新的勝利』。他久已叫人『特別注意爆發於全中國的工農運動』且久已宣佈他相信『在未來，無產階級將在中國最後得到勝利。』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九日，馮玉祥和眞理報談話，立誓要他的軍隊『爲民族解放』及『完成國民革命』而戰。（註二）

馮玉祥雖然把他的軍隊改稱爲『國民軍』，但多年來他的朋友勸他和國民黨合作，這個狡猾的傢伙就避而不談，『但是當他訪問莫斯科的時候』，一位日本記者驚奇不置道，『這位基督將軍却於大家不知不覺間居然成了一個列寧的信徒。』（註三）這是非常舒服，愉快，——和有利可圖的事情。史大林獲得馮玉祥，心花怒放，他遂供給馮玉祥以軍火和欵項，並護送他回到他的軍隊中去，這枝軍隊已動程作長途跋涉，從南口經山西省，南下河南邊境。馮玉祥於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在軍中宣佈：『我是一個工人子弟』，幷聲明他的軍隊今後的目的是『喚起民衆……肅清賣國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及取得中國的自由獨立。』（註四）馮玉祥現在在史大林底可靠同盟者的隊伍中，是一個羽毛豐滿的生力軍，他大胆地沿着胡漢民，蔣介石，李濟琛，唐生智和汪精衞已走過的道路走。馮玉祥得到他底大西北地盤的崇山嶺峻的拱蔽，獲得了大量俄國鎗枝和軍需品，雄據潼關，虎視河南平原，恭聽他的俄國顧問的高見，靜候『那一天』。

這個日子不久就來到。當他靜候之際，北伐軍直下長江。蔣介石（他早就曉得打開俄國兵工廠的大門多麽容易）進抵上海，並且就在那裡打破史大林對他的信仰，可不是打破他對史大林的信仰。唐生智和汪精衞現在也在準備决裂，不過這一點在莫斯科尙未正式承認，因爲必須的代罪羔羊尙未選出——而且還有一個馮玉祥。他一定會從他的西北營壘裡走出來，挽救『革命的國民黨』！他是一個結實的人，他比之莫斯科從前所依憑的軟骨頭更挺直更穩固。

他不是剛剛還通電重新表明他對武漢的不死的忠心麼？（註五）雖然已有訪電到莫斯科，指出馮玉祥和蔣介石的密使接頭，并指出馮玉祥迫使武漢和蔣介石談判，但俄國報紙却不採登，而且在別的地方還遭到極力否認。

共產國際中央機關報宣稱：『近來帝國主義者又散佈謠言稱，蔣介石將與武漢和解或稱他將和馮玉祥合作。這是騙人的話。這些領袖沒有一個和蔣介石有任何關係。馮玉祥和他的軍隊也沒有信任這個叛徒……』(註六)馮玉祥是莫斯科的最後一張勝牌。指出他將要同流合汚是最有害的托洛次基主義邪說，因爲托洛次基不是屢次警告：相信馮玉祥就等於有意重演過去和蔣介石合作的試驗嗎？（註七）武漢也差不多非常可憐的期望馮玉祥。我們記得武漢已决定北討奉軍，不征伐蔣介石，因爲他們希望一個軍事勝利和佔領北京就可以令蔣就範。這個計劃的成功一定要依賴於帶着生力軍坐鎮潼關的馮玉祥。五月初，黨軍的精銳部隊已因此沿鐵路開入河南。黨軍以『鐵軍』爲前鋒，連續打了幾塲血仗，向北推進，這些血戰以是月末在駐馬店北面的一塲决戰，達到頂點。在漢口後方，工人們在兵工廠裡每天做十三，十五至十七小時的工。他們的頭上飄着旗幟：『你們是革命的後衞。……你們如不犧牲一切，就不能有軍隊，不能有革命，不能有鬥爭來把中國從牠的壓迫者手中解放出來……我們的革命士兵并不是八小時輪班作戰的 。你們也想只做八小時的工嗎？』（註八）在前方，兵士們也以爲他們的作戰是『把中國從壓迫者手中解放出來』。他們以無以類比的英勇擊潰張學良（張作霖的年青兒子）統率的一枝供養和武備都較優的北軍。奉軍被逐退了，但戰勝者却賠掉了他們的最精良的步隊。他們死傷了一萬四千人。（註九）這些人的作戰是中國從前所罕有的，因爲他們受一種希望激勵，滿以爲他們之作戰和犧牲是在幫助完結他們本國人民底可恨的貧窮和屈辱。他們的犧牲却成了徒然，他們之被送去作戰并不是爲着這些目

的，而是去滿足唐生智的拿破崙的野心和武漢領袖想廹使蔣介石就範的希望。這些希望也落了空了。武漢已下了賭注——牠的精銳部隊。但獲得贏錢的却是馮玉祥。

在戰爭的期間，馮玉祥已小心地置身事外。他現在調軍從潼關沿隴海路而下。他不喪一卒佔領洛陽，六月一日便安坐在開封的新軍部裡。奉軍的後撤與漢口軍隊的過重傷亡使他成爲華中的仲裁者。進攻北京完全依賴他。彷彿爲了標明這一事實，他非常公平的通電給寧漢雙方宣告他的『勝利』。他邀集武漢領袖於六月十二日會商於鄭州。他們全體在這個地方卜知他們的命運。

馮一直等候武漢方面的人已抵達鄭州才下車來迎接他們。史特朗女士注視馮玉祥以『一種外表的坦直』態度從貨車中走出來，他之乘貨車就是因爲他的『弟兄也乘貨車』。她說，她『很久以後』聽說馮玉祥原來是乘這同一列車的最舒適的專車來的，他在鄭州的前一站才換乘這輛貨車。（註十）鼓吹和階級敵人及可疑底盟友聯盟的人可以想一想這件事：僅僅一年之前，馮玉祥也曾乘着一輛飾以中國無產階級之名的政治貨車，行抵莫斯科。現在，『很久之後』，他們大概知道他過去只是暫時的離開他自己的，更舒適的專車，上面標着：『中國資產階級包用』。

當馮玉祥會集武漢的一羣領袖時，他發現他自己只在一件事上是同意的：工農和共產黨人應加壓服。我們這位女報告者悲痛地補充說：『甚至武漢政府也已決定這件事。』（註十一）除了這件事外，馮用不着和武漢再有什麽來往。他願意得到強大的盟友，因爲他可以從他們揩得一點利益，他用不着弱者，因爲他從他們那裡再也得不到什麽東西。當宴會的虛文已完結，武漢也已授予馮玉祥及其重要私狗各種權位，藉以尊重他對河南的軍事支配權之後（武漢已自動把牠的所有政治工作人員撤離河南），（註十二）馮遂匆匆結束會議，把他的『同盟者』遣送回漢。民衆論壇滿懷希望的報告道：『馮玉祥統率的所有軍隊均宣

誓服從武漢中央及國民政府的决議和命令。』（註十三）
一個星期之後，馮玉祥偕同兩個武漢的大領袖（註十四）顧孟餘和徐謙乘車赴隴海路東端的末站（徐州）與蔣介石會面，幷和他立即談判。六月廿二日，馮在徐州車站告訴那些心急的記者說：『他忠實願望和國民革命軍合作，消滅軍閥制度和共產主義。』（註十五）而且交給他們一份電報底稿，這電報他已經打給武漢政府諸領袖了。
這個電報說：『前在鄭州與諸兄分途晤談，總合意見，以近日武漢情形，店員脅廹店主，職工脅廹廠主，佃戶脅廹地主，甚至利用打倒土豪劣紳之標語，壓廹出征軍人之家庭，前方苦戰奮鬥之將士不足以保護其在鄉之父兄，彼等陽冒國民革命之名，陰佈全國恐怖之毒，他如別有用心之不良份子，攙入地方黨部，擅行威權，殺人越貨，高級黨部屢加制止，竟敢充耳不聞，以至社會根本動搖，四民無一安寧。補救之方，鮑顧問已經辭職，亟宜設法使鮑歸國，在武漢之國民政府委員，除願出洋暫資休息者外。餘均可合而爲一等語，玉祥迭聆之下，以爲必須如此一致，如此主張，方足以紓黨國前途之禍……現在（甯漢）雙方處境之苦，業已完全了解。值此風雨飄搖之際，千鈞一髮之秋，既異地而同心，應通力而合作，敢請汪譚孫宋何諸同志，速决大計，早日實行……』（註十六）
馮玉祥已同流合污了。
俄國的主要軍事顧問和北伐的眞正組織者加倫將軍（附註一）在離鄭州的歸途中，從車中指點若干橫在樹下和溝壑內的幾乎辨認不淸的影子。這些影子『就是廣東人的屍體，他們就在衝過這道關隘和鐵路時死的。就是爲此一戰，他們捐軀了……這些懷着某種希望（這種希望他們大多數才剛剛開始了解哩）而衝鋒陷陣的湘粵健兒。也僅僅因爲有此一戰——……他們的苟活的同盟者才可以建立一個軍

（附註一）這是華西利・布魯齊在中國使用的名字。他後來當了蘇聯遠東紅軍司令。

事獨裁，以共同鎮壓工農爲基礎。』（註十七）
現在，儘可能和這個軍事獨裁妥協就是武漢領袖們的唯一目的。他們在鄭州已懂得，能否和馮玉祥更進一步合作全視乎他們能否擺脫共產黨人及消滅羣衆運動。馮蔣的徐州會議及馮玉祥的哀的美頓電報使他們趕忙幹。
汪精衛『立即幹，準備馬上驅逐共產黨人。』（註十八）唐生智匆匆赴湘，我們已知道他到湘後即『證明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陰謀確實存在』，并建議『立即將共產黨人逐出國民黨』。（註十九）國民黨領袖在報上和公開演講台上展開一個反共運動，立意準備分裂。
最滑稽的就是羣衆運動的興起，牠之脫離武漢政府而獨立行動的傾向，牠之公然違抗武漢的禁令，通通歸咎於共產黨。很久以前，共產國際就罵共產黨領袖玩忽牠的訓令，不去指引和發展這種羣衆運動的獨立性。但我們指出一件事是很重要和很有教訓意義的：當時汪精衛十分贊成的引證史大林的話和共產國際的决議，作爲攻擊湖南『過激份子』下層工農及個別共產黨人的論據。
六月二十六日，汪在武昌的湖北黨代表大會上的演講，曾引證共產國際執行委員第七次全會的决議。汪說：『這個决議案明明說中國革命應依靠工農和小資本家的聯合。由此可知，中國共產黨員本身也不贊成例如最近在湖南省發生的輕舉妄動的。』（註二十）
換言之，照汪的見解看來，凡是『不贊成』農民『過火』的共產黨領袖是遵守而不是違反共產國際的决議！汪想指出關於社會革命的問題，中國與俄國如何『不同』，於是引證史大林在一九二七年中國與一九〇五年及一九一七年俄國間之『可敬服的比較』，（註二十一）史大林之作出這個比較爲的是反駁和嘲笑托洛次基的見解，因爲托氏認爲要用蘇維埃來使中國的土地運動澈底做出牠的結論。（附註一）汪精衛在大發言論，攻擊羣衆運動的無名領袖時，發覺他與史大林的見解一致，這無名領袖的意見，據汪精

衞的引證，是非常古怪的，彷彿是從托洛次基的演辭裡摘引出來的一樣。

汪精衞寫道：『我常常聽到那些幹羣衆運動的人說：『不要相信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力量，要相信你們自己。』……結果，民衆都不肯接受政府或黨（國民黨）的命令，也不肯服從牠們的指示。這不僅使民衆和黨發生隔膜，而且使民衆陷於脫離黨的指導而和反革命份子獨立作戰的危險地位……結果，羣衆已受反革命包圍，黨已無法拯救他們。』（註二十二）

羣衆和反革命份子『獨立作戰』，在這些反革命份子中，他們首先計及的就是地主。國民黨不能拯救農民，因爲牠首先最關懷的還是拯救地主。農民之遭逢失敗，幷非因爲他們抹殺國民黨的領導，而是因爲共產國際和共產黨的領導抹煞他們而保持與國民黨的聯合。

（附註一）在五中全會裡，史大林問道：『我們能夠說，俄國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六月的局勢和中國目前的局勢相同麼？不，不能，這種說法是說不通的，不僅因爲俄國當時是處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而中國現在是碰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且還因爲俄國的臨時政府當時是一個反革命的政府，而目前的漢口政府則照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意義看來，是一個革命政府……工人蘇維埃的歷史告訴我們，這種蘇維埃只有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直接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有利的情形中，才能存在和發展。一九〇五年列寧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蘇維埃不正是因這個理由而歸於失敗，正如一九一八年德國的工人蘇維埃因爲情形不利而失敗一樣麼？假使當時在俄國有一個和中國目前的國民黨左派一樣廣大的組織，一九〇五年在俄國就會可能沒有蘇維埃……因此，中國的國民黨左派在目前中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中所盡的作用，大約和蘇維埃在一九〇五年所盡的作用相同。』——一九二七年六月三十日，共產國際報，史大林著：『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的任務』。

汪精衛繼續往下寫道：『不錯，耕者有其田這個原則，三民主義的第三部有明文規定，……但我必須指出這一點：當我們的總理起草民生主義及說起「耕者有其田」時，他同時……淸楚的說過，土地問題應經過政府和法律的手續來解決，他從來沒有說這個問題可以由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農民的辦法來解決的。』

汪說，孫中山希望問題之『解決應使農民蒙其利而地主不蒙其害』。他又說，孫氏認爲中國絕不會有什麼階級鬥爭，國民黨是『民衆中許多階級的黨』，牠的職責就是避免這種階級鬥爭——『否則各階級就不能聯合起來』。（註二十三）

在他自己方面說來，汪是對的。如果你們想得到史大林所謂『革命的議會』，或布哈林的所謂『黨與蘇維埃之中間物』，或馬丁諾夫更簡單的稱爲『四個階級聯盟』的東西，你們就必須使合作的各階級不互相火拚。否則聯合確實是不可能的。史大林——布哈林在口頭上要階級鬥爭，在行動上則設法避免牠。在這一點上，他們和工農破裂，因爲工農不相信說話，他們具有被壓廹者的一切眞實本能來實行幹。農民認爲和地主的唯一共同之點就是農民耕種，地主從中取利的土地。他爲了生存已不得不把地主逐離這塊土地，據爲己有。這就是土地革命的簡單內容。你們不是擁護農民，就是擁護地主。汪精衛和他的明友現在廹得把他們所有關於土地和農民的大話通通收回，而毫不含糊的擁護那些已在摧殘土地叛亂的人。

史大林曾廹令中國共產黨人在完成一件任務：鞏固羣衆與武漢政府（『唯一的政權』，『革命的組織中心』）中間的連繫。但在中國，羣衆仍然愈來愈尖銳的和這個政府衝突起來，因爲，雖然史大林的想法相反，這個政府却不擁護，倒還反抗羣衆爲本身利益的奮鬥。羣衆組織儘可能趕快走自己的路。派赴江西調查該省狀況的國民黨特派員報告道：『政府與羣衆間的鴻溝現在很大。政府甚至不能參

加或監督公衆團體的活動……我們常常見到各縣蔑視省黨部的指示，農會和工會反對省黨部的決議……各黨支部擅自逮捕和懲罰民衆。公衆團體也一樣幹法。因此到處有多重政府的現象——其危險不下於無政府……農工運動領袖的最大缺點就在他們誤解「擁護農民利益」的政策。』（註二十四）

工農領袖誤解『擁護農工利益』的口號。他們以爲牠眞的就是表示擁護工農利益。他們努力這樣幹，他們就不得不產生『多重政府』。工農的地方組織孤立和散處在各城鄉中，牠們在每一點上都和國民黨的縣省黨部及武漢的『組織中心』衝突。這些『多重政府』彼此間完全缺乏連絡。牠們無法採取統一的政策。各鄉，各縣，各省組織工農兵代表會是克服羣衆運動這種混亂瓦解的唯一手段。但這些代表會就是蘇維埃。托洛次基極力主張這一辦法，但史大林却反對牠，他的理由就是：這等於『反對革命的國民黨』，反對『唯一的政權』。武漢的國民黨左派領袖也恰好拿這同一理由，恰好用同樣的話來反對牠。

孫科寫一篇題爲『革命與民衆』的文章，他埋怨民衆漠視武漢禁止羣衆團體侵奪政權的禁令。他寫道：『自從該項訓令頒布，爲期已兩個月。但各公衆團體尙公然藐視政府的決定，繼續採取自由行動，希圖破壞政府的權力』。他埋怨，農民沒收土地，工人收奪工廠和店舖。『我們不得不請大家注意，如果羣衆不服從國民黨的領導和指示，不準備執行黨的政策，他們實際上就是違背國民革命運動（即：『革命的國民黨』）的利益。換句話說，他們實際上就是幹反革命勾當。

『如果民衆可以不顧政府，自由逮捕，罰欵，沒收個人的財產和執行處決，那末我們一定認爲政府的政權完全被篡奪了。沒有威望也沒有權力了。另一方面，假如民衆認爲他們的行動是正當的，那末，他們已公然拒絕把國民政府視爲革命運動的唯一統治機關及國民革命的政府。他們腦中

以爲國民政府不能行使牠的權力，因此，他們必須形成獨立的行政機關……他們的行動公然反對革命政府，這可以視爲反革命的性質……他們不肯承認中國所有民衆運動應受國民黨指導，并應統一在牠之下。他們相信共產黨應參加領導羣衆運動。他們尚未相信國民政府是革命運動的唯一代表機關。（註二十五）

一九二七年七月，孫科在漢口是否已讀到史大林遠在數星期之前在莫斯科發表的大綱和演辭，殊屬疑問。但他并未看過或聽過托洛次基的言論却是確實的。他在此地恐怕直接剽竊了史大林的話。拿『托洛次基』或『反對派』來代替『羣衆』，孫科的大文可以混充八次全會史大林——布哈林多數人的文件。中國工農和托洛次基排斥史大林——孫科的名言：武漢政府是『唯一政權』，是『革命運動的唯一統治機關』。羣衆相信武漢不能『行使牠的權力』，且要求產生『獨立的行政機關』，這與莫斯科的托洛次基的見解不謀而合，他也警告過：武漢的權力『盪然無存或幾乎盪然無存』，並且他也要求產生蘇維埃，即，工農兵的獨立會議。爲了這一點，史大林斥托洛次基爲『反革命』，也爲了這一點，他的同志孫科更公開，更直接的用同樣的罪名來攻擊羣衆。這些因緣都不是偶然的。

一九二六年三月在廣州，以及一九二七年四月在上海打擊羣衆運動之前，蔣介石也曾築起隄防來對付共產黨人，駡他們應替羣衆的『過火』負責，又駡他們陰謀反對資產階級在國民黨內部的支配權。國民黨左派的領袖現在採取同樣的策畧。現在的指責和當時在廣州或上海的指責如出一轍。但在漢口或莫斯科的共產黨領導，心目中連想也沒有想起發動一個羣衆的獨立攻勢來反對國民黨小資產階級領袖的怠工和叛賣。六月廿九日，正當武漢領袖已公開站到軍閥方面來反對土地革命的時候，共產國際的中央機關報刊登一篇綱領式的文章，牠首先問道：『誰來實現土地革命呢？』隨後就答覆道：『從牠的過去歷史，牠的社會成分

以及牠底發展的前途看來，國民黨能夠而且一定要轉變而為一個民主專政的機關……國民黨是一種黨和國家議會的中間物……』

這位共產國際的代言人往下說：『到了革命將近完成牠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任務的時機，到了能夠或者（？）必須分裂國民黨的時機，蘇維埃才是必須的。這個時機是不能精確預見的。但，這一點是明白的：牠尚未臨近，足以令我們必須立即在羣衆中提出蘇維埃的口號。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現在替國民黨及武漢政府的命運，換言之，替中國革命的命運負責。因此，他們不能提出不精確的口號和公式。

『反對派的極左路線的無聊，其最好例證就在兵士代表會的口號，這就是兩重政權的形式之一。布爾什維克提出這些口號，志在瓦解沙皇和克倫斯基的軍隊。現在向那枝替武漢政府作戰的軍隊提出牠，就是自覺地謀瓦解這枝軍隊……提出士兵代表蘇維埃的口號就是自覺地在共產黨及其同盟者的最不利的環境中，加速他們與將軍們的衝突。這個口號等於挑起一個衝突，這個衝突是能夠眞正招致革命的永遠失敗的。』（註二十六）

在漢口，這同樣的精神也必然支配着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他們現在死抱着兩個可憐的希望，第一個希望就是以為再行退却，再作讓步，他們尚可保持『聯合戰線』，第二，他們以為利用這個或那個軍閥野心，他們尚能使武漢囘心轉意，討伐蔣介石。據共產黨某中央委員說，他們提出『東征』南京的口號，想『騙「革命的將軍們」先去打蔣，再來打共產黨人。』（註二十七）他們於是開大會，發宣言，向他們認為比較『可靠的』將軍請求。張發奎是『鐵軍』軍長，他是反蔣最烈的，有一個時候，共產黨的希望集中在他身上。魯易謁見汪精衛，且根據史大林那封電報的精神，設法勸他允准共產黨的隊伍在張發奎統率之下加以擴充。魯易發現汪對他的建議，表示冷淡，（註二十八

）馮玉祥剛在鄭州要求撲滅一切工會領袖，但同一日，上海總工會打電報向馮玉祥呼籲：『你是國民黨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及……總理政策……之眞正擁護者，我們希望你來領導……革命軍討伐蔣介石。』（註二十九）討蔣運動的全部鼓動總是和兩黨繼續『合作』的最狂熱要求連在一起，（註三十）因爲大家都已經知道，淸共已廹在眼前。汪精衞和張發奎曾贊成討蔣，但只是因爲他們本身的政治命運需要消滅他。張不久眞正調遣他的若干部隊，向南京進發，但這次戰役旋即消滅。何鍵及其他將領冷笑道：『我們不替共產黨人討蔣。』（註三十一）

共產黨中央驚惶失措，决定發一宣言，說明如果國民黨『眞正』願意執行孫中山的政策，牠必須討伐蔣介石，而且必須和共產黨人聯合。但是當政治局各委員召集會議時，每一個出席委員提出一個不同草案，關於該項宣言得不到一致的意見。末了，到了六月二十日，中央擴大會議通過一個宣言，內中包含十一點——這是最後的絕望企圖，想使『革命的國民黨』相信共產黨人準備繼續效忠於『民族統一戰線』。這十一點中，以如下幾點爲最重要：

『四、中國國民黨旣然是反帝國主義之工農及小資產階級聯盟的黨，當然處於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

『五、國民黨的ＣＰ份子，雖然參加政府（中央及地方）工作，而只是以國民黨黨員資格，并非以ＣＰ份子黨員資格參加……（現在參加政府工作之ＣＰ份子，爲圖減少政局之糾紛，可以請假）。

『六、工農等民衆團體均應接受國民黨黨部之指導與監督。工農等民衆運動之要求，應依照國民黨大會與中央會議之議決案及政府公佈之法令。但國民黨員亦應依據黨的决議案及政府之法令，保護工農羣衆之組織自由及利益。

『七、依照國民黨主義，需武裝農民，但工農武裝隊均應服從政府之管理與訓練。武漢現有的武裝糾察隊，只因避免政治之糾紛，可以減少或編入軍隊。

『八、工會及工人糾察隊不得黨部或政府之許可，不得執行司法行政權，捕人，審判及巡邏街市等事。
『九、店員工會應即由黨部會同總工會派員組織。店員的經濟要求不得超過店東的經濟能力以上。工會不得干涉店東的用人權，管理權，更不得侮辱店東，如逮捕，罰欵，戴高帽子等。』（註三十二）
中國共產黨作最後的努力來服從史大林的訓令，『加强革命政府的權威及其革命組織中心的作用』。當同一星期，四百個代表齊集武漢，代表八個省份的三百萬有組織工人，參加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之時，共產黨不敢利用當時具備的機會，作一次劇烈的轉變和開始動員工人抵抗國民黨反動勢力的進攻。汪精衞於六月二十三日出現於會議講台，尙被大聲喝采。（註三十三）但代表們仍屢屢表示要堅决爭取工人運動的利益。（註三十四）甚至羅佐夫斯基（他以俄國工會友誼代表的資格出席）也不得不作一次反常的『激烈』的演講。（註三十五）大會六月廿八通過的宣言說：『反革命天天得勢。在國民政府的領土內，工人運動只能在武漢公開進行。反革命派現在湘，贛，豫，得權……工人仍在新式的專制統治之下受苦。在這種情形之下，反動派將來有可能統治武漢。我們應極力奮鬥，維持工會的存在。我們現在正處於白色恐怖中。』（註三十六）但這並不妨碍該宣言結末高呼：『國民政府萬歲！』
民衆論壇說：『此間工人處於自由的空氣中。此間沒有不表同情或積極敵對底軍閥的壓廹。在國民革命的中國，有組織的工人均效忠武漢政府，因爲他們只有在這個政府底下，才能十分自信地希望保持工人的第一和最切要的權利——公開的……無憂無慮的做工。』（註三十七）
但是六月三十日晨，最後一次會議剛剛高呼『國民政府萬歲』的口號，宣告閉會的時候，『敵對底軍閥的壓廹』猛烈地，直接降臨工會機關。兵士衝入來，開始刼掠和破壞全國總工會的會產和文書紀錄。抗議急忙提出來。犯事的

士兵也奉令撤退。他們幹得有點過早了。到處轉的史特朗女士曾見蘇兆徵匆匆跑過馬路，她立即止住他，問他那些抗命的兵士是否受懲辦。『他作苦笑。得回那所房子他就十分快樂了。他答道：「我們今天尚可在裡面辦公……誰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呢？」』（註三十八）但總工會從沒有收回牠的會所。

襲擊工會會所之前，已宣告工人糾察隊自動繳械和解散。在上海，人們希望挽回那臨近的打擊，曾下令『藏匿或埋沒』所有鎗枝。在漢口，共產黨中央則決定事先完全繳出工人現有的少量鎗枝，并解散糾察隊。六月二十九日，湖北總工會的代表團由向忠發率領，逕赴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辦事處，『說明因有人抱怨工會糾察隊是商人不願恢復正常經濟狀況的原因，他們擬繳出他們的鎗枝或改編入軍隊中。後來決定他們自動繳出他們的鎗枝……』（註三十九）

民衆論壇解釋道：『據說，因爲糾察隊握有武裝，商人恢復商業，不感安全，其他謠言則盛傳糾察隊陰圖進攻軍隊。爲幫助政府的政策及平息這些謠言起見，湖北總工會決意將糾察隊解除武裝。我們覺得，採取這一辦法，商業恢復的障碍必可祛除，而離間工人與兵士的企圖亦遭失敗。』（註四十）

翌日，湖北總工會發佈一個更進一步的解釋聲明書：『爲鞏固軍隊與工人的聯合戰線起見，又爲着使反動派與反革命派的攻擊無所憑藉起見，本工會於本月二十八日下午下令解散武裝糾察隊。鎗枝及軍火均移交武漢警備軍的漢口辦事處保管……我們已請求政府保護，以表明我們擁護牠的誠意……至於反動派，我們希望政府實施強硬的手段，懲辦他們』。（註四十一）

共產黨中央也已經決定讓供職政府的共產黨人『請求離職，俾減少政局的困難』。因此，六月三十日，共產黨的農政部長譚平山托詞無法『納農運於正軌』，向政府請『假』。

他寫道：『自從我就任農政部長以來，我已盡我所能，完成改善農民生活狀况的重責。我已不斷盡我所能，指正農運。但最近的發展已使政局愈趨嚴重，納農運於正軌，這個責任於我未免太重。因爲我的體力不適於繼續我的工作，故此請假。』（註四十二）共產黨的勞工部長蘇兆徵久已不到部視事。他的辭職信說：『因爲最近局勢的發展，我已無法留職。』這封信數日後才發表。（註四十三）向忠發及其他供職於鄂省府的共產黨人均已辭職。充滿了驚慌和頹喪。共產黨中央自身也渡江逃入武昌。牠已盡牠所能去『增強革命組織中心的權威』了。一切均歸於徒勞，因爲驅逐共產黨人的决議已做好，只是留待七月十五日國民黨政治委員會正式通過吧了。

陳獨秀開始醒悟，現在剩下來的唯一辦法就是完全退出國民黨。他和鮑羅庭商量。這位高等顧問說：『我十分贊同你的意見，但我知道莫斯科是不會允准的。』（註四十四）但事實上鮑羅庭一點也不贊同。他仍然想把『堅定性和革命的目的』注入兎子中，據湯良里說，自長沙事變以來，鮑羅庭已僅被待爲『上賓，不復（被待爲）……顧問』。（註四十五）鮑羅庭迷戀着國民黨厚遇的光榮。他尙探尋合作的『可能性』，生怕自己萬一忽畧過牠們。瞿秋白說，他還懷着這種兒戲的念頭：想領着宋慶齡，鄧演達和陳友仁脫離政府，作爲反對汪精衞的示威行動。（註四十六）但事變已捲過鮑羅庭的頭。共產黨領導已破了產，而且幾乎瓦解了。黨的下層已陷於潰散，頹喪。何鍵的軍隊已佔據武漢，且任所欲爲的統治牠。工會機關一個一個的被佔據。逮捕及鎗决已發生。恐怖的高潮呑沒了史大林的『革命中心』。消息報訪員發電：昨天的可靠同盟者今天已成了『將軍們手中的玩物』。（註四十七）老鼠開始離開沉船。

七月六日，布哈林突然絕望地勸中國羣衆必須依賴自己：『重要口號之一應該是：「工農們！只相信你們自己的力

量！不要相信將軍和軍官們！組織你們的武裝軍隊！」……
……馮玉祥已投降人民革命底敵人的陣營。我們必須向他宣布無情的戰爭！』但布哈林尙樂於信任汪精衞，他滿懷希望的在括弧中加進這一句話：『蔣介石的朋友準備贊同這個計劃（即指驅逐共產黨人的計劃）——汪精衞不是這種人。他比之別人更堅定。』（註四十八）不到一星期之後，他發現汪精衞只在決心摧殘羣衆運動這一點上，『比別人更堅定』。布哈林現在才宣佈『中國革命的突變』已發生，并鄭重聲明『武漢的革命作用完結了』。在第八次全會決議收梢的一段帶威嚇口吻的話裡，又在他往後的幾篇文章裡，布哈林已準備好他的解脫。他現在聲明：失敗的責任歸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負，因爲牠『近來頑固地對共產國際的決議怠工。（牠）已受不起火熱的試驗……牠已遭逢破產。』（註四十九）

七月十四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一道決議宣告：『武漢政府的革命作用完結了；牠成了一個反革命的力量了。這是一個新的和特殊的現象，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及所有中國同志必須充分和清楚的注意牠。』（註五十）

共產國際已預見和預言了每一件事。七月十四日，牠又發現一個『新的和特殊的』事實，這件事實，多月來，就是頭腦最簡單的湖南農民或武漢工人也知道了。難道這表示犯有什麽錯誤嗎？錯不在莫斯科！自從列寧死後，史大林就未曾犯過一個錯誤，或差不多沒有犯過啦。

『支持北伐（亦即支持蔣介石——著者）是完全正確的，因爲牠喚起一個革命的羣衆運動，支持武漢也同等正確，因爲牠充當蔣介石南京政府的反對者。但到了武漢政府投降革命敵人的時機，這同一聯盟的策畧就根本錯誤了。在革命的前一階段是正確的，現在就絕對不適用了。』

但北伐就是資產階級征伐長江，到了長江，牠的勝利與共產黨的退却政策使蔣介石能夠屠殺工人，破壞他們的組織。他這樣幹的時候，他的『革命作用』就完結了。和階級

敵人成立聯盟是『完全正確』的，只有正當你們的敵人扼住你的咽喉時，這個聯盟才變成『根本錯誤』和『絕對不適用』。假如事先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行動上，動員起來對付這個敵人，假如你們自己武裝起來抵禦他的確確鑿鑿的進攻，這就是——反革命的托洛次基主義了。

『所有這些都與黨領導的某種困難有關的，尤其是像中國共產黨這樣幼稚和無經驗的黨……革命形勢的極度緊張需要迅速的把握到每一瞬息的特點。牠需要巧妙的和及時的玩弄陰謀，迅速修正口號……及斷然破裂聯盟，因爲這種聯盟已不復爲革命鬥爭的因素，且已成了牠底道路上的障碍。假如在革命發展的某一階段上，共產黨支持武漢政府是必須的，那末在目前，這種支持就會成爲中國共產黨的災禍，且會把牠推落到機會主義的泥坑中。』

今天，七月十四日，這種『革命鬥爭的因素』已突然出其不意的成了『牠底道路上的障碍』了。僅僅到現在，七月十四日，當共產黨狼狽潰退，鬥志全失，羣衆受了摧殘，喪失所有陣地之時，繼續支持武漢才成了災禍哩。中國共產黨人因從始就已支持武漢，以前又支持蔣介石，故陷入『機會主義的泥坑中』已深及頸部，他們現在恐怕很想知道共產國際執委會用起『災禍』一詞究何所指。僅僅六個星期之前，共產國際執委會着重指出的『革命中心』和『增強這個革命組織中心底權威的需要』，現在變成什麽了呢？莫斯科對這一點也有一個答覆。武漢已由『革命中心』轉變爲『反革命力量』了。因爲：

『國民黨領袖旣不顧共產國際的勸告，不僅不支持土地革命，且已解放了牠底敵人的手。他們曾批准工人的繳械，批准討伐農民，又批准唐生智之徒的報復行爲。他們在種種藉口之下，延緩討伐南京的戰役且對牠怠工。』

所有這些事情的造成，都是因爲武漢拒絕莫斯科的『勸告』。兎子剛剛捲起眼睛死了。當牠生時，牠因爲莫斯科頻頻求愛，滿眼泛桃紅色。但是現在牠死了，牠的羞容也消

失了。桃紅色變成腫脹的白色，一轉瞬間，大蛇便把牠捲走了。

在廣州，上海，長沙，現在最後在武漢，中國羣衆已眼見國民黨的領袖由革命的眞正同盟者搖身一變而爲工農的殘酷屠夫。在每一次新的災難中，共產國際總是宣佈一切都已適切預見了，過去採取的政策完全是正確的。布哈林在中國革命中，不斷發現『新的和特殊的現象』，他現在又叱責共產黨不能實行與『成了障碍的聯盟』破裂。和武漢政府的聯盟已完結了。但這不就是表示和國民黨的聯盟完結。在這一點上，共產國際的訓令給了我們一種盲目驚慌的明證。共產國際的决議叫中國共產黨人『退出武漢政府，表示示威』，但『不要退出國民黨』。這也許是最新和最特殊的現象吧。

『儘管國黨民的領袖發動驅逐共產黨人的運動，共產黨人也應留在國民黨內。更密切的和國民黨的黨員羣衆接觸，應勸誘他們接受决議：堅决反對國民黨中央的行動，要求撤換國民黨現時的領袖，並按照這些辦法，準備國民黨的代表大會。』

共產黨人一方面仍然豎起國民黨旗幟，另一方面現在又要『加緊在無產階級羣衆中工作……建立工人羣衆組織……鞏固工會……準備工人階級决戰……發展土地革命……武裝工農……組織一個適於作戰的非法黨機關。』

但怎樣忘記過去呢？中國共產黨人問道：我們過去成立的偉大組織都給摧毀了。我們的同志正在被酷刑拷打，槍殺和打得七零八落。羣衆運動已遭破壞，工農都把我們視爲欺騙他們及送他們去受屠殺的人。我們假定：你們敎我們把國民黨旗幟舉得更高一點，我們一定照辦；但我們十分懷疑：現在即使提出我們自己的旗幟，羣衆是否還肯跟我們走。共產國際答覆道：不要緊，負責的是你們自己的領袖，不是我們。

『……共產國際執委會認爲號召中國共產黨員公開反對中

央的機會主義，是牠的革命義務……

『爲了使黨的領導在政治上健全起見，設法改正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機會主義錯誤……堅決反對黨領袖的機會主義乖離……改變領導的性質……否認那些破壞共產國際底國際紀律的領袖。』

史大林已盡他一己的『革命義務』。今後共產國際那些文氓的『革命義務』就是永遠責令中國共產黨領袖（他們自己底易欺和無知的不幸犧牲者）單獨負上這次莫大歷史災刼的責任。但史大林和布哈林可以迫使中國共產黨人接受這種政策，這種政策把一個最偉大的羣衆運動摧毀了。他們却不能靠寫些不忠實的決議，可以使他們的意志支配歷史。在武漢，事變發展到最後的關頭。共產黨人遵照莫斯科的訓令，『退出』他們早已離開的政府，表示示威，同時又聲明他們『沒有理由脫離國民黨或拒絕和牠合作』，他們不容許『叛變革命的將領與動搖的政客來濫用國民黨的名義及隱藏在孫中山的旗幟之下』。（註五十一）但將軍們却一點不怕，繼續『濫用』國民黨的名義。七月十五日，國民黨的政治委員會命令國民黨內的所有共產黨委員放棄他們的共產黨黨籍。四日之後，軍事委員會也通令軍隊進行同樣的清黨。所有違抗者均下令『嚴懲不貸』。（註五十二）往後數日，劊子手隊使清黨令顯得更嚴峻。凡是拒絕投降的共產黨人——他們許多人都拒絕了——迫得逃跑。陳獨秀鑒於自己的地位已極度無望，遂辭去中央總書記之責。他寫道：『國際一方面要我們執行自己的政策，另一方面又不准我們退出國民黨。實在是毫無出路，我也不能繼續我的工作。』（註五十三）其餘的共產黨領袖，如瞿秋白，張國燾，李立三，毛澤東等，則把國民黨的旗幟塞在口袋裡，留待將來之用，急忙逃走。七月廿七日，國民黨左派的領袖羣集火車站裡，和他們的『貴賓』鮑羅庭話別，他名義上是去和『馮玉祥磋商』。（註五十四）實際上，他正開始長途旅行：橫渡西北以抵遼遠的蘇聯邊

境，莫斯科從漢口撤退了。

軍事當局進行有系統的破壞工會。漢口警備司令部下令禁止罷工。從七月十四日至十九日，兵士『駐紮』在二十五個工會會址內，工會的文書和會產遭沒收。馮玉祥在河南全省也同時進行同樣的勾當。（註五十五）泛太平洋工會秘書報告道：『最近數星期內，在武漢政府治下的中國工人運動已經歷了一個最無恥的反動時期……軍隊……已執行了如是巨大的破壞羣衆組織的工作……以致需要一個極長久的期間和莫大的力量來補償損失，並使工會能恢復牠們的正常機能。各省各縣的許多工會領袖和組織者……已被驅逐，逮捕，或殺害。中國工會的其他領袖，就中最著名的就是全國總工會的領袖，均已逃亡。……有一次在接待泛太平洋工會大會各代表的宴會上……汪精衛娓娓動人地宣稱他認爲國民革命的最好的保障莫如發展工農羣衆運動及立即實現勞苦大衆的基本要求……現在我們不僅聽到不同的演辭和聲明，而且我們還親眼見到人們採取完全不同的行動來對付工農組織，這種行動迄今尚爲一切張作霖和蔣介石之流的軍閥和反革命派的獨有特權。』（註五十六）七月三十日，武漢兩千人力車夫猛襲一個警察署，迫令釋放一個被捕的同志。結果，車夫兩人被殺，六人受傷。警局去函人力車夫工會，請求派代表談判。但該會已闃無一人。工會領袖均已逃跑。只有街頭的車夫在罷工。當局頒佈戒嚴令，並適用死刑。罷工遂告結束。這就是漢口工人運動遲遲而來的最後一次示威。數日之後，寧漢互通賀電。寧方通電贊揚武漢反共的堅決行動並邀這些首領赴寧。八月十日武漢覆電稱『如一切嫌惡均毅然釋棄，則兄等前此應付急變之手段，弟等均衷心諒解。』（註五十七）武漢『革命中心』與反革命南京之間的『充滿的矛盾』就這樣——在一幕動人的基督教式的寬宥中完結了。

在武漢所有『左派份子』中，只有鄧演達和宋慶齡公開脫離這種新政策。鄧於七月六日寫道：『從楊宇霆（張作霖

代表）至蔣介石……均成爲國民黨員或將要成爲黨員。國民黨的旗幟到處舉起。但我們在辛亥革命中碰到的不是同樣的情形呢？所有經濟政治和軍事權力不是尙握在軍閥手中麽？……我們想利用軍閥，但我們却被他們利用了。』（註五十八）一星期之後，鄧辭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之職。他甚至比之莫斯科的『革命家們』更淸楚的看出羣衆與國民黨間正發生公然的破裂。他宣稱『往日鼓吹充分保護工農者已動手屠殺他們……國民黨的革命意義已失……自然的結果就是黨本身將變作反革命……革命將失敗，與辛亥革命的失敗一樣。』（註五十九）
宋慶齡也跟着宣稱國民黨已變成『軍閥手中的工具。牠不再是替中國人民謀未來幸福的活力，牠將來一定變成傀儡，壓迫的代理人，寄生於目前奴隸制度上的寄生虫。』（註六十）鄧演達和宋慶齡，偕同陳友仁逃亡歐洲。『國民黨左派』的神話就這樣完結。（附註一）
革命在短促的變幻無常的三年之內已席捲了全國，牠現在完結了。一個強大的人民的勃興已引起一種古舊和殘破底壓迫文明的腐朽建築搖搖欲倒。羣衆已表明有十分充分的力量來顚覆牠，並把牠永遠連根剷除。但今天這個舊社會（附註一）只有劇烈的個人競爭尙殘存着。蔣介石暫時下野，讓寧漢合作得以實現。汪精衞經過五年倒蔣，毫無結果，遂於一九三二年一月終於步孫科及其他『左派』的後塵，變成蔣的嬖臣。陳友仁經過數度出山的企圖，均歸失敗，遂隱沒無聞。鄧演達於一九三〇年回國，組織所謂『第三黨』，反對國共兩黨，他後來在上海法租界被捕，移交蔣介石，被蔣槍斃。宋慶齡是『國民黨左派』中始終效忠於共產國際的最後殘餘份子。差不多十年來她就頻頻叱責蔣介石和國民黨爲民衆的屠夫，但後來她又被共產國際引回到蔣介石懷抱中，現在她又因爲一九三七年『民族統一戰線』的復興，熱烈的擁護蔣，和『寄生於目前奴隸制上的寄生虫』講和。

又重新穩定牠的基礎了，牠內部所具有的一切矛盾又重新復活並加深了。中國的工農因爲想破壞牠，又因爲追求人類的尊崇，現在正付出可怕的代價。在監獄及刑場上面飄着國民黨的旗幟。資產階級曾在這枝旗幟底下走上政權。羣衆也曾在牠底下蠢起，並在牠底下莫名其妙的被打倒。在整個革命中，這同一旗幟曾經綑在共產國際的旗桿上，也曾經綑在那枝拿來打擊中國共產黨人的旗桿上。

第十六章　秋收暴動

第十六章　秋收暴動

武漢政府的塌台完成了反革命的勝利。從廣州到南京，從大海到湖南的山岳，將軍們都大權在握。他們彼此已在混戰，但他們却共同對羣衆運動，對羣衆的組織和領袖發動無情的殲滅戰。

當時有一個報告說：『底下就是鎮壓的事實。四個月來，在蔣介石統治的地盤內已進行有系統的屠殺。結果，江、浙、閩、粵等省的民衆組織均受摧殘，而在這數省內，國民黨的黨部，工會，農會和婦女協會均由強有力的，有決斷的機關變爲馴服無骨頭的團體，牠們被「改組」得那樣澈底，牠們將執行牠們底反動主人的意旨。

『在過去三個月間，反動勢力已從長江下游擴展開去，直到如今，牠已成了所謂國民革命軍治下的支配力量。唐生智已親自證明：他做一個作戰軍隊的司令官，還不如做一個劊子手隊的司令官那樣起勁。在湖南，他屬下的將領執行的淸「共」，連蔣介石也幾乎無法駢比。槍斃和斬首的尋常辦法已輔以酷刑拷打和殘害身體的方法，這些方法充滿了黑暗時代與宗教裁判的恐怖氣味。這些結果已令人難忘。湖南的農會和工會恐怕在全國是組織得最好的了，但現在已完全被摧毀。領袖們倖免於火油活燒，活埋，鐵線慢慢絞死，及其他慘不忍書的死法者均已離鄉棄井，否則小心潛匿起來，令人不易發現他們……』（註一）

泛太平洋工會秘書報告：『工會領袖和組織者被處决的數

目一天一天的多起來。簡直沒有一天不處决幾個工人和工會份子的……羣衆運動一時受了摧殘。一切工人團體和農會均被「改組」，所謂「改組」也者就是說，牠們先遭解散和破壞，然後，牠們殘存的軀殼便受軍閥的若干特派員驅策。九江和武漢一樣，在那裡，所有工會組織均已解散，許多工會領袖均遭槍決……軍隊已佔領大多數工會會所且已掠刼破壞會產及工會的文件和最有價值的擋案……武漢所發生的事情也就是不久之前在廣州所發生的事情的精確的重演（李濟深先是破壞工會和農民團體，然後才加以「改組」，）也是蔣介石政府在上海所幹的事情的重演。』（註二）

羣衆運動的失敗不能僅僅以其物力毀滅的程度來測量。工農不僅僅已降伏於一個較強梁的敵人之前。他們還被他們自己的領袖來砍頭，人們平日教他們視爲他們自己底革命的先知先覺的人和團體，現在却來砍他們的頭。此事所造成的精神上和心理上的頹喪，無限的加深了反革命的效果。在一九二七年下半年，上海及其他幾個城市的工人尙有力量罷工，企圖把幾年獲得的迅速消失的勝利品，至少保持一部份。在這些零碎的，無組織的防衞戰中，工人很快就被反革命打敗了。羣衆退出了政治舞台。反革命的野蠻的，而且在他們看來又完全是出乎意外的進攻迫使他們陷於消極。他們脫離他們的支離破碎的組織。工會的會員大大減少。早在七月，當恐怖的第一次打擊才來到之時，泛太平洋工會秘書就說：『需要一個極長久的時期和莫大的力量來補償損失，並使工會能夠恢復牠們的正常機能。』（註三）農會曾有過幾及一千萬的會員，現在幾乎完全消失了。只有到山上落草的零碎暴動隊伍尙在困擾那些魚肉鄉民的官兵。在城市裡，工人成千成萬的脫離共產黨。一九二七年四月，牠尙是一個保有六萬黨員左右的組織，其中百分之五三・八是工人。（註四）一年之內，這個百分率跌減到了五分之四，一個正式報告也承認黨『在產業工

人中沒有一個健全的支部。』（註五）工人們用自己的方法來懲罰這個致令他們失敗的黨。假如共產黨懂得如何去估計這次悲慘失敗的原因，並根據這一估計，重新集合牠的力量，重新走到工人裡去領導他們的防禦鬥爭，牠一定可以博囘他們的信任。但事實上，這個黨從來沒有懂得如何和何時進攻，牠也從不知道如何退兵。工人們從那時迄今日也從未囘到牠的隊伍裡。

列寧援引俄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寫道：經過了一次嚴重的失敗之後，『革命的政黨必須繼續學習。從前他們學習進攻，現在他們必須懂得如何最良好地退却的智識，以補充他們底進攻的知識。他們須懂得——革命的階級已在自己的痛苦的經驗中懂得了——如果不學會如何進攻和如何正確地退却，勝利是不可能的。在所有被打敗的反對黨和革命黨中，布爾什維克黨最退得旗幟不紊，其「軍隊」之喪失最少，主力之保存最多，分裂最微……頹喪最輕，大規模地，有效而果毅地恢復其工作的能力也最大。布爾什維克黨之所以能如此，就在牠能夠無情地揭破並驅逐口頭革命家，這些人不願了解退却之必要與怎樣退却；他們不願了解在最反動的議會中，在最反動的工會……和類似的組織中學習公開工作是他們的義務。』（註六）

一九〇五年俄國工人之失敗，就是因爲沙皇的力量尙足以抵抗，而革命的力量則太過薄弱，不足以驅逐他。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之蒙受沈重的失敗，並非因爲工農缺乏力量和才能取得勝利，而是因爲他們所相信的領袖無法領導他們取得他們隨手可得的勝利。在俄國，工人已曉得誰是他們的朋友，誰是他們的敵人。在中國，工農恰好就受他們誠心服從的人們來摧殘。布爾什維克黨失敗之後尙能保存實力。中國共產黨失敗之後，實力喪亡過半，潰散和頹喪。如果單就這一點來說，中國一九二七年的結果較之俄國一九〇五年的結果千倍悲慘了。

在列寧底下，布爾什維克主義成了應用馬克思主義於實際

政治的科學，這猶如航海家指引他的船隻赴某海港時應用羅盤針和六分儀一樣。馬克思主義因爲暴露社會進程的內在規律。牠給了革命的領導以事先確定其方針的手段，這種方針不僅完全配合客觀形勢的要求，而且還希望改變這個客觀形勢俾有利於無產階級。這種方法與庸俗的經驗主義正相反，蓋庸俗的經驗主義跟着事變的尾巴，無舵飄流，陷於急流的漩渦中而束手無策。在列寧和托洛次基的指導之下，布爾什維克黨給了全世界一個最完滿的證明，證明一個自覺的革命領導能夠積極干涉事變的行程，使那些起來行動的廣大民衆的願望得到定形和方向。繼承他們兩人的官僚層不復給無產階級的願望以自覺的表現。牠反而替別的階級開闢一個途徑來影響無產階級專政，且時而受這一階級的壓迫，時而受另一階級的壓迫，搖擺於各階級間。牠因爲主要是受了維持和增進其本身威望和權力的慾望所支配，故『實用主義式地』，亦即經驗地往前走。當牠的錯誤造成其不可避免的後果時，牠便從懸崖的邊際，急劇退縮，慌亂地衝到相反的方向去，在這個方向中，照例有另一個懸崖在等着牠。

在這件事也像在其他許多事情中一樣，史大林成了官僚中派的化身，這個中派不能指引，只能跟在事變的進程後面。只有這一類的領導才能夠在蔣介石四月政變之後，宣稱上海工人之遭受屠殺已被『預見』了，這是一個完全正確的政策的當然結果，是無法防止的等等。共產國際的史大林派領導『預見』資產階級一定『放棄』革命，並認爲這是革命過程中的一個必然的，無可避免的『階段』。因此，工人便一定要聽人家的話，跟着資產階級的脚跟走，一直等到牠把他們踢開爲止。在革命過程中受反革命蹂躪是不要緊的，這件事已完全『預見』了而且也符合革命『各階段』的法則。這一類『領導』的不可分離的思想就是認爲革命的先鋒隊應消極靜候資產階級公然走上反革命的道路，讓牠自己在羣衆眼中自行『失信』。僅僅到了那時，

牠才能夠採取更大胆的革命政策，因爲羣衆對資產階級的幻想已完全喪失，他們今後可以了解這種政策了。這種思想是史大林的一貫思想。假如一九一七年列寧不及時趕回國，終止消極的等待，把黨造成爲羣衆底最積極和自覺的工具（這些羣衆已遠超過領導他們的人了），史大林本人一定領着布爾什維克黨走中國這條路的。史大林於一九一七年說：『我們必須等待臨時政府自行衰竭，等待牠在完成革命政綱的過程中自行失信……我們……必須等待事變暴露臨時政府底空虛的時機。』（註七）
彷彿在十年之後來一個反響似的，史大林現在在武漢政府塌台之翌日寫道：『中國共產黨應該在六個月之前提出「打倒國民黨領導」的口號來麽？不，因爲這一定是一個極其危險和輕率的步驟，牠一定使共產黨人更難於接近羣衆，蓋羣衆當時尙相信國民黨的領導，而且這樣一來又一定使共產黨脫離農民。這個口號一定是錯誤的，因當時武漢的國民黨領導，當作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政府來看，尙未達到牠的最高點，而且尙未因爲反對土地革命及投降反革命而自行失信。我們常常說，只要武漢的國民黨領導，當作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政府來看，尙未消竭牠的可能性，我們不應存心破壞牠的信用和推翻牠……中國共產黨現在應該提出「打倒國民黨領導」的口號來麽？對的，他們當然要提出。現在國民黨的領導因爲反對革命，又因爲已在牠與羣衆之間產生（！）敵愾，故已自行破產了。……這個口號將得到驚人的響應。現在每一個工農將認識到，共產黨的行動是正確的。』（註八）史大林只是忽畧了一件事。當共產黨在羣衆面前隱瞞自己的眞面目，消極等待國民黨『自行破產』及抵達牠的『最高點』時，國民黨的反革命已在順利地摧殘羣衆運動的團體了。工農方盡力抵禦恐怖的打擊，他們已無法懂得共產黨現在的『行動是正確的』了。（附註一）
當國民黨到達牠的『最高點』及全副武裝進行使自己『破

產』的時候，牠的難逃的犧牲者之一就是那位革命流產的主要產婆，鮑羅庭。他已竭力幫忙，把堅定性注入史大林的一批國民黨盟友身上，直到他們的『可能性』通通消竭了才罷休。他現在正橫越中國西北的荒漠，趕回本國。抛在他後面的就是他幫助破壞了的革命破船。沿途，其他國民黨的將領，甚至馮玉祥都來餞別這位嘉賓。

安娜·史特朗在牠另一本別無用心的有價値的書中，報告道：『鮑羅庭似乎討厭這些將軍。他非常淸楚(！)的看出他們的國民革命口號背後隱藏着軍事接濟的慾望。他說：「如果下一次中國的將軍們來到莫斯科高叫『慶祝世界革命！』最好還是立即把他們送給格別烏……他們所要求無非是槍枝而已。」』

史特朗女士抗辯道，他們的居停『似乎是一位友善的人而且傾慕俄國。』

『鮑羅庭厭煩地答道：「他是年靑人。他們年靑的時候都是好人。」』

過了幾晚，在東升的中國月亮之下，鮑羅庭坐在一張行軍小凳上閒談，他所談的就是史特朗女士稱爲『中國革命各種力量的最完全和不慌不忙的解釋。這種解釋我還沒有聽他談過。在漢口是沒有時間（！）來做這種討論的。現在，離開了行動的地點許多天數和里數，彷彿他也是爲了替自己的靈魂解脫而把這件事做個總結似的。』鮑羅庭說：

『大資產階級永遠不能統一中國，因爲他們並非眞正反對帝國主義者；他們是和他們聯合，靠他們賺錢的。小資產階級不能統一中國，因爲他們搖擺於工農與大資產階級之

（附註一）在刊載史大林這篇文章的同一期刋物的封底上，轉載列寧一九一七年的片斷文章，內中有這句話：『假如我們不淪爲一個愚蠢俗物的可笑角色的話，我們必須認識的正是第一步，而這個愚蠢俗物則欣然以爲到了第二步，雖則他尙在幫助實現第一步。』

間，末了則投降後者。工農也沒有統一中國，因爲他們太相信小資產階級了。』（註九）

在漢口，在行動的地點內，『沒有時間』來攷慮這些簡單的問題。鮑羅庭太忙於執行史大林的訓令，當心『不應存心破壞國民黨領導的信用並推翻牠』。不等到他離開行動的地點許多日數和里數，他尙找不出時間來下個結論：他過去『太相信小資產階級了』。歷史是不關心鮑羅庭的靈魂的，牠只是關心他對自己及他底功業的裁判，而他的裁判也只有在這裡發表，因爲他一回到莫斯科，他便埋沒於更安全的沈默退隱中。假如他拿他的題目來發表意見，這一定和托洛次基在中國革命失敗之前（並非之後）不斷發表的意見一樣，太過危險了。托洛次基也『離開行動的地點許多天數和里數』，但他與中國羣衆的關係比之置身於他們中的鮑羅庭更無限的親切。

史大林在中國資產階級祭壇中的另一位助手就是魯易。幾年前，在列寧的小心審查之下，魯易曾幫助起草共產國際第二和第四次大會的有歷史意義的民族和殖民地提綱，這個提綱曾宣稱反對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是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共產黨人的基本任務。當他動身赴中國時，他把這些敎訓丟到腦後。魯易在漢口充當共產國際執委會的重要代表，但他却背棄羣衆，委身於一件熱心的工作：先是『敦勸』蔣介石，後來又『敦勸』汪精衞不要令自己『失掉信用』。等到他們把他踢開的時候，他便回來莊嚴地寫道：

『資產階級的國民革命領袖寧願出賣革命，也不願意犧牲反動地主和資本家的部分利益。階級的團結打破了民族的團結……革命的發展威脅了資本家和地主階級的利益。進一步的反帝鬥爭一定不可免的引起國內社會經濟關係的革命。土地本應（！）歸給農民。農民本應（！）獲得保證，不受無限制（？）的資本主義剝削。簡言之，帝國主義不能推翻，除非牠的土著同盟者也遭到破壞。充分的民族解放之能夠實現……只由於認眞的破壞這些階級的特權地

位：這些階級的代表領導着國民革命……武漢政府的小資產階級急進主義已告破產。牠竟投降……反革命的封建的資產階級軍閥聯盟，這個聯盟已把國家賣給帝國主義了。這個國家已犧牲於階級利益的祭壇之上。國民黨的民主主義的（非階級的）理想已消失於階級利益的劇烈衝突中。中國這些革命與反革命事變的教訓就是：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本質上是反革命的；民族革命要想成功，牠必須是一個土地革命；不僅大資產階級，甚至小資產階級，儘管他們口頭上如何急進，也不能而且不會領導土地革命；當小資產階級得到工農的擁護走上政權的時候，牠並不和工人階級共享，也不和牠共同保護這個政權，牠反而把牠交給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工人階級經過牠的獨立政黨（共產黨）來活動是民族革命勝利的唯一保證。』（註十）

魯易這篇文章題爲『中國革命的教訓』。魯易過幾年後出版了一卷書，這在這本書裡適度的估計自從國民黨的『非階級的理想』變爲『階級利益的劇烈衝突』之後，在一九二七年最初幾個月的恐怖中，有兩萬五千個共產黨員送了性命。剛剛昨天，史大林才憑他的聰明『預見』資產階級（不是蔣介石！不是汪精衛！）要『放棄』革命。同時他又教這兩萬五千人去相信蔣介石和汪精衛是革命的『可靠同盟者』，蔣的廣州及後來汪的漢口是土地革命的眞正『組織中心』，『不應存心破壞他們的信用和推翻他們』，等他們自行『破產』，即等他們送掉這二萬五千個莫名其妙的人的生命，隨後，又送掉成千成萬的生命，及革命本身的生命。

在史大林，布哈林，鮑羅庭，魯易及他們的同僚能夠終於懂得大小資產階級不能領導土地革命，懂得『帝國主義不能推翻，除非牠的土著同盟者也遭破壞』之前，付出這一筆驚人的代價，難道眞是必要的嗎？

史大林的莫斯科中央委員會，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九日的一

個文件裡，把花了這許多生命得來的教訓，總括一下：『過去發展的經驗清楚的指出：資產階級因爲反對工農，不能解决民族從帝國主義束縛中解放出來的問題，牠也不能進行始終如一的反帝鬥爭，且愈來愈傾向於妥協……這種妥協實際上就是差不多讓帝國主義的支配權原封不動。民族資產階級同樣不能解决革命的國內問題，因爲牠不僅不支持農民，而且還積極反對他們……資產階級和農民作任何妥協也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爲在中國，甚至最微小的土地改良也會連帶沒收豪紳和小地主的土地，這種行動資產階級是絕對辦不到的……共產黨必須宣佈只有站在工農反封建地主和資本家的階級鬥爭的基礎上，戰勝帝國主義，中國的革命的統一及牠從帝國主義束縛中解放出來，才有可能。』（註十二）

難道眞是需要在肉體上消滅一整代革命家來『清楚地指出』資產階級不能反帝，不能領導農民麽？難道工會中心到了現在，即『四個階級聯盟』三年之後，才眞是時候宣佈：『中國工會目前要認眞反對階級合作的理論與實際』嗎？（註十三）

托洛次基在羣衆運動最高漲的時期曾極力主張成立工農兵會議（蘇維埃），這分明爲的是產生一個最廣大，最富於彈性的自衞機構來訓練羣衆，發展他們對於從敵人陣營裡來的暫時同盟者的警戒心，準備他們對資產階級反動的抵禦，並以他們自己的力量，他們自己的組織，他們自己的旗幟，他們自己的武裝，轉變這種抵禦爲進攻。這條道路，也只有走這條道路才能消滅反革命。但史大林派的領導當時却把牠塞斷，因爲史大林禁止反對『唯一的政權』，禁止反對任何『破壞革命的國民黨底信用及推翻牠的企圖』。現在，事變已爲這一政策索取了悲慘的血稅，而資產階級也已自行『失信』，實現了史大林的『預見』，史大林派領導又宣告革命『正長足進展到牠底發展的最高階段，即發展到直接爲工農民主專政而鬥爭的階段。』（註十

四）人們曾罵托洛次基跳過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階段。史大林的領導現在則只不過想跳過牠自己底政策的悲慘後果而已。

中國共產黨借陳獨秀底沈痛的話來說，『在過去只不過學會如何投降』，(註十五)現在却得不到機會來『了解退兵的必要』。在恐怖的打擊之下，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喪亡和潰散，羣衆被迫退，他們的組織也被摧毀，現在他們又奉令急忙轉向。他們還沒有停一停去考究一下什麽原因造成失敗，也沒有停一停去測量一下他們底失敗的程度，便立即被迫去聲明共產國際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領導永無錯誤的神話無論花多少代價也要保持！）——失敗的責任在於中國共產黨領袖的『怠工』，武漢的最後失敗已把革命提高到一個『新的和更高的階段』。昨天，在革命浪潮高漲，廣大羣衆力量行動起來的情形中，人們只是敎中國共產黨如何去使羣衆服從敵對階級，壓制他們和敗壞他們的鬥爭精神。今天，這個浪潮已成了反動的礁石上的『泡影』。殘餘的共產黨人又被人無情的從機會主義和妥協的極端趕到冒險主義的對極，希望藉過時的軍事行動，他們可以挽回他們現在已無可挽回地喪失了地位。他們被迫而委身於改善局勢底絕望和無望的企圖。在莫斯科的直接命令之下，共產黨採取暴動的道路。

執行這個新路線的人就是昨天還固執地朝相反方向的中央委員。陳獨秀已撤職了，因爲共產國際想拿他來做主要的替罪羔羊。黨的新政治局有瞿秋白，張國燾，李立三，周恩來，張太雷和李維漢等人，他們通通都要替過去黨和革命的失敗負責的。四月十三日赴蔣介石的上海行營請求發還糾察隊槍枝的，就是周恩來。在馬夜事變之翌日，下令長沙郊外農軍撤退的就是共產黨的湖南省委書記李維漢（即後來在革命運動中頗爲出鋒頭的羅邁）。他們現在通通都想法保持莫斯科的眷顧，故此特別將過失推到陳獨秀及其他幾個人身上，但這些人的主要罪過就在於他們過去想

忠實執行莫斯科發下來的命令。這批新『領袖』在進攻的時候才受了退却的訓練，現在在退却的時候，又奉令進攻了。

他們遵照上峯的命令作機械式的轉變，既不顧客觀形勢，也沒有改變黨對國民黨或土地革命底態度的基本政策。共產國際一方面命令共產黨人退出武漢政府，另一方面又特別訓令他們不要退出國民黨，應繼續留在國民黨內努力反對該黨領袖的『背叛』。國民黨的旗幟現在已成了恐怖的普遍象徵，在華南華中每一個大小軍閥的司令部都掛上牠，但這件事是無關重要的。托洛次基於五月已寫過：『各階級來來去去，但國民黨却長存不朽。』(註十六)現在，到了七月末，當各階級的來來去去已把國民黨改變爲恐怖的公開工具之後，中國共產黨尙忠於布哈林的訓令，不想把青天白日旗讓給別人。七月廿九日，共產黨新政治局號召國民黨黨員『起來反對中央』。（註十七）這個新領導在八月七日匆匆召集了一次會議，在這次會議裡，『國際的電令及其新代表（羅名尼茲）』號召共產黨『在國民黨革命左派的旗幟之下，組織工農暴動。』（註十八）八、七會議的決議案道：『革命的國民黨組織發展到更高的階段，則政權轉到工農兵代表會的手中也更容易和沒有危險。』（註十九）

失敗已把蘇維埃的口號合法化——這個口號昨天才是托洛次基主義的違禁品哩。七月廿五日，眞理報突然宣告『國民黨的危機把蘇維埃問題提上議事日程。蘇維埃的口號現在是正確的……從前主張立即組織蘇維埃的人……想強迫羣衆跳過革命運動尙未經過的階級……』（註二十）

史大林則有他自己的說法：『革命發展到目前的階段，在新的進展中成立蘇維埃的問題將完全成熟。昨天，數月之前，中國共產黨不能提出蘇維埃的口號，因爲這一定流於冒險主義（！）……因爲國民黨的領導尙未成爲革命的敵人，使自己的信用破產。』（註二十一）莫斯科的戰術大

家完全寄托希望於革命的迅速『進展』。史大林認爲這次挫折『大概』可以比之一九一七年年布爾什維克黨的『七月事變』。（註二十二）俄國中央委員會下令：『新的進展』一發生，『必須改變蘇維埃的宣傳口號爲即時鬥爭的口號，並馬上進行組織……蘇維埃。』（註二十三）但尙未這樣幹之前，還必須最後嘗試『更輕易和無害的』經過『國民黨的革命左派』來走向蘇維埃。就是現在，『可能性』還沒有完全消竭。八七會議時，中國共產黨尙高舉着青天白日旗。一位共產黨歷史家於五年之後，審愼地說，這件事『太走出』國際訓令之外了，『這自然是一個大錯誤。事實上，武漢政府反動後，國民黨的整個政治生命宣告死刑了。』（註二十四）事實上，死了的不是國民黨，牠正採取軍事獨裁的形式穩穩坐在政權上面呢。死了的是革命的國民黨底神話，是『四個階級聯盟』底神話，是共產國際政策底基石。事變過了五年之後，華崗描寫『八、七』會議爲『復活國民黨左派的企圖！』但當時共產國際却命令中國黨死死抱住殭屍。牠之不能復生並不是中國共產黨之過。

關於土地問題，『八、七』會議提出這個口號：『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要求小地主減租。』（註二十五）結果，『黨的各地組織牢記着土地革命的舊觀念，（！）認爲阻止農民沒收小地主的土地是他們的任務。』（註二十六）『八、七』會議又發一告全黨同志書，列舉出過去領導的『錯誤』並宣布陳獨秀曾老是反抗或不執行共產國際的完全無誤的訓令。牠從布哈林的狡猾的，自保的辭句中摘出每一句含混的話來證明共產國際於事前，事變當中及事後都是絕對正確的。『反機會主義鬥爭』，據官方的日曆，開始於八、七，但這個鬥爭實際上無非是反對人們想使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共同負過去錯誤底責任的任何企圖而已——此刻，這種錯誤（依賴國民黨）的實質內容正毫無改變，移到革命底『新的，更高的階段』中去了。盲動主義

的新罪惡只是舊罪惡的補充。但這並不妨碍『八丶七』會議自稱能夠『保證今後有個正確的，革命的布爾什維克領導。』（註二十七）這次會議『救護黨於行將解體中，且納之於布爾什維克的正軌』，官式歷史家的評述如此。（註二十八）莫斯科正式宣告『中國兄弟黨領導的右傾現在已清算了，領導的政策亦已改正。』（註二十九）

昨天，所謂『機會主義者』就是指和托洛次基一樣的人，他們在革命浪潮高漲時期要求採取不可調和的階級鬥爭的政策，要求產生蘇維埃及共產黨脫離國民黨的桎梏。今天，這同一名詞又要應用到如托洛次基一樣的人們身上（現在還包括陳獨秀），他們譴責革命退潮時期的暴動政策是只能破壞殘餘的革命幹部及使黨完全脫離羣衆的政策。撤了職的陳獨秀曾叙說，他給過新中央一封信，『指出羣衆的革命情緒當時並沒有到了高度，國民黨政府也不能很快或輕易推翻，不合時宜的暴動只不過削弱黨並使牠更加脫離羣衆……當然，牠從不考慮我的意見而且把牠當笑話到處宣傳，證明我沒有改正我的機會主義的錯誤。』（註三十）

『機會主義』成了一個無意思的形容字，拿牠來堵住任何反對暴動路線者的口。由失敗的絕望中產生的盲動情緒在共產黨內雖非常強烈，但尚有一些頭腦健全的同志懷疑應否加入早已命定失敗的瘋狂冒險中。他們的抵抗被整批開除壓平了，動搖份子的整批開除是黨的『布爾什維克化』政綱之一部分。『八七會議後……如果任何人對暴動政策表示懷疑，他就馬上被稱爲機會主義者，遭受無情的攻擊。』(註三十一)反抗已壓服。莫斯科說，『直接鬥爭』的時候已到來了。如果必須的條件尚沒有，就一定要不惜任何代價用人工把牠們造出來。結果遂造成了一九二七年秋天的一連串冒險盲動，即有名的『秋收暴動』。盲動主義走到自殺的極端。假如共產國際存心想破壞中國共產黨的殘餘力量，牠一定找不出比此更有效的手段。黨也彷彿只

想自毀似的，而在這一點上，牠也幾乎完全收效了。

八月一日第一次暴動發生於江西省會，南昌。兩位共產黨軍官，葉挺和賀龍舉起叛旗。他們帶有三千人左右。在他們的『革命委員會』的名單中，他們列上孫夫人，鄧演達，陳友仁（這幾個人當時正在亡命歐洲的旅途中）及『鐵』軍的張發奎，黃琪翔兩位將軍的名字，這兩位將軍很快就放棄他們的討蔣的假面具，進行消滅共產亂黨的眞正事業，這些亂黨竟把這種不中用的革命美名贈給他們。共產國際的報紙報告道：『南昌暴動……是反對武漢政府鬥爭的開始。每一個革命家將來都同意：一個由叛賣革命及受軍人和大地主支持的份子而成的政府，無論處在什麼情境中，應該加以推翻……』我們該記得，武漢開始與這種麻衣相法相合才不過兩個星期之前哩。『一個新的革命中心在形成中。』（註三十二）這個新的『革命中心』只維持了幾天。當張發奎率軍迫近該城時，葉挺賀龍的軍隊便迫得要開拔逃亡了。

這些革命家碰着民衆的冰冷面孔，揮動國民黨的旗幟，退出南昌，向南逃去。他們沿途經過的民衆，都久已把國民黨的旗幟視爲恐怖的象徵了。他們曾親眼見到蔣介石於三月間揮動過牠，又見到朱培德於六月也揮動過牠。在他們看來，葉賀的軍隊似乎也只不過是『蔣介石第三的軍隊。』（註三十三）葉賀答應沒收超過二百畝以上的土地，這無異答應讓大多數地主不受侵犯。痛苦的經驗已敎乖了江西及粵北的農民，凡是新來的軍隊答應拿善心來代替從前駐軍的惡意者，他們總不相信。簡直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區別這枝新的『革命軍』和先前的國民黨軍隊。農民見到牠總是退避三舍。經過兩個月的奔波，毫無結果的通過各個農村之後，葉賀的軍隊進攻粵東北的潮汕。結果打了敗仗，全軍覆沒。牠的殘餘份子逃入東江各縣，在這些縣份裡，一個叛亂的農民運動已開始在偉大農民鬥爭退潮之時，抬起頭來了。這就是葉賀冒險盲動的結果。

官式的解釋是這樣的：南昌暴動失敗的原因就是『敵人的力量過於強大』，此外還順便列舉幾個附帶的原因，歸入『指導錯誤』一項如下：『①沒有明顯的革命政綱；②對於土地革命不堅决；③沒有與農民連繫起來，沒有武裝農民；④沒有摧毀舊的政權機關而代以勞動者的政權；⑤其他軍事上的錯誤等。』（註三十四）如果沒有這些原因，就萬事如意了。敵人太強，我們沒有力量，沒有一個革命的政策，又沒有與羣衆連繫。但雖然如此，暴動的政策仍然是絕對正確的。

同樣的流產正發生於整個華中，甚至發生於北方若干縣份。所有這些人工暴動有個共同的特點：羣衆竟沒有史大林所預言的『驚人的響應』，倒還干脆拒絕合作。恐怕工農也是『機會主義者』吧，否則就像瞿秋白後來迫得承認的，『羣衆比我們先看出國民黨的旗幟已成了白色恐怖的旗幟』吧。（註三十五）在許多場合，共產黨人因爲羣衆的消極厭倦，便干脆不理他們，求救於和地方小軍閥的聯合。例如鄂北有共產黨員張兆豐領着一小部分軍隊，他竟和當地某軍閥聯合去反對另一個掠刼隣地的軍閥。華崗叙述道：『湖北因機會主義的影響，秋收暴動亦歸失敗。』（註三十六）同樣的策畧也應用於蘇北，當地共產黨人想和一個名叫祝逢吉（譯音）的軍閥聯合。結果也一樣。在湘鄂若干縣份裡，發生農民的散漫暴動，他們結成小隊，手執戈矛，作奪取縣城的絕望企圖。他們不斷被擊退或消滅。甚至在這樣的場合中，在場的共產黨人『也沒有設法喚起和組織工農，只是一味依賴軍事力量。』（註三十七）在上海，共產黨的江蘇省委自己設法去『喚起』民衆。早在十一月，宜興和無錫的短促的農民騷亂使該省委相信『暴動的時候現在眞的到來了』。唯一的困難就是工人受了恐怖的摧殘，對此並不感興趣。但黨却沒有氣餒，牠派出『赤色恐怖隊到各廠去威迫工人罷工，以爲如果用這種方法能夠製造（！）一個總罷工，暴動就一定勝利了。』（

註三十八）在武漢，自從在農村中的秋收暴動已一律失敗之後，共產黨又開始鼓動組織城市的暴動。共產黨的長江局首先表示異議。他們先前的『立即暴動』的命令並沒有好結果。湖北省委也同樣染了懷疑病。牠竟大胆答覆道：『現在不是總暴動的時候。』於是『機會主義』的罪名堆到牠的頭上來，而在這個打擊之下，牠就屈服了。『爲了避免機會主義的嫌疑起見，湖北省委發出一道動員和總罷工的新命令。』但是，當執行這道命令的時候一來，武漢的大多數黨員都『驚慌而逃』。（註三十九）黨的北方局於十月六日通過一個『暴動總計劃』，這個『總計劃』之乖謬一至於此，以致華崗也迫得稱牠爲『歷史的笑談的資料』。

這些糊亂塗成的革命暴動的諷刺畫一個一個的抹去了。牠們中有些似乎是滑稽之至的，但只有共產主義的敵人才忍心笑出來，因爲共產黨人在這些輕浮的暴動和更輕浮的計劃中把他們的黨打得粉碎了——而事情還沒有了結哩。

到了現在，共產黨的領袖才終於恍然大悟：原來『國民黨左派沒有存在的基礎了』。（註四十）等到秋收暴動已被人順利地壓平之後，他們才最後决定把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收起來。中國共產黨政治局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的决議宣布『暴動無論如何不能在國民黨旗幟之下舉行』，（註四十一）於是和資產階級政黨的不幸的聯盟正式終結，而國民黨『十分之九』已决意服從獨立的共產黨指導的神話，也烟消雲散。這『十分之九』的人已在恐怖之下消失了。現在，史大林的『眞理報』又突然下令作另一次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牠於九月三十日宣告『蘇維埃的宣傳口號現在必須成爲行動的口號』。（註四十二）中國共產黨現在必須在革命退潮時期拿蘇維埃的紅旗來代替飄揚於革命高漲時期的資產階級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共產黨領導機關的十一月中全會忠順地宣布即時行動的口號：『一切政權歸工農兵及城市貧民會議——蘇維埃！』（註四十三）

共產黨領導機關從葉賀冒險盲動的失敗，從秋收暴動的失敗中，得出一個熟套的結論：『葉賀失敗後，中國革命不僅未退潮，而且還升到一個新的，更高的階段。』（註四十四）

蔣介石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的政變已把革命提高到四、一二政變的『更高』階段，四、一二政變又引到武漢的『更高』階段。武漢試驗的失敗又把革命抬高到南昌暴動的平面上。秋收暴動的失敗把牠帶到蘇維埃制度的眩人的高度！這種不斷昇高的妙論使十一月全會宣布『中國的客觀局勢是這樣的：一個明白的革命局勢的持續現在和將來也不是以星期與月，而是以年來計算的。』根據這一點，就不難推出立即暴動已成熟的條件：『雖然革命已遭受大大的失敗，但中國勞苦羣衆革命運動的力量尚未衰竭，牠在革命鬥爭的復興中才開始發揮出來……綜合上述各點，中國共產黨中央全體會議不得不宣布一個明顯的革命局勢現在存在於全中國。』（註四十五）

這個估計直接造成新的冒險和新的失敗，牠是建立在這個前提上的：……因爲資產階級不能解決中國的內外問題，『資產階級軍閥反動勢力的穩定是不可能的。』（註四十六）因爲反動勢力取得政權便立即分裂爲混戰的黨系，共產黨便從這件事得出結論，認爲暴動的條件尚在。在這一點上，他們忽畧了一件小事：革命的組織差不多通通被破壞掉了。羣衆的革命情緒，尤其是城市工人的，也差不多通通冷却了。一方面被軍閥內戰及因之而來的商業凋敝弄得支離破碎，另一方面又被帝國主義的壓力所屈服，資產階級政權當然是難於『穩定』的。但是革命力量能夠拿他們自己的政權來代替牠嗎？這正是中國共產黨不能正確答覆的問題，因爲他們無法了解他們所遭受的失敗的原因和程度。他們誤認他們自己的盲動主義情緒爲民衆的一般情緒。

資產階級政權無論內部如何薄弱和不確定，但革命的沈重

失敗却保證了牠的相對『穩定』。只有羣衆重新起來推倒牠時，牠才會顚覆。在一九二七年冬他們不能這樣做，因爲當時他們尙受悲慘的失敗所壓服，這些失敗就是他們自己的領袖的錯誤造成的。他們受了束縛，他們只是站在旁面來觀望將軍們混戰及區區少數的共產黨人委身於魯莽的冒險中。共產黨無心去組織工人的日常防禦鬥爭和慢慢恢復他們的組織和自信力。他們只是留心各派軍閥的明爭暗鬥及設計取得軍火，企圖『轉變軍閥的內戰爲羣衆的反帝戰爭』，『推翻反動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註四十七）

他們和史大林一樣，期待羣衆方面底自動的『驚人的響應』。但牠老是不來。在農村中雖尙有叛亂農民及譁變士兵的隊伍，但秋收暴動的經驗已淸楚的暴露了城市工人的冷淡消極及零碎農民武裝隊伍的無能。這一點，共產黨人是看不到的。他們在武漢塌台之後採取的暴動政策只不過造成一連串失敗了。他們下結論說：『雖然如此，雖然革命又蒙受這種部份的失敗，但最近三個月的巨大（！）經驗却是雄辯（！）的證據，證明中國共產黨的全部策畧是完全正確的。』（註四十八）共產黨並沒有學會如何去組織勝利。他們只是學會如何去背誦史大林底神仙似的永不犯錯的公式。由廣州而上海而武漢，他們已經過了一次又一的失敗。這個圈子現在必須兜完。在廣州，他們再度倒向次一個新的災刧去。

第十七章　廣州公社

第十七章　廣州公社

自從蔣介石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的政變之後，廣東已不經一戰的送給軍閥了。又自從是年七月北伐軍出師，十月省港罷工取消，十二月國民政府遷都武漢之後，該省的全部統治權便落入桂系軍閥李濟琛的手中。

李濟琛急不容緩的把整個廣東放在他的軍部的鐵蹄之下。他嚴峻拑制工會並用鐵腕來運用飽羅庭的強迫仲裁制。他並沒有碰到共產黨的反抗，他們已減少他們的所有活動，向將軍們極力讓步『以保持民族統一戰線』。共產黨的政策就是『等待北伐成功』。(註一)當他們等待的時候，北伐果然勝利了，只不過這些勝利歸給蔣介石和中國資產階級，結果造成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的上海事變吧了。李濟琛迅速響應蔣介石的發動，於四月十五日實行他自己的淸黨。一切尙享有合法存在的組織均遭搗毀和封閉。兩千餘人被捕，至少有一百個男女（多數是共產黨員）被槍決。省港罷工的殘餘糾察隊經過幾度劇戰之後通通被繳了械，兩千餘受共產黨影響的鐵路工人被李濟琛的軍隊驅逐棄職，代之以受最反動的機器工會支配的工人。李濟琛既然以蔣介石的馬首是瞻，他當然懂得維持工人階級組織底外殼的價值。他奪取牠們的機關，把這些機關讓給那些稱爲『工會改組委員會』的流氓走狗。同樣的事變也在全省各縣市發生。在農村中，農民往往抵抗軍隊的襲擊。但農會終於受摧毀了。

共產黨現在必須要補償他們的消極。他們宣佈於四月廿四日舉行大罷工，抗議李濟琛的進攻工會。這次罷工沒有實現。往後幾個月，廣州和全廣東的共產黨人普遍被迫到深深的地底下。僱主們向工人發動攻勢，結果把他們在省港罷工高潮時期得來的工資，工時及工作狀況等方面的每一宗勝利品都剝奪了。著名的廣東工人代表會，這個雛形的蘇維埃不到一年前還代表二十萬各業工人 ， 現在也消滅了。有一個非法的『特別委員會』代替牠在活動，這個特別委員會由幾個從前的代表會執委及少數新選的代表構成。這個委員會號稱支配廣州的一百個工會。六月，牠自詡能動員三千工人左右舉行示威紀念沙基慘案及省港罷工。（註二）縱使這些自詡是眞的，但比之最近的過去却微乎其微了。

大多數工人的冷淡在共產黨內部產生了恐怖主義的情緒。工人共產黨員因爲無法動員工人起來抵抗資本家的攻勢，他們竟作一連串無望的徒勞的企圖，用炸彈來嚇退李濟琛的改組委員會的會員。據黃平說，當時甚至還密謀暗殺李濟琛。後來因爲安放的炸彈未爆炸，計劃遂告失敗。（註三）這些絕望的工人和共產黨人採取個人恐怖主義的辦法，共產黨尙正式以『赤色恐怖』的美名來表彰。

有時爲了保障革命的勝利品也難免需要到赤色恐怖；到時牠就是一個勝利的工人階級的政府所頒布的審愼手段，藉以對付那些公然反抗或危害政府的敵人。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奪取了政權很久很久之後，一直等到敵人謀及布爾什維克黨領袖的生命及開始積極組織反革命的武力，牠才對敵人加以嚴懲，這件事與用個人恐怖主義的方法來對付當權的反動政府的工具，毫無共通之點。布爾什維克主義就是在反對這種方法的鬥爭中生長起來的，因爲這種方法並無補於羣衆的動員，只有助於他們的癱瘓。在一個革命組織裡面，恐怖主義傾向的出現就是這個組織底無能或墮落的可怕的徵兆。（附註一）

廣東共產黨人先前曾拿『等待北伐成功』的高見來掩飾他們的消極態度，現在他們又和先前一樣，拿『東征』的希望來掩飾他們的束手無策，因爲他們（連同莫斯科領袖）通通都滿以爲武漢政府一定就要舉行討伐蔣介石的『東征』。等到武漢不討蔣，反而投降蔣的時候，又發出這種呼聲：『等待葉賀！』至九月末，共產黨人預期葉賀軍隊開抵廣州，他們趕忙立定計劃，擬舉行暴動來響應。後來他們守候的救主在潮汕潰敗了，暴動的計劃便暫時放棄。（註四）

在廣東，一直等到葉賀失敗之後，共產黨人才採用『打倒國民黨！』的口號。（註五）在十月十四日那一次有計劃的示威裡，這個口號才第一次帶到街頭上。換言之，自國民黨政府出賣和無條件取消省港罷工之後已過了一年零四天；蔣介石的三月政變也過了一年半，在這個悠久的歲月中，廣州工人已被國民黨的軍隊槍殺，被監禁在國民黨監獄中，他們的組織也被國民黨的一紙命令剝奪，到了這個時候，共產黨才正式准許廣州工人高呼：『打倒國民黨！』那末，在許多工人看來，用匕首，手鎗，小刀或炸彈來對付國民黨的工人『領袖』似乎較之共產黨的政策更有效果，這還有什麽希奇呢？又大多數廣州工人過去曾懷着如是樂觀和希望踴躍加入他們的組織，到了現在這個時期，他們的同等人數又陷於痛苦，失望，憤世嫉俗，脫離了有組織的活動場所，這又有什麽希奇呢？

但是雖然離心力的強烈作用使共產黨牢牢地孤守和擱淺在昨天底錯誤與今天底荒唐幻夢的暗礁之上，在廣州尚剩下一小部份工人，他們的鬥爭意志經過運動的一興一衰，尚堅固如常。他們就是昨天龐大底羣衆組織的最優秀的戰士，少

（附註一）安德華·馬爾勞在他的兩本關於中國革命的書（征服者和人之命運）裡，描寫中國的青年恐怖主義者因爲共產黨缺乏革命政策，迫得去使用炸彈和手槍，他們述他們中有一個於上海四月政變之前夜，謀炸蔣介石。

數曾在革命歷史中寫過輝煌一頁的省港罷工糾察隊，工人赤衛隊的殘餘，及一部急進的，失業的鐵路工人。這些工人在整個革命的過程中曾作過極大的犧牲，他們在廣東曾把自覺的政治理解發展到了最高度，國民黨最初在南方取得權力時，他們的作用也幾乎是決定的。共產黨得到這一羣受過鍛鍊的工人，牠無異從革命的破船中撈回一份驚人的財寶。經過小心的培養和適當的領導，經過頑強的鬥爭並憑藉一個正確的政策，這些幹部就一定可以重新替共產黨打開到領導之路，這條道路現在已給過去的殘燼攔斷了。但共產黨却不懂得『退却的必要』，不能領導廣州工人的防禦鬥爭——這是恢復牠底影響，威望及領導權的唯一道路——牠現在反而準備推使牠的最後的無產階級力量舉行絕望的進攻，這種進攻，無論從客觀和主觀的每一個條件看來，都是預先注定要失敗。

廣州的政權當時分掌在李濟琛和張發奎兩派敵對力量的手裡，他們的火併已迫在眼前。張的政治門面當然由汪精衞來粉飾，他和汪計劃舉行一次政變，把李趕出廣州。上海的共產黨中央預知這一政變，遂向廣東省組織發出如下的訓令：『廣東的工農羣衆只有一條出路……即，利用政變所造成的內戰時機，堅決擴大城市和農村的暴動……在軍隊中鼓動嘩變，並在戰爭期間，迅速聯結這些暴動爲總暴動，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蘇維埃)的統治。』(註六)羅佐夫斯基的神氣十足像一個醫生剛剛不留心弄死了一個病人。現在來舉行屍體解剖一樣，他在一年之後寫道：『不錯，有劇烈的鬥爭在張發奎和李濟琛中間發展起來，但暴動者應該知道，叛旗一舉，反革命陣營中的爭執就要立即停止的。』(註七)在中國共產黨領袖應該知道的東西，與羅佐夫斯基輩及其他所有共產國際的寶貝們教給他們的東西之間裂開一條大裂隙，中國革命就是跌入裡面毀滅掉的。將軍們在互相混戰之前將千倍聯合起來反對暴動，這件事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固然昭著，在革命的所有已往的時期

也一樣昭著。共產國際從前不懂得這一點，現在也不懂得這一點，中國共產黨是在共產國際執委會及其駐華新代表的直接訓令之下，被迫而走暴動的道路的。這些駐華新代表最先是羅名尼茲，後來就是冒險大家漢茲·牛曼（Heinz neumann），牛曼現在已抵達廣州，給中國共產黨以必要的暴動『指導』。

張汪政變果然於十一月十七日舉行了，敵對將軍們的軍隊互相對峙備戰，戰線起自廣州四十里外並從北江各縣伸展至汕頭。十一月二十六日，共產黨决定立即準備暴動（註八）並於數日後規定十二月十三日爲暴動日期。（附註一）據漢茲·牛曼說，共產黨領袖『深信一切勝利的條件都具備，成功……是有把握的。』（註九）

實際上，照當時的情形看來，縱使廣暴勝利，全國也沒有餘力能夠出來支持牠。加之以，廣州和全廣東本身的現存的力量交互關係也不能造成這一勝利。僅僅到了後來，漢茲·牛曼和羅佐夫斯基輩才承認這是當時的實情。廣東的暴動者在他們的計劃裡寄很大希望於東江海陸豐各縣暴動農民的合作，海陸豐距離粵垣一百五十里，五年前，澎湃（附註一）廣暴來得特別『湊巧』，牠竟和聯共十五次大會同時舉行，史大林就在這次大會裡完全打敗反對派並實行全體開除黨的左翼。托洛次基曾寫道：這次暴動恰合其時的給史大林派多數在中國造成一個『勝利』，『以掩蓋俄國反對派的肉體上的消滅。』——中國革命問題集第三九一——二頁。參閱維多·綏奇的從列寧到史大林（一九三七年，巴黎出版），第三十一頁；維多·綏奇的二十年後之俄國（一九三七年，紐約出版），第一六〇頁；波利斯·蘇瓦林的史大林傳（一九三五年，巴黎出版），第四三四頁。有一小羣國民黨左派的亡命客（包括孫夫人，陳友仁，鄧演達等）當時適在莫斯科，他們後來告訴本書作者說，他們也有理由相信廣州事變是故意迫成，以便在第五次大會中造出必須的『空氣』的。

就在那裡撫育了近代的中國農運。澎湃現在拿這個地方做根據地，藉葉賀殘部之助，產生了第一個農民『蘇維埃』，這種『蘇維埃』在隨後整個時期內，成了共產黨底政策的基礎。自十月末以來，海陸豐的農民蠭起已引動東江及海南島兩三個縣份農民零零碎碎起來鬥爭。假如拿全國的形勢來看，這些農村騷亂的小小中心只是過去底時機的過遲的回音而已，這些時機已無可挽回地錯失了；但廣州的共產黨人却把這些叛亂中心看成萬倍的大。他們認爲這些小中心就足以保證全國起來援助他們了。一年多之後，羅名尼茲招認：『我們當時分明把農民暴動的發展誇張太甚。』（註十）

當時全省和全國的一般情形姑置勿論，光是拿共產黨舉行暴動的軍事力量與鎭壓暴動的反動軍事力量比較一下，我們就可以得到未來結果的可怕的豫告。陳紹禹（附註一）搜集參加暴動者的直接報告，發現『統治階級駐守廣州的武裝力量超過暴動者的力量五六倍』。（註十一）陳紹禹又綜合共產黨軍長葉挺，『A同志』（大概是牛曼）和廣州革命軍事委員會各方面的報告，估計革命派的軍火，其最高數字如下：『手鎗和自動手鎗最多三十枝，手榴彈最多二百只；工人手上的步鎗最多五十枝；兵士手上的步槍最多一千六百枝。』（註十二）牛曼的報告說工人赤衞隊只有二十九枝毛瑟槍，及二百個左右的手榴彈——沒有一枝步槍。（註十三）暴動指揮的唯一軍隊就是教導團，由未受職的軍官和從前的黃埔學生構成，內中共產黨員約佔兩百人。（註十四）參加暴動者的有眞正數目，據葉挺說有四千二百人，內中教導團佔一千二百人，赤衞隊及其他佔三千人。『A同志』估計只有二千人，加上教導團總共只有三千二百人。（註十五）

據葉挺說，廣州市當局有七千武備優良的隊伍可供調遣。

（附註一）後來就是鼎鼎大名的王明，中國共產黨總書記，抗戰後又加入國民黨的國民參政會。

內有五千士兵，一千警察和受反動的機器工會支配的一千流氓。士兵包含步兵，機關鎗手和炮兵等部隊。他們總共保有五千餘枝步鎗，大量機關鎗，三十五尊小型迫擊炮和大炮。（註十六）這還只是市內的軍力，在江上尙有幾隻中外炮艦。在市郊尙大約有四團兵駐守着，又在二三日路程外，尙有張發奎和李濟琛的聯合軍隊，總數不下五萬人，武備優良，訓練亦好。在這些軍隊中，共產黨的影響沒有存在，甚至連一點影子也沒有。牛曼也承認：『廣大的兵士羣衆完全不理睬共產黨的口號……』（註十七）羅佐夫斯基寫道：『我們並沒有做一番準備工作，使敵人的軍隊瓦解……』這件事『預先決定了暴動的結果』。（註十八）牛曼在他事後的報告裡，承認衆寡懸殊。『但假如人們考慮到，』他可憐地補充說，『資產階級的軍隊四面八方被革命的激盪包圍着，上級機關在政治上不能依賴這些軍隊，人們就可以說，廣州的軍事力量是勢均力敵的。』這就是牛曼自己解脫的唯一企圖。他的報告的其餘部份都是自己打自己嘴巴的。（註十九）

『革命的激盪』大到這樣程度，共產黨竟不敢號召一個總罷工。當牛曼和共產黨的委員會考慮暴動的戰畧時，他們偶爾也想及號召這一罷工，但後來這個念頭放棄了，據牛曼說，『因爲在革命委員會看來，假如他們乘敵人無備，突然夜襲弄不成功，則勝利的機會似乎微乎其微了。』（註二十）黃平是革命委員會之一員，他記載道，委員會『一致』決定舉行暴動而不舉行罷工。（註二十一）本來共產黨於十月二十三日曾作最後的嘗試，想號召工人出廠罷工，結果失敗了，因爲張發奎採取迅速和野蠻的手段把罷工的所有準備工作都破壞了。大約一星期之後，汪精衛又對共產黨影響的殘餘力量施行進一步的打擊，他迫逐省港罷工糾察隊離開他們尙在市郊據有的公共宿舍。汪精衛，這位共產國際晚近的偉大同盟者，實現了一件連當時的軍閥也畏縮不敢爲的任務。糾察隊被驅散了。只有五百人左

右尙留在共產黨手中。（附註一）經過這些經驗之後，共產黨領導機關連想也不想起罷工這兩個字了。他們唯有暴動。『共產黨不能組織罷工。他們不能停止全市的經濟生活。他們不能吸引工廠和作坊的無產者加入（革命）運動……等到槍炮的吼叫聲已傳到耳鼓，巷戰已在進行，工人羣衆才知道暴動發生……（羣衆們）把這次暴動看爲一件突然的，偶發的事情。』（註二十二）

同時，同等『突然的』，看起來似乎『偶發的』就是『蘇維埃』的出現，牠的名字現在寫在共產黨的旗幟上了。暴動之前四天，在一個秘密會議裡選舉出十五個人，其中九個人代表受共產黨領導或影響的工人小團體，三個人代表教導團，其餘三個人則假定是代表廣東農民的。（註二十三）這十五個人便組成『廣州工農兵代表會！』他們決議等到奪取政權之後，這個『蘇維埃』就擴大爲三百個委員。

每一種革命的觀念都受共產國際的史大林化的領導機關歪曲的，蘇維埃的觀念也一樣被截切得不辨本來面目。什麽叫做蘇維埃？首先，牠就是一個選擧的工農兵代表團體，這個團體以勞苦大衆各部分的最廣泛的選擧爲基礎。牠是最廣大的無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表現。是在驚心動魄的革命蠢起的時候產生的。牠脫胎於罷工委員會，行動委員會及其他地方團體，牠一度產生之後，便把那些尙未受任何政黨影響的叛亂羣衆的廣大部分，吸入革命運動的軌道中。牠的價值就在這一點：牠有機地從羣衆運動本身生長並成了直接表現羣衆底意志的特別政權。羣衆在蘇維埃內受政治訓練，而由於各個時期的衝突增高，這種政治訓練也被千倍的加速了。在蘇維埃內，他們從革命浪潮高漲以至奪取政權，在鬥爭的每一個階段中都得到指導和訓練。蘇維埃組織和完成了暴動之後，牠就成了新興革命政權的機關了。這種蘇維埃的概念是經過三次俄國革命的經驗形成和試驗

（附註一）牛曼說只有三百人。

過的，牠現在在史大林的統治下消失了。史大林並不把蘇維埃視爲革命鬥爭整個過程連帶產生的機關，他認爲牠是在奪取政權之前夜才能產生的機關。這種歪曲蘇維埃底性質和作用的見解在廣州得到其適切的奇怪表現。（註二十四）

即使我們暫時假定廣州暴動是在羣衆運動高漲，要求奪取政權（這在當時也不是很遠的事情）的時候計劃的，但倉卒推選一個蘇維埃也是不可能的，甚至還是不必要的工作。在這種情形中，先前羣衆運動的生長如果不是已經採取蘇維埃的形式的話，牠一定已發展另一種同樣合適的組織，能夠準備羣衆和領導他們去奪取政權。在廣州，這些條件一個也沒有。既沒有高漲的羣衆運動，也沒有產生一個選舉的蘇維埃的根據——至於另外任何種組織都不是什麽蘇維埃。

托洛次基並不是完全不熟習那種現象的，他寫道：『產生一個選舉的蘇維埃並不是一件易事。羣衆必須從經驗中知道什麽叫做蘇維埃，他們必須了解牠的形式，他們又必須在過去曾學會一點東西，使自己熟習於選舉的蘇維埃組織。關於這一點，在中國連影子也沒有，因爲正當蘇維埃的口號應該成爲整個運動的神經中樞的時期，人們却宣佈這一口號爲托洛次基主義的口號。但是當他們手忙脚亂指定暴動日期，藉以跳過他們自己的失敗之時，他們同時又不得不指派一個蘇維埃。假如這個錯誤不加以澈底暴露，蘇維埃的口號就能夠變爲革命的一條絞索的……

『蘇維埃的任務不僅是號召暴動或實行暴動，而且還是領導羣衆通過必要的階段走向暴動……羣衆在行動時必須知道和了解蘇維埃是他們的組織，了解牠是爲鬥爭，爲抵抗，爲自衞，爲進攻而集合的力量。他們不是從一天的行動，也不是一般的從任何單一的行動，而是從幾個星期，幾個月，或許幾年的經驗中才能夠知道和了解這一點……與此相反，不肖門徒們已把蘇維埃改變爲一種組織檢閱的制

服，黨在臨近奪取政權時簡單的把牠穿在無產階級身上。但這個時候我們恰好又發覺蘇維埃不能爲武裝暴動的直接目的，於二十四小時內下令草率成立。像這樣的試驗必不可免要帶着一種虛構的性質，而蘇維埃制度之外表的儀式却揭破了奪取政權的最必要的條件之缺如，這就是廣州的情形，在這個地方，人們簡單的指定一個蘇維埃奉行儀式……倉促產生來奉行儀式的蘇維埃只是冒險盲動的假裝吧了。』（註二十五）

劇塲是建築來排演悲劇的。共產黨碰到全國羣衆的冷淡，牠陰謀在廣州造成一個暴動。指定十五人的『蘇維埃』來掌握明天的政權，這件『瑣事』也是熱狂的準備工作之一。壓倒的優越力量準備毀滅他們。大多數廣州工人沒有絲毫懷疑他們將要遭遇什麼。只有行將應召而起的工人和士兵的無比的英雄主義來抗拒這種力量。

在最後一刻鐘，全盤計劃幾乎失敗了。（註二十六）當其時，汪精衛已赴滬和蔣介石開一個政治會議。據黃平說，他在滬偵知共產黨的計劃並電廣州張發奎，促其注意。張馬上打電話給他的主要助手黃琪翔（舊鐵軍的不可一世的『革命英雄』之一），囑他從前線趕回並調遣充足的軍隊來增援廣州駐軍。黃於十二月十日晨抵廣州市，他後面帶着一枝軍隊，數小時才走完。這些發展並沒有使謀亂者停足不前。革命委員會從這些發展中得到的唯一結論就是趕快暴動，原來規定的日子是十三日，現在又改爲十一日。

十日晚七時，赤衞隊開始在他們的指定地點集合。命令火速傳達於教導團各營，爲時不過數句鐘，萬事已定了。在那天晚上，事情又幾乎弄失敗。當局已起了提防心。大量警察巡邏隊和鐵甲車擁塞街上。在一切重要交通路口，行人均遭搜查。傍晚，赤衞隊的集中地點，有一個眞正發現了。九十個赤衞隊被捕並搜去六十只手榴彈。暴動者一時躊躕起來，但現在翻改事已太遲了。他們遂向赤衞隊下令如事洩則拒捕。計劃現在必須實現，管牠發生什麼後果。

往後數小時，全市均沉寂如故。午夜，多數警察巡邏隊都放心離開街頭。早晨三時三十分，沉默終於被城北角的槍聲衝破了。教導團已起事。團長和幾個軍官被逮捕和鎗殺。教導團士兵爬上預備好的汽車，每一隊或兩隊分成一組，分頭疾駛入市，趨向選擇好的攻擊地點。同時赤衞隊也參加行動了。

最先的閃電襲擊幾乎完全成功。在城內幾個地點，敵軍均被繳械或經過短促的劇戰之後驅散了。有大量的步槍供給暴動者的需要。在市中心區，工人和教導團士兵的聯合武裝猛襲而且迅速佔領公安局及位於同街對過的警備團部。在張發奎軍部及李濟深的堡壘似的公館中，機關槍的可怕的掃射迫退襲擊者，使不得越雷池一步。黎明，全市大部分已在暴動者手中，但這幾個地點尙負隅頑抗，繼續戰至翌日。

十二月十一日晨六時，廣州的『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在公安局正式成立，並開始充當事實上的廣州政府，行使職權。當時只有十三人出來成立『蘇維埃』。有兩個當選的農民代表沒有及時趕到參加。政府幹的第一宗事就是釋放一千多政治犯，他們多數立即加入暴動。從敵人方面奪得武器立即發散出去。『蘇維埃政府』第一批命令頒佈時，市內尙響着炮聲。

革命政府的宣言數日前已印好，但這些宣言尙未出店，而承印該項宣言的印刷店却恰處於炮火線上，無法抵達。於是由佔領區的印刷店趕緊印出新傳單。汽車被徵發了。青年宣傳員駕着牠們在廣州工人中散發新印好的傳單，讓他們曉得革命終於發生，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已終於被蘇維埃的紅旗代替了。宣言號召沒收大資產階級，銀行，錢莊的財產。富人的房屋改爲工人寄宿舍。沒收當店，將質物無價發還原主。『我們的所有烈士都爲此而鬥爭及捐軀。我們必須繼續他們的奮鬥。』今天的鬥爭只不過增加殉難者的名字吧了。

廣州公社的政綱宣布八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由國家照原薪津貼失業工人，一切大工業，交通事業和銀行國有化，承認中華全國總工會爲中國無產階級的全國組織。牠又宣佈土地歸國有，殺盡一切土豪劣紳，燒燬一切田契，租約，債券，消滅田界，各村各區成立蘇維埃政權。沒收和分配富人的財產，救濟城市貧民。當鋪和高利貸者的債務均下令取消，而強迫勞苦羣衆負担的苛捐雜稅亦宣布廢除。此外尙向勞苦大衆宣布武裝工人，立即釋放一切政治犯，言論，出版，集會自由，及組織和罷工之權利。

拿中國革命中共產國際政策已往的整個方向來看，廣州公社的政綱是極有意義的。因爲中國革命是一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共產國際的理論家便認爲無產階級專政的前途是不可能的。據史大林和布哈林的官式公式，這次革命的結果不是產生無產階級專政而是產生『工農民主專政』。這個『民主專政』又模糊的假定爲完成革命的民主任務及替無產階級專政開闢道路的過渡政制，但無產階級專政的到來却是遙遙無期的。托洛次基認爲民主任務只能由無產階級專政完成，因爲實現這些任務而沒有社會主義性的手段（侵犯資產階級財產的手段）是不可思議的。爲了這一點，托洛次基屢屢被人駡爲想『跳過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階段』。但是當中國共產黨在廣州制定政綱時，他們迫得要公佈托洛次基描寫爲『比之十月革命開始實行的更急進的手段』。托洛次基問：『如果這也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方法，則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將來又是什麼樣的革命呢？』（註二十七）

這個問題當然無法在廣州找到答案。廣州公社中人還沒有覺悟到他們已如何接近於『托洛次基主義』的大罪，他們除公布他們的政綱之外已來不及幹別的什麼事情了。十二月十一日中晨，國民黨的軍隊已開始反攻。在六個營寨中，工人和士兵已絕望地設法擊退那些每小時愈來愈烈的反攻。廣州工人羣衆仍是消極的旁觀者。在他們看來，這次

暴動是『一件突然的，偶發的事情。』他們自知與這一小羣人不同，這些人正在他們眼前表演勇壯的奇蹟。他們根本想不到在公安局發施號令的『蘇維埃』就是他們的，就是無產階級政權的機關。在這些緊張絕望的鐘點內，有誰甚至來着手喚醒他們，吸引他們加入鬥爭的工作呢？『……工會的積極工人，領袖和黨支部的負責同志多數加入赤衞隊。……他們都在軍營中。沒有一個去做動員羣衆的工作。』（註二十八）

廣州大多數工人和手工業者站在鬥爭外面。沒有總同盟罷工的號召。只有少數汽車夫，印刷工人，人力車夫及其他若干工人踴躍抛開工作，拿起槍來。（註二十九）鐵路工人和內河水手尙繼續上工。他們運輸軍隊來鎮壓暴動。他們幫助國民黨的官員逃離該市。

葉挺於暴動前六小時才趕到，握軍隊總司令之權，他後來報告道：『羣衆沒有參加暴動。所有店鋪都關了門，店員也沒有表示擁護我們的意思……多數兵士經他們繳械之後便在市內逃散。暴動沒有顧及三大鐵路線上鐵路工人的困境。反動派尙能利用粤漢路……電燈廠工人斷絕電火供給，我們不得不在黑暗中工作。省港工人和海員通通受了英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不敢加入作戰……內河海員竟可恥的替白黨服務，他們幫助他們渡江，而我們則連幾個搭船的地點還無從偵知。廣九及粤漢兩路工人傳遞敵人的電訊及輸送他們的軍隊。農民沒有幫我們破壞公路，也沒有設法阻止敵人進攻廣州。香港工人沒有對暴動表示半點同情。』（註三十）

牛曼對這次失敗負更直接的責任，他說他覺得葉挺估計這次暴動中羣衆的作用並不是完全正確的，但他『整個說來，却和他的意見一致。』他自己的報告也無可隱瞞的反映同樣的事實。『大多數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沒有給這個新政權以充分積極的支持……鐵路工人，市政工人，香港海員及其他工人都沒有停工……小資產階級大部份採取觀

望態度……在暴動的時候，在廣州附近各縣的農民中沒有重大的革命運動……（海陸豐和海南島的）農民完全陷於孤立；不能希望他們有所接濟。廣州暴動得不到中國其他省份無產階級羣衆或革命農民底任何干涉來支持……』（註三十一）

因爲公社突然出現。有少數，或許數千廣州工人滿懷希望的起來行動，這件事是沒有什麽疑問的。但充其量他們仍只是可憐的少數。鄧中夏說：『不錯，不是全體廣州工人參加……但有些人說只有五千人參加。這是……造謠。確實有兩萬餘人參加。』即使是這樣，鄧中夏也想了一下再說：『但我們仍然不得不說，牠的社會基礎並不是廣大的。例如，國民黨叛變之前，在共產黨的工人代表會底下有二十萬工人左右。』（註三十二）

這是不到兩年以前的情形。廣州和全廣東的工農曾用他們自己的武裝和他們自己的力量，使舊軍閥的軍隊癱瘓，使大英帝國的香港死氣沉沉，而且使全省得以統一，國民政府得以成立——可惜的只是替國民黨，替資產階級服了務吧了。但是在當時，主張工人暴動，主張擴大雛形的蘇維埃（工人代表會及全港罷工委員會）爲包容幾千百萬羣衆底熱望和衝動的廣大民主機關，這種思想却是一種不可思議的褻瀆，只有在托洛次基的心中才能生得出。今天，拿鄧中夏的數字來說，他們的組織力量已縮減到從前的十分之一弱，革命也到處冰消瓦解，反動到處奏凱，共產黨在這個時候才在蘇維埃政權的旗幟之下舉行暴動——只可惜羣衆已不復跟他們走了。才不過兩年之前，共產黨人曾彷彿從千里鏡的大鏡頭窺見他們的力量非常微小和無能，實際上牠們却是難於置信的強大。今天，他們又從小鏡頭窺見牠們放大到無數倍。他們從沒有看清他們底力量的眞實程度。成千成萬曾一度跟隨他們的人現在都走掉了，因爲這些人對他們的希望已完結了。

幾隊青年宣傳員從政府各機關走出來，用口頭和傳單傳佈

一個消息，稱一個廣大的羣衆大會將於十二月十一日中午舉行。到了指定的時候，只有三百人出席。（註三十三）領袖們忍着滿肚子氣惱，稱之爲『代表會議』。甚至連全體政府人員及黨領袖的聯席會議，連續指定兩次時間都開不成功。這些人不是在軍營裡，就是不能來。當晚又決定原定的羣衆大會於翌日（十二月十二日）中午在太平戲院前召集。關於這次會議，黃平（他被舉爲蘇維埃的『外交委員』）沒有提到一句話。鄧中夏（另一參加者）說沒有召集成功。（註三十四）陳紹禹（他好在當時不在廣州而在莫斯科）說一萬工人參加會議，批准蘇維埃的法令。（註三十五）縱使陳紹禹所說是眞的，一萬工人集攏起來傾聽蘇維埃寥寥幾個人的演講只能是兩年前五一節底回憶的一種痛苦的銓釋而已，當時有這個數目二十倍多的羣衆遊行廣州市，表現了無產階級力量的強大。根據這次羣衆大會的議事日程看來，相信十五人組織的蘇維埃的職權已得到承認，牠的手段的法令也得到批准，且擴大蘇維埃爲三百人的提案也通過。究竟這些措施有否實現並沒有明文紀錄。但事變迅速把這一點弄成無關重要，因爲十二月十二日下午軍隊正雲集襲攻廣州市，一塲血戰已發生，工人和兵士賴着步槍，竹劍和戈矛，在殺人如麻的機關槍和輕炮的炮火之下，固守他們的陣地。

正當作戰的時候，在中心市區發生幾次火災。當然人們都罵是共產黨放的火。實際上幾次大火（中央銀行及鄰近建築物也燒燬了一部分）都可直接追源於珠江方面對市內的炮轟，因爲當時珠江上的中英日三國炮艦正合力剿滅蘇維埃。牠們實行幹起來，掩護張發奎軍部的防守，又用沉重的炮火，掩護軍隊渡江，這些軍隊現在正大隊趕來重奪廣州。炮彈轟着火藥庫，引起大火，把鄰近所有馬路都燒着了。（註三十六）而且，市內的作姦犯科之徒，已利用暴動幹他們自己的勾當。『土匪乘機焚掠』。（註三十七）當李福林的軍隊一到，兩隻中國炮艦向市內連珠炮轟，結

果，據北京益世報說，在十處引起大火。（註三十八）

敵軍從三方面會攻廣州蘇維埃。張發奎，黃琪翔，和李福林由駐泊江上的一隻炮艦掩護作戰。薛岳也是調軍來鎮壓蘇維埃的軍長之一，他在九個月之前還想把他全師軍隊獻給共產黨去反對蔣介石的上海政變哩。從西江，從北面的公益，從東面的黃浦和河南，不下四萬五千兵士捲入作戰。在市內，成千武備優良的土匪已幹起來。赤衛隊的主力部隊駐守在長隄的沙包後面。牠受到對岸的軍隊，炮艦和後方機器工會的流氓襲擊。蘇維埃在人民中已陷於如是孤立，以致幾枝敵軍登陸，衝到革命委員會機關一百五十碼之內才察覺。(註三十九)但他們仍死守至十三日晨十時。經過一場流血的肉搏戰之後，工人們被迫退出他們的沙包營壘。他們從一條街退到一條街，且戰且走。有些領袖糾合一部分教導團和赤衛隊——牛曼說他們總共有一千五百人——逃出敵軍的警備線，離開廣州，逕赴海陸豐去了。（註四十）正午，蘇維埃的殘軍在公安局（即『蘇維埃』匆促柄政的所在）作最後的掙扎。此處自四面被圍之後，最後一批赤衛隊作了兩小時的殊死戰。防守者僅有純潔的頭腦及勇氣來抵敵進攻者所享有的武器上與數量上莫大優勢。黃慕松的黃埔軍五次衝襲工人防線，每次都被擊退。午後不久，紅旗終於從公安局上扯下來了。

蘇維埃昨天才成立，今天已塌台了。在牠的最後數小時間，只有幾隊工人的絕望的英雄主義而已。這些工人以十人，三十人，五十人爲一隊，死守至子彈已盡或被進攻者擊倒和殺死才罷休。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廣州蘇維埃的最後一批保衛者已被肅清。

資產階級作者不寒而慄的，指十二月十一至十三日的廣州事變爲『恐怖的三日』。蘇維埃在牠短促的存在期間，只殺死了牠的敵人二百一十人，監禁了七十一人。（註四十一）一位中國資產階級訪員統計在蘇維埃政府之下遇害者的總數爲六百人，內中包括蘇維埃抵禦國民黨的反攻而殺

死的人。還沒有等到中國的加利法（Gallifet）於十二月十三日晚動手幹之前，恐怖狀態已開始了。李濟琛，張發奎和黃琪翔放縱他們的軍隊在市內爲所欲爲。眞正的戰事久已結束之後，街上響着劊子手的卜卜槍聲，血流成河，工人的死屍纍纍堆疊。

大公報一位訪員瞧見女共產黨人『被浸透煤油的棉被裹着活燒』。（註四十三）軍隊一發現女人剪了頭髮，便視爲過激主義的無誤的證據，把她捉起來。幾百個年青女子或遭槍斃，或經過難以形容的侮辱之後被弄死。（註四十四）一位身歷其境的訪員發出電報道：『工農暴動壓平之後，廣州宛如地獄……未經淸除的屍體沿路堆積。』（註四十五）北京順天時報的一位訪員大胆跑出街上。『我在巷口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個工人的屍體仰臥着。牠滿身濺污。頭上有一條紅巾。額頭和右頰已被槍彈打去。蒼蠅雲集死屍上。……在斷垣殘壁後面，靠樹撐着，在馬路上邊躺着，在江面飄浮着，到處儘是死人……各馬路到處都是被殺的男女屍體……血流成河……地上污染着赤黑色凝塊，塗滿腦漿和腸臟。石頭，竹劍和木槍尙散置街上……死屍殭臥在血泊中，臭氣薰天……在公園裡，我瞧見三輛貨車高高堆滿屍體。在右面樹叢裡有十個死屍，似乎是剛剛槍斃的……有痛苦的呻吟聲，而遠處槍斃似乎仍在進行。』（註四十六）上海某報編輯在一幀廣州馬路死屍的照片下面題着：『死屍積聚如柴堆，由卡車裝去公共墳場埋葬。』（註四十七）革命委員會首腦張太雷的屍體及五個俄人的屍體也雜在其中，前者於十二日戰死，後者則於十五日李福林軍隊攻襲蘇聯領事館時被槍殺。多數領袖均設法逃走。據葉挺說，漢茲・牛曼是頭一批逃命者之一。他們讓廣州無產階級的精華奇形怪狀地飄散在廣州街道上，走掉了。這次犧牲了五千七百人。

國民黨的『革命的將軍』是殘酷的屠夫，這早已是一件既成事實了。誰是這次廣州罪惡的眞兇呢？無名死者的公墳

尙未蓋土，廣州共產黨人已煩言嘖嘖，譴責廣東省委應負此次屠殺的責任。（註四十八）但這些煩言旋即平靜，因爲難道省委是獨行己是的嗎？牠不是服從中央的指導嗎？而中央又不是服從史大林的指導嗎？拒絕暴動政策是不可能的，因爲牠是直接來自克林姆宮的。廣州的驚人罪惡當然要加以辯解，爲的是再度保持永遠正確的領導底神話。最先趕忙做這件事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局。牠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通過一決議案，題爲『廣州暴動之意義和教訓』，牠在這個決議案裡明白宣稱：

『只有懦怯的機會主義者才能稱這次暴動爲幼稚行爲，盲動，軍事陰謀。這種機會主義不存在於共產黨的廣州支部或中央委員中。十二月中的廣州暴動是整個階級鬥爭發展及客觀情勢的不可避免的結果。工人階級除直接起來奪取政權之外別無出路。』（註四十九）

這個決議案繼續指出暴動是共產國際及中國共產黨中央底決議的『不可避免的結果』。牠追憶道：武漢政府塌台之後，『共產國際執委會及中央八七會議均認爲中國已有了直接革命形勢。這個分析完全與事實相符。』（註五十）南昌暴動，葉賀南征及秋收暴動的失敗當然不是由於誤解局勢或暴動政策的錯誤，而是由於『領導的錯誤』，這些錯誤已由十一月全會糾正了。全會又已正確的指出：『革命力量不僅沒有削減，而且在不斷的增長』，暴動問題尙是『議事日程上直接問題』。因此，遠在十二月，『（在廣州）已具備了無產階級暴動的一切條件』。在這個時機，延遲暴動就一定『引起極厲害的白色恐怖』。暴動失敗及直接致令幾千工人遭受無必要的屠殺，這又僅僅是由於一連串不相干的『錯誤』，如『準備工作不夠』等。於是結論又是這一套：『中國的一般形勢尙是一個直接的革命形勢』，『廣州暴動後，中國資本主義穩定的前途不僅沒有改善而且無限的縮小了。』因此：『暴動問題……及蘇維埃政權問題是實際的，當前的問題。』末了號召全黨『

加緊』組織新暴動。（註五十一）

一個月之後，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九次全會採取同樣的立場，拿泛泛的『盲動主義傾向』的警告來掩飾。廣州暴動不是盲動而是『無產階級建立蘇維埃政權之英勇的嘗試。』牠只是吃了『指導機關的一些錯誤』的虧，在這些錯誤中有準備不夠，『沒有廣泛的政治罷工，沒有選舉的蘇維埃以爲暴動之機關』等，對於這些，『N同志等』應負責。『雖然有這些指導方面的錯誤，但廣州暴動應當認爲中國工人極大的英勇精神的模範。』（註五十二）共產國際决議案的作者懦怯地企圖躲在廣州工人的英雄主義後面，希望藉此掩蓋他們過去的錯誤，這些錯誤他們現在也承認，牠們已『招致工農的最沉重的失敗……招致共產主義運動一部分幹部的消滅。』同時，他們又重新號召新的犧牲來辯護官式的路線。他們又『預見』『一個新的革命高潮』異常迫近，這一高潮向共產黨提出『組織並實行羣衆的武裝暴動的實際任務，因爲只有暴動，只有推翻現存的政權，才能解决革命的種種任務。』反對『盲動主義』的忠告就是避免孤立行動的訓戒。『黨在這裡也應當見着自己的主要任務，是在準備城市與鄉村相配合相適應的發動，準備幾個鄰近省區之間的相配合相適應的發動，而且準備有組織的有預備的廣泛範圍之內的發動。』（註五十三）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史大林的眞理報寫道：『中國共產黨正走向武裝暴動。中國的整個局勢說明這是正確的路線……經驗證明中國共產黨必須集中全力於武裝暴動底日常及廣泛的小心準備的工作。』（註五十四）

在往後五個月間，這種政策引導共產黨人走上零碎的冒險，連續遭逢失敗，把自己的殘餘力量也加以毀滅。正當這個時候，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及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於一九二八年七八月開催。事實已終於使克林姆宮的政治戰術大家恍然大悟，所謂一九二八年八月以來已存在的『直接革命形勢』原來却是一個不幸的虛構。但這並非表

示莫斯科指示而後來造成無數失敗的暴動『基本路線』現在可以視為錯誤，視為更清楚的證據：證明冒險主義時期乃過去機會主義錯誤的天然反動，而加以排斥。牠只是表示：一個新的辯解的公式必須尋出。他們突然『發現』廣州暴動不是立即建立中國蘇維埃政權的先聲，不是革命不斷『高漲底浪潮』的最高點，而是結束武漢塌台後革命退潮的退兵時一戰。

『許多中國共產黨員及其他國家（？）底共產黨員的最大政治錯誤……就是：在廣州暴動失敗已經過幾個月之後，他們尚以為這次暴動是泛濫全中國底新的，更高的革命浪潮的直接起點，因此，他們主張直接組織武裝暴動。』這是誰講的話？當然是中國革命底『不斷上昇』底理論的作者，羅名尼茲嘍。（註五十五）

承認這一『最大的政治錯誤』，不能就要共產國際委會及中國共產黨指導機關方面承認任何『錯誤』。中國黨第六次大會於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行將開幕之前，舉行於莫斯科郊外，牠鄭重宣告『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尤其是（！）廣州暴動都沒有盲動主義的性質。』廣州蘇維埃是『保護革命勝利品』（！）的必要的（？）英勇的企圖……但客觀上』，注意：這是一個新的公式：『廣州暴動是革命失敗過程中的退兵一戰。』（註五十六）

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的殖民地提綱說，武漢失敗後，中國共產黨已『改正牠的路線』——即是說，牠採取暴動的道路——『但革命浪潮已低落』。呵！『從前機會主會領導機關犯了許多巨大錯誤，現在則恰恰相反，在各地暴露了極有害的盲動主義錯誤。』（註五十七）但在革命低潮時期『正確的』暴動政策除了造成『有害的盲動政策』之外，又怎能造成別的結果呢？如果盲動主義不是立意在預先注定失敗的情形中舉行暴動又是什麼意思呢？這些問題既沒有提起也得不到答覆，因為共產國際自身曾下令轉向暴動，而且共產國際是永無錯誤的。現在只能以隨便的態度

，彷彿誰也沒有持過異議似的承認這一點：『革命浪潮已低落了。』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和廣州暴動只是『挽救革命失敗的企圖』。廣州暴動是『將近退消』底革命浪潮的『最後的有力的衝擊』。（註五十八）

這種臨時變更稱呼只是可憐地遮掩極度的破產吧了。當中國共產黨走暴動的道路和刈取自己的秋收的時候，牠以爲走這條路是去奪取革命的政權的。沒有一個人談及『保護革命的勝利品』。也沒有什麽勝利品。只有失敗待克服。奪取政權的問題提到議事日程過遲了。

當莫斯科的反對派提出警告，認爲武漢失敗後，革命退潮的開始，應舉行防禦的退守時，但他們却被罵爲『取消』中國革命。現在，當共產國際對局勢的錯誤估計直接造成連續新的和悲慘的失敗已經過了一年之後，第六次大會才臨時提到：武漢失敗後，革命浪潮確乎『低落』，『行將退消』了。一九二七年八月的所謂『取消主義』直到一九二八年八月，當事變久已把五千七百具廣州無產階級的屍體放在克林姆宫門口之後，才變爲『布爾什維克主義』。

一個敗軍之將明明知道有一條退路擺在眼前，他尙把他的殘軍迫入陷穽並在一場『退兵戰』中葬送他們，這算是什麽將軍？他不是盲目就是無知。共產國際的『革命』將軍則兩者兼備。

第十八章　失敗的後果

第十八章　失 敗 的 後 果

革命失敗把國民黨捧上了台。牠預告一個反革命，恐怖，軍閥戰爭重新爆發，經濟瓦解加深及無力拒抗帝國主義重新入寇的時期到來了。

資產階級既無法給羣衆以充分的經濟保障，藉以贏得他們的自願的擁護，牠自然不能發展或利用民主主義的機關。牠只能採取野蠻的軍事獨裁的形式來樹立牠的政權，這個軍事獨裁的政權由一羣競爭的暴君共享，而且牠全部依賴於帝國主義者底軍事和財政的支持。國民黨政府無法採取一個有效的步驟來改善全體人民的生活狀況，牠成了國家受傷機體上的一條可怕的寄生蟲。牠的將軍和牠的銀行家，牠的地主和官僚，牠的獄卒和劊子手難解難分的結合在一起，無情的耗竭國家的生機。幫助國民黨上台的經濟和社會改革的漂亮諾言仍是空話。在國民黨統治底下，所有現存的剝削手段都保持起來且加強到空前的地步。牠只是用赤裸裸的武力來維持自己。

誰也不知道多少人死在國民黨的恐怖的災刼之下。誰也不知道在國民黨統治的過去十年間，有多少老少男女被殘害肢體，酷刑拷打，監禁和殺害。大家只知道除了年年不放鬆執行的日常兜捕的犧牲者之外，有成千成萬人於鄉村和城市的整批屠戮時被殺死和弄殘廢了。誰也沒有精確知道有多少政治犯關在全國發臭的牢監裡，也不知道他們有多少人病死或死於酷刑之下。

明文記載只有部分的估計和不完全的數字，這都是從官塲的文告和報紙上摘下來的。據一位調查者說，從一九二七年四月至十二月間，已知死者有三七丶九八五人，又已知政治犯有三二丶三一六人。在一九二八年一月至八月間，正式判死刑者有二七丶六九九人，判徒刑監禁者有一萬七千餘人。一九三〇年末，中國共產黨赤色救濟會估計被殺或死於獄中者總數達十四萬人。一九三一年，研究六個省份各城市現成數字的結果，證實已有三八丶七七八人以政府敵人的名義處决。(註一)從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六年，成千成萬遇害或塡滿監獄的人，主要都是用種種方法公然反對蔣介石和國民黨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可鄙的投降，或設法抵抗帝國主義侵畧中國領土（奪去滿洲和華北一部分）的。蔣介石對帝國主義侵畧採取『不抵抗』政策，但另一方面他却對華中的暴動農民舉行無情的殲滅戰爭，在長江南岸各省殺人累千並把村落和田野夷爲廢墟。

在國民黨之下，工農的生活狀況每况愈下，他們設法抵抗這種生活的壓廹，但恐怖對他們的打擊也最厲害。當世界經濟恐慌的破壞到來，加上政府的掠奪，中國迅速遭逢經濟的停滯和完全破產。在五年間，蔣介石政府發行公債達十一萬，而這筆巨欵的百分之九十九用在蔣政權所依靠的軍事機關及其官僚機關上。當中國對外貿易在經濟恐慌的打擊之下，大大低落時，又當日本帝國主義受同樣的恐慌刺激而佔領滿洲，把政府歲入的重大部分奪去，同時加緊攘奪中國的紡織和絲工業時，政府所依存的脆弱的經濟組織便有完全崩潰之虞。

國外貿易指數（以一九一二年爲一〇〇）從一九三一年的二七七跌至一九三四年的一一八・六。入超指數（以一九一二年爲一〇〇）一九二七年是九一・九二，一九三二年竟高至五四二・六二。在往後一年中，全國工業和農業已衰落到這個地步：糧食和衣料竟佔輸入總額的半數以上。絲業是中國經濟的台柱，但也幾乎完全破產了。一九二七

年在上海有九十三家絲廠開工，一九三四年則只有二十三家開工了。繅機數從二二、一六八跌至五、七二二。日絲在中國市場上傾銷，比中國的土產更廉。在紡織業方面，外國資本總是趕上和吸收中國的企業。一九三四年日英紗廠操有中國的紡錘幾及一半，生產的綿紗也佔半數。外國織造廠數目雖然較少，但出產綿織品的匹數較中國廠全數多至百分之五十以上。中國的手工業，製紙，製火柴，陶瓷各業在外國競爭的壓廹之下衰落了。農產品的價格在一九三二年跌去百分之二五至五十。小地主受愈來愈高的賦稅及比之地稅總額高許多倍的週期的軍閥苛捐所累，連生產費也負不起了。地租從百分之五十增至百分之百，佃農成千成萬的放棄耕地。遼濶的農作地，幾千萬畝拋荒了。白銀的不斷流出（一九三四年美國購銀政策加重這個現象）破壞了中國通貨的薄弱基礎。（註二）

這種經濟恐慌，（因為帝國主義者侵畧，更形嚴重，）國民黨政府本已無力克服，當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國主義按照牠的征服中國的計劃，開始一個新的侵畧階段時，國民黨更陷於彷徨無告的地步。因為經濟恐慌，又因為英法計劃在蘇聯四週建立封鎖線，日本遂狡猾地乘着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侵入滿洲，打破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條約所造成的現狀，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畧經過幾個細心研究和審慎將事的階段，凡是一個階段完成牠便停下來小心鞏固新獲得的陣地，結果，在一九三一年與一九三五年之間，日本帝國主義征服了滿洲並把牠改為『滿洲國』，廹使上海變為非武裝區，佔領熱河，把河北邊區各縣改為非武裝地帶，公開保護大規模的私運，使華北貿易解體，並西向入侵內蒙察哈爾省。

在每一階段上，侵畧者不是完全碰不到抵抗，便是只碰到一些孤軍來對抗，這些孤軍，蔣介石的南京政府是讓之自生自滅的。『不抵抗』政策並非僅僅表示消極的意思。當南京政府可憐地敲日內瓦的大門時，牠把國內任何想獨立

抵抗侵畧的企圖均加以無情的鎮壓。牠把全部恐怖的機器裝置起來摧殘自發的抗日運動，這種運動於一九三一年冬便已發生。牠破壞民衆的抗日團體，且撲滅抵制日貨的運動。牠絲毫不願接濟義勇軍，這些義勇軍正在滿洲不斷困擾日軍。一九三二年一月至二月，當十九路軍在上海舉行英勇的抗戰時，蔣介石除了有少數軍隊參加外，差不多他的全部軍隊和所有飛機大礮通通遠離前線，讓成千成萬人因受海、陸、空三方面的殘酷進攻而犧牲。等到這次被政府怠工的抗戰終於敗績了，蔣的專使便簽訂了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的上海停戰協定，這個協定把全市週圍二十基羅米突的地帶劃爲非武裝地帶。

一年之後，侵畧者攻入熱河，他們仍然碰不到什麽抵抗，雖然南京已向人民聲明要抵抗。這個時候，『不抵抗』與乞訴國聯的混合政府已有點不行了。蔣介石雖屢屢聲明他要『北上』和『捐軀』，但大家都不相信這一套。國聯派一個調查團到中國來，牠由一批前任的殖民官組成，以李頓勛爵爲首，牠的報告提議由各帝國主義共同瓜分中國，以代替日本的獨吞。日本將要進攻熱河時，南京政府妮妮妞妞聲明牠要抵抗，但牠沒有調動人，沒有調動鎗，沒有調動糧食，也沒有調動軍需品。所謂『抵抗』也就是讓幾千營養不良，武備窳劣，軍心渙散的軍隊來抵抗日本的進攻。熱河一個星期就失陷了。有幾團人在長城各口作短促的壯烈的抗戰，但幾天功夫就給壓服了。一九三三年五月，日軍迫近北平城，蔣介石的代表又簽訂塘沽停戰協定，這個協定把長城以南五千方里劃爲非武裝地帶，讓日本在華北得到一片堅固的立足地。一九三四年間，南京政府又連續簽訂幾個協定：恢復華北和滿洲國的鐵路和郵政關係，並恢復河北境的中國關卡。這樣幹，南京事實上等於承認日本征服東北了。一九三五年，秦土協定承認日本吞併察東，蔣介石的軍部長又簽訂何梅協定，中央軍完全退出河北。這些就是日本一九三七年發動更進一步，更

擴大底征服戰的跳板。（註三）

國民黨政府藉帝國主義產婆之助而誕生，又靠帝國主義的支持而長大，牠在短短的幾年內，使國家頻於經濟崩潰及被瓜分之境。十年來，蔣介石繼續毫無忌憚的屠殺革命家，鎮壓和撲滅工人的防禦鬥爭，剿滅所有農民暴動，並毫無抵抗的把國家大部分讓給帝國主義侵畧者。從頭到尾沒有強有力的革命力量來干犯國民黨的反革命。這就是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失敗的後果。

自一九二七年失敗（以廣州暴動爲最高點）後，共產黨已闖入新的死巷中，一個黨既已遭受這樣大的失敗，如果牠不澈底消化失敗的敎訓，就不能希望重建牠的隊伍。過去的敎訓應該是新路線的不可或缺的出發點。因爲牠們產生了新局勢及這個新局勢所提出底新問題的前提。但人們宣佈那些造成一九二七年失敗的政策是絕對正確的。七月，布哈林向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演講說：『錯不在策畧的主要路線，錯在實際行動及中國所採用的路線的實際運用。』（註四）而且，這一『主要路線』的精髓，『民主專政』底理表和未試驗的實際，竟包含在共產國際的綱領內，且人們重新認定牠爲未來中國共產黨戰術的基本支柱：廣州——上海——武漢。三重經驗無影無踪的空過了。

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革命已用相反的方式給了我們以俄國十月革命敎訓的新印證。牠再度證明（雖然這一次是從反面）：在我們這個時代，一個落後國家只有採取無產階級獨裁（後面領着幾千百萬貧農）的形式才能實現牠的民主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共產國際在史大林的領導之下，排斥無產階級獨裁的遠景並代之以列寧久已放棄掉的公式——『工農民主專政』這一含糊的，從未確定的中間政制，這個專政在階級衝突的實際生活中已一次再次的變爲資產階級專政。最先是蔣介石的廣州，後來是汪精衞的武漢，通通被說成爲『民主專政』的萌芽的胚胎，這個胚胎將實行土地革命並替中國解除帝國主義的束縛。中

國無產階級迫得償付牠的最優秀的頭顱來學到這一點：資產階級是不會破壞牠自己底政權的基礎的，革命只能採取無產階級獨裁的形式進展。如果像共產國際現在的幹法，把這個教訓抛棄不談，則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注定要成一場新的撲空，要遭受無數新的失敗了。（註五）

一九二八年共產國際突然普遍的向左轉，突然發現『第三時期』，（資本主義之最後時期）與『猛烈的革命高漲』，（註六）於是理論上的混亂被策畧上的極左的瘋狂弄得加倍厲害，機會主義與冒險主義混合起來，共產國際一方面向在中國共產黨的面前懸擺着那可望而不可即的虛妄的『民主專政』，另一方面却拒絕拿一定限度的民主要求來鼓動的策畧。共產國際反而命令支離破碎的中國共產黨現在進行創立蘇維埃。

第六次大會的殖民地提綱下令道：『在目前，黨必須在羣衆中到處宣傳蘇維埃的觀念，宣傳工農民主專政的觀念及革命的羣衆武裝暴動到來之必然性。牠現在就應該着重鼓勵推翻統治聯盟及動員羣衆舉行革命示威的必要………牠應該始終如一地，一成不變地進行奪取政權，組織蘇維埃作爲暴動機關，沒收地主及大財產所有者，驅逐外國帝國主義者………革命的未來的增長將向黨提出一個急迫的實際任務：準備和實行武裝暴動，作爲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及推翻………國民黨政權的唯一道路。』（註七）

在革命高潮的時期，當羣衆充分表現其向心傾向的時候，斯大林以資產階級國民黨來代替蘇維埃。現在，當革命失敗已喚起一個深刻的離心過程之際，蘇維埃的口號——借托洛次基的話說來——只能是『教條式的，無生氣的，或最壞就是………冒險主義的口號。』（註八）上述的提綱依照史大林的原來思想，把蘇維埃視爲『暴動機關』而不把牠視爲通過一個兩重政權的時期，伴隨着羣衆運動高漲的整個過程而生長的民主會議，這種思想適足以表明這個口號的純粹冒險主義的性質。

不錯，根據過去的新鮮經驗，中國革命的往前發展將一定走向蘇維埃，並經過蘇維埃而走向無產階級專政，因爲這是沒收土地歸農民及脫離帝國主義統治的唯一手段，亦即順利地實現民主革命任務的唯一手段。但這並不是說，蘇維埃的旗幟可以在那些剛剛遭受一連串悲慘失敗而潰退的工人面前招展起來。托洛次基從他充軍的地方阿爾瑪·阿塔給第六次大會寫一批評書道：『決戰之後才拿出拳頭來，再沒有比此更無結果和更不中用的了………我們必須淸楚的了解，目前在中國並沒有一個革命形勢。我們還不如說目前是一個反革命形勢………牠正在轉變爲無定期的兩個革命中間時期。』

在這個過渡時期，托洛次基提議以一個包含最基本的民主要求的鬥爭綱領來武裝共產黨，這個綱領拿一些配合羣衆底最簡單的日常要求的政治要求來恢復羣衆底革命情緒及重新團結他們。這些政治要求就是八小時工作制，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的自由等，這些要求歸納爲一個總的口號：召集澈底民主的普選國民會議。他說，只有照這樣進行政治的鼓動，同時領導防禦鬥爭及耐心的改組工會運動才能夠恢復羣衆的鬥爭情緒，恢復他們的自信心，而共產黨也才能夠在重要的經濟部門中得到穩固的基礎並能夠隨着事變的進程，重新走上革命的道路。只有始終如一的，勇敢的爲眞正民主的國民會議而鬥爭，以此來對抗國民黨軍事獨裁底御用的假民主的矯飾，才能夠重新產生必要的條件，有了這些條件，蘇維埃的成立就會重新眞正配合工人的情緒和要求。（註十）

但共產國際却命令中國共產黨不顧工人的冷淡態度加深，僅僅憑藉『蘇維埃的觀念』及『革命的羣衆暴動到來之必然性』之類的武器來進攻國民黨的反革命。共產國際蔑視那認爲中國已進入最黑暗的反革命時期的見解，牠認爲牠處於『兩個浪潮之間』或『革命的兩個浪潮的凹處』。暴動的口號暫時成了一個『宣傳的口號』，但顯然第二個浪潮

迅速高漲起來，牠就『又成爲立即實行的口號』。（註十一）

托洛次基警告道：『如果我們是處於革命繼續發展的兩個浪潮之間，那末每一種不滿的表現（不管牠的重要性如何小）都可以視爲………『第二個浪潮的起始』了。………從這一點又可以生長盲動主義的「第二個浪潮。」』（註十二）這種傾向確乎已在第六次大會中表示出來，大會的一位中國代表高呼道：『我們正迅速的走向一個新的革命浪潮！』（註十三）會場中其他中國代表（他們的黨剛剛才遭受了歷史上的最悲慘的失敗）一齊起立高呼：『勝利的中國革命萬歲！』（註十四）中國共產黨同月在莫斯科召集牠自己的第六次大會，牠宣告『新的革命浪潮的最基本的象徵已可逆睹了』。（註十五）一年之後，共產國際執委會因爲中國暴發一個新的軍閥內戰，心中大爲激動，立即宣告從凹處升至浪尖此其時矣。牠寫一封信給中國支部道：『這就是新的革命浪潮的起點………黨應破壞各派軍閥的權力………「轉變軍閥戰爭爲階級的內戰」，「推翻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的政權」——這兩個口號現在應成爲黨的主要和迫切的口號………準備政治總罷工………』（註十六）共產黨便因此被弄得迷惑不清，又着手舉行一連串新的無望的冒險，這些冒險只不過把一道原本已使牠與工人階級分離的鴻溝加濶吧了。牠永遠沒有從一九二七年的失敗中恢復過來，重新成爲工人階級的組織。

一個代表在六次大會中吹牛說：『共產國際决切的提出武裝暴動建立蘇維埃政府的口號………只有這個口號才使我黨能夠團結我們的隊伍，爭取新的力量，結集幾十萬，幾百萬工人在牠的口號週圍。』（註十七）但三個月之後，中央委員會在一個內部文件裡揭露這種空洞的誇大所隱藏的眞相：『工會組織已幾乎縮小至零。黨的城市組織都潰散和破壞了。全國沒有一個健全的產業工人的支部。』（註十八）

共產黨（由李立三領導）拿一個『赤色工會』的綱領來進行恢復工會運動的巨大任務，這個綱領主張成立『赤色工會』來對抗國民黨於一九二七年特許成立的『黃色』工會。這就是把一九二八年共產國際的總政策應用到中國來的結果，共產國際這個政策規定在有組織的工人運動中凡是不接受共產黨政綱者均視爲當前敵人。牠在中國採取特別奇形怪狀的形式，因爲他們是在革命大失敗，大多數工人羣衆已背棄黨的時候，才來打算產生共產黨工會。『赤色工會』當然無論在會員資格及政綱上都和黨一樣。牠們完全拿出黨的『蘇維埃』政綱來，這個政綱沒有吸引工人加入牠們，倒還在白色恐怖的狀態之下，把他們嚇跑了。

過去在羣衆運動迅速高漲期間，組織得並不很健全的工會組織已被掃出舞台了。國民黨御用的工會只代替了他們的少數幾個。而這些國民黨工會許多都是空掛工會的名字的，裡面全是國民黨政府直接指派的工賊官僚，其目的在有效的鎮壓工人，但在許多場合，工人們都加入這些國民黨工會，雖則這些工會受南京政府的公開工具所領導。他們爲了自衛而加入這些國民黨官許的組織，這是他們的自然趨勢。加之以政府又進行假自由的宣傳。牠採取迷人的勞動法(這當然從未實施)。牠甚而容許罷工，尤其是外國企業內的罷工，這件事幫助『黃色』領袖在羣衆中散佈新的幻想，取得他們的地盤。這些領袖當然鼓吹階級合作，妥協和屈服，但共產黨不是昨天剛剛才拿『四個階級聯盟』的學說來教育工人嗎？在華北，許多工會遲至一九二八年，即蔣介石已攻入北京並取消了該處的舊政府之後，才在國民黨的監督之下，初次成立。平津許多工人均興高烈采的加入剛成立的工會，他們大多數人還沒有知道國共合作已突然終結哩！這些組織多數落入國民黨汪派（『改組派』）的手裡，汪派爲了反對在朝黨的蔣介石領導機關，正在工人中找尋根據地。（註十九）改組派的吸引力就在他們鼓動成立一個比較民主的文治政府來代替蔣介石的殘暴的

軍事獨裁。共產黨根本不屑在這方面舉行鬥爭，把戰塲完全讓給汪派，汪派四年來利用小資產階級和工人底重大層份的民主要求，爲的只是出賣這些要求（這是必然的）來作他們投降蔣介石的過門。（附註一）

但在國民黨之下，有組織的工人運動比從前縮小了許多。一九二七年，參加工會的工人曾幾達三百萬。一九二八年這個總數減去幾及一半。一九三〇年，據官式數字，有七百四十一個工會，五七四、七六六個會員，又減少了百分之六十左右，一九三二年，則更縮減至六百二十一個工會，四一〇、〇六七個會員。（註二十）中國大多數產業工人尚沒有任何組織，即使是最初步的組織也沒有。

共產黨在幾十萬有工會組織的工人中得不到任何基礎，在幾百萬無組織工人中也得不到什麽基礎，雖然一九二八年工人尚未完全放棄鬥爭，尚進行非常頑強的防禦罷工戰。內戰停止及短期的經濟復興使許多重要產業部門的工人恢復信心。例如在上海，一九二八年間便有一百二十次罷工，包括二一三、九九六個工人。這些罷工六份之五是爭取增

（附註一）自一九二七年寧漢合作之後，個人的嫌隙並不是這樣容易消釋的。是年九月，正當國民黨許多派系爭奪權力之際，蔣介石狡猾地退出政府。但早在一九二八年便奏凱復職，維持他們的均勢。汪精衛和各派敵對軍閥勾結，先是和張發奎，後來又和閻馮，閻馮於一九三〇年曾發動內戰討蔣，結果失敗。一九三二年一月汪終於回南京和蔣合作，且成了蔣底赤裸裸的軍事獨裁的文治裝飾物。汪的同黨（如湯良里之流）多年來便有聲有淚的揮毫縷訴南京的野蠻虐政，但他們一旦在政府中得了肥缺便不難成了蔣的最卑賤的辯護人。（一九三八年汪派又脫離重慶政府，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公開代理人，後來並在南京成立傀儡政府——譯者）

加工資和減少工作時間的。（註二十一）在這種順利的環境中，共產黨却依然是無能爲力的旁觀者。一九二八年及稍後，他們一接近工人，大談『政治罷工』，『總罷工』，『武裝暴動』及『蘇維埃政權』，那些受驚嚇的罷工工人便趕忙復工。李立三被撤除黨領袖的資格之後，沒有多大功夫在黨的報紙上便洩露若干事實出來。據某文縷述道：『工人害怕共產黨來………並懇求他們不要破壞他們的鬥爭。他們客氣地說：「你先生的說話是十分對的，但我們現在不能實行。我們只要能增加一點工資，不被開除就好了。」』據這同一文章報告，工人所要求的與共產黨所提出的兩者之間的鴻溝竟如是濶大，以致有幾個共產黨工作人員常常把罷工將要爆發的消息隱瞞起來不讓黨的上級知道，爲的是好讓罷工工人得到一個機會，能依照他們自己的條件來進行鬥爭！有一次上海的黨機關派代表去參加某紗廠的罷工，工人說：『這是我們的事情。各位先生爲什麽這樣熱心到敝廠來呢？』其他工人則說：『共產黨又來了。我們最好還是跑開吧，免得吃虧更大。』（註二十二）

罷工多數是在各廠自發的。共產黨一個正式報告說：『甚至在上海，工人也沒有鬥爭的組織………他們都潰散……和失敗了。他們多數受黃色工會及國民黨的領導。』另一方面，共產黨人又『輕視黃色工會。結果，赤色工會的工作和影響幾乎縮小至零。羣衆遂均受黃色工會影響。』（註二十三）

一九二八年末，『赤色工會』已『幾乎縮小至零』，黨沒有『一個健全的產業工人支部』。往後幾年，共產黨非常荒謬的誇大牠的力量，但在黨內文件中，特別是當共產國際依照那一套譴責失敗的替罪羔羊的慣例，叱駡中國黨中央，中央又轉而攻擊省縣組織的時候，那種誇大的說法不攻自倒。這時洩露出來的事實就無情的打破一切宣傳的神話了。領袖們年年都一定要埋怨他的黨從不盡責，不正確

的執行『黨的路線。』當然，他們從不指出，工人們至死也不願服從黨的領導，『黨的路線』本身也負不少責任。黨追求『新的革命浪潮』，而這個浪潮則宛似一個精靈的小鬼一樣總是躲避牠。共產黨人盲目的舉行零碎和無益的示威，計劃一些從未實現的暴動，結果，他們只能完全脫離他們自詡他們所代表的階級。爲了證明這一點，人們只要簡畧地讀一讀黨自己的報紙及牠自己的內部文件就行。一九二九年二月，共產國際的一封來信曾引這一事實：『在多數城市裡，甚至在武漢，天津和廣州這樣大的工人階級中心裡也沒有幹出一點工作………在大的和重要的企業裡沒有支部。』（註二十四）五月，黨的一位領袖周恩來寫一個組織報告，他埋怨黨員們不能領導工人的自發罷工。他補充說：『就是我們的同志參加，我們的影響和口號也產生不出結果。………在重要中心裡………沒有地方組織。』（註二十五）共產黨人因爲無法拿他們的政綱的本身力量來爭取羣衆，他們便往往實行强迫手段，用手槍來命令罷工，否則便用『恐怖方法』來消滅『黃色工會』。（註二十六）黨的領導機關埋怨道，這種辦法使組織更難與工廠的工人接觸，但這種埋怨也無多大結果。一位老工會運動者和戰士項英寫道：黨僅以建立全國和各省工會的『空頭機關』爲滿足，這些工會因爲沒有下層會員，故毫無能力。他又寫道：『赤色工會已成了完全站在羣衆外面的組織了。』（註二十七）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這個『空頭機關』召集所謂『第五次全國勞動大會』，這次大會十分客氣的稱號僅代表三萬工人。（註二十八）即使暫時接受這個可疑的數目，人們也要問：那末兩年前在武漢，第四次勞動大會眞正代表的另外兩百九十七萬工人到底怎樣了呢？

一九三〇年夏共產黨有一項材料稱『赤色』總工會有六萬四千三百八十一個會員。各大城市（包括上海，武漢，香港，哈爾濱，天津，厦門和無錫）總計爲五千七百四十八

人。其餘據說分散於沒有產業工人的農村中。（註二十九）數月之後，一九三一年二月，一位黨的領袖寫道：『現在沒有眞正的赤色工會………牠們都已給肅淸了，所有工作都已放棄了。』（註三十）

一九三〇年末，黨已有全部崩潰和解體之虞。李立三突然被免職，由一批學生來瓜代，這批學生曾在莫斯科度過了革命的歲月，他們的領袖就是陳紹禹（王明）。這批完全由上面用命令派給黨的新領袖，宣告他們『完全無條件效忠於列寧主義底共產國際的總路線』並聲稱『黨所遭逢的一切嚴重的後果皆由李立三同志及其信徒漠視共產國際執委會的訓令』。（註三十一）這批新『領袖』於是着手糾正黨內某作者中肯地稱爲李立三對共產國際政策『過份誇大』的毛病。（註三十二）但在新的領導之下，完全放棄大城市中心工作的傾向仍然無法遏止。

一九三一年是日本入侵和罷工浪潮高漲的年頭，是年臨末數月，罷工尤其高漲。在黨的報告中，又是那一套話：『鬥爭是分散的………自發的，沒有組織和領導的………最大的困難就是我們在工廠中沒有好幹部………我們的組織不十分了解工廠的情形，因此無法提出工人的最迫切的要求。我們組織一個反帝的罷工也不成功。』這個報告一面訴說關於黨監督的『赤色工會』沒有『充分的統計』，一面舉出如下的會員數目：『上海丶六六六人；厦門丶七二人；哈爾濱丶七一人；膠濟路丶二十人；海員和碼頭工人丶三一九人；………總計：一丶一四八人。在天津，北京，漢口，香港，廣東（即廣州）等處………我們沒有組織。』（註三十三）

一九三二年三月，日本入侵後六個月，黨的領導機關指責牠的黨員『放棄組織和發動罷工的工作，尤其是在重工業中………放棄組織赤色工會的工作是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至於深入黃色工會，這一工作尙未開始。上海事變（即指一九三二年一月至二月，日本入侵上海）後，中華

全國總工會，上海總工會和省委甚至還未着手。』（註三十四）

但王明後來提及這同一時期，說『黨實際上採取罷工，集會，示威的形式，組織了巨大的抗日羣衆運動………』（註三十五）米夫現在已成了共產國際的主要中國『通』，他於一九三三年夏寫及『在國民黨領土上工人階級運動聲勢浩大的高漲』，並引證一些數字證明在一九三二年十二個月間，不下一百十一萬零一百七十個工人參加罷工。（註三十六）但這並不妨碍他於一年之後又宣稱僅在是年頭六個月內就有一百二十萬工人參加罷工！(註三十七)這兩個數目字把上海共產黨報紙同一年舉出的三十萬一千一百七十個罷工工人的總數平空增加了三倍和六倍了，(註三十八）而上海共產黨報紙舉出這個數目字又比之較爲切實調查的數目多出一半。米夫說，他的總數三份之一（或三十二萬五千罷工工人）是在共產黨直接領導之下的。但根據黨自己的數字（這個數字大概把米夫在某處發現的另外八十萬罷工工人忽畧了），我們迫得要下一個結論：黨不僅領導一九三三年放下工作的每一個罷工工人，而且還要領導莫斯科出版的某雜誌向壁虛構的二萬五千人！

中國共產黨的領袖雖然發誓『無條件效忠』於他們的莫斯科的祖師，但在克林姆宮底宣傳機關與上海底黨報編輯之間，尙可悲的缺乏一致。例如，米夫吹牛說，一九三二年九月，共產黨組織了一個紗廠工會，包括了『上海紗廠的大多數工人羣衆』。（註三十九）我們想及這些工廠總共有十二萬工人，（註四十）我們便知道米夫這句話就無異說黨的無產階聯基礎突然和奇怪的擴大了。但可惜在這一點上，米夫也無法與他的上海朋友唱和，他的上海朋友寫道：『產業基礎的薄弱與赤色工會的縮小是驚人的。我們試拿上海的紗廠總工會來看吧。十二月（一九三二），牠尙有一千左右會員（『大多數？』）………今年春我們檢討工作時，會員已大大縮減了。今年（一九三三）八月牠

已由二十個支部減至七個。』（註四十一）再舉一個例，上海烟草工廠工人有一萬七千四百四十五人，（註四十二）米夫於五月寫道：『在烟廠工人中，革命工會組織的力量也已增强，而且在組織上確立了。』但十月，紅旗報說：『烟廠總工會由九百餘人（！）縮減至目前的不可忍受的（！）狀態………就在這種狀態中，牠的會員也不能全數找齊。』這同一上海的報告，綜合全國的工作時，不想列出數字，代以『××』的神秘象徵，但這些『××』的意思仍是很清楚的：『拿滿洲三個產業中心來看吧——在哈爾濱只有××會員………在瀋陽通常有××會員，但現在我們就不知道。在大連，工作還剛剛開始。在滿洲全境總數只有××。在武漢，直到如今尚未開始工作。在上海今春尚有××會員。現在只有××了。不僅沒有增長，倒還減退了。』（註四十四）

一九三四年初，共產黨青年團中央注意團內的『嚴重現象』：『我們的同志竟不知道工廠將要發生鬥爭………孤立的結果，我們不僅不能領導羣衆鬥爭，我們連他們的尾巴也捉不到了！』（註四十五）

『赤色工會』和『蘇維埃政權』的六個年頭，事實證明也就是軟弱無能的六個年頭。一九二七年後，廣大的工人羣衆離開共產黨，而共產黨也並沒有學會如何去恢復他們的自信力及重新團聚他們的有組織的隊伍。一個階級既已被他自己的領袖出賣而一敗塗地，牠當然不能響應『蘇維埃』的空洞口號，蓋『蘇維埃』並不與實際相符，牠只配合黨內的冒險主義情緒。結果，黨在任何大城市中心內，從未有恢復任何重要的立足地。當工人們不顧黨的噪雜的急進主義，離開了政治舞台之際，一九二五——二七年本已抬頭的農民暴動，繼續過遲的暴發起來。共產黨員在大失敗之翌日心中混雜着盲動的情緒，他們發覺在農村方面較易於喚起他們底暴動號召的回音，因爲在農村裡，農民正揭竿而起，譁變兵士們也正脫離國民黨的軍隊。雖然有若干領袖尚微

弱地懷着他們的無產階級主張，抗拒那走最少抵抗底道路的誘惑，但城市的不斷失敗，國民黨恐怖政策的沈重打擊幫助革命從城市走向農村的轉變。這一轉變在黨自身的成份中找到明顯的表現。

在一九二七年四月，革命運動最高漲的時候，共產黨曾有六萬黨員，其中百分之五十八人是大產業城市的產業工人。後來他們雖然遭受一連串悲慘的失敗，但在秋收暴動期間，在廣州及後來，共產黨尚號稱增加數千新黨員。他們說，黨在一九二八年有十萬黨員，一九三〇年有十二萬，一九三三有四十一萬餘。黨員的可靠數目字從來沒有。一九二七年後舉出的數字通通都是過甚誇張的，這一點毫無疑義。但這些誇大的數字適足以加重說明黨的階級基礎已發生的變化而已，因爲共產黨已正式承認，黨內工人一九二八年只有百分之十，一九二九年百分之三，（註四十六）一九三〇年三月百分二・五(註四十七)九月百分之一・六，（註四十八）是本年末則實際上等於零。（註四十九）眞正的數字是不常舉出的。一九二九年二月共產國際一封信說，全黨有四千工人，其中一千三百人在上海，其餘則散處其他地方。（註五十）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江蘇省委號稱全省有六千八百黨員，其中只有五百九十一人爲產業工人。（註五十一）一九三〇年九月周恩來向中央第三次全會報告說，全黨有十二萬黨員，其中有二千工廠工人。如果一九三三年末，在全國最大的產業中心（上海）又聽到『沒有一個眞正產業支部』的怨言，（註五十二）那末，兩個月之後，王明在莫斯科大吹黨有四十一萬零六百黨員，其中百分之二五——三十（或十萬左右）是工人，這又能有什麽價值呢？（註五十三）

但就是這個數字中，人們也偵知許多事實。王明報告道，總數中只有六萬人處在國民黨的中國。黨的七分之六黨員集中在遼遠的內地，距離大城市和交通線幾千百里。情形如何是一目瞭然的。當農民暴動已徐徐發揮牠的蓄蘊力量

並向前發展的時候，共產黨已趕快加入牠，讓工人階級自己想法去。共產黨重新從一九二七年的慘敗中露出面來，站在深入於華中各省底叛亂的農民運動的前頭，並就在當地建立了牠的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第十九章　蘇維埃中國的興亡

第十九章　蘇維埃中國的興亡

在中國差不多有史以來，農民戰爭就有了一個傳統。兩千年來，在大浪潮的一高一低中，農民戰爭不斷震動全國并顚覆了許多皇朝，但等到經濟關係按照靜止的中國社會的舊規恢復和更新的時候，農村戰爭便衰竭不振了。在羣起暴動的時候，農民軍馳騁於整個帝國的各行省，喚起幾千百萬人。在新朝廷興亡的過渡時期內，游擊隊伍尙數十數百成羣，散處在無數地方，繼續拒絕換湯不換藥的新束縛。中國經濟和建立於其上的社會在歷史上誠然是靜止的。但中國歷史幷不是一篇千古不變的寧靜古史。牠是充滿暴力和流血，充滿循環叛亂，反抗那自行更新底奴隸形式的歷史，正是這種奴隸形式使中國於西方世界蓬勃發達之時，停滯不前。

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在華南和華中所重新喚起的就是上述的傳統。幾千百萬重新起來奪取土地解除自己痛苦的農民和那些加入長毛太平軍的農民相隔還不到一世紀。但農民造反的老祖宗老是弄失敗的事業，一九二六——二七年起來鬥爭的農民却第一次能夠希望成功。中國社會受了帝國主義侵畧的壓迫已正在瓦解中，而新解決的要素也已形成，只不過等待把牠們配合起來吧了。農民因爲分散，分化爲數層，和落後，他們自身不能起獨立的作用。中國資產階級本身與土地的剝削制度連結一起，牠也不能領導摧毀這一制度的鬬爭。但城市工人這一個新階級却認爲把社

會基礎的財產關係加以根本的變革是其自身的利益，而農民們把自己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連繫起來，他們現在就第一次能夠希望打破有害的歷史循環，他們過去受這一循環束縛那樣久遠。

正因爲共產黨不能鞏固城市與鄉村底被壓迫階級間的連繫并使他們在一個大胆的革命政綱之下聯合起來，結果才給資產階級的反革命開闢道路。無產階級運動受了挫折，土地暴動便陷於無領導。在蹂躪全國的恐怖中牠喪失了成千領袖。但損失最重的就是牠失去了城市工人的領導，唯有工人才能使農民暴動得到聯絡，得到一個經濟政治的組織，農民在這個經濟政治組織內不僅能夠奪回土地，而且當新的生產形式藉他們的幫助而發展時，他們尙能繼續保持牠。

結果，在短期內團結成千萬農民的革命運動被擊敗了，牠的最優秀的戰士也潰散了。零碎的農民武裝隊逃到山上去，恢復游擊隊伍的作用。他們聯合國民黨成連成團譁變上山落草的兵士。共產黨人——有若干工人，多數是智識份子——逃避蔣介石及其同盟者的劊子手，離開了縣市走入農村中，他們在許多地方握到了農民兵士游擊隊伍的領導權。這些成分混合起來，一九二八年便產生了『紅軍』，這些『紅軍』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過在許多地方，農民暴動尙繼續暴發，完全沒有共產黨參加。

第一枝和最重要的『紅軍』成立於井崗山，井崗山位於湘贛邊境，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動流產之後，許多能征慣戰的軍人逃到這裡來。德國留學的共產黨軍官朱德率領不到兩千人來到這裡，這些兵士主要是葉挺賀龍的殘部。我們還記得，葉賀曾於一九二七年八月在南昌舉行暴動，後來又沿江西南下廣東。十月牠想攻取汕頭，結果弄得潰不成軍。許多兵士跟朱德一道赴海陸豐，海陸豐農民當時已暴動起來，沒收土地并組織鄉蘇維埃。葉挺則去廣州，廣暴之後便從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賀龍帶了一小部人走，後來重

新露面，成爲湖北省一枝游擊軍的軍長。廣州軍閥克服海陸豐之後，朱德帶着少數人先走粵北各縣，隨後遂入湖南。他沿途召募了若干農民，一九二八年四月抵達井崗山。他在井崗山會合湘南的農民軍，幾連來自武漢及長江其他城市的叛軍，和共產黨員毛澤東從湘東帶來的一支農民隊伍。毛在武漢曾充任國民黨的農民部長，當反革命向農民進攻時，他却執行壓制農民的政策。失敗後，他逃入湘東平江和瀏陽一帶。他在當地指導秋收暴動。暴動失敗後，他率領一小部分殘部逃到井崗山。他們在井崗山和袁王等地方土匪軍合併。朱德到後，各軍合併，稱爲紅軍第四軍，朱爲軍長，毛任政治委員。黨的正式記載稱牠有一萬人，步鎗二千。（註一）

這支紅軍幷不是從大規模的自發的農民運動中生長出來。恰恰相反，牠長期間和四圍農村的農民沒有聯絡，陷於孤立。只要武裝的紅軍一開拔，游擊隊成立的農民委員會就一定立即塌台和消滅了。盤據在井崗山上的幾個月間，這枝軍隊遭逢不斷的叛變，而且因爲處境孤立，歷盡千辛萬苦。戰敗往往使農民游擊隊員奔散回鄉。特別是湖南人的部隊，他們屢屢脫走重返家鄉。只有領袖方面的極度堅忍不拔與命運的嚴酷鞭策才使這枝游擊軍團結起來，尤其是當冬季已屆，四圍敵人的力量使牠無法掠奪糧草的時候，牠更不得不團結起來。牠在井崗山附近襲擊，突圍及退却，經過了差不多一年的漫無目的游擊戰爭之後，便决意開向南方，找尋較好的根據地。一位共產黨軍人彭德懷曾帶一批人從湖南來投井崗山，現在他這小部分隊伍留守後方來抗拒迫近的省軍。一九二九年一月，朱德和毛澤東率領幾千飢寒交迫，武備窳劣，七零八落的部隊，衝下山來。

牠跑進農村裡碰到農民的冷視，甚至敵視。黨有一個報告說：『羣衆完全不了解紅軍是什麽。在許多地方，牠像一隊土匪似的遭受攻擊』。（註二）紅軍自從在大庾附近與國民黨省軍發生意外的戰事，幾乎一敗塗地之後，便繞向廣

東邊境。他們在農民中進出，但農民們不止一次而是三次受軍隊殘酷的欺騙了，這些軍隊來到總是高擎革命的旗幟幷答應解除他們的重負。『紅軍沒有羣衆擁護。找尋駐營之地，進行軍事活動和獲得情報都非常困難……我們跨過蓋滿白雪的冰山，後面敵人緊緊追來。我們有時一天跑九十里。我們愈來愈困苦。我們戰敗了四次』。（註三）

一九二九年二月中旬，在舊曆新年元旦日，這枝筋疲力倦的紅軍突然在贛南的瑞金和寧都交界進襲贛軍某師。紅軍以絕望的兇猛態度進攻。當他們的子彈已絕時，他們便用鎗桿，石頭和樹枝來作戰。敵人敗逃了。勝利之後，朱毛軍爭得一個最需要的休息機會。他們就在這個僻遠的，層巒疊嶂的縣份裡建立一個新根據地，三月間，彭德懷來會於此。只有最堅苦的殘存下來。全軍總數爲二千八百人。他們走到農民裡工作，當他們開始驅逐地主和焚燬地契時，他們的隊伍膨脹起來了。他們稱他們佔領的領土爲『中央蘇區』。

同時，其他蘇區也同樣成立了，但實力較小。在贛東北，共產黨員方志敏率領一枝游擊隊；在鄂省洪湖附近，賀龍已作閃電似的襲攻和突擊，一時成爲傳奇式的人物。在豫皖和湘贛邊區及其他零散的山嶺重疊的縣份裡，小隊紅軍也成立他們的大本營。這些就是世人所知道的所謂『蘇維埃中國』的構成部分，牠們在地理上都相隔甚遠的。

在革命失敗之翌日，充滿了冒險主義情緒的共產黨就是拿這些稱爲紅軍的游擊隊爲基礎，而牠的活動，牠對於『革命高潮』到來的信念也就是寄托在牠們上面。黨的領導機關瞥見了轉向農村的危險，有一個時候也想起來克服牠。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的中央通告預言式的警告道：『假如農民心理的危險不極力改正，革命就要完全取消而黨也要死亡。』（註四）但因爲黨的城市基礎日益狹窄，牠的無產階級黨員和羣衆也日益減少且差不多完全消滅，這些警告也就愈來愈微弱了。一九二九年十月，共產國際執委會

把農民戰爭說成爲『中國民族危機和革命高潮的特點』。牠在形式上尚是『支流』，但『循着這條支流，革命運動的強有力的高潮將在全國爆發起來』。（註五）共產國際執委會雖然承認共產黨在城市裡沒有力量，（附註一）但牠仍然宣佈『新的革命高潮的起點』到來，並製定一個暴動綱領，要中國共產黨去實行。當城市革命的工人運動正在衰落，共產黨的影響正在被肅清的時候，內地的游擊軍已被視爲『革命高潮』的『決定因素』和『動力。』（註七）『革命高漲不僅表現在高漲（？）的工人運動中，而且最主要和基本的表現在土地運動中。土地革命是新革命高潮的源泉』。（註八）

但一九二八——二九年間，在華中各省的零散山嶺重疊的縣份中成立的所謂紅軍，最初還不是農民武裝隊伍。牠們能夠在佔領縣份中團結各部分農民還是很遲以後的事情。牠們的成分主要是沒有土地的農民，失業的農業勞動者，嘩變的士兵，地方土匪等一切喪失了階級地位的份子，他們就是在農業生產中也不起直接的作用。牠們的活動三年來還限於游擊戰和突擊。牠們無法建立任何固定的根據地。一九三〇年，共產黨一位被撤職和被開除的領袖，陳獨秀（附註一）發表一篇文章，（註九）他在這篇文章裡警告共產黨道：放棄工人，帶一枝流氓無產階級的軍隊來從來從事軍事冒險是不能推進革命的。人家立即毒罵他和反革命勾結。陳氏借恩格斯關於流氓無產階級的定義：『一切

（附註一）『……共產黨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影響和工人階級的組織狀況一樣，與羣衆不滿的增長比較，仍然是落後的……多數赤色工會尚不是羣衆的組織……共產黨尚未把工廠中起領導作用的革命工人團結在自己的週圍，他尤其沒有完成爭取工人階級多數的任務』。——見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五日上海紅旗報『一九二九年十月廿六日共產國際給中國共產黨一封信』。

階級氐腐敗份子的殘渣』（註十）來描寫當時操縱許多游擊隊的份子。但在共產黨的紀錄中也不難找出豐富的證據去證實陳獨秀對當時的紅軍的分析。黨過去想改變這些軍隊爲眞正的農民暴動機關還必須作長期的鬬爭，而這個鬬爭還僅僅得到部分的勝利。

一九二八年，共產黨的第六次大會嘆息游擊隊有從事於『漫無目的焚掠』的傾向，并把這些活動描寫爲『流氓無產階級心理的反映』。（註十一）黨的又一個報告談及『土匪的心理，墮落爲殺人掠刼的土匪生活』，牠甚至還借用

（附註一）自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撤除他的領導職位之後，陳獨秀便退隱一旁，而共產國際則把革命失敗的全部責任諉給他負。在往後的冒險主義期間，陳獨秀寫幾封信給中央，反對舉行有損無益的暴動的政策。一九二九年八月，他致信給中央表明他反對黨的路線并要求重新審定黨的政策。數月之後，他和其他一百人左右整批以反對派的罪名開除。一九三〇年二月，共產國際召他赴莫斯科。他拒絕了，反而要來把革命問題公開在黨內充分討論。後來他和當時已成立起來的托洛斯基派左派反對黨合併，一直到一九三二年被國民黨逮捕爲止，他是該組織的領袖人物。他被判處十三年徒刑，但一九三七年秋釋放出獄。至於他現在的政見似乎有點疑問。參閱：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陳獨秀『關於中國革命問題致中共中央信』（載中國革命與機會主義），一九二九年十月上海發表的告共產黨同志書，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陳獨秀和其餘八十人在上海發表之我們的政治意見，一九三〇年七月一日上海無產者發表之『陳獨秀致共產國際信』，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陳獨秀之辯訴狀。

比之恩格斯或陳獨秀所應用的更強烈的詞句，把這若干游擊隊稱爲『燒殺搶刼的赤匪』。（註十二）中央有一位報告者至一九三〇年尙抱怨『在許多游擊隊中尙保持着流氓無產階級的思想……這種思想往往表現爲無組織的焚掠殺人』。（註十三）米夫甚至在眞理報上也公開寫及中國若干紅軍中『流氓無產階級成分……的極大百分比』。（註十四）

但問題幷不在於當時或甚至以後紅軍中流氓無產階級成分的精確百分比。這些軍隊過去確實是波及頗多（雖然是零散的）地方底農民暴動的先驅。這一類的軍隊已屢屢在中國歷史中露頭角。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共產黨愈來愈傾向於把這些軍隊視爲其活動的正當基礎，幷經過牠們來粉飾牠之逐漸脫離城市中心的工人。托洛次基反對派的見解認爲只要黨本身離開了無產階級，黨口頭上保持農民運動的『無產階級領導權』就是一種謠騙。當城市的盲動政策（企圖強迫罷工及人工地把這些罷工改變爲武裝政治示威）把剛剛開始恢復的工人防禦鬭爭斷送的時候，這個領導權越發越變得妙不可言了。

農民游擊運動的『無產階級領導權』是經過一個活生的運動幷非經過黨報上的一個虛構的口號來實現的，國際左派反對派（托派）就是根據這一點，要求共產黨保持城市的基礎幷提出一個民主鬭爭的政綱和普選全權國民會權的口號，作爲共產黨充當中國工人底眞正代言人和領袖的出發點。一九三〇年反對派宣稱，只有工人運動在民主政綱的推動之下復興，農民暴動才能得到城市工人的不可或缺的領導，而在走向第三次中國革命的進程中，工農合作的基礎才能奠定。（註十五）但托派反對派力量太弱了，牠的影響微不足道。共產黨把主要工作和最優秀的力量放在農村，幷以農民來代替牠的失去了的工人黨員，結果愈來愈遠離牠的城布工作幷終於實際上完全放棄了牠，使國民黨陣營分裂的軍閥競爭及國民黨政府無法克服的長期的經濟拮据

都被視為革命恐慌成熟的有力的徵兆，而紅軍事實上也被視為使這一恐慌成熟的有力工具。

共產國際於一九二九年十月已發現『新革命高潮的起點』之後，牠於一九三〇年七月便宣稱『中國革命運動的新高潮已成了一件不可辯駁的事實了』。因此：『中國共產黨的當前任務是在鬬爭過程中準備和集中全部力量以應最近將來的决戰』。

該决議繼續往下說：『……在頭一階段中有某種（！）弱點，即，鬬爭的羣衆不能一開始便佔領產業中心……這是新高潮中的特點……只有在革命鬬爭往前發展的過程中，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戰爭才能擴展新的領土。到時相互的關係就能夠改變得較為有利』。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加緊注意於加强紅軍，如果做到這一點，『將來，配合政治和軍事的情勢，一個或數個政治或產業中心就能夠佔領了』。（註十六）

雖然共產國際確乎提出過組織工農底一般的需要，并拿這小心說過的訓諭來維護自己，但牠却造下一切致命謬見的因，這種謬見在李立三的政策中成了最可怕形式，李立三現在已是共產黨的領袖了。

因為共產國際委他去『推翻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的政權，建立工農專政……展開羣衆的政治罷工和示威，擴大游擊戰……并轉變軍閥戰爭為階級的內戰』，（註十七）李立三迷惑住了，他開始在各方面看見暴動臨近的先兆。當蔣介石於一九三〇年和馮玉祥領導的北方聯合政府進行一個長期的兇猛內戰時，李立三便斷定國民黨和牠的將軍們快要覆滅。他於三月高呼道：『準備建立革命政權』！（註十八）六月間，他的政治局通過一個决議案，認為羣衆『正長足向革命高潮進展』，并號召積極準備全國暴動。李立三非常認眞的相信共產國際於世界資本主義最後恐慌底『第三時期』的空談，他逆料俄國紅軍將從蒙古開入來援助復興的中國革命。（註十九）

李立三偶然也悲嘆工人運動的消沉，但他却天眞爛漫的相信工人正在等候黨號召他們起來。他深信國民黨隄壩中只須一個小孔就足以促成一個革命的水災。據後來有人引證他的話說：『革命高潮到來，三天功夫就可以組織起九千萬人』。（註二十）他在六月的决議案裡寫道：『羣衆久已說：「請告訴我們什麽時候暴動，我們一定來。」現在，黨應該勇敢的號召羣衆：「暴動的時候到來了！組織起來！」』（註二十一）他把黨，青年團和『赤色』工會合併起來，組織他的所謂總行動委員會，他在上海集合一百七十六個工人組成一支『赤衞隊』，組成『第四次暴動』。（註二十二）他計劃以少數兵士在南京舉行暴動。他又下令紅軍進擊城市。『地方暴動的目的是奪取地方城市……前途必然是會合於中心城市，完成全國暴動的勝利』。（註二十三）

共產國際和李立三都在口頭上承認無產階級必須領導農民。在所有文件裡，都有許多很長，甚至動人的段落，在『無產階級領導權』題目之下，說明這一必要。可惜，無產階級的隊伍和力量自遭受革命失敗及往後國民黨恐怖統治擊潰和摧殘之後，迄今尚待重新團聚。共產黨想拿自己來代替無產階級整個階級。但在這個過程中，牠却轉變爲一個農民黨。革命旣然不能從城市播散到農村，那就必需農村來包圍城市。

彭德懷統率的紅軍第五軍就懷着這個見解，於一九三〇年七月廿八日從江西向西移動，佔領湖南省會，長沙。李立三堅决相信這件事就是全國自發暴動的信號，而這個暴動的中心就在武漢，他滿想在那裡建立『中央蘇維埃政府』的首都。不幸共產黨在武漢只有兩百個黨員和一百五十個『赤色』工會會員！(註二十四)完全出乎李立三的意外，什麽地方也沒有反響。在全國其他地方沒有暴動。九千萬人仍處於消極狀態。英、美、日、意的砲艦撤退了驚惶的外僑之後，溯湘水而上，無情的砲轟那個淪陷的城市。（

註二十五）紅軍退出了。湖南省主席何鍵率幾師新調來的軍隊回城幷開始屠殺無告的市民，這次大屠殺直到五千餘屍首塞滿公墓，甚至長沙商會也請求南京出來制止，尙未罷休。紅軍得到朱毛四軍的增援，九月間又想奪回該市，但這一次他們失敗了，便再度退回贛南的山中。

長沙事件一下子暴露了全部紅軍政策的致命弱點。游擊隊伍和城市工人沒有連繫。當紅軍攻入來，『宣佈蘇維埃政權，工農兵政權成立』時，（註二十六）城內五十萬廣大民衆仍不動聲色，驚慌或詫異。『蘇維埃政權』的成立是一枝戰勝軍之賜。牠幷不是該城底羣衆行動的產物。後來人們也招認：『紅軍進攻與長沙羣衆鬬爭的連繫不夠』。（註二十七）結果在不同的平面上，重演廣州的成爲笑柄的失敗。『在長沙，沒有工廠或街頭選舉的羣衆蘇維埃』。（註二十八）紅旗遍插全市，一個羣衆大會也召集起來，但只有三千民衆參加。兩日後召集第二個大會。成功比較上也絕微。(註二十九)軍隊習於農民游擊的基本戰畧——襲擊，搶刼，破壞和跑開——故幷不認爲牠之領佔長沙是一件長久的事。『牠的地位沒有鞏固。市政權也沒有成立』。（註三十）牠反而向商會徵募四十萬元，而商人則向民衆募集；等到帝國主義的砲轟開始時，牠匆促的抵抗一下就退走了。

當牠退走時，在城中新召的三千工人和牠一起走。換句話說，長沙的最進步的工人，工人運動復興的可能的細胞拋離工廠和商店，變成完全脫離城市的游擊兵士。紅軍用此種方法來進行砍去長沙工人運動底頭腦的工作，而何鍵的劊子手則完成之。這就是長沙冒險的結果。

是年夏季尙有數次企圖，想包圍武漢及奪取其他城市，但均無結果。十月，紅軍佔領江西的吉安，但牠在此地也只限於『招募新兵』幷派出最優秀的部隊去奪取南昌和九江。『組織羣衆的工作完全給漠視了』。（註三十一）吉安在數星期後也撤退了。

但莫斯科的戰畧家已開始知道，紅軍不能順利地攻取大城市。周恩來新從莫斯科回來，在九月的中央第三次全會裡審愼的勸令退兵。他說，『中央有某種機械的觀念，以爲中央（蘇維埃）政府必須在武漢，或至少在長沙或南昌成立……成立政府，大城市當然比小城市好，但這是次要的問題』。他提醒中央說，共產國際已規定統一紅軍及擴大其羣衆基礎爲『首要任務』。他報告道：『我們必須把目前分散的蘇區統一起來，把牠們連成一氣，加強和集中紅軍的領導，發動更廣大的農民羣衆，建立中央蘇維埃政府，向產業中心發展』。

周極力否認這就是退却，同時否認共產國際的意見與李立三的政策有任何矛盾。他反覆說，城市的中心任務仍是『積極準備武裝暴動』。李立三只不過『過高估計速度』，犯了若干『純粹策畧上的錯誤』，及懷着幾點『機械的觀念』而已，但此外便『與國際完全一致』。（註三十二）但李立三『過度誇大』共產國際路線，實際上已破壞了黨和使牠的黨員頹喪。李立三已不能保持領導無誤的神話。因此，礮火集中在可憐的李立三身上。他過去用來打擊他的前任領袖的一切惡言毒語現在都用到他頭上來。十一月十六日莫斯科來信下令在黨內公開向他宣戰。在米夫親自監督之下，不客氣的把李立三撤換了。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召集所謂四中全會，米夫的私狗陳紹禹根據『無條件盡忠於國際路線』的政綱，被抬入黨的領導機關。

這批年青人這樣急遽的晋昇爲共產黨的『領袖』，他們在革命的幾個年頭通通在莫斯科做學生，而且他們還曾經在孫文大學內，打擊孫大學生的托派同情者，立下功勞。米夫爲了讓他們取得支配權，把一羣老戰士趕開，這批老戰士過去在李立三的領導下做工作時，並不是毫無異議的。（註三十三）一月十七日晚，一羣老黨員和工會運動者，及若干青年黨員，在何孟雄領導之下，在上海某旅舘開會，考慮他們所遭遇的新局面。但這次會議却被人告密，遭

公共租界英國巡捕破獲，關於此次事情迄今在黨內尚人言嘖嘖，疑團叢生。何孟雄和另外二十四個人被捕，移交國民黨當局，於二月七日在龍華槍斃。米夫這批馴服的年青傢伙便成了黨的無容爭論的領袖。

黨的其他領袖虧得靠自貶，靠自責自悔的勾當才有權留在黨內，這種自責自悔的勾當已成了史大林黨底方法的固有特色，而且爲時不過十年之後，這種勾當就開花燦爛，成了莫斯科老布爾什維克領袖的『自招』，他們都遭到了死刑的裁判。瞿秋白迫得譴責他自己的『懦怯腐朽的機會主義』。周恩來自己鞭撻自己。他高呼道：『我號召全黨指責我的錯誤』。（註三十四）李立三已赴莫斯科，他一到達該地便趕忙懺悔他的罪過 。 連共產國際機關內的習於無恥之徒，也爲他的熱心自棄，弄得有點吃驚。馬努爾斯基在十二月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召集的會議裡，表示他的詫異，他說：『如果李立三在這裡辯護他自己的見解並一篇一篇文章的和我們討論，那麽，我心裡也許舒服點。但李立三却這樣快的放棄他的意見。這點使我吃驚！』（註三十五）瞿秋白，周恩來，項英（工會領袖）等被派赴江西担任不明的職務。李立三本人則無影無蹤了。（附註一）

新領袖機關的任務就是從李立三的釀成大災的極端冒險主義撤退至比較温和的，較爲實在地顧及黨底實力的冒險主義政策，牠並沒有作任何較爲根本的改變之意，共產國際在他的十一月來信中已表明了這次轉變的主要特色。『不應忘記紅軍底軍事和技術的弱點（如武備和軍需品的貧缺，大礮的缺少等）。這種情形使牠無法佔領大城市，進攻帝國主義的現代軍隊及征服主要的中心地。佔領長沙與進攻武漢的經驗已經證明：這些任務，目前的紅軍是不能完成的』。現在必須『集中黨的最優秀的力量』去建立一枝『眞正的工農紅軍』並在現存的蘇區中，擇定一地成立中央蘇維埃政府作爲未來擴展的基礎。該信又說：『只有那

些與布爾什維克主義沒有共通之點的人才能將此解釋爲退却的路線。這並不是退却而是進攻。暴動的路線是固定不移的』。（註三十六）

但這終歸是退却，是從李立三的誇大夢想中退却。新領導機關放棄了『地方暴動』的口號，且凡是有人企圖在國民黨軍隊中組織零碎的兵變，均被罵爲『勃朗葵主義者』。（註三十七）集中黨的『最優秀的力量』來執行加強紅軍及產生中央政府的『首要任務』也就表示完成從城市走入農村，從無產階級走入農民的轉變。現在已不是使城市工人趕上農民暴動，以便領導牠的問題。恰恰相反『每一個罷工就是蘇區的後援』。（註三十八）一九三一年六月和九月，這個新領導機關數度向全黨發出訓令，這些訓令差不多全篇僅談及紅軍和蘇區問題。他們萬一簡畧的談到城市工人運動，也只是敦促城市工作加緊進行，俾『造成工農紅軍的有力支援』。『加緊援助紅軍的偉大勝利……替紅軍募兵……』是『非蘇維埃』區的主要任務。（註三十九）

上海，武漢，天津，廣州及所有其他產業和無產階級集中

（附註一）瞿秋白於一九三五年在福建被虜，并由蔣介石直接下令鎗决。項英也被虜且分明遭遇同樣的命運。（譯者按：此事蓋出於訛傳，蓋項英後來又出面任新四軍軍長，該軍解散後，又隱沒起來）。其他許多領袖都被槍决或監禁了。鄧中夏和羅登賢（這兩人都是一九二五年省港罷工的領袖）於一九三三年在南京被鎗决，他們至死，口中尙高呼口號，示忠於無產階級事業。參閱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七日，三十日上海出版的中國論壇。李立三於一九三七年在陝西延安（共產黨新中心）重新出面，他在延安以『孫中山舊友』的資格被介紹爲美國新羣衆的作者——參閱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新羣衆。

的中心城市實際上已成了贛南山地的『後方』。一九三〇年九月，當李立三正想辯護他的奪取武漢及立武漢爲『蘇維埃首都』的計劃時，他曾說過這句話：『我認爲假如我們在山上成立蘇維埃，是一幕滑稽劇』。（註四十）但他們不得不去，不得不駐足的正是山上。紅軍在贛南的深山內，在瑞金農村內設立他們的首都，他們又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一日在當地宣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誕生並建立一個臨時的蘇維埃政府。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於一九三二至三三年間，即其最高發展的幾年間，包含六個互相遠隔的地區，這些地區都散處在華中各省的邊區一帶。一九三三年末，王明（即陳紹禹）吹牛說，蘇維埃中國的領土佔『中國本部廣大領土的四分一』。他指稱六分一或五分一——這兩個分數均被引證於同一演辭中——爲『穩固』的蘇維埃治區。（註四十一）共產國際的報紙向全世界吹牛說，蘇維埃的旗幟統治五千萬，七千五百萬，八千萬中國人民。（註四十二）共產國際有一位作者做了一本書，這本書不幸恰好在黃昏薄暮來臨的時候來慶祝『蘇維埃中國』的曙光，他在這本書內稱蘇維埃中國的人口有九千萬。（註四十三）這些數目字從沒有一致，但通通都是龐大的，而且通通都是大大誇張了的。實際的數目少得多，而只務實際，不尚宣傳底神話的在場者却比較老實點。

因爲借一句中國老話來說，紅軍和游擊隊伍大部分是『如流水行雲』的，故他們佔領的土地隨戰爭的成敗而伸縮。朱德統率的紅軍在各個不同的時期內跨越或暫時佔據的地方，至少在江西八十一縣中佔六十七縣，但我們有很大的權威說：最重要和最穩定的紅軍區域（所謂『中央蘇區』）從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末算是保持相當長久的了，牠也只包含贛閩邊區十七縣左右，人口總數爲三百萬。共產國際的國外報紙雖然隨便抹殺這件事，但『蘇維埃共和國』的主席毛澤東及其他共產黨代言人却往往徵引牠。（

註四十四）其地位於湘鄂，湘贛，贛東北，豫鄂皖及皖湘贛交界等蘇區通通都是比較小，比較不穩定的，而且往往在不斷進攻的壓迫之下解散。

紅軍的相當正規的部隊以及在不斷反抗蔣介石國民黨軍隊的內戰中成立的農民赤衛軍的補助部隊，無論數量和實力均參差不齊 。一九三二年，有人根據共產黨的文獻 ，經過十分審愼的查檢，估計在所有蘇區中活動的全部紅軍總共爲十五萬一千人，就中僅九萬七千五百人有步槍。（註四十五）上述那一位專事揑造的傢伙（即指王明——譯者）却從他的莫斯科監視地，看出蘇維埃統治下的四分一中國也於一九三三年末，把紅軍擴大爲三十五萬人了。（註四十六）但不幸，內戰仍不能夠靠共產國際報章上糊亂列出的數字所代表的兵士來舉行。朱德誠然是歷史上最卓越的軍事領袖，他在一九三二年統率一枝軍隊尙不出四萬人，而且據上海共產黨負責代表的最實在的估計，牠在江西最盛的時代尙不出七萬人。賀龍的神怪似的軍隊從未超過一萬人。其他散處的部隊則人數更少。牠們當然通通都有農民補充隊的幫助，這些隊伍的人數時時有很大的差異，他們的主要作用就是偵察和刼奪軍需品，及在打游擊時，聲東擊西，牽制敵人。

這些軍隊及他們長期佔據的領土實際上雖如是之小但這更足以表明牠們底功業的質。在農民戰爭的歷史中還沒有寫過比之紀錄中國紅軍戰功更光輝的幾頁，牠們與人數超過五、六、七倍，軍備上超過成千倍的敵人從事內戰。五年多，紅軍以謀畧制勝及擊敗國民黨的五次圍剿。因爲得到民衆擁護的無比便宜，因爲有優越的流動性和調度，又因爲有了地勢上的智識，紅軍把蔣介石的最優秀的軍隊，一師一師的截斷和擊敗，並完全以他們奪獲的武器來武裝自己。土地歸農民及脫離國民黨政府底貪婪政治的口號像坦克車一樣駛過蔣介石底僱傭兵的隊伍。（註四十七）

字林西報有一位敎士訪員奇怪紅軍得到當地農民許多方面

的接濟，他發覺『這樣多人民甘願做他們明知道冒死的事情，是一件怪事』。（註四十八）紅軍差不多到一處便驅逐地主，燬棄地契，債券和租約。農民們尙有許多闇弱的地方，但他們總懂得國民黨圍剿的目的是恢復地主的土地和權力。南京政府每次圍剿所宣佈的一切漂亮的『恢復』計劃也只是爲着這個目的。（註四十九）爲了反抗這一點，農民樂意戰死。這是敎士心中無法了解的英勇，偉大，因爲牠太簡單，太無邊際了。他心中反而感謝蔣介石平服農民叛亂時貽害全省的屠殺，掠刼和恣意破壞。

蔣介石的軍政部長何應欽於一九三一年抱怨農民接濟紅軍，且使剿匪軍難於得到糧食或運輸。（註五十）蔣介石於一九三三年告訴一位日藉記者說，剿匪軍『無法區別良民和赤匪』，且總覺得『敵人到處埋伏』。（註五十一）五次圍剿的故事就是國民黨將領們激怒和挫敗之餘唉聲嘆氣，成連成團譁變，敎士和各口岸外國報紙大聲威嚇和詈罵的故事。最後，蔣介石不得不調五十餘萬人上戰場並派出三百餘架英、美、意的轟炸機隊去剷平全部蘇區，消滅各部分的叛亂農民。

蘇區的僻遠，山地，缺乏公路或鐵路，所有這些條件都有利於紅軍抵抗外敵的軍事鬬爭。但這些因素假如從軍事抬到政治、經濟的平面上，就立即成爲不可踰越的內部障碍的根源。『蘇維埃中國』不僅遠離重要的城市中心和主要的交通線(這些交通線都是內地農村的生命線)，而且就在牠自己的領土之內，牠也沒有統治什麽城市或稍爲過得去的縣城。江西省的主要城市——九江，南昌，甚至深處於赤區土地的贛州也還留在國民黨手中，而牠們中間的聯絡線（南潯鐵路和贛江）也一樣。九江從未遭逢嚴重的威脅。南昌受過幾次攻擊，但這也只是爲了軍事上的牽制作用。吉安自一九三〇年受過一次佔領之後，便從未再度淪陷。贛州屢次被圍，但從未陷落。甚至縣城也隨着內戰的一得一失而不斷改變主人。口頭上，目的尙在奪取至少『一

兩個中心或次要的城市』，（註五十二）但這個目的從未達到。除了一次突入福建，結束於一九三二年四月把漳州佔據了數天之外，紅軍便再沒有攻陷或固守任何重要的縣城。國民黨進攻的愈來愈增大的壓力及經濟封鎖的逐漸加緊，反而使他們越發閉守在贛閩邊區及其他華中各省邊區的山寨裡。『蘇維埃運動』仍然只是一個農村的運動。

這些農村的經濟自足制度久已消滅。牠們僅出產米和少量竹、紙和木油，牠們必須拿這些產物來換取最基本的必需品，而這些必需品如鹽、布、火油、農具、火柴等又必須來自外方。這種貿易操縱在商人手裡，因為他們和外間市場保有關係。在蘇區內，商人同時就是地主，放債者和勞動僱主。農民自身也分為幾層，經濟利益互相衝突，自最大和最有權勢的地主被驅逐之後，他們中間的鬬爭只不過採取新的方式罷了。富農仍然支配農村，他們就是半地主，農業工人的僱主，往往還兼商人和放債者。其次是中農，他們佔有的土地僅夠滿足他們的微薄的要求，而且只是偶然僱傭工人到他們的田裡做工。最後便是貧農，他們有足夠的土地或根本沒有土地，迫得租用小塊田地或加入農業工人的隊伍內，這些農業工人除他們的勞動力之外，便一無所有了。貧農和農業工人在經濟上屈服於富農，而中農則按照各種不同的程度搖擺於他們之間。

共產黨居然說牠已替這些具有複雜的內部分化和衝突的農民階級，造成『無產階級的領導』了。牠這種說法有時根據純粹抽象的見解，認為共產黨的定義就是『無產階級的黨』，因此光是牠參加便保證工人階級對農民暴動的領導權。為了加強這一幻想，黨又臨時從城市中調離工人，讓他們在紅軍和若干現成的政府機關中就領導職位。但這種辦法實行的結果，把城市工人的最先進的代表奪去了。假如國民黨的警察的恐怖沒有使他們脫離工人運動，共產黨却辦到了。這些工人一度離開了他們無產階級環境之後，他們已不復是無產階級份子，且不可避免的反而受他們底

農民環境的壓倒的影響。他們脫離了生產的過程，旣不能成爲無產階級領袖，也不能成爲無產階級領導暴動農民代表。

只有眞正的無產階級領導才能挽救農民暴動的瓦解和潰散。只有牠才能使貧農、中農和農村工人聯合起來，共同作反對農村資產階級的鬬爭。也只有牠才能把國民經濟加以全部改組，因而使這一鬬爭得到效果。但又只有經過整個城市的工人運動，只有經過城市工人實行監督農村經濟完全賴以生存的生產和分配中心，才能執行這種領導。換句話說，土地革命必須與無產階級革命結合起來才有勝利的出路。

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形之下，如果國家普遍的落後，在改造農村生活，用有計劃和有系統的辦法使工業直接幫助農業的時候，也一定碰到巨大的困難。在這一點上，先進國的工人階級一定要起一種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作用。這個問題的廣大和複雜在俄國表現得最充份，因爲在俄國無產階級已握有政權，但國家孤立與經濟落後的因素却產生了最嚴重的因難，障碍建立城市與農村底和諧的平衡的工作。現在問題却發生在中國底蕞爾之地的『蘇維埃中國』，即，零碎的叛亂農村和山居社會裡，而中國本身尙受帝國主義和土著的金融資本整個支配着，因此，這個問題更形尖銳，沒有無產階級革命，要努力解决這個問題也是徒然的。

共產黨從沒有接受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遠景。有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經驗之後，牠尙堅持『中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權性』。『工農民主專政』的學說雖然一九一七年在俄國，十年之後又在中國已如是澈底的試驗過，但這一學說仍然是中國共產黨思想兵庫裡的主要武器。一九二五——二七年，牠已引導他們去依賴資產階級卒致造成悲慘的結果。現在牠又造出理由要依賴於純粹農民運動，即，像從前一樣，依賴於另一階級的利益，這種利益與無產階級的利益不相侔合反而發生衝突。一九二七年的失敗已在物力

上使黨脫離了工人階級。一九二七年以後的冒險主義路線又把牠改變爲一個農民黨，在工人當中沒有根基或影響。牠不是俄國布爾什維克黨，而是俄國社會革命黨的中國等價物，牠彷照社會革命黨，提議在資產階級財產關係的基礎上，實行土地的改革。共產黨孤處在農業的，經濟貧弱的小天地裡，牠甚至連改善紅軍統治區域內的零碎散處的半無產階級和農民工人的狀況，也無法着手，至於拿他們做基礎，建立一貫的，可以實行的經濟政策和政治制度，則更不用說了。雖然共產黨有忠誠的決議和訓戒，但他們却不得不依靠富農和商人，因爲他們與外間市場的接觸，即使對於維持蘇區的起碼生活也是不可少的。不管牠自己願意與否，共產黨已成了農村中支配集團的工具了。

富農們出來充當農民暴動的領袖，努力吞併若干地主的財富而他們自己的則加以保持。在許多地方，他們把運動只限於不交租不納稅。等到農民走出這個界限，進行分配土地的時候，他們便擅自取得最好的土地并保存他們自己的農具和耕作牲口。他們在農村宗族裡的地位的影響，以及富農和地主的表面上的衝突，都足令前者易於支配農民的下層羣衆。只要農村仍屈服於商業資本的活動和外間市場，則農村資產階級，富農和商人一定仍舊是支配農村的階級，而且他們也利用他們底重要地位，取得每一可能的便宜。

共產黨與其說抵抗這一發展，還不如說扶植這一發展。一九二八年，第六次黨大會在『不要故意發動反富農的鬬爭，因爲這樣幹就會糢糊農民與地主階級的根本矛盾』的口號底下，（註五十三）對農村資產階級採取調和的態度。因此，富農的土地原封不動。『沒收地主的土地』成了土地運動的主要口號。換句話說，共產黨現在又假設富農與地主的對抗，像他們從前假定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地主的對抗一模一樣。他們現在又設法和農村的富農妥協，恰好似他們從前曾設法遷就城市的民族資產階級（結果造

成慘敗）一模一樣。甚至富農『必然叛變』到反革命方面去的熟套的預言已實現了，（註五十四）又雖然在口頭上已發動某種有限的，或『次要的』反對這些必然反革命份子的鬬爭，但事實上，實際的領導權像從前一樣讓給他們，而他們的經濟利益也一樣得到保護。共產黨還迫得號召貧農，農村工人，工匠和手工業者犧牲他們本身的眼前利益，爲的是不要疏遠富農和商人。

一九二九年共產黨中央招認道：『因爲要和富農聯合，農業勞動者的利益便犧牲了……我們害怕富農的反革命叛變，故要求農業勞動者減低他們的要求』。(註五十六)一九三〇年在閩西，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不得不『和商人妥協，以解決必需品輸出入的困難。他們不僅宣佈保護商人，而且免除他們的稅，雖然農民尙付百分之一五的地稅……他們沒有辦法遏止商人抬高的物價……有時他們走得這樣遠，竟然限制店員和工人的經濟鬥爭』。（註五十七）

一九三〇年五月在上海開催的秘密『蘇維埃代表大會』採用了和富農商人公開妥協的政策。（註五十八）這種政策的反無產階級的後果，不僅青年反對派區芳已在一篇輝煌的分析文章裡指出過，（註五十九）就是黨內有些人也糢糊的察覺了。陳紹禹批評過蘇區的同志，因爲他們藉口『農民反對』來辯護他們的不組織農業工人。

他問道：『我們因爲害怕富農就不組織農業工人嗎？那麽我們就絕不是無產階級黨了……在蘇區許多農村裡，富農的心理支配作用。富農在羣衆組織和黨內，佔着不小的地位。他們只曉得富農的利益。這就是說，我們已把富農的心理視爲農民羣衆的基本心理了……由於同樣的道理，他們不組織店員，手工業工人和小工廠工人。例如在豫鄂，「保護中小商人利益」的口號居然公開提出來了，結果，店員和手工業工人的要求一點也沒有提出』。（註十六）

一九三〇年末，共產國際用如下的話描寫當時的情形：『土地革命的最重要的任務幷沒有解決。不僅富農，甚至小

地主也混入蘇維埃，混入新政權機關，混入紅軍。富農設法竊取土地革命的果實。富農的口號——按生產工具分配土地——並沒有碰到充分的抵抗。在某幾個地方，有人提議只沒收佔五十畝以上的地主的土地。另外有些地方則提出償付五十畝以下底地主——高利貸者的債務的口號……平分土地革命最重要任務，但實行的地方寥寥無幾。貧農的組織工作甚至還沒有着手……苦力和農業工人並沒有組織工會』。（註六十一）

自李立三替這種情形負了當然的責任，陳紹禹起而代之以後，局勢不僅沒有改善，倒還愈弄愈壞。一九三一年某蘇區的一位通訊員寫道：『政府三分之二在富農手中』。（註六十二）同年八月，另一位通訊員寫道：『富農担任黨的一切職務』。（註六十三）一九三三年，一位重要代言人在蘇維埃首都瑞金寫道：『土地是分配了，但地主和富農也分得土地且還是其中最好的土地。許多地主和富農份子尚在農村中保持他們的權威和地位……他們有不少人操縱黨和政府並利用牠們來實現他們本階級的利益。……在許多地方，土地問題似乎已完滿解決，但仔細考察一下，就發現原來地主也分得土地，富農尚保持他們的優美的土地』。（註六十四）

『蘇維埃共和國』主席毛澤東寫道：『許多地主和富農都染上革命的色彩。他們說他們贊成革命和分土地……他們都很積極，而且有歷史上的便宜（「他們講得好，寫得好」）可憑，故此在頭一個時期，他們竊取了土地革命的果實。從無數地方收集來的事實證明他們已竊據臨時政權，混入武裝隊伍，操縱革命組織並比貧農分得更多更好的土地』。毛澤東估計『中央區百分之八十地域，二百餘萬人口』陷於這種情形。（註六十五）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瑞金開第二次『蘇維埃大會』，毛澤東向大會報告，在這個報告裡，他暴露了一件驚人的事實：一九三三夏舉行土地審查運動時，『在中央蘇區查出六千九百八十八家地主和六

千六百三十八家富農佔有龐大逾額的土地，他們的土地遂遭沒收並藉沒了他們六十萬六千九百一十六元的欵子』。（註六十六）這證明事實比之黨的決議案更嚴酷，更帶強制性。甚至爲了貧農得到更大的利益而重分土地的企圖也放棄了，因爲恐怕妨害收成。是年末，一條命令頒布下來，禁止繼續重分土地；因爲這樁事已成了『改善農民耕作的最嚴重的凝碍』。（註六十七）

農業勞動者，手工業者及其他農村工人的要求也同樣威脅蘇區的脆弱的經濟組織。在中央蘇區，這一階級估計有二十萬人。(註六十八)這些工人一個，兩個或三個，散處在田間，村中工作，或遊行就食，他們在農村經濟中佔着一個輔助的地位。資本家沒有工廠工人是不能生存的，但農民不僱幫手却能過活。就他們脫離生產手段和爲工資而出賣勞力這一點看來，這些工人是無產者。但他們互相分散且在生產中不起獨立作用，這件事又表示他們有組成一般農民小資產階級羣衆底一部分之勢。他們無論如何不能起獨立的政治作用。根據他們的利益來製定任何首尾一貫的政策都是不可能的。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就有辦法整頓農村勞動，使他們得到經濟手段，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但他們現在的處境却是孤立的，當他們設法減少工作時間，增加工資的時候，農民便極力反對或干脆解僱。農民已處於最危殆的境地，他們絕不能倍增他的工人的工資或人數，否則便不堪設想。在商店和小企業中也一樣，商人以完全停止活動的簡單威脅來答覆店員的要求。這就是表示慢慢窒息貿易之意，商人知道自己手中握有鞭子。

『臨時蘇維埃政府』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成立之後，不久通過一篇堂皇的勞働法，這篇勞働法的條文較之國民黨早期的勞工條例要完滿。牠規定成年工爲普遍的八小時工作，十六至十八歲的青工爲六小時工作，十六歲以下爲四小時工作，又規定增加工資及一般的改善工人生活狀況。爲了向蘇區外面，尤其是向國外宣傳起見，說得到就要做得

到。但在『蘇維埃中國』本身，人們很快就知道：原來『採用於大城市與大規模生產的（法律）不能完全機械的應用於經濟落後的的蘇區』。（註六十九）因為碰到商人農民的反對，施行這條法律的企圖早已放棄了。湘贛黨委員會報告道：『同志們認為勞働法是不能實現的，是純粹宣傳的。省委已打擊這種傾向，但沒很大效力』。（註七十）人們想出許多推的辦法來掩飾這條法律之無法施用。最常有之推托之一就是詭稱新工作時間不能實施，『因為沒有鐘來計算時間！』（註七十一）上層領袖叱責下辦事人老是『漠視』該項法律，但過後他們也終於迫得承認牠是『不能實現的』。

洛甫（一位重要代言人）描述實行增加田工一倍工資（每年由八元增至十六元）！和減少工時的不幸的結果。工人干脆被解僱了。『結果農民不滿，工人也懷疑我們的領導』。改善田工的生活狀況當然是必要的，『但這種改善必須是農民認為必要的，可以行得通的。』該法也同樣施用於商店學徒和幹河上生意的船夫。『我這裡有許多商人和僱主的請願書，我們從這些請願書就可以知道，機械的運用勞働法將必然使工商業衰落』。改善學徒的生活程度和待遇當然是必要的，『我們必須使店主僱傭學徒能夠獲利，不要毫無利得』。（註七十二）他又叫工人了解，他們雖然是『國家主人』，但他們必須承認同時仍是『被剝削階級』，不應提出『過份要求』或舉行罷工，蓋罷工的唯一結果就是『破壞工農同盟』。（註七十三）這就是『蘇維埃』底『民主專政』的眞正內容。

在這種情形中，組織農業工人工會的工作不是干脆失敗，組織不出半個團體來便是組織一些冒牌工會，這些工會所幹的事，實際上違反工人的利益。蘇區『工會』的數字非常不一致。短短一年之內，公佈出來的不同數字竟從一萬四千至三萬，十五萬，二十二萬九千，甚至二百二十萬！（註七十四）但是不管人數多少，這些工會的性質之可疑

，就是連上海黨的工會中心也不得不抱怨了。牠在一九三一年的報告裡談及工會內發現『店東和富農』。（註七十五）翌年，牠寫一封信痛罵江西的工會辦事人，責他們准許『農民，僧侶，店老板，工頭，富農，地主』爲會員，但『另一方面則諸多藉口，使大部分農業工人，苦力，店員和工匠不得入會』。從事這方面工作的同志被駡爲『輕視工人，對他們擺架子』。該信指這些工會是『反無產階級性質的，多份代表地主，富農和店主的利益』。（註七十六）

瑞金有一位黨的領袖寫道：『在蘇區，一般的說來，黨是漠視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我們到處看見有不斷漠視工會運動的嚴重現象……委員會從未討論過牠……無產階級領導多份尚是黨底文件上的空辭』。（註七十七）

這就是使江西的蘇維埃試驗全盤失敗的鐵硬的事實。紅軍曾驅逐地主，實行分土地，喚起廣大農民羣衆的熱烈情緒。但因爲沒有有效的經濟統制，沒有一個有力的無產階級羣衆運動，不僅在大城市裡，就是在蘇區毗連的縣城裡，（註七十八）富農也重現爲地主，商人也重現爲支配階級。貧農和農業工人連最微小的物質勝利也不能獲得和保持。最簡單的必需品的價格也漲至高不可攀的水準。失業蔓延起來了。農業工人一樣開始懷疑他們爲什麽作戰，並希望只要有和平，無論什麽樣的和平也接受。羣衆的熱情冷却了。紅軍的逃脫者數目愈來愈多了。（註七十九）蘇區沿邊已開始痲痺，且不久就蔓延到中心。消極耗蝕了羣衆的創意力。悲觀支配了領袖們。結果成了黨內喧傳的『羅明路線』，因爲羅明（福建黨領袖）是首先投降這種情緒的人。羅明說：『即使我們最優秀的領袖到來，或者把史大林本人請來，或者甚至從墓裡把列寧救活，一齊向羣衆講三日三夜，我不相信能把羣衆的情緒改變過來』。（註八十）

一九三三年全年，『羅明路線』像毒菌一樣蔓延『蘇維埃

中國』的血管。牠從福建傳染到贛南的會、信、安各區，鄧小平領導的黨工作人員干脆棄職潛逃。（註八十一）紅軍徵募運動黯然失敗，遂有徵兵之說。少年先鋒隊成隊逃脫，並實行與紅軍的追勦部隊火併。（註八十二）農民往往逃入山中，不肯替作戰軍隊執行運輸工作（註八十三）『游擊隊不僅很少增加，而且日益縮少，如過去之會、信、安，現在之宜春和南豐便是。挾鎗逃脫和叛變不斷發生……腐敗和墮落不斷發現。有些游擊隊表現土匪的傾向。……這不僅是游擊隊的情形，就是在獨立部隊中也一樣，如拒絕執行命令，搶刼金錢等……「吃土豪」（搶刼富農的積蓄）的現象蔓延非常之廣……黨的工作人員携帶小行囊入來，不久就增加成大件行囊。如果他們隨身帶着大行囊，不久就變成兩挑擔子』。（註八十四）
新羅明到處出現，連紅軍的上級機關，最後連瑞金中央政府的各部也發現了。工農監察委員何叔衡被撤職，因爲他宣布中央蘇區三百萬人民中，有兩百萬人受富農地主壓迫，『蘇維埃各級政府已成了地主富農壓迫民衆的工具。』（註八十五）
周恩來號召『反對各種各色動搖，悲觀，消極，失望，疲倦和遇難屈服的鬭爭』。（註八十六）其他領袖抱怨：黨工作人員的不斷遷換，區域的常常變更破壞了羣衆的熱情，無論什麼軍隊來到，都把農民嚇逃到山上。『他們不管牠們是紅軍也好，白軍也好』。（註八十七）
紅軍碰到這種情緒，他們於一九三三年夏作了確實英勇的努力，把蔣介石的圍勦擊敗，但這幾個月的『勝利』却是完結的開始。國民黨政權的中心如碰不到攻擊，牠的優越力量之取得勝利只是時間問題而已。國民黨的陸空軍事力量和嚴緊的經濟封鎖產生其必然結果，只是時間問題而已。蔣介石的轟炸機蹂躪全部蘇區，他的軍隊一面挺進，一面修築碉堡。蔣放棄派遣大軍深入赤區的戰畧，蓋軍隊因此遭受截斷和殲滅。他的五十餘萬大軍，由德國塞克特將

軍訓練，使用歐美軍火廠的最新式武裝，像一張密結的鋼網包圍着蕞爾的蘇區。炸彈，大礮和火把進行猛烈和迅速的，而飢餓則進行緩慢和痛苦的驚人屠殺。（註八十八）一九三四年八月，蕭克帶領一枝紅軍，大約一萬人左右，衝破封鎖線，向西逃去。朱德和毛澤東的主力也於十一月跟踪逃出。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日，自中國『蘇維埃共和國』宣佈成立差不多整整三年之後，蔣介石的軍隊勝利開入蘇維埃首都瑞金。蔣介石雖然不克如願，消滅一切『赤匪』。但他替地主奪回江西，畢竟成功了。

紅軍越過湖南，貴州，雲南和四川以至陝西，中間經過許多週折，忍受難於相信的困苦，幹下更難於相信的勇敢機智的戰功。這次『長征』將載於史冊，成爲亘古以來最煊赫的戰績之一，但牠却使紅軍更遠離本國的政治經濟中心。江西的失敗不能撲滅農民戰爭，但牠却給了有組織的叛亂的農民運動以沈重的打擊，而當時已非常低沈的城市工人運動也因而受到莫大的打擊。恐怖，投降和叛變的新浪潮把重要城市內共產黨的大部分殘餘機關破壞了。事變已揭破無數宣傳的神話了。共產黨人逃入中國西北部的荒漠之地也就是走入一個新的絕境。

第二十章　新的『民族統一』陣綫

第二十章　新的『民族統一陣綫』

國民黨政制於一九二七年上台　，奉着帝國主義列强的上諭，去鎮壓工農羣衆運動。在那一年的大屠殺中，又在往後十年那樣殘暴地對付工農和激進知識份子的內戰和恐怖中，國民黨完成了牠的主要機能：充當帝國主義和人民中間的一架緩衝機。

外人的利益那樣充分的支配着中國資產階級的政治和經濟生活，他便直接和間接的參預了那進攻中國人民大衆的不斷的戰爭。那些派去鎮壓華中叛亂的農民的軍隊，從所有歐洲，日本和美國的軍火廠方面取得武裝。德國的法西斯教官訓練那些用來反對人民的軍隊。美國和意大利的軍官教導國民黨的飛行員如何去轟炸平民。美國、英國、意大利和德國的飛機把中國上空弄得可怖，令揚子江各省的無抵抗的農民們胆戰心驚。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和日本的炮艦向中國的江河沿岸的『土匪』——這是稱呼農民叛亂者的官場話——不停地開火。美國於一九三三年給了南京政府一筆五千萬美元的棉麥借款，供作完成江西戰事所需的最後一筆財源。在大城市中心駐紮着美國、英國、法國、日本和意大利的陸軍和海軍，直接保護外人利益。英、法和日本的巡捕在外國租界不懈的搜捕激進學生、罷工領袖和共產黨人，整千整百的把他們移交給國民黨軍政當局，受酷刑和處决。日本帝國主義於一九三一年重新發動直接的進攻，這次進攻伴着近代掠刼戰爭之一切可怖行爲

；但日本在這次進攻中，只是爲了他一己的特殊利益而把那一個同等可怕的戰爭延續下來吧了，那個戰爭就是國民黨和所有列強爲了他們的共同利益而聯合一致向被剝削和充滿恐怖的人民發動的。日本的侵畧（經過連續不斷的階段而發展至一九三七——八年的大戰）主要的意義是表明豺狼中最瘦又最飢餓的那一隻已經脫離了狼羣，重新努力去爲自己攫取食餌中之較大部份。

日本資本主義依存於一個輕工業的基礎和一種封建的落後土地制度之上，此外還有一個雖然高度集中但比較脆弱的金融上層建築。日本是帝國主義國家家族中之一個後來者，牠已經四十年來就設法操縱中國，爲的是想創造一條無滯碍的河床，供他自己的生產品外流，並獲得基本的原料，主要是煤、鐵和棉花，這些東西牠是那樣可憐地缺乏。由於牠的經濟的脆弱，日本比之牠的強大的競爭者——英國和美國，更少能力去抵禦一九二九年開始的世界不景氣的壓迫。世界市場對日本商品的關閉直接造成了一九三一年滿洲的入侵。勝利沒有使牠停頓下來，只是助長新的冒險吧了。大陸軍事活動的巨額消耗和恐慌的尖銳的酷烈化增加了日本經濟的緊張性。一九三七年日本又訴諸武力，想有系統的驅逐牠的帝國主義競敵——英、美，因而把中國更大的部份納入牠的軌範，並使全部中國經濟滿足牠的需要。

英美帝國主義的構造與日本不同，牠們是植根於高度發展的重工業之中，而這些重工業又由一條強有力的金融網線編成龐大的單位。牠們供給中國經濟以重工業品，藉此能夠絕對支配牠，牠們又保持直接和間接的金融支配權力，藉此又能夠抽出必需的超額利潤。牠們的互相競敵，時至今日，已把這個行程攔斷了，但正是這個遠景才把中國變成資本投放的一個具有偉大潛能的貯水池，對於這一點，大列強們將來一定終於發生衝突的。

因爲日本帝國主義想對中國市場、中國勞動力和中國資源

直接和整個不分地加以剝削，藉此來維持牠本身的脆弱的經濟結構，所以牠不僅和牠的大敵人衝突，而且還不能容忍處於競爭地位的土著中國工業的一種相對的增長。牠不能讓出半點餘地給一個半獨立的土著剝削階級來發展。（附註一）英美金融資本對中國的更進一步的剝削則不僅容許，而且絕對需要中國資產階級充當一個代理人來服務。爲着這個理由，那個無能獨立發展的中國資產階級自然寧可臣服於紐約或倫敦也不願臣服於東京。

當日本於一九三一年進攻之時，國民黨無告地乞援於英、美。但日本已經狡猾地選擇了好多的時機，滿洲侵畧發生之時，適逢舉世焦頭爛額於經濟恐慌，所有帝國主義的內部競爭亦隨之而尖銳化，這兩種條件已產生了一個戰畧的眞空，在這個眞空裡，日本可以很少或者絲毫不怕即時的干涉而向前做去。牠的競敵誰都沒有準備或願意發動一個制霸亞洲的武裝鬥爭。牠們還並不是不願意扶助日本對蘇聯來一次最後進攻的計劃的。

國民黨政制害怕民衆較之害怕侵畧者更甚，牠不敢動員民衆舉行一次民族革命戰爭。牠反而採取『不抵抗』的政策，儘量退讓，希望日本得到滿洲，或者充其量，得到滿洲和

（附註一）『戰爭對上海工業的難於估計的大損害正在每天有系統地增加着。負責的日本官吏承認在南市、浦東以及其他尙對外人封鎖的區域，日本士兵繼續破壞或拿走一切華人工廠中之一切機件。在虹口和楊樹浦，這個破壞運動已經告成。而閘北則在華人撤退時簡直是一片廢墟。這種工業破壞的公認目的是完結中國的工業發展，這種發展正開始威脅着日本對中國市場之支配地位。若干日本人已聲稱他們已破壞了和掃除最近十年來所成就的中國所有工業的發展。』——一九三八年一月三十日。『紐約時報』特約通訊。

華北就滿足。最初，牠設法運用抵貨的武器，但一九三一年，在日本進攻上海的壓迫之下，牠便放棄了，而且積極的鎮壓抵貨運動。之後，牠想向日本人證明牠的有中用，便加緊進攻華中的農民，而對獨立反日運動的任何表現，都加以摧殘。

因之，差不多自然而然地發生這樣的事情：既然人民中每一階層都在日本的鞭撻之下，激發到這一程度或另一程度，則凡是他們想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便被迫而從事於反國民黨政制的鬥爭。國民黨無法保衛國家領土，學生們對之最先而且最兇猛的發生反響，他們示威地把國民黨的旗幟踐踏在脚下。他們襲擊、搗毀國民黨黨部。他們奪取火車，成千成萬的擁到南京去攻擊政府本身的衞城。好像在一九一九年一樣，他們衝到賣國總長的面前。他們衝入外交部，毆打外長王正廷（現任駐華盛頓大使），迫他辭職。他們還阻止他的繼任者顧維鈞（現任駐巴黎大使）上台。他們從蔣介石方面取得一句諾言：在華北戰場馬革裹屍，這是他已經慣常作的諾言之一。但幾天之後，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蔣却實行他的戰畧上的辭職。他從旁面監視着，而孫科和陳友仁則在他們的倒霉時機來秉政，負責鎗擊和刺死學生示威者，學生們便終於像牲畜一樣成羣的被趕離南京。學生們到處以同樣率直的英雄主義舉行壯烈的示威。他們在上海把市長變成俘虜，迫他辭職。

學生運動不久便低落了。一九一九年，學生們曾引起民族主義運動的爆發，這個運動把工人、農民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捲入第二次中國革命的鬥爭中。一九三一年，學生的火花一閃便滅了，因爲學生們一貫處境非常孤立之故。一九一九年，資產階級爲他們在戰爭中的利得所鼓舞，便鼓勵學生們起來，並自己站到前面去領導那爆發起來的廣大民族主義運動。一九三一年，資產階級却用全力去打擊反帝運動。一九一九年，新近才招入工廠的工人們迅速地起來鬥爭，又通過他們，幾千百萬的農民也被喚起來了。

一九三一年，因爲一九二七年的深刻的失敗的結果，羣衆尚陷於消極狀態，伏處不動。（註一）

但抵貨却也一時令中國工廠的機輪轉動得快了一點。有一度微弱的景氣，開始在工人中刺激起自信的情緒。罷工開始發生，但罷工者到處都被打，被鎗殺，被打散。工人組織都受國民黨的代理人和暴徒控制。他們多數是完全沒有組織的。沒有一個政黨具有一面旗幟和一個政綱，工人們承認是他們自已的。

這樣充分地暴露國民黨的懦弱作用的同一事變，也同等無情的暴露共產黨的無能和孤立。共產黨極度無能去把國民黨打散和壓制着的力量團結起來。牠不能把瀰漫於人民所有階層（尤其是那些最有直接受日本帝國主義進攻危險的階層）的深刻仇恨轉變成有組織的力量。在滿洲，幾十萬兵士和農民組成義勇軍（紅鬍子或『土匪』，他們直到今天還不斷搖撼着溥儀的不安定的皇位，在他們當中，共產黨發生很少或根本沒有影响。（註二）在滿洲諸城市的工人當中，黨完全沒有立足地。（註三）在上海及中國本部其他城市中心，黨已經完全脫離工人階級，也不能利用這次侵畧所造成的機會去重獲牠已經失去了的陣地。共產黨知識份子在學生運動中盡若干作用，但因爲與工人缺乏連絡，他們不能防止這個運動中的國民黨政客的陰謀詭計，在國民黨恐怖的無情打擊之下冰消瓦解。

黨提出的抽象的抗日口號從工人方面得不到什麽反响。僅僅愛國的呼籲不能一筆過抹煞長長的一連串的致命錯悞，這些錯悞已削弱了黨，破壞了牠在工人中的權威和聲望。共產國際的國外宣傳機關照例公佈愈來愈多的報告，說明在抗日運動中共產黨之成功，但在當地，黨自己的報紙却更精確的反映黨的眞正弱點。『自九一八以來，黨和赤色工會已在工人運動中絕對沒有領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的『紅旗報』說。日本入侵之後，工會委員會已『無法建立一張工人報紙。』（註五）想建立工人抗日會的微薄的

努力也沒有多大成功。

『工人羣衆尙沒有廣泛的積極的參加鬥爭，』日本人侵畧開始兩個月之後，另一個共產黨的機關報說。『這由於……一方面赤色工會及其先鋒隊共產黨不能團結羣衆於其周圍。在實際鬥爭中，我們沒有將抗日的浪潮與階級鬥爭的大胆的推進連繫起來。因此，中國工人階級，尤其是在上海，雖然浸浮於抗日情緒，却不能立即响應『打倒日本强盜！』，『反對佔領滿洲！』………等口號，因爲這些口號尙未與當地工人羣衆的迫切要求（如增加工資，發房貼、米貼………）連繫起來。顯然的，純粹抗日口號不能使罷工工人得到工資增加生活狀况的改善。』（註六）中央委員會的勞工部也在這個時期寫道：『我們無法組織成功一個反帝罷工。』（註七）

但一個罷工運動與黨完全無關，而且不顧野蠻的壓迫，却開始在上海醞釀起來了。永安紗廠曾從抵制日貨中大獲其利，這個廠的工人於十二月罷工要求增加工資。在這次罷工尙未受摧殘之前，有幾個工人和國民黨的警察衝突遇害。一月七日，上海三十四間日本紗廠的六萬工人發動一次總罷工。這個罷工是在純粹經濟的基礎上號召起來，反對尅扣工資和解僱的。（註八）兩個星期之後，除了七千之外全體工人都被迫回廠復工或到另外地方找工做了。

七天之後，一月廿八日，日本的海軍攻打上海。十九路軍出乎意外地，而且違抗着蔣介石的直接命令，舉行頑强的抵抗。交戰支持了五個星期。七年前，英國巡捕射殺不過十三個學生，就曾促成了一個癱瘓的總罷工。現在日本侵畧者却自由地利用公共租界的法理上中立的地域，作爲屠殺性空襲及炮轟的根據地，把工人階級的閘北擊毀，把整千整萬的平民打死。但廣大的工人羣衆，（他們多數已因爲戰爭失業）却仍舊消極地觀望着。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工廠機車大致和從前一樣地轉動。有一小隊工人在吳淞和士兵們比肩作戰，另一些工人則被小心地隔離兵士，僱

用於後方。上海工人階級的廣大羣衆並沒有參預。（註九）共產黨雖然後來要求分沾十九路軍的光榮，但實際上在鬥爭中沒有盡什麽作用。（附註二）

一九三三年，共產黨領導機關尙在悲歎各城市中『工作缺乏正常的持續力。』牠歸咎於牠的地方委員會不能在天津或上海組織一個抗日的工人組織。（註十）

共產黨之所以不能團結羣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因爲牠既沒有力量也沒有政綱能夠組織他們作反對中國資產階級的鬥爭。正好是一九二七年資產階級國民黨反動的勝利才給日本的帝國主義侵畧舖好道路。正好是革命的失敗及往後五年來國民黨的鎭壓，才在帝國主義進攻之前，在心理上和政治上解除了羣衆的武裝。共產黨現在不得不替牠在這種災難的積累中所盡的作用和責任，償付無能的代價。

資產階級的反動及其軍事獨裁在這整個時期這樣完全的佔着優勢，其他政黨竟沒有一個能夠抬起頭來對國民黨提出任何有效的反對。敵對的軍閥此起彼伏的向蔣介石的統治挑戰。他們僞善地拿抗日的旗幟來掩飾自己，希望利用蔣的顯然的賣國行爲。但蔣却一個一個地把他們收買或打垮。

（附註二）共產國際的中央機關報爲了證明上海十九路軍的抗戰『得力於共產黨人的工作幷不少』，竟走到那樣遠，稱日本工廠的罷工是『一九三二年一月初………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組織起來的。』（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共產國際』）這一點之爲分明的僞造。不僅參閱一月份『中國論壇』，就是參閱一月份的其他報紙也能夠證明。著者本人就經過這次罷工，碰過罷工委員會的委員幾次。戰事爆發時，這個罷工已遭打破。在戰爭當中，工人乾脆被趕出廠。但工人一直到四月，即戰事結束後一個多月，尙拒絕回日本廠復工，在這件事中，共產黨盡了若干作用，這却是眞實的。

馮玉祥於一九三三年八月在察哈爾豎起獨立的旗幟，但他碰到必需要實現他對侵畧者宣戰的經常恫嚇時，却寧可和蔣講和了。同年十一月，一羣國民黨的失意政客和十九路軍的長官們聯合叛變反蔣，這件事在福建省鬧了幾個星期。他們走得這樣遠，竟用試探的態度向共產黨獻媚，宣佈廢除國民黨，成立『人民生產黨』來代替牠。但他們也很快就被蔣的一排銀彈制服了。十九路軍便遭解散。

小資產階級的急進小集團企圖對蔣介石的軍事獨裁採取一個原則反對的立場，但牠們都是短命的。當汪精衞於一九三二年一月投入蔣的陣營去的時候，他對這個獨裁的微弱的反抗便完全解體了。鄧演達的第三黨，自從鄧氏一九三一年被蔣槍決之後，便若有若無的存在着。小資產階級反對派是由知識份子的小宗派組成的，這些知識份子結集在失意政客和野心將軍們周圍，從事於短暫的謀叛，而這一類謀叛却總不出爲爭權奪利的範圍之外。蔣介石的國民黨軍事獨裁是一個耗費甚大而又不夠格的政治工具，但牠却是資產階級所能設計出來，替其利益效勞的最好一種了。

在共產主義運動中，唯一一貫對共產黨挑戰的是托洛斯基反對派。牠的核心是一九二七年後從俄國回來的一羣學生。他們一開始提出他們的批評，便很快被開除出共產黨，他們中有許多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裡，已從俄國左派反對派的文件中，找出革命所遭受的大災害的唯一合理的解釋。他們於是成立幾個小組織，開始出版一些地下的刋物。一九二九年，陳獨秀和他的一大羣追從者被開除，他們也過着一種獨立的生活，一直到一九三一年，所有反對派的團體才在國際共產主義同盟的旗幟之下，合併起來。中國的托洛斯基派團體也像其他國家的托派一樣，繼續自認爲共產黨之一派。牠設法去發揮充分的影响，促使黨的政策改變，黨的政策改變就會容許牠回到黨的隊伍裡去的。因此，反對派一貫就是一個細小的宣傳組織，刋發牠自己的定期刋物，但却不能夠在階級鬥爭中起什麽作用。

托洛斯基派也受着思想混亂之害，這種思想混亂之發生却是大失敗及羣衆退出政治舞台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政治重定方向的過程是一種緩和痛苦的過程，而且因爲處於孤立和恐怖的環境，他們之進行討論大都是未受行動證驗的。一九三三年之後，當托洛斯基派放棄『改良』共產國際的企圖並發動創立一個第四國際的運動之時，上海的團體便改組爲『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一九三四年開始在若干上海工廠中爭取一些小小的據點。

托派的人數雖少，但並沒有逃過國民黨恐怖手段的沉重打擊。托派雖然被他們的史太林派敵人攻擊爲『反革命份子』和『蔣介石的代理人』，但在蔣介石的恐怖行動中，他們却喪失了他們若干最優秀的同志。整整兩個中央委員會因爲被捕，給清除了。死於酷刑及餓斃獄中的，其數不少。一九三二年，陳獨秀和另外十一個人被捕，判決長期徒刑。一九三四年，重新成立的中央委員會又因爲五個負責人員的被捕，給打成粉碎。國民黨對付所有牠認爲是牠底統治的革命政敵時，總表現出無情的兇殘性，現在原來也不斷用同等無情的兇殘手段來對付牠的『代理人』哩。

雖然托洛斯基派從未有團結充分的力量，對事變發生任何直接的影响，他們却堅决主張需要有一個基本的民主政綱，作爲工人運動復興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出發點。他們認爲，只有憑這個手段，工人運動才能夠復興，才能夠成爲（牠也一定要成爲）反日本帝國主義鬥爭的前鋒。這件事的意義就是說：根據工人的最簡單的日常要求，在工廠裡進行最耐心的，不懈的組織工作。當工人們爲工資、工時和米貼等微薄的改善而罷工、遭受捧打、追捕、酷刑和槍斃時，他們就不難了解爲最基本的民主權利——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而鼓動的意義了。這些口號是按照直接而易於了解的邏輯，從工人們所參加的每一個細小的一部分的經濟衝突中引伸出來的。這個政綱歸結爲普遍全權的國民會議這一口號，牠給所有受國民黨獨裁壓迫和恐

嚇的各部份人民，提供一個共同的出發點。

事變却使史太林派迫不得已地在這方面走了半步。他們自己的『蘇維埃政權』的政綱沒有具備工人們所能領畧的迫切的意義。他們的『擁護紅軍』，『擁護蘇維埃』的口號與工人們的眼前利益或要求都沒有關連。這一點使共產黨變得無能，而受了這種無能所驚嚇，牠突然於一九三一年秋，採用了『選舉的人民政權』的口號，這個口號有類似托派那個普選的國民會議的立場之處。雖然黨的領導機關花了許多力量去解釋，但牠甚至向牠自己的黨員也不能夠充分的解釋清楚『人民政權』與『蘇維埃政權』或『人民政權』與『國民會議』間之不同。(註十一)牠不能把這樣一個爭論發展到牠的邏輯的結論，因爲即使是暫時的採用『人民政權』的口號，這也就是模糊的，但却是無誤的承認：『蘇維埃政權』的號召，從那些受資產階級軍事獨裁重量壓毀了的羣衆方面，不能喚起什麼反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於一九三二年九月間召開的第十二次全體會議中，提議在滿洲『建立一個選舉的人民政權』，(註十二)但實際上這個口號却悄悄地放棄了。共產黨後來就要回到這個根本正確的口號，但牠將以一種扭曲的，變形的形式重新提出牠，並不是把牠改變爲工人革命的一支槓杆，而是把牠改變爲套在工人階級運動頸上的一個圈套。但這件事的發生也要等到內地農民蘇維埃的實驗已澈底得出牠的結論，而牠的失敗也因爲犧牲了整千整萬的農民生命而寫定了的時候哩。

蔣介石因爲上海的停戰而獲得休息時間，便於一九三二年夏重新在華中發動他的剿赤戰爭。紅軍希望利用那些派來圍剿他們的軍隊裡的抗日情緒，他們便於一九三二年四月對日本『宣戰』。(註十三)一九三三年一月十日，正當日本進攻熱河之前，紅軍向任何願意參加反對帝國主義侵畧者底戰爭的武裝力量，提出聯合戰線。（註十四）牠提出的條件是停止反赤戰爭，給人民以民主權利，和武裝民衆

。憑這一點，紅軍的領袖們又一次承認：如果他們希望衝破他們的山寨的孤立，他們不得不回到最低限度的民主政綱。但蔣介石尚希望日本人滿足於他所作的讓步，他集中主力去剿滅叛亂的農民，確保他在華中的政權。共產黨人因爲在國民黨軍隊的後方缺乏羣衆的支持，便不能迫令對方接受他們所提出的完全合乎原則的聯合戰線。一九三三年三月熱河潰敗之後，蔣介石在牯嶺召集他的將領們會議，他嚴厲地反覆申明他的基本策略：『在共產黨人剿滅之前，談什麽抗日是無用的！』他恫嚇着說，他的軍官中有任何人認爲共產黨提出的聯合戰線是值得考慮的，牠要加以『嚴懲』。（註十五）進攻農民蘇維埃的戰爭繼續進行，雖然這個戰爭一直要延長到一九三四年末，但蔣終於重新奪回了江西南部。

第二年，紅軍衝過九個省份，跨越江河及環繞西藏邊境的崇山峻嶺，奪路而走。蔣介石調遣他的最優良的師團去追剿，但他們從未趕着這個善於逃避的敵人。紅軍表現了無比的戰略上的技巧，表現了一種忍受最沉重底損失，最磨難成困苦的堅忍不拔精神，終於和兩年前已開入四川的其他赤色武裝力量聯合，於一九三五年十月，又終於抵達陝西。

紅軍向西逃走和被迫而取消江西的『蘇維埃共和國』，這對於紅軍不僅是一種軍事的失敗。不錯，紅軍逃出了封鎖線，多多少少地保存了實力，牠阻止蔣實現他的夙願——紅軍之肉體的消滅。但這次失敗主要還是政治性的。牠把這個企圖結束了：這個企圖就是妄想單獨以一個叛亂農民階級的散漫的各部分爲基礎，建立一個革命政權。紅軍不僅迫得放棄江西農民，讓他們聽天由命。他們還不得不放棄那些已經把人引入一條死巷的政策。人們說過許多話，寫了許多文章，奢談全中國蘇維埃革命之迫近的勝利是發動一個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必需的前提條件。（註十六）一九三四年一月間在瑞金召集第二次蘇維埃大會時，『蘇維

埃中國』正『不斷增長和獲得優勢』，此乃『不可克制的，發展着的蘇維埃革命』之結果。（註十七）這些急切希望，當紅軍向西開走時，不得不連同江西區一道放棄了。紅軍和共產黨既已無法成爲工人階級手中的一個工具，他們現在就開始朝着資產階級的方向走去了。投降的情緒已支配着許多黨的機關。在城市中，大批青年共產黨員被江西的失敗弄得志氣消沉，眼見得他們面前沒有新的前途，便轉變到國民黨方面去了。蔣介石的恐怖機關吸收這些叛徒，利用他們的出賣，將共產黨殘存於城市中的力量加以全般的瓦解和破壞。（附註三）他們對共產主義的放棄和

（附註三）在這些叛徒中，有若干著名人物，如黃平，短命的廣州公社的『外交部長』。王明於一九三七年有點過遲的發現一九三四年的叛徒曾通通都是『托派』。這個名詞之用作隨便的帽子加在任何色彩的政敵頭上，已因爲蘇聯的肅清而風行一時了。厄德加・史諾在他那本書『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中，輕率地照抄那種造謠中傷的話，稱托派，由於『其立場的邏輯』使然——史諾對托派的立場却顯出一點也不懂——投降了蔣介石並把同志出賣給警察。由於其自己的立場的特殊『邏輯』使然，史諾於是熱烈地擁抱共產黨，因爲牠投降同一蔣介石和出賣工農給資產階級。史諾爲他這本稱爲『西行漫記』一書搜集材料之後一年多，寧姆・華爾斯（他這本集子就是呈獻給她的）瞧見一個紅軍士兵小心地撫弄着他那顆發亮的新的國民黨紐扣。她不懂得，他究竟想起『他從江西寄來的那件襤褸舊衫的紅星否………但是紅星，』她補寫一句：『在往日的蘇維埃地平線上，已不復瞧見了。』（一九三八年一月『亞細亞報』）

攻擊充滿於報章上。他們充當密探和警察的代理人，使許多他們往日的同志被捕。黨員們都害怕在街頭露面，因爲他們會在那裡給人認到的。許多人都逃到別的城市去。一切黨的活動都絕對停頓。黨的機關本來就是脆弱的，現在則打成片片了。在江西，在最後幾個月當中，臨陣逃脫不僅發生於紅軍士兵中，而且同樣發生於高級指揮部中。如孔荷寵和張毅（譯音）之類的老將領都投降敵人，宣稱他們對江西蘇維埃看不出什麽希望。（註十八）黨攻擊所有這些逃脫者爲胆怯的叛徒，但牠不久也要步他們的後塵，和他們在國民黨的陣營裡重新聯合一起，因爲在莫斯科，共產國際已把中國蘇維埃實驗的欠帳一筆勾銷掉了。

正當紅軍橫越中國西部，開向其自身歷史的一個新的轉捩點的時候，共產國際恰好在莫斯科的第七次世界大會中（一九三五年七月），完成了一次政策的轉變，這一次政策的轉變表明牠最後的放棄了爲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德國共產黨的崩潰和希望希特勒的勝利打破了歐洲的國際均勢，並從舞台上清除了德國無產階級的強大組織，戰後歐洲的最強大的革命潛力。希特勒進而與日本聯盟，並公開與英法談判，以便放手進攻蘇聯。蘇維埃官僚作了一次驚慌的轉變。英法，昨天還是反蘇聯盟的主要組織者，現在却成了『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受人乞憐和爭取，充作反德國法西斯主義的假想同盟者。所有國家的共產都較之往日更公開、然更保留的改變爲史太林外交政策的工具。共產國際聲明牠現在並不是爲無產階級革命，而是資產階級的民主而鬥爭。各國共產黨都對資本主義政府停止一切反抗，作爲和莫斯科聯盟的酬答（如在法、捷），或者變成爲要求締結這種聯盟的施行壓力的團體（如在英、美）。

中國自然在蘇維埃官僚的估計中，佔一個樞紐的地位。日本在中國遭逢困難的程度大致上足以决定牠對蘇聯底不可避免進攻的時機和效驗。因此，阻止國民黨政府參加日本的反蘇公約，又如果可能的話，把牠推到反日的地位上，

就成了蘇維埃外交的首要目的之一了。江西的失敗使莫斯科的戰畧家們深信：中國的紅軍本身對於這個目的是非常不夠的。蘇維埃官僚久已放棄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切希望，牠於是再度轉向中國資產階級。牠決定拿紅軍的服役與土地鬥爭的取消，來酬答一個抗日的聯盟。

沿着這一條路，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只走了第一步。牠把『蘇維埃中國』的欠帳一筆勾銷，又替中國共產黨訂立一條新方針，走向一個新的『民族統一戰線』。一九三三年，王明曾斷定『推翻國民黨這個辱國喪權的政府是順利地實現民族革命戰爭的條件』，他也曾宣佈這一點『只有蘇維埃政府和紅軍』才能實現。（註十九）這個遠景現在簡直是不值一顧的被放棄了。王明在第七次大會中宣稱：『共產黨除了反帝統一人民陣——的策畧之外，沒有別的手段使整個中國民族總動員起來』。而要辦到這一點，就是『向一切人民、一切黨派、團體、軍隊、民衆組織，又向一切顯要的政治、社會領袖呼籲，與我們一道組織一個全中國統一人民國防政府和一枝全中國統一抗日國防軍。』（註二十）

事變證明：這將是走向國共再度合作的一個過渡公式。國民黨與紅軍的內戰已進行了七年，而且仍在進行中。黨確實需要時間來再教育牠自己的力量，以適應新的轉變和開始實行牠對資產階級的獻媚。而且還不能不計算這一可能性：蔣介石和國民黨已向日本方面偏倚太深，『民族統一戰線』之建立將仍然不得不和他們作對。在第七次大會上，王明尚承認『國民黨的史無前例的，不名譽的賣國行爲』，並把蔣介石說成爲『中國人民的大漢奸。』（註二十一）

第七次大會之後，將近一年，中國共產黨和各種各色失意政客軍人勾勾搭搭，在西南和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在南京和孫科、馮玉祥，在西北和張學良，但他們就沒有一個人，勢力大過蔣。共產黨人開始向『一切』黨派求愛

承認：只有一個黨——國民黨。他們設法和『一切』顯要的領袖合作，但不久就得承認，眞正值得重視的只有一個人——蔣介石。遠在一九三六年，毛澤東就公開向蔣伸出『友誼之手』，如果他拿起武器抗日的話（註二十二）共產黨在一連串公開信文章和通電中，正向國民黨提供愈來愈多的特別保證，令資產階級相信牠不再威脅任何實際的資產階級利益，而反之將替他們好好地服務。

在第七次大會中，王明曾在下面幾句話中提及一九二七年的『民族統一戰線』：

『我們從中國共產黨的鬥爭歷史方面知道：當領導機關中之機會主義者，以陳獨秀爲首，在一九二七年革命運動的嚴重關頭，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畧來對抗階級鬥爭的任務時，當這些機會主義者爲了保持和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的民族統一戰線，而放棄了工人階級爲保衛其基本利益的革命鬥爭，放棄了農民的土地革命時………他們便造成了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敗。』（註二十三）

不到一年之後，毛澤東就遠遠超過了陳獨秀的機會主義了。他向中國資產階級貢獻的是同樣致命的對革命戰爭的放棄，而且還更走遠一步：他提供自覺的，苦心孤詣的保證——假如革命的勢力再度抬起牠們的頭的話，中國共產黨隨時準備扮演劊子手的角色。陳獨秀——受史太林指導——已藉助於與資產階級的聯合，而摧毀了第二次中國革命。毛澤東——和史太林——現在又預先保證絞殺第三次革命而設法恢復這一聯合。

在聯合戰線談判進行當中，救國會，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團體，要求共產黨提供這種性質的毫不含糊的保證。『我們希望（牠寫道）中國共產黨將用具體的行動表明牠眞誠願望與其他黨派聯合………在紅軍佔據的區域，當地之富農、地主及商人，應受到寬大的待遇。在大城市中應盡力避免勞資衝突，以免障碍救國聯合戰線之擴展。

『………救國會及其他民衆團體往往有一些青年在抗日會

議中鼓吹不穩定的思想………如像『階級對抗階級』及「反國民黨和國民黨政府戰爭」之類的口號，大大損害聯合戰線………我們深信此種行爲並非出自共產黨………我們認爲共產黨應立即糾正這種情勢。而且到處發現武裝隊伍，自稱爲共產黨游擊隊，發施號令。如若這些無紀律的部隊是受共產黨節制的，則後者應採嚴厲手段制裁他們，否則應及早宣布與這些部隊毫無關係。』（註二十四）

毛澤東於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對這幾點，一一給予明白的答覆。他宣佈『工農政府』已改稱爲『人民蘇維埃政府』，『工農軍』已改稱爲『人民紅軍』。他報告：蘇區一切往日剝奪資產階級公民權利的法律均已取消，於是繼續說：

我們已通過一項決議，不沒收富農的土地………我們並未進行沒收大小商人，資本家的財產和工廠。我們保護他們的企業………至於積極抗日的軍官和大地主，我們可以聲明，他們的地產不加沒收。

『至於蘇區內勞資的互相關係問題，我們已規定改善工人生活水準的最低限度的條件。工人與資本家已訂立一項協定，其條件以每一企業的實際情況爲根據，且由雙方遵守，該項協定袪除了不必要的罷工和怠工。從前關於各種企業中工人之監督權與領導權的法律，均已廢除。工人們已被勸阻不提出超過資方所能應允的要求。……在非蘇區中，我們無意着重反資本家的戰爭，（附註四）雖然我們贊成改善工人的生活水準。……資本家與工人的共同利益是以反帝國主義侵畧的戰爭爲基礎的。

『鄂丶湘丶贛丶閩丶浙各地游擊隊之所以迄今尚未遵守我們最近通過的法令，因爲我們的指示，由於種種障碍尚未轉達他們。此外，在這些區域中，有鎮壓游擊運動的反覆

（附註四）根據另一譯文，這句話又翻成這樣：『我們同樣不願意加劇反資本家的戰爭。』——『今日之中國』一九三七年一月。

企圖，而這些企圖又確乎伴着不可言喩的暴行，也可能造成報復(！)精神之到處佔上風。但我們認爲這是一種錯誤的態度。我們非常迫切要把這些錯誤馬上加以糾正……』毛氏還答應『糾正』那些青年的浮燥，他們還厚着臉皮大談『階級對抗階級』，毛氏又補充說：『我們所最關切，而且認爲最重要的是一切黨派集團應毫無敵意的對待我們，心裡記着救國抗日戰爭的目標。我們今後認爲在其他問題方面的任何不同意見，都是無足輕重的。』（註二十五）

假如工人不請求共產黨人的允准『着重』反資本家的戰爭，又怎麽辦呢？假如農民們沒有請准而擅自沒收土地又怎麽辦呢？簡而言之，假如羣衆像一九二七年一樣，把一切黨派，一切領袖置諸不顧，直接按照他們自己的利益而鬥爭，又怎麽辦法呢？難道眞的這樣容易忘記了：一九二七年，『過火』的叫喊跟着就來了最野蠻的鎭壓嗎？在第七次世界大會中，王明尙能夠大談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敗』，但現在這一段歷史也要再寫一遍了：

『我們準備和你們成立一個強大的革命聯合戰線，』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共產黨寫信給國民黨道，『像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大革命……當中的情形一樣，當時就有過一個廣泛的聯合戰線，執行反對民族與封建壓迫的鬥爭，因爲這是今天拯救我們國家的唯一正當辦法。你們……尙未忘記國共合作的光榮歷史……正是虧得這種合作，所有民族的和封建的壓迫者在我們面前發抖。那時我們的民族壓迫者，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非常害怕我們的合作會引到最後的勝利與中國的澈底解放。因此他們在我們中國散播衝突的種子，而且極盡其威迫利誘的能事，結果，一方放棄其合作，喪送了聯合戰線。當你們今天回憶這件事的時候，覺得良心上的痛苦嗎？』（最後兩句有着重點——校者）（註二十六）

蔣介石的良心，並沒有因爲他那些被征服的政敵的匍伏而

覺得痛楚。他一點也沒有忘記他與共產國際的第一次合作的『光榮』結果。這個合作曾把他捧上了台。跨過中國工人階級的癱伏着的肉體。那末過去並不是個什麼良心的問題——現在也並非如此，而是個政治權謀的問題。蔣介石，這個上千次無原則聯合的訂立者和破壞者，並不把一個政黨的僞善的忠諫放在心上，這個黨他曾利用過，用恣肆的野蠻手段摧殘過，假如想適合他的目的的話，他現在還能夠再度拿來利用一下的。假如他開始考慮接受共產黨向他獻降的得計，那就是因爲全般局勢迫使中國資產階級要下一個決心：開始抵抗（雖然過遲）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更進一步的入侵。

將近兩年，中國資產階級已在呼吸一種經濟復興的令人興奮的空氣。經濟的曲線始與一九三五年的豐收一齊上升，從一九三四年牠所到達的最低點一直升高。中國的復興與世界規模的經濟向上轉同一步調進行，以商業、歲收及生產之新的增進爲其特徵。一九三四年，華盛頓的白銀收買政策使本已嚴重的白銀外溢愈益加劇，中國通貨遂大呈動搖，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遂告貶值，依附於英磅。白銀收歸國有，隨後則輸出作購買外滙之用。這件工作是在英國財政部(由李滋羅斯在中國代表)的直接監督之下實行的。工業得到一種新的激勵。一九三六年間，中國的銀行投放一〇九、〇〇〇、〇〇〇元（華幣）於製造業中。中國的國外信用的地位也顯著的改善了，一九三六年末，三千萬磅英國借欵開始談判，翌年六月在倫敦卒告成立。財長孔祥熙赴歐完成這樁談判，同時也在其他歐洲國都中，辦理巨額借欵，在華盛頓還辦妥一個非常有利的黃金交換協定。久已束之高閣的鐵道和工業計劃，似乎行將實現。

伴着經濟的復興而來的，是更大的政治穩定。蔣介石實行他的武力統一中國的計劃，大部份已告成。江西紅軍的打敗已從他的直接統治區域中除去了唯一的重大革命威脅，把紅軍逐向西走，給了蔣一個機會，第一次把他的支配權

伸展到貴州、雲南和四川等省份。一九三五年，蔣到西部各省分，到山西，甚至到內蒙古，作了一次示威式的空中巡視。他到處受招待，宛如君臨一切的主人一樣。地方權力的最後一個重要堡壘——西南，他於一九三六年七月差不多不流血的征服了，他的軍隊在他離開粵垣，循長江北向奪取政權的第十週年，重新開入廣州。

這種政治與經濟地位的改善在中國資產階級中間發起新的、興奮的情緒。資產階級清楚的看到，牠的微薄的經濟基礎受了日本堅持的『中日合作』的要求所威脅。日本對於中國紡織業的逐漸征服，在復興當中繼續進行，這是一個雄辯的預告『合作』的眞意所在。在日本的另一個主要的要求『反共合作』中，不難看出：這是日本取得在華駐兵權的藉口。蔣介石正確地看出這點是對他自己政權的威脅。他於一九三六年九月，以從來未敢表示過的堅决口吻，通告日本大使：這些條件全部不能接受。

蔣還沒有眞正打算抗日。他還在打算利用他的增強了的地位，去迫使日本的要求減低。爲了保證他的政權澈底鞏固，他仍認爲必需對紅軍給予最後一擊，他還不十分信任牠們的投降。當十月間張學良在西安提出停止內戰，聯合蘇聯和立即抗日之時，蔣便把這一點說得淸淸楚楚。據說他曾經答覆：『我永遠不談這件事，除非每一個中國的紅軍都剿滅，每一個共產黨人都下獄，只有那個時候才能聯俄。』（註二十七）

是月，日本支配的滿洲國軍隊和內蒙雜牌軍跨過綏遠邊境，作一次試探性的偸襲。蔣除了對當地軍隊給予精神上的鼓勵之外，便很少援助，這些軍隊抵抗那次蓄意的侵畧是得到勝利的。

他有幾師人調到綏遠，但其目的也只是竭力使衝突局限於當地境內，防止侵入察哈爾的企圖。當綏遠的勝利對資產階級重要派系中日益增長的抗日運動，發生觸電似的影响時，蔣則更加用心加緊他進攻陝西紅軍的戰事。他在上海

逮捕了七個著名的救國會領袖，把剛開始爆發的新抗日學生運動，用武力加以破壞。他還無意於接受共產黨人的屈服、他寧可藉軍事手段完成他對他們的征服。

當張學良的軍隊不願打破他們在陝西邊區上和紅軍的實際休戰時，蔣調遣他自己的第一軍作戰。這枝軍隊在甘肅竟敗於紅軍之手，蔣於十二月遂飛西安，決心迫使叛逆東北軍服從他們的命令，否則迫牠往南方撤退，但當西安駐軍的軍官和士兵於十二月十一日夜起而叛亂，把蔣及其大部分最親信的幕僚變爲階下囚時，上述的計劃便奇妙地被傾覆了。

蔣身穿睡衣縮在山坡上被捕獲，他不僅大失『面子』，而且還有喪失生命的極大危險哩。東北軍弟兄們齊聲要求把他交給『民衆公審』他的一切罪惡。假如聽任士兵們幹去，這位國民黨獨裁者的生命一定不值一文錢的。在南京，蔣介石手下的主張答應日本條件的將領和幕僚們，深信他不會生還。爲了萬全之計，他們開始把軍隊調到陝西邊境，『討伐』逆軍，並下令飛機飛臨西安，作威脅性的示威。在西安，張學良正在敦促蔣接受一個大胆的抗日政綱。他警告：假如蔣拒絕答應他們的要求：停止內戰，對滿洲老家的征服者實行抗戰，他就不能保證他對青年軍官和士兵的控制力了。這位滿洲的前任統治者憑他自己一定不能拯救蔣的生命的。共產黨人却能夠而且眞的實行干涉，竭力利用他們『對東北軍的巨大影响的，保護蔣，並把他當作一個民族領導者送回南京。』（註二十八）

蔣被迫居留陝西省會時，最有戲劇性的，而從其後果判斷，又確乎是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便是他和當時共產黨駐西安代表團主席周恩來的會見。在這一定是很可紀念的一幕中，這幾位主角，尙沒有親自把牠描述出來。蔣在他後來發表的日記中甚至還沒提及牠。（註二十九）但照另一紀載說，當周跨入他的房間，委員長臉色轉白了。他似乎以爲他就要被移交於紅軍之手。他一定不會健忘：十年以前

，血的四月的一個早晨，蔣曾下令槍殺和砍殺上海的糾察隊，周恩來就是這些糾察隊的副指揮。這就是蔣介石本人也難置信的：他曾這樣無情地叛賣過，搜捕過的人却眞的肯再度委身於他。上述的記載繼續說，周恩來一跨入來就致『友誼的問候』，向蔣敬禮，『認他爲總司令』。他開始解釋共產黨的新政策。『蔣最初是冷然不作聲，後來聽下去就慢慢的色霽了……』隨後又有另外幾次會談。『他愈益相信不僅直接扣留他的人，就是紅軍也有一種誠意反對內戰，而且假如他確定一種積極武裝抗日政策，他們也有誠意準備在他本人的領導之下，幫助國家的和平統一的。』（註三十）蔣在西安終於恍然大悟的就是：他只須接納一個他本來已一半決定了的政策，共產黨人就對他無條件的投降。他覺得：當共產黨人再度充分準備替他的政治目標服務時，堅持用軍事手段剿滅他們，是愚蠢的。（附註五）

（附註五）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廿九日『大美晚報』說：

……顯然愈來愈普遍的覺得中國共產黨人，就任何殘存的特質看來，現在都不是共產黨人了………關於現時之所謂共產黨政綱，還有什麽東西足以拿來當作口實，拒絕與一個團體和解呢？這個團體已不再幹根本上是共產主義的任何事情了。』

頭號帝國主義英國的『字林西報』是反對十年前國共合作最猛烈的攻擊者，同時又是蔣介石剿赤戰爭的最熱烈的支持者，但牠現在也甜蜜地唱着新調子：十二月廿八牠說，『這將很好的證實：張學良將軍辯稱所謂共產黨人决心降服，多麽正確。』

西安事變同時也足以窺見國外共產黨報紙『彈性』的刺目例子。蔣作了階下囚的那一天，紐約『每日工人報』大吹大擂稱張學良已發起『一個統一中國的團結號召了……』哈里·甘尼

蔣大體上同意擱在他面前的建議。他於聖誕節釋放，飛回南京。六個星期之後，經過一連串彎彎曲曲，完全如願以償的挽回面子的機謀之後，蔣召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全體會議。共產黨對這次中全會通電建議：『停止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武裝鬥爭；蘇維埃政府稱爲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爲國民革命軍，直屬於南京政府及軍事委員會；在特區實行民主政治；中止沒收地主的土地，完成統一抗日民族陣線的共同政綱。』（註三十一）

國民黨中全會圓滑地宣稱：政府將像從前一樣繼續維護國家主權，而且像從前一樣決心『剷除共黨』。牠於是訂立接受共產黨屈服的正式條件：（一）取消紅軍，將牠編入政府軍隊中，受軍事委員會直接支配。（二）解散『蘇維埃共和國』。（三）停止一切共產主義宣傳。（四）停止階級鬥爭。（註三十二）

對這些條件，共產黨於三月十五日正式加以接受，牠聲辯說，其中最重要的，牠都已經實現，而且已『自動宣佈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此點足以證明『共產黨並未提倡階級鬥爭。』（註三十三）紅軍後來指定陝北爲『防區』

（接上頁附註五）　斯寫道：西安叛黨提出的要求『最初已爲中國共產黨提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每日工人報。翌日，電報稱莫斯科報紙斥張學良爲日本的工具，『實際上幫助日本去進一步犧牲他的國家』。新聞和眞理報說，整個計劃是在東京造出來的。——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紐約時報』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聯合社電。次日，每日工人報作一百八十度轉變。甘尼斯發覺『槍炮是在東京裝備好的』，而且宣稱第一次報道『有意充滿反日的煽惑，完全是誤人的。』——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每日工人報』。此事同時也證明莫斯科愛蔣，僅僅愛蔣一個人。

，並開始從南京領取經常的津貼。四月間，共產黨青年團代表大會於陝西延安，選出蔣介石及其他南京將領，與朱德、毛澤東一同爲牠的主席團。（註三十四）

一位陝北訪問者寫道：『膚施是中國共產黨活動的中心，但此間並沒有壓迫地主，沒有分配土地。沒有一張共產主義的宣傳品可以找得出來。在街道牆壁上所看見的唯一標語，都是寫着號召反侵畧者戰爭，救國和國內和平統一等口號的。「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日戰爭」這個口號是其中最普遍的，到處都見到。』（註三十五）

紅軍戰士對這些風捲殘雲式的變化，作何感想？農民怎樣高興這些政策呢？中國共產黨怎樣能夠輕易使他接受這個『新路線』呢？只有將來才能最後答覆這些問題。但一九三七年陝西的紅軍並不是長期艱苦地從事爭土地與反國民黨戰爭的軍隊了。這枝交給蔣介石支配的軍隊人數約九萬人。其中從江西長征的刼餘者還不到三份之一。朱德告訴某外國訪問者說：『此間九萬正規軍中，從江西原地來的僅二三萬人。約有三萬人是沿途（主要是在四川）召募的，其餘則來自本地。』（註三十六）一九三六年夏，另一位陝西訪問者有幾次看出：這些士兵已開始接受新的，不熟習的號令，但這些號令都在他們當中喚起種種懷疑。彭德懷告訴他說：『我們在自己的軍隊中必須加緊我們的敎育工作。在最近幾個例子中，譬如我們已經贊成准其撤退的軍隊，我們的士兵竟向牠射擊，因而破壞聯合戰線。在另一些例子中，士兵們不願將俘獲的步鎗發還，必須經過三令五申才照辦。這不是破壞軍紀，這是對他們長官的命令缺乏信心，證明士兵們並沒有充分懂得此種行動的理由，有些士兵實行指他們的領袖爲『反革命階級』。（註三十七）

數月之後，另一位新聞記者問一位蘇區官吏，人民的感想如何。他答說：『人民都比較喜愛蘇維埃，蘇維埃在他們看來是簡單舒服的。地主或者比較喜歡新的民主制度，但

此間只有寥寥無幾的地主留下來享受牠了。我們讓地主保有選舉權，發現有點困難。人民都不了解此舉的必要，農民們則害怕他們的土地要歸還地主。………一般的說來，人民都安心放棄蘇維埃。他們信賴共產黨的領導去幹對他們有利的事情。不過，他們仍看不出這樣一種複雜改變的必要，有些人看不出這種改變是有利於他們自己的。』（註三十八）

這只是懷疑與異議的一些短暫的閃光，等到羣衆不大『安心』『放棄』，再度起而爲『有利於他們自己』的目的而鬥爭時，這些懷疑和異議便不可免擴大爲未來的衝突。但現在這些顧慮暫時因爲事變的迅速轉變而歸於隱沒。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帝國主義又進攻華北。蔣搖擺不决，盡最後一分努力，俾達到一種『局部』的解决，七月十一日，他同意華軍撤離平津區。二十九軍的士兵們置調停於不顧，繼續作戰。日本向華各省進攻繼續進行，八月間，日本海軍再度用全力進撲上海，蔣這一次迫得最後握起武器來。數星期後，採取最後的正式步驟，確立新的國共合作。九月十日，南京宣佈紅軍編入國民黨軍隊中稱爲『八路軍』。九月二十三日，共產黨在陝西膚施發佈公告，正式解散『蘇維埃共和國』。翌日，蔣去電慶祝。這一天差不多剛好是蔣去電『慶祝』武漢國民黨左派脫離共產黨的『民族統一戰線』，投降南京蔣政府的第十週年。一個新的『民族統一陣線』現在成立了，牠成立的時候，正好中國工農在野蠻的帝國主義進攻的直接打擊之下，愈益需要他們自己有一個黨，一面旗幟和一個政綱，藉此領導反對侵畧者，解除剝削者底羈絆的鬥爭。

共產黨回到國民黨的懷抱中，便完成了一個歷史的循環，這個循環，在牠所有的階段中，對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總是不祥的。這個黨自詡爲『無產階級先鋒隊』，但牠從來就沒有眞正將自己建築在無產階級的基礎之上作爲民族革命鬥爭的主要槓桿。一九二五——二七年，牠曾使自己和牠

所領導的羣衆運動，隷屬於資產階級。結果是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妥協，在這一基礎上取得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勝利，而這種妥協所盡的唯一作用無非是替新的帝國主義侵畧，開闢道路而已。一九二七年後，這個志氣消沉的黨陷入冒險行動中，把牠改變成爲一種地方化農民暴動的前鋒。江西農民蘇維埃的失敗和取消再度令牠流離失所。牠現在只單獨依靠農民戰鬥員的流動武力，而這些農民戰鬥員，就是王明也承認，大都是沒有『半點大城市的工人階級運動的觀念』的。（註三十九）共產黨旣然已無法把這武力轉變爲無產階級的工具，現在便把牠帶囘資產階級的陣營中。當共產國際在一九二七年失敗後，無法從其經驗中取得結論時，托洛斯基說，牠已『替那按照國民黨路線底精神的新實驗，廣開門戶』。一九二八年他寫道，『中國資產階級的政策』，將來還有『不少的向左曲折，對於『民族統一戰線』的玩票友，在未來還不缺少誘惑。』（註四十）共產黨從來就沒有在一種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政策的樞軸上平衡自己，十年之後便倒囘民族資產階級的懷抱中。

『民族統一陣線』於一九三七年，在一個新的歷史平面上，重新產生。一九二七年，共產黨站在一個強大的羣衆運動的前頭。一九三七年他却站在一枝十萬農民軍的前頭，這枝軍隊脫離人民的廣大羣衆而陷於孤立的。一九二七年，共產黨人相信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合作，會取得『領導權』，而且會使民族解放運動取得勝利。一九三七年，共產黨人形成一個合作，其基礎是國民黨收編紅軍和領導抗日戰爭，而這個戰爭則替蘇維埃官僚的眼前利益服務。這再也不是什麽民族解放的問題，因爲有這一合作（和其他國家擁護這一合作的共產黨人）公開的向英美帝國主義者呼籲，請求他們出而干涉和保障他們自己的主人地位，抵禦日本對他們底帝國主義利益的威脅。共產國際再也不用費盡心機去編造一些彎彎曲曲、花言巧語的關於『無產階

級領導權』的決議案，因爲無產階級已再也不在他的估算之中。一九二七，共產國際即使不是在行動上，但在口頭上尚承認在民族戰爭中，土地革命的最大作用。一九三七年，爲了報答他們與資產階級的聯盟，共產黨人公開放棄他們的急進的土地政綱，並放棄他們已領導了七年的土地鬥爭。他們還更走遠一步，預先答應『糾正』——亦即制止和鎮壓——任何這一類農民獨立進行的運動。

一九二七年，共產黨人把反帝鬥爭的領導權讓渡於資產階級，結果，後者壓服了羣衆，與帝國主義妥協。在反帝鬥爭中各階級利益聯合一致，這一虛構，等到資產階級證明牠的利益與帝國主義一致反對羣衆時，嚴酷地打破了。這一重大的事實今天和當時一樣眞實。牠構成基本的軌範，拿來衡量和理解一九三七——三八年的事變，以及最近將來的前途。

日本雖藉助於外交、經濟和僅僅臨時的軍事壓力，從國民黨政制方面取得部分的讓步，牠並不滿意於這種結果。一九三七年七月間，牠遂發動一次大規模的侵畧，其目的是用武力迫使全中國受牠的統治。蔣碰到有作一次生死存亡底決定的必要時，動搖起來。南京政府同意『蘆溝橋事件』——七月七日在北平南部發生的衝突，結果促成戰爭的局部解決。當日軍繼續進攻，證明侵畧者決心佔領整個華北時，並沒有中央軍隊調赴援助當地軍隊。但是等到事情已大白：這一次日人不會接受暫時的妥協，又等到平津陷落後日本陸海軍再度入侵上海的時候，事情便終於決定了。在日本的鞭打之下匍伏了六年之後，國民黨終於迫得起而抵抗，因爲日本的侵畧現在已有完全剷除中國資產階級之虞。

在戰爭剛發生的幾個月，國民黨小心地儘可能打開門戶，準備妥協。牠避免採取任何無可挽回的步驟。牠並沒有廢除牠和日本簽訂的條約，牠也沒有否認牠以前的妥協協定。牠不去沒收日本的財產。在上海戰事正酣時，牠甚至還

把庚子賠欵定期攤還的欵子交付給日本！牠反覆聲明牠願意接受『友』邦的斡旋，使戰事終結。

但蔣介石已騎虎難下。日本的活動範圍伸展愈廣，任何立即妥協的前途也愈黯淡，這種妥協就是對中國資產階級提供『合理的』保障，對日本帝國主義者則給與充分的賠償。上海，中國人領有產業的主要中心，淪爲廢墟。凡是在戰爭中沒有破壞掉的，日本人往後便有系統的加以剷平。一年之內，侵畧軍握有華北的所有重要中心，差不多全部沿海省分，全部重要海港（其中只有幾個尚未佔領），和全部鐵道（兩條除外）。國民黨只限於使用龐大的武備窳劣的士兵大衆來抵抗進攻者。在上海，經過三個月可怖的犧牲，面臨壓倒優勢而發揮了難於置信的勇敢和頑強之後，中國士兵的肉和精神終於敵不過侵畧者的鋼鐵。軍隊的指揮部在反對人民戰爭的那幾年，曾表現過這樣有效能，現在却充滿腐敗，怠工，和公然賣國。十一月撤離上海，牠也同時整個的破產了，退却變成大潰敗，渡過長江三角洲而去。敵人還在一百十五里外，南京便趕忙放棄了。蔣介石逃入內地，不久唐生智也接踵而去，唐生智就是湖南大屠殺的英雄，他是留守南京，指揮一次無效的最後一分鐘的防禦的。南京於十二月十三日在可怖的殺戮當中淪陷。

在北方，日軍在路上碰到一些留以阻擋他們的零亂部隊，但遭逢很少的抵抗。他們僅在山西才遭遇到嚴重的阻碍，因爲當地從前的紅軍，現今的八路軍，給他們嘗一嘗運動戰術的滋味，對於這種戰術，紅軍指揮官們是有十分充分的把握的。在中央當局指定的嚴格範圍之內，紅軍藉助於他們的游擊戰術，得以橫貫廣大區域，困擾日軍的交通。八路軍的游擊隊因爲受給養短缺所妨害，且尤嚴重的受國民黨嚴禁民衆政治動員所限制，他們所能獲致的戰績只是他們過去能夠而現在仍然有能力獲到的戰績之一小部分罷了。

在華中前線，經過京滬的慘敗之後，改編過的軍隊，（其中大部分是新近從川、桂召募來的）在徐州附近——隴海、津浦兩路的戰畧交會點，造成一新的抵抗據點。在這裡他們永遠打破了日本軍不可克勝的神話，使日本若干最優良的師團蒙受沉重的損失和幾次嚴重的失敗。一直等到南京陷落之後五個月，日本的武力增至二十五萬人，才最後佔取隴海路。黃河、長江水漲，破堤成災，使農民人口忍受一個驚人的損失，才遏止他們的前進，阻緩他們向漢口進攻的企圖，漢口當時是國民黨的臨時首都，政府已開始逃避到那裡。同時，新的進攻也在華南發動，日本的轟炸機，在廣州、汕頭等城市，沒有遭遇任何抵抗，將整千整萬擁擠在一起的遭刼平民，置之死地。

戰爭的整整第一年，中國資產階級只敢進行一種純粹軍事的防禦戰爭。牠令日本的侵畧變成一樁耗費甚大的冒險，這是成功的，但牠同時却證明，這種方法不能有效地抵抗帝國主義的進攻，而且將來對於中國民族解放的利益，也一定起不了什麽作用。資產階級之畏懼民衆仍然較之畏懼帝國主義者更甚，他已向美國和英國乞援。這幾個强國尙沒有充分準備好在太平洋作最後的决戰，牠們已拿慎重規定的救濟品，給國民黨以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則小心地避免在外交上造成敵對日本的證據。牠們對日本的壓力，尤其是美國的壓力，在臨近的爭奪太平洋霸權的時期中，一定要增長。在尖銳的抗議聲中，在孜孜不倦準備的宣傳運動中，尤其是在耗費數達數十萬億元於建設强大艦隊和空軍中，這一爭奪戰的基礎已正在奠定。蘇聯正爲一種深刻的國內危機所癱瘓，他所能拿出來的只是涓滴之助而已。牠的命運也不僅與目前正在中國進行的戰爭的結果息息相關，而且還與那個命定要沿着更廣大的戰線而爆發的戰爭互相關連。

同時，只要中國的領導權保留在資產階級的手中，目前的戰爭，充其量不是與日本妥協而終，便是使中國完全伏臣

於英美，酬答牠們對中日戰爭的干涉。無論那一種結果，都不會解放中國，也不會解放那些負上戰爭主要負担，並成了戰爭主要犧牲者的人民。只有當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在羣衆的心目中，清楚地與他們自己爲其自身利益的鬥爭連繫在一起，才會造成一個勝利和解放的結果。只有按照這個方法，由本國的落後而發生的技術缺陷才會被克服。

只有當羣衆爲大胆的社會政策鼓舞起來，中國龐大人力的動員才有可能，這些社會政策將妨止商人、銀行家及地主把戰爭的耗費轉嫁於被剝削者的背上。如果有一個更大胆的革命政綱，替農民將這兩個目的倂而爲一：即，民族從帝國主義侵畧中謀解放的目的以及農民自身從土地的奴隷地位中謀解放的目的，則這政綱將喚起日本侵畧者所永難制服的後備力量。由這種力量來發動的游擊戰，能夠而且定將把中國造成和二十年前的西伯利亞一樣的不可制服，當時西伯利亞曾受列強干涉的侵畧軍隊蹂躪。但這種戰爭不能隨意造成。當中國紅軍尚是一枝革命的農民武裝的時候，牠之能夠抗拒那些派去圍剿牠的，武器無限優良、數量更大的軍隊，這正因爲牠洞察了成功底游擊戰的簡單秘密。彭德懷有一次曾說過：『因爲羣衆只關心他們生活問題的實際解決，故只有立即滿足他們的最迫切要求（此句有着重點——校者註）、發展游擊戰才有可能。這就是說，剝削階級必須迅速加以解除武裝，使牠無法行動起來。』（註四十三）

換言之，抗日戰爭之能夠向前發展，是加緊而不是停止階級鬥爭，在言行兩方面喚起羣衆知道這個鬥爭是與土地鬥爭一致的，紅軍投降了國民黨，也就放棄了這個鬥爭。爲了報答資產階級的合作，牠讓送了對農民的領導權，並立誓棄絕牠久已拋棄了的工人階級的動員。在資產階級方面，牠現在絕不比一九二七年更願意放棄牠的基本經濟利益。牠現在和那時一樣堅决使工農繼續受牠覊絆，使他們負

担資產階級自身覺得不能不發動的軍事鬥爭的用費，阻止他們起來按照他們自己的利益而鬥爭。

工人們在一九三五——三六年復興的刺激之下，已開始重新團聚他們的力量，進行大胆的、富於戰鬥性的罷工，但現在却因戰爭的爆發而被推回後面，這次戰爭在重要的產業中心造成這樣可怕的破壞，自然遏止了經濟的向上發展，這次經濟的好轉已開始使工人運動復興了。國民黨政府爲了保證工人不致有任何拒絕新負担的企圖（這些新負担現在正加於他們身上），牠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發佈一道命令，規定如果工人在戰爭進行中，發動罷工或甚至鼓動罷工，則處以死刑。(註四十四)數日之後，王明在漢口告訴一位訪問者說：共產黨『十分滿意』國民黨的戰爭措施。(註四十五)戰爭的往後行程將由距離現場或遠或近的許多因素來決定，但在臨近的時期之內，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之能否有所成就，只有看羣衆不再像共產黨一樣『十分滿意』於資產階級剝削者繼續統治，究竟達到何等程度而定。這一點回頭又依賴於一個新革命黨的出台，這個新黨將能夠把工農團聚於他們自己的組織之內，和他們一道走上革命鬥爭之路。這樣一個黨將來一定懂得怎樣與『魔鬼本身』的蔣介石一道參加當前的戰爭而且牠還一定決心於蔣介石放棄這一戰爭時，繼續作戰，並實行鬥爭，反對一切企圖於明天的中國革命中，阻斷工農走向勝利之路的人們。

無論如何，日本在軍備上暫時的優越，牠的短暫的勝利，牠所征服的十分遼濶的範圍，不能，將來也不會保證牠的最後凱旋。最後失敗的陰影落在中國戰場上每一樁高價爭得的『勝利』上面。日本的致命脆弱的經濟結構，不能抵禦戰爭所加於牠的壓力。日本帝國主義經常在國內碰到一種社會危機的威脅，加之以，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帝國主義列強重新企圖經過重分世界的贓物來延長他們的生存時，日帝馬上就要碰到牠的無比強梁的敵人。戰爭制造者將發動這個戰爭。中國、日本和橫亘全世界的被剝削

、受犧牲的羣衆將決定牠如何終結。在這一點上，中國當前的衝突只能與阿比西尼亞的侵畧、西班牙內戰一同被視作迫近的更大衝突的一個揷話，一個正在開展的揷話。

註　解

第一章　註　解

一、Karl Wittfogel 著的『中國之經濟與社會』(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 一書（一九三一年萊比錫出版）尚通稱爲研究這一問題的最淵博的論究。雖有若干俄國的研究作品，但大多數，需要澈底解剖的事實尚要從中國的文獻中發掘。周庭芝（Chao Ting-chi）著之『中國歷史中之重要經濟區域』（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一九三六年出版於紐約）是最近討論這個問題底一方面的著作。

二、參閱 C. F. Remer著之『中國對外貿易』(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第二十六頁，一九二六年，上海出版。關於鴉片貿易的統計表請參閱Ioshua Rowentree著的『帝國藥物貿易』(The Imperial Drug Trade)，一九〇八年，倫敦出版，第三四四頁；又參閱H. B. Morse著之『中華帝國之國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一九一〇——一八年，倫敦出版，第一卷第二〇九——二一〇頁。

三、參閱吳文藻 (Wen-tsao Wu) 之『英國言論與行動中之中國鴉片問題』（The Chinese Opium Question in British Opinion and Action），一九二八年，紐約出版，第五九——六十頁。

四、『牠們（鴉片和基督教）一齊光顧中國人，曾一齊奮鬭，並終於一齊取得合法地位』——Rowntree，『帝國之

藥物貿易』第二四二頁。

五丶據某一估計，在一七一二年和一八二二年期間，人口增加了二萬三千七百萬，或百分之一九〇左右——S. Wells Williams 著：『中國』(Middle Kingdom)，一八八二年，紐約出版，第一卷第二八三頁。又一個估計，指出一七四一——一八五一年，從一萬四千三百萬增至四萬三千二百萬，或百分之二百左右——E. H. Parker 著：『中國，她的歷史，外交和商業』(China, Her History, Diplomacy, and Commere)，一九〇一年，倫敦版，第一百頁。皇室的紀載，表明一六六一——一八三三年可耕地的增加只不過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即從五四九丶三五七丶〇〇〇畝增至七四二丶〇〇〇丶〇〇〇畝。——陳紹光 (Chen Shao-Kwan) 著：『清朝之稅制』(System of Taxation in Ching Dynasty)，一九一四年，紐約出版，第五十一頁。

六丶『林則徐奏稿』(一八三四年)，P. C. Huo 譯，見『第一次中英戰爭之批判的研究』(A Critical Study of the First Anglo-Chinese War)，一九三五年，上海出版，第八十二——四頁。

七丶據某一俄國的研究資料，這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四八年物價增加百分之二百，在一八四九和一八五一年間增加百分之四七〇——一九二九年，莫斯科出版之『中國問題』第一期。

八丶參閱『中國社會與政治學報』，(一九三二年十月北京出版) H. D. Fong 著『中國之紗業和貿易』一文。第三十三表。

九丶 H. B. Morse 認爲一八三〇年前輸入中國之白銀爲五萬萬元——『中國對外貿易，』見 G. H. Blakeslee 編之『中國與遠東』雜誌(一九一〇年，紐約出版)第九十七頁。

十丶G. E. Taylor 著『太平天國運動』(The Taiping Rebellion)，見一九三三年一月北平出版之『中國社會

與政治學報』第五五八頁。

十一、W. C. Hunter 著『訂約時代以前（一八二五——四四年）廣州之番鬼』（The Fan Kwac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44)一八八二年倫敦出版，第四十八頁。

十二、Taylor 『太平天國運動』 第五五五——六頁。

十三、 T. T. Meadows 著『中國人及其叛亂』(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一八五六年倫敦出版，第三十三頁。

十四、 J. S. Hill 著『印度支那之鴉片貿易』(The Indo Chinese Opium Trade)， 一八八四年倫敦版，第五十一頁。

十五、Taylor『太平天國運動』第五九七——九頁。

十六、K. Latourette 著『中國人，他們的歷史和文化』(Chinese,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一九三四年紐約出版，卷一第三七九頁。

十七、有一件事是頗爲值得注意，外人公司從事於買賣鴉片以外之商業者，均繼續贊助太平軍反滿。但他們尙沒有充分的支配權來決定列强的最後政策。參閱 A. Lindley (Lin-Li) 著『太平天國』，一八六六年倫敦出版。

十八、J. K. Fairbank著『一八五三——四年上海之臨時制度』(“The Provisional System at Shanghai in 1853-4”見一九三四年十月及一九三五年四月北平出版之中國社會政治學報)，該文以英國官方自行辯解的文獻爲根據，敘述該項統治權獲得之經過。

十九、 Taylor 『太平天國運動』第六一二頁。

二十、H. D. Fong 著『中國之工業化』(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a Statistical Survey)，一九三三年上海出版，第二頁。

二十一、 Fong 著『紗業』第二十六、 三十、三十四表。

二十二、關於這個時期的有用的文件，請閱 M. E. Cameron 著之『中國之改革運動(一八八九——一九一二)』(The

Reform movement in China, 1898-1912）一九三一年，斯坦福大學出版。

二十三、扼要的概括請閱 Latourette 著之『中國人』第一卷第四〇四頁以下。

二十四、參閱R. Wilhelm著『中國的靈魂』(The Soul of China)一九二八年，紐約版，第二十六頁。

二十五、例如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十日倫敦泰晤士報刊登的北京來電便提及『俄國事變與聖彼得堡中國公使的驚慌電報。』

二十六、關於這些抵貨的記載請閱 C. F. Remer 著『中國抵貨之研究』(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一九三三年，Baltimore版，第四第五兩章。

二十七、關於這些會社的活動情形請閱 S. Tretiakov 著『一個中國人的遺囑』(A Chinese Testament)的頭幾章，一九三四年紐約出版。

二十八、在山東，財產和學問及格，准獲投票者在三千八百萬左右人口中僅佔一一九・五四九人。在湖北則三千四百萬人口中僅有一一三・二三三人投票——見一九一〇年二月十八日 North China Herald.

二十九、Fong 著『中國之工業化』表 la和lb。

三十、C. H. Lowe 著『中國目前的勞工問題』(Facing Labour Issues in China)一九三三年上海出版，第六、七、八十等表。

三十一、Fong 著『中國之工業化』表 Ia 和 Ib。

第二章 解 註

一、陳翰笙著『中國現在之土地問題，』一九三三年，上海出版。在J. Lossing Buck 著之『中國農村經濟』(Chinese Farm Economy，一九三〇年，上海出版）中，也可找到有用的事實，雖然收集得不很充分。又在R. H. Tawney著『中國之土地與勞動』(Land and Labour in China)一書（一九三二年紐約出版）的註解中，也找到一些適當的論文和各種專門研究著作的書目。

二、『國民黨土地委員會報告』，見漢口『中國通訊』（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

三、陳氏『現在之土地問題』第二——五頁。

四、陳翰笙著『華南之土地問題』，一九三六年，上海出版。

五、參閱一九三四年四月南京出版之『給國聯行政院報告書附錄』(Annexes to the Report to The Council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附錄六和七；在Tawney著之『土地與勞動』一書中也有更扼要的概括和書目提要，參閱該書第五十——五十四頁。

六、王寅生著『華北的苛捐雜稅和農民』（Requisitions and Peasantry in North China)，一九三一年上海出版；陳氏：『現在之土地問題』第十五——十八頁；陳氏：『華南土地問題』第五章；又參閱伊羅生編『國民黨反動之五年』（一九三二年上海出版）中之『國民黨對農民』。

七、參閱『一九三二年中國海關年報』第四十八頁以下；陳翰笙著『中國之經濟解體』（見一九三三年四月至五月之 Pacific Affair）；C. H. Lowe 著『中國目前之勞動問題』表一；Dr. Friedrich Otto 著『五穀之收穫和輸入』("Harvests and Imports of Cereals" 見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國經濟雜誌』）；Louis Beale 和 G. Clinton Pelham合著『中國貿易和經濟狀況（一九三一——三）』（Trade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in China, 1931—3），一九三三年倫敦國外貿易部出版，第七頁及一四四頁以下。糧食輸入一九一八年達總數的百分之五，一九三二年爲百分之二〇。往後一年，僅僅償付輸入的糧食就耗去總輸出的百分之四五。

八、H. D. Fong 著『中國之紗業和貿易』第二十六表；G. F. Remer著『在華之外國投資』（Foreign Invetsments in China），一九三三年紐約出版，第六十九、八十六——九一、一三五等頁；一九二六年之『中國年報』第八二二頁；房福安著『外人操縱交通之程度』（見一九三〇年九月十日上海出版之 "The China Nation"）；L. K. Tao 和S. H. Lin 合著之『中國工業與勞動』（一九三一年北平出版）第十二、十六——十七頁。

九、陳氏著『現在之土地問題』第十八頁。

十、『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委員會給德國黨員的第一號通告』（見恩格斯著『德國之革命與反革命』附錄三，第一三五頁以下）。

十一、『馬克思和恩格斯通訊集（一八四六——一八九五，）』一九三四年倫敦版，第八十七頁。

十二、關於列寧一九一七年對他的一九〇五年底口號的估計，請閱列寧全集（英文版）第二十卷第一一八頁以下；關於這種思想及後來圍繞着這種思想而發生的爭論底說明，請參閱托洛次基的『不斷革命論』及『俄國革命史』第三卷附錄三。

十三、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六卷第三十頁。

十三、前揭書（英文版）第二十卷第三三——四頁。

十五、前揭書第二十卷第一二〇頁。

十六、『民族與殖民地提綱』，見『第三（共產）國際之提綱與章程』（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七至八月七日第二次大會通過），一九二〇年莫斯科版，第七十頁；又參閱列寧著『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草案』，見一九二〇年六——七月之『共產國際報』。

十七、『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第六十九頁。

十八、『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始末記』（一九二一年漢堡出版）第一四〇——三頁。

十九、『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第七十頁。

二十、『補充提綱』，（見『提綱與章程』第七十二——五頁）；參閱『東方問題提綱』，見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三日至十二月三日『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之決議與提綱』（倫敦出版，日期未詳）第五十三頁以下；又參閱沙發洛夫：『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及共產黨人對牠的態度的報告，』見（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一——二月一日）『東方勞苦大衆第一次大會的經過』（一九二二年彼得堡出版）；第一六六頁以下。

二十一、托洛次基著『俄國革命史』第一卷第三十二和五十三頁。

二十二、Lowe 著『中國目前之勞工問題』第一五四——五頁；關於工業人口研究資料之總合，請閱房福安之『中國勞動』（一九三一年上海出版）第二章。

二十三、『一九一七年三月黨大會的紀錄』，見托洛次基著『史大林僞造學校』（一九三七年紐約出版）第二三九頁之附錄。

二十四、列寧全集（英文版）第一〇七頁。

二十五、前揭書第九十八頁。

二十六、前揭書第一二〇頁。

第三章 註 解

一、Tsi C. Wang 著『中國之青年運動』一九二八年，紐約出版，第一〇〇頁。王君尙將一九一五年新青年一卷一號陳獨秀的論文，摘引了幾段。這本書敘述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並旁徵博引，闡述戰後的學生運動，甚有價值。

二、參閱汪精衛著『中國與國際』(China and the Nations)，一九二七年紐約出版，第九十一——八頁。

三、M. T. Z. Tyan著『覺醒的中國』(China Awakened)，一九二二年紐約出版，第二三七、二四〇頁。

四、關於中國工業人口的大約估計，請閱房福安的『中國勞動』第二章。

五、周守貞（譯音）著『廣州莫斯科協定對孫中山底政治哲學的影響』，見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月北平出版之『中國社會政治學報』第一一三頁。

六、孫中山著『實業計劃』；『一個中國革命家的回憶』。一九二七年倫敦出版，第三章。

七、孫中山著『三民主義』。

八、關於孫氏政治學說的闡釋，請閱周守貞著『廣州莫斯科協定之影響』及 T. C. Woo 著『國民黨與中國革命之未來』（一九二八年倫敦出版）第三章。

九、陳獨秀：『告中國共產黨同志書』，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發表。

十、陳獨秀：『資產階級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見一

九二七年上海出版之『中國革命論文集』第六十頁。

十一、劉仁靜在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會議上的演辭（見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國際通訊』）。

十二、孫中山『實業計劃』。

十三、汪精衛著『中國與國際』第一〇八——九頁。

十四、一九二〇年十月九日莫斯科的『消息報』(Izvestia)，L. Pasvolsly『在俄國之遠東政策』一書中曾加引證，見該書第八十七頁。（一九二二年紐約出版）。

十五、馬林 (H. Maring) 著『華南之國民革命運動』（見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共產國際』報）。

十六、魯易・菲些耳(Louis Fischer) 著『蘇維埃之世界政策』(Soviets in World Affair)，一九三〇年紐約出版，第二卷第五四〇頁。菲氏關於中國的一章書特別有價值，將來要常常引證牠，因爲牠差不多完全以鮑羅庭的談話爲根據，且自始至終企圖辯解和維護共產國際在中國採行的路線，是無異給了我們一個有力的內證。

十七、米夫(P. Mif) 著『英勇的中國』，一九三七年紐約出版，第二十一——二頁。

十八、華崗著『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大革命史』（一九三一年上海出版）第六章第一節引證。

十九、菲些耳著『蘇維埃之世界政策』第二卷第六三七頁。

二十、周守貞著『廣州莫斯科協定之影響』第九十七頁；菲些耳著『蘇維埃之世界政策』第二卷第六三八頁。

二十一、國民黨政綱，一九二四年一月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

二十二、菲些耳著『蘇維埃之世界政策』第二卷，第六四〇頁；湯良里著『中國革命秘史』（一九三〇年倫敦出版）第一八三頁。這本書有特別的重要性和權威，主要是因爲牠直接反映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衛的見解和態度，我們

今後將常常引用牠。湯是汪的正式作傳者。

二十三、關於工人階級狀況的調查，請閱一九三二年上海出版『國民黨反動的五年』一書內之『國民黨對工人』又請參閱Lowe Chun Hwa著『中國目前之勞工問題』第一八九頁以下列舉的書目提要。

二十四、參閱S. Wong 和 W. L. 著之『勞動者的中國』，見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國際通訊』。

二十五、Lowe Chun-hwa 著『目前之勞工問題』第四十頁。

二十六、『一九二四年二月廿四日鐵路工人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關於一九二三年事變，請閱羅章龍著『京漢路工人之屠殺』，一九二三年三月北京發表。羅是共產黨員，鐵路工人的組織者和領袖，一九三二年下獄（後來投降國民黨——譯者）。

二十七、陳達著『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六年中國罷工的分析』，上海出版，日期未詳，第五頁。

二十八、Wieger 著『現代中國』第五卷第二六六頁。

二十九、前揭書第二六九——七〇頁。

三十、周守貞著『廣州莫斯科協定的影響』。第一二〇頁。

三十一、衞金斯基 (G. Voitinsky)：『太平洋交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會』，見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一日，『國際通訊』。

三十二、澎湃著『海豐農民運動』，一九二六年廣州出版，澎湃於一九二九年八月由蔣介石下令槍決。

三十三、前揭書。

三十四、張 (Chang) 著『廣東之農民運動』第二頁。

三十五、『孫中山宣言（一九二四年九月一日）』，汪精衞『中國與國際』第一一一——一二頁；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一、十八、十月二日『國際通訊』；一九二四年九月六日上海 North China Herald 報。

三十六、張氏著『廣東之農民』第三十一頁。
三十七、Lowe Chun hwa 著『目前之勞工問題』第三十六頁；華崗說有二百八十一個代表。一百六十六個工會，五十四萬工人——『中國大革命史』第四章，第一節。
三十八、張氏著『廣東之農運』第八頁。
三十九、前揭書第三十二頁。
四十、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上海『密勒士評論報』。
四十一、陳達著『罷工分析』第廿七頁。陳氏記載一九二五年全年有三百十八次罷工，已知的罷工工人數爲七八四、八二一，加上列舉的三分一罷工中未記錄的人數，得出大約的總數爲一百萬。
四十二、察甫曼(H. O. Chapman)著『一九二六——二七年中國革命』(一九二八年倫敦出版)第十四——十五頁。
四十三、陳達著『罷工分析』第二十八頁。
四十四、鄧中夏著『香港罷工之總檢討』，一九二六年八月廣州出版。鄧是這次大罷工的組織者和領袖之一。他於一九三三年夏由蔣介石下令鎗決。他的重要助手之一，羅登賢亦於一九三三年八月由蔣下令鎗决。
四十五、『中國年報』(一九二六年)第九六〇頁。
四十六、張氏著『廣東之農運』第三十八頁。
四十七、『中國年報』(一九二六年)第六九〇頁。
四十八、鄧中夏著『香港罷工之檢討』。
四十九、『中國年報』(一九二六年)第九七七頁。
五十、陳達著『罷工分析』第三十五頁。
五十一、Lowe Chun-hwa 著『目前之勞工問題』引證這段話，見該書第四十四頁；又參閱一九二五年份『香港政府之行政報告』。
五十二、『中國年報』(一九二六年)第九七四——五頁。
五十三、『香港政府公開的送三百萬子彈到汕頭，港商幫助陳烱明百萬多現金。』——華崗：『中國大革命史』第四章第三節。

第四章　註　解

一、華崗著『中國大革命史』第四章第一節引證。
二、察甫曼著『中國革命』第二一〇頁。
三、一九二五年六月六日 North China Herald 報。
四、陳達：『新民族主義的勞工部分』(Labour's Part in The New Nationalism)，見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密勒士評論報』。
五、Samuel H. Chang 著『廣州布爾什維克主義之分析』，見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和四月三日之『密勒士評論報』。
六、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 North China Herald 報。
七、同上。
八、關於大沽哀的美頓書，請閱一九二六年之『中國年報』第一〇三——一二頁，關於此次屠殺的詳明敘述，請閱 Oskar Erdberg著『現代中國故事』一書，（一九三二年莫斯科出版）『三、一八』。
九、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密勒士評論報』。
十、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 North China Herald 報。
十一、一九二六年『中國年報』第一〇一一頁。
十二、李芝龍：『汪主席之辭職』，一九二七年武漢出版。
十三、『中國問題決議案』，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三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會議通過。原文見一九二六年

五月十三日『國際通訊』（第四十期）。
十四、湯良里著『秘史』第二三四頁。
十五、菲些耳著『蘇維埃之世界政策』卷二，第六四六頁。
十六、前揭書。
十七、『廣東農民運動』（國民黨農民部的報告），一九二五年十月，廣州出版。
十八、一九二六年一月七日『國際通訊』。
十九、史大林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及殖民地問題』（紐約出版，日期未詳）第二一六頁。參閱托洛次基著『列寧死後之第三國際』（一九三六年紐約出版）第二一二——二二頁。
二十、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國際通訊』。
二十一、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六次全會『中國問題決議案』（見註十三）。
二十二、布施勝治著『蘇維埃之遠東政策』（一九二七年北京出版）第三〇四頁；在該書第三〇五頁上有胡漢民與其農民國際同僚聚坐的一幀照片。
二十三、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七日（第六次全會首次會）共產國際執委會擴大會的詳細報告，見一九二六年三月四日的『國際通報』。
二十四、同上。
二十五、同上。
二十六、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六次全會『中國問題決議案』（見註十三）。
二十七、湯良里著『秘史』第二三三頁；以小說的方式描述鮑羅庭在廣州的作用。請閱昂德里・馬爾勞的『征服者』(les Canquērants)，一九二八年，巴黎出版（即紐約一九二九年出版之 Conquerors），並參閱托洛次基對牠的批評：『被絞殺的革命及其絞手』，此二文均收入托洛次基之『中國革命問題集』一書（一九三二年紐約出版）中（

見該書第二四四——六六頁。

二十八、菲些耳著『蘇維埃之世界政策』卷二，第六四七頁。

二十九、前揭書。

三十、托洛次基『中國革命問題集』第二五四頁。

三十一、『共產主義同盟給德國黨員的第一號通告』，見恩格斯之『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第一四三頁。

第五章　註　解

一、湯良里著『秘史』第二三一頁。
二、『黃埔年報』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廣州出版。
三、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國際通訊』。
四、李芝龍著『汪主席之辭職』。
五、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七日『國際通訊』。
六、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密勒士評論報』。
七、華崗著『中國大革命史』第四章第五節。
八、李芝龍著『汪主席之辭職』。
九、湯良里著『秘史』第三四六頁。
十、李芝龍著『汪主席之辭職』。
十一、鄧中夏著『香港罷工檢討』。
十二、 George Sokolsky 著『亞細亞之取火匣』(Tinder Box of Asia)，一九三三年紐約出版，第三三六頁。
十三、鄧中夏著『香港罷工檢討』。
十四、李芝龍著『汪主席之辭職』。
十五、該決議案之全文收入 T. C. Woo 著之『國民黨與中國革命之未來』一書中(見該書第一七〇六——九頁)；華崗的『中國大革命史』第四章 第五節 ，和布施勝治的『蘇維埃之遠東政策』第二五一——六頁均有引證和摘錄。
十六、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見『提綱與章程』第七〇——一頁。

十七、前揭書七四——五頁。

十八、『當俄國共產黨員已在中國被捕，我們的報紙尙沒有一句話提到一九二六年三月二日的蔣介石政變』——季諾維也夫語，參閱托洛次基『中國革命問題集』第三四七頁附錄『中國革命提綱』；『史大林——布哈林集團把一九二六年三月蔣介石的第一次政變隱瞞了整整一年』。——阿爾拔·特列恩特(Albert Treint) 語，參閱一九二七年，參閱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巴黎出版『反對派文件與黨的答覆』第七十六頁『特列恩特同志的宣言』。

十九、一九二六年四月八日『國際通訊』。

二十、同上。

二十一、一九二六年四月廿一日紐約『工人日報』。

二十二、衛金斯基著『中國局勢與帝國主義者的計劃』，見一九二六年五月六日『國際通訊』。

二十三、G. Sokolsky著『亞細亞之取火匣』第三三六頁。

二十四、湯良里：『秘史』第二四七頁。

二十五、A. M. Kotenev 著『新燈替舊燈』(New Lamps for Old)，一九三一年上海出版，第二三七頁。

二十六、湯良里著『秘史』第二四九頁。

二十七、菲些耳著『蘇維埃之世界政策』，卷二第六五一——三頁。

二十八、見一九二六年三月末上海『嚮導』週報，該文幷與中國共產黨其他論文和文件收入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京出版之『本黨與廣州事變』一書中。

二十九、『陳獨秀給蔣介石的公開信』(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四日)，見『本黨與廣州事變』。

三十、『高語罕致蔣介石的公開信』，見『本黨與廣州事變』。

三十一、『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給國民黨的信』(一九二六年六月四日)，見『本黨與廣州事變』。

三十二、收入『本黨與廣州事變』中。

三十三、李立三在『中國革命』（文件集）的序文中曾加引證，該書於一九三〇年在上海出版。
三十四、陳獨秀：『給黨員的信』。
三十五、『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與國民黨』，見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共產國際』報。
三十六、陳獨秀：『給黨員的信』。
三十七、華崗著『中國大革命史』第四章第三節。
三十八、惲代英著『國民黨與工人運動』一書曾加引證，該書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出版於武漢。
三十九、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八月七日、八月十四日、八月廿一日及八月廿八日『密勒士評論報』上之『南華消息』。
四十、『廣東省農會報告』（一九二七年二月），見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武漢出版之『中國通訊』。
四十一、『中國年報』（一九二六年）第九八二頁。
四十二、鄧中夏著『香港罷工之檢討』；一九二六年四月廿四日『密勒士評論報』。
四十三、『廣州抵貨談判』，見一九二六年『中國年報』第九八九頁。
四十四、前揭書第九九八頁。
四十五、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密勒士評論報』。
四十六、一九二六平七月卅一日『密勒士評論報』。
四十七、『中國年報』（一九二八）第九七六頁。
四十八、前揭書第九七七——八頁。
四十九、菲些耳著『蘇維埃之世界政策』卷二第六四五頁引證。
五十、『中國年報』（一九二八）第九七八頁。
五十一、『廣州罷工條例』，見一九二七年上海『中國經濟雜誌』；參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卅一日 North China Herald 報之『廣州之勞工鎮壓』一文。
五十二、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卅一日North China Herald 報

。

五十三、李立三編『中國革命』附錄之『「八七」會議告全黨同志書』。(以後均簡稱爲『八七告黨員書』。)

五十四、米夫著『中國革命』(一九三二年莫斯科出版)第九七——八頁。

五十五、斯托拉 (Sydor Stoler) 著『廣州之工會運動』，見一九二七九月十五日漢口出版『泛太平洋工人』。

五十六、勃勞達 (Eaal Brauder) 著『國民革命中國之內戰』(一九二七年，支加哥出版)第十二頁。

五十七、『在華之國際代表』，見一九二七年四月廿八日『國際通訊』。

五十八、譚曼尼(Tom Mann) 著『中國見聞錄』(一九二七年，倫敦出版)第八頁。

五十九、史托拉著『廣州之工會運動』。

第六章　註　解

一、察甫曼著『中國革命』第二十頁。

二、華崗著『中國大革命史』第四章第四節引證。

三、前揭書。

四、『嚮導』報之『長沙通訊』，華崗之『中國大革命史』第四章第四節亦加引證。

五、陳達著『罷工分析』第四十頁。

六、前揭書第四十一頁。

七、『上海來信』（一九二七年巴黎公佈）第十三——十八頁（英譯文附入托洛次基『問題集』中，見該書第三九七頁以下。）該信的作者爲Nassonov, Fokine和Albrccht。雖然他們小心避免使共產國際與『國際代表』的錯誤牽連，但他們舉出的事實對於史大林——布哈林的領導未免太過損害，故該信的發表遭禁止。後來還是共產國際執委會席團之一員，阿爾拔·特列恩特公佈出來的。

八、托洛次基：『問題集』第二七一頁。

九、托洛次基：『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演辭』，見『史大林僞造學校』第一六五與一七三頁。

十、史大林：『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演辭』，見『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及殖民地問題』第二三七頁。

十一、『中國局勢提綱』（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二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全會通過），見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日『國際通訊』。

十二、『譚平山報告』（第七次全會），見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國際通訊』。
十三、史大林：『中國革命前途』（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在第七次全會中國委員會上演講辭），見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廿三日『國際通訊』。
十四、『第七次全會之詳細報告』（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一次會議），見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國際通訊』。
十五、特列恩特著『關於中國與問題隱瞞的眞相』（La Verītē Qu'on Cache Sur la Chine, etc），見『反對派文件與黨的答覆』第七七——八頁。
十六、史大林：『中國革命之前途』。
十七、『中國局勢提綱』（第七次全會）。
十八、同上。
十九、史大林：『中國革命之前途』。
二十、『邵力子（國民黨代表）演辭』（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第七次全會），見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國際通訊』。
二十一、布哈林『在聯共列寧格勒區第二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辭』，見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二日『國際通訊』。
二十二、『譚平山演辭』（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廿六日七次全會會議），見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廿三日『國際通訊』。
二十三、史大林：『中國革命之前途』；又參閱『（聯共）彼特洛夫的演辭』（見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國際通訊』。
二十四、陳達著『罷工之分析』第四十三頁。
二十五、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 Hankow Herald 報。
二十六、察甫曼：『中國革命』第三十五頁。
二十七、蘭辛著『中國之謎』第一〇六和一一三頁。後來蘭辛有一個駐九江的英籍情報員寫信給他，抱怨他的記載『不夠悲慘！』

二十八、『上海來信』第四頁。

二十九、關於這些文件的原文和有關的引證，請閱一九二八年『中國年報』第七三九頁以下，七六一、七六四、九八三、一三五三等頁。

三十、『上海來信』第五頁。

三十一、『八七告黨員書』。

三十二、『上海來信』第七——八頁。往後幾年，鮑羅庭不嫌麻煩拿這次宴會來證明。他會反對過蔣介石。關於蔣氏自己對這件事的記載，請閱 Wieger 著『現代中國』第七卷第一四〇——二頁。

三十三、 Wieger 著『現代中國』第八卷第二三——四頁。

三十四、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North China Herald。

三十五、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漢口『民衆論壇』(People Tribune)；Woo 著『國民黨與中國革命之未來』第一八〇頁。

三十六、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六日『民衆論壇』。

三十七、同上。

三十八、同上(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九日)。

三十九、同上。

四十、『上海來信』第七——八頁。

四十一、一九二七年四月九日 North China Herald 報譯自一九二七年三月八日『嚮導』。

第七章　註　解

一、一九二七年三月『中國經濟雜誌』；一九三三年上海社會局出版之『一九一八年以來上海之罷工和關廠』。

二、『上海爭奪戰』，見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三日『國際通訊』。

三、關於精確的數字，各方材料互有出入。外人的官方報告之過低報告數字簡直成了一種政策，牠們舉出十萬六千人（一九二八年『中國年報』第九九六頁。）『上海來信』舉出三十萬人。華崗在『中國大革命史』中舉出三十六萬人，並列舉工廠和商店來證明他的數字。敵對的中國資料舉出更高的總數。上海社會局列出四二五、七九五人（『罷工與關廠』第六十二頁）。賀生（譯音）舉出五十萬人（「近代史資料」第三卷，一九三三年上海出版）。

四、華崗著『中國大革命史』第五章第二節。

五、瞿秋白著『中國革命之爭論問題』（一九二七年武漢出版）附錄一。

六、一九二七年二月廿一日New York Herald-Tribune報。

七、賀生：『三次上海暴動』，見『近代史資料』卷一第一七〇頁。

八、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上海『密勒士評論報』。

九、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North China Herald　。

十、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New York Herald Tribune。

十一、『上海來信』第十——十一頁。

十二、『中國年報』（一九二八年）第一二六六頁。

十三、華崗著『中國大革命史』第五章第三節。

十四、前揭書。

十五、關於上海暴動的動人的描述，請閱馬爾勞的『人之命運』。

十六、華崗及其他共產黨的資料通常舉出八十萬人爲捲入罷工者的總數。『罷工和關廠』一書則舉出眞正加入罷工者的數目爲三十二萬九千人。

十七、牛堡(A. Neuberg即Heinz Neumann) 著『武裝暴動』（一九三一年巴黎出版）第一四一頁。

十八、華崗著『中國大革命史』第五章第三節

十九、賀生著『資料』第三卷。

二十、華崗著『中國大革命史』第五章第三節。

第八章　註　解

一、中國人說，蔣屬於通字輩，或青幫第二十二代，因爲這個組織是照家族系統組織的。提及蔣『與青紅幫的關係』，George Sokolsky說道：『他也許甚至是這種有勢力的秘密團體中一個或兩個的會員，但這件事，外界無從知道。』——『中國年報』（一九二八年）第一三六一頁。
二、『上海工人代表報告』，見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九——二十『湖南申報』（以後通稱爲『工人代表報告』）；又參閱郭美力（譯音）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民衆論壇』上的報告及一九二七年六月廿三日的『國際通訊』。關於青幫及其後來發展的敘述，請閱『國民黨反動之五年』中『上海幫口制度』一節。
三、李芝龍著『汪主席之辭職』。
四、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 North China Herald 報上的三月廿三日九江通訊；又參閱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的『民衆論壇』。恐怕在所有關係的外人中，首先知道蔣介石在江西的恐怖運動的事實的，就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勃勞達、譚曼尼和杜里歐。他們何以故意隱匿該項情報，直到牠已過時失效之時才發表？這一點在第九章有講到。
五、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民衆論壇』。
六、『第六軍政治部報告』，見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一日『民衆論壇』。
七、察甫曼著『中國革命』第三十二頁。

八、關於強姦罪狀底證據的缺如，請參閱一九二七年五月廿八日『密勒士評論報』。

九、見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和十六日『民衆論壇』上G. A. Kennedy的報告。Kennedy的大部份調查資料均收入William Prohme的公函中，該信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三日的紐約『民族』報。關於『南京暴行』表現上海外僑之情緒和精神的資料，請閱一九二八年『中國年報』第十六章。

十、基凡斯(Givens)後來充當上海巡捕房的特務（政治）部主任，特務部在往後幾年，搜捕成千成百共產黨人，其中許多都交給蔣介石政府鎗决。一九三一年南京政府以第一級『甲』等陸海空軍勳章授予基凡斯，嘉許他之合作『維持秩序』。——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九日『字林西報』。

十一、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 North China Herald.

十二、一九二八年『中國年報』第一三六一頁 George Sokolsky 一文。

十三、『工人代表報告』；陳福泰，漢口泛太平洋工會代表大會上海代表之一，報告道：上海糾察隊有三千人，二千八百枝步鎗，三十挺機關鎗，兩百枝手鎗和十六挺輕炮。——一九二七年五月廿六日『民衆論壇』。

十四、『據華人方面可靠的估計，駐上海的國民黨軍不出三千人。何應欽將軍只有一萬軍隊扼守杭州。蔣介石的軍事力量目下散處於如是廣大的區域，……對於鎮壓工人……沒有多大價值。』——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 North China Herale『蔣在上海只有三千軍隊……有重大關係的成分，蔣絲毫沒有取得。』——Sokolsky，見一九二八年『中國年報』第一三六一頁。『同情革命的軍隊，仍然是優於反革命的軍隊，蔣介石直接指揮的軍隊都動搖起來。』——李立三編『中國革命』第三十三頁。

十五、一九二七年四月廿八日『民衆論壇』。

十六、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 North China Herald 報上

A. De C. Sawerby 一文。

十七、一九二七年二月二日『市政公報』。

十八、參閱藍辛著『中國之謎』一書內『上海之心』一章。

十九、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 North China Herald 報上 Rodney Gilbert 君一文，對於這種普通論調的極其適切的答覆可於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民衆論壇』中找到，見該報的："That model Settlement"，一文。

二十、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 North China Herald 報一個逃離佈道師做的『撤僑感想』一文。

二十一、同上。據一九二七年六月廿四日上海泰晤士報載，正常工作的宣教師有八千人，就中只有五百人尙留原職。因爲五千人逃回老家，一千五百人避居上海，一千人則避居其他口岸，自保的本能竟勝過於宣傳福音的使命也。

二十二、一九二七年二月上海『憲政報』的『中國之眞相』一文。

二十三、E. E. Strathers 著『一個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世界的最大禍患』及其他文章的集子，第六頁，一九二七年六月上海出版。

二十四、同上，第十八頁。可惜關於這種『確鑿的證據』，察甫曼（當時的一位漢口居留民）明白認爲這種遊行『從未發生』。——『中國革命』第八十七頁。這種特殊的報道是外國報關於漢口情形。所懷着的瘋狂思想的典型例子。這些報道都是惡意的中傷。有幾個人因爲散佈『裸體遊行』的謠言，在漢口被捕了。

二十五、一九二七年五月九日North China Herald 報上，美國駐華海軍司令 Smedley, D.Butlcr 一文。

二十六、一九二七年一月『憲政報』第二九一頁。

二十七、一九二七年四月九日『密勒士評論報』。

二十八、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字林西報』。

二十九、一九二七年三月『遠東雜誌』。

三十、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字林西報』。
三十一、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 North China Herald。
三十二、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字林西報』。
三十三、一九二七年四月七日『新聞報』。
三十四、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日『字林西報』。
三十五、一九二七年四月九日『密勒士評論報』。
三十六、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紐約泰晤士報』。『工人代表告報』也舉出一千五百萬的數目，不過一千二百萬歸蔣，一百五十萬白崇禧，一百萬歸周鳳歧。五十萬歸工賊。外人參加這種『借欵的程度是很難確定的。關於外人如何經過中間人來合作的情形，再請讀者參閱馬爾勞的『人之命運』。
三十七、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新聞報』。
三十八、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北京晨報』。
三十九、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新聞報』。
四十、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密勒士評論報』。
四十一、一九二七年三月廿八日『字林西報』。
四十二、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紐約泰晤士報』莫斯科專電摘引『眞理報』的話。
四十三、一九二七年四月九日 North China Herald。
四十四、湯良里『秘史』，第二六六——七頁。
四十五、一九二七年四月七日天津『大公報』。
四十六、湯良里『秘史』第二八八頁。

第九章 註 解

一、一九二七年三月廿五日『上海泰晤士報』。
二、一九二七年三月廿八日『字林西報』。
三、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七日柏林『紅旗報』。
四、一九二七年三月廿三日『人道報』。『史大林——布哈林造成的混亂……使我黨的領導機關於一九二七年三月廿三日電賀蔣介石入滬，譽之爲中國公社的代表……史大林——布哈林小組織的政策引導法國黨的領導關機誤入歧途，竟將 Gallifet 和公社，屠夫和犧牲者混在一起……』阿爾拔·特列恩特。『關於中國問題，一九二七年七月廿三日致共產黨國際執委會的宣言書』，見『法國反對派文件與黨的答覆』第六十七頁。
五、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進步報』；一九二七年三月九日，四月十日等『眞理報』。
六、見本書一三四——六頁（原本頁數）。
七、參閱『中國局勢提綱（第七次全會）』（見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日『國際通訊』；）又參閱一九二七年二月廿八日『共產國際報』社論；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同報馬丁諾夫一文；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日同報之『中國革命與國民黨』一文，及許多其他文章。
八、勃勞達著『國民革命中國之內戰』；杜里歐作『在中國革命中』（見一九二七年六月——八月『人道報』）；譚曼尼著『中國見聞錄』。

九、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人道報』上杜里歐一文。

十、勃勞達著『內戰』第十五頁。

十一、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二日『人道報』上杜里歐一文。

十二、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漢口『民衆論壇』。

十三、見一九二七年七月倫敦『勞工月刊』。事實上進行公開反蔣的唯一人民就是漢口一批個別共產黨員，但他們的行動完全是自動。參閱『上海來信』第八頁。

十四、一九二七年四月九日『民衆論壇』。

十五、『國際代表團從廣州到武漢之經過』，見一九二七年十一日『國際通訊』。

十六、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二日『民衆論壇』。

十七、同上；又參閱譚曼尼著『中國見聞錄』第十一頁。

十八、一九二七年三月廿三日『國際通訊』。

十九、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日同上。

二十、一九二七年三月廿三日『人道報』。

二十一、一九二七年三月廿六日『國際通訊』及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日『共產國際』報均有轉載。

二十二、馬丁諾夫：『中國革命中力量之改編』。見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共產國際』報。

二十三、這篇演辭從沒有公佈過。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會中，吳約維支（Vuyaiutch）向史大林提起這幾段話。蓋吳約維支已親自把牠們速記下來。他用挑戰的口吻說，『史大林同志隨時有機會向我們提出他的速記稿來修正一些無心的失實之處。』（參閱托洛次基：『問題集』附錄，第三八八——九〇頁。）但史大林沒有提出修正，他也沒有留下速記稿，因爲，據托洛次基在共產國際執委會同一會議上說：『數日之後，榨乾了檸檬奪取了政權和軍隊……我以中央委員的資格，有權取得這篇演辭的速記稿，但我的苦心和企圖均歸失敗。同志們，現在再嘗試一下吧，也許你們碰到好運氣。但我懷疑這

點。』（前揭書第九十一頁）。不僅一個反對派份子，就是史大林信賴過的部屬，阿爾拔·特列恩特也證明有這篇演辭並有禁止發表牠的事實。『史大林甚至連他自己的演辭也隱匿起來了……史大林本人在共產主義學院，對三千名黨的辦事人作的一篇演辭從未發表過……因爲十日之後，蔣介石的政變使他的遭遇事變的體無完膚的駁倒』（『法國反對派文件』第三六、六四頁）。關於史大林的見解反映在中國舞台上的情形，請讀馬爾勞『人之命運』一書』第一四六——五五頁，喬和『窩樂金』（Valogin）的談話。

二十四、史大林，一九二七年三月廿九日『對青年團的演辭』，見一九二七年四月九日『國際通訊』。

二十五、曼達萊揚(T. Mandalyan)：『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機關何以無法完成牠的任務？』見一九二七年七月廿三和三十日『國際通訊』。曼達萊揚當時是駐滬的共產國際代表。『國際打電囑我們埋藏工人的所有鎗枝，避免工人和蔣介石間的軍事衝突』。——陳獨秀：『告黨員書』。『……隱藏鎗枝，不迎戰，因此不致繳械……不是更好麽？』——布哈林著『中國革命問題』巴黎出版，日時未詳（大約一九二七年五月——六月），第五十六頁。又參閱馬爾勞『人之命運』第二〇九——一〇頁。

二十六、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俄文版，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日德文版，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英文版『共產國際』報。

二十七、見本書第二二二——四頁（原本頁數）。

二十八、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字林西報』摘引。

二十九、『……照鼓動者現在招募新人馬的情形看來，在往後數星期內，半百萬以上的工人將服從總工會的罷工號召。』——一九二七年四月九日上海North China Herald. 據泛太平洋工會代表大會的上海代表陳學達報告，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二日與四月十二日間，上海工會力量從三

十五萬人增至八十五萬人。——一九二七年五月廿六日『民衆論壇』。

三十、一九二七年三月廿六日『國際通訊』。

三十一、華崗著『中國大革命史』第五章第二節。

三十二、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新聞報』。

三十三、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同報。

三十四、同上。

三十五、同上。

三十六、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同上。

三十七、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同上。

三十八、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同上。

三十九、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 North China Herald 。

四十、米夫著『中國革命』第九十八頁。

四十一、從原稿翻譯。

四十二、Glover Clark著『一九二七年之中國』(一九二八年北京出版)第十三頁。

四十三、楊超羣 (Yang Tsao-Cheng)：『一九二七年春在上海事變』，見莫斯科孫文大學出版『中國問頭資料』第十三號第二十頁。『……薛岳向中央提議，他同意不服從蔣的命令。他願意駐留上海，和上海工人共同抵禦準備中的軍事政變……』——Chitarov (當時駐上海的共產國際辦事人)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在聯共第十五次大會會議上報告。這段話後來從紀錄中刪去，托洛次基則從速記原稿中摘引出來——托洛次基：『問題集』第九十九頁。米夫在『中國革命』第九十九頁中也證實這件事，雖然他採取故意曲解的形式。又參閱馬爾勞『人之命運』第二〇七頁。

四十四、楊超羣：『上海事變』第二十頁；……我們的負責領袖……宣稱他們知道這次政變正在着着準備，但不願過早和蔣介石衝突』， Chitarov，——同上摘引。

四十五、馬爾勞小說中的喬想組織抵抗，『但中國共產黨

的友式演辭，和國民黨聯合的全部宣傳却正在痲痺他。』——『人之命運』第二〇七頁。

四十六、一九二七年四月七日『新聞報』。

四十七、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字林西報』之北京路透電。

四十八、參閱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國際通訊』。

四十九、一九二七年四月九日『紐約泰晤士報』。

五十、華崗著『中國大革命史』第五章第二節。

五十一、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新聞報』。

五十二、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同報。

五十三、參閱一九二七年五月七日『民衆論壇』。

五十四、馬爾勞著『人之命運』第二〇六六——七頁。

第十章 註 解

一、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上海 China Press。
二、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字林西報』。
三、同上。
四、一九二八年『中國年報』第一三六二頁。
五、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上海『申報』。
六、同上。
七、參閱『工人代表報告』，『新聞報』及其他上海報紙的詳實記載。
八、『捕房四月份報告』。見『市政公報』（一九二七年五月廿一日）。參加漢口第四次全國總工會代表大會的上海代表報告：一百四十個工會領袖和五百個工人在抵抗蔣的政變時送掉生命。——一九二七年六月三十日『民衆論壇』。
九、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三日『新聞報』。關於『改組』的最好的描寫，請閱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七日『民衆論壇』上之『蔣介石之法西斯工會』一文。
十、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三日『新聞報』。
十一、同上。
十二、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 North China Herald。
十三、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三日『新聞報』。
十四、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三日 China Press.。
十五、『九萬工人出廠』。——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日

China Press『共產黨號召總罷工來抗議反共的政變，這一號召於四月十三日午得到不下十一萬一千八百個工人服從。』——上海工部局捕房一九二七年份報告。
十六、『工人代表報告』。
十七、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日 China Press。
十八、華崗著『中國大革命史』第五章第二節，『工人代表報告』。
十九、蔣介石：『告民衆書』，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海發。
二十、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 North China Herald.
二十一、同上。
二十二、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北京晨報』稱官方報告舉出被捕者的人數總共爲一千。
二十三、馬克思著『路易·波拿帕特霧月十八日』（一九二六年紐約出版）第一二七頁。
二十四、同上，第一二八頁。
二十五、一九二八年『中國年報』第一三七四頁。
二十六、一九二七年五月四日『紐約泰晤士報』。
二十七、同上，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九日。
二十八、一九二七年六月廿五日上海『密勒士評論報』。
二十九、『是的，這個傭人跨在主人的頸上，不時的把最鮮美的東西從他的嘴裡奪了去，並且把痰吐在他頭上光禿的地方。任你怎樣說，牠是一個最不合意的傭人！然而牠還不過是一個傭人。資產階級和他住在一起。因爲沒有他，牠和牠的統治必然滅亡。……資產階級獨裁仍然不受侵犯，因爲牠的社會霸權的所有條件已維持和鞏固了。』——托洛次基著『第四國際與蘇聯』。
三十、蘇聯工會赴漢代表，於四月十四日道經廣州。翌日他們眼見搗毀工會，大批逮捕和當街處決的情形，這都是奉李濟琛將軍的命令執行的，李將軍在數月之前也曾列入史大林——布哈林的『革命將軍』人名錄中哩——參閱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五日『民衆論壇』。逃亡的廣州工會運動者把

這段過遲的消息帶到漢口：『我們深以國民革命的發源地變成反動的根據地爲憾。』——一九二七年五月六日『民衆論壇』。

三十一、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共產國際』。

三十二、由官方（武漢）國民通訊社傳出，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日 China Press 發表。

三十三、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日『紐約泰晤士報』。

三十四、台爾曼 (E. Thaelman）作『中國革命與無產階級的任務』，見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國際通訊』。

三十五、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國際通訊』第四十三期。

三十六、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同上第四十四期。

三十七、廖漢生 (Lian Han-sen)：『人民叛賊，蔣介石，』見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三日『國際通訊』。

三十八、史大林：『中國革命問題』，見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國際通訊』。

三十九、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三日『紐約泰晤士報』。

第十一章　註　解

一、一九二七年四月廿六日『字林西報』。
二、參閱蔣介石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在南京作的演辭；又參閱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五——二十六日『民衆論壇』上 James H Dolsen 著『蔣介石之困境』一文。
三、本章摘引一切史大林的話均根據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國際通訊』上『中國革命問題』一文的正式英譯稿。
四、托洛次基：『中國革命與史大林同志的大綱』（一九二七年五月七日），見『問題集』第廿三頁以下。（除另有註釋者之外，本章所有摘引托氏的話均本自此文。）
五、N. Lenzner「中國問題」，見一九二七年六月廿五日和廿九日「國際通訊」A. Stetski：『中國革命之轉變，』見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七日同上；Stetski：『中國鬥爭的辯證律』，見一九二七年五月七日同上；L. Heller：『中國革命聯合戰線破裂以後』，見一九二七年五月七日同上；J. Pepper『張伯倫與蔣介石的同盟』，見一九二七年五月廿一日同上；等等。
六、見註三。
七、Lenzner：『中國革命』（旁圈照原文）。
八、布哈林『中國革命問題』第五十六、五十九頁。
九、布哈林：『向聯共莫斯科委員會全體會議報告』一九二七年六月四日，見一九二七年七月二日『國際通訊』。

『何時應該妥協，何時應轉守爲攻？』五月末，共產國際執委員第八次全會的決議問道。『這要就具體條件決定。共產國際特別以爲，有些同志在蔣介石上海政變時建議實行暴動的策畧，十分謬誤。這項策畧的究竟，非以暴動進攻帝國主義及蔣介石作先發制人之計，便須廣佈陣線，用武裝力量和他們鬥爭。………假使上海工人發起了廣大的武裝行動，則必被蔣介石帝國主義聯合武力撲滅，中國無產階級的鮮血，在一個毫無勝利之望的戰爭中，便會平白灑盡。』——『中國問題决議案』，見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五日『國際通訊』。（此段譯文乃從李立三編『中國革命』中之正式中文譯稿摘下的，與本書作者引證的英文重譯，有少許詞句上的出入——譯者。）

十、E. Eichenwald著『共產國際在中國之策畧路線，』見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國際通訊』。

十一、布哈林：『中國革命問題集』第五十九頁。

十二、唐新士（Tang Shin-She）：『蔣介石之武力活動與漢口政府』，見一九二七年六月六日『國際通訊』。

十三、一九二七年五月廿一日『國際通訊』。

十四、托洛次基著『問題集』第二八五頁。

十五、藍辛著『中國之謎』第六十六頁。

十六、托氏『問題集』第二八〇頁摘引。這一段及外幾段已從大會出版的紀錄中删去。

十七、托氏：『關於中國問題的第二次演講辭』，見『問題集』第一〇三頁。

十八、史特朗（Anna Louis Strong）著『中國之勞苦民衆』（紐約，一九二八年出版）第三八——九頁。

十九、前揭書。

二十、杜里歐：『在中國革命中』，見一九二七年六月廿五日巴黎『人道報』。

二十一、菲些耳著『蘇維埃之世界政策』卷二，第六六七頁。

二十二、米夫著『中國革命』第一〇〇頁。

二十三、『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宣言』，見一九二七年五月廿三日——六日武漢『民國日報』。

二十四、一九二七年七月廿八日『國際通訊』，正式譯稿。

二十五、『泛太平洋工會秘書處宣言』（一九二七年七月廿五日漢口發），見一九二七年九月二日『國際通訊』。

二十六、米夫著『中國革命』第一〇〇頁。

二十七、華崗著『中國大革命史』第五章第二節。這段話是複述瞿秋白一九二八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上更審慎地發表的思想。蓋史大林底『革命中心』在一切人的記憶中尙際常新鮮，故當時尙不敢大胆說話。（參閱瞿秋白著『中國革命』第一章）。

二十六、見托洛次基著『不斷革命論』。

第十二章　註　解

一、『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言』，見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漢口『民衆論壇』。

二、『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宣言』，見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民衆論壇』。

三、見本書第九章：『沉默的陰謀』。

四、『共產國際代表團宣言』，見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漢口『中國通訊』。

五、同上。

六、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七日『民衆論壇』。

七、瞿秋白：『中國革命』第一一四頁。

八、『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宣言』，見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民衆論壇』。

九、一九二七年五月六日『民衆論壇』。

十、『鮑羅庭先生與Reugo 通訊社代表談話』，見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中國通訊』。

十一、非些耳著『蘇維埃之世界政策』第二卷第六六七一一八頁。

十二、前揭書。

十三、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三日『紐約泰晤士報』。

十四、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日同報。

十五、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同報。

十六、『紐約泰晤士報』是美國官場脈膊的正確檢查表。

中國消息多月來便登在第一版，但五月六日突然不見了。數日之後，林白的偉業與紐約的情殺案完全吸引了報紙和公衆。

十七、察甫曼：『中國革命』第一三六頁。

十八、一九二七年五月三日『紐約泰晤士報』。

十九、一九二七年四月廿四日和廿九日『民衆論壇』。

二十、『外交部通訊，見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中國通訊』。

二十一、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七日『民衆論壇』。

二十二、參閱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三日『民衆論壇』。

二十三、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中國通訊』。

二十四、一九二七年五月九日路透（英國）通訊社電，發表於一九二八年『中國年報』第七三五——六頁。

二十五、魯易：『帝國主義干涉中國』，見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中國通訊』。

二十六、察甫曼：『中國革命』第一二九頁。

二十七、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四日『民衆論壇』。

二十八、先一年，白銀已流到沿岸。上海的白銀存量從一九二六年初之一萬零二百兩增至一九二七年四月之一萬三千八百六十萬兩。參閱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上海出版之『資本與貿易』及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上海『密勒士評論報』。

二十九、參閱『驚慌與怠工造成的金融局勢』，見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民衆論壇』。

三十、據湖北失業局報告，六月末，武漢有十六萬人失業——一九二七年七月十日『民衆論壇』。

三十一、參閱第四次全國總工會代表大會報告，見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日以後之『民衆論壇』。

三十二、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民衆論壇』。

三十三、瞿秋白：『中國革命』第五十三頁；湯良里『秘史』第二七一頁。

三十四、一九二七年四月廿四日『民衆論壇』。
三十五、原文見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中國通訊』。
三十六、『關於革命之各階級性宣言』，見一九二七年五月廿一日『民衆論壇』。
三十七、『湖北總工會中央執行委員會條例』，見一九二七年五月廿五日『民衆論壇』。
三十八、米夫：『中國革命』第一〇一頁摘引。
三十九、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告農民書』，見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中國通訊』。
四十、『國民工農政策』（一九二六年十月），見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中國通訊』。
四十一、『告農民書』。
四十二、土地委員會議事的詳細報告均自下列各書採集；瞿秋白著『中國革命』；米夫著『中國革命』；『八七告黨員書』。本書作者引用的所有直接摘引均是上列各書從原稿摘下的。在 Oskar Erdberg 著『近代中國故事』的『八月四日晚』一節中，有生動的記載，該書於一九三二年莫斯科出版。
四十三、瞿秋白著『中國革命』第一一二頁。
四十四、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九日『民衆論壇』。
四十五、米夫著『中國革命』第一一八頁。
四十六、魯易著『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見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巴黎『國際通訊』。
四十七、米夫：『中國革命』第一一八頁。
四十八、魯易：『第五次大會』。
四十九、同上。
五十、瞿秋白著『中國革命』第一〇〇頁以下。
五十一、陳獨秀：『向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報告』，見一九二七年六月四日『國際通訊』。
五十二、托洛次基著『問題集』第七七——八頁
五十三、托洛次基著『問題集』第二八四頁引證。

五十四、米夫著『中國革命』第一二〇頁以下有引證。原文亦見於 Asiatcus 著『從廣州到上海』（一九二七年柏林出版）第二六五頁。

五十五、陳獨秀：『向第五次大會報告』。

五十六、見本書一三三頁。

五十七、N. Lenzner：『中國問題』，見一九二七年六月廿九日『國際通訊』。

五十八、『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宣言』，見一九二七年五月廿三——廿六日漢口『民國日報』。

五十九、瞿秋白：『中國革命』第一〇四——五頁。

六十、同書第一〇八頁。

第十三章　註　解

一、瞿秋白著『中國革命』第五十三頁。

二、『湖南省農會代表報告』，見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二日武漢『民國日報』。（以後簡稱爲『湖南代表報告』。）

三、蔡玉眞（Tsai Yi-tsen）：『湖北省農會代表報告』，見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二十一日『民國日報』。（以後簡稱爲『湖北代表報告』。）

四、『湖南代表報告』。

五、『湖北代表報告』。

六、參閱史特朗著『中國勞苦民衆』的『民衆糧食』一節。

七、察甫曼：『中國革命』第九十一頁。

八、前揭書第九十一頁。

九、關於革命在文化方面的成就，尤其是在婦女解放和破除迷信方面，請閱史特朗著『中國的勞苦民衆』和察甫曼的『中國革命』。

十、史特朗：『中國民衆』第四一——二頁。

十一、『湖南代表報告』；又參閱一九二七年七月二日『民衆論壇』上載之『湖北省農會決議案』。

十二、『湖北代表報告』。

十三、蔡玉眞：『湖北農運之困難與最近的策略』，見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二——十三日『民國日報』。

十四、同上。

十五、湖北省農會估計二月至六月間，在湖北省起碼有四千七百個農民（包括五百婦女）被殺。牠縷舉處決的手段如下；『斬首，活埋，鎗斃，絞殺，燒死………碎屍。』——一九二七年七月七日『民衆論壇』）。

十六、『湖北國民黨工作報告』，見一九二七年六月廿四日——廿五的『民衆論壇』；參閱『董必武對湖北黨大會的演辭』（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民衆論壇』）。

十七、參閱『湖北國民黨代表大會報告』，見六月廿六日以後的『民衆論壇』。

十八、史托拉著『國際工人代表在湖南』，見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漢口『中國通訊』。

十九、『湖北代表報告』。

二十、史托拉：『國際工人代表在湖南』。

二十一、同上。

二十二、同上。

二十三、『壓制反革命派的手段並沒有十分迅速和小心的執行。想使政府開始立即審判被捕的腐敗鄉紳，土豪等反革命派亦不可能。』——『湖北國民黨工作報告』。

二十四、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二和七月八日『民衆論壇』。

二十五、『中執會宣言』（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日），見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日『民衆論壇』。

二十六、史特朗：『中國民衆』第一六六頁。

二十七、『湖北省代表大會（六月廿五日武昌）報告』，見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二日『民衆論壇』。

二十八、『湖北代表報告』。

二十九、『湖北國民黨工作報告』。

三十、史特朗：『中國民衆』第一六六——九頁。

三十一、史托拉：『國際代表團在湖南』，見一九二七年七月廿一日『國際通訊』。

三十二、魯易：『中國之革命與反革命』見一九二七年七月廿一日『國際通訊』。

三十三、『湖北省代表大會報告』；見註二十七。
三十四、蔡玉眞：『困難與最近策畧』。
三十五、『八七告黨員書』。
三十六、湯良里：『秘史』第二七六頁。
三十七、『八七告黨員書』。
三十八、史大林：『中國革命問題』。
三十九、托洛次基：『問題集』第四十三頁。
四十、『八七告黨員』。
四十一、『勃勞達在工會領袖會議上談話』，見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中國通訊』。
四十二、勃勞達：『中國革命向左轉』，見一九二七年七月倫敦『勞工月刊』。
四十三、藍辛：『中國之謎』第九十二頁。
四十四、一九二七年五月廿一日『民衆論壇』。
四十五、同上。
四十六、『八七告黨員書』。
四十七、『譚平山宣言』，見一九二七年五月廿九日『民衆論壇』。
四十八、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二日『民衆論壇』。
四十九、『八七告黨員書』。
五十、一九二七年五月廿五、廿九日『民衆論壇』。
五十一、一九二七年六月二、九日同報。
五十二、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一日同報。
五十三、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同報。
五十四、湯良里：『秘史』第二七〇三頁。
五十五、『八七告黨員書』。
五十六、同上。
五十七、參閱漢口『民國日報』，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日各份；又參閱一九二七年六月四日『民衆論壇』。
五十八、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八日『民國日報』。

五十九、『八七告黨員書』。
六十、一九二七年五月廿八日『民衆論壇』。
六十一、參閱『八七告黨員書』；瞿秋白著『中國革命』第一一二頁；Chitarav 在聯共第十五次大會演辭（托洛次基著『問題集』第二八九——九〇頁有引證）；米夫著『中國革命』第一三九——四〇頁。
六十二、瞿秋白：『中國革命』第一一二——一三五頁，又參閱一九二七年五月廿七日『民衆論壇』。
六十三、據阿爾拔·特列恩特說：『譚平山……在六月初贊成指揮武裝討伐土地革命。』——（『特列恩特同志宣言』第六十三頁）麥克思·夏克曼著『十年來反對派的歷史和原則』（一九三三年紐約出版）第五十頁也根據特列恩特，說出這種話。當著者問及這一點時，特列恩特堅稱他的報告者就是布哈林本人。但這種說法顯然是訛誤的。
六十四、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八——十九日『民國日報』。

第十四章　註　解

一、見『反對派政綱』（一九二七年，巴黎出版）第九一——廿四頁，托洛次基著『俄國之眞相』（一九二八年，紐約出版）第二章和第四章；托洛次基著『被背叛的革命』（中譯本名爲『蘇聯之現狀與前途』——譯者）一九二七年紐約出版第二五——三二頁。

二、見托洛次基著『問題集』第六一——七頁；托洛次基著『列寧死後之第三國際』第一二八——三四頁。

三、例如，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月第六次全會議事的報告充滿九期『國際通訊』，足足佔了二百零二頁。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第七次全會的報告還要長，擠滿該刊十六期之多。

四、一九二七年五月廿五日『國際通訊』。

五、『特列恩特同志宣言』，見『法國反對派文件』第六十五頁。

六、『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局關於執委會全體會會議進行的通告』，見一九二七年六月八日『國際通訊』。

七、史大林：『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的任務』，見一九二七年六月三十日『共產國際』報。

八、布哈林：『共產國際執委會全體會議的決議』，見一九二七年六月廿九和七月二日『國際通訊』。

九、『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會中討論的中國問題』，一九二八年，漢堡——柏林出版。

十、史大林：『中國革命』。

十一、托洛次基：『關於中國問題第一次演辭』，見『問題集』一〇〇頁。

十二、托洛次基：『關於中國問題第二次演講辭』，見『問題集』第一〇二——四頁。

十三、『中國問題決議』，見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一和十五日『國際通訊』。

十四、阿爾拔·特列恩特：『一九二七年五月中國次委員會底分析的報告』，（Compte Rendu Analytique de la Petite Commission Chinoise, Mai, 1927），這個文件是特氏於一九三五年八月，應著者之請，根據筆記寫出來的。他後來在巴黎把牠發表，一九三六年二月八日在紐約的『新戰鬥報』上重印出來。牠的要點包括在『特列恩特同志的宣言』（一九二七年七月廿二日發），第六十四頁中。

十五、陳獨秀：『告黨員書』；又參閱湯良里著『秘史』第二八〇頁；史大林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及殖民地問題』第二四九頁。

十六、湯良里：『秘史』第二七三頁。

十七、陳獨秀：『告黨員書』。

十八、托洛次基：『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執監聯席全體會議上演講辭』，見『史大林的造謠學校』第一六五頁。

十九、瞿秋白：『中國革命』第九十頁。

二十、陳獨秀：『告黨員書』。

二十一、湯良里：『秘史』第二八〇頁；陳獨秀的『告黨員書』也證實魯易把電文出示汪精衛的事實。

二十二：托洛次基：『問題集』第一二一——二頁。

二十三、『關於托洛次基與吳約維支參加共產國際執委會全體會的決議』，見一九二七年六月八日『國際通訊』。

二十四、『書記局通告』，見一九二七年六月八日『國際通訊』。

二十五、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一日『眞理報』，一九二七

年六月十一日『國際通訊』亦有轉載。
二十六、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民衆論壇』。
二十七、湯良里：『秘史』第二七四頁。
二十八、瞿秋白著『中國革命』第一一三頁。
二十九、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國際通訊』；托洛次基：『問題集』第二九二頁。
三十、瞿秋白著『中國革命』第二章。
三十一、『八七告黨員書』。
三十二、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二日『民衆論壇』。
三十三、一九二七年六月廿一日同上。
三十四、一九二七年六月三十日『國際通訊』。
三十五、一九二七年六月廿九日『民衆論壇』。
三十六、一九二七年七月二日同上。
二十七、E. Zeitlin：『中國革命之新階段』，見一九二七年六月廿九日『國際通訊』。
三十八、『八七告黨員書』，米夫著『中國革命』第一四一頁。
三十九、夏鼎（譯音）：『中國的農運』，見一九二七年六月廿三日『國際通訊』。
四十、一九二七年六月三十日『民衆論壇』。
四十一、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三日『民國日報』。
四十二、托洛次基著：『問題集』第七十八頁。
四十三、米夫著『中國革命』第一三九頁。
四十四、同上。
四十五、菲些耳：『蘇維埃之世界政策』第二卷第六七二頁。

第十五章　註　解

一、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六日紐約『工人日報』。
二、Katsuji Fuse：『蘇聯之遠東政策』第三二二——六頁。
三、前揭書第三二七頁。
四、前揭書第三二九頁。
五、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民衆論壇』。
六、一九二七年六月八日『國際通訊』。
七、托洛次基著『問題集』第一二三——四頁。
八、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民衆論壇』。
九、參閱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九日『民衆論壇』上『河南决戰之詳細故事』一文。
十、史特朗：『中國民衆』第六十二頁；魯易著『中國之革命與反革命（一九三〇年柏林出版）第三六
十一、史特朗：『中國民衆』第六十二頁以下；菲些耳著『蘇維埃之世界政策』卷二，第六六九頁。
十二、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民衆論壇』。
十三、一九二七六月十三日同上。
十四、魯易『革命與反革命』第三六三——四頁。
十五、一九二七年六月廿三日廣州Chinese News Service。
十六、『馮玉祥一九二七年六月廿一日給漢口通電』，見六月末新聞報。
十七、史特朗著『中國民衆』第七十二頁。

十八、湯良里：『秘史』第二八三——四頁。
十九、前揭書第二八五頁。
二十、一九二七年六月廿九日『民衆論壇』。
二十一、同上。
二十二、汪精衛：『黨必須領導民衆運動』，見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民衆論壇』。
二十三、同上。
二十四、『江西特派員報告』，見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十四、十五日『民衆論壇』。
二十五、孫科：『革命與民衆』，見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漢口『中央日報』。
二十六、N. Lenzner ：『中國問題』，見一九二七年六月廿九日『國際通訊』。
二十七、瞿秋白：『中國革命』第一一四頁。
二十八、前揭書。
二十九、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五日『民衆論壇』。
三十、參閱一九二七年七月九日『民衆論壇』。
三十一、瞿秋白：『中國革命』第一一五頁。
三十二、『八七告黨員書』；瞿秋白『中國革命』第一一五頁以下。
三十三、一九二七年六月廿三日『民衆論壇』。
三十四、參閱Sz Toh-li：『第四次全國總工會代表大會』，見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漢口『泛太平洋工人報』。
三十五、『羅佐夫斯基演辭』，見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泛太平洋工人報』。
三十六、『第四次勞動大會宣言』，見一九二七年六月廿九日『民衆論壇』。
三十七、一九二七年六月廿二日『民衆論壇』。
三十八、史特朗著『中國民衆』第八十八頁。
三十九、一九二七年六月三十日『民衆論壇』。
四十、同上。

四十一、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同上。
四十二、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同上。
四十三、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同上。
四十四、陳獨秀：『告黨員書』。
四十五、湯良里：『秘史』第二八〇頁。
四十六、瞿秋白：『中國革命』第一一八頁。
四十七、一九二七年七月廿八日『國際通訊』。
四十八、布哈林：『中國革命之地位』，見一九二七年七月六日『國際通訊』。
四十九、布哈林：『中國革命之急劇轉變』，見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國際通訊』。
五十、『共產國際執委會關於中國革命現局的決議』，見一九二七年七月廿八日『國際通訊』
五十一、『中國共產黨宣言』，見一九二七年八月四日『國際通訊』。
五十二、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廿六日『民衆論壇』。
五十三、陳獨秀：『告黨員書』。
五十四、一九二七年七月廿八日『民衆論壇』。
五十五、一九二七年七月廿二、廿三、廿四日同報。
五十六、一九二七年七月廿九日同報。
五十七、湯良里：『秘史』第二九一頁。
五十八、一九二七年七月六日『中央日報』。
五十九、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民衆論壇』。
六十、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民衆論壇』；Woo著『國民黨與中國革命之未來』第二七〇——三頁也有宋慶齡宣言的原文。

第十六章　註　解

一、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日『密勒士評論報』上，Jui Fu-san 作『騰沸著的革命發生了什麽』。
二、『中國工會在目前局勢中的迫切任務』，見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五日『泛太平洋工人報』。
三、一九二七年七月廿九日『民衆論壇』。
四、『陳獨秀對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的組織報告』，米夫著『中國革命』第一一七頁有引證。
五、『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八日中國共產黨中央通告』，見一九二七年上海出版之『六次大會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工作』；周恩來著『現時黨的組織問題』（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五日，上海出版）。
六、列寧著『左派幼稚病』英譯本第十四頁。
七、『一九一七年三月黨大會紀錄』，見托洛次基著『史大林造謠學校』第二三九頁。
八、史大林：『論現時的幾個問題』，見一九二七年八月四日『國際通訊』。
九、史特朗著『中國民衆』第二四二、二五一——二頁。
十、魯易著『中國革命之教訓』，見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倫敦『勞工月刊』。
十一、魯易著『中國之革命與反革命』第四〇五頁。
十二、『國際形勢決議』（一九二七年八月九日蘇共中央執監聯席會議聽取布哈林報告之後通過）；見一九二七年

八月十八日『國際通訊』。
十三、『中國工會之迫切任務』。
十四、『國際形勢決議』。
十五、陳獨秀：『致共產國際一封信』，見一九三〇年七月一日上海『無產者』（中國左派反對派『無產者社』機關報）。
十六、托洛次基著『問題集』第五十二頁。
十七、華崗著『中國大革命史』第六章第一節。
十八、瞿秋白著『中國革命』第一二二頁。
十九、華崗著『中國大革命史』第六章第一節。
二十、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眞理報』，一九二七年八月三日『國際通訊』有譯文。
二十一、史大林：『論現時的幾個問題』。
二十二、同上。
二十三、『國際形勢決議』。
二十四、華崗『中國大革命史』第六章第一節。
二十五、瞿秋白著『中國革命』第一二三頁。
二十六、華崗著『中國大革命史』第六章第一節。
二十七、『八七告黨員書』。
二十八、華崗著『中國大革命史』第六章第八節。
二十九、『國際形勢決議』。
三十、陳獨秀：『告黨員書』。
三十一、『江蘇省委決議（一九二八年五月七日）』，見莫斯科『中國問題資料』第十四期第六頁，托洛次基著『問題集』第二二六頁有摘引。
三十二、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國際通訊』。
三十三、瞿秋白著『中國革命』第一二四頁。
三十四、華崗著『中國大革命史』第四章第七節。
三十五、瞿秋白著『中國革命』第一三五頁。
三十六、華崗著『中國大革命史』第四章第七節。
三十七、前揭書。

三十八、『江蘇省委第八號通告』。
三十九、瞿秋白著『中國革命』第一四三頁。
四十、前揭書第一三四頁。
四十一、前揭書。
四十二、一九二七年九月三十日『眞理報』，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國際通訊』有譯文。
四十三、瞿秋白著『中國革命』第一三六頁以下。
四十四、同上。
四十五、『中國共產黨十一月中全會政治決議案』，見一九二八年一月廿六日『國際通訊』。關於『不斷高漲』底學說的爭論及羅名尼茲的『不斷革命』說法，請閱托洛次基著『中國問題集』第一六三頁以下及『列寧死後之第三國際』第一八七頁以下。
四十六、『十一月中全會政治決議案』。
四十七、瞿秋白著『中國革命』第一三八頁以下。
四十八、『十一月中全會政治決議案』。

第十七章　註　解

一、瞿秋白著『中國革命』第一三八頁。

二、黃平著『廣州公社及其準備』，見一九三〇年上海出版之『廣州公社』（文集）第七七、八〇頁。

三、前揭書第七十七頁。

四、A. Neuberg（漢茲・牛曼之假名）著『武裝暴動』第一〇八頁；瞿秋白著『中國革命』第一二八頁。

五、鄧中夏：『廣州公社與共產黨的策畧』。見『廣州公社』第四三頁。

六、前揭書第三十九頁。

七、羅佐夫斯基：『廣州公社的教訓』，見『廣州公社』第一三九頁。

八、Neuberg 著『『武裝暴動』第一一〇頁。

九、前揭書。

十、羅名尼茲：『廣州公社週年紀念』，見『廣州公社』第二〇五頁。

十一、陳紹禹：『廣州暴動的經過』，見『廣州公社』第一三九頁。

十二、前揭書第一四二頁。

十三、Neuberg 著『武裝暴動』第一一四頁。

十四、『廣州公社』第八十五頁，黃平一文。

十五、『廣州公社』第一四二頁，陳紹禹一文，Neuberg 著『武裝暴動』第一一二頁。

十六、『廣州公社』第一四二頁陳紹禹一文。
十七、Neuberg 著『武裝暴動』第一二四頁，
十八、『廣州公社』第五頁，羅佐夫斯基一文。
十九、Neuberg 著『武裝暴動』第一一三頁。
二十、前揭書第一一五頁註。
二十一、『廣州公社』第八十九頁黃平一文。
二十二、『廣州公社』第六頁羅佐夫斯基一文。
二十三、『廣州公社』第八十九——九十頁黃平一文；牛曼說『蘇維埃』由十六人成立，參閱 Neuberg 著『武裝暴動』第一一一頁。
二十四、參閱托洛次基著『問題集』第一五一——七、二〇三——六；托洛次基著『列寧死後之第三國際』第二〇一——一二頁；『工人代表蘇維埃何時，又在什麼條件之下才應成立，』見『共產國際提綱與章程』（第二次大會）第六二——五頁：關於史大林的『蘇維埃』學說，又請閱本書三一一頁註。
二十五、托洛次基著『列寧死後之第三國際』第二〇一——一六頁。
二十六、往後關於十二月十一——十三日事變的敘述均參照『廣州公社』一書內各篇文章縷述的詳情及漢茲·牛曼在『武裝暴動』內的記載。
二十七、托洛次基著『問題集』第一二八頁以下。
二十八、『廣州公社』第五十五頁鄧中夏一文。
二十九、Neuberg 著『武裝暴動』第一一八頁。
三十、『葉挺關於廣暴的報告』，Neuberg 著『武裝暴動』第一二三——六頁有引證。
三十一、Neuberg 著前揭書第一一八、一二四——五頁。
三十二、『廣州公社』第五〇——一頁鄧中夏一文。
三十三、前揭書第五十二頁。
三十四、前揭書。
三十五、『廣州公社』第一四六頁，陳紹禹一文。

三十六、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北京晨報』。
三十七、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三十八、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北京『益世報』。
三十九、Neuberg 著『武裝暴動』第一一八頁。
四十、前揭書第一一九頁。
四十一、『廣州公社』第一五八頁以下，陳紹禹一文。
四十二、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密勒士評論報』。
四十三、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大公報』。
四十四、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同報。
四十五、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北京晨報』。
四十六、『廣州公社』陳紹禹一文摘引。
四十七、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密勒士評論報』；關於照片，請閱『國民黨反動之五年』。
四十八、瞿秋白：『中國革命』第一五二頁。
四十九、前揭書附錄，第二四七頁。
五十、前揭書第二三二頁。
五十一、前揭書第二四六頁以下。
五十二、『中國問題決議』，見『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九次全會通過之決議案』第五十二——四頁。
五十三、前揭書第四十八——五十一頁；參閱托洛次基著『問題集』第二一六——三一、二九三——五頁；又參閱托洛次基著『列寧死後之第三國際』第一八六——二一二頁。
五十四、托洛次基『問題集』第二九四頁引證。
五十五『廣州公社』第二九四頁，羅名尼茲一文。
五十六、『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決議案』（一九二八年上海印行）第三十一頁。
五十七、『殖民地之革命運動』，見『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通過之提綱』，一九二九年紐約印行，第三九——四〇頁。
五十八、同上第三頁。

第十八章　註　解

一、關於國民黨恐怖的詳明紀載請閱伊羅生編之『國民黨反動之五年』。

二、參閱中國海關每年報告；中國銀行每年報告；陳翰笙著『中國經濟之解體』（一九三三年五月份『太平洋時務雜誌』）；Rajchmann 報告附錄（一九三四年四月，南京出版）；一九三六——七年『華人年報』（Chinese Year book），『中國年報』等。

三、參閱一九三二——四年上海『中國論壇』，該刊每星期詳載國民黨之不抵抗及鎮壓抗日運動。

四、一九二八年七月三十日『國際通訊』。

五、參閱『共產國際綱領』（一九二九年紐約印行）第五十八頁；托洛次基著『問題集』第一七三——四頁；『列寧死後之第三國際』第一九六頁。

六、參閱麥克思·夏克曼在『列寧死後之第三國際』英譯本上的序，又見該書第十九頁以下。

七、『殖民地之革命運動』第四十一頁。

八、托洛次基著『問題集』第二〇六頁。

九、前揭書第一七五——六頁。

十、前揭書第一八五——六、二〇三頁以下。

十一、布哈林著『國際形勢與共產國際之任務』，見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廿三日『國際通訊』。

十二、托洛次基：『問題集』第一九八頁。

十三、一九二八年七月廿五日『國際通訊』。
十四、同上。
十五、『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通過之政治決議案』，見『中國共產黨六次大會』（一九二八年上海出版）。
十六、『關於改組派，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國C·P的信』（一九二九年十月廿六日），見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五日上海『紅旗報』。
十七、一九二八年七月廿五日『國際通訊』。
十八、『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八日中央通告』，見一九二九年十月上海出版之『第六次大會後中國共產黨之政治工作』第四十二——三頁。
十九、『河北省之革命鬥爭與工會運動』，見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上海『鬥爭』報（中國共產黨機關報——譯者）。
二十、林東海（譯音）著『中國之工人運動與勞工立法』（一九三三年上海出版），房福安著『中國勞工』第七十四頁；天津『南開週刊』第廿九期。
二十一、房福安：『中國勞工』第九十七頁。
二十二、澤民（譯音）：『下層統一戰線問題』，見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八日『紅旗報』。
二十三、項英：『過去一年來工會運動之發展與目前之任務』（一九二九年二月八日在全總執委會第二次擴大會上報告），見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五日上海『中國工人』。
二十四、『一九二九年 二月八日 共產國際 執委會 給中國C·P一封信』，見『第六次大會後之政治工作』一書。
二十五、周恩來：『現時黨的組織問題』，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五日上海印行。
二十六、顧遂寧：『殖民地之革命運動』，見一九二八年十月四日『國際通訊』；項英『工會運動之發展』；『工會問題決議案』，見『第六次大會』一書。
二十七、項英：『工會運動之發展』。

二十八、白凱聲（譯音），『工人運動之現狀（一九二八——三〇年）』，一九三〇年上海出版。
二十九、前揭書。
三十、羅邁：『李立三路線江蘇工作之檢討』，見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上海『眞理報』。
三十一、『中國共產黨四中全會决議案』，一九三一年二月，上海印行。
三十二、『李立三路線在順直的實踐』，見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上海『眞理報』。
三十三、中央工人部『一九三一年份工人運動報告』，見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紅旗』。
三十四、『反對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見一九三二年三月廿五日『紅旗』。
三十五、王明、康生合著：『今日之革命中國』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三次全會上演講辭），一九三四年紐約出版，第四十四頁。
三十六、米夫：『中國革命危機之新發展』，見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五日『共產國際』。
三十七、『中國之蘇維埃』（一九三四年莫斯科出版）第十三頁。
三十八、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日『紅旗』。
三十九、米夫：『新發展』。
四十、H. D. Fong：『中國之紗業與貿易』第十六表。
四十一、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日『紅旗』。
四十二、D. K. Lieu ：『上海之繁榮和工業化』（一九三六年上海出版）第二九四頁。
四十三、米夫：『新發展』。
四十四、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日『紅旗』。
四十五、『論下層統一戰線問題』，見一九三四年二月一日北平『青年戰線』。
四十六：周恩來：『組織問題』。

四十七、一九三〇年三月廿六日『紅旗』。

四十八、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三中全會上報告』(一九三〇年九月廿四日)。

四十九、一九三一年五月十日上海『布爾什維克』。

五十、『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廿九日國際來信』。

五十一、錢雄(譯音),『江蘇省委對第二次代表大會報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廿九日上海印行。

五十二、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日『紅旗』。

五十三、王明、江聲合著『今日之革命中國』第四十八頁。

第十九章　註　解

一、董里（譯音）：『關於朱、毛紅軍的歷史和現狀的報告（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見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上海『中央軍事情報』。
二、同上。
三、同上。
四、『告全黨同志書（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見『六次大會後之政治工作』。
五、『一九二九年十月廿六日國際來信』。
六、『中國共產黨二中全會政治決議案』（一九二九年六月）。
七、中國共產黨中央第六十八號通告。
八、M. James 和 R. Doonping 合著『蘇維埃中國』，（一九三二年紐約出版）第十頁。
九、陳獨秀：『關於所謂紅軍問題』，見一九三〇年七月一日上海『無產者』。
十、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一九二六年紐約出版）第十八頁。
十一、『農民問題決議案』，見『六大』一書。
十二、錢雄『江蘇省委報告』。
十三、『農民游擊討論』，見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五日『中央軍事情報』。
十四、米夫：『走向中國革命的大風暴』，見一九三〇年

四月廿八日『眞理報』，一九三〇年六月廿五日『紅旗』上有譯文。

十五、參閱托洛次基：『中國之政治形勢與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派之任務（一九二九年六月）』，見一九三〇年一月廿五日『無產者』；『中國國民會議的口號』；『中國革命之前途和任務（國際左派反對派宣言）』，（按以上各文均收入中譯『中國革命問題集』中——譯者）。

十六、『中國問題決議案（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局一九三〇年七月廿三日通過）』，見一九三〇年十月廿三日上海『眞理報』。

十七、『一九二九年十月廿六日國際來信』。

十八、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六日『紅旗』。

十九、『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數省首先勝利（一九三〇年六日十一日政治局通過）』，見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九日『紅旗報』。

二十、一九三〇年三月十六日上海『眞理報』。

二十一、『新的革命高漲……』

二十二、羅邁：『在上海活動份子會上演講辭』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日上海。

二十三、『新的革命高潮……。』

二十四、『國際給中國黨的信（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收到）』，見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上海『眞理報』。

二十五、一九三〇年九月六日『密勒士評論報』。

二十六、一九三〇年八月七日『國際週報』。

二十七、『政治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一九三〇年九月三中全會決議）』，見一九三〇年十月三十日『眞理報』。

二十八、Kuchiumov 演辭，『關於李立三路線的討論（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見一九三一年五月十日上海『布爾什維克』。

二十九、同上。

三十、同上。

三十一、瞿秋白：『吉安之得失』，見一九三〇年九月九日『眞理報』。

三十二、周恩來：『爲傳達國際決議對三中全會的報告（一九三〇九月廿四日）』見『三中全會資料』第九期。

三十三、何孟雄：『給中央的意見書』（一九三〇年九月八日、十月二九日），一九三一年一月六日上海印行。

三十四、『瞿秋白同志聲明書（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見『四中全會資料』；『周恩來同志聲明書（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該項聲明即周氏對三中全會報告小册子的序言）。

三十五、一九三一年五月十日『布爾什維克』。

三十六、『國際給中國黨的信（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六日收到）』。

三十七、『目前的政治形勢與黨的中心任務』，見一九三一年二月二日『眞理報』。

三十八、『國際給中國黨的信（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六日收到）』。

三十九、『一九三一年六月十日給紅軍及全黨組織的訓令』；『中央關於緊急任務的決議案』，見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布爾什維克』。

四十、『李立三對三中全會演說辭』，見『三中全會資料』第十期。

四十一、王明和康生合著『今日之革命中國』第八、廿八頁。

四十二、一九三三年九月八日、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國際通訊』；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三日紐約『新羣衆』。

四十三、史沫特萊著『中國之紅軍行進』（一九三四年紐約出版）第二十頁。

四十四、參閱梁平（譯音）：『五一與紅軍建設的幾個重要問題』(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鬥爭』)；『江西黨大會

的總結』（見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日『鬥爭』）；洛甫：『向右傾機會主義開火』（見一九三三年七月五日『鬥爭』）；梁平：『蘇區的現金問題』（見一九三三年八月五日『鬥爭』）；毛澤東著『粉碎第五次圍勦與經濟建設的任務』（見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紅旗』）。

四十五、伊羅生編『國民黨反動之五年』第一二九頁。

四十六、王明和康生合著『今日之革命中國』第九頁。

四十七、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上海『中國論壇』。

四十八、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九日『字林西報』。

四十九、參閱Rajchmann 報告附錄：『江南若干地方的調查』。

五十、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晚報』。

五十一、見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央公論』，『今日之革命中國』第四十頁摘引。

五十二、『關於緊急任務的決議案』，見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布爾什維克』。

五十三、『政治決議案』，見『六大』。

五十四、一九二九年六月『二中全會政治決議案』。

五十五、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國際關於農民問題給中國C·P的信』。

五十六、一九二九年八月『中央接受國際關於農民問題的指示的決議案』。

五十七、惲代英：『閩西蘇維埃之過去與未來』，見一九三〇年三月廿六日『紅旗』。

五十八、參閱一九三〇年六月四日『紅旗』的蘇區代表大會專號；『關於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大綱』，見一九三〇年六月廿一日『紅旗』。

五十九、區芳：『蘇區代表大會的結果』，見一九三〇年八月三十日『我們的話』。

六十、陳紹禹：『爲什麽不組織農業工人的工會呢？』見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七日『紅旗』。

六十一、『國際給中國黨的信（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六日收到）』。
六十二、一九三一年三月八日上海『黨的建設』。
六十三、『湘、鄂、蘇區通訊（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四日）』，見一九三二年三月上海『工農通訊』。
六十四、洛甫：『蘇維埃政權下的階級鬥爭』，見一九三三年六月五日瑞金『鬥爭』報。
六十五、毛澤東：『蘇區土地分配之再審查是中心任務』，見一九三三年八月三十一日『紅旗』。
六十六、毛澤東：『赤色中國』（一九三四年倫敦版）第二十二頁。
六十七、王明和康生合著『今日之革命中國』第十頁。
六十八、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瑞金『鬥爭』報。
六十九、洛甫：『五一與勞動法實施之檢討』，見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鬥爭』報。
七十、『湘、贛黨給中央的報告』，見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紅旗』。
七十一、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紅旗』；一九三三年二月四日『鬥爭』報。
七十二、洛甫：『五一與勞動法』。
七十三、洛甫：『蘇維埃政權底下的階級鬥爭』。
七十四、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七月十日『鬥爭』報；一九三三年二月四日『鬥爭』報；毛澤東：『赤色中國』第二十頁，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五日『共產國際』。
七十五、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紅旗』。
七十六、『中華全總常委會關於工會會員問題給蘇區工會的信』，見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七十七、鄧穎超：『爲增強無產階級鬥爭的檢討』，見一九三三年二月四日『鬥爭』報。
七十八、『中國的政治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見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五日『共產國際』。

七十九、一九三三年四月五、廿五日『鬥爭』報。

八十、博古：『爭取黨內的布爾什維克路線』一文有引證，該文見一九三三年二月廿三日『鬥爭』報。

八十一、洛甫：『江西的羅明路線』，見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鬥爭』報。

八十二、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鬥爭』報。

八十三、一九三三年八月廿九日同報。

八十四、羅邁：『爭取布爾什維克的轉變』，見一九三三年八月廿二日『鬥爭』報。

八十五、洛甫：『向右傾機會主義開火』，見一九三三年七月五日『鬥爭』報。

八十六、周恩來：『粉碎第五次圍勦』，見一九三三年八月廿九日『鬥爭』報。

八十七、一九三三年十月廿一日『鬥爭』報。

八十八、關於江西封鎖的詳情，請閱一九三四年九月二、三、四日天津『大公報』上該報隨軍（國民黨軍）特約記者的報告。

第二十章　註　解

一、參閱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三日上海『中國論壇』。

三、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國論壇』；『中央給滿洲組織的信（一九三三年六月九日）』，見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五日瑞金『鬥爭』；羅邁：『滿洲的民族革命戰爭』，見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五日『鬥爭』報。

三、見本書第十八章註三十三、四十四。

四、『布爾什維克工作與革命鬥爭的榜樣』，見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共產國際』。

五、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紅旗』。

六、『滿洲事變與反帝運動的基本任務』，見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鬥爭』報。

七、見本書第八章註三十三。

八、一九三二年一月廿七日『中國論壇』。

九、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五日同上。

十、『中央關於在反帝運動的聯合戰線問題告全黨組織及全黨同志書』，見一九三三年六月十日上海『鬥爭』報，『中央關於第五次圍剿與黨的任務決議案（一九三三年七月廿四日）』，見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瑞金『鬥爭』報。

十一、參閱洛甫：『論蘇維埃政權與民衆政權』一文，該文見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鬥爭』報。

十二、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全會（一九三一年九月『提

綱和決議案』（莫斯科，一九三三年出版）第十六頁。

十三、一九三二年五月廿一日『中國論壇』。

十四、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三日同上。

十五、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三日同上。

十六、王明：『今日之革命中國』第三十三頁。

十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見一九三四年六月一日『國際通訊』。

十八、一九三四年八月廿五日『上海晚報』；一九三四年九月二日『大陸報』。

十九、王明：『今日之革命中國』第三三頁。

二十、王明：『殖民地國家之革命運動』（對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報告），一九三五年紐約出版，第十五、二十一一二十一頁。

二十一、前揭書第十三、二十頁。

二十二、一九三六年三月三十日紐約『工人報告』。

二十三、王明：『革命運動』第五十一——二頁。

二十四、『團結禦侮之基本條件和最低要求。』

二十五、『毛澤東給救國會全體會員的一封信（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

二十六、『統一中之中國』第三十頁。

二十七、愛德加·史諾：『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一九三八年紐約版，第三九二頁。

二十八、Harry Gannes：『中國之統一』（When China Unites），一九三七年紐約出版，第二六五頁；史諾：『西行漫記』原本第四一四頁。

二十九、蔣介石和蔣夫人：『蔣介石將軍』，一九二七年紐約出版；又參閱 James Bertram 之『中國之第一次行動』（First act in China）。共產黨在此次事變中的立場可在一九三七年三月 China To-day 轉載的各種電報中看出；又參閱『關於西安事變』（一九三七年一月『共產國際』報）。

三十、史諾：『西行漫記』原本第四一七頁。
三十一、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紐約『工人星期日報』。
三十二、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紐約『泰晤士報』；一九三七年二月廿二日New York Herald Tribune；Gannes：『中國之統一』第二七九頁；史諾：『西行漫記』原本第四二七頁。
三十三、一九三七年五月China To-day。
三十四、一九三七年四月三十日『紐約泰晤士報』。
三十五、一九三七年七月China To-day。
三十六、Philip Jaffe：『中國的共產黨人告訴我』，見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二日紐約『新羣衆』，參閱史諾：『西行漫記』第一九四頁。
三十七、史諾：『西行漫記』原本第三四二——三頁。
三十八、Nym Wales：『中國蘇維埃旅行記』(The Passing of the Chinese Soviets)第一九三八年一月紐約『亞細亞雜誌』。
三十九、王明：『中國必能勝利！』一九三七年紐約出版，第四十五頁。
四十、托洛次基：『列寧死後之第三國際』第一七七、一九六頁。
四十一、一九三八年一月廿四日『紐約泰晤士報』。
四十二、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八日『上海大美晚報』。
四十三、史諾：『西行漫記』原本第二七五頁。
四十四、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廿三日哈瓦斯電訊。
四十五、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廿七日上海『大美晚報』。